



麦克米伦回忆录

1

风云变幻

商务印书馆

编者的话

麦克米伦 (Harold MacMillan, 1894—) 是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1894年2月10日生于伦敦。年轻时, 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9—1920年任驻加拿大总督副官。1924年当选保守党议员。1940—1942年任军需供应部政务次官, 接着, 担任过一个很短时期的殖民部政务次官。从1942年至1945年大战结束, 担任英国驻西北非盟军总部驻节公使。之后, 他先后担任过空军大臣、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国防大臣、外交大臣以及财政大臣。1957年1月, 他继艾登之后出任首相, 至1963年10月卸任。此外, 他在1960年还被选为牛津大学校长; 1979年10月访问过中国。

麦克米伦退出政界后即着手写回忆录, 从执笔到最后一卷出版, 前后历时近十年。

《麦克米伦回忆录》共分六卷, 译成中文三百余万字。作者站在自己的立场, 记述了从童年时代起至卸任首相五十年间英国国内和世界许多大事, 其中包括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 以及第二次大战后东西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史料。六卷的标题分别为: 第一卷《风云变幻》(1914—1939年); 第二卷《战争风暴》(1939—1945年); 第三卷《时来运转》(1945—1955年); 第四卷《乘风破浪》(1956—1959年); 第五卷《指明方向》(1959—1961年); 第六卷《从政末期》(1961—1963年)。

本书因字数很大, 组译、校订和编辑工作都费时较多; 又因各卷竣译时间参差不一, 所以各卷出书间隔既长, 也未能顺序出版,

而是先出了第五卷，再出第六卷，然后依次从后往前出，最后出第一卷。第五卷封面不统一，有待再版时再行统一。

本书第一卷由山东大学外文系翻译组译，参加者有鲁少平、江家鼎、连富英、关引光等同志；校者是山东师范学院外文系翻译组，参加者为刘衍书、沈保和、郭模曾等同志。

1983年9月

目 录

| | |
|-------------------------------|-----|
| 序言 | 1 |
|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 | 30 |
| 第二章 家庭背景 | 48 |
|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 60 |
| 第四章 插曲 | 110 |
| 第五章 训练时期 | 122 |
| 第六章 选入议会：最初印象和人物评论 | 152 |
| 第七章 二十年代的生活 | 186 |
| 第八章 1924年至1929年的议会 | 205 |
| 第九章 重大危机：1929—1931年 | 250 |
| 第十章 抢救灾难 | 289 |
| 第十一章 访问俄国 | 331 |
| 第十二章 重建 | 363 |
| 第十三章 决定命运的年代：1931—1935年 | 387 |
| 第十四章 1935年的大选 | 432 |
| 第十五章 疑虑和迷乱 | 443 |
| 第十六章 中间道路 | 488 |
| 第十七章 慕尼黑：绥靖的历史 | 520 |
| 第十八章 滑向战争 | 590 |
| 附录 | 616 |
| 一、《重建》概要 | 616 |
| 二、《就业规划》导言 | 625 |

| | |
|---------------------------|-----|
| 三、《未来五年》第一部分概要：经济政策 | 627 |
| 四、《和平的代价》摘要 | 640 |
| 五、《防卫的经济方面》摘要 | 647 |
| 索引 | 653 |

序 言

我于1964年8月4日开始写这本书,这一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五十周年。这次可怕的冲突,把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里曾经导致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中影响最深远的那一次革命的各种力量都调动起来了,而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便接着发生了第二次这样的冲突,其规模甚至更大,历时更为长久。我们离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过于近,因而尚无法领会其全部含义。然而,在这两次大动荡中,旧世界消亡了,一个新世界已经诞生。

五十年前,各欧洲大国仍然享有其大帝国的传统,抱着大帝国的希望。

至于我,还能回忆起我们这个帝国并以女王为其顶点的这个国家的极盛时代。那就是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的庆祝大典。虽然在幼儿园里经常念叨着女王,因而加强了对她的印象,但现在我对于她的记忆已经淡漠了,可是对于那一系列游行的军队我却仍然在脑海里留下了一幅清晰的图景,队伍由各族人民组成,穿着各式各样的制服,走在军队前头的是英国陆军里个子最高大的军官艾姆斯上尉。在1914年,这些形形色色的军队毫无疑问都是能够用来支持英国大国地位和利益的。

在这两次战争之间的年代里,人们也许已日益认识到一场不可避免的变革正要发生。然而我们还是怡然高唱着这个扩展自己版图的日不没帝国的赞歌。

今天,当那些主要的欧洲大国或已摆脱自己的责任,或已结合于一个较广泛较松散的联合体之中,这些迷梦便也烟消云散了。这

些观念在现代这一代人看来不是不可理解的,就是令人厌恶的。

2 同时,在全世界,另一次革命正在发生着,两次大战都对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当我下笔写到这些话,听见头上飞往盖特威克机场的大喷气式客机的隆隆声,或是听见乡村公路上川流不息的小汽车的声音,代替了我儿童时代各种马拉车辆的得得声和丁当铃声时,我就会想到这一次革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引起的巨大变化已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1914年8月在整个欧洲熄灭的灯光已在幽暗的贫民窟内闪烁着,也在辉煌的会议厅里照耀着。今天,实用科学的光辉给最卑微的家庭也带来了使之普遍感到舒适与方便的照明,这在本世纪最初十年内还是梦想不到的。然而这些光辉也带来了新的可怕的恐惧,带来了灭绝人性的大规模残杀手段,使我们上一辈人感到惊惧而为之咋舌。

社会革命是近五十年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这方面技术虽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还不是唯一的动力。和十九世纪“迟者遭殃”的竞争哲学——极端个人主义大相径庭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集体责任感,关心人类大家庭,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中世纪理想的想法。当一个大主教可以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基督教异端”的时候,他正是揭示出我们离开那个时代已经多么遥远,那时满足于歌唱“有钱人住城堡,穷光蛋倚大门”,并心安理得地把安排各自财产的责任归之于上帝。对大多数英国人说来,“福利”国家的出现也许是近五十年发生的一切变化中最为明显的了,因为它对他们的生活具有那么密切的影响。但与这新增长着的集体主义同时存在而未被忘却的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个人主义比较美好的方面,个人决定的自由,首创精神以及责任感。的确,关于国内政治问题的争论,大都由于这两种哲学起着有成果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随着对社会看法的这一改变,经济思想中也出现了一个新纪元。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自由党旧日的放任主义的学说衰

微了。大多数公正人士的头脑中已开始出现这样一种思想，即在国家和与生产、分配、甚至交换有关的人士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形式³的有效伙伴关系。对正统理论起反作用的极端形式——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连工党也未曾严肃地提出。然而在那些曾经深入钻研过他们党的历史并对该党的哲学潜心探讨过的托利党人看来，托利主义财政与经济的传统原则自从 1886 年以来就被辉格党和自由党的新党员削弱了。在自由党内，阿斯奎斯及其比较“温和的”追随者们是忠实于古典经济学说的；而且劳合·乔治在第一次大战前发挥出来的那种生气勃勃的力量，依然留下了它们的痕迹。随着三十年代国际局势的暗淡，以及重整军备变得必不可少，这类关于政府与工业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愈加尖锐，愈加紧迫了。

对英国来说，两次世界大战意味着往外倾泻它自己的财富到了这样一种规模，以致使它从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债权国，至少是短期间变成了一个经常负债、财政困难的债务国。自从我青年时期以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相对经济实力改变得更大了。那时候，交换中的奥妙，收支差额，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储备规模，增长率都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普通人不得与闻。当时的政治论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涉及过这些问题。甚至认真的报刊也很少提到它们，普通刊物更是把这些问题完全置之度外。大多数商人一生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他们出口自己的产品，不过为了利润而已，并非受到官方鼓励出口运动的推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公众已经讨论起货币问题来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里，这个问题曾经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中带着几乎是宗教般的热情进行过激烈辩论。这表明情况已和流行于 1914 年以前的年代里的气氛截然不同，那时候，商业界大致说来对于货币制度的功能是漠不关心的。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特别是由于恢复金本位后，英镑定价过高对英国产生了影响；

1929—1931年信贷结构发生总崩溃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又产生了影响，长期以来被认为属于学术范畴的那些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酷的现实了。当未加利用的资源是那样多，那样明显，人们开始对货币信用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表示怀疑，看来这种信用会使他们注定要遭受贫穷和失业。“捧着聚宝盆挨饿”已成了描述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情况的一句流行的口头禅。^①

这一切仍然是活生生的问题。国家与工商业之间的适当关系如何，仍然是一个辩论中的问题。辩论有时是在理论上进行的，有时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的。为了改善信贷而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虽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某些国家的困难虽已促使人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普遍衰退的重演，但我们大家都明白，问题并未得到最后解决。辩论在继续进行；计划仍在一个接一个地提出。虽然迄今世界已逃过了一场灾难——也许部分是由于人们普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要么发展要么死亡的缘故——然而我们还是过着尽往好处想的日子，而我们如果诚实的话，便不得不承认我们尚未找到真正的答案。信贷的基础与生产潜力仍旧不相称。风险仍然存在。

本书第一卷从一次战争叙述到另一次战争的爆发。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时期中有较长的一段时间看来是充满希望与信心的。尽管困难重重，我们并不怀疑热情会产生知识，会引导我们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只是在最近几年内我们才好象希腊悲剧里所描写的那样不知不觉地卷入一场事先虽看到却无力预防或制止的大灾难。我于1924年被选入议会，除了当中两次短暂的间断外，到1964年议会解散时止，我一直是一名议员。因此，在本书

^① 这句话在邓达斯(后来的梅尔维尔勋爵)1800年10月28日致斯潘塞勋爵的信件中出人意外地出现。他提到“人们由于人为的因素不得不捧着聚宝盆挨饿这一谬论”。

这个第一卷中将要描绘的极其重要的年代里，我得以列席下院观察事态的发展。虽然直到1940年丘吉尔组阁时为止，我从来不是任何一届政府的成员，但我认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多数大辩论也大都参与过。随后的几卷将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年代，直到1963年10月我辞去首相职务为止。

在这场伟大的戏剧场景中，我个人的卷入是以一个小人物开始，而以担负重任告终。虽然许多我曾对之负有责任的重大事件必须详加叙述，特别是在后面几卷中，但我无意将本书写成一本辩护状；作为出生于这次大变动之前，并作为在这个使人非常惶惑而又非常振奋的奇异新世界幸存下来的几个老年人中的一个，我倒有意叙述一下也许不仅仅会使我的同时代人——可惜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现在还活在人间——感兴趣，而且会使经历过某几幕或某几场但未得窥其全貌的青年和中年男女也感兴趣的故事。

霍勒斯·沃波尔在他的一封信中对报道当代的困难发出怨言说：

生活于自己时代的恶果之一就是直到死时也还不了解自己时代的真相。

然而，观众确实看到了某些东西，而且是有关当前角逐的东西。丘吉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序言中这样写道：

同前面各卷一样，我尽力之所及，仿效了迪福的《一个骑士的回忆录》的撰写方法。在那本书中，作者以他个人的经历为线索，记述和议论了重大的军事和政治事件。^①

这种方法对于一个并不希望成为历史学家，仅是致力于记录他自己时代较为低微工作的人同样是适合的。我主要的意图就是按照事情留给我的印象，或许说按照事情对我生活发生的影响而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伦敦，1948），第7页。

描述它们。同时，我还力图以“五十年的变迁”这一宏伟背景为衬托，把我这幅有限的图画描绘出来。

在我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岁月里，建立在海上实力之上的英帝国权威尚未遭到挑战——至少可以说，尚未被动摇。我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们都扎根于这样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内英国海军维持近一百年的世界和平；在这个世纪内，除了对于大国生活并无多大冲击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外，并没有发生过把英国卷入其中的欧洲战争；在这个世纪内，欧洲各国，尽管有着许多较小的和若干较大的困难，仍旧发挥其作用，维护住了和平，并使各国相互的力量，包括它们对殖民地的野心，在不引起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得到调整。这个世纪是这样一个人时期，在这时期大多数明智的人士，不管是保守党人还是自由党人，都觉得在解决国内政治与社会问题方面正在取得令人满意的进步，而且觉得这种进步将继续下去，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动乱。这个世纪是这样一个人时代：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财富的生产，甚至其分配，都有了显著的增加，当然也出现过某些暂时的衰退。但这在当时，正和以后的情况一样，被认为是任何经济体系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紧接着拿破仑战争而出现的动荡和混乱消逝之后，国际金本位已成功地建立起来，而且保持下来。无论是过分的通货紧缩还是过分的通货膨胀都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经济萧条时期的失业现象虽然后果严重，但在经济发展时期都得到了正常的补救。无论如何，普遍的看法是，人类不可避免地要遭到一定程度的苦难，例如贫穷或疾病。社会良心的刺激对于好思考的人当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八十年代激进改革家约瑟夫·张伯伦的真正继承者劳合·乔治的有力影响之下，1905年的自由党政府使许多人觉得它有点刺耳地表达了这些感觉，而只有少数反动派认为这种情况是预示着革命。改革，甚至是看起来很激烈的改革，都从未动摇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信心。

一般说来,我们大多数在中学或大学里的青年都觉得,无论是在对外政策还是对内政策方面,世界将或多或少地如同以前一样地进展下去。如果我们乐观主义者的话,我们就期望朝着人类更大的幸福持续前进。即使我们疑心更重一些,对德国沙文主义的种种事例或许日益感到惶惶不安,但我们当中没有哪一个人对于我们不久即将陷入其中的梦魇世界曾得到任何暗示。可是,一代人之后,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说,竟然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还没有完全推翻也是大大动摇了欧洲和 7
欧洲国家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一种原来以地中海为基础的文明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向外传播,最后欧洲人的优势至少在欧洲人自己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而且也为世界其余部分广泛接受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欧洲的影响有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给予古希腊的影响一样,不过规模较小而已。文明国家或自称具有较高的文明并借此统治着世界其余一大部分的那些国家,在一场剧烈而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自相残杀,因而弄得四分五裂。协约国(同盟国如有条件的话无疑也会这样做的)有点糊里糊涂地征募了数达十余万的非洲人和亚洲人(包括中国人)去观战。战争结束时,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的经济都遭到了部分的破坏,伤亡和残废达数百万人之多。一些古老的君主国被推翻了;人口众多、潜力巨大的俄国在社会秩序与结构方面经历了彻底的革命;奥地利遭到了肢解,没落下去;法国、意大利、比利时都蒙受重大损失,内部弱点立刻暴露出来。德国自己尽管免遭入侵的灾难,但在人力、财力和内部团结方面都遭到了损害。战争临近结束时,美国——至少暂时地——抛弃了曾经推行了好几代的孤立主义政策,参加了这次战争,给战争以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欧洲的优势,如果说尚未彻底完结的话,也似乎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从经济观点来看,欧洲由于巨大的通货膨胀和债台高筑,已处

于极为严重的境地；除非赖债，很少国家能够从这个罗网中解脱出来。旧的国际金融体系自动平衡似乎绝望地动摇了。许多人预言全部金融和经济权威的中心不久就要转移到美国去。

就不列颠海外帝国而言，殖民体系相对说来未受削弱。印度次大陆的庞大军队在支持英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印度日益觉醒并逐渐走向自治。在发展之中，虽然有些内在的困难，但似乎还没有理由马上就惊慌起来。在著名的领导人管辖之下的几个大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都确立了充分的独立，其表征之一就是它们各自签署了和平条约。

在英国，“适于战斗，适于选举”的战时口号使历史上最激进的改革方案得到了通过。一种接近于普选的东西就这样产生了，这是在一百多年前就非常强烈地提出过的要求，但经过三个法案都没有被采纳。一直到1928年，甚至要到1948年才完成，但在实际意义上，在第一次大战后议会民主取代了在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占支配地位的议会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时，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人们依然认为“战前”是“正常的”。政府各部门，伦敦商业区，商界以及工会的主要努力就是回复到走惯了的路上去。即使在纯政界，也是普遍主张稳健的。右翼倾向传统；左翼即使处在压力之下，也是倾向宪法的。大规模的长期失业，以及由此而招致的贫穷与困苦，由此而产生的辛酸与失望，在国内某些地区是存在的。关于俄国的事例大家谈论得已不少，而且同志式地交换了许多情报；但事实上不管是哪个社会阶层的英国人都不会有危险真正受俄国事例的诱惑。当时和现在一样，一般只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有共产党人。

因此，当人们几乎被他们重大的战争经历震撼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着。在英国，

的确如同在整个欧洲一样，战后最初几年并未将已经发生的事情全部揭示出来。从外表看来，一切大致如故。美国拒绝参加国际联盟，决定回复到孤立主义上去，使许多人感到满足，而不是惶恐。⁹虽然国联被这一行动严重削弱了，也许——我们要是知道的话就好了——由于这一行动注定了它要失败，但其工作却进行得颇有成效，给人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在我国，如同在许多国家一样，国联的积极支持者包括所有的党派，而且无疑包括所有党派中最明智的成员。战后年代的前半期整个欧洲确实曾经面临各种严重的困难，但却得到了显著的恢复，这部分是由于国联组织的努力，部分是由于国际贸易和货币的复兴，同时毫无疑问也是由于美国大规模贷款的结果。今天，这一事实往往被人忘却或忽视。我们考虑并谈论两次大战之间年代出现的那些可怕的情况；但是事实上，直到1929年大衰退时止，战后的头十年显示出旧世界具有显著的复兴能力，当然也显示出了新世界的繁荣景象。但是大灾难的来临只能推迟几年而已；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发生财政和商业的大衰退之后，接着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了道路。经济与财政一旦破产，许多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便拒付全部内债，从此欧洲就沿着走向毁灭的道路滑下去了。可是在英国和法国，许多人害怕俄国，仍然保持着早期所形成的认为共产主义具有侵略性的那种心情，因此对墨索里尼的上台，甚至对希特勒的胜利都不予重视。

从我初次进入下院的1924年到墨索里尼入侵阿比西尼亚的1935年，我和我最亲密的朋友们主要关心的是国内的问题。在1924年至1929年的议会中，当失业尚未大规模出现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倒是穷苦的征候和经济的失调——有关人的方面。但是，随着经济萧条的日益严重，失业情况的恶化，我们也越来越关心促进某种根本的治疗办法了。我们对第一个问题进行研究，迪

斯雷利^①给了我们启发，他对青年人的魅力仍然是不可抗拒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很自然地是受了凯恩斯学说的鼓舞，这种学说当时已开始从经济学家的队伍中传布到对现实政策感兴趣的所有的人们当中去了。

10 后来，希特勒的上台以及纳粹和法西斯独裁的蛮横无礼，促使我日益转向对外事务，并使我更加赞同和接近丘吉尔，使我自己党的出任公职的领袖们相对地不信任了。1939年9月3日宣战后，丘吉尔和艾登参加了政府。但他们未能使它维持多少时候。1940年5月席卷欧洲的风暴全面来临时，张伯伦垮了台，让位给了丘吉尔。丘吉尔让我在他的内阁中担任一个级别较低的职务，我接受了。我十六年的普通议员身份便告结束。几年之后，一天，令人厌倦的工作快结束时，丘吉尔把我留住漫谈，主要内容是谴责希特勒的。我当时可能显得对此不感兴趣，并要去睡觉。“你怎么啦？”他问道，“你赞成希特勒吗？”“不，首相”，我回答道，“可是不管怎样，你和我都有要感谢他的地方。他使你当上了首相，而使我当了一名次官。地球上除了希特勒之外，没有什么力量能办到其中任何一件。”我当时以为他会勃然大怒的；但过了一会儿，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那种奇妙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嗯”，他赞同地说，“这倒有些道理。”

自然，在那些战争年代里，我们大家不管地位高低，责任轻重，思想和精力都被可怕的斗争所占据：首先是为了生存；然后是为了胜利。日常的例行公事使我们完全忙于处理当前的工作，以至难于去探索那些正在出现的更重大的问题。然而，我称之为近五十年的伟大革命的某些重要特征已开始显露出来。在供应部，为了一个目标，我们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把整个英国的生产组织起来。我是多么深切地希望，某些为把生产组织得更好，并使政府与工业之

^① 迪斯雷利(1804—1881年)，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译者

间的联系更加有效而拟订的计划，能在那些浪费掉的年月里变得成熟起来。通过临时措施与合作，尽管由于挫折与破坏而有所耽搁，这些任务在两三年之内便卓有成效地实现了。即使在日常压力之下，我也不能不认为政府与工业之间的联系在战后必须有个新的转变。旧日的分离现象必须有所改变(如我相信的那样)，但不是“一切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都国有化”，而是变为一种真正的、有效的伙伴关系。我也懂得，英国财政体系如果孤立无助，仅仅依靠自己本土的和英帝国各地的资源，也是经受不住考验的。以“租借法案”形式提供的美援拯救了我们，使我们摆脱了某种灾难。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英美合作就是当时进行军事抵抗和最后恢复的力点。首相丘吉尔一开始就抓住了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个人的努力，美国才在公开保持中立的情况下给了我们一切可能的援助，只是没有参战罢了。无论如何，我同丘吉尔都由于有一位美国妈妈而沾了大光；当我们两国越来越紧密地互相靠拢时，我自然也就感到欢欣鼓舞了。

11

因此，我在供应部的最初时期便很强调我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年代里一直力图得到的教训。首先，必须有一个以政府、管理部门和劳工之间的充分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健全的国民经济。其次，任何国家不管多么强大，都有必要在紧急关头依靠别国的援助。独立和互相依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美国人很明智地记得第一次大战后战争债务的重担造成的灾害，因而制定了租借法，这实际上是一种永远不要求偿还的贷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个教训在我脑海中变得越来越强烈了。由于第一次大战后美国回复到孤立主义，同时整个欧洲发生疯狂的货币贬值，使经济与社会受到了影响，于是运动迭起，即使民主国家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和预见，这些运动仍可能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既然欧洲当时已经困惫不堪，胜利的赢得与和平的缔造就必须主要依赖英美合作了。

我在盟国统帅部担任了两年半的常驻使节，开始是在阿尔及尔，最后是在那不勒斯。在这段时间内我有机会对上述信念加以检验，并把它应用到实践中去。随着战争的进展，我明显地意识到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地位已发生了变化。英国曾经单枪匹马，独自承受了纳粹和法西斯攻击的全部压力。我们征集并部署了庞大的军队。我们进行了许多次战斗，打了许多败仗，但也赢得了几次决定性的胜利。可是，我也不能不认识到我们两国在财富与军事力量方面越来越悬殊。必须赢得战争并维护和平所依仗的伙伴关系，不能建立在力量均等的基础上，它必须建立在极其尊重与互相谅解之上，建立在对共同经历的艰辛记忆之上，以及建立在一种在和平年代里紧密合作以支持我们共同所抱理想的决心之上。从那时以来，尽管发生了一些困难和令人沮丧的事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我对英国政策这一主要目标的想法。

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的年代占支配地位的事件，是在俄国及其控制下的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出现的巨大分裂。和第一次大战后果不同，这次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和平会议，没有签订凡尔赛条约，战胜国方面也没有为解决世界重大问题而作出全面的努力。由于东西方的破裂，妨害了任何这样的步骤。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不幸的国家，先是遭受纳粹党人占领，然后又被共产党人占领——的第二次掠夺导致了一个包括美国以及几乎所有西欧国家在内的防御性军事联盟的建立。

在最近两代中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俄国的事件了。我记得 1914 年的夏天，一种传遍英国的神秘谣言激动着许多人的心灵：“俄国佬来了。有人在苏格兰看见了他们，靴子上还有雪呢！”奇怪的（即使是令人兴奋的）幻觉！接着三年之后，古老的沙皇制度崩溃了；克伦斯基有过一段悲剧性的插曲；权力斗争以列宁取得统治而告终。俄国军事上的瓦解影响了西线，

使得德国能够将东线军队调到法国和比利时去，从而发动了 1918 年 3 月的进攻，这次攻势是在美国军队有效地展开之前进行的，差一点儿取得了胜利。在这几年里，俄国注定从童年急剧地过渡到成年。它没有青年时期。

在战后，以及在第二次大战前的几年里，我们对俄国的政策是 13 犹豫不决和自相矛盾的。起初我们对白俄进行积极的但却是无效的武装干涉，这一政策在联合内阁中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劳合·乔治激烈反对，丘吉尔则极力拥护。英国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革命这一事实，并和俄国相互交换了非官方代表。麦克唐纳进而于 1924 年给予共产党政权以法律上的承认，双方互派了大使。但是，通过一项贸易条约和一项贷款协定的商谈，以建立进一步的和解的努力，却是不受欢迎的，并促成了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垮台。在 1924 年选举中，季诺维也夫信件^①这一插曲透露了俄国宣传机器在英国进行颠覆活动。这件事对工党非常尴尬，而对保守党则是相对有利的。在随后的 1927 年议会中，内政大臣乔因森—希克斯批准对俄国国家贸易组织全俄合作社驻伦敦的各机构进行一次突然搜查。结果收效不大；用范西塔特勋爵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发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即俄国在搞间谍活动和颠覆活动”。^②但搜查引起的愤慨情绪却足以使外交关系破裂。不过，工党政府于 1929 年又和俄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1934 年——发生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俄国加入了国际联盟，作为国联的成员国，直到 1939 年由于侵略芬兰而被开除。以李维诺夫为代表，由于他巧妙的外交手腕，俄国做出忠于国联原则的样子。“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这句名言立即得到了响应，英国自然也不例外。”越使俄国成为一个欧洲大国而不是一个亚洲

^① 见本卷原书第 152 页。

^② 范西塔特勋爵：《雾中行踪》（伦敦，1958 年），第 344 页。

大国，这就对大家越有利。”^①这句话虽然是鲍尔弗在不同的情况下而且是在革命前说的，但仍然很中肯，应当成为整个西方外交的
14 确定不移的目标。但是从希特勒 1933 年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极其重要的年代里，在英国掌权的人总是非常怀疑（当然不是毫无理由地）俄国的政策。人们只能揣测，如果在李维诺夫任职期间英国政府方面采取一种更为愿意帮忙的态度，那么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下历史的进程。但由于那几年英国抱着致命的犹豫态度，在本来可以通过英、法、俄联合，将希特勒及其一伙挡住的时候，英国竟使法国丧失了信心。甚至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当仍然还有机会的时候，与俄国的谈判还是进行得很无力，并无任何真正紧迫之感。

接着战争到来了，后来德国由于征服了法国、荷兰、比利时而得意忘形，或许是由于未能击败英国来圆满结束这些征服大业而沮丧，它就转而指向东方，情况又突然发生了变化。丘吉尔毫不犹豫。从那天起直到战争结束，西方给了俄国一切可能的帮助。然而，为进行战争而结成的联盟，以及我们和美国人慷慨提供的援助，都未能使我们的基本政策更接近些。美国人的政策比一些老于事故的人的政策更受感情的影响，他们肯定成了狂热的亲俄分子了。在雅尔塔会议上，由于罗斯福的软弱和虚荣心，丘吉尔几乎被撇在一旁，备受冷落。罗斯福自以为凭着他的手段能挫败斯大林，或者使斯大林成为他魅力的俘虏。随着美国物质力量不断增加，美国对战争努力作出的贡献比我们越来越大。丘吉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软弱而不愉快的地位。我记得 1943 年在雅尔塔会议前大约十四个月的开罗会议上的一段插曲，这件事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相和我同罗斯福总统在他的别墅中共进晚餐。我们很晚才驱车返回切斯特·贝蒂先生借给英国政府的米纳大厦。当

^① 布兰奇·达格代尔：《阿瑟·詹姆斯·鲍尔弗》，卷 2（伦敦，1936），第 437 页。

我们就寝前喝一点酒的时候，丘吉尔突然望着我问道：“克伦威尔是一位伟大人物，是不是？”我回答道：“是的，是一位很伟大的人物。”“啊”，他说道，“但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由于在青年时代老是对西班牙感到恐惧，他没有注意到法国的崛起。将来别人也会这样说我吗？”这个念头支配着他的战略意图，使他在1944年6月编制了他向总统发出的最大的一个呼吁——无效地试图阻止把 15 军队徒劳无益地调往法国南部，这些军队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东南欧登陆，并推进到不久铁幕就必然会落下的那条线以东几百英里的一个地点的。即使在战役的最后阶段，丘吉尔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努力。

在战后最初几年里，美国和英国先是原子然后是核力量的唯一占有者，那时西方的力量占压倒优势。当俄国人自己大规模地发展了核力量以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世界均势发生了变化；新的可怕的军备出现了；各主权国家承担着各种长期义务；英国政府历代遵循的各项政策完全倒转过来。这一切确实是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加入一个二十年的联盟，结果使我们的防御政策制度化，如同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所做的那样。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日子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甚至在1904年兰斯多恩勋爵同法国订约，最后导致了“英法协约”之后，许多明智人士都摇头表示吃惊。象罗斯伯里勋爵那样的一些政治家觉得这样与法国纠缠在一起必然要与德国发生冲突。我们随后参加的几次参谋会谈使我们于1914年在道义上受到约束。这几次会谈从未让议会和公众知道，只是在1912年才通知内阁。我们对来自东方威胁的外交和防御政策再也不能完全自主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啊！听到那些反对在政治与经济上同西欧更紧密地联合起来的人们进行的争辩，往往使我好笑，他们似乎忘记我们已经对共同防御拿我们的生命与生存作出保证。美国的传统政策也同样完

全倒转过来了。

在两届工党政府期间——1945年至1950年和1950年至1951年——两个主要政党在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但在国内问题上自然有激烈的争论。在一些可以称之为社会的问题上，普遍都接受了关于卫生事务以及显然为新民主政治所必须具有的其他改良措施的各种政策。甚至在战争重压之下，在联合政府期间，也为这些发展的某些方面作了准备，例如巴特勒的教育方案以及比弗里奇勋爵的著名的报告“福利国家的先驱”等。政治斗争主要是集中在经济与财政政策方面。工党政府似乎固执于一项扰人的、不再需要的控制政策。围困经济在被围困期间是极其重要的，但在保守党看来，围困解除后就应当放宽限制。发展，个人力量的解放，无论是私人或公共的企业与努力的出现，让整个国家力量的问题置于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之后的决心，所有这些要题似乎都比当时厉行的限制主义更有价值。此外，虽然得到了大量美元贷款，我们对于财政事务的处理却引起了一系列的危机，包括货币贬值，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可原谅的。毫无疑问，和所有反对党一样，我们曾经强硬地坚持我们的论点，有时是无道理的强硬。将来历史学家从容不迫地进行判断时，对此才有可能作出结论。无论如何，此时我们大家，不管属何党派，全都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活动着，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两次大战之间，似乎都是不可能的。财富的更加广泛分配；人民物质享受标准的提高和机会的获得；决心不断增加教育设施以满足他们的精神欲望；改进战前救济方式以便迅速承担老年和潦倒路旁者的照顾，所有这些激进的措施不能只是一个远景目标，而是要立即执行的问题，对此两党都是赞成的。政治家采取的手段与方法也许不同，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特别是大萧条之后的各时期不同，大规模失业和贫穷所引起的那些辛酸

情绪，现在一点也没有了。迪斯雷利所谓的“两个国家”已逐渐地但是稳步地成为一个了。

丘吉尔在 1951 年 10 月组织最后一届政府时要我担任负责人民住房的部门。我的任务是实现他与他的同僚们在上次选举中作出的保证。我担任这个职务直到 1954 年 10 月为止，共约三年的时间。1954 年 10 月，内阁改组，我担任国防大臣，到 1955 年 4 月为止。那时丘吉尔引退了，艾登组成选举前的政府，我改任外交大臣。我任外交大臣的时间很短，不到八个月，但在这期间内签订了奥地利和平条约，举行了第一次最高级会议。这几个月使我第一次得到机会在近距离内见到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引起大家注目的伯吉斯—麦克莱恩事件，我作为外交大臣，有责任在下院讨论一下自由社会允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了安全而置公民自由于不顾，这个问题我还得在更痛苦的情况下以首相的身份重新提出。可是甚至这些麻烦事情也有其有趣的一面。例如一天早上，一个保安部门的头目跑来见我，他笑容满面地说：“我抓住他啦，先生。我抓住他啦。我盯梢盯了他好几个月，现在我可抓住他啦。”我的脸色特别阴沉，于是他便问道：“你不高兴吗，先生？”我回答说：“一点也不错。当一个好的看守人打死一只狐狸时，他会一声不响地把它埋起来，对主人一点也不告诉。他一定不把死狐狸挂在狗窝外面。你的密探”，我继续说，“将不得不在法院、议会和报社面前亮相。可能要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来检查你的工作效率，那样你的成功就会使政府难堪，也许还会导致政府倒台呢。”这就是民主制度下的安全问题奇怪的矛盾现象。

1955 年 12 月我当了财政大臣，1956 年提出了我唯一的预算案，其中包括发行第一次政府有奖债券的各项计划。1957 年的预算案还未提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由于一系列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的事件从唐宁街十一号转移到十号去了。

1956年夏，纳赛尔夺取了苏伊士运河，形势非常危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下院不分党派，一齐起来对付这种专横威胁时的那种情绪。用盖茨克尔先生的话说，“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和我们在战前年代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那里遭受到的威胁如出一辙。”在那几个令人焦虑的月份里，首相一直使我与他的各种计划保持着密切接触。对每项决定我都在最大程度上分担了一份责任，这特别由于我是属于首相特别要向之征询意见的同僚之一。我仍然觉得，假若不是由于英美两国政府之间缺乏谅解而造成了损害的话，我们本来是可以不遇到过分的困难而渡过这次危机的。中东的稳定受到威胁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我任首相期间，由于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外交政策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花样，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这时英国就有必要为约旦的政治安全提供军事援助。

艾登的健康不好，他被迫于1957年1月辞职，这使他的同僚们都感到难过，甚至失望。四天之后，我接替他担任了首相。最初几个月是议会的内外都感到非常忧虑的一个时期。除了尽力对于那些面临我们整个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剖析之外，没有什么机会能做更多的事情了。在我担任过的不同的职务中，我处理过许多特殊的问题，但还没有应付过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我认识到两次大战及其后果已经引起了巨大的变革。我认清了旧社会已经死亡，一种新秩序正在费力地形成，带着它的种种危险，也带着它的种种希望。政府已经相当稳固，我便在我自己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同我最亲密的同僚们开始研究如何最好地抓住时机，以对付这个新世界带来的危险这一整个的重大问题。在我任首相的其余时间里，我的思想和精力除了偶尔被一些虽然很麻烦但比较细小的问题打断之外，全被这些基本问题占用了。本书最后一卷的大部分将用来叙述我们在力求突破一个错综复杂的、而且往往是令

人困惑的混乱局面时，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以及遭受了多大的失败。

首先，谈谈英国的经济。英国海外投资在第一次大战中大都消耗光了。在两次大战之间海外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重建，而 19 现在又不得不再次遭到牺牲。长久以来曾是一个债权国的英国，已经大体上变成一个债务国了。同时，美国的地位则相应地翻过来了。此外，美国给予英国的十亿英镑的庞大贷款在六年之内就被花光了，留给后代人去连同利息一并偿还。进行一次英镑贬值已经成为必要，而到 1951 年底又来了另一次贬值的威胁。自然，这对英国人民生产、工作、发明和奋斗的基本力量并没有任何削弱。的确，两次大战的结果，由于妇女就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劳动力大大增加了。如果说工作时间的缩短，假期的增多——这是极正当的——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工业和农业得以大量使用机械力量，其规模迄今为止是梦想不到的。生产财富的能力因之增加了许多倍；但为了满足现代生产和消费的欲求而需要进口的各种东西也增多了许多倍。十九世纪工业化的牺牲品农业复兴起来了，从交换观点来看，它肯定使形势得到了缓和。然而，一个就其面积来说人口非常众多的岛国，原料稀少，而又渴望获得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那就只能通过努力与节制相结合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了。

最重要的是，无论在国内或在我们对之负有传统和道义责任的那些海外国家里，成本和物价的上升，对资本的大量需要都使第二次大战结束时给我们留下来的储备突出地显得不足了。甚至竭尽全力也无法使储备的积累迅速达到足以应付增长着的贸易量。一句话，战后的英国一直是而且仍然是在做着“超过其资力的买卖”。这种许多世纪以来为个体商人所熟知的局面，可以由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通过银行贷款或在市场上另行筹集资本来补救，一个

国家要这样做就不可能没有困难。

因此，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们面临着的并将延续下去的困难，是持续性的，是经常出现的。一方面如果我们以人力物力所能支撑的那种最大速度前进，这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更多的进口，而进出口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就要出现贸易逆差。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降低前进速度，我们就要冒不能充分使用我们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危险。被人轻蔑地称之为“停停走走”制度的根源即存在于这种困难局面之中。我记得一位议会议员指责我一会儿使用制动器，一会儿使用加速器。我不禁要问，怎样能够期望一个人在一条拥挤的道路上还有别的方式开车呢。同时使用两种手法的那一政策自那时以来就得到了某些人的赞同，但似乎是有些奇怪的。

然而，尽管在经济领域内前进速度有些不规则，英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改善却是不容否认的。的确，现在叫人难以设想战后最初时期的情况，更不用说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情况了。在构成国民生活标准的每一项目——食物、衣着、住房、保健、假期、教育设施以及其他一切方面——当中，今天人民的状况与往日人民的状况差距是如此之大，青年一代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甚至老年人也很难捉摸得准。如果偶尔有些波动和挫折，我们不应夸大其词。这里引用一下麦考利的名言：“有时停滞不前，有时暂时倒退，但关于总的趋势，却是不容置疑的。单个的激浪可能是在倒退，但潮水显然是在上涨的。”的确，我们的政策是那樣的成功，反对党只好采取一种新的攻击方式，某些空想的批评家也跟着这样办，而这些批评家自己一般是处在富裕的环境中。有人说我们的“富裕社会”使我们的人民堕落了；据称我们使人民昌盛结果损害了他们的道德性格。回想起三四十年前的热烈辩论，我不禁对这些新鲜的、出人意料的指控感到有点吃惊。当然，物质繁荣可

能被利用得好,也可能利用得不好;它可能成为更加完美的生活的基础,为全国每一个人揭示出新的前景,也可能成为一种诱惑物,诱使人们放荡和愚蠢。但是,每当想起过去——贫民窟与穷困,以及失业,或者我的选区斯托克顿的情景:工厂关闭,有工作意愿和 21 能力的人们徘徊街头,渴望找到职业的,其数量竟达全体人口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我便不能同意这些乖戾的抱怨。恰恰相反,我有幸能看到这么大的一次变化,并在上帝保佑之下竟让我对这次变化起到一点小小的促进作用,我是由衷感到宽慰的。

技术革命的一个产物是大大地使现实的防御问题复杂化了。甚至在所谓“常规”武器方面,科学与技术进展之快,搞得人们手忙脚乱,以至使人很难设计并遵循一贯的方针。在非常规武器方面的问题也增多了。麦克马洪法案在美国通过这件事,对英国独立发展威慑力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共同研究修改这一法案的问题。经过他的努力,修改了这项方案,因而互换情报得以恢复,使我们节省了无数的金钱和时间,使我们能够自行生产有效的威慑武器,这和我国战略力量与政治力量都是有重大关系的。有关“蓝钢”和“蓝光”以及“闪电”和“北极星”——只举几个最重要的——的问题,它们全都需要作出具有经济与战略价值的困难决定,这也表明二十世纪的防御是多么错综复杂而且代价昂贵啊。

虽然我们的财政与经济地位和我们国防的需要以及满足国防需要的手段等方面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变化,但英帝国和联邦取得的发展仍然比任何领域的发展都更为显著。悲观主义者会把它描绘成为英帝国的消失;乐观主义者可能又会把它看作是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转变为一个自由与独立国家的联邦。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把我青年时代的那些旧地图卷起来了。在这些地图上地球的四分之一或者更大的一部分是绘成红色的。它不仅

包括那些英国后代建立的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直接受殖民统治的英国直辖殖民地，而且包括诸如埃及、苏丹这样一些事
22 实上一——如果不是法律上一——处于英国统治之下的领土。描绘这种变化之快的最富于戏剧性的方法恐怕得在联邦总理会议成员的数目中去找了。我所主持的第一次联邦总理会议是1957年召开的，最后一次是在1962年。第一次会议有十位总理或他们的代表出席；最后一次会议有十六位参加。到了1965年，有权派代表参加的就不少于二十一个国家了。“变易之风”确实刮出些结果来了。

变化过程始于1925年，那时成立了自治领部。结果，在加拿大和其他自治领政府之间进行联系的渠道就不再经由总督，而是移交给各自的高级专员了。后来的变化又经威斯敏斯特法案予以法律与宪法上的批准。到第二次大战爆发时，旧日的联邦（这里使用了个方便的字眼）——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事实上已成为独立国家，虽然由于血缘、传统和感情，尤其是对英王的共同效忠，使它们相互间以及和英国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两次大战之间立宪发展的过程在印度、缅甸和锡兰，都在稳步前进，在许多——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直辖殖民地中，也都初步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些直辖殖民地，譬如西印度群岛领地已具有古老的宪法，权力集中在白人手中。可是，扩大选举权的过程已经着手了。1935年的印度法案表明又向前发展了一个阶段。在当时的全部辩论中，一般都同意最终必需达到自治领地位或者实际上的独立。争论并不集中在最终结局上，而是集中在到达这一结局的手段和进度上。

第二次大战后，印度获得了独立，但不是英国统治了那么多世纪的统一的印度次大陆的独立，而是分裂的印度两部分的独立。独立带来了生命大量死亡的悲剧，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新

兴国家之间遗留下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独立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据了解情况的人们看来,独立已是无法再拖延了,虽然这种变化也许已经带来一些混乱与痛苦。

关于帝国或联邦的旧观念很快就发生了下一个具有决定性的 23 变化,对英王直接效忠改变为承认英王为联邦元首了。结果就同意新兴国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采用立宪共和政体。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既已作出这一让步——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当其他国家已具备独立条件时,便很难拒绝去作这种让步了。

吸引我们注意的下一个问题是英国同欧洲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处于反对党地位的 1945 年到 1951 年期间,丘吉尔在海牙发动了欧洲运动,结果成立了欧洲委员会,这样就帮助西德回到了民主和平国家的大家庭中。工党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也同意存在欧洲统一背后的那些主要目的,虽然可以公平地说,无论是他还是外交部,对于欧洲的新机构都是不热心的。应丘吉尔的请求,我在欧洲运动的奠基工作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保守党和全国一样是有自己的忧虑与保留的。我将永远不会停止谴责自己,即使我在内阁中的地位比较低,因为我没有把英国至少应积极参加那些最终导致签订罗马条约的预备性会议一事,当作具有高度原则性的问题提出来。这个问题当然讨论过,但外交部和财政部还有商业部都持反对意见,其理由大都是技术方面的。外交大臣艾登持怀疑态度,如果还不是反对这种思想的话。丘吉尔当时是首相,也许是因为年老,或者是由于不愿促使政府内部可能引起重大冲突,从而把我们这个微弱多数要去执行的国内建设的各种紧迫问题置于危险境地,他没有大力反对就接受了一般人的意见。此外,在发动欧洲运动的时候,丘吉尔想的更多的始终是欧洲的精神复兴,而不是任何明确的组织体系。当然,他对艾登为拯救欧洲防御共同体并从而让德国在法国赞同下重新武装起来而进行的努力,是给

24 了充分支持的。鉴于戴高乐领导法国以来所发生的事情，英国为了讨好法国舆论界，感到不得不负担欧洲沉重的军事义务，但对德国作为联盟内的一个军事伙伴仍然抱怀疑态度；回想起来真是怪事。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能够把这些义务减轻一些，但这些义务有条约限定，既繁重又是长期的。如同在自己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样，英国又一次给人家的多，而取回来的少。关于欧洲，我总是感到遗憾。我本职工作十分繁忙，包括复杂的立法问题和我担任职务以来算是最繁重的行政事务，以致尽管我写信给丘吉尔表示反对，但对问题未能坚持下去。我提出的那些问题可惜只是些辩解，而不是正当的理由。我只好以此自慰：即使我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事帮助我，我也没有任何希望达到目的。我在放过了原则问题以后，只能以自己具有正义感而聊以自慰。

我任首相后，起初几个月忙于处理其他问题，但在内阁的赞同下，我不久就决定，我们必须进行一次谈判，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制定一项计划，使英国和其他不包括在六国之内的西欧其他国家能够通过建立一个西欧工业自由贸易区来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合作。在一个时期看来，好象我们将获得成功，但是法国政府最后阻止这项工作，虽然它在六国中的伙伴们有可能表示同意。因此我们着手组织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就是六国以外的西欧七国。这个组织本身就有巨大的价值，同时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取得了并正在取得巨大的进展。在我们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伙伴们的赞同下，并与英联邦国家进行充分磋商后，我们的下一个步骤是提出联合王国加入六国集团的正式申请。接着在布鲁塞尔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最后，在1963年初，法国政府强行使用了否决权。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无论是我的同僚还是我本人，都不会懊悔

25 进行了这次冒险。我并不认为1963年1月的这些事件就是整个问题的终结。它们也许不过是一章的结尾罢了。

保守党于 1951 年重新上台后，东西方的分裂支配着全部对外政策。铁幕似乎是针也插不进的。在丘吉尔最后一届政府的年代里，我与首相的友谊使我常常成了他脑子里正在形成的一些新念头的知情者。我也知道，他是多么不愿意满足于东西方之间的这种完全僵持的局面。这种观点不仅在这两组国家（包括这两个集团中首要国家的盟国或卫星国）之间造成了严重而危险的分裂，而且它的恶劣影响还扩散到世界上每个国家中去。所谓中立国家，或者说那些力图使自己保持（用时髦话来说）“不结盟”的国家，都处于积极竞争者的宣传压力之下。确实它们有时候能够通过挑动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而坐收渔翁之利。但在总体上，世界生活不是被弄得瘫痪了，就是被败坏了，似乎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突破这堵钢墙。所有这一切使得丘吉尔焦虑不安。他怀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至少搞一些试探活动。我记得 1953 年春天，在他生病前不久，他还渴望着采取某种主动措施。他在那年 5 月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说中，公开讲出了他的希望。虽然国内和国外的官方对这篇演说有点冷淡，但它给全世界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丘吉尔因之便成了“最高级会议”这个概念的创始者了。艾登负责召开第一次最高级会议，那是 1955 年春在日内瓦举行的。虽然这次政府首脑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外长会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令人失望的，可是我觉得这两次会议至少是有了一些有益的接触。我作为外交大臣，两次会议都参加了；尽管正式讨论没有取得成果，但在在我看来，我们之间进行的非正式长谈却不是完全无用的。

我任首相后不久，就下定决心在时机看来更为好转的时候，一定要重新提出为艾登所遵循的丘吉尔的创议。1958 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和巴黎以及同年秋天在波恩举行谈判的时候，得到了机会²⁶把我的一些想法亮出来。那时候，莫斯科已经在柏林问题上从一种纯粹消极的立场转而采取一种威胁的立场。在 1958 年最后几

个月中，我决定访问莫斯科，并做了一些安排以谋求向我发出邀请。我通知了我们的盟友，当然事实上是不能说曾与他们磋商过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不大赞成，但祝愿我此行顺利；戴高乐总统持怀疑态度；阿登纳总理则被触怒了。但是英国的这种主动精神肯定受到了较小国家和中立舆论的广泛欢迎。访问一结束，我就又去巴黎、波恩和华盛顿，我的主要目的是向这些国家的首脑尽力施加压力，使他们同意或默许召开一次新的最高级会议。几个月之后，我成功了。但是，可惜的是U2飞机事件的结果，使这次就要开始的会议彻底告吹了，世界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在后来几年里，尽管东西方关系有了某些改善，但对柏林的威胁未获解决，这犹如一团乌云笼罩在全世界之上。除此之外，1962年又发生了古巴危机。在闹哄哄的一周里，俄国人将核导弹运进古巴的挑衅行为，似乎已使一场毁灭性的冲突迫在眉睫了。肯尼迪总统每天都用我们的专用电话和我联系——有时一天两次或三次——而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充分的鼓励与支持。他和我都确信俄国人在古巴问题上不会逼人太甚。但关于柏林怎样呢？结果，世界安全地渡过了一个黑暗而危险的时期，那个时期虽然短暂，但却使人感到极度痛苦。确实，我们立即又能够着手处理核试验问题了，而且还有取得成功的某些希望。

俄国人于1961年夏天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引人注目的爆炸，从而破坏了持续两年之久的非正式的暂停试验。这样西方就必须保持核技术与核力量的均衡，因此，英美在圣诞岛进行了一系列的核爆炸。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达成一项禁止核试验协定的想法。最后，尽管有些勉强，我和美国总统接受了俄国人愿意进行讨论以缔结
27 一项仅限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协定的意见，因为大家越来越相信，无论是从核试验给地球居民的健康造成任何损害这一点来看，还是

从核技术可以获得重大突破这一点来看，地下试验都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了。即使在那个时候也还是有许多潜在危险的。直到最后时刻，我还害怕功亏一篑。最后签订协定的最早消息是从华盛顿传给我这里的。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7月25日下午5点钟用我们的私人电话亲自告诉了我。在走向和平与更好的谅解的漫长道路上，最后总算取得了一些成就。

我已陈述了这些年来一直在我与我的同僚们的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主要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两次大战及其影响使世界和英国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所造成的这样那样的结果。现在我要谈谈最后一个问题，即我们同美国的关系。这个问题成为贯穿所有其他问题的线索，因为所有这些问题美国都卷进去了。在经济领域内，美国对内对外政策在每一点上都影响着我们。美国的经济衰退对我们向美国出口就相应地产生不良影响；而美国经济繁荣对我们则有所帮助。他们的关税安排对于我们生死攸关的，他们自己的关税和他们对于其他国家关税的影响，都起着这种作用。他们的贷款政策，以及他们先是通过马歇尔计划，然后又通过各种形式的援助，再加上加入并支持为扩大贷款基础而建立的各种国际组织对世界复兴所作出的贡献，其重要性是极为巨大的。在防务方面，除了我们已经解决的核情报交换问题外，我们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美国卷进了所有的联盟，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他们提供的实际援助可以从服役海外的庞大美军看出来。在欧洲，他们对我们的欧洲统一计划的同情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任何形式的自由贸易组织，无论是欧洲经济共同体，还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都必然会对美国的利益产生影响。在我们的对俄政策方面，美国人通过他们的核力量，当然在防御上发挥主要作用。制定谋求“缓和”或者达成一项核试验 28 协定的计划时，他们处于支配地位。在为实现裁军而进行的漫长、

沉闷、迄今毫无成效的斗争中，情况也是如此。

一方面由于我自己的血统，另一方面由于我一生无论在战时或平时都同情美国人，并和他们有紧密联系，我曾坚信世界和平与繁荣都将取决于英美之间的密切合作。至今这仍然是我的观点；但我从未想到这样就要放弃英国的重要利益，或者过分顺从美国人的意见。然而，每当英国同美国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而相互脱离时，灾难通常随即到来。例如，苏伊士运河的纠纷就主要是由于国务卿杜勒斯奉行了一项不正当的、碍事的政策造成的。幸而，在那个日子以后，每当发生约旦和黎巴嫩、沿海岛屿与台湾或者东南亚等新的带威胁性的问题时，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那么融洽，我们的影响在我任职期间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美国人很象英国人，处在两种情绪的折磨中。他们的一部分心神回顾着过去；另外一部分总是极力遥望未来。旧日的孤立主义顽固得很，俄国的威胁以及现在中国的威胁就象两次大战中德国的侵略一样，才促使它过时了。走回头路的倾向一直存在。同样，美国有慷慨而高尚的情操，这已具体表现在马歇尔计划以及对世界所有国家广泛提供的援助上；但同时又有保护制度的传统、压力集团的力量、附有津贴与限制的海运政策，有时名义上向世界开放签订重要合同而给外国投标者以有伤名誉的待遇。同样，美国的反殖情绪常常使那些象英国一样的已经正在推行着它们那博得好评、分阶段建立自治国家的自由联邦的计划的某些国家，受到压力，感到为难，特别是当它在联合国内采取一种毫无帮助的态度时，这种反殖情绪更是叫人难以接受。人们有时真想提醒一下我们的美国盟友，他们不过刚刚开始面临日趋尖锐的种族问题。然而，我总是发现与我的美国朋友们在绝对坦率的基础上无论正式地或非正式地打交道，都是很容易的。我与两位总统的交往是很幸运的。我对艾森豪威尔怀有真诚的情感与深切的尊敬，这是由

于他在整个地中海战役期间表现的公正与慷慨。在我们举行的多次会议中，他对待我如同一位可靠的老同事一般。我与肯尼迪总统结成了一种十分亲密的友谊。我们常常会见，并通过信件、电报以及电话不断联系。他到我苏塞克斯家里访问后几个月就死去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悲痛的个人损失，对整个世界则是一场灾难。

总而言之，随着我的经历，人们将发现英美合作是贯穿于整个一团乱线中的一条主线。

在这几卷书的叙述过程中，我将不得不涉及国内外的许多别的事件与危机。我突然出人意料地当上了首相，我卸任时也同样突然出人意料。我是因艾登病情严重而出任首相的，也由于我自己身患重病而去职。在1945年到1951年我们处于反对党地位的期间，丘吉尔总是每两周便在萨沃伊饭店招待他的影子内阁的同僚们，共进午餐。在一次这样的午餐上，曾端来过一份不成样子、又象又不象的布丁，他端详了一番，显得有些厌恶。他把侍者唤来：“请你把这份布丁拿走。它没有主题。”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对作家也是对厨师的警告。这篇序言——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就是要表明我的主题。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

1894年2月10日，我出生于伦敦卡多根街52号，就是我父母在伦敦住家将近五十年的那幢房子。象那个时期同一类型的大多数房子一样，我家的房子很高，但不结实。从幼儿室到厨房和地下室的距离好象很远。那时当然没有电梯，我们家也没有后楼梯。每样东西，包括食物和煤在内，每天都从楼下运到楼上去。昼间幼儿室面对着“园林”。这些树木分布在我们那条街和斯龙街之间，这是很有好处的，特别在炎热的夏天是这样。在我们房子对面有一棵刺槐，我很喜欢它；还有一根灯杆，灯夫每晚都来点灯。夜间幼儿室靠着一条小街，就在我们房子后面，有一家铁匠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铁锤敲打铁砧的声音似乎从一清早直到深夜老是没有完没了——那是打马掌铁和给马钉掌的声音。当我们在半睡时，我们依然可以听到四轮马车的辘辘声，夹杂着马蹄落在鹅卵石上的声音，车上的人是参加宴会后归来的。我们住的那条小街上有几个很小的店铺，但是不准我们到那些地方去。在女厨的帮助下，我们有时能去，她让我们从后花园溜出去。卡梅伦太太跟随我母亲多年了。她待人严肃而和气。当然幼儿室和厨房两家大吵其架，乃是习以为常的事。

由于房子后面靠着一条小街，房子前面每天有通过和停留的运货车和马车，当时伦敦所特有的气味仍然十分强烈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伦敦当时仍然是一个村镇。四轮马车、四轮大车、四轮运货车、公共马车、四轮出租马车、双轮双座马车、奶车、肉铺用车和其他的一切车辆，都是马拉的。马粪、麦

31
楷和麻雀到处都是。人们常常把大量麦楷堆放在靠街房子的外边，其目的在消除以上的吵闹声。这不是意味着一位富孀快死了，就是一位贵妇即将临盆。现在伦敦已经完全失去了古老的乡村气味，代之以汽油和柴油的新的臭气了。

在我们住的那条街的尽头，有一栋巨大的宅邸切尔西大楼。凡是读过爱德华·卡多根那部令人神往的回忆录^①的人一定会记得他对那里生活的描述。对我们这些地位较低的邻居来说，切尔西大楼就是一座男爵所领有的城堡，其重要性仅次于白金汉宫。我们偶尔被带到白金汉宫去看卫队换岗。当走过切尔西大楼时，我们在外面的台阶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位显赫的人物。他头发上敷着粉或者戴着假发，穿着蓝色上衣，红色天鹅绒背心，蓝色天鹅绒短裤，白色或黄色长袜，以及银扣皮鞋。此人博得我们很大的尊敬，我们深信他就是卡多根伯爵本人，正在那儿得意地检查他的佃户和财产呢。

在卡多根街的尽头向左拐；有时你可坐着儿童车去，有时你沿着人行道快步走。我已忘记那时我穿的是哪种衣服了，只特别难过地记得我穿过一套衣服，那是仿照一个写得很成功而有名的故事中的主人公的服装，叫作什么“小伯爵”服。这套令人厌恶的衣服包括一件棕色绒布上衣和一条短裤，此外还有一个宽大的镶边领子。这套极端令人厌恶的服装很可能只是在室内穿的。如果你特别走运，并且是晨起散步的话（这就是说，如果早饭后我和母亲在书房内作“功课”所受的煎熬成功地渡过的话），那你就可能有机会在路上遇到“皇家近卫军”到海德公园去进行早上操练，或者从海德公园上操归来：士兵们穿着白色粗呢短上衣；军士身穿红色上衣，系着值班带；军官则穿黑色便装军大衣，戴着白手套，系着佩

^① 爱德华·卡多根爵士：《洪水氾滥之前：回忆与沉思，1880—1914》（伦敦，1961）。

囊，头戴金色尖顶军帽。如果功课仍在继续进行，这种乐趣就只好放弃。不过也是一样，甚至在我们家里也能听到鼓笛乐队的声响，当队伍走过斯龙街的时候，中间只隔着一片树林。然而即使没有“皇家卫队”——这是一件特殊的、罕有的令人兴奋的事，因此，在
32 这个罪与愁的世界上只不过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偶然的“享受”而已——也还有大量离奇的景色在前头，只要南妮情绪好，想在铺子里多逗留一会儿，那就都可看见了。沿着卡多根街的那一尽头走去，然后往右转，便进入斯龙街的娱乐场所。沿着这条街再走几步，便是维戈先生开的鱼店。我现在依然可以想起那块很大的大理石板，上面摆满了各种鱼：有大的，也有小的，有的是扁平的，遍体斑点，奇形怪状，也有一些匀称漂亮的。维戈先生外貌威严，冬夏的穿戴总是一样：头戴草帽，蓝白相间的围裙把他的全身包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把令人望而生畏的家伙，就象一把大匕首，那是用来剥大冰块的。他偶尔拿出几只龙虾和海蟹给我看，这是对我极大的款待。走到街的正当中就是邮局，仿佛总有些理由老是要趁机走到那里去。我记得很清楚，那铁栏杆，那暗淡而令人讨厌的柜台，——这是我最早接触的官僚政治。邮局对面就是麦克弗森先生的体操舞蹈学校。我想那时，我不过才五六岁，每周要和别的小孩一起到那里去练习一两次，那时我初次体验到我对任何形式的集体表演都是厌恶的。我不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做事，尤其不喜欢做一些我认为本身就是愚蠢的事情，这种心理在我整个青年时期——在中学、在大学以及后来（至少在开始）在军队里——一直都在作祟。有一种叫“印度棍棒”的运动，特别使我感到苦恼。搞这个玩意儿，我动作不太灵活。我从来不能爬绳子，而攀缘一头固定在墙上的木棍更使我厌恶。我唯一喜欢的是一种叫做“旋转秋千”的玩意儿。你抓住一根绳子，悬挂绳子的机械就慢慢地旋转起来，许多孩子们便围成一个圆圈绕着跑。这还有点意思；不过，与

其说那是操练，倒不如说它是马戏或者赛会，同时是以当时民间乐曲那令人陶醉的调子伴奏进行表演的：

黛丝，黛丝，
你回答我呵，你呀你。
我已情痴意迷，
全因那样地爱你！

在斯龙街的尽头，往右一拐弯，是新建立的一些奇异美妙的商店，如哈维·尼科尔斯、伍兰兹等。这些商店取代了那些古老的建筑物；毫无疑问，那些老房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武士桥还不过是个村庄的时候。接着横过大街。在四轮马车和公共马车以一种拼命飞驰而过的情况下，那是多么需要灵活而危险的事啊！要不你就得从车辆堵塞当中穿过去。那时候，人们竟能忍受这样的不便而毫无异议，想起来真令人感到奇怪。在夏天，一次交通堵塞可能持续两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从艾伯特门进入公园后，就可以选一条小路走了。我们最喜爱的一条小路是在S形水池的尽头，到那儿去可以看到成群的家兔在围栏内跳来蹦去，而再走下去就终于能看见那个比我们见过的或想象过的任何水面都大的大湖面。然后我们回到幼儿室饮茶；夏天茶后在花园中游戏；冬天就在幼儿室舒舒服服地围炉取暖，并阅读心爱的书籍。那时，我们的眼界仅仅限于幼儿室之内，而南妮就是主管幼儿室的能手。因为我大哥比我大八岁，二哥比我大四岁，而我又没有姐妹，所以我在童年有点孤独。后来，无论在假期或者学期中间，我家请来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私人教师以及类似的人物，几乎可以说是多得过剩了；家里人对我的学习和精神修养从来也没有放松过。

这就是我九岁以前生活平淡的过程，直到我离开家到牛津的萨默菲尔兹地方的一所预备学校去上学时以前就是这样。跟我的儿女和孙儿女的生活比起来，我们那时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现

在，孩子们好象是横冲直闯，跑遍了整个欧洲——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在英国国内也是走东家串西家的。我们那时可不是这样。就我来说，我们没有在乡间拥有房子的亲戚，若有的话，我们自然就去了。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们墨守成规单调而规则地行事。学校也没有使那种情况改变很多。暑假期间，我们到亨斯坦顿，父亲为我们办了一所小型的暑假补习学校，麦克尔霍斯家我的一些表兄弟通常也同我们一起学习。要不我们就到肯特郡的金斯格特地方一所叫做荷兰大厦去。有一年亨斯坦顿来了一个马戏团，³⁴ 尽管我被认为年纪太小，不能观看演出实况，但还是让我去观看马戏团穿城而过的盛况。马戏团一行可真令人神往，无法忘怀。在这两个避暑胜地，都可以划船、游泳、骑马以及在悬崖间寻找化石。1906年，我父亲在苏塞克斯买了一幢房子和一份小小的产业。于是我的整个生活便发生了变化。我在我们这份半是农庄半是林地的小小土地上漫游。我未经许可就闯进了所有邻居的树林。我学会了观察，并且爱上了乡村景物，而此后它一直是使我感到极大愉快和轻松的源泉。

在当时，我们还都是伦敦孩子。我的两个兄弟同我不一样，他们生活在一个更为高级的环境里。他们那里充满着各种乐事，那是我不能分享的。他们对我都很和善，我认为这就宠坏了我。然而我是一个相当孤独的孩子，我们当时的生活方式并不能招引许多外面的朋友。

在我那些早年的回忆中，有几件事特别突出，主要是公众事物。如同我说过的那样，女王维多利亚即位六十周年纪念，以及身高六英尺八英寸的艾姆斯上尉率队前进的情景，我都记忆犹新。我们是从干草市场贝恩先生开的书店那里观看游行队伍的。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被带去观看灯火。一路上大半是父亲抱着我走过皮卡迪利广场和圣詹姆斯大街，不知怎的就到了家。我那时才三岁

零几个月，但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接着又来了庆祝马菲金胜利日（1900年5月19日）。那天我和我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正在公园里，将近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看见成群的人们集中起来了。我们跟着人群走，因为我们回家的路要么经过艾伯特门，要么经过海德公园角。在圣乔治医院附近的巴登——鲍威尔夫人的宅邸外面，大片的人群现在又出现在我的眼前。当然，我们不曾目睹那天夜里狂欢庆祝的场面，但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的人群。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还记得1901年2月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甚至当时我能够认识到伟大的女王之死意味着什么。我们从公园巷和南大街拐角处的一所房子里观看送殡人的行列。全是一片黑色——黑衣服、黑领带、黑纱；士兵们缓慢地行进着；乐队呜咽地奏着哀乐；国王爱德华七世；德国皇帝。不久在海德公园拐角处，从一辆公共汽车的顶上，我们看到军队从帕丁顿快步归来，此情此景使我高兴。

就我们的平淡生活而言，布尔战争当时成了我们感情不断激 35 动的根源。南妮是个极端派，她非常痛恨亲布尔的人们，并且相当没有根据地怀疑那位法国女家庭教师。有些地图上面插着小旗。把从《伦敦插图新闻报》上剪下来的图画，贴在剪贴簿上。在上衣翻领上佩戴着闪闪发亮的圆形小徽章，上面有罗伯茨和基钦纳^①的肖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基钦纳严峻的面貌，后来我也感到他是那么令人爱慕、那么令人感到亲切。还有一件无价之宝——一套英国团队的军服（我想是步骑团的），头上戴一顶阔软边呢帽，手持卡宾枪，那就是全部武装了。这是我的教父“老表乔治”送给我过生日或过圣诞节的礼物，并且还有佩剑一柄，这些礼物差点儿把我“惯坏”了。

^① 罗伯茨（1832—1914），英国南非军总司令（1899—1900）。基钦纳（1850—1916），布尔战争时英军总司令（1900—1902）。——译者

另外一个事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报纸的艺术家们用奇妙的手法描绘了那次大海战。我们也有一般人的亲口感情；我想我们之所以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矮小。勇敢的小日本啊！

后来，在我十二岁那年举行了1906年大选。当时正逢圣诞节。那时候，选举可以延续三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选举结果每天都公布一次，我们经常到哈罗兹外面去看热闹，看到鲍尔弗和坎贝尔一班纳曼的模拟像都在步步升高。我是坎贝尔一班纳曼的热心支持者——我想这是因为家里人都向着鲍尔弗。

其他一些罕见的但是突出的童年趣事，依然历历在目。星期日去逛动物园，凭绿色门票只准会员和他们的友人进入；乘坐双轮双座公共马车，多么紧张啊；星期日海德公园的军乐演奏，是在议会里长期遭到严守安息日的教徒的反对以后，新近获得准许的，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外免费听，也可以花费两个便士在用栏杆圈起的地方坐在绿色铁座位上听。但是，最好的一件事也许是乘坐火车外出旅行。这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仅限于夏天跟家人一起到外地去度假，而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呀。同去的人包括父亲、母亲、³⁶三个男孩子、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南妮、一名幼儿室的女仆、一名厨师。我们带着大量行李，包括那匹马。铁制的儿童用澡盆，上面有盖子，用皮带和绳子捆绑着，里面填满各种东西。起程那天的情景是忘记不了的。我总是提前一小时，或者更早就来到临时租来的一辆出租四轮马车（有时是四轮游览马车）前面，我们都坐马车到车站去。卡梅伦太太为我们准备了大量我们要在火车上吃的东西。当时火车通常是包车车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旅行时乘坐的是二等车。当时经济情况中等的家庭很喜欢采用一种折衷的方针：坐头等车花钱太多，坐三等车又不舒服。在我六岁或者七岁那年，有一次母亲带我到诺福克的几个朋友那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次旅行虽然并不怎么兴高采烈，但令人着迷。我们坐的是头等车

厢，因为那时火车还没有暖气设备，就为我们每人提供了一只暖脚器——那是一种长方形铁制容器，装满热水。我戴着一顶便帽——我的第一顶便帽；我母亲裹着围巾和毛毯，包得严严实实。这次旅行虽不象全家旅行那么令人开心，却别有迷人之处。过了不久，我们又有苏格兰之行，这是一次更加令人兴奋的旅行——先乘火车到格拉斯哥，然后再乘船到阿伦岛去。

除了南妮和幼儿室——那是我生活的真正中心和唯一的安全世界——我的童年回忆主要是与我母亲联系在一起的。我的父亲颀颀、缄默，老是工作。平时，他每天很晚才回家。在星期天，他有时带我出去，在S形水池划船，逛动物园，或乘电车到汉普顿宫去。自行车问世以后，我学会了骑车，我们经常绕巴特西公园兜圈子。（我父亲过去常好骑马，可是出了一次事故之后，他就不再骑马了。）如不这样，我是很少见到他的。在他那短短的暑假期间，我们得以短暂而幸福地体验到他那可爱的好脾气，他同我们一起游戏。我还记得他穿着白法兰绒衣服，头上戴着当时必不可少的草帽。另外，我记得这个时节他在伦敦，早出晚归，穿燕尾服，戴大礼帽，这是那个时代每一位受到尊敬的男子的标准制服。我的母亲一心一意地热心爱她的孩子。然而，她多少有点令人可怕，甚至令人望而生畏。她认为工作与行为都要合乎最高标准。我从她那里学会了乘法表，记熟了英国国王和女王的年代。这些我是能够对付的。但是还有一种称为“心算”的可怕的试验。她用意很好，但是对我不能准确而迅速地做出恰当计算又感到十分担心。

在我外出上学以前，我们在楼下总是讲法语的。因为我们的媵姆接连几个都是法国人，而后来，又加上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她成了我们的一位终身的朋友。再因为我母亲法语说得很漂亮，我觉得自己这门课超过了我的大多数同学。我能够流利地讲法语，也能够阅读法文书籍。这似乎还只是事情的一半。我一点

语法也没有学过——那些可怕的虚拟式呀，古怪的重音呀——这方面我还得从头学起。

我六、七岁时，到斯龙广场附近的格拉斯通先生的日校上学，一直到九岁。他是一位极好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通过它的创始人莫顿先生，这所学校与萨默菲尔兹有联系，所以也采用了同样的教学方法。我的主要朋友是一个姓格温的男孩，他是作家兼批评家斯蒂芬·格温的儿子。我记不清他的教名了。那时我们只是以姓相称。

我父亲在苏塞克斯购置一份小小的产业之前，每个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日都是在伦敦度过的。至于暑假，我们则到海边去。在伦敦我们并不是没有赏心悦目的乐事，但是次数不多，而我们是以前相当的热情盼望着的。最有意思的是到德鲁里舞剧院。由于我母亲与阿瑟·罗素夫人(她是我的教母)有交情，我们有时借用贝德福德公爵的包厢。包厢的后面有一座大厅，由豪华的侍者引导我们进入包厢，这简直是把我们引进仙境。接着戏就开始了！我当时想，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也想像不到还有像变换场景这样美丽的东西。但是我还有一个更美好的记忆，那就是在《树林中的孩儿》一剧中丹·莱诺和赫伯特·坎贝尔两个角色。我不知那时我多大了，但是我忘记不了丹·莱诺把广大观众吸引住了的那股迷人的力量。

也许我们的家庭生活比我母亲的大多数朋友和邻居的家庭生活多少要严峻一些。的确，我们是在重视艰苦工作和专心致志的传统中教养起来的。由于我的大哥丹尼尔是一个有才华的学生，我跟他比起来，真是相形见绌。在这一点上我有点悔恨。他是伊顿公学的头等生，而我仅仅是三等生。在巴利奥尔，他是他那个年级高级古典文学奖金的获得者；而我仅仅获得一般的奖学金。他获得牛津大学古典文学士学位初试第一名，水平很高，我好不容易

才勉强得到个优等。另外，后来我侥幸长得比他高了，我就不再接受他穿完的衣服了。

我二哥阿瑟是有音乐才能的，他真正懂得并爱好音乐。我真不好意思说，我过去——现在还是——全然不懂音乐。但是，我们相互喜爱，也不断争吵。

不管是戏剧或舞剧，都不像今天的电影和电视，并不是每天都能享受到的。每逢假日只能看一场戏或者舞剧。有时，长辈也带我们到自然博物馆去，总的说来我不喜欢它，因为骷髅使我有怕。不过，那里有一个绝妙的带摆的仪器，它以某种方式证明了地球确实围绕太阳旋转——一件我不想加以否定的事。

每星期日的晚上，我父亲给我们朗读，这是我们简单生活中安闲的乐趣之一。他读得好听，我总是坐在他的大扶手椅的角上。他朗读的大部分是诗——莎士比亚、密尔顿、济慈以及大量的丁尼生的作品。我一度也试图在我的家里恢复类似的传统，但家里人不接受。

我们个人阅读的内容很杂。父母从来不制止也不鼓励我们读哪一本特定的书。我们手头总有大量的书籍，但是还塞给我们大量的材料。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司各脱和狄更斯的作品；当然我们同样欣赏亨蒂、赖德·哈格德以及科南·多伊尔。那时，每一篇舍洛克·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都使我感到新鲜、兴奋。我也没有忘记，当我在萨默菲尔兹上学时，登载在一份叫《队长》的杂志上的沃德豪斯学校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作者写作《吉夫斯》以前的佳作，有其特色，质量很高。

回顾一下这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或爱德华式的家庭，那种在今天看来舒适而朴素的生活条件，是令人感到奇怪的。甚至在 39 我们的那个小小家庭中，我想除了南妮和一名媒姆，另外也还有六、七个仆人。我父亲在伦敦没有自备马车。但是当我们到乡下

时，我们有一辆单匹马拉的马车，这主要是为表示身份使用。我们没有什么奢侈品。我记得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我们伦敦的家中安装了一个浴盆。浴盆是安在当时房子必不可少的楼梯中间的一间小房子里。安装浴盆一事使大家都很兴奋。通常我们把马口铁澡盆放在幼儿室炉火前面；但是，装上了“大浴盆”以后，只允许我们每星期六晚上用它。这个浴盆长而且深，周边是桃花心木的，有着发亮的黄铜龙头，还有一个长的黄铜把手，样子象船的舵柄，这是用来灌水和放水的。向上有三级的台阶，还有一条绳子。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小S形水池，在里面可以划船。

我父亲很少谈宗教，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生来就沉默寡言。甚至一直到他临终时，我也弄不大清楚他的真实看法。他是按照我祖父的密友F.D. 莫里斯和查尔斯·金斯利的传统培养起来的。我找不到任何人比他更无私、更正直了，但是我认为他已经抛弃了教义。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我们当然都要学《圣经》和《经文》，做为我们教育的一部分。

我母亲是美国美以美教会“抚育”起来的，仍然保有强烈的新教感情，那不能说是偏见吧。她对于论点所做出的最强烈的辩解都是“耶稣会教义的”。可是，我们是圣公会信徒，我祖父在英格兰定居以后就信奉了这个教会。但是我们对于做礼拜并不特别热情，甚至也很不经常。当我们在伦敦时，我们到斯龙街的三一会教堂去做礼拜。我们搬家到苏塞克斯以后，就到教区教堂去了。每星期日晚上，我父亲朗诵晚祷词，冬季在饭前，夏季在饭后。

在某些日子里，有些妇女委员会在我们家里开会。我相信她们属于“妇女自由党工联主义者协会”或者属于“维多利亚同盟”，或者属于“妇女劳动者协会”。我母亲不是这些机构的名誉秘书就是名誉司库。这些女士们来我家总是坐四轮马车，这给我很深的
40 印象，特别是那些车夫和男仆。那些女士们块头很大，来时象巨浪

翻滚般；她们的皮衣、宽边帽和外套好象要把大厅都快填满了。我常常站在楼梯上看她们到来。由于某种原因，她们在餐厅里集会。

还有一些别的奇风异俗，现在已经全部消失了。其中之一与名片有关。我们出出进进时，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大厅桌上可以看到一只大浅盘，放着刚刚放上的名片。举行这一仪式要遵循一套神秘而重要的规则。有时似乎有三四张名片，却只有一个名字；或者是除了妻子的名片以外，还要加上一张丈夫的名片；或者是在母亲的名片上还要添上一两位大约是刚刚参加社交活动的年青女士的名字。有一种特别奥妙的风俗，就是将名片一角折叠起来，这显然意味着名片是本人亲自留下的，而不是由仆人送来的。我相信除了在外交界，这些传统习惯早已废除了。

最后，谈谈“拜访”。星期六或者星期日下午是拜访的最好时刻。我们经常楼梯上或在穿堂里碰见这种热心君子，他们主要是男人。我往往当做陈列品被叫到客厅里去，而我得到的报酬呢，则是看一下那动人的场面：来访者把帽子和手套放在桌子上或地板上。这些东西应该拿到楼上去而不应该留在大厅里。

在我离开家庭外出上学之前，所有我生活上这些杂乱的回忆，仍然留在我的脑海中。我不能坦率地说当时我很幸福，象我认为现在儿童那样的幸福。我的确不象我的儿孙那样幸福。我那时总是担心，怕自己做错事或者失礼。我受到一种神秘力量的压制，到头来这种力量肯定会把我毁掉。我总觉得不愉快的事似乎比愉快的事更容易发生。这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不慈爱，相反，他们深深爱我们。除了孩子们的幸福和成功之外，他们很少其他兴趣。另外，我们的媒姆拉斯特太太终生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为人和善而可爱，我结婚之后她成了我的女管家。（顺便说一下，我母亲的所有仆人，几乎都无限期地留了下来，尽管她待她们十分严厉。）不过，还 41

是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塔莱朗^①说过，任何人如果不了解大革命前的法国，便不知道什么是“生活的甜蜜”。这句话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些人的生活说来，也可能同样是真实的。但是在我的童年时代，上层中产阶级的幼儿室内却没有什麼“甜蜜”可言。但是，我们也许不同。当然，我们是有欢天喜地的时刻的。然而，我那时老是感觉到：总的来说，世界非常令人可怕，各种年龄的人们似乎都使人讨厌，而不是使人喜欢。因此，我逐渐害羞和敏感起来。我经过了长期的自我训练，才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种种拘束。每逢发表一次重要的演讲，我在头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感到强烈厌恶。下院或者讲台对我说来同样地使人讨厌；甚至在我担任了七年首相快要退职的时候，我对于议会质询也有痛苦之感，就象人们在参加竞赛或战斗之前的感觉一样。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的质询日，我都是单独用午餐，我总是把这做为一个规则。我即使不能克服这种神经质，也能把它隐蔽起来，其原因也许是由于我童年时听说过，这种焦虑是天生的，不可避免的，必须设法忍受。

1903年我九岁那年到萨默菲尔兹去，格拉斯通先生的学校里古典文学的基础很好。由于威廉斯博士的出色教导，我在1906年获得三等奖学金，到伊顿去学习。在伊顿公学，学校的小教室，它的一幢幢大楼和回廊，对该校创始人亨利六世的美好的回忆，以及它的全部值得骄傲的传统，这些都是得天独厚无与伦比的。那里生活朴素而思想高尚——至少在那时是这样的。而我是在这两种风尚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除了代代相同的学童日常活动之外，我最早的记忆是“创始人纪念日”，那次我不知不觉地上了实用经济学的第一课。校长依次赠送给我们七十名奖学金获得者每人一份纪念国王的礼品。那是一枚三便士的辅币。我哥哥丹尼尔——不是他自己了解，就是从与他同时的一位奖学金获得者梅纳德·凯

^① 塔莱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译者

恩斯友人那里得知——后来向我解释说，这点钱在十五世纪就算是一份十分象样的小费，现在却似乎微不足道了，这只是因为货币不断贬值的缘故。在以后的年代里，我时常想起这件事。虽然我不擅长运动，可是我喜欢板球，并且代表学校参加奇怪的“墙上足球游戏”^①。我们球队曾踢进一球，当时我是该队队员——多么难忘的一件大事啊。

但是健康不佳使我的学校生活受到了损害。我始终是一个身体虚弱的孩子，或者至少人们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我遭受过不少损伤，而且后来又克服了不少疾病，但我先天的体格基本上还是健康的。在萨默菲尔兹的时候，人们很早就叫我上床睡觉，而不和别的孩子一起熬夜，准备功课。我在伊顿公学的前半期，得了一次很厉害的肺炎，几乎一命呜呼。几年以后，我长得过快，因而出了毛病，被诊断为心脏不好。这就迫使我过早地离开了伊顿公学，卧床或养病好几个月之久。接连有好几位家庭教师来教我，我从我的古典文学家庭教师 A. B. 拉姆齐先生（后来他是剑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院长）那里得益很大，他细心教导，耐心帮助。他每周都来伦敦一次或两次，给我改正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作文。我在每一方面都很感谢他，我与他的亲密友谊一直保持到他的逝世。自然，我这个时期的生活有点孤独。除了我的古典文学课之外，我还贪婪地阅读英文书。

这个时期我跟许多伊顿公学的人保持着友谊，而在上大学的几年中又使之加强了。在这些好友中，最亲密的是朱利安·兰巴特（后来他是伊顿公学的低年级学监和副校长）、哈里·威林克（后来他是卫生大臣、剑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院长和副校长）以及哈里·克鲁克香克，他大战前后曾多次担任内阁大臣的职务。1945年我在斯托克顿竞选失败，而在布朗利举行的一次补缺选举中重新

^① 墙上足球游戏，英国伊顿公学特有的一种游戏，踢在墙上。——译者

当选以后,我必须履行通常的正式手续才能进入议院。按照惯例,前任大臣入阁必须由主任督导员和另外一位督导员介绍。我选定克鲁克香克和威林克为介绍人,他们都是前任大臣。我们同在1906年这一年在伊顿公学获得奖学金,并且在丘吉尔政府中同时担任过大臣。同样地威林克于1940年在北克罗伊登举行的一次
43 补缺选举中当选,我们三人都是丘吉尔政府的大臣,他是由克鲁克香克和我推荐的。我想,这在议会历史上真是罕有的。

在我的家庭教师中,有一位名叫罗纳德·诺克斯,后来他成了我最亲近的一位朋友。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他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在他逝世之前不久,他还到唐宁街十号住了一两天,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虽然我没有跟他一起脱离英国圣公会改而信奉罗马公教会(有一个时期我也很想这样),但我们的友谊并没有受到损害。在唐宁街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和他都知道他的生命危在旦夕。我用我的汽车把他送到帕丁顿,再坐火车到梅尔斯,几个星期以后他就在那里去世了。我可能是无意识地对他说:“我希望你有一次愉快的旅行。”他回答说:“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啊。”我接着说:“龙尼,你对这次旅行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了。”这是我们最后的谈话。在我离开伊顿到牛津这个空间,我的其他家庭教师中有一位是他的兄弟,名叫迪尔温。他或许是一位甚至比龙尼造诣更深的学者,但是观点和气质却很不相同。我全靠他的帮助,虽然确实没有在巴利奥尔取得古典文学奖学金,但至少被评得一般奖学金。

当我去牛津时,我大哥丹尼尔已经开始经商了。二哥阿瑟也离开了巴利奥尔,取得了律师资格。我最小,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少。那时我们都大部分时间住在苏塞克斯的乡间家中。尽管我们不断争论,因而吵起架来,我们家却是非常团结的。我父亲很欣赏我们的辩论,但他本人很少参与。我们可以讨论任何题目——宗

教、历史、文学、经济。他只是不赞成有关食物和金钱的讨论，他认为这是庸俗的，不值得认真考虑。把我们家庭连在一起的是一种团结感，这主要是以我祖父创立的商业为基础的，它对我们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学童的早期起，我就看见“麦克米伦”这个名字印在我们的许多教科书上。在我们家里，有我家公司出版的最新出版物，以及当时出版的其他一些有趣的书籍。我祖父的成就是我们非常引以自豪的。他为我们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这家公司仍然是一个家庭企业这一事实，更加使我们感到我们与公司及出版界和著作界息息相关。与我父亲合伙的是他的兄弟弗雷德里克以及他的堂兄弟乔治·麦克米伦。后来，我和我哥哥丹尼尔接替了他们。我一想到我的儿子莫里斯继承了此业，我就感到高兴。 44

我祖父的一生总是留在我们的脑海中。丹尼尔生在阿伦岛的上科里地方的一个宅旁小农场里，祖父本人在该岛最北端的“公鸡”农场住过。在洛克兰扎的教堂院内，到处都是麦克米伦家族的墓碑。访问这些对我们来说神圣的地方，乃是一次庄严的朝圣。在我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被带到那里去。

我的两年牛津生活最终对我证实了塔莱朗的话是适用的，即生活确实是甜蜜的。一个青年那时好象是突然长大成人了，特别是一个从家规严格、母爱几乎把人束缚住的家庭来的青年更是这样。度过家庭和学校的生活以后，在一个有无数新老朋友的社会里过自己的生活，这该多么令人陶醉啊。在学期间，我从事各种活动，参加每个可以参加的讨论。我在政治上是混乱的。我既是自由党激进派，又是保守党民主派和费边社会主义者。在大学生俱乐部里，我一般是支持当时的自由党政府的，特别支持它比较激进的作法。但是关于迪斯雷利的每一本书，只要能弄到，我就阅读，因为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回忆许多朋友的名字是令人沉闷的（虽然我很想这样作），他们对我友好，我对他们也有很深的感情。唉呀！不几年以后，幸存者很少了。其余的那些以后也都消逝了。在我终身的朋友中有杰弗里·马登、维克托·马利特、艾伦·赫伯特、克兰伯恩、文森特·梅西，还有无数的其他朋友。因为在家有点缺乏交往，我在牛津就尽情多交朋友。沃尔特·蒙克顿是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学生俱乐部的主席，他使我有幸初次加入那个集会，并且他对我始终是很好的。1915年在霍格战死的吉尔伯特·塔尔博特是我另一位忠诚的伙伴。在巴利奥尔大学教师中，厄克特（大家都称之为“斯利格”）始终是有耐心的、能宽容的。西里尔·贝利和皮卡德—坎布里奇是两位谆谆善诱的、忠诚的教师。靠这两位——他们都是杰出的古典文学学者——的帮助，我才勉强得以在1914年复活节期间的牛津大学文学士学位第一次考试中得个优等。除罗纳德·诺克斯以外，我最亲爱、最知心的朋友是汉弗莱·萨姆纳，他是我同年级的布雷肯伯里奖学金获得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得以生还，然而不到中年就夭折了。他曾当过万灵学院的院长。在我所认识的所有人当中，他的头脑最为精确、敏锐。大战结束时，他和我是我们年级获得各类奖学金的学生中仅有的两名幸存者。

和几位牛津朋友结伴到意大利（乘二等火车，一等轮船）去游览；在厄克哈特先生的萨沃伊德避暑处的小屋中举办朗诵会；假期中苦读，而在学期中参加非常愉快的社交活动，对于所有这一切，回顾起来，令人怀念，也感激不尽。

1914年的夏季学期最有意思，那时距文学士学位考试（结业考试）还有两年多，因此，这一学期几乎完全可以纵情享乐。又象经常在充满戏剧性事件的一年中那样，那是一个地道的英国夏天。牛津那时还不是一座工业城市，科学也还没有带来密集的建筑，它和过去几个世纪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现代化（除

了离城相当远的铁路以外)唯一的让步就是有了有轨电车,但那是用马拉的。那年整个夏天,我们在河上撑船、洗澡,院内闲坐,与朋友们一起吃饭和争论,在学生俱乐部里进行辩论,在纪念舞会上跳舞。学期结束时,我们计划在国外或者国内举行朗读会。我们中间有少数人——尽管如此年轻(因为在那时二十岁的青年人是不会被邀请去参加正式的伦敦招待会的)——偶尔也会接到伦敦大户人家的邀请。我记得这样一次邀请是在6月28日夜间。那是一次老式的大型舞会,楼梯上摆满了荷兰石竹和牛尾菜,卡萨尼先生的乐队,一个接一个地奏起华尔兹舞曲。开始时,跳舞的场地很挤,但是当老年人和显贵们离去之后,青年人就大享其乐了。我有点羞怯、笨拙,因为我没有姐妹,我几乎完全是生活在男性社会里的;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在牛津参加了几次舞会。在那个时期,⁴⁶华尔兹舞动作急速,很费力气。青年人照例要带上两条或三条备用的领子,先放在衣帽室里,领子皱了,就另换上一条。我记得有一天凌晨,这样打扮后,走到街上,听到一个报童大声叫喊新闻消息——因为那时晚报彻夜出售。他沙哑地喊叫:“奥国皇太子被谋杀了”。对于我来说,毫无疑问对于几乎全部伴客来说也是这样,这个新闻并无特殊的意义。

这样我就写到我的“五十年的变迁”经历开始的那一天了。旧世界结束了,美与丑、乐与忧、善与恶的奇怪混合物也随之而去——这是多么值得自豪的啊;回顾一下,或许有不少事情令人感到羞愧。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曾为自由斗争了二十多年,并且取得了胜利;它一百年来也曾帮助维持世界和平,并将文明传播到各个遥远的角落。对英国那些最狂热的激进派或者最苛刻的批评家来说,也不能不感到英国在这一连串的迅速变革中,如果说得到了不少东西,但也失去了某些东西。

第二章 家庭背景

在童年时代，甚至在少年时代，我们几乎完全被自己生活中的日常戏剧性事件所缠绕，痛苦与快乐，忧愁与幸福，瞬息万变地交替着。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们舞台上演员的数目与日俱增，令人眼花缭乱。我们是那样地着手使自己适应现实，或梦想未来，以至我们不大关心过去。

这样，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内部，我们认为成年人——父亲、母亲、叔伯、婶伯母以及堂兄弟们——是老一套的、已经定型的人物。我们很少知道，也不愿知道许多关于他们生活和性格的事情。只是后来，我们才学会了解他们或者他们的前辈。

在我早年时代，祖父丹尼尔的形象就与此不同了。他是我们家庭和财富的创建人。他与我的叔祖亚历山大都属于这个英雄年代的人物。他们的画像——或者他们的雕刻像——挂在我们家的幼儿室内，既惹人注目，又令人敬畏。至于家庭其他成员，我们了解得很少。然而我自己的经历与我生活过的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期的经历交织在一起，若是我要叙述的话，那我就应当对家庭的背景作一番说明。

1882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一书的作者托马斯·休斯所著的我祖父丹尼尔的小传出版了。这本小书细腻地刻划了一个具有异常魅力和性格的人物。“许多年轻的苏格兰人”，作者在他的序言中写道，“来到南方，发了财，建立了一些大商号。……”但是他又补充说，并不是因为在我祖父逝世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许多人促请他为我祖父搞点某种永久性的纪念物，他说他写传记的理

由是：“我认为不管谁，只要看到这些篇章，他便不能不承认，除了他那了不起的商业才能外，在这个人的个人品质和性格中有着某种东西。事实上，他有一种我们称之为英雄主义的极好的品质。”⁴⁸

丹尼尔·麦克米伦于1813年生于阿伦岛。他的祖父马尔科姆是岛的最北端“公鸡”农场的“借地人”。那个时代的“借地人”是一种“农民首领”，对四周小佃农的福利负有一定的责任。马尔科姆是英国国教的长老；他为人性格坚定，但对那些生病的人和不幸的人却很厚道。他的儿子邓肯摆脱了他父亲较为严格的传统以及教义和纪律的陈旧框框。当时崇高的信仰复兴者霍尔丹一家人到阿伦岛传教，马尔科姆对他们冷眼相待；但他允许他的孩子们参加他们的集会。马尔科姆的邻居威廉·克劳福德既是友人又是教会同仁，性格容易激动，而不那么严肃。较年轻的人们被这个新的运动吸引住了，其中包括邓肯·麦克米伦，他娶了威廉·克劳福德之女凯瑟琳为妻。丹尼尔就是他们婚后生的第十个孩子和第三个儿子。休斯谈到他说：“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似乎就显著地有着他的两位祖先的特征，长老马尔科姆是一个遇事有条不紊、富有责任感的人，长老威廉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人。”但是，象他深深受惠于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尊敬、慈爱、温柔、忠实——这些品质是相互关联的。此外，从她那苏格兰低地血统中——克劳福德一家本来是埃尔郡人，后来迁居来到阿伦岛——他继承了一种谨慎与坚忍的气质，这就可以把他那苏格兰高地人的激烈性格平衡一下。

我祖父是十二个孩子中的一个。其中四个很小的时候就被一种所谓流行病夺去了生命，那肯定是肺结核；他本人在二十岁前也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他一生常受到疾病复发的折磨，工作受到影响，有时需要长时间才恢复健康。尽管如此，在他四十二岁逝世时，他已为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并使它走上正轨。我祖父的生

49 平和成就已由托马斯·休斯在其纪念性著作中叙述过了，这里再做任何详细描绘都是不适宜的。而且，为了纪念公司建立一百周年，查尔斯·摩根在他所著《麦克米伦家族，1843—1943》一书中，已经把公司的历史叙述过了。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父亲便把托马斯·休斯所写的传记赠送给我了。我珍惜这本书，反复阅读。某些段落对我内心的抱负有所鼓励。甚至在我去牛津之前，这种抱负便肯定与我在政治上要设法发挥作用的决心密切地联系起来。我知道，由于别的关系，关于这方面将有许多困难，但我决心一一给以克服。

1824年1月1日我祖父当了欧文一个书商的学徒，时间定为七年，第一年每周工资一先令六便士，以后六年每周工资增加一先令。七年结束时，他十八岁了，在格拉斯哥的一个书商那里找到了职业。尽管健康不佳，他其后不久就下定决心在英格兰，如果可能的话，在伦敦碰碰自己的运气。1833年，当他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时，他那不知满足的野心遭到当时在斯特林当小学校长的哥哥马尔科姆的谴责。他给哥哥作了如下的答复：

你好象有点喜欢责备我野心勃勃，这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听你说“你怎么能有野心呢，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或你的家族是干什么的？”我曾经想过一两次给你一个答复，现在我就答复你吧。虽然我说话很激动，你可不要以为我在生气。我对你太尊敬了，不会出口不逊的。所以，你可别误会我。

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一个十分低微的人，如果我能够体面地把自己抬高一下，我是不会不那样做的；即使我所有的亲属都是奴隶，我也不会感到因此我便是一个奴隶，也就是说，如果我可以买到我的自由的话。我认为我不需步任何亲属的后尘。此时此地，我靠的是自己。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任何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上代替我。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必须由我自己做——我行我素。

这一段话特别激发我。在引证了他哥哥所提的问题之后，他

继续描述他童年时所受过的训练和教养，“我父亲的家族是干什么的？”

好嘛，那就从父亲谈起吧。尽管当他去世时我很年幼，只有十岁，然而我对他怀有最深的敬意。他是一位勤勉的人，一位最虔诚的人。听母亲说过，他一心只为家庭，别的什么也不考虑，那就是说，为了家里的人，他从来不考虑自己所受的劳累。

这对于我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个不坏的描述，特别关于他对他的家庭的献身精神，他接着写道：

你比我更了解他，你对他的评价可能更高。我现在高兴地（而且有些不只是高兴）回忆起他领着全家礼拜时的那种方式。虽然对于他的祈祷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跪倒在地那动作本身对我是有好处的，至少我认为如此。

他用同样的口吻继续写道：

对于我的母亲我可以就我所了解的说一说。我很了解我的母亲，就象任何一个儿子了解自己的父母那样，而我坚信她是全苏格兰最完美无缺的妇女。尽管她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很少，与上层社会交往很少，很少关心或想到在表面行动上如何最讨人喜欢，有象她那样如此本能地、自然地、在所有情况下都非常循规蹈矩的妇女吗？她的意念是如此高尚，以至没有人听她说过或知道她做过一件下流的事情，也没有人敢对她说一件厚颜无耻的事，或者在她面前谈论丑闻。如果有人这样做过一次，那绝不会再次重复；她的某些虽然不动声色但很尖锐、极富讽刺性的言语，使那些下流话销声匿迹了。

书中随后有一段对他去伦敦寻找职业的描述，这是根据他的家信写出的。他连续找了几家书商，但都没有结果。可是他决心从事图书行业。于是，当他等待另外一个申请的结果时，对于这次令人沮丧的求职过程中的情感有下面一段生动的叙述：

我现在除了等待之外，别无他事可做了。我的内心处于非常不安的状态之下。我说不出何以至此。为时久远的罪过在我面前高视阔步地

走过。我真悲惨。我徘徊街头，然而什么也没看见。我在街上拥挤，然而看不到一张引起我关心的面孔，很少注意到那些向我挤过来的人们。陌生的一切增加了我的痛苦。我祈祷。我尽力祈祷。我思考。我努力思考。我的内心简直是一个奇异的旋涡。我眼前一片空虚。我只能哭泣，努力祈祷。我多么希望这一切给我的心灵留下一个强烈而永久的印象啊。世界多么奇妙，人类多么神秘啊！

51 他在伦敦的努力失败了，于是他就到剑桥去，在那里他很走运，被一位名叫约翰逊的书商雇用了，工资每年三十镑，工作时间从每天早七点半到晚七点。

我在两次大战期间的那些可怕的萧条岁月里，担任提兹河畔斯托克顿的议员，当时千千万万的人们焦虑地等待工作，由于寻求职业无效而极度忧伤时，我经常想起这位年轻的苏格兰人在 1833 年的经历。

1857 年丹尼尔逝世后，由他的弟弟亚历山大继续把买卖经营下去，并加以发展。亚历山大是从苏格兰找来帮忙的，直到 1896 年他才逝世。他的一生也充满着冒险，差不多是在他的童年时代他就作为一个普通水手到美洲去了。丹尼尔和亚历山大·麦克米伦不仅建立了一个日后兴隆起来的出版公司，并且使它有一种始终不变的特征。十分明显，尽管这两位年轻的苏格兰人都决心在物质方面要获得成功，但并不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优良品质是能够经受住考验的。托马斯·休斯对丹尼尔的评语也同样适用于他的弟弟亚历山大：

过去从未有过以经营书籍为生计的人比他更意识到这是一种天职；他对他的行业的尊严及其对于人类的作用感受更深；他更关切他的行业不要在他手上蒙受耻辱与贬低。他的理想并不是谈谈而已，当书店不是门庭若市之时，他的理想就成了一个美好的偶像，顶礼膜拜。他忠心耿耿地在困难中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除了象他这样一个坚强勇敢的人以外，其他任何人都会在这些困难面前被吓倒。

我的父亲莫里斯·克劳福德·麦克米伦是丹尼尔的第二个儿子，生于1853年。我的祖父去世时，父亲年仅四岁，因此他完全是在他的母亲和叔父亚历山大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但他是根据他的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的教父的名字而取名莫里斯的。另外一个教父是查尔斯·金斯利。虽然莫里斯的著述现已大部分被人忘却，但他对他同时代的人有很大的影响。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它在逻辑上有某些弱点，但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仍然吸引了许多心肠慷慨的青年人。它对促进社会改革和对教育的推动力今天也没有完全被忘掉。

莫里斯同他的两个兄弟一个妹妹被委托给他的叔父亚历山大 52 照顾，后者自己也结了婚，并且成为几个孩子的父亲。这两个家庭生活在一起，亚历山大把他哥哥的孩子视同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的伯父弗雷德里克年龄最大，在我祖父逝世后便到书店工作。一两年之后，他在经济上已相当富裕，便送我父亲到厄平哈姆去读书，这个学校当时是在十九世纪伟大的校长之一思林博士管理之下。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座老式的大理石钟，那是在他离开厄平哈姆时校长赠送给他的，上面刻着如下的文字：“莫里斯·麦克米伦：当你离开厄平哈姆之际，全家人赠此留念——1871年9月。”这似乎是对这个孩子品质的既异乎寻常又很显著的颂词。他从厄平哈姆到剑桥基督教学院学习，于1875年在那里的古典文学荣誉学位考试中取得优等。我父亲并未立即投入出版业。在1877年至1883年这六年当中，他在圣保罗学校任古典文学教师，当时该校校长是著名的沃克博士。古典文学教师的职务是很重要的，而该校在传统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学术水平很高的。毫无疑问，那一段经历日后对他很有用处。

我父亲沉默寡言。人们很少见他忘乎所以。我已经将我童年时期对他的某些回忆介绍过了。随着我逐渐长大，我学会了更好

地了解他。他于 1936 年逝世，享年 83 岁。他的生活分为明显的两部分：家庭中的私生活和做为一个出版家的工作。他为人质朴，所思所想者莫不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为一个父亲，他仁慈，能体谅人，慷慨大方。他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利益，并且为了他们自己情愿牺牲任何金钱和时间。他很少对我说话，责备我或纠正什么，可是从他的态度上总是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的情感。他把他的房子以及有关花园的事情或者我们那份小小的财产，统统交给我的母亲管理。除了赞同她的建议之外，在我们面前我们从未听到过他发表意见。然而，因为他如此克制自己，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我和哥哥们引起了他焦虑或痛苦，我们便感到非常难过。如果我们感到我们博得了他的欢心，那么我们便都高兴起来。

53 他从我的孩子们——他仅有的孙辈——的身上得到很大乐趣，并且象许多羞怯的人们那样，他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感到很自在。他读书很多，旧的和新的都读，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主要是从重读心爱的书中得到乐趣。这些书是司各脱、狄更斯以及萨克里的著作。

虽然我向父亲要求帮助并没有什么难处，但我总是首先求助于母亲。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作为最后一着，他的意志总是占上风。他不轻易表明自己的判断。我父亲对一般的社交活动不大感兴趣。他喜欢我母亲把朋友们请到家中，他为她孚众望、从容大方感到高兴。他只有少数几个亲近的朋友，那主要是在剑桥大学时结交的。

在商业活动中，我父亲为人严格，非常公正，人人都尊敬他。我认为他从来不巧取于人，他也不曾对任何稍微有点下流的行为卑躬屈膝。我祖父的某些易受冲动的性格遗传给了他，尽管他在商业事务中通常是小心翼翼的，但有时却出乎意外地果敢。他说，他经常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劝阻他的同伴们的更大的冲动，他认为这些人对某些特殊的计划易抱一种过于乐观的见解。是他加强与

发展了生意中的教育内容，并由他负责向海外扩展。在印度的以及别处的分公司都是由他创建的，同行们大都请他指导工作。

儿童们对于父母的性格或生活轶事很少有一明晰的印象。这一点后来才能做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认识到了父亲的品格，我对他不仅有一种儿子对仁慈而宽容的父亲的爱，而且对于他决定如何安排他的生活也有深切的了解。他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准则强加给他的孩子，但我们从母亲那里得知，在四十岁以前，他就决定不吸烟，不喝酒。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什么良心，而是怕吸烟有害健康——他一生都遭受喉咙和胸部不好之苦——怕喝酒非但不能加强反而削弱自制力，而他认为自制力是每个人必不可少 54 的品质。当我的政治生涯开始后，好象要与我的商业工作相冲突，父亲并不使我为难。结果，我得以多年整日在办公室工作，并且在生意结束之后到下议院去。直至 1940 年我没有被政治上的提升所诱惑——因为我没有碰上那种诱惑。所以这两种业务得以同时进行。第二次大战到来时，父亲逝世了。由于哥哥丹尼尔宽宏大量，我才能够参加战时内阁。又一次，在 1951 年，当我们处在反对党时期，虽然我重入商界，他又敦促我接受公职。因此，可以看出我的政治生涯，和其他事情一样，都得助于父亲和长兄的提携。

现在我应该谈谈我母亲了。她于 1856 年生于印第安纳州欧文县一个名叫斯潘塞的乡村小镇。在我以外交大臣和首相的身份到那里时，我发现它依然是一个小小的典型美国城镇。邻近的城市印第安纳波利斯当然已发展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繁荣兴盛的社会了。但是斯潘塞的生活情况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好象没有多大差异。我外祖父 J. 塔尔顿·贝尔斯大夫（他的姓贝尔斯是贝拉西斯的讹用，贝拉西斯家族的一个人很早就移居到美国）是这个城镇第一流的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医生。人们对他仍然念念不忘。他显然是一位性情慈善、个性坚定的人物。他的房子仍然或

者说直到几年前还矗立在那里，那是一所当时典型的木头房子。当我母亲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常去那里参加唱经班的那个小教堂，曾被火焚毁，后又重新建立起来。我外祖父原籍肯塔基州，各种职业他都想干——其中之一就是到美国最西部去，当时那里刚刚开发——后来决心行医。他是德·波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一百年以后，这所大学授予我一个名誉学位。从我母亲经常给我们讲的故事当中，我可以推测出，他与家庭或者家庭中的某些成员争吵过。住在肯塔基州的那些人在南北战争时都积极支持南方；他以及那些迁到北方的人都支持北方。他妻子的娘家姓里德，是北方人，他们的祖籍是苏格兰。许多美国书籍都描述了这种严重的家庭意见的分歧，而我母亲的叙述虽然根据的只是她幼年时代的记忆，但后来这些故事从我的亲友中（他们对南、北方的同情心在人数上是相等的）得到证实。我母亲的教名是海伦·阿蒂，但大家都叫她妮莉。十九岁时，她与一个名叫希尔的音乐家结了婚。在婚后大约六个月，她的丈夫死去了。我从来不记得我母亲提起过她的第一次婚姻，在她临终前几个月算是例外。但是我在她卧室的一只抽屉里发现过几样纪念品——一条表链、一枚图章、一个金十字架、一张小的画像——这是她保存起来的。那时光，人们是爱缄默的。

丈夫死后不久，我的母亲感觉到她要立刻离开那个小镇，在那里，她的精力与抱负无疑都无用武之地。很可能我外祖母死后，外祖父又续娶一事对她的决定有某种影响。不管怎样吧，她决心离开；大约在1876年左右，她说服了外祖父让她去作一种在当时看来肯定是冒很大风险的事情。由于某种原因，我的外祖父在巴黎有几位颇有影响的朋友，我的母亲就决定到那里去。我的外祖父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叫利尼尔先生的，他是银行家。带着这个以及其他的介绍关系，我的母亲只身启程，乘坐的是一艘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好的轮船，即四千吨的明轮汽船。在巴黎她结识了许多朋友。

她学习雕刻，并且在美术展览馆中展出作品。由于得到良师的指导，她的嗓音得到很好的训练。她的声音虽然没有达到歌剧要求的水平，但是她曾在音乐会上并且在马德伦演唱过。她确有不寻常的才能。她珍藏着她那时朋友们的许多照片、画像以及信件。这当中，许多是法国著名的艺术家和歌唱家。

她何时以及怎样遇见我父亲并且爱上了他，这人们是不知道的。我相信那是在我叔祖亚历山大·麦克米伦家中，他那时娶了一位名叫埃玛·皮格娜泰尔的意大利血统的淑女做为他的第二夫人。或许是通过她，我的母亲被介绍给麦克米伦这家人的——是在巴黎呢？还是在伦敦？也是不知道的。这又是一个例子，孩子 56 们很少熟悉父母的风流韵事。可惜的是，我从未听我母亲歌唱过，因为在我出生后，她的嗓子便坏了；但她说话声音优美动人，一口纯正的英国话。她的法语说得令人赞叹不已，她还懂得一点意大利语。

我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家庭主妇，她善于组织令人愉快的社交活动。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苏塞克斯，我母亲都交游很广，朋友们来自社会各界——作家、画家、政治家。她有许多外国朋友。她的公众活动和慈善活动都相当多，但她致力的却只有两三个组织。她一点儿也没有我父亲的那种羞怯，因此她对宴会或集会特别觉得开心；只是为了她，父亲才敷衍这些活动。但她固执己见，的确有点清教徒似的严峻。她爱她的寄籍国，但她从来不忘却她出生的国家。

我的母亲是一个性格特别坚强的妇女。她标准很高，因此她对周围的一切要求也高。她有很大的抱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的孩子们。这有时使我的父亲和我们都感到为难。但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一生中任何一件事都要归功于我母亲的热心与支持。我生病时，她护理我，失望时，安慰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确实

是她拯救了我的生命。索姆战役以后，也就是在我受伤后几个星期，病情十分危险时，我被用船运回国。对当局无可指责，因为伤亡过重，造成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记得到达维多利亚车站时，我发高烧，陷入极度疲惫的状态中。炮弹片伤及我的右腿膝盖，而骨盆中则射进了好几粒机关枪子弹。我说服了救护车司机，绕道卡多根街，而不直往苏塞克斯的某医院。（因为这次破坏纪律他当然受到我适当的酬谢。）我的母亲来到门前，迅速做出决定，给她认识的一位外科医生威廉·贝内特爵士打电话，并且同我一起驱车前往座落在贝尔格雷夫广场的一家医院，那时是由沃德女士和格拉纳德女士经营管理的；她们两位都是美国籍人。由于没有插入管子，57 伤口便在表面上愈合了。结果形成深度的脓肿，我病情危急，几乎濒于死亡。威廉爵士一到立刻为我施行手术——这是连续手术的第一次。我母亲的战斗行动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后来推测，陆军部当局曾找过不少麻烦，但那位与我母亲会面的倒霉将军不久就垮台了。没有经历过这件事的人，是无法体会到一位美国母亲保卫她的一个孩子的决心的。

这件事仅是许多事件中的一个，但很典型。我试图做的一切事情，常常可能失败，或者遇挫折失去信心，如果没有我母亲的鼓励和她在我幼年时代那种坚持高标准工作的要求，我将永远不会得到甚至最小的一点学术荣誉。假若我初试失败，她总是坚信我将在下一次获得成功；事实证明正是这样。在我与我的政治领袖们意见不合以及对事显示慌乱时，我的母亲对我是同情的。她总是说：“最后你会胜利的。”在我一生每个重要的时刻，我都感到她出现在我面前，在她生前或死后都是这样。

当然，在正常情况下，这幅图景无论如何也还有其令人不大愉快的一面。我母亲的性格令人生畏，事无巨细，她一经决定，就不易阻挡。她对于英国儿童的传统感情不表同情。我有两个哥哥，

因此我很难穿上一套新衣。有时我接下来的衣服在某些细小地方过时了，我对此很不满意，但是她不理解我对于这种细微的缺陷所怀的心情。更为糟糕的是，当我在学校里还是低年级一个小学生时，她偏偏要和那些六年级的“穿着时髦的人”或者耶稣十一门徒们说话，如果她刚好认识他们的父母的话。这使我激动、狼狈。如果她遇见校长，她就要把他抓住，通常对卫生及其他方面的安排发表一些还算得当的批评。除了这些小讨厌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使人烦恼。我母亲总想深入她孩子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她希望了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娱乐以及几乎是我们的日常活动。自然这好象是对我们进行干涉，但事实上这是从爱与关切出发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满于这一点，有时进行某种规避。做为一个家庭的父亲，尤其是做为一个祖父，我现在明白了提问题是多么危险啊，而如果你真的提问了，你得到的回答也是很少的。但是这与她给我力量和信心的重要性以及在任何困难时——不管是不是由于我的愚蠢造成的——只要真相弄清楚了，她将支持我到底的那种认识相比，这些缺点都是无足轻重的。 58

我的母亲于 1937 年 8 月逝世，在我父亲死后不到十八个月。他们两位都葬于苏塞克斯的霍斯特德—凯恩斯教区教堂里面的同一墓穴之中。对于我在任何领域取得的任何成功，我的父母都各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贡献。我住在他们建造的家中，天天不断地回忆他们两位老人家。幸而，某些活着的人还在回忆他们，并且感激他们。我欠他们的债是数不清的，也是无法偿还的啊！

第三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一般人来说,犹如一颗突然爆炸的炸弹。它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真是晴天一声霹雳。的确,德国海军大规模扩张曾被许多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视为不祥之兆。然而德国人从阿加迪尔的撤退以及继之而来的稍有好转的国际关系,又似乎令人感到宽慰。说真的,在1914年夏天,更令人感到忧虑不安的是在爱尔兰发生内战,而不是在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当然,1914年暑假正当过着无忧无虑的牛津生活时,如果我们听说,几个星期以后,我们这伙朋友都将永远放弃学院生活,仓卒拿起武器,甚至在一次为时四年的战斗中注定能够生还的将为数无几,那我们就会把这些预言视为疯子的胡言乱语。德皇的偶尔发作被视为言行失检而得到宽恕,德国毕竟是由一些德高望重的人统治,并且是一个有文明背景的地方。它的那些统治者无论如何是不能同在下一代夺取了政权的以希特勒为首的流氓暴徒们相提并论的。

甚至白厅内部人士也不曾预见到,在奥地利大公被刺^①后六个星期,那严酷的、显然是不可避免的威胁与反威胁,动员与反动员的过程,将导致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因此,不能设想我的年轻的朋友们和我对于我们的命运能够稍有觉察,我们那时正在高兴地向往着各种各样的暑假计划呢。甚至,战争到来时,人们还都普遍认为到圣诞节时即可结束。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无论如何也别误了圣诞佳节。

^①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于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遇刺。

我真倒霉，在战争爆发前不几天，我做了割治阑尾炎的手术。⁶⁰在那个时候，这种手术被看做是件严重的事情，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恢复期。因此每当听到我所有的朋友都仓促入伍的消息时，我不得不甘心忍受着那令人心碎的境遇，静静地呆着，一筹莫展。

我们当中有些人是义勇军团队或义勇骑兵队的成员。另外一些人则加入了军官训练团。唉，我呢，干哪一样都缺乏精力和兴趣。在那焦急、忧虑、痛苦的时刻，惟恐贻误大局，我羡慕我的朋友，诅咒自己的懈怠无力。事出偶然，他们当中许多人发现自己成了基钦纳藐视业余士兵的牺牲品了。他们感到厌恶的是要开往印度以及其他海外驻地，他们受骗了，失去了参加真正大显身手的机会。因此，他们必然这样想过：“愚蠢的童男们”机运最好。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们也还是都被拖入那吞没一切的漩涡之中了。

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在家中等待消息。派遣军向法国调动极端保密，后来情况如何我们很少听到。从蒙斯退却、埃纳河畔战斗以及最后挡住德军对马恩河的猛烈攻击，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富于戏剧性的结局。这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军事头脑的人来说，很难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尽量从官方公报中，从新闻检查允许报刊发表的那相当贫乏的报道中去了解情况。当然，那时既没有无线电广播，也没有电视。那个时候，真的直到二十年代初期，政府与公众之间除了报刊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了，回想起来也真够奇怪的。唐宁街没有播出什么消息。最激动人心的是那幅著名的基钦纳招贴画提出的呼吁——“你的国家需要你”——他食指指向前方，眼睛流露出谴责的神情。全国也到处都在举行征兵集会，用阿斯奎斯首相在艾伯特纪念堂发表的响亮的演讲来鼓舞人心。但是，除了那没有报告什么消息的公报以外，别无其他东西去指导公众思想。希莱尔·贝洛克先生所著《陆地与水》中的文章和图表成了我们主要的依靠。在那等待的期间，⁶¹

我自然是茫茫然不知道怎样才好；继续阅读希罗多德或柏拉图的著作，那似乎是不适宜的，结果很可能是浪费时间。然而不久，我被准许加入艺术家步枪队，并开始在伦敦的四个法律协会的会址进行操练，但既无军服也无步枪。最后我算“合格”了，并且，我记不清，自己怎么会和为什么竟成了英国皇家步枪军团的一个新陆军营的少尉。另外还有一个必需克服的障碍是体格检查。我相信那时我的身体是健壮的，但我知道我的视力将是一个严重障碍。幸运的是，要受检查的人很多，压力很大，这就使得军医相应地宽容了一些。实际上，需要戴眼镜(和携带备用眼镜)我并不感到有多大困难。防毒面具带起来多少有点问题。但是，我认为任何人透过防毒面具都不可能看得很清楚，戴不戴眼镜都是一样。

1914年秋末，我奉命去自己的营队，我想那就是驻在绍森德的那个著名团队的第十九营吧。无论如何，这总比无所事事要好些，但我依然耽心，在我能够做出任何显著的贡献之前很长时间，战争就会完全结束。到圣诞节时就能结束——甚至在最初的失败以及前线一时停滞之后就结束——仍然是人们共同的错觉。不管怎样，众所周知基钦纳曾经说过，战争要持续三年。做为基钦纳部队的士兵，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没有步枪，装备也很差，甚至连我也心里很明白，一切还都在准备阶段，这使我们的部队几乎不能作战，战争能因我们拖延那么长的时间吗？

在这期间，我从通信中，以及与休假的人们偶尔见面的机会里，听到了关于我们的朋友们的一些消息。他们大多数人像我们一样，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被雇用了。一些人很幸运，加入了正规军。一些人已经到法国去了。自然，这些月来正规军受到重大伤亡，感受最深的是那些传统上一贯对军队做出过贡献的家族。当然，在我的伊顿和牛津的同学们中间，有些人的名字已经出现在那冷酷无情的名单上了。随着战争的继续，国内每一个家庭都开

始越来越感到恐惧。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那长长的绷带在未来的几年中终究会被截断的。

我们营是由一位退休的老式军官指挥的。他的名字叫托马斯·皮尔金顿爵士,他胸前佩戴着布尔战争勋章以及其他勋章。他白白的头发,红红的面孔,一只鹰钩鼻,是一位过去时代的人物。他待我们很好,但对他领导的这批奇异的军官、军士和士兵,似乎感到有点惊讶。副官过去是个正规军的士兵,但除了一两位中士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人有什么军事经验了。然而,我们以热情弥补了我们在知识上的不足。

军官们占用了一两处旅馆,都是那时候典型的海滨建筑。士兵们大多分配住在宿舍中。我们同别的兵团的部队合用一间小礼堂,在那儿我们接受步枪射击理论的基础教练。即使我们没有武器,但至少我们可以操练。操练是在城外悬崖上一块开旷的空地进行的。操练的理论把我们迷住了,我还记得一些漫长的夜晚是这样度过的:我和同伴们用火柴棒试着重复演习“向右成横列队”的正规方法,以及各种类似的队形变换。在那些时日里,我们是集合排成两列上操的。我们学的第一课是编成四列队形,前排的每个人要报数,情况往往是笑话百出,乱成一团。最后,人们都报过数了,事前要嘱咐和告诫的话也都说尽了,便发出口令:“成四列队形!”单数原地不动,双数退后一步,随之再向右跨过一步。然后,如果所有的人都做对了的话,便下口令:“向右转!”于是一队排列成适当队形的士兵便做好行进准备了。当然,有些人不是往右而是往左跨了步,而另外一些人则忘记了自己的数目。还有一些人听到“向右转”的命令后,莫名其妙地向左转了。我依然还记得,我们那位可爱的、困惑为难的上校,怀着同情与惊愕交错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大家都渴望做对了,但却偏偏容易做错。我现在还能想起他那个样子,身着裁剪合体的军服,足蹬时髦的、擦得锃亮的皮靴,皮

靴上装有踢马刺，他沮丧地凝视着许多士兵——其中有些人身穿
63 紧身短上衣，但下身却是平民长裤子；另外一些人穿着卡其布长裤
与平民上衣——这样的一列队伍，肯定使他感到不成其为士兵。
现在，当然啰，一切都要容易得多了。现代一个营划分为三个排，
这就免除了不少旧日的困难。

好象是一个规律，每逢战争总是下雨，冬季的几个月大雨无情
地下个不停。草地变成泥淖；士兵每天都浑身湿透。军官们和中
士们都泄气了。可是我们还在努力挣扎着。我们没有合适的阅兵
场。但我们学习并且进行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操练。起初，我厌恶
去做这些，如同我在童年时不愿去搞那些类似的活动一样。但不
久我开始懂得，如果我们偶尔把某些事做好了，终究是有好处的，
最后终能达到满意的地步。无论如何，我们试着干。晚间我们学
习各种各样的教科书。《步兵操练》、《陆军规程》、《军法手册》等
代替了古代历史和哲学。这些探索偶然揭露出一些纯粹金块。例
如，“校级军官进入巴隆不准穿踢马刺皮靴”。实际上，这块美玉是
艾伦·赫伯特首先发现并谱成歌曲的；但这个好消息不知怎么吹
到绍森德来了。尽管如此，随着几个星期的流逝，圣诞节过后，我
的二十一岁生日临近了。我开始丧失信心了。在我看来，由于我
们是属于那个庞大的基钦纳陆军部队，地位如此之低，很可能我
们会被忘掉了。我们到海外去的希望仿佛越来越渺茫了。我觉得
必须想想办法，调换到另外一个团队去，那里可能有较好的机会。

自然，我向我的母亲求助，靠她的帮助和我的几个牛津朋友的
介绍，我受到近卫步兵第一团的中校亨利·斯特里特菲尔德爵士
的接见。当我前往座落在白金汉门的团本部去见他时，我不禁感
到情况大不相同。哨兵和军士敬礼动作那么敏捷，使我感到无地
自容。我意识到，当我进去会见这位中校时，我的举止将会很不
体面，不象个军人的样子。可是，他只问了我很少几个问题，这才使

我感到松了口气。几个星期以后，听说我的申请被批准了。1915 64 年 3 月，公报上公布，我被编入近卫兵第一团后备营。当然，读者今天会叫，这全不对头，这不是全靠关系嘛。这是一种最坏的特权——实际就是那样。它确实可恶。但是，这事到底应不应该受到如此严厉的申斥呢？我以及其他许多象我一样的人所寻求的唯一特权，就是能尽早地使自己死去或负伤。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后悔离开了我在基钦纳部队呆过的那个营。假如我知道战争会持续那么久，以及战争实际上可能会使我们那样的部队武装起来，得到训练，并参加战斗，那我或许就会耐心等待下去了。十八个月以后，在索姆河战役中，我看到了那支新的部队——基钦纳部队——那样雄纠纠气昂昂，无上光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把大量的军队投入了战场。永远不应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通过志愿招募，就有近五百万人应征为国王和祖国而战斗。毫无疑问，那样的征兵制度效果很差，也欠公正，不够科学，但它还是值得赞美的。自然，随着战争的延续，它的缺陷不得不以义务兵役来弥补。然而，1916 年和 1917 年一些著名的战役却都是基钦纳的士兵参加战斗的。即使不少人认为，索姆河和帕斯钱德勒两次战役的残酷牺牲是不可原谅的，而那些英勇的斗争做为志愿应征者和爱国者的精神胜利将永远载入我国的史册。

不过，我对未来看得不清楚，急切希望一个变化。可那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切尔西兵营广场离绍森德郊区泥泞的田野很远。教练军士、军士长、军士、下士甚至卫兵，全都是那么潇洒，军服整洁，裤子烫得笔挺，衣扣闪闪发光。没有一等兵那样的级别，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不是两条道道，就是光板。军营文书室对新来的人，几乎就象校长的书房那样令人感到惶恐不安。团队和更大的部队近卫步兵旅的一些神秘之处模糊不明，需要仔

细研究。我同其他“青年军官”（这个字眼适用于任何一个年龄在十八至四十五岁之间的、先前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的人），在乔治·鲍威尔少校热诚的指导下，对于这些秘密的某些方面开始有所领悟。（许多年以后，乔治·鲍威尔是我在下院的一个同事。）其中某些属于团队传统，另外一些属于行为准则，特别是有关便服方面。所有这些惯例不在正式规章之内，自尊与习惯是其裁决的唯一权威。自然，我必须抛弃我的军服，并且在一个被批准的裁缝那里另买一套；还需要买一把剑。军服已经没有了；我还保留着那把剑，因为1915年夏天我去法国时，遗憾得很，这些武器已经废弃不用。在新军装做成之前，我们一直是身着便衣在广场上操练，而不是“平时穿军装的人所穿的那种便装”。（后者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不恰当的说法。）适当的打扮是一顶圆顶硬礼帽，一套蓝色服装，还有一根手杖。检阅开始之前，我们很整齐地来回走了五分钟。随后，当副官或其他指挥检阅的军官来到时，我们便停止前进，摘去帽子，立正敬礼。我养成了每次都比指定时间提前五分钟到场的习惯。

许多青年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了一系列周期性的变化，那正是（或者过去是）他们生活中有益的阅历之一。凡是男孩都要进预备学校，并成为名列学校末尾的一个小家伙。三年过去后，由于幸运他发现自己名列前茅了——受到学童们尊重，老师们也或多或少地把他当作大人看待。接着进公学；他从顶上掉下来——犹如儿童骰子游戏那样——重新到了底层。他辛辛苦苦往上爬，在学业上和运动方面都出人头地。但那只是昙花一现；他成了大学一年级学生或者团队军官候补生——再一次退回到原来的地位。从德育观点来看，这种运气的不断升降，可以使人们学到许多东西。

但从技术观点看，许多东西不能不只是一知半解。一来到广场上，我便立即意识到我并不能正确地做好向右转或向左转的动

作；我不能正确地敬礼；我甚至从未试过“慢步走”；我对于在原地踏步走转为“开步走”和在行进中恰好可以准确地“立定”的时候如何下口令的一些微妙之处，毫不了解。下口令的时间必须随着军官与他正在训练着的小队之间的距离的变化而变化着，象这样更为错综复杂的细致动作，自然我更是一窍不通的。所以我全都要 66 重新开始，同时我不得不说，我也开始认识到，操练做对了可以从中得到快乐，或者确实可以从单个或成组的人们所做出的那轻快、简练、雄纠纠气昂昂的动作中得到快乐。

我担任首相时，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从我卧室的窗户俯瞰皇家近卫骑兵队为国王诞辰阅兵而进行的预演。在分列式中，操练变得似乎象一幕优美的芭蕾舞剧。虽然我妻子和我对那费加罗^①式慢步走都感到有些厌倦，但在七周或八周的时间里，四天早晨当中我总有三天还是很喜欢去看那种操练的。当全面预演走近时，我常常乐意出去，在近处一个有利的地点观看。年复一年，那些预演引起了许许多多回忆。

在此同时，我必须承认，初到切尔西时，有点令人沮丧。我加入预备营的第二天或许是第三天，我走进军官餐厅休息室（在皇家近卫旅中是这样称呼食堂的），规规矩矩地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在预备营中有一大批军官，在我看来似乎他们都是很老的人。他们全都佩戴着布尔战争勋章。在军官餐厅休息室里，他们都戴着军帽，但没有系肩带。在室内戴帽子是一种旧习惯，在俱乐部和议会也还残留着这种习惯。我想他们事实上都是四十岁或四十五岁的人，但是对我来说，他们却显得都是些老战士。其中一个军官大声地对我说：“我猜想你对参加团队感到非常高兴吧？”我有点紧张地回答说：“嗯，我能获准参加感到非常自豪。”“噢，我真不懂，”另外一个老家伙说，“如今它没有什么了。我入伍的时候，我

^① 费加罗，法国剧本中的勇士。——译者

们那个营是由一位军士长指挥的，那可真好。在我离去时，它改由一位副官来指挥，也还不太坏。现在呢，他们告诉我，指挥官想要亲自指挥这个营了。我只能说，愿上帝保佑，别的我还能说什么呢！”由于看来我有点惊讶，也许好象有点失望，首先讲话的那位军官很和善地给我端来一杯葡萄酒。

训练在继续进行，在这个期间我住在卡多根街的家中，得到很大的方便。我在伦敦时，跟一些朋友见面和保持联系比较容易。伊顿和牛津的老朋友休假时不断路过伦敦，有时候是到前线去，有时候是负伤后归来。在我们那个预备营里面，军官们有来有去。尤其是一些常备军官，经过一段时期等到把战争刚开始那几个月里受的伤养好以后，就回到预备营来，随之就又去替代在战壕战斗中那些新的伤亡者。那种紧张而又愉快的生活继续了好几个月。我希望能够得到当局完全批准，立刻把我作为一个分遣队可用的人，送到我们驻扎在法国的一个营里去。由于不管在兵营内还是在兵营外，我都没有犯过严重错误，我的希望似乎是很有可能的。

那时传来消息，说一个新营——第四营——即将成立。所有的近卫营将合编为一个近卫师——十二个营分属三个旅。肯定是这样，我要么被挑选进这个第四营，要么被派到其他三个营中的一个，去填补一个位置。结果宣布我被编入第四营。在团里建立一个第四营是史无前例的。新营编成后不久，我们便离开伦敦开往营地去了。

建立第四营的决定是在1915年7月做出的。到这个月的中旬，该营就完全建成了，并开往博文登兵营，那儿离泰晤士河的马洛不远。我们营的指挥官是G. C. 汉密尔顿上校，副指挥官是迈尔斯·庞森比少校，副官是汤米·索恩，军士长是E. 勒德洛。现在从头到尾看一看那个名单，确实糟糕透了。甚至在卢斯的首次交锋，我们的许多战友被证明是遭殃的。

我们在马洛的兵营是建在或者靠近近卫军第一团当时健在的最伟大的成员、爵士乔治·希金森将军的地产那里。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我参加了一次庆祝他百岁大寿的宴会。当时这位主人对我们很客气。我们进行了一些操练和野外演习，那真象是一个无休止的游园会。天气明朗，来自伦敦的大批友人，前往伦敦游览的过客川流不息，处处都是优雅的妇女社交活动。在那些显要人物中间有位青年，名叫爱德华·坦南特，人们都称他为“姑娘”。他是那么令人可爱，那么富有诱惑力。他的父母才华横溢，他似乎现身说法，来表明那依然对战争给以某种魅力和激励的伊丽莎白时代的热情。他生来注定短命，但他给所有认识他的人留下了一个永不磨灭的印象。人们写了千册万卷关于那个时代一些青年的书籍，其中最动人的莫过于格伦康纳夫人对她儿子的赞词了。^①

我们大伙都在等待着的那一天及时到来了。第三营被派去参加新建立的近卫师，于7月末从南安普敦乘船去勒阿弗尔。我们那个营到达博文登兵营仅仅一个月，就于8月15日也跟着去了。在我们横渡海峡时，我记得发生过一件激动人心的事，那要是在早期战役中发生也许更合适些，因为当时人们对划一行动还很少注意。那依然是一件受人欢迎、叫人开心的事。我们上船以后，看到所有的“士兵们”都很舒适，吃的和住的无疑都是很好的。人们把我们引进到交谊室，军官们将在那儿吃些茶点。使我们感到诧异的是，丰盛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了——餐巾、陶器和银制餐具以及其他东西一应俱全——俨如和平时期的宴会。餐厅侍者总管是查尔斯，他是里茨^②餐馆的大老板。他还从本单位带来了一群侍者。在横

^① 帕梅拉·格伦康纳：《爱德华·温德姆·坦南特：他母亲帕梅拉·格伦康纳的回忆》（伦敦，1919年）。

^② 里茨，生在瑞士，是法国旅馆饭店业的巨商。——译者

渡海峡的时间里，我们享用了一席丰盛的餐饭，美酒佳肴都是精选的。“我们欢天喜地，谁都不说话，从1点30分吃到3点30分。”^①那一切全由一连连长 J. A. 莫里森上尉掏腰包，他是一个既富有又慷慨的人。他是怎样筹备安排的，我不得而知。但这次极其讲究的饯行，使得人们群情振奋。当时我们想象不到，不到一个月，莫里森上尉会发现自己在卢斯战役中指挥这个营；那时这个营已经遭到了四名军官被打死、两名军官中毒气、五名军官受伤的损失，以及其他伤亡，总计超过三百五十名士兵。我们精神奕奕地在勒阿弗尔登陆，受到了法国人的热情接待。“没错，他们将把德国佬吓得屁滚尿流！”^②当我们通过市区时，人们作了如上的评论。我们坐上火车——军事用语管这叫做“前进”——到圣奥美尔去。在圣奥美尔下车后，便向一个叫做布朗迪克的小村庄进发。我们在那儿呆了一个多月。

69 我的部队的宿舍是在一所典型的法国资产阶级宅第里。与我同住的还有我们的连长奥布里·弗莱彻上尉和霍尔、莱顿、坦南特等几名中尉。我们呆在布朗迪克一直到9月我们师完全编成为止。我们营受到了旅长海沃思将军和师长卡万勋爵的检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懂得，我们正在为进行大规模作战做准备。当时，日子过得满愉快，天气晴朗，有时搞点训练，偶尔打打桥牌，尽情打趣。这个时期的几个小事情还时刻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其中之一便是我生平第一次经历的、在战壕后面举行的连队表演会。

我们连队举行的音乐会是非常成功的。可以想象，一个长约一百英尺、宽约三十英尺的古老的通风谷仓——砖地上铺着稻草，全部照明设备只是挂在四周墙上的三只油灯，灯光暗淡，多么令人抑郁，给人以凶兆之感。

五个壮汉把一架小型立式钢琴抬进谷仓（通常总有三个班睡在这

① 给母亲的信，1915年8月16日。

② 给母亲的信，1915年8月17日。

里)。这是一个欢乐之夜。钢琴上摆着五个瓶子，每个瓶子上插着一支蜡烛。接着一名粗壮的下士拿来更多的瓶子，点上更多的蜡烛，顿时谷仓被照得通明，(在我们看来)象伦敦西区的戏院一样明亮。

晚会就这样开始了。先是一个朗诵，极其委婉动人。它描述一个可怜的小伙子，在岗位上睡着了，被上校判处死刑。然后他的寡母如何为她的唯一的儿子苦苦哀求；还有他的好友——一位年约十七岁的英雄曾在战斗中立下卓越的功绩而赢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如何宁愿不要勋章，而要求上校给予宽恕。“请问，小伙子怎么要处死他？请饶恕比尔·威廉斯吧，先生，”那位英雄恳求道。(比尔是那位失职者的名字。)“他太年轻，留他一条命吧！这样比尔就得救了，人们也都宽恕他了！”

接着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伴之以大喊大叫的喝彩声——有些人几乎是热泪盈眶。精采极了。之后，是一段“短剧”，由一位从前的杂耍剧场喜剧演员表演，现在应征入伍。接着是几部令人振奋的合唱。随后军士长(应大家的要求)演唱了“老国王科尔”(这是一支深受人们喜爱的歌曲，每一个歌咏会上都有人演唱)：

“下一次的命令是个啥？

少校说——

“我要休假六个月——

上尉说——

“我们包下全部工作，

中尉们说——

“把他的名字快记下，

军士长说——

(就是说，记下他的名字并且给以品评)

“向右转，成四列

中士说。

“左、右、左、右、左

下士说。

“我们要用果酱代茶，

二等兵说。

70

“奇不隆咚锵登锵登锵

鼓手们说——

此地并无大好佬

堪与卫队试比高。”

接着是更多的歌唱、朗诵以及诸如此类的节目，一直热闹到就寝时间。但在我们走开之前，“英国近卫队”和“国王万岁”的歌声非常恰当地结束了这场确乎令人愉快的晚会。同时，晚会给人留下的印象也颇为深刻。在象这样的一个谷仓中，二百五十只喉咙发出了一阵“近卫团式”的愉快的响声。^①

在我们行将开拔之前，发生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事。近卫师的全体军官都在邻近布朗迪克的一个小村庄的广场上集合，军长要对他们讲话。在讲话中，军长相当详细地、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就要发动的战役。既然平民老百姓都允许自由参加来听这次户外讲话，那么从安全观点来看，这种做法似乎就有点令人难解了。据我们当中某些颇爱冷讽热嘲的军官说，人们确实看到一些微笑的主妇探身窗外，以惊人的速度在那儿放出鸽子。在讲话过程中，将军向我们保证，他将全力以赴地支持我们。“先生们，在你们后面，在你们的连、营那里，有你们的旅长；在他后面有你们的师长，而你们所有的人后面——我将在那儿。”我对于团队军官们对待参谋机构的那种典型态度早已心领神会，以至当我听到一个同僚用有意让别人能听见的耳语说“对，对。还有一条遥远漫长的路在后头呢！”
71 这些话的时候，我不禁笑起来。另外一段插曲其性质也是同样不光彩的。在出发作战之前，我们接到命令，要我们全体人员阅读一份激励人心的电报，我想那是总司令拍来的。总的说来，将军们坦率地陈述一件事情，其效果要比他们试图以优美的词句来进行呼吁号召更好些。我能够记忆起来的电文只是开头的几句话：“在这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的前夕……”。我是个新征募来的生手；但当

^① 给母亲的信，1915年8月25日。

我读到这些话时，我听到我们排里的一名曾经历过全部过程——蒙斯、勒卡多、伊普雷、费斯杜伯尔特——的士兵大声喊道：“孩子们，现在我们为它而战！”我太年轻，觉得他太好笑了，因此我没想对他那破坏纪律的行为加以谴责。

我无意对卢斯战役给以全面的描述。许多历史书都记载了那次战役。战役于9月25日开始，第一军在拉巴塞运河和维尔麦尔中间一线进攻，同时，第四军则从维尔麦尔向格雷耐进攻。进攻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伤亡惨重，某些阵地固守不住；尽管第五十一师——赫赫有名的高地师已推进到卢斯，甚至越过了七十号高地，但只是在遭受到重大的损失以后才取得这些成就。9月26日下午，第十一军，包括近卫师和第二十一、第二十四两个师，由约翰·弗伦奇爵士移交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那整个一天——一个星期日——战斗激烈进行，第二十一和第二十四两个师不断增援。我军损失惨重，德军发起猛烈反攻。七十号高地被迫放弃，卢斯陷于危险境地。近卫师，即第十一军的第三师，直到星期日凌晨方才到达差不多十英里以外的黑利库尔特，并通过纳莱米内向维尔麦尔进军。那是近卫师自从建立以来首次投入战斗。但正如我们团队的史学家所说：“所有的奇袭要素都不存在了，德国人有了时间从第一次所受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集聚增援力量。近卫师在进攻时是否能有确实成功的机会，是值得怀疑的。进攻必须从德军原来的战壕开始，德军炮兵对炮弹轰击目标，一清二楚，而我们原先炮轰的效果却没有了。”不管怎样，还是决定将近卫师投入战斗，并力争尽可能多收复一些失地。战斗从9月26日到27日继续了72两整天。到28日那天，事实上战争已告结束。后来，基钦纳勋爵描述这次战役时说，那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实际上，成就是每前进一英里伤亡四万五千人的代价取得的。确实抓到了三千多名俘虏，并缴获了不少枪炮，据官方估计——也仅仅是估计而已——德

军伤亡达五万人。所有这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证明基钦纳勋爵的描述是正确的，那就有待于各人自己去判断了。

然而，当时我和我的同伴们对于那一切宏伟的计划——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几乎都一无所知。我们第四营（第三近卫旅四个营中的一个）向集结地点出发——是步行的，那时没有卡车——于26日星期天早上到达黑利库尔特。这里有一段插曲是颇有意思的。在一个叫做马尔莱米内的地方，由于道路被人群拥塞，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前进六个小时。但是不准许我们离队去吃点东西，或者休息一下。要大家坐在那泥泞的道路上焦急地等着清除出一条通路来。

我们从午后3点30分等到晚上9点30分。整个时间我们全都一直站在那里；但每当我们要朝前走动时，就传来新的命令，要我们等待。走在我们前面的队伍排成了一条似乎永无止境的长蛇阵。更使我们感到不愉快的是，在那整个六个小时里，倾盆大雨一直没停。在等候中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茶，但除了巧克力之外，别无其他食物。

从火线开来的救护汽车，川流不息地从我们身旁通过。有些伤员非常高兴。我看到有个老兄坐起来了，兴高采烈地玩弄着一顶德军军官的钢盔。“他们正在逃窜！”他大声喊叫。一些荒诞不经的谣言在传布——可是我不知道那些谣言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们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在那条路上从3点30分一直站到9点30分，几乎歌声不停。“爵士音乐”——杂耍剧场小调，多愁善感的爱情歌曲——什么都唱。真是精彩极了。晚上9点30分我们终于能够前进了。我们旅的其余人马于六小时以前起程，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暂时同他们完全失去了联系。当然这意味着参谋工作糟糕透了，我们全都异常气愤。打算要到哪儿去或者要去干什么，我们大家都心中无数。指挥官派出一些通讯兵和一些人骑自行车到处去寻我们旅的其余的部队，其实我们行进的方向很可能是正确的。晚上11点，我们在一块田地里暂时停下来了。幸运得很，那时雨已停止。晴空闪烁着星星，一轮明月

光洒大地，给了我们极大的欢欣和鼓舞。我们就在那块田地上暂时休息。在行军过程中“厨师们”为我们烧好了茶，大家都喝上了热茶，吃到了面包和乳酪。晚上 11 点 45 分，我们又出发了，在那期间我们和旅长已经建立了联系。在凌晨 1 点 15 分，我们来到我们当时驻扎的那个村庄。我们在几个铺满麦秆的很好的谷仓中找到了部队宿舍。1 点 30 分，我们心安理得地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这天早晨 4 点 30 分，我们又被叫醒了，5 点吃了早饭，以为立刻就要行动。可是到 7 点 15 分，尚未接到任何命令。^①

造成这个干扰的原因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为了让一支骑兵部队通过。年轻的乐天派把这种阻碍看作是好的预兆：一场重大的突击必定近在眼前；老于世故的人并不如此轻信。关于骑兵突击和恢复运动战的这种奇怪的想法，统治着那些骑兵将军们的头脑；这些人一直指挥英国军队，几乎直到战争结束。

26 日星期天下午，我们又开拔了。我们向维尔麦尔进军，并在那儿宿营。碰巧我们连分配住在过去的一些老战壕里；在那里睡起来比较安全，但周围环境有点阴森森的。我们那一小段战壕穿过一座古老的法国教堂的院子，在炮轰的时候，死者的棺材和尸体可是遭殃了。这儿是一具大体完整的骷髅架子；那儿一只手、一颗头颅、或是一条大腿。自然，我原以为那情景会影响士气的，但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近卫旅的战士们却认为那是一种最有趣不过的巧合，因此关于这件事出现了许多笑话。“伙计！那儿明天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啦！”“上帝！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妥当了！”还有其他一些呼喊声，显示人们把那奇妙的“死的象征”看作是高级指挥官们逗趣地开玩笑。

9 月 27 日早晨我们旅奉命进攻七十号高地。我们的指挥官汉密尔顿上校召去连长们，告诉他们我们营将要干些什么。由于旅

^① 给母亲的信，1915 年 9 月 26 日。

74 长命令他陪同自己去卢斯，因此，他便将他那个营移交给庞森比少校指挥。同时，我们连长奉命前去侦察，探索出一条通往卢斯的最好的路线。在后来的战斗混乱中，我认为我或者其他任何一位中尉同僚都从来没有接到过要我们做些什么事的任何通知。然而，在 27 日下午大约 2 点 30 分的时候，我们排成四列纵队沿着大路愉快地出发了。我们营是近卫旅的先头营，由第一连前导，我们第四连殿后。威尔士近卫团、苏格兰近卫团第二营以及近卫步兵第一团第一营依次跟随在后面。在非常猛烈的炮火轰击之下，我们沿着大路前进——不仅有榴霰弹而且还有大量的猛烈炸药。这是我第一次经受炮轰。很快人们就看出来了，沿着大路前进是很愚蠢的。因此，我们接到命令，要队伍散开，以“炮兵队形”前进。（这种编队是将一个营分成相互间距离不等的一些班，每个班仍按四列前进。）整个旅按照这种队形前进了大约一英里半至二英里。我们完全进入了德军居高临下的视野之内，在那整个的行进当中遭到猛烈的炮轰。我们的历史学家说：“我们的部队始终秩序井然。”他又继续写道：“在近卫军历史上所记录的功绩中，再没有比近卫旅每一个营在面对难以忍受的严峻考验时所表现的姿态更为壮丽了。”我曾听说，当时德国人看到这种表现都大为惊异。

我们在右翼行进，更加不利，机关枪猛烈地向我们扫射。从维尔麦尔开往卢斯的这次行军我至今记忆犹新。说实在的，过后许多月甚至许多年里，我还常常梦到这次行军。这次进军确实就象在阅兵场上进行似的。自然我们遭到一些伤亡，但不象后来那么严重。我记得只有那么一次，当一只野兔从我们排与邻近的排之间窜过时，才有人在队伍中动一下。在近卫军士兵中有不少乡下佬，因而那样一件小事儿引起了如同在国内打猎时那样激动的心情。“它在那儿！它在那儿！快追！”等等喊声不停。这个小插曲来得意外，但令人兴奋。

使我们的人感到苦恼的是，我们进军途中经过的地域全被（或者几乎要全被）那些战役开始时参加进攻的残余部队所充塞。除了勇敢的高地师的伤亡人员以外，还有第二十一师和第二十四师的人。一些人阵亡了，一些人受伤了，还有一些溃不成军。后来，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决定投入这些师呢？他们从未看见过开枪，却先于近卫师直接从英国开来。这似乎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我们到达卢斯时，我们营受到奥布里·弗莱彻上尉的欢迎，我们接到命令快步跑下斜坡，进入一条穿过一些断墙残壁的战壕之中。卢斯正遭到猛烈的炮轰，敌人还发射了许多毒气弹。我们进入一段战壕以后，看到我们的旅长勇敢地出人意料地在大路上纵马飞奔。他命令第三连和第四连不要再继续进入战壕，而要他们跟他去。从那时起，我们营便被分成两部分。当时，我当然不知道就要发生这件事情，但后来许多麻烦跟着就来了。在那天剩余的时间里，情况一片混乱，我能回忆得起来的只是我自己和我们那个连队当时的一些情况。至于我们另外那半个营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自然是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莱顿和我（指挥后面的两个排）——营长瓦斯中毒了，副营长和副官阵亡了，我们自己连的奥布里·弗莱彻上尉同他的半个连队分开了——把我们自己置于 J. A. 莫里森上尉的指挥之下。那时他有他自己的连队——第二连的一个排、第三连的两个排以及第四连的两个排，我那个连（第四连）仅有的两名军官，就是莱顿和我本人了。宾波·坦南特被掉在后头了。因为没有接到命令，并且对于营的其余部队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于是莫里森上尉便作出了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他自己统率所有的那些他可以集合起来的士兵。由于在进军开始时，他就被告知，我们旅要进攻七十号高地，我们营将参加进攻，因而他判断我们如果坐等命令不动的话，那将是错误的，因为命令不大可能下

76 达给我们了。我们营的其余部队不见了，他派出的请求指示的传令兵也都未能返回，于是他想，他若能在那儿参加战斗，最好就在那儿参加。

莫里森上尉知道第二旅要进攻第十四号陷阱，因此，他便自作主张，决定并入那个旅。为此，我们以恰当的方式在第一苏格兰近卫营的右翼疏散开来，该营当时正在开始攻击。不幸，他们的进攻受到了十分猛烈的反击，在机枪集中扫射的压力下他们被迫后退。战斗正在进行，情况将会怎样，自然我是不清楚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以正常的疏散队形发动进攻，遭到了密集的枪炮火力的射击。然而，在当时没有人去注意这些。人们眼花迷乱，茫茫然竟至有些麻木不仁了。无论如何，这是我经历的第一场战斗，因此我不能设想它比通常的战斗更糟一些。当苏格兰近卫营从第十四号陷阱败退下来时，我们在莫里森上尉指挥下的那半个营发现自己完全陷于孤立，我们真象是四面楚歌了。莫里森上尉命令我们停止前进，就地卧倒；我们只有那样作，那确实是个上策。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匍匐向后爬行，并在休卢克公路稍后不远的地方掘壕据守。莫里森上尉（我们都叫他“朱米”）在整个那些行动中表现得极其镇静。（他是一位预备役军官。布尔战争之后，他离开了团队，他的军级不怎么高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他始终是一位正规军官的话，那么他必然会晋升到与他的智谋和胆略相称的高级指挥地位。）命令叫士兵们爬回，但既然“朱米”不能爬（他骄傲而又肥胖），那我不明白我怎么能够很好地爬呢。因此，我就踱来踱去，极力表现出我在枪林弹雨中是那么沉着镇定。我们成功地返回公路，立即掘起战壕来。

夜晚，几乎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我的右手中了一颗子弹。白天在上午的时候，我的头部就已经负了轻伤，但却十分疼痛。最后我们由第二苏格兰近卫营替换了下来。关于以后那些日子的情况，

我记不起什么来了，因为除了手上的伤口十分疼痛、膀子肿得很厉害⁷⁷以外，我的头部因负伤而引起一定程度的脑震荡。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还记得，莫里森上尉当晚或次日早上在某地告诉我，叫我离开，后来我便发现自己躺在战地救护站了。这样就结束了我的首次战斗。无论如何，通过这次战役我从“战争的迷雾”一语的含义中得到了教训。

那天的混乱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后果。我回到英国后，被送进设在伦诺克斯花园的一所医院中去，那里也就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玛丽·梅内尔夫人的宅第。我猜想——但我不记得了——是我母亲设法那样“安排”的，因为那是一所不坏的医院，离她住的地方也不远。团的中校军官亨利·斯特里特菲尔德爵士到病房来看望我。他非常称赞第四营攻克并坚守住七十号高地那样惊人的事迹。由于年轻，缺少经验，又加上稍微有点发烧，我坚决声明我们从未攻克七十号高地，也没有到达过接近它的地方。我甚至说，我认为整个事情处理得非常不当。他很谦恭地表示有些惊讶，但对我们的功勋他仍坚持他自己的说法。我在继续跟他争辩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如果我再坚持我的观点，那他很可能认为我缺乏纪律性，患了弹震症，甚至他会把我看做疯子。因此我便温文地承认了他对我的那份儿赞扬。只是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弄清那次战役的真相，中校和我都有错。一开始我们那个营便不幸被分开了，正是这一情况使我有力量地坚持自己的说法，就我们那半个营而言，我坚持那样说还是准确的。

圣诞节前不久我出了院，并且获准休假。新年时我被安置到驻在切尔西兵营的预备营，从事一般日常工作。我的伤完全治好了，但我的右手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力气。工作并不繁重，但有些事令人感到新奇。我特别喜欢去皇家近卫队值勤。那个时候，按照习惯卫兵在圣詹姆斯宫设置岗哨。一百多年以前，英国君主认为

到白金汉宫去住适宜，这一改变在皇家近卫队看来似乎不能成为
78 更改他们自己习惯的理由。即使现在卫兵在白金汉宫警卫这一新
近的改变，也主要是为了使英国的以及外国的观光客人满意和便
利交通。在那些日子里，举行警卫仪式之后，一支小分队便向白
金汉宫进发；但是军官们以及主体部队仍然留在那座古老的宫院
里。住处是好的，警卫时所度过的那些日子绝对不是令人讨厌的。
除了按时“巡逻”之外，就是读书和闲逛。女宾留在这里进午餐，男
客则留在这里吃晚饭。饭菜精美，酒类醇香。老跑堂皮埃尔是位
了不起的人物。当时在帕尔一马尔的近卫旅俱乐部离白金汉宫仅
仅几码的距离，值班的军官们下午可以利用这个俱乐部。从那以
来，在值班时我经常象一位宾客那样在那儿进餐，并且我总是津津
有味地大吃一顿。我相信我是惠灵顿公爵以后第一个在岗位上进餐
的首相。

健康恢复期和担任“轻勤务”的这几个月，为我提供了一个看
望老朋友的机会。我去过牛津和伊顿，并在伦敦看望了另外一些朋
友。但死亡的阴影已经开始使所有我们这些青春生命黯淡无光。
在 1915 年战死的人当中，使我悲伤的是吉尔伯特·塔尔博特。在
牛津时我就和他很熟。我曾和他一起在法恩翰逗留过，他的父亲
温切斯特主教和塔尔博特太太住在那儿；一种罕有的优雅气氛令
人回味无穷。我确信无疑，假若塔尔博特幸免于难的话，那他必定
会成为我们政界中有名的人物。政治是他生前的梦想和爱好。当
时做为大学俱乐部的主席，他是一位统帅人物。1915 年 7 月底他
在霍格阵亡。不管别人怎样，我可以肯定吉尔伯特定然会履行他
早先的诺言。我的许多军官同僚阵亡了，也使我感到悲伤；他们
中间有位名叫伊沃·查特里斯的，是一位前途无量、很有魅力的
青年。

到 1916 年春，先前那种希望战争早日结束的想法开始消失

了。那阴郁沉闷的战壕战似乎逐渐成为围攻战而僵持起来，只是偶尔由于双方相互发动残忍的进攻和反攻，才使局面变化一下，但并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的结果。对青年人来说，时光虚度了。我记得，我开始感到绝望与幻灭。在国内，生活尽管有其欢乐与愉快的一面，但它逐渐使人不能忍受了。1916年春，当我得以再次出国，⁷⁹我为获得那种机会而感到非常高兴。

1916年4月，我出国负责一支分遣队，并被安置在第二营。那个营是由一位意志非凡的人物指挥的，他就是C. R. C. 德克雷斯基上校。他已证明自己是一个颇有胆识的军官，他已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尽管内脏溃疡很厉害，他却拒绝去找医生治病。这一点，加上他那乐观而平易近人的性格，使他深受士兵的热爱，并在军官同僚中人缘很好。的确，凡是和他接触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受到他的吸引。我个人的教养、训练、兴趣以及出身，几乎都不同于他，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打猎、越野赛马、赌博以及搏斗，这些就是“克劳利”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的兴趣。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读过一本书，他甚至也未曾提到过一本书。实际上，他是一个大老粗；但他却是一位优秀的团级军官，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能与之比美，也许G. D. 杰弗里斯上校(后来的勋爵杰弗里斯将军)是个例外。“克劳利”对于值勤坚持严格的纪律要求；在阅兵场外，他几乎绝对主张传统上的行动自由，我们对那种自由是引以为自豪的。然而，他的纪律观念并没有扩大到对待上级。的确，他对任何一个比他级别高的军官都表示非常蔑视。他特别厌恶旅长，而那位旅长是一个于人无害的人。“克劳利”的这种起破坏作用的精神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特别是那种朴素的诙谐使全营人员都开心极了。譬如说，从旅部下达过一道关于耗子问题的命令，无疑这是总司令部发出的。这问题的引起是《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通讯呢，还是某位好奇的国会议员要求一次议会质询，我不清楚。无论如

何，耗子问题传到我们耳朵时，我们正在坡拍朗格和伊普雷附近。关于这个问题要求我们上报战壕中的“耗子统计表”。“克劳利”组织了一场为期三至四天的大规模捕杀。好多沙袋里装满了耗子，放置了一两天使之腐烂发臭，然后，乘夜深人静时运走，堆放在旅部门外。这就是我们的报告表。

“克劳利”另外一个漠视任何他不赞成的命令的例子是关于军
80 服的事情。到了1916年春天，“当局”才作出决定，认为军官服装过于引人注目，这在时间上已经有些过晚了。在战争最初那几个月里，旅里的军官都戴金色帽檐军帽并佩带短剑。所有这些还在卢斯的时候就废除了，但我们身佩军官的武装带，手提文明棍儿，这一切依然使得我们成为一个很明显的目标。后来，在前线或者在任何激烈的交战中，军官们不仅取下了武装带，而且也穿上了士兵穿的网状装备，甚至在进攻中还扛起了步枪。可是，“克劳利”并不赞成这一方式，他认为那会降低身份。他总是头戴一顶金色帽檐军帽，身佩武装带，足蹬皮靴，还有金色踢马刺——为敌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目标。但他象有魔法护身似的，整个战争从头至尾，他都安然无恙。

我在德克雷斯基尼上校统率下供职那段短短的时间里，得到他多方面的关照。他把我看做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一个怪物，我手不释卷，并同那些乐于倾听我高谈阔论的军官同僚议论哲学和政治。但是，由于当我们在后方的时候，我也喜欢那种友好的、甚至是喧闹的社交生活，所以他对我毫无怨恨，恰恰相反，有时我感到博得了他的赞许，而这不是用言语表达，而是以他那特别令人愉快的呲牙一笑表示出来的。说来也够怪，此人有那么一种魅力，战争以后任何时候，如果他要求我承担某种职务——不管多么不合我意，也不管与我的计划多么抵触——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总之一句话，他是一位群众的首领。

重归营队时，我遇见了几位老朋友。这年6月哈里·克鲁克香克加入我们那个营；他是我一生最亲爱的朋友之一。童年时代我们是邻居。我们两人的母亲都是美国人。我们在同一年进入同一所预备学校。在伊顿时我们在一次推选中同时都获得奖学金；后来又一块在牛津大学学习。我们意外地发现我们在同一个团队里。现在我们又在同一个营里了。哈里是一位孜孜不倦的一丝不苟的古籍学者；当让他任机枪教官时，他对待维克斯式机枪的各种“故障”就象对待希腊文不规则动词那样，不久就熟练掌握了。战后我们继续保持着友好关系。1924年我们在同一时间都被选进议会。虽然他当了矿业大臣，并且后来在鲍德温和张伯伦政府中 81 担任财务大臣，但他仍然保持自己的见解，并且从未对我有过非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两个都曾在丘吉尔的政府中供职，战后我们做为反对党紧密地在一起工作。后来，他成了议会领袖，并且证明自己是所有的最成功的领袖之一。他能应付议会的各种变化情况，能够丝毫不动声色地反驳攻击或者使质询转移方向。至于结束一场辩论的本领，我很少听到过一位比他更有才华的会议员。但他的真正力量蕴藏在他的性格之中。从幼年时代起，直到1961年他与世长辞那天为止，他始终如一：真实、勤勉、诙谐、高尚、忠诚。对于他来说，任何卑鄙的思想或下贱的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

哈里·克鲁克香克在战争初期，在一种不寻常的情况下负伤。结果他在团队有一个绰号，叫他“叫花子”。1915年8月里一天早上，德国人在他战壕前面爆炸了一颗地雷，当时他和连长偕同一个作业队正在外面。哈里全身被埋进大约四英尺或更深的泥土中。他能呼吸，但喊不出声。他在那里呆了一整天。连长虽也负伤，但当夜幕降临时，回到了我们的战壕。他派出了几个人试图寻找哈里，并把他挖出来。哈里能够听到他们谈话，可是曾经一两次看来

他们就要放弃搜寻了。“只不过是个血肉模糊的可怜的军官。”“噢，得啦，他倒是个满好的家伙。咱们再去找一会儿吧。”七嘴八舌，说个不停。最后他被救出了，人们把他送到一个救护站去。没有人期望他会回来。然而，在那里呆到第二天晚上，他又重新在战壕里参加了他的连队。他的绰号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常常谈论这件事。哈里总是说，他非常幸运。如果这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就要被送回本国进入医院，落入一位精神病学家的手中，从而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他的余生便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了。“万幸，”他经常这样说，“这些精心的安排在我们那个时代还真是想像不到的。”

后来的三个月我们是在伊普雷突出阵地或在它的附近度过的。我们遵循着当时千千万万战士所熟知的常规：前线、支援部队、预备队、短期休假，然后又是前线——就这样循环不已。有一次我们接管了一些非常坏的战壕，这在我们所见过的战壕中可说是最坏的了。显然那是一些懒惰的矮子修建的。胸墙仅能达到腰部，并且无处防弹。没有交通壕，似乎无人作过有关排水设备和卫生设施方面的工作。可是，我们动手干了起来，把那些战壕都弄得相当不错。令人烦恼的是，每当我们把这样的活儿干完了，就被派往别的地方去。

凡是在伊普雷战斗过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从坡拍朗格到伊普雷去的那条公路。在预备队的时候，我们有时占据着伊普雷的一些地窖、壁垒里的掩蔽壕，或者据守在铁路林场和梅嫩公路之间一线。在伊普雷，有一次我们住在一座监狱中，可真让大家乐了。“今天我们住上监狱了！昨天夜里我睡在一个单人牢房里；而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在战壕里呆过最初的四天之后，我们还将再来……。让一个连队住在一座监狱里，自然要在士兵中引起许多挖苦的语言。但是这里是一个十分坚固保险的地方，地下室和地面上

的牢房都很讲究。所有的窗户全都用沙袋堵了起来，能很好地防弹。”^① 其次是那些战壕。泥淖、狭板道、阴暗、弹痕、狙击固定点和炮击，所有这些在人们的记忆中多么清楚！然后是在前线，每天扫射，有时猛烈，有时轻微；有时伤亡不多，有时伤亡惨重。恐怕最令人厌烦的，尽管不是最危险的，而我们又不得不作的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换班。但是次日，即使是在前线，也要睡上一觉，休息一下，只要是情况相对地平静就行。那种刻板的生活从没有多少中断过，一直持续到7月底。这真是一场稀奇古怪的战争。

也许现代战场上最使人感到异常的就是它那满目凄凉与一片空旷。我想我以前曾试图向你描述过。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关于战争或士兵什么迹象也看不见——只有那些劈裂的、击碎的树木和偶尔一颗炮弹的爆炸声揭露出一点真相。人们能举目远望数英里，渺无人烟。然而在那辽阔的原野里潜伏着（犹如鼯鼠和耗子似的）几千甚至几十万人的互相对抗，他们正在想方设法置对方于死地。他们从不露面，以子弹、炸弹、空雷和炮弹互相发起攻击。某些地方（我们听说德军方面有这么一些东西对准我们）还布置了一些毒瓦斯小圆筒，待机喷射那令人呕吐的毁灭性臭气。然而，以上那些东西在地面上一点不露声色——看见的只是一些被炮火击碎的树木和一条条三、四层厚用泥土和沙袋堆成的掩体；这些东西再加上城镇与村庄的废墟，这就是人们仅能看见的战争痕迹。红外套的魅力——鼓笛合奏的军乐——侍从武官骑着骏马匆匆忙忙地到处乱跑——明晃晃的长矛和寒光四射的利剑——古代战争的景象是多么不同啊。现在一年当中只有一两次惊人的战斗。我们不太需要象前辈那样的勇敢；我们需要的（在我们的队伍里无论如何我相信你会发现的）是一再拯救过英国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坚忍不拔的决心。如果在国内有谁想到或谈论和平，那你可以老实地对他说，我们的军队对于战争已够厌倦的了，但是如果必要的话，则准备再战斗五十年，直到最后目的达到为止。

① 给母亲的信，1916年5月5日。

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严肃的东西。但是每天报纸上都充满了胡言乱语，大谈我们如何“疲惫不堪”，同时国内的人们似乎是那样的热衷于一些无聊的个人争吵，以至那些重大问题（世人感觉到）渐渐被掩盖了，被忘却了。^①

那最后一句话反映了我们对某些失望情绪所感到的厌恶。从报纸和私人信件上获悉，这时失望情绪似乎遍及全国。

有一件事或许我还记得起来。用我们团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那令人激动但很危险的巡逻冒险活动使单调的战壕生活不致那样死板。”这真说得恰当不过。今年夏天对于使参谋机构着了迷的巡逻活动，人们有着两种见解。一种理论认为巡逻可以保持部队士气，另外一种——可能更为正确——则说巡逻是为了获得情报，试图去弄清楚德国团队的活动。不管怎么说吧，一天指挥官把我找去，向我交代了任务。那天夜里我要偕同一位班长和一名卫兵出去，目的是想活捉一个德国兵，或者在他自己的战壕里，或者一个碰巧在外面工作或巡逻的德国人。在这个小小的活动中，困难很多。首先是要通过我们的铁丝网，其次，在维利式信号弹不间断的照耀之下，德军狙击手或机枪手可能向我们射击；第三，即使我们好歹接近了德军战壕，我们还必须通过他们的铁丝网。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可是不久就碰见了一个德国哨兵或巡逻兵。双方便混战起来，胡乱开枪。接着，一个德国兵扔出了一颗手榴弹，打在我的脑袋上。手榴弹在我的钢盔边上爆炸，但不知怎么的我没有受到重伤。我们那位班长用敌人打击我们的棍子中的一根棍棒猛击我的敌手。他的钢盔被打落在地，威廉斯班长又打了他一棒。在这次撕打中，另外一个德国兵被打死了或者被打伤了。我们安全返回阵地，但未能捉回一个俘虏。早上我们作了汇报。我得了严重的脑震荡，留下极坏的后遗症，对此

^① 给母亲的信，1916年5月13日。

我永远不能忘记。除了脸上几块轻伤之外，我没有受到其他伤害。然而，我的状况不怎么好，对那天夜里的工作不能简明扼要说清楚。指挥官看出我明显地有点脑筋混乱。他转向威廉斯班长问道：“怎么回事？麦克米伦先生受伤时你干什么？”“噢，先生，”他回答说：“我看到德国兵想溜掉，于是我就揍他，把他的钢盔打掉了。接着，我又给他一棒子，他的后脑勺子被我砸下来了。”对于这件不怎么成功的作为，我受到了三项嘉奖：第一，因负伤而在军服上增加了一根条纹，我对此很为珍视；第二，得到了“克劳利”的友好祝贺，对此我更感到珍贵；第三，旅长拍来了如下的电报：“旅长愿向麦克米伦中尉及其本月 19 日的巡逻队表示祝贺，祝贺他们做出了杰出的报告并带回了最有力的情报。”我想旅长是在故意表扬，因为我记不起我们带回了什么特别的情报。但是，或许我们这次小小的恶作剧使身在遥远的陆军司令部或统帅部大别墅里的某公感到有些满意，因为他能够用这件事进一步证明巡逻是有益于“减轻战壕生活的单调。”

军医主任准备送我回国进医院，但是既然全部医院都因战斗即将到来而正在进行清理，那么这就意味着送我回家去。我的伤势确实还不是那么严重，没有理由这样作。经过与军医主任和德 85
克雷斯基尼上校讨论之后，我决定留下来。我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到我们下一次壕外休息完毕，我就恢复健康了。

当时，索姆大战即将开始。战役开始时的胜利和失败都与我們无关。但在 7 月底我们离开了伊普雷，并开始集结，向南移动。接着，我们得知，我们正在进入战斗。经过长途行军和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于 8 月 10 日到达贝特兰库尔特。皇家近卫师当时正在靠近索姆地区。我们营开进鲍芒—哈麦尔一线的右翼防御分区。我们遭到一次相当猛烈的炮火轰击，伤亡很大。几天之后，我们换防向库尔塞尔进发。我们从那里来到了梅欧尔特。就是从这個基

地，我们不久就部署了皇家近卫旅漫长的历史上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索姆战役已成为过去五十年来无数文章和书籍的主题。那次惊人的会战对于协约国目的的得失怎样，仍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敌对双方集结如此庞大的兵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各种口径的大炮也从未发射出如此大量的炮弹。步枪和机关枪也从未倾注过这样一阵弹雨。从来也没有如此大量的伤亡。我的目的不是要参加这场争论，我只不过想在这一巨幅油画上面把自己所占的那小小的一份勾画出来而已。

9月12日夜间，我们营把第三皇家近卫旅驻守的部分防线接了过来。我们知道皇家近卫师即将投入一场大规模的消耗战中去。我们听说很可能我们旅和第二旅要去打先锋，而第三旅留作后备力量。人们到处传阅那些老一套的鼓励性电报，其中一份是我们军长卡范勋爵拍来的。一场预备性战斗活动由我们营担负。为了使“进攻日”能有一个所谓“好的起发点”，必须占领一定的地盘，面积虽小但要稳固地守住。我们必须将金奇—弗莱尔公路上一个德军机枪据点拔除。两个排在明钦少尉率领下被派去执行
86 这项任务。我奉命调来两个排做为增援部队。我记得那是一个月色清新的夜晚，把我们前面的进攻队伍照得清清楚楚。然而，那领头的几个排都非常成功：不管对方火力多么猛烈，还是把果园中的敌人全部清除掉了。虽然领头的部队斗志旺盛，乘胜追击，超越了他们的目标，但明钦还是明智地决定，暂停前进，掘壕据守。他在拂晓之前将此事成功地完成了。我那一小部分人参加了这一活动，大家期待着一次反攻，但并未实现。次日一整天我们营一直留在前线，遭到了猛烈炮击，造成一些伤亡，其中包括一名上尉和两名连的军士长战死。14日傍晚我们被替换了下来，就在金奇后面宿营。我们那位令人敬佩的军需官象通常一样，准时地给我们准

备了口粮和甜酒。

那天夜里，我奉命带着一名传令兵前去同将在我们前面领头攻击的科尔斯特里姆营取得联系，并记下战斗前进的路线。我记不清了，我是代表全营行事呢，还是其他连的军官也是同样做法。我们在路上碰到一具倒在地上的德军尸体，他的手臂伸出，表示欢迎的样子。我的传令兵性好嘲笑，当我们从旁走过时，他热情地同死尸握了握手。我不知道这个异常的小插曲为什么这样牢固地一直萦回在我的记忆之中，但它的确使我不能忘怀。我肯定从中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这具尸体也是我们返回的途中一个很好的路标。夜间，我们得到通知，次日清晨6点20分为进攻时刻。第二和第三科尔斯特里姆营将袭击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目标。我们做为支援力量尾随其后。那第三个目标离勒伯夫不到几百码远。事实上，当黄昏到来时，仅仅攻克了第一个目标。

许多日子以来，就流传着关于某些神秘战争武器的谣言，据说那些武器很可能要用于进攻。事实上没有谁看见过，而对于这些可怕的怪物，歪曲的描述却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事实上还是些坦克，这在当时是第一次投入战斗。统帅部透露坦克（其数量还不能对这次战斗发生很大的影响）将在这次战役中出现，这一作法是否明智，后来人们争论不休。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曾看见过一两个这种怪物来回移动，其中之一眼看着陷进了一个巨大的弹坑中。⁸⁷那种东西是有用的，但并不起决定作用。

按照命令我们开拔了——天刚破晓之后——以排为单位，成炮兵队形前进，大约落后于科尔斯特里姆营的战士们三百到四百米。德克雷斯皮尼上校走在前面，身穿平时那套潇洒而不整齐的服装。我们其余的人则头戴钢盔，身披网状伪装。当我们到达金奇时，一阵阻击炮火密集轰来；我们被那嘈杂声和混乱情况弄得几乎头昏眼花。炮轰大都稍微偏向村庄的南边，但仍然产生了分散

人们注意力的效果。从右边向我们射击的步枪的密集火力，还有些枪弹显然是从后面射来的，这也使我们很感烦恼。这里是我们师同邻近的师即第六师中间的一个危险的连接点。所幸的是那里的地面潮湿松软的沼泽，以至使许多炮弹没有爆炸。但我们还是遭到了若干伤亡。第二连的劳埃德上尉阵亡了，但我没有看到。我那个连，即第三连的一位名叫阿巴思诺特的青年军官，腹部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而死去。当我们正在前进时，我负了伤——一块炮弹片击中我的右膝。正好打在膝盖骨下面。但我还是设法继续前进，直到后来才感到行动有所不便。

正如后来我所听说的那样，德克雷斯基尼上校当时认识到已经出了问题。我们按照命令前进，右边就是金奇—勒伯夫公路。但哪里也看不到两个科尔斯特里姆营。当时实际情况是，整个正面攻击已经向左转了，两个科尔斯特里姆营都不再是在我们前面了。原先是想由我们来支援他们，但他们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无影无踪了。我记得我们暂时停止前进的时间似乎很长（实际仅仅二十分钟），随后，我们接到命令继续前进。我们满怀希望地向着我们心目中的第一个目标推进，我们充满信心地认为这一个目标已在我们友军手中，其实它仍被德军所据守，进攻部队已经离开那里了。我们的掩护轰击当然已经停止了，这样我们就没有任何炮兵支援。我们只有把队伍展开进行攻击。经过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之后，
88 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就夺取了敌人的那条战壕防线。德国人可能和我们一样地感到惊奇。我们又设法和驻在我们右方很近地方的第三营取得某些联系。同时，我们清理了我们夺得的阵地，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我们各连和各排有点混乱，但士气很高。从我们左边一个阵地发来一阵讨厌的机枪射击，颇为恼人，于是我带领一队人出去，想把它压制下去。真倒霉，虽然我们对付敌人的机枪射击很成功，但当我半蹲伏半匍匐前进时，我在近射程内被击中

了。机枪子弹打进我的左大腿，刚好在屁股下边。后来我发现这些子弹穿进了我的骨盆。这次重伤有些奇怪，跟上次在卢斯时手上受的伤大不相同，那次手上负伤并无多大危险，但疼痛难忍。这次肉体上的折磨把我弄苦了，但并不感到疼痛。我滚进一个巨大的炮弹坑中，昏迷地躺在那儿，但并未失去知觉——至少起初是如此。

我们攻克的那个战壕就在我后面。第二个目标就在我前面。我推测战役可能发展到什么样子。结果证明，我们营再往前进是不可能的了，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右侧的第六师的进攻失败了，另一个原因是两个科尔斯特里姆营和我们营都遭到重大伤亡。在我们占领的那个战壕的左边，战斗异常猛烈，有些时候情况十分危急。但我对这一切自然是一无所知。我在坑内躺着。即使我知道还有个更好的弹坑，我也不能到那里去。我衣袋里装着希腊文的哀斯基勒斯的《普罗米修斯》。那是我十分熟悉的一个戏剧，按照我的情况，读读它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样，好象在那里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同时我也动弹不了，于是我就时断时续地阅读起那个剧本来了。那来自双方可怕的隆隆炮声响个不停，但既然我在战壕中间，从这一点来看，我便感到或许我的位置还不错呢。只有“流弹”可能打着我。可是，我从那深坑中往上看去，在白天看到敌人两三次进行反攻。德军绕着我那弹坑的边沿跑过去。但我隐伏不动，假装一个死人。没有一个德国兵由于好奇而打扰我。若是我动弹一下的话，那无疑我就会招惹人来，终于将我杀死。虽然这些反击使我不时感到焦虑，但终被击退；偶尔我看到一些德国人往回跑。我躺了整整一天，的确是十二个多小时，思绪万千，而又茫茫然一无所得。我主要的忧虑是担心自己被击中了要害部位，因为我感到似乎全身都麻木了。我流血很少，至少外部是这样。我没有水喝，我的水瓶已被机枪子弹打碎了，这些子弹打进了我的胸

侧。然而,当我一想到下面的情况我便感到安慰:或许我们的部队在继续前进,也或许他们一旦在我后边巩固了阵地,就会有人在适当的时候前来寻找我。

事情正是那样。当夜色笼罩大地的时候,连军士长诺顿这位优秀的人物,带领着一个搜索队出发了。我认为他多少有点知道我在哪儿。无论如何,他找到我了。我被送回我们据守着的那个战壕,并被带到我们指挥官当作司令部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的右膝关节僵硬挺直,不能动弹——并且很痛。我大腿上那处伤也使我左腿无法行动。我头昏眼花,但神志还十分清醒。谈了几句话之后,克劳利说:“好吧,我认为你最好是离开这里。”担架兵组成了——一伙抬我,另一伙抬一位名叫里奇的军官,大家都管他叫做里奇“狗子”,后来他在肯尼亚成了一位卓越的助理裁判员。在我们通过金奇时,炮火极为猛烈。根据战斗前的命令,是要在金奇建立一个救护站的。但我们并没有走多远,而炮火又那么厉害,显然救护站不必再设立了。我和里奇共同商议了一下,认为让四个身强力壮的卫兵冒着生命危险抬着我们再往前走,那是非常错误的。因此,我们告诉他们回到营里去,我们设法自己向前走。在炮火混乱的黑夜中,我们被拆散了。在那个时刻,恐惧情绪,更不用说惊慌了,把我们弄得不知所措。当时的勇气我认为主要(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来自虚荣或骄傲。一个人在战斗中——特别是如果一个指挥官对他的部下负责的话——好的行为举止(甚至勇敢的行动),都是身教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几乎就象球队的一个成员或舞台上的一个演员那样,在机械地进行表演。

90 但当时一切都过去了;我孤孤单单,谁也见不到我了。没有必要装门面了,我怕得要死。炮击非常可怕,我决定从坑里出来。尽管在理论上说,我不应移动,可是我记得十分清楚,我跑着,或者至少是蹒跚地穿过村庄,从村南头出去,脱离了炮火。我实际上顺利地走

了多远,自己也不知道。但我记得,当我走出金奇时就感到比较安全了;因为那里是敌人炮火集中轰击的地方。我一定是走在一条什么公路上,因为我曾从路旁滚进一条壕沟,后来被舍伍德林人营的运输队拉上车去。是在当天呢,还是第二天,我记不准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躺在救护站里;在那里我见到了内维尔·塔尔伯特(吉尔伯特的兄弟,我们在巴利奥尔学院时的牧师),他和我说了几句话。在到达阿布维尔一所医院之前,我再也记不起什么来了,我们似乎是在运河的某一地点乘坐一种驳船去的。在阿布维尔,我们被送进一所法军医院,那所医院是按照通常的法国式样设计和装备的。我在这里身体逐渐好起来,但由于伤员过多,我的伤口未能排脓,而任其逐渐愈合,结果自然是内部发生脓肿,全身也普遍中毒,最后,被送回英国。我模模糊糊地记得那艘医疗船,还有那开往维多利亚去的火车。当听说要把我送往远处的一所医院去,我反抗了。我下定决心——尽管身体十分衰弱——这一次定要自主行事。我已被朋友和敌人摆弄得够够的了。前面我已说过,我是如何说服了救护车司机,把车开到卡多根街我的家里去,以及我母亲是如何当机立断,采取了有效措施的。

这里有一段与这次战役有关联的奇妙的插曲。1943年夏天,当我担任北非战场常驻使节时,我必须进行一次从阿尔及尔到开罗的旅行。我们乘坐的飞机坠毁,我好不容易才逃脱出来。由于引擎着火,我被严重烧伤,而且受到的震荡也很厉害。我们大约在午夜动身,凌晨时我住进一所离机场不远的医院。这是一所法国 91 医院,白色的瓷砖、长长的走廊以及那高拱顶房间,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1916年在阿布维尔时,我曾要求给我母亲发一封电报,告诉她我很好。承蒙一位医官或牧师帮忙,设法把电报拍了出去。这一次,在阿尔及尔我要求拍出一个同样的电报,不幸,我的母亲与世长辞已经七年了。我承认,我已把我的婚姻生活、孩子们和其

他一切东西全都忘记了，对此我觉得惭愧。有那么一两天的时间，似乎觉得自己是一位三十年前一次战役中负伤的军官。当我恢复了知觉时，我认为这样的错觉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周围的每个人和每件事似乎同上次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有能干的护士长、漂亮的护士、仪表堂堂的副官、脾气很坏的军事长，有《见闻录》、《闲谈者》，以及菲利普·奥本海姆的小说，甚至还有一架手摇留声机，附有很少几张唱片，唱来唱去唱那几个曲调。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觉到胜利有把握了。

第二步兵近卫营在9月13、14和15三天的战斗中，伤亡惨重。总计有三名军官阵亡或重伤死去，九名军官负伤；在士兵中有一百零八人阵亡或重伤死去，二百三十五人负伤，十二人失踪。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该营取得了新的补充（军官和士兵都有），仅仅在十天之后就又奉命重新投入战斗。9月25日，仍然在原来的指挥官和副官德克雷斯皮尼上校和贝利上尉——都是前次战斗中的生还者——指挥下，他们发动了对勒伯夫的攻击。那一仗打得很勇敢，很成功。他们攻克了德军在勒伯夫的坚强阵地，并且向前推进到他们能够固守的一条战线。在这第二次战斗中，又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军官的损失是四人阵亡、五人负伤；士兵的损失是一百零八名阵亡、一百二十二名负伤，十二名失踪。通常的贺电拍来了。他们的确是受之无愧。

我的实战经历随着索姆战役的结束而告一段落。战斗是激烈的，但时间很短。一些军官在没有替换的情况之下，不得不经受长时间的堑壕战，而我却一点也没有受到那些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的长期压力。在那些日子里负了伤，负了“可以回英国老家医治的伤”，被认为是一个好运气，而不是不幸的事，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记得很清楚，个别的一些军官，身经百战，长时间在战壕中鏖战，但他们既未生病，也没有受伤。象他们那样勇敢的人，最后

也开始显露出某些颓丧的迹象。到了战争后期,根据某些情况,迅速把部队送回了国内。但是一个更为灵活、更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应该把在这些情况下的轮换视为正常之事。预备营的另外一些人准备好了,来接替他们。几天的战斗生活至少有其令人激动和满意的一面,当然也有危险与艰苦,但那沉闷而没完没了的战壕生活,却是一个大得多的考验。然而,这场战争提出了一些完全新的问题,既有技术方面的,也有人一方面的。这种新问题过去从未遇到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们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的后继者大不相同。当时到处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是不足为信,但肯定是有典型意义的——说是一位有名的将军在吃饭时,一位参谋对他说:“部队在这样讨厌的天气里行军使我感到很难过。雨一直不停地下了好几天了。”他说这话与其说是出自谨慎,倒不如说是出自同情心。据说将军听了后是这样回答的:“噢,他们都发给防水胶布被单了,不是吗?请把葡萄酒递给我。”除了极少的几次,这些大人物是从来不在前线露面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批准在帕斯痕达勒进行的那些接连不断而又毫无意义的战斗了。在那里几乎是白白伤亡了四十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那些坐在篷车里的大将军们指挥作战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一些较小的庸才坐在别墅里指挥的。

对指挥方面的这些情绪在整个陆军中是很普遍的,甚至在索姆战役之前就是这样。这样的一些情感部分是由鏖战的陆军的自尊心激发起来的,这确是事实;另外也由于这次战争的整个情况同过去的半岛战争、滑铁卢战争甚至克里米亚战争时代的情况不同。在上次战争中,副官一职是显赫荣耀的,在战争中他担负着最危险的任务。那时候,一些小部队的指挥官都参加战斗,正象今天海战中海军将官也参加战斗一样。指挥官的参谋们带着他的命令,在

93 战斗前沿骑马来回奔驰。只要看一下昔日战争中参谋人员的那些伤亡情况，就会明白他们的职位既危险而又光荣。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副官职务常常成了那些宁要安全和舒服而不要荣誉的人们的避难所。同样的情况似乎也适用于其他参谋职位。有这样一个流行的传说，可能是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伊普雷战役中出现的，说是德克雷斯基皮尼上校（那时是上尉）恶作剧地从一个已变为废墟的车站里把所有的能弄到的一等车票全部收集起来。这些车票上印着“布鲁日至伊普雷”、“布鲁塞尔至伊普雷”，等等。他将“布鲁日”或“布鲁塞尔”划掉，代之以“陆军部”、“总司令部，开罗”、“总司令部，英国派遣军”，等等。然后他将涂改过的客票分发给那些在他看来应该前来参加战斗的军官。

团队军官与参谋之间的敌对情绪因此很强烈——经常相当强烈。我们当中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舒适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训练有素的参谋机构的工作效率。当我们离开其他部队到普卢默将军的部队的时候，或许我们最能理解这一点（我更多的是谈我同伴们的经历，而不是我自己的）。在普卢默部队里每一件事都总是安排得秩序井然。这种不断增长的不健康的情绪，究其根源，其中之一虽然是一般的，但却很重要。参谋人员的黄铜帽和红领章引起众怒。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红领章就“象拿红布给牛看一样”。我们有一支最流行的歌曲，是朱米·莫里森上尉所写作的。我只能记得那合唱部分：

军长统率十万兵；
军长统率十万兵；
军长统率十万兵；
然而“红领章”把人马全输光！
荣耀啊！荣耀啊！哈利路亚！
“红领章”把人马全输光！

自然，后来我认识到，这个故事还有它另外的一面。当时，象许多别的青年军官一样——或在前线或在国内医院里——我对步兵近卫旅内部那种高度的纪律性与对一切外部权威的抗命精神结合得那样好，感到颇为得意。这种情绪与我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我很幸运，透过我所称为的“望远镜的另一端”，观看了北非战役的大部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军团、最高统帅部、参谋部以及战斗部队由于互敬互爱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主要是由于：许多主要的将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团级军官，他们不曾忘记他们的经历。他们经常在战斗的前沿出现，部队也很熟悉他们。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队是比较幸运的。

另外一个差异给我的印象很深。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遍地歌声的战争；与此对比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寂寞无声的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歌曲多得不计其数。《蒂珀雷里》向人们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此歌注定驰名全世界。《蒂珀雷里》与十七世纪的《利利伯尔洛》或十八世纪初期的《马尔布鲁克上战场》那两首歌很相似。除了《丽丽·玛尔勒内》和其他一两首歌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歌曲了。原因或许是两方面的。1914—1918年那个期间，杂耍剧场尚在全盛时期。战争开始时，有巴兹尔·哈勒姆的《着了迷的吉尔伯特》，乔治·罗比与维奥莱特·洛兰的一首著名歌曲《卿为世上小孤芳，我则人间一亚当》，以及无数的其他歌曲。所有这些娱乐都是在一座不受空袭的大都市里进行的，那里挤满了休假的军官与士兵。也许第二个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步行战争：五十分钟行军三英里，休息十分钟，然后再继续前进；全天行军十二到十五英里，当然携带装备；步枪、弹药、背包，后来还要带着钢盔。直到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有卡车搬运士兵的行装。行军，行军，再行军。脚步有时是走在法国那铺着鹅卵石的公路上，士兵们的铁掌大皮靴踏在那些

古老的石头上咯咯作响；他们有时慢吞吞地拖着脚步沿着狭板道走过那长长的交通壕。步兵靠着两只脚战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我所见到的，步兵是乘坐卡车、吉普车、装甲车、坦克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的。总而言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我离开法国之前，我们营的一切运输都是依靠马拉的。的确那是一场步行战争。这样也许它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一场充满歌声的战争了；因为士兵们不管是上战场，还是下战场，他们一行军便唱起歌来。

1916年9月底，我被送进贝尔格勒夫广场巴瑟斯特大厦中的医院。1918年12月，即停战以后几周内，我就最后一次离开了那所医院。我不是一直住在医院的，大约九个月以后，我就恢复得可以出院度病假了。又过不久，我就能够去切尔西兵营执行轻勤务了。同时，在一个短时期，我在一所训练青年军士和军官的学校里当了副官；这些人都是从新部队不断扩大的士兵中抽调出来的。有些勤务我不能担任，例如皇宫岗警，这是因为我的左大腿负过伤，无法佩带军刀。我不时返回医院，在伤处开一新口，取出铁片或骨头碎块。复元得这样慢，我自然很着急。最初的几个月过去以后，当我开始好转时，我急切想用更为剧烈的治疗方法。但照料我的那位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威廉·贝内特坚持他的疗法。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的伤将会治好的。那些不易取出的铁片将和肌肉自然揉合，最后创伤将从内部愈合而无中毒的危险。他所断言的一切都实现了，但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1919年初，管子就取出来了，并且我能够每天自己换药包扎，处理伤口的轻微化脓。直到1920年初，我的创伤才最后痊愈。

这样长期强制逗留在医院内和医院外——主要是在院内——实在是一次令人厌倦的经历。不住院了，休病假或执行轻勤务时，那当然可以享受一下伦敦生活的乐趣，或至少可以消遣一番。然

而，不知怎么的，随着时光月复一月地慢慢地流逝，所有这些显得越来越乏味了。回忆与忧虑常常萦回在人们心头。到那个时候，阵亡名单随着岁月的推移越积越多，总数达到惊人的程度。其中有些人是我童年时期所敬仰的知名人士——雷蒙德·阿斯奎斯、格伦费尔父子、帕特里克·肖—斯图尔特，以及许多别的人。另 96 外，是我在短短的牛津生活中结识的那些人，如鲁珀特·布鲁克，他经常作为厄克特的客人来访。还有那些伊顿、牛津以及团队的朋友们，一些年龄与我相同的朋友们，哎呀！还有些朋友甚至比我还年轻。伤亡人数与日俱增，人们简直不敢阅读报纸，特别是每当一次新的战役开始猛烈进行的时候。公报宣称经常的、不断的胜利；但伤亡名单就说明了代价如何。有些人因休假或负伤而住在国内，他们企图借连续不断的、甚至是有损身心的娱乐来避开这个梦魇。他们确实有千条理由万条道理去“借酒寻欢”。某些人昨日九死一生，另外一些人明天将见上帝。然而我却既无那样的健康和精力，也无那种癖好参加任何即使是无害的寻欢作乐，更不要说那些十足的放荡行径了。

1916 年最后几个月和 1917 年最初几个月那一期期间，我身体十分虚弱，对新闻消息不大注意。我记得读报时看到大字标题，报道阿斯奎斯辞职和劳合·乔治组成新政府。在我负伤前的那个夏天，盛传政府可能要更换。我记得在“宾波”·坦南特阵亡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把从国内听到的一些流言告诉了我。“他告诉我伯肯黑德的一个有趣的说法（或者归因于他），说米尔纳勋爵将接替阿斯奎斯。‘为什么一个发动了一场战争的人就应被认为是必然能够结束另外一场战争的人呢？’”^①假如我的健康正常的话，这个政治上的戏剧性事件将使我感到非常激动。我一向钦佩阿斯奎斯。我受他小儿子赛伊斯的邀请有一两次住在唐宁街十号，他

^① 给母亲的信，1916 年 5 月 12 日。

对我十分客气；赛伊斯是我在巴利奥尔学院以及此后多年的朋友。我早就知道，雷蒙德在索姆战役中阵亡对他父亲来说一定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我对劳合·乔治也很同情，我一生仅仅和他说过一次话，那时他接受了吉尔伯特·塔尔博特的邀请来到牛津大学俱乐部。对我说来——很象我钦佩阿斯奎斯的精神上的诚挚和道德上的高尚——劳合·乔治是位反叛者、革命者；尤其重要的是，他是位能成事的人物。在我看来，阿斯奎斯既代表旧世界的优点，也代表旧世界的缺点。更重要的是，他曾长期容忍了统帅部的错误。这样，这年过去以后，我身体渐渐康复，并且弄明白了更多的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我在一切讨论中都强烈地支持新政府，不管在病房里，或在食堂里和俱乐部里。确实，由于劳合·乔治同意进行象帕斯痕达勒那样的战役，并且对一些高级将领显然是驾驭无力，我对他感到失望。

在那些年里，我读了大量的书，主要是历史书籍，但也有一些古典作品。希腊文的我读了《奥德赛》和《伊里亚特》；拉丁文的我读了《伊尼伊德》^①。我也读了吉本的作品。我读了许多政治回忆录和传记。我心目中的英雄迪斯雷利曾经说过：“读点传记吧。传记中有史无论。”当我休假时，只要能去苏塞克斯，我就回家。我结识了许多人，他们对我很好；其中有位奥斯伯特·西特韦尔，他成了我的一位终生朋友。但是时光的流逝，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月，都过得太慢了，令人忍耐不住，而各种消息似乎都显示对结局无望。罗尼·诺克斯很少到伦敦来。我们两人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盖伊·劳伦斯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负伤，随后他到法国去了。唉！不幸在停战前几个星期他战死了。

1917年秋天那些旷日持久的战役大都劳而无功，使我感到很烦恼。我至少充分懂得了在官方声明中去体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

^① 《伊尼伊德》，罗马诗人维吉尔所作的史诗。——译者

意。我和其他许多人对于所有这一切都感到有苦难言；因为我们在国内，或许比我们在战场上——说得确切一些，比在泥淖中——更为痛苦。

接着 1918 年春季到来了，德军长驱直入。我记得那时候我回到了医院，仅仅能从前来看望我的朋友们那里得到一点断断续续的消息。最后，形势开始转变了。统一指挥建立起来了。德国人显然已经精疲力竭，而我们则在等待着——从 7 月、8 月到 9 月——我们四年来的恶运终于逆转了。最后——经过长时间的最后——胜利与停战都到来了。

碰巧在宣告停战时，我回到医院，作轻微的治疗，但我能够拄着拐棍步行。我记得很清楚，从贝尔格雷夫广场走出来时看到许多人群向海德公园角聚集。那是一种欣慰若狂的场面。然而，在 98 所有那些兴高采烈的男女中间，肯定会有许多人心情凄楚悲伤。

这四年战争犹如整整一个时代，因为时光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过得很慢。战争开始时我二十岁；战争结束时我二十四岁了。或许由于最后两年我被迫不能行动，因而我对于这些悲惨的事件比在前线时想得更多。况且，人不管多大年龄，并不是经常面临死亡的——当然不是暴死。当时我们每天都跟死亡在一起。

后来，我发现和我年龄相同的幸存者很少有人感到能够摆脱对这些岁月的回忆。往事使我们烦恼。我们几乎都有一种内疚，因为我们没有跟我们的朋友和同伴们共命运。我们确实感到，既然已幸免于难，就应当好好地生活下去。当战争最后结束时，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于应该如何重新开始生活，都感到茫茫然无所适从。我不能回牛津。每当我到牛津去，都感到它仿佛象是一座“鬼城”。对于我们的许多老前辈似乎又以不减当年的热情，重新开始玩弄政治游戏这件事，我们的心中不由得深深感到有说不出的痛苦。“老头们活着，青年们却死去了。”

同时，行伍生涯却使我们很多人得到了一些满足。除了融洽的伙伴关系以外，当兵还有其料想不到的但却无可置疑的魅力。服兵役对我以及养育我的家庭来说，并无多大关联。我在正规军或海军中亲友很少。我的大部分中学和大学的朋友是不会投身为一个正规军战士的。起初，那陌生的刻板生活和周围的一些事物令人有些烦恼。但有一件新奇的事情，它既令人感到生疏，又令人感到鼓舞。特别是在我加入皇家近卫步兵团之后，我开始从严格的纪律中尝到真正的乐趣，这和我在中学和大学里过的那种懒散生活大不相同。操练本身就是潇洒和优美的，操练得好，它就开始产生影响。做一件事，就应当把它做好，这种意识在任何高效率的军事编制中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这对文职人员的生活也是一个好的劳动规则。在皇家近卫旅中学到的东西使我受益非浅啊。

我逐渐了解到我的军官同僚们——特别是一些正规军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他们见解广阔，为人宽宏大量和诚恳质朴。起初，人们可能把一位军官同僚看做是眼界狭隘的人，他只对体育、赛马、也许还有女人感兴趣。直到相当一段时期过后，人们才会发现他乃是一位才华出众的风琴手或者是一位袖珍画专家。因此，对于知识阶层的人们（我就属于这一阶层）动辄偏狭无礼地把那些没有学过他们的专门术语或者不抱他们那种偏见的人不放在眼里而横加排斥这件事，我感到有点可耻。

其次，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懂得了勇气的意义。战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即便是核子时代以前的老式战争也是这样。战争暴露了黑暗势力，并使蛮性大发；同时，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胜利几乎带来同失败一样众多的危险。对整个民族来说，毫无疑问这是真实的。但无可否认，对个人来说，战争可以并且的确带来一种特别的激情——一种伙伴感——一种团体感和

一种胜利感。国王在阿让库尔^①战役前庄严地向其部下所谈的每一件事情，在1914年象1415年那时一样真实。任何人出于个人抉择而错过了或逃避了这样一个机会，那他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了。对于那些“现在躺在床上的英国绅士们”我一直总感到有些蔑视，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自动地放过机会，或者想通过觅得安全的职位以逃避危险。

另外，从军——也许这对于我自己的思想和理想的发展所起作用最大——给许多象我这种出身和阶层的青年人以一种经历，这种经历无论如何在那时候从日常生活中是难以得到的。从军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和各种类型的人物相交往；在这一方面那些拥有土地的绅士们和喜欢进行乡间体育活动、民间娱乐活动的人们，总是胜过那些学究气十足的人和不能从自己生活圈子中跳出来的人。由马夫、园丁、管理员以及小学教师教养、后来同广大群众分享欢乐、并且在陆军中和赛马场里经常地同各行各业的人们混在一起的一些人，他们很早就学会了怎样与他们接触到的那个广阔圈子里的人们互相交往和对待，他们的态度既不嘻嘻哈哈，也不羞羞怯怯。这对于我可不适用。除很少几位我父亲的职员以外，我们的家庭商业与之大不相同。我们的乡间产业很少。我找一封给我母亲的信，信中对此有所描述，我现在无意加以改动。 100

我十分幸福；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从心理方面来说是那样有趣，以至使人不能忘怀……的确，关于整个战争我认为最有趣味的（也是最微小的）经验就是一个人对于比较穷苦的阶级获得的了解。这些士兵们胸怀宽大，必须读一下他们所有的家信，那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有妻子，有家庭，他们每天都写家信，他们书信的风格是那么朴素，几乎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同时，很好笑地夹着一些讲究

① 阿让库尔，村名，在法国西北部，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曾大败法军于此。——译者

形式的或报刊上常见的词语——吻小宝贝或者小安妮；或“代他爸爸转告乔治要做个好孩子，别忘了爸爸”——这一切都十分动人。他们喜爱买些小玩意儿寄回家中——明信片，或者小幅丝织品，或者装饰用的针织工艺品。但偶尔也写上一两句严峻的话，跃然显示出一种令人不快的家庭斗嘴。“母亲，你从来不想给我写信。我已经给你写过整整十封信了，可是一直没有回信。是不是又在酗酒了？乔治大叔写信告诉我说，孩子们的处境极其可怕。”……从士兵的信中可以学到许多东西。^①

伟大的解放者波利瓦尔说过，人分剑客和长袍客两类。后者包括“牧师”（中世纪的含义）、文官、商人等等；前者是活动家和领导人员。他宣称每个人生下来不是属于这类就是属于那类。我肯定生来就是一位长袍客。奖学金是最高的追求，从中可以得到最大的荣誉。对学问的争论和辩论我最有兴趣。但是战争，至少是由于收养，使我成了一位剑客，我第一次同这一类型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得以观察并欣赏他们的品质。但还远远不止于此。通过日常生活和排里或连里士兵们在工作中的密切接触，我们初次学会了怎样去理解他们，怎样跟他们交谈，以及怎样和他们无拘无束地相处；他们那些人都属于同一阶级，我们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无从和他们接触。因此我们开始敬佩他们的坚毅，欣赏他们的幽默，从而在感情上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甚至检查信件也是一种经历；士兵们跟你商谈他们个人的问题，这会展开他们生活中的一整幅新的图画。后来，我发现这在选举生活中获得极大的好处。所谓“诊疗室”——当时是那样称呼的，在连队官兵之间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四年的战争给我带来了痛苦与悲伤，但它也使我广开眼界、经历更深了，并给了我自信与谦恭，而这都是在我青年时期所缺乏的。由于天性是一个“长袍客”，并受到这种训练，以及我永远要感

^① 1915年8月30日。

谢的青少年时期幸福时日给我的那一切，尽管是在一所冷酷无情的学校里，而我还是学得了一点点“剑客”的品质。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我和我的朋友们的生活中引起了一个突然而猛烈的变化的话，那么它标志着延续五十多年的革命开始了，那个革命就是我的传记的主题。对于就要到来的巨大变化，公众能看到多远呢？即使是内阁和英国人生活中的统治人物，对此又能掌握到什么程度呢？对此，议会理解得又有多远呢？对于战争的幸存者来说，至少一件事是免除了。如果我们在1918年预见到这四年的一切劳苦都是白费，并且预见到，在另一代，部分地由于德国的控制者们的邪恶，部分地由于德国人民愿意遵循一种甚至比德皇及其朋党的教义更凶恶的教义，部分地由于英国政策的制定者的软弱与愚蠢，所有这一切都将必须重再忍受，那么的确就更加痛苦无边了。幸而，帷幕将遥远的未来遮掩住了。可是对于迫在眉睫的一些事情我们又作何感想呢？

自然，许许多多的战役、伟大的生死戏剧、整个国家的大混乱，这些都奉献给了战争搏斗和军火制造，造成了可怕的动乱。一切还会恢复旧观吗？象战前那样的生活能恢复多少？这些问题许多人都回避了；一些人竭尽全力地献身于旧世界的重建；一些人梦想建设一个新世界。无论如何，1918年选出的议会似乎是没有怀着希望开始去尽力解决这些问题。劳合·乔治有一次开心地把它描绘为“工会代表大会面对商会联合会”。

我们的确意识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当全欧帝国动摇，王冠 102 落地的时候，英国君主政体却比以往更加稳固了。英帝国不惜把一切人力或财富都用于重整故国的事业上。各自治领、印度以及殖民帝国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那个时候，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问题还没有出现。当未来可能带来变化的时候，英帝国目前的结构却似乎是稳定、坚固的，与其说被战争蹂躏削弱了，倒不如说

由于战争而加强了。

恐怕最显著的变化是在技术进展方面。战前我就是 H. G. 韦尔斯的一个忠实虔诚的读者，在我看来他是一位新的科学时代的预言家。但在战争期间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发生。战前还是少数人的奢侈品的摩托车，私人和商业上的使用不断增长。在陆军中，用马运输已开始被卡车所取代，马最后成了供消遣或运动的动物，而不是用来干活了。即使在乡间这个过渡也已开始了。战前飞机还是一种玩具，战争期间已成为交战双方的一种强有力的军事工具了。不久它将成为一种正常的民用运输方式。

经济变化很不明显，而我还没有开始研究经济问题。战争自然产生了一种由于通货膨胀而引起的市面景气，在战争结束以及其后一两年里，这种情况依然处于高潮。我当然不了解原因，但却享受到了它的成果。我的确记得，我感到奇怪，不知怎么搞的，尽管那样大规模地浪费财富（政治家们开口就是钱就是财富），每个人的日子似乎过得更好了。确实，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什么可以发牢骚的。在战前的那些日子里，我父亲给我的补助费很少；而战后我发现自己的薪给优厚，在那时候还有所谓“近卫队津贴”补助；同时，不管是在前线，还是在医院，或在家里，生活多少有点无所事事。

然而，尽管我肯定不能自己宣称预见到了那些将来终于要发生的问题，但全国普遍感到旧的劳动条件一定要加以改善。政治家们把这称之为“英雄要有用武之地”。有头脑的人们觉得填平“两个国家”之间鸿沟的时间到了。另外一些比较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则看不出钱将从何处而来。

参政权方面已经发生了极其明显的变化。在议长会议上，所有党派都有代表，大家协商一致，从而使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以上。在战争结束之前就通过了必要的立法。选区的大小必定会改

变选举的整个性质。第一次产生了象真正民主那样的事物。因为已经授予妇女以选举权，虽说还不是在普遍的基础上，至少范围是很广的。因此战前英国奇异的特色之一——“妇女参政运动者”的造反——就烟消云散了。同时，妇女除了获准参加选举之外，在一切阶级中，妇女昔日的地位大大改变了。准许妇女进入商界，这在以前他们是不允许的。先前妇女主要是在纺织以及与纺织有联系的工业部门中劳动。现今她们进入各种机械工业。她们在本地发挥了自已的作用，并且大量地应征入伍。过去政府机关仅仅录用男职员，那时就大量地配备了妇女。与此同时，习俗方面也在发生变化。很难回想得起来，五十年前一位名门的年轻女士能够只身在街上行走而不损其声誉。那时步行走过圣詹姆斯街就是超越境界了。所有那些常规习俗，1918年时都已经放宽了，在二十年代就很快消失了。

俄国正专心致力于更广阔的活动范围，它那时（正如过去长期注定的那样）是一个未经探测的秘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很少。我们只知道沙皇制度倒台了，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内战以及引起大量争论的干涉行动被人们热烈地辩论着，但真实的情报很难得到。假若说俄国离我们很远，那么我们与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我们是十分清楚的。美国已是全力冲上来了，它爱出风头，充满自信，但仍然受到欢迎。对于我来说，由于有着美国血统，战争最初那几年是令人痛苦的。威尔逊总统那句名言“不屑一战”招来的只是轻蔑而已。1916年12月他关于我们的与我们敌人的战争目的相似之点所做的声明，以及1917年1月他对于“没有胜利的和平”的要求，都未能使事态得到很大改善。在那个时候，贝利西埃先生的“活报剧”以其无与伦比的情趣分散了厌战公众的注意力。我记得在一个著名的节目里，歌唱者在每一诗节开始时，总是这样唱道：“我将帽子摘下

……”，唱了一连串名人的名字。向威尔逊总统敬礼的姿势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见总统威尔逊，
我便脱帽致敬，
若问我为啥这样，
只因为，
他虽“不屑一战”，
却已结婚满心愿！
快点鼓掌莫怠慢！

这种和平主义与婚姻生活结成一体的做法使英国人民感到十分开心。当然，我们不知道美国已给了协约国方面以财政和其他许多别的援助。美国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是我父母的一位密友，所以我对于由于英国的封锁政策和中立国运输的被干预所引起的某些问题和外交上的困难，都有所耳闻。罗伯特·塞西尔勋爵住在苏塞克斯时是我们的邻居，也乐于告诉我们一点传说。一想到这些争论不时几乎使我们公开冲突，我便不寒而栗。因此，当美国终于参战，对于我们家庭来说，真是最愉快的一天。当第一个美国师由皇家近卫旅人数众多的乐队引导下通过伦敦时，我记得我母亲是那么高兴，那么激动。尽管美国在德国崩溃之前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并不太大，而美国一旦参战，战争的结局就定了。1918年最初那几个月里鲁登道夫的最后进攻是绝望的最后孤注一掷。正是认识到美国力量将不可避免地给协约国以几乎无限的援助，在
105 1917年至1918年初那一期间才支撑住了英国和法国的意志和决心。威尔逊总统尽管不是一位天才人物，但当他来伦敦时仍受到了热情而感激的接待。由于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的誓言和协定，那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灾难便被隐瞒过去了。从战争结束时的那种情绪来看，美国似乎永远放弃了孤立主义，并准备在维护和平中

发挥领导作用。

当时，紧接战后的几年最显著的特点是古老文明传统的势力与对抗。欧洲受到了震动，但还不是致命的。尽管在许多国家君主已被废黜，制度上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尽管一些大帝国都崩溃了；尽管共产党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欧洲文化的重要基础方面的许多东西都保留下来了。确乎美洲前来拯救欧洲了，首先是通过英国殖民地与自治领的辉煌壮丽的贡献，后来是通过美国的决定性干预。然而即使在否定了凡尔赛和约和舍弃了国际联盟之后，欧洲各国也为恢复元气仍做了卓越的努力，并且几乎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不过，这一切全都寄托于未来。

停战之后，我在病中与康复期那好几个月里反复考虑的那些想法，被我置于脑后了。对于一个虽然受到震惊但并未受到损害的二十四岁的青年人来说，青春的活力能使智力和精神得到迅速恢复；1918年末的生活，似乎提供了一个虽不能说是令人激动的但是有吸引力的远景。我急于完成一章并掀开另外一章的篇页。

第四章 插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管那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特征是怎样使人不大安心——使英国处于优越的地位。正如丘吉尔指出的那样，在连续四个世纪以来第四次战胜了那些妄图在欧洲建立军事暴政的人们，创造了古今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坚韧不拔、成就赫然的记录。我们很少怀疑这一切会在一代中就丧失殆尽。

在停战后的那个冬天里，虽然我因健康欠佳不能参加任何积极的庆祝活动，但我有着一一种巨大的解放与胜利感。那些圣诞节月份真正是欢乐、感恩的月份，尽管有很多家庭有许多理由感到悲伤。在几个星期之内，不顾胜利者凭借权势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个烦恼的世界，现役的普通士兵唯一热切关心的事——回老家。复员一词可以把这个要求全部概括了。这个要求是无法压制的，而在它未得到满足之前，威胁到了军队的纪律；这个军队在战争中从未动摇过，甚至在最剧烈的严峻考验与前所未见的伤亡情况之下，也从未动摇过。

复员的进程使我首次洞察到计划的优点和危险，特别是计划只根据理论而不适当地考虑人的方面。在战争临近结束的那个阶段，就制定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方案，根据那个方案，复员可以被用作重建工业的一种有效的手段。计划是根据工业需要而提出的。

107 它是合乎逻辑的。它是精心巧制的。但是它很少考虑到被涉及到的人们的感情。那是一个美好的设计，而且，如果有可能付诸实施的话，它就会产生令人赞美的结果。那个方案的基本点是先复员那些“关键”人物。这些人有时被称为“关键”人物，有时被称为“中

枢”人物，认为他们立刻回去工作，将促进工业和商业重新起步。但是，麻烦在于那些“关键”人物不是首先应征入伍的，而在大多数情况是最后入伍的。如果他们真是些“关键”人物的话，那么即使在志愿入伍时期，他们也会被劝阻不要入伍了。征兵到来时，他们只是陆续地脱离民政部门。因此，复员这种方式虽然从国家观点来看原则上是健全的，但与个人的公平感发生了剧烈冲突。它计划得很好，但它很不公平。而且，它大大地被滥用了。谁要想复员，他就设法叫雇主出具信函一封，说明要雇用他。雇主可能实际上是一家工程公司，但他经营的则可能是一个马铃薯煎鱼的店铺。这不易查核。所有这一切全都得由那些倒霉的连长们或者营部来进行检查。

圣诞节后不久，我回到切尔西兵营，工作较为轻松，我在那里发现后备营正在拿出全部精神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有高度纪律性的近卫旅，尽管它从未屈服过，当时也受到那种可以感觉到的真正愤慨的威胁。整个来说，全军公正感与责任感发生了冲突，同时在国内和海外都发生了几起麻烦的、甚至是危险的事件。在多佛、福克斯通和加来以及在卢顿发生过骚动。在格罗夫公园——一个运输兵站——甚至企图组织一个士兵会议。

1919年2月初发生的一个事件，我还记得很清楚。许多单位的大量士兵——两千或三千——假满后要回法国去。当他们来到维多利亚车站时，由于安排得不够周到，他们拒绝上车。他们乱哄哄地涌向近卫骑兵团，申诉他们的委屈，要求解决。他们甚至指派了一位“领袖”向伦敦统帅部提出条件。因此我们后备营接到指示 108 派出一定数目的连队协同近卫骑兵团的两支部队将“哗变者”包围起来。我未参加包围行动，但是我负责一个连在格林公园某处做为预备队，听候命令。实际上一切平安无事，有关人员被护送回惠灵顿兵营，吃了一顿很好的早餐，然后被送进了火车。虽然这些队

伍的行动,象别处类似的骚乱一样应该受到谴责,然而人们不能不对他们的抱怨深表同情。

国家叨惠于丘吉尔的是不少的,其中之一,除了少数人之外,现在人们不再记得了。丘吉尔被任命主管陆军部以后,立即设计了一个全新的计划。当那个计划颁布后,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公平的。计划主要立足于“先入伍,先复员”的原则;在处理复员时要相当重视伤员;对占领德国以及其他海外任务所需要的军队提高薪俸。然而,在丘吉尔快要控制形势和设法谋求内阁与议会的赞同的过程中曾经有着一个危险的停顿。可是,这个险恶的时期,不知怎地竟被克服了,秩序恢复了,大家都满意了。倘若1919年年初陆军部不改组,倘若没有一位新的有胆有识的国务大臣,那么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很有可能轻易地陷于完全瓦解了。这些事件给我印象很深。从白厅传出的近卫步兵后备营是否“可以信赖”的质询,这对我们似乎是一个侮辱。但这样一个问题竟然被提了出来,真有点令人震惊。

然而不管英国获得的军事荣誉是何等伟大,不管加强和平的责任和风险给人的印象是何等深刻,我同时代的人当中百分之九十九,其中也包括我在内,思想全部集中在唯一的一个问题上:“下一步我干什么?”我们这些非专业士兵中绝大部分人都把这次战争看作一场意志和力量的较量,只有赢得了这一较量,才能够带来胜利的果实。如果人们问及我们,我们得知下列事实,就会大吃一惊:也许除了“吊死德皇”以及“紧紧挤压德国人直到他们尖声哭叫时为止”之外,事情并没有完呢。无论如何,绝大多数人都当兵当够了,都想回家去。让那些小伙子们,或那些最后入伍的人去做还必要做的工作吧。让其余的人也都离去,重新开始吧。

对于我来说,这些确实就是我的感想。我不想作为一个正规军军官呆下去,即使我很适合于谋求一个正规军职务。然而我并

不急于立即进入实业界,尽管我父亲及其合伙人邀我那样做;我十分期望把我的余生致力于政府机关工作。于是我迟疑不前,认为没有必要立即开始行动。在这个冬天里,一个新的念头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我能不能利用我暂时的职务之便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呢?我在牛津读书时,我跟乔治·劳埃德^①非常熟识。在他受命出任孟买总督之前,我1918年冬天在伦敦遇到他一两次。他邀请我到他那个班子里担任副官,看来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这会使我过一两年舒服、愉快的生活,看看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国家,从一个我一无所知的世界中学习一些东西。这至少将把那老一套的伦敦政府机关生活拖延一个时间。这将给我一个恢复身体和精神的机会。因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对此团部也同意了。我原定在23月间就要出发,可是当我进行体检时,使我大失所望,医生们坚决拒绝发给我所需要的证明。我的伤还未治好,他们肯定说,在那种情况下到印度去是愚蠢的。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可以象别的人一样要求复员。我不能说有人在我手下工作,也不能说自己是位“关键”人物。但是,由于当局对我最后那两年里断断续续的服务并未做出多大的评价,因此,毫无疑问,他们是会乐于让我走的。但我并不想走,至少那个时候还不想走。假若可能的话,我想离开英国,离开家庭,我独自一个去看看世界的一个新地区和一些新面孔,并去寻求一些新的经历。孟买是会给我这一切的,它也会使我得到为一个我已经熟识并且非常敬仰的人服务的机会。幸而就在這個時候,加拿大总督德文郡公爵的工作班子需要吸收新人员。战时他雇用了一些年纪较大的并且受过重伤的人,他们自然都想回去自己搞点什么;因此,他很需要年轻的副官。我母亲听到了这个消息,她是公爵的母亲爱德华·卡文迪什夫人的多年好友。有人提议我可以干那个工作。德文郡公爵夫人那时在英国休

^① 即后来的多洛布伦劳埃德勋爵。

假,于是找她磋商了一下。我一直还是喜欢到印度去,并为取得医生同意做了最后的努力,但还是失败了。这样将是去加拿大而不是去印度了。在加拿大我及时地恢复了健康,找到了配偶。人生中的风流韵事就是靠了这样一些小小的机会的。

我于1919年3月底到达渥太华,并在那里一直呆到第二年1月底。这十个月在许多方面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任务不重但很有趣。总督官邸的气氛犹如一个大规模的、快乐的家庭聚会,有总督的家人,有络绎不绝的男女宾客,以及我们这些意气十分相投的幕僚。结交朋友的机会很多,特别是在渥太华、蒙特利尔以及多伦多,我们都充分利用加拿大人殷勤好客的传统。我因公出差可以乘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和加拿大国家铁路的列车,从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另外,威尔士太子的秋季访问使得这一年成了永远不能忘怀的一年。夏季里,可以娱乐的地方很多。我们经常在周末驱车前往公爵建筑在加蒂诺山里的蓝海湖畔的别墅去。有过几次有趣的观光旅行,其中包括从魁北克去萨格内河的那一次。还有钓鱼、划船、游泳以及调情取乐等。同时也作一点正经工作。

英联邦这个新观念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了,因此很难忆起英国和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老的”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得多么迅速,以及近来的变化如何。1919年时一个总督的职能和责任绝不仅仅是在礼仪方面的。如哈罗德·尼科尔森勋爵指出的那样,111 老的殖民理论并未随着维多利亚女王的去世而完结,而是一直存在,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①只是由于战争的冲击,加速了事态的发展,无疑这些发展在某种时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当我去加拿大时,总督仍然是由国王根据英国首相的个人意见加以任命的。总督以及他的办公室是加拿大和英国政府间主要的联系渠道,

^① 哈罗德·尼科尔森:《国王乔治五世:生平与统治》(伦敦,1952),第470页。

如果不是唯一渠道的话。每一件重要的事务都通过他向殖民大臣汇报。如果总督是一位特别富有政治经验的人物，大臣们都不拘礼仪地同他磋商，而他的意见是受到重视的。那时没有人对不列颠王国及其议会统治整个帝国的权力提出挑战。大英帝国的枢密院被认为是最高上诉法院。就在我到达之前，由于加拿大政府提出两项要求，使得形势相当紧张。其中第一个要求是罗伯特·博登勋爵坚持在和平会议上加拿大应有自己的代表。回想起威廉·菲尔丁对这个要求竟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真是莫名其妙。他多年来充当威尔弗里德·劳里埃爵士的主要副手，一直是自由党的一位领导人，虽然他以个人身份支持博登的战争内阁。他发出了一个庄严警告，反对一个可能使加拿大变为独立国家的危险步骤。这遭到代总理阿瑟·米恩的反驳，他的言词当时几乎被认为是革命性的。“在这里我以一个加拿大公民的身份断言”，他说，“作为不列颠帝国内部的一个独特的统一体，作为一个独特的自治统一体，我们对英国在处理每一个有关和平条件的问题中所采取的态度有发言的资格。”1918年10月加拿大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有重大意义的步骤，那时他们宣布要任命一位驻华盛顿公使。^①这一点，不管怎样应视为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地理联系。很少有人想到此举会导致广泛地扩展为外交代表权问题。 112

回顾一下，看看那些老的英联邦国家独立的发展过程以及为帝国的继续团结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基础多么困难，那是颇有趣味的。非常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加拿大地位的完全变化，就如其他自治领那样。自治领在和平会议上取得了他们的席位。自治领国家做为独立统一体加入了国际联盟。从1927年起，他们便

^① 这件事在1920年得到联合王国政府的同意，尽管那一职务一直空着，直到1926年文森特·梅西才被麦肯齐·金任命为加拿大驻华盛顿第一任公使。

行使向海外任命外交使团的权利。1926年的帝国会议上便面临着这个问题，会议通过了鲍尔弗方案。在1930年下一次会议上，一致同意了鲍尔弗方案在法律上的效力，此事于1931年末由威斯敏斯特法令完成手续，这与自治领议会的立法也是符合的。回忆一下这个具有特性的、巧妙的定义所使用的精确语言，也许是值得的：

自治领是不列颠帝国内部自治的共同体，地位平等，在它们内部事务的任何方面都不属于主从关系，尽管由于共同忠于王室而联合在一起，并自由结合而成为英联邦的成员。

然而，凡此种冲，都要看未来的发展。我在渥太华得到的经验，后来使我明白了议会在以后短短的几年中提出并通过的那些变革的意义是多么深远而又必要啊。

1916年德文郡公爵被任命为总督，他非常无愧于受到加拿大人的尊敬与热爱。他那尊严与朴实结为一体的品质，很投合他们的心意。几年之后，他那和蔼可亲、乐观快活的性格由于中风的不幸影响而黯然失色。那些仅仅知道他在最后几年是一个牢骚满腹和受尽苦难的病人的人们，简直难以想象这位本质上仁慈、聪慧而谦逊的人物曾有过那样的魅力。他的一些加拿大部长们经常告诉我，他们在刚结识他时，曾低估了他的学识以及他那坚强、机灵的性格。一个自负的或愚蠢的人受到他的接见后，离去时往往带着对总督阁下印象的一种错觉。但是主要的部长们不仅仅把总督看做一位朋友，而且把他看做是一位有益的政治顾问。他在下院有一段漫长的经历，当过近二十年的下院议员。他曾担任过鲍尔弗政府的财务大臣和阿斯奎斯战时联合政府的海军部文官大臣。自然，在副官室里，许多这样的情况都对我们隐瞒了，尽管我们首长的某些工作和影响还是流露出一些东西来。当时驻渥太华的总督照例每天都要到他在议会大厦的办公室去，总是有位副官陪他前

往。他在那里会见部长们，处理公务。公爵发现我对政治问题很感兴趣，他总是和我坦率地讨论起来。从这种接触中我从他那儿学到了许许多多东西。

确实，那年夏天加拿大的问题既严重又错综复杂。全国仍然受到强迫征兵的震动，特别是在魁北克省。1919年2月，威尔弗里德·劳里埃爵士逝世，他是位年高望重的自由党人，他的死亡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对他十分哀痛。劳里埃的影响尽管有些减小，但他一直是维护国家团结的。

我到达之后不久，社会动乱不安，引起了很大的恐慌；这种不安情况在温尼伯5月罢工中达到了顶点。不管怎样，米恩在罗伯特·博登爵士去巴黎参加和平会议不在国内时，总算坚定而有效地掌握了局势。除了那些一向胆怯的、无事自扰的人以外，许多严肃认真的人都对大草原诸省和温哥华的困难情况表示由衷的关切。“大同盟”运动和省际劳工会议受到苏俄和德国斯巴达克革命事例的鼓舞，他们向两方面的领袖们发去了兄弟般的贺电。威尔弗里德·劳里埃爵士去世以后，自由党便群龙无首了；罗伯特·博登爵士仍在国外。这种局面迫使米恩担负起重大的责任，而他却没有一个首相所具有的那样全部的权威。虽然任命麦肯齐·金做反对党的领袖那件事，后来证明是一场长期权力之争的开端，但在 114 当时，金的领导是不起作用的，也是没有前途的。我在这个时候有幸结识了他，这样就开始了一段持续多年的友谊。

在这种局势下，博登夏天回到加拿大时，便专心致志于重建他的党和政府的问题。许许多多的自由党人支持战时政府，承认征兵的必要性。在联合政府赢得了战争那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联合党没有可能吗？如果能把那些比较温和的法裔加拿大领袖们从自由党那里争取过来的话，那就会使政府稳定，给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定。这方面的关键人物是洛梅尔·古安爵士，我记得，

当总督的游艇停泊在默里湾时，不得不给他和博登安排一次会见，我对于这许事，在当时已看出了它的重要意义。公爵把会议的一切细节都向我做了充分的介绍。真够奇怪，在英国，劳合·乔治和联合政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自由党在战争的强烈压力下也分裂了。

博登的7月“奥德赛”不仅包括与古安的会见，同时也包括与法裔加拿大其他领袖们见面，如比罗、拉波安特，最后还有米厄。虽则有这样一些讨论，甚至还得到了魁北克副省长查尔斯·菲茨帕特里克爵士的巧妙帮助，但并没有取得什么真正的进展。然而，这是我第一次在高阶层中介入政治，不禁欣然自得。

除了在议会大厦从部长们和其他前来看望总督阁下或在里多俱乐部用午餐的人们那里得到一些流言蜚语之外，我常常不失时机地及时探听在议会内外进行的讨论。我时常到议会边座去听辩论，现在还记得，特别是米恩的才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仅仅听过一两次麦肯齐·金的发言。在我们看来，他的风格是老式的，他的语言有些华而不实。米恩在辩论中有那种“短兵相接”的气势，正如后来我听人说的那样。的确那时加拿大人的发言比现今英国下院中惯常听到的要冗长得多，也正规得多，我认为迄今也还是这样。他们通常遵循十九世纪的一种风格。但我总是乐于倾听他们发言，我所看到的那种议会场面把我强烈地吸引住了。

115 这年晚些时候，组成一个永久的联合政府，或者使法裔加拿大领袖们同官方的自由党拆开的任何努力，显然都是不会成功的。尽管那时麦肯齐·金在魁北克省的追随者不多，但最后的形势还是使他控制了那个省，因而控制了渥太华多年。

从政治角度看，1919年夏秋的大部分时间被花在了铁路合并的问题上，且不说这个问题对不对，政府并未增强力量。最后，罗伯特·博登爵士决定，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继续担任首相。公

爵告诉我说,经过多次讨论后,他于1919年接近年底时,将他的决定向同僚们宣布了,但是在他们的压力下,他屈服了。人们要他在职休假一年。这一点他做到了,他于1920年1月初,到国外旅行。他最后那次来政府大厦,给我们所有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忆犹新。除了那洪亮的嗓音和堂堂的仪表之外,他那诚挚而坚定的性格,溢于言表。他确是一位伟人。结果证实,首相休假一年的计划打破了,这是必然的;博登于7月辞职,那时我已经离开加拿大,对于加拿大错综复杂的政治,我就不能有更进一步的亲身体会了。可是,我幸而保持了许多联系,有的已结成了友谊。其中有一些杰出的人物——德雷顿、怀特、伯勒尔以及独具风格的克里勒。我跟巴利奥尔的一位老朋友文森特·梅西(后来当了总督)重修旧谊,过从甚密,多年来一直这样。

但是,我们在加拿大的大部分生活是与政治无关的。说实在的,这几乎完全是一种享乐生活。高级工作人员是由军事秘书亨德森上校和审计员理查德·内维尔勋爵领导的,他们两人都是友善的容易相处的人物。理查德勋爵对加拿大的情况很了解,他曾在前任总督康诺特公爵那里供职。随从人员哈里·卡特、休·莫利纽克斯^①、乔治迪·哈丁顿^②以及后来的拉里·明托^③都是一些 116 乐观快活的青年,他们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我们不知怎么地在战争中都活下来了,我们决心在和平的第一年尽情地欢乐一下。官邸总是人满满的——一部分是家庭成员,部分是川流不息的来宾。虽然正经事不少,这主要是些代表总督夫妇中的一人或另一人出席各式各样的盛大集会,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的招待会。到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去旅行那是经常的事。恐怕最难忘的是去魁北

① 后来的塞夫顿勋爵。

② 哈丁顿勋爵。

③ 明托勋爵。

克城堡的那一次，在那儿我们迎接了威尔士亲王。亲王周游完毕，我也随同公爵前往哈利法克斯送行。亲王在那儿举行盛大的告别宴会，招待所有的市长和其他官员。也许由于文娱节目精彩，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他们当中一个人掉进了海里，但很快就被捞了上来，人们都乐坏了。

尽管那时安大略省是禁酒的，而这也包括渥太华，幸而禁酒令并不适用于政府大厦。所以，我们的官方招待会很受欢迎，使人开心。河对岸座落在魁北克省境内的赫尔城郊俱乐部也是不禁酒的，我们都经常到那里去。多年以后我以首相身份来到渥太华时，在这个俱乐部里曾受到迪芬贝克先生的款待，这是一个引人幸福回忆的地方。

转瞬间几个月过去了。我想每一个青年，当他堕入情网，他是不会意识到别人在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不管怎样，当多罗西·卡文迪什同意我做她未来的丈夫时，这件事对其双亲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似乎没有引起什么惊奇。多年之后，我成了住房与地方政府部大臣。我的职责之一是关心英国国立公园。我对于那些国立公园一直怀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因为正是在加拿大贾斯帕公园那美妙的景色中，我初次懂得了互相爱慕之情。

1920年1月，多罗西同我一起回国；过后，她的父母也随之而来度假。我们于4月21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结婚。卡文迪什家族的一位亲戚坦普尔主教和我自己的一位堂兄约翰·
117 麦克米伦(后来是吉尔福特的主教)主持了结婚仪式。那时候举行盛大的聚会，邀请可以想到的所有亲戚，有年老的，有年轻的，那是一种风尚。我妻子那边来人很多，因为她家亲戚范围极广。我这方面则少些。在我的案卷中有一份婚礼登记表。教会、国家、文学界都有适当的代表人物；在签名的人当中有坦普尔主教、德比的主教、亚历山德拉皇后、康诺特公爵、约克公爵(后来的乔治六世)、

莫利勋爵、布赖斯勋爵以及托马斯·哈代；后面的三位都是我父亲最好的朋友。

就这样，在战后十八个月我们开始了共同生活，正如我写的那样，这种生活已持续四十四年了。我的妻子有时责备我说，她本想嫁给一位出版商，指望在文艺界过一种安静的生活。但事与愿违，她被拖进了纷烦的政治生活中去，这情况不得不忍受了四十多年。然而，她毕竟热心地接受了在她一方面来说几乎是一种世袭的职业。至于我呢，如果没有她那聪慧的指点和忠诚的支持，我就承受不住早年那些刺激和经常不断的失望，或者后来岁月中那些沉重的负担。

第五章 训练时期

随后的三年是在出版和政治两方面学徒的岁月。婚后不久我就进入自家开设的商号学做买卖。1923年我成为一名议员候选人。尽管一些重大的争端已经开始自行解除，然而前景依然是暗淡的。1920年夏天，繁荣依然保持着势头。只是在冬季临近时，失业威胁的最初征兆才开始出现。我们年轻；我们幸福；天地万物都在向我们微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一所房子。我的父母依然住在卡多根街，狄更斯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把它描绘为“一个脆弱的结合物将两个明显的极端联结起来了；它是连接环，把贝尔格雷夫广场的豪华的人行道和切尔西的野蛮景象连接起来了”。对于我们安家的那个切斯特广场也许同样可以这么说。它位于贝尔格雷夫和皮姆利科之间的边界区。那时候，我们以适中的价钱租得了一所房子，以后在那里住了十六年之久。我的四个孩子都在那里出生。几个世纪以来，伦敦发展的特点是稳步向西扩大，因此现在切斯特广场既时髦又奢华。在我们那个时代，可不是这样；它对我们非常适宜。

那时公司的负责人是弗雷德里克·麦克米伦爵士，他是我父亲的哥哥。其他合伙人是我父亲莫里斯以及他的堂兄弟乔治，乔治是创立人之一亚历山大的儿子。年轻的有乔治的儿子威尔和我哥哥丹尼尔，他因伤病从陆军退伍，后来在海军部供职，卓有声誉，并在巴黎参加制定和约。我是最后一个加入的。那时候，弥漫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那种极为欢乐的气氛。因为那些合伙人象福赛特一家人一样——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和福赛特一家人相似——是

一些真正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物。每个家庭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我伯父喜欢乡村和骑马用猎狗打猎。他在作家、演员、艺术家、商界人士以及一些专业人员中间的朋友和熟人，比之他同时代的任何人，几乎可以肯定是范围最广的。他担任过牛排俱乐部的主席多年，那里还会有人记得他。他在哈福德郡作了许多工作，他在那里住的时间很长，并当过副郡长。他也同样热心于医院工作——他曾任英国瘫痪病医院院长多年——并且还在别的公共团体服务。乔治为人谨严，他的精神之家是雅典娜神庙。他在约克郡有个家，对它十分喜爱。他对于出版神学、古典文学以及高级的技术等方面的读物贡献很大。我父亲给自己的假期甚少——每年不多于两个或三个星期——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出版业上。他特别关心教育方面以及海外的发展。他负责扩大我们的规模，并在帝国各处建立分支机构。合伙人天天聚会。尽管是近亲，尽管是终生伙伴，可是每天早晨见面时，他们都相当严肃地握握手。我们每天共进午餐，许多业务问题就利用这个时间处理了。有时有客人来，错过吃午餐是允许的，但多少有点令人不满。我们的长辈们对我们不仅客气，而且慷慨大方。开始是琐碎小事，后来是重大问题，都落到我们身上了。我们的三位长辈伙伴，年纪都很大了，都在1936年逝世。但在那时之前好几年，我哥哥丹尼尔和我事实上就成了总经理了。

虽然我一生都是生活在书的气氛之中，听到了许多有关出版事业的事情，最初的几年，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我伯父把照管我们某些主要作家的责任交给了我，他们包括托马斯·哈代、拉迪亚德·吉卜林、休·沃波尔以及其他许多人。结果我便干了二十年枯燥无味的日常管理工作。1945年至1951年我又回到业务方面干了六年。自从我卸任首相以后，除了设法提供一点指导性帮助之外，我已无力做更多的事情了。从1920年到1923年这三年，使我

120 从一个令人着迷的学徒时期达到一个精通技艺的阶段。

在我们自己的家尚未安置之前，我们住在我妻子的祖母爱德华·卡文迪什夫人卡洛斯街的家，和她生活在一起。她是一位很有特性的人，受过十九世纪下半叶辉格党和自由党集团的教养。对于一些重大危机和冲突的详情她都还记得：她的姻兄弗雷德里克勋爵在凤凰公园被爱尔兰恐怖分子谋杀；格拉德斯通先生转变为地方自治论者；以及由于自由党内部严重分裂而引起的苦恼。由于利特尔顿、格林以及塔尔博特几家人广泛的结合，卡文迪什与格拉德斯通两个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老夫人舌锋锐利，记性超人。格拉德斯通先生的女儿德鲁夫人常常来住，把自己晚年大部分时间用于专心照料爱德华夫人。她常常按钟点读书给爱德华夫人听。1920年夏季，巴克尔所著《迪斯雷利的生平》一书的最后两卷出版了。爱德华夫人坚持要德鲁夫人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时而插话，以一种故意的、淘气的神态说，“怎么样，毕竟他是本世纪最大的一位人物，不是吗？亲爱的。”德鲁夫人悲伤地摇了摇头，继续读下去。

一年过去了，1921年春天经济繁荣结束了。失业的困苦与悲伤开始出现。南方因有出口工业，遭受的苦难比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轻一些。但是即使在伦敦市中心，贫穷和痛苦的现象也在开始显露。那时为失业者和穷苦人提供食物，虽然是件新事，并且足以防止公开闹乱子，但规模还是不大的。因此人们在街道上看到相当多的叫化子、退伍军人的乐队以及一些别的行乞者，他们那可怜的状况——即使有些人是假的——实在叫人感到不安。失业人员游行示威开始了。沮丧情绪，这一附在胜利上的阴影，开始蔓延开来。万幸，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避免了失业的悲剧。

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学童时，曾经目睹过这类事情。1907年或1908年春天，由当时一位大名鼎鼎的鼓动家维克托·格雷森率

领的一支失业人员游行队伍向着温泽进发。游行要经过伊顿公 121
学。校长爱德华·利特尔顿邀请格雷森先生在校园里对学生们讲话，这次讲话有着一定的效果。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很自然的。然而我想，许多公学的批评者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件竟然发生在将近六十年以前，他们是会感到惊奇的。

战后，1918年普选中选出的政府尽管在选举中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从而在议会中形成史无前例的多数，但是政府内部却播下了不稳的、甚至是衰败的种子。

随着达达尼尔海峡远征的失败，大家对于指挥战争的关切增加了，又嚷嚷着弹药缺乏，在这样一个严酷的时期，阿斯奎斯被迫于1915年夏天放弃了由一党负责进行战争。因此他邀请保守党领袖博纳·劳与兰斯多恩勋爵同他共同组织联合政府。十八个月以后，索姆战役失败了，人们越来越感到阿斯奎斯不适合做一个战时首相，于是发生了一次反对他的政变，经过乱哄哄的策动之后，结果于1916年12月成立了以劳合·乔治为首的第二次战时联合政府。虽然新首相是位名声卓著的自由党领袖，他的地位仅次于阿斯奎斯，但是他的自由党同事却很少有人答应参加他的内阁。的确他们对于撤换阿斯奎斯以及所采取的方式都甚为不满。结果，保守党的领袖们全都参加了劳合·乔治政府，得到了下院保守党和全国保守党的赞成，而自由党却严重分裂了，事实证明这种分裂是必然的。大约有一半自由党后座议员，仅仅一两位前座议员参加或支持新内阁。^①

战争才结束——的确在停战后不几天——议会就宣布解散了。选举于1918年12月14日举行。做为大战中的胜利者，劳 122

^① “1916年劳合·乔治政府成立时，一百二十六个自由党议员或者说几乎自由党议员中的一半保证支持政府。”（弗兰克·欧文：《暴风雨的历程》，1954年，第347页。）

合·乔治向选民们要求并且也得到了一次压倒多数的信任投票。但由于支持阿斯奎斯的那些自由党人遭到劳合·乔治方面的自由党人或为劳合·乔治所支持的保守党人的反对，正式自由党人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阿斯奎斯本人失去了法夫郡东区的席位。民族自由党人——人们认为是劳合·乔治支持者——一般都保持住了席位。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保守党巨大多数的俘虏。阿斯奎斯保有官方机器和全国传统的自由党人的感情。然而，自由党被粉碎了，下坡路的第一步是从一个议会党下降为一个小集团。

那是很自然的，几个月过去以后，政府最初享有的众望没有保持下来。此外，由于国内传统党派中一个党分裂得无法修补，政治前途黯淡，令人不安。1920年，在政界里关于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合并的议论很多。我父亲的政治态度是既机警又超然，他认为两党应该合并。我记得他对我说过，如果两党现在不赶快合并，那就永远也不能合并了。很奇怪，反对“熔合”——当时人们这样称呼——更多是来自自由党而不是来自联合政府中的托利派。在保守党人集团里很有影响的德比勋爵仿佛与我父亲观点相同，他在1920年向朋友们发出警告，“要么现在就合并，要么永远不合并。”1921年3月博纳·劳因健康不佳而引退，那件事对于政府的稳定当然是一个打击。只要劳合·乔治和博纳·劳在一起工作，他们就成为效果奇异、相辅相成的一对。博纳·劳能够限制劳合·乔治的强烈行为。他离开了，没有人能够代替他。我记得在1921年夏天以前听到过的谣传，说劳合·乔治正不顾一切地力图使博纳·劳能够回来。但博纳·劳依然坚持说，他病得厉害，精疲力竭，除了休息之外，什么事他也不能作了。他的确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战争。五年来他肩负着最大的责任，地位仅次于政府首脑，差不多就跟政府首脑一样；在战争中他的三个儿子死掉了两个，这一切

使他心力交瘁。

到 1921 年夏季,幻灭的感觉开始增长。失业上升到二百万那样惊人的数字;贸易停滞。和平条约的条款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攻击,而另外一些人的支持则是有气无力的。无人为吊死德皇而烦恼。荷兰政府给予德皇以庇护权,从而使协约国免除了不少麻烦。但是赔偿情况如何呢?1919 年年底凯恩斯所著《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出版,销售甚广,产生了广大的影响。这给予劳合·乔治的威信损害很大,减弱了而不是增强了他分阶段处理赔偿问题的努力。那本书叙述了威尔逊总统在巴黎是怎样被谋略所挫败的,这使得他在美国的地位在一个关键时刻严重地受到损害。最后,它极力在英国和英联邦——甚至在美国——引起一种对德国罪恶的变态心理,这种变态心理从未完全消失,并且事实证明是灾难的根源。“迦太基式的和平”^①这一传奇,无论在德国还是在英国,都造成了无穷无尽的危害。当有关赔偿问题都说完了也作完了,某些政治家做出了一些愚蠢的诺言,一些主要银行家和“专家”也做出了各种估计。回想起那些事实来几乎是令人发笑的。几年来德国实际上付出了十亿英镑。为了应付这一需要,它向国外贷款十五亿英镑。总之,是德国得到了赔款,大部分是从美国得来的。

同时,一段痛苦的内战时期过后,英国和爱尔兰之间长达几世纪之久的、带来残酷后果的斗争,终于在 1921 年 12 月 6 日签订和平条约而告结束。联合内阁的所有成员,不管是保守党人还是自由党人,都对这个重大决定承担同等的责任。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都是自由党人。伯肯黑德勋爵是一个终生的保守党人,他战前是“合并”运动的忠贞不渝的辩护者,在谈判中他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北方各郡仍保持做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从而保卫了北爱尔兰

^① 迦太基式的和平,意谓和平条约的条件非常苛刻,以至足以毁灭战败的一方。——译者

兰昔日的特权。但是南爱尔兰，或者今天人们所说的爱尔兰共和国，成为独立国了，并且后来决定放弃它那有名无实的联邦成员资格。

124 如果没有激起对于背叛行为的大喊大叫以及对于卑怯懦弱的谴责，而这主要是来自南爱尔兰的那些反对独立的人们，那么这样一次巨大的革命是很难发生的。的确，人们常常这样说，保守党党员们的忿怒是一年后议会党决定退出联合政府的主要原因。但这决不能明确证实。我的岳父德文郡公爵从加拿大回来时，劳合·乔治曾建议他任职印度事务部；这是在1922年3月。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象德比勋爵一样，他拒绝了。引录一段德比勋爵的日记也许是合适的：

我想维克托做得很中肯，他说对政府的实际工作我们大概挑不出多少缺点来，诸如它的工作方式以及非常希望统一指挥诸方面。^①

日记继续说，而这些话是相当重要的：

他热烈赞成爱尔兰法案，并且打算要在一切方面支持它……。^①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指出下面的事实很有趣味：公爵本人是一位爱尔兰大地主，他岳父兰斯多恩勋爵拥有大量的爱尔兰财产，而公爵却赞成这一协议。我从未听说过他改变见解。或许我可以允许自己再从克劳福德勋爵的日记中引录一段，这一段提到了这些态度：

德比拒绝了，他并且谈论了那件事。维克托·卡文（迪什——德文郡公爵）也不想这个职位，但并不一直在喋喋不休。^②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日记是众所周知的危险源泉。但这段日记听起来是真实的。

① 伦道夫·丘吉尔：《德比勋爵：“兰开夏王”》（伦敦，1960年），第430页。

② 比弗布鲁克勋爵：《劳合·乔治衰亡史》（伦敦，1963年），第156页。

事实上，除了每届政府在议会就要结束时通常会失去众望之外，1922年夏季终了时政府发生困难的原因，比仅仅由于丢掉爱尔兰而引起的悔恨心情更复杂、更直接得多。在国内，农场主对于废除谷物生产法令感到不满，因为那个法令保证了他们的谷物高价出售。在全国工业方面，普遍的不景气和随之而来的失业决没有因为生活费的下降而得到补偿。物价低廉对于那些不挣工资的人来说，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 125

在国外，重组欧洲的宏伟愿望受到了挫折。国际会议走马灯式地一个接一个迅速召开，希望解决赔偿问题，并为欧洲经济生活的恢复打下基础。1921年3月由于德国违约导致法国强行制裁，包括占领德国一些重要城市，以及强行征收德国的进出口贸易税。在1月戛纳会议之后，由于会上白里安采取了更为调和的态度，作为回敬，他得到了签订英法安全条约的允诺，法国议会疑心重重，谴责总理软弱。总理由彭加勒接替，而彭加勒是一位心胸狭窄、墨守成规的洛林佬，他对于难以捉摸的凯尔特人劳合·乔治没有好感，几乎将其驱入绝境之中。在1922年4月热那亚会议上，英国首相作了最后的努力。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此。这次会议是历史上最大的国际聚会之一，代表三十多个国家，包括——战争以来还是第一次——德国和俄国。会议不仅在政治与经济问题上一无所获，而且德国和俄国背着其他国家在主要会议进行期间在拉巴洛谈判达成了单独的条约，这就使协约国，尤其是使热那亚会议主要发起人英国首相信誉扫地。用劳合·乔治自己的话说，为了完成“重建欧洲”，在他一生当中从未进行过比这更为出色的战斗。他从未放弃过努力，并且全面地显示了他那卓绝的手腕。然而，他失败了，而失败的内容比我们那时知道的更多——欧洲和平与繁荣的希望。正如詹姆斯·格里格爵士——一位高尚而不无经验的评论家——写的那样，如果热那亚会议成功的话，那或许就没有鲁

尔问题,没有希特勒,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①

劳合·乔治的勇于努力并没有为他赢得声誉。他失败了,失败给他和他的政府带来了耻辱。

最后,而且可能比外交方面任何其他别的挫折更具有损害性¹²⁶的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突然燃起战火,这件事似乎有把英国卷入一场对土耳其再次作战的威胁。劳合·乔治的确曾鼓励过希腊人轻率地入侵小亚细亚。当最后在查纳克达成解决方案时,国内舆论哗然。鲍尔弗和外交大臣寇松勋爵两人全都支持首相不让土耳其重返欧洲的决定。此外,不顾正式自由党的抗议,他的确能公然声称自己是在遵循着格拉斯通的传统。然而查纳克事件动摇了联合政府中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信心。人们认为丘吉尔和伯肯黑德都过于轻率鲁莽了。

除了国内国外的这些忧虑和失望,劳合·乔治的声望之所以下降还有另外的两个原因。第一,随着困难越来越大,他那正在滋生的傲慢似乎也不断增长。他对一些大臣几乎蛮横起来了。他与下属们打交道而背着他们的上级的习惯越来越突出。他周围的全部随从人员侍奉他似乎象侍奉一个独裁者,而不是象侍奉一个议会领袖。然而他却没有支持一个独裁体制所需要的权力。第二,荣誉交易令人厌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荣誉制度过去仅是轻微的弊端,那时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丑剧了。在十九世纪已建立起来的那些政党,从来都是从个人支持者那里募集基金,并经常以荣誉做为酬报,那么,事情的处理就更加微妙了,荣誉的接受者通常都是些德高望重的人士。劳合·乔治的代理人却与众所周知、由来已久的基础背道而驰。某些接受人是那样声名狼藉,以至他们的荣誉被撤销或者自动放弃。大家都说,在最后阶段,当财源将近枯竭之时,荣誉可用金钱购买,价格那么低廉,并可按年分期付款

^① P.J. 格里格:《偏见与判断》(伦敦,1948年),第82页。

款。全部事实真相大概永远也不会让人知道，但是人们一般都相信这些传闻，这却关系到劳合·乔治的威信。

但当考验来临时，劳合·乔治在政治上软弱的主要原因恐怕 127 是由于他是一位没有党支持的首相。丘吉尔在内维尔·张伯伦于 1940 年逝世后，遵循了一种谨慎的方针，他不同意某些学究式的评论家的意见，坚持由自己来担任党的领袖。二十年前，他对于一位试图不要一个坚固的基础而行事的人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当时，由于政治形势恶化，人们相信劳合·乔治本人想要辞职。寇松勋爵为那闪闪发光的首相宝座所吸引，准备冒险去干一番。然而，他继续肯定自己的忠诚。由于议会的常规任期临近结束，必须作出一些决定了。概括地说，保守党的领袖们愿意联合政府继续下去。次长们和一般人员都不那么坚定。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开始公开反叛了。

最后一致同意议会党——即保守党党员——应该自己作出决定，他们是想做为单独的一个政党参加临近的竞选，选出一位保守党首相呢，还是在劳合·乔治的旗帜之下，与民族自由党结成联盟。为了这个目的，1922 年 10 月 19 日在保守党本部召集了一次大会。保守党的一些领袖——奥斯汀·张伯伦、鲍尔弗、伯肯黑德——确信他们将能获得多数票，从而继续维持联合政府。但他们没有把两个重要人物的个人因素计算在内——而且他们的运气不佳。

首先，商务部大臣斯坦利·鲍德温出来反对劳合·乔治，他对劳合·乔治怀有强烈的、几乎是病态的憎恶心情。在公众中间他是一位很不出名的人物，但是他却受到他的议员同僚们的尊敬。

其次，博纳·劳决定返回政界，企图获得权力。如果联合政府瓦解了的话，他是唯一能够领导一个纯保守党政府的人。他因病引退一事至少使他近来没有失去众望。在他的朋友比弗布鲁克勋

爵的强烈影响下,几经犹豫之后,他下定决心,宣布参加竞选。他
128 通过两种方法预示了这一点。10月7日,在保守党本部召开大会
之前两个星期,他写信给《泰晤士报》,严词批评政府对查纳克危机
的处理。实际上,那是请求放弃冒险政策。我们不能成为“世界警
察”。在离职十八个月之后,就这样他又正式重返政治舞台。他的
下一步骤甚至更为重要。他在保守党本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
清楚地表明他赞成结束联合政府,他准备重新领导并且组织一个
独立的保守党政府。鲍德温的讲话很重要。博纳·劳的讲话
果断。

这桩恶运也多少有些奇妙。那些支持劳合·乔治的保守党大
臣把即将举行的会议安排在新港(蒙默思郡)举行的一次补选后的
第二天。这时,一个独立的保守党是在与工党以及联合政府中的
正式自由党相抗衡。得到政府“许可证”的官方候选人将取得胜利
那是可以确定无疑的。结果,独立保守党获得超过两千票的多数,
工党名列第二,而联合政府中的自由党则败居第三位。胜利的候
选人克拉里先生没有获得更大的声望。他不需要那样。象说话诚
恳的汉米尔顿一样,他只能保持短时间的声誉。他帮助搞垮了一
个政府,那个政府四年前曾以在七百零七个席位中获得五百二十
六个席位的多数——几乎是历史上最大的多数——重新掌权。

在保守党本部赞成脱离联合政府的实际票数是一百八十七
票,反对票数是八十七。九位大臣也投了反对票。他们立即辞职。
当劳合·乔治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向国王递交了他本人和他的
政府的辞呈。这不需要等待议会辩论或投票。那些原来支持政府
的势力收回了他们的信任。不寻常的战时联合政府结束了。自查
塔姆以来最伟大的战时首相劳合·乔治从此永远离开了唐宁街。
此后他一直没有再担任政府职务。

博纳·劳立刻接受国王的委任,他被选为领导后接着就开始

工作。在他的新政府中，我岳父担任殖民大臣。他既机敏又谦逊，对新政府的力量并不抱很大希望。新政府大部分由一些德高望重 129 但并无什么惊人成就的贵族所组成。伯肯黑德勋爵是联合内阁中一位主要保守党大臣，他对劳合·乔治始终忠诚。他断言新的保守党政府是一些二流角色组成的行政班子，这些话有些刻薄，但却符合事实。公爵喜欢同我磋商政治问题，在博纳·劳政府组织期间他要求我去见他。我发现德比勋爵正在与他交谈。公爵对于他们生存下来的机会抱有悲观的看法，并且指出了下院前座议员们的致命弱点。这一大批贵族可能万事如意。但在下院大厅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德比勋爵说，“你太悲观了。他们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小人物。他是那伙代理人中的一个，知道吧。他将做所有的工作。”“他叫什么名字？”公爵问。“皮格”（猪的读音），德比勋爵答道。公爵转身向我，问道：“你认识皮格吗？我认识詹姆斯·皮格（他是瑟蒂斯作品的爱好者）。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皮格。”原来是道格拉斯·霍格（霍格也是猪的读音）爵士！这真是特罗洛普的一幕。^{①②}

博纳·劳一组成他那性质纯粹是保守党的政府之后，他立即要求解散议会。投票在11月15日举行。我没有参加选举。尽管我希望有朝一日试图进入议会，但我不愿在那样早的时期就冒昧地向公司合伙人提出要求，以取得他们的同意。但我关切地注意着，并且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我的几个朋友，我越来越感到兴奋。然而，我很烦恼。那时我对劳合·乔治钦佩之至，我一直就是那样。我对事物注意的不够，以至对他的错误无所察觉；但我认识到了他的伟大。

① 伦道夫·丘吉尔在他所著德比勋爵的传记中，对于这个故事曾有过叙述，大体正确。

② 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译者

在这年夏天，发生了两件怪事，我的妻子和我都与之稍有牵连。诺思克利夫勋爵临死前的几个月得了一种相当于夸大狂的病。那时他住在卡尔顿花园一号，我岳父把德文郡的房子出售后
130 买下了卡尔顿花园二号。一天下午，我妻子和我正在屋子里观看各种正在进行着的变更以及搬进来的图画和家俱。监工神态相当激动地告诉我们说，照料诺思克利夫勋爵的那些人希望把他搬到公爵新宅的房顶上去。好象在他病态的情况下，他坚持他与天国之间不应再有任何东西。一号房顶有个斜坡。二号房子的屋顶则是平的。公爵和公爵夫人外出不在，也找不到我的内弟。怎么办呢？在我们看来，我们只有同意那个要求。但这是一个奇异而又悲惨的故事。

当诺思克利夫勋爵的生命陷入绝望时，《泰晤士报》将会发生什么问题，已成为人们深切关注的事情了。比弗布鲁克勋爵曾记述过，坎贝尔·斯图尔特爵士如何提出一项计划，组织一帮可靠的人，由他们来购买具有管理权的股份，而且目的之一就是让劳合·乔治担任编辑工作。这似乎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看来甚至也乞求过国王的帮助，但自然是无济于事。那时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人们也在担心罗瑟米尔勋爵可能会购买股票，而许多人认为他的政治见解几乎象他兄弟的见解一样难以信任。同时，当然威克姆·斯蒂德仍旧控制一切，他是劳合·乔治一个强硬的敌手。有一个时期，他每天——如果不是每小时的话——都同博纳·劳接触。也向德文郡公爵打了交道，看公爵是否会单独或合伙购买具有管理权的股票。款额巨大，但德文郡宅邸的售出毫无疑问为他提供了一大笔现款。我记得，他与我在不同的阶段讨论那项方案，并且在关键时刻曾向我在苏格兰的驻留处打电话。最后，他拒绝了那个计划，我想部分原因是他希望比3月更为有利的情况下重回英国政界，那时他已经拒绝了劳合·乔治要他担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建

议。肯定他考虑过既当内阁大臣又当报纸老板那是不适当的。股票将落入令人尊敬的人手中,那他也就感到满足了。几经变化,约翰·阿斯特上校以比罗瑟米尔勋爵更高的标价购买了股票。阿斯特上校这样做是出于最良好的意图,他想保持住报纸的独立性,让政策由编辑掌握,而不是由老板掌握。唉,良好的意愿哟! 二次大战前编辑方针是招灾引祸的,再没有比《泰晤士报》编辑部更糟糕的“姑息者”了。甚至在二次大战期间,正如我将在我关于雅典共产主义革命的叙述中描绘的那样,在对于东地中海的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大难时刻,《泰晤士报》表现出可怜的无知与严重的学究气。回想一下,如果公爵曾中标买到股票的话,《泰晤士报》的历史过程会是怎样,这是耐人寻味的。^①

某些人,包括博纳·劳本人在内,对1922年的选举结果不太抱有希望,并且认为保守党人他们自己充其量只能占有一个二十五席的多数。结果是超过七十个席位那样的多数。这次选举是靠“安定”那样一个奇怪的呼声来竞争的。它并不象是十分鼓舞人心,而当1929年鲍德温在“安全第一”的题目下重复那一呼声时,结果证明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但是毕竟由于对战争的感受和对战后年代的焦虑不安,证明安定恰恰是人民所要求的。劳合·乔治对它有过恰当的描述,那个描述很有趣,但不能使选民们信服:“安定!”他大喊大叫,“这不是一个政策,这是一个呵欠。”但是安定胜利了。自由党分裂为几乎是势均力敌的两部分。劳合·乔治有六十二个追随者;阿斯奎斯有五十四个。工党席位增加,原来只有七十六席,这次获得一百四十二席。^②丘吉尔失去了他在敦提的席

^① 关于这些谈判的详细叙述可在《泰晤士报史》第二部分:《1921—1948》(伦敦,1952年)中找到。显而易见有大量的方案,一些是单独的,一些是互相关联的。

^② 这些以及后来的普选统计数字是根据戴维·巴特勒和珍妮·弗里曼写的《英国政治事实,1900—1960》(伦敦,1964年)。

位，而阿斯奎斯在下院重得一席。

人们满怀信心地期望着 1922 年的议会将正常地向前发展。由于没有大的立法议案的障碍，在国内它将集中精力逐渐重建一个稳固的政府，而在国外则求稳步前进，以求解决困难。事实上，
132 它仅仅支撑了一年。博纳·劳身患重病，上任不到七个月就辞职引退。五个月以后，他就死去了。他的继承者鲍德温便这样出人意外地登上了首相宝座，他建议在年底以前解散国会。但这个短命议会的经历必须简单地给以叙述。

联合内阁的垮台并未给人们带来宽慰。确实，重大问题似乎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恶化了。

尽管“安定”，尽管劳合·乔治已销声匿迹，他现在已成为和平时期的恶棍，而不是战争时期的英雄了——公众舆论就是如此反复无常而又往往是胸襟狭窄——就国内来说，贸易并未恢复；失业数字依然超过一百万以上，而且曾几乎达到一百五十万；价格继续跌落，商业继续衰退。紧缩通货政策在执行，博纳·劳以传统的强硬态度拒绝了任何关于借债或赤字预算的问题。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开始研究这些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以后十五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是注定会日益紧迫地吸引着我的思想的；所有我们这些战后余生的年青人都开始对于一个那样不能令人满足的、那样使人失望的局势，越来越感到忧虑不安。对于我们当中的某些人来说，那种局势肯定是不能容忍的。

在外交方面，新政府并没有显得比过去的政府更为成功些。博纳·劳和寇松勋爵（后者先在一个首相下当大臣，很快他又侍奉另一个首相）都不能制止彭加勒和新的法国政府执行他们的计划。1923 年 1 月法军开始占领鲁尔，一切后果随之而来。

如果英国的经济问题以及围绕着欧洲的各种危险在那一年显露出来的话，那么，即使对那些最肤浅的学者来说，也会在殖民地

政策范围内采取一项意味深长、富于想象的决定。德文郡公爵尽管通常是位沉默寡言的人，他却常常跟我无拘无束地谈论工作。他主持殖民地事务部工作非常严肃认真，虽然他脑子来得不快，但是他有宽大而正确的原则。他的一项政策声明招来多方面对他的严厉批评，从而给英国的殖民发展留下了一个永久的标记。这是关于英属东非洲——即肯尼亚的。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估计到在移民和保守党右翼中会引起的敌对反应之后，公爵规定了“至上”原则。他正式宣布，在任何问题上，凡是移民和本土居民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后者的利益应被视为“至上”。在1923年，这个主义即使说不是革命的，的确也是出人意料的。公爵遭到巨大的压力，要他撤回或者修正那一原则。但他仍然十分坚定，而且不管好歹，这个决定为许多年后历届政府必须采取的某些决定，树立了事情的典范。

当时，英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清算美国债务的经过是外交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之一。人们从博纳·劳的观点以及鲍德温的观点给了详细的叙述。1922年8月的鲍尔弗照会建议：常识和正义都要求全面解决债务，这在美国遭到冷遇。根据著名的柯立芝声明的精神，“他们借钱了，不是吗？”华盛顿当局正在催逼立即进行一次负有法律义务的清算。他们全不考虑英国债务中的一大部分是为协约国借来的这一论据。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在3月初国会休会之前，商定两国政府间的条款。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存在着二元性的美国制度，确实有某些不便之处。但在外交上却有相应的优越性。虽然那时我并不十分了解这一点，这是许多场合中的一次，当时行政部门向国会求援以弥补它的弱点，目的是维护那不然就会令人怀疑的政策。众所周知，鲍德温——当时的财政大臣——突然地、出人意料地不与内阁商议，也无视博纳·劳的电报警告，竟同意了一项提议，强使英国每年付

款三千四百万英镑，共付十年，以后每年付款四千万英镑。这些金额必须大部分用黄金或相当于黄金的东西支付，因为美国的高额关税政策使之几乎不可能以货物支付。博纳·劳或者想拒绝鲍德温的清算方案，或者想辞职。现在我们知道他当时得到了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位同僚的支持——诺瓦尔勋爵^①和菲利普·劳埃德-格里姆(后来的斯温顿勋爵)。^②经过一整天的讨论以后，一切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我见到了公爵，他对我说，他对于博纳·劳宣布宁肯辞职而不愿参预这样一些灾难性的约定感到关切。这是1923年1月30日的事情。内阁在一阵混乱中休会。看来好象“二流人物们”有其弱点，而“一流角色”将很快能够说明这件事的道德标准以取得某种效果。可以这样说，一个为澄清混乱而成立的政府，又缺少劳合·乔治体系的中央控制，没到三个月就在极度混乱中垮台了。前途确实暗淡。第二天内阁在博纳·劳缺席的情况下开会了，最后大家同意，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条件那样苛刻，还是应当接受。一个由财政大臣缔结的协定，不管多么不明智，便不可能拒绝接受了。

我记得那天晚上公爵来到切斯特广场。他与凯夫勋爵被委派去拜访博纳·劳，要他听天由命。首相勉强同意了；但这个插曲肯定没有使鲍德温的同僚们对他的手腕或决心给予高度评价。然而，总的说来，全国普遍的意见是同意清算贷款的。银行家们和商业界人士无意对博纳·劳让步的两千万镑和鲍德温送掉的三千四百万镑(后来是四千万镑)之间的不同，去进行过多的挑剔。仅有的两位强烈反对债务的专家是梅纳德·凯恩斯和麦克纳。^③

① 苏格兰事务大臣。

② 贸易大臣。

③ 雷金纳德·麦克纳(1863—1943)，前自由党议员，在阿斯奎斯内阁中相继担任海军大臣、内务大臣以及财政大臣，当时是米德兰银行总裁。

1923年5月博纳·劳引退以后，有关争夺首相职位的情况各方面的资料都已详加叙述了。这也是广泛争论的问题。这一竞争是在鲍德温与寇松之间进行的。无论如何，在上院也好，在下院也好，党内的一般意见都反对寇松当首相。我记得公爵对我说过，他感到在上院议员中挑一名首相是完全不可能的，一届政府，其成员有这样多的贵族，的确是不可能的。他竟然说，他认为再也不会在上院议员中产生一位首相了。不错，公爵是位传统的自由党人，在许多方面对不断变化的情况，他比他的保守党朋友们更为敏感。除此以外，尽管他为人谦逊，对于小事显然漫不经心，我认为他多年以来就发现寇松勋爵是一位有点傲慢的朋友和邻居。他常向我谈起寇松勋爵得到嘉德勋位时欣喜若狂的那个故事。寇松向他详细地解释说，对于他本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寇松家族中未曾有人获得过嘉德勋位。他赢得嘉德勋位是由于他自己的努力和他成功的事业。他继续说道：“你，维克托，当然喽，你是做为嘉德家族的首脑得到它的。德文郡的公爵们总是得到嘉德勋位的。对你来说没有一点光荣。但对于我这却是一种个人的荣誉。”公爵软弱无力地抗议说，他在上院和下院都经历一段漫长的政治生涯，在国内和国外都竭尽全力而努力工作的。这些都被丢在一边了。“不，不，维克托，”寇松勋爵继续说道，“这对你毫无意义。我是自己挣得的。”寇松的傲慢态度以及他性格中那不可思议的冷漠的一面，使他很不适于在现代情况下担任首相职务。不管怎样，在一次议会休会期间，问题得到了解决，没有更动几个人，政府继续下去了。

麦克纳——从后来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来看，真够奇怪——被敦促出掌财政部。几经犹豫之后，他拒绝了，内维尔·张伯伦受到任命。麦克纳是一位自由贸易主义者。张伯伦不是。

在几个月内，显然忘记了他把他政府中关键的财政职位奉献

给一位确切无疑的自由贸易者。鲍德温突然得出结论，在即将到来的整个冬季里除非以保护贸易制度为基础，他无法对付失业问题。但政府是 1922 年年底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136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他们很难理解当时辩论财政问题时人们那种几乎是神学般的热情。关于当今更客观地认为是一件能够以实用主义来解决的问题，人们当时对它的那种狂热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自从皮尔于 1847 年在这一争论上挫败了托利党，而他自己随后也因遭到报复而毁灭以来，这个问题搁置了多年。在那时，保护贸易制度当然意味着保护英国农场主对抗进口食物。自由进口事实上意味着自由进口食物和原料。进口工业品以至严重地威胁纺织工业，更严重地威胁钢铁重工业，在英国工业的鼎盛时期，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1902 年，当约瑟夫·张伯伦提出关税改革的整个问题时，情况与皮尔为了工厂主的利益而牺牲农场主和农场劳动者大不相同了。然而，张伯伦的主要目的是对外而不是对内。激进的帝国主义者设想了一种结构，根据这种结构宗主国与殖民地都应当是受益者。既然殖民帝国向联合王国主要的出口是食物与粮食，那么与外国的贸易便应当征收适当的税额，同时在殖民帝国这些方面的贸易却应当免除关税。作为回报，殖民帝国要同意给英国工业品以真正的特惠，这些工业品形成了殖民地进口的大部分。这种互相补充的制度称之为特惠制度，它被正统的敌手们，自由党也好，保守党也好，视为致命的罪恶——反对自由贸易信念的根本基础的罪恶。约瑟夫·张伯伦的竞选运动在本世纪初分裂了当时的保守党，并且导致了 1906 年自由党那次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选举胜利。在紧接大战前的那几年里，保守党由于这个问题被严重地分裂了，约瑟夫·张伯伦怀着帝国主义的狂热又把它

重新提出来了。因为张伯伦——第一个张伯伦——曾经并且一直在心里保留着某些革命者的东西。然而他的政策失败了，这不是因为权威性评论者在理性上的非难，而是因为人民实际上的反对。因为对殖民地的进口给以特惠，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食物税——令人憎恨的“肚子税”——托利党小面包代替了自由党大面包。任何人试图把进口小麦的计划中的关税定得合理一些，他就被野蛮地抨击为复活了的玛丽·安托万内特。^①然而没有食物税，137就不可能有有效的特惠待遇，因为食物是帝国必须向我们输出的物资。对于他们向我们市场出口食物而不给予这种利益，那么就不能期望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市场上给予英国工厂主们一个相应的特权地位。

无论如何，一个新的因素当时已经开始出现了。十九世纪的自由贸易者为了保证免税食物以使英国的工资结构不与人为的生活费用高涨发生关系，而高兴地牺牲了农场主的利益。在他们心目中，自由进口意味着自由进口食物和原料。但是现在，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内，英国的工厂主们开始大声疾呼反对免税进口工业品，那些货物是在外国生产的，那里的工资低，工时长。甚至在重工业中，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发生了。在钢铁贸易中，廉价的棒铁、钢坯和角钢涌进英国港口——在克莱德河上、泰恩河上、提兹河上以及在所有其余的上帝本想用来出口而不是进口钢铁和机械产品的那些河上——而这对于那些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们来说，是历历在目的，他们看到他们的原则维护住了，但他们的利润却化为乌有了，他们的工厂停了工，他们的工人失了业，拖着沉重的步伐流浪街头。

这是 1923 年夏季几个月里呈现在鲍德温和他的亲密同僚们

^① 玛丽·安托万内特(1755—1793)，法王路易十六的皇后，大革命后被处死刑。
——译者

眼前的景象。彻底改革关税制度好象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是也有这样的困难。在前一年(1922年)的大选中,博纳·劳曾明确地保证说,如果当选的话,他的政府和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在国内和国外,都不会执行冒险政策。要有安定——即使对那些失业数字不断增长的人们来说,也要有强迫的和无报酬的闲暇的安定。

138 鲍德温下定决心至少要自由行动。要想自由行动就得进行另一次选举,在选举中能够从选民那里得到行动自由。他除了这样对付以后几个月中失业与贫困可能带来的一切,没有别的办法。这件事情的必然结果,自然就是要求绝对自由——在食物关税、帝国特惠(双边贸易)以及工业保护等领域内与外国的竞争相对抗。在战争中,为了节约吨位空间并且增加收入,一位无可指责的纯正自由贸易者自由党财政大臣征收了麦克纳税。这种税适用于汽车、钢琴和表。双方的信徒们,自由贸易者和保护贸易者,根据自己的偏爱,以顺从或胜利的态度来看待战争关税。普通老百姓说,这至少将是一种试验。那时这个试验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正如可以想到的那样,似乎并没有明显地得出什么特殊教训。

促使首相突然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的另外一个不太体面的原因,在各俱乐部和政界到处议论着。据说他已得到情报,得意洋洋游历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合·乔治打算回国,并且宣布他将转向保护贸易,做为失业的一种对策。人们有点冷讽热嘲地推测,一位保守党首相更加关切的是排斥一位对手,而不是欢迎一位改变信仰者。

处于压力之下,鲍德温迅速地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一方面因为兰开夏对任何形式的食物税都强烈反对(而当时保守主义在兰开夏指的是德比勋爵,并且牵扯到七十个席位),另一方面因为很容易提供一个机会,使自由党的两派在“为人民的食物而战”的口号下重新团结起来,于是鲍德温把自己的纲领限制为保护工业的

一道命令。

鲍德温的决定使保守党的两派都不高兴。奥斯汀·张伯伦和他那些一直未参加政府的朋友们以及政府中的那些曾是约瑟夫·张伯伦改革运动忠诚追随者的大臣们，都哀叹全部纲领都被削减了。另一方面，他的政府中那些自由贸易者，如德比、索尔兹伯里以及德文郡自然都对鲍德温不征求同僚的意见就作出决定的那种方式，感到大为不满。公爵对此相当镇静，因为他对这些问题绝不固执己见。他倾向自由贸易更多地是由于传统，而不是出于信念。¹³⁹他作为他伯父第八世公爵建立的基金的一个评议员，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安排得奖论文及其他奖励措施，这使他有点为难。然而，这并不足以成为一个严重的障碍。别的大臣们会提出要有一段时间使宣传教育运动能够展开。从我后来得到的经验来看，我不认为这样一个计划是真正切实可行的。一旦一项政策决定了，并且尽人皆知决定了，最上策就是大胆地去付诸实施。无论如何，大局已定，国会于1923年11月底解散了。

这整个一年我对政治的兴趣一直在增长着。我与一位内阁大臣密切联系；我与我内弟哈廷顿勋爵之间的友谊发展了，他1922年曾是一位落选的候选人，他被邀请再次参加竞选。他是一位热诚的政治家。我与我学生时代和当兵时期的朋友进行接触，他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开始政治生涯。所有以上这一切都把我激发起来了。我受到吸引而又倒下。但我的处境是困难的。我投身商业生涯尚在初期，我不能轻易地希望说服我父亲及其伙伴，我应当把我本来应该致力于学习生意的时间用来参加竞选。然而我却非常渴望成为一名候选人，即使那只不过是一次试验也好。但主要的问题是，我不应获得胜利。因此，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前往保守党中央事务所——当时在皇宫事务室——在那儿我被介绍给一位绅士，他就是处理这类问题的。我告诉他我想当某个地方的候选人；

我认识到为时已晚，我不可能期望得到一个可以获胜的席位，更不用说一个优越的席位了。我确实也不要求那样，我要求的是经验。那位绅士似乎同意这一点，因为我毫无经验，而经验显然是我所需要的。举出了几个不同的选区研究了一番。最后，来了一个人，说道：“我们给你把事情安排好了。今天下午来吧。提兹河畔的斯托克顿需要一名候选人，会长要到这儿来的。你不大可能得胜。”就这样我的政治生涯开始了。

140 会长准时到来了，他确实是一位具有相当魅力的人物，但他对参加政治运动的看法几乎同我一样不够明确。我记得，他身穿一件外套，衣领是俄国羔皮的，领带上有一枚饰以宝石的别针，这使得他的外表有点象个剧场上的人物。事实上，他是船舶公司的一位股东，在战时发了一笔大财，那时已把股票出售以抵偿欠款。他坚持说，在斯托克顿我将找到我的试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那个席位虽不能说是激进党的，在传统上也是自由党的。确实不错，这个席位曾两次被保守党人所赢得——一位叫罗普纳，另一位叫赖特森。但这两位都是当地工业界的头面人物，而他们的胜利是在保守党人非常得势的时刻取得的。一位塞缪尔先生曾长期占有这个席位，他代表激进党的利益。他的遗孀仍然保留着巨大的影响。会长认为我们将要进行一场激战；但是从城市的苦恼情绪以及随后出现的普遍向左转的情况来看，我们除了进行一次体育表演之外，很少有机会做其它更多的事了。“喂，老兄，对你来说，这将是一件好事，”他说，“并且你会十分喜欢这样做的。”我问他为什么人们找到我头上来了。他对于此事十分坦率。委员会已邀请他和当地另外一些绅士都来参加竞选，但他们谁也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没费多大气力就把我说服了。我同意尽快地动身前往斯托克顿。

以此种方式投身于政治活动，对于任何一个青年人来说，都是

一次希奇的经历。有时,也许是通常,一个候选人在选区工作中有过一些训练。在政党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制度下,一个候选人先前没有履历,是不能当选的。他也许已经游说过了,他属于青年保守党运动的成员(如果他是一个保守党人的话),参加过政治学校和地区集会。他或者曾在地方政府担任过什么职务。通常是在一定时期的服务和准备之后,才被挑选作为候选人。但由于战争以及我紧接战后的生活环境,我毫不具备这样的背景。对什么是一个党派社团,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我从未搞过游说的活动。我是从同时代的人那里,或从我父亲那些爱推究哲理的政治家朋友们,如约翰·莫利、詹姆斯·布赖斯以及罗伯特·塞西尔勋爵等人的口中学得政治的。当然,我在牛津也获得了某些知识。不过,我在牛津的时间不长,并且雄心大志难以超出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的范围以外。在去年,我通过我的岳父紧密地接触了实际政治问题。¹⁴¹但所有那些都是高级资料——会议室里的政治。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集市和街道的乱哄哄的集会。

那时我要突然地进入竞赛。但我的地位之所以立刻使人振奋和困惑是因为我对于我要进入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实践知识。我从未到过提兹河岸,甚至连泰恩河岸也没有去过。我除对印刷和装订略有所知外,对于任何机械或工业程序都一无所知。除了格拉斯哥(我的堂兄弟们在那里从事印刷业)以外,我几乎没有到过工业城市。我从未见过大炼铁厂、大炼钢厂、大机械厂、大造船厂,这些工厂都建立在英格兰北部的和苏格兰的河岸边。如果不是战争,我也没有生活在工业居民当中的任何实际经验。在联队里,军士和近卫队士兵大多是从南威尔士、英格兰中部地方以及有些是从纽卡斯尔招来的。我开始以对待战友的态度来了解他们;但是,除了通过看他们的信件以及同他们交谈之外,我对于他们真正的生活方式很少了解。一位朋友说服了我去协助伦敦东区的一队童

子军。这件事使我对于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们的社会略微有了一些了解。但这十分有限。恐怕斯托克顿在后来二十多年给予我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从了解中产生的同情和谦逊。

次日我开始了长途旅行，并且立刻发现自己陷入了提兹河边铁路系统的混乱中去了。为了到斯托克顿去，似乎必须先去索恩纳比；当然，要在达林顿换车。我在一个黑暗的雨夜到达，当地的会长欢迎了我。我们驱车数英里到他的房子里去，那所房子已经租给乔治·波利特上校，就是那位和蔼的——如同后来我了解到的那样——帝国化学公司正在开始设计的比林厄姆工厂的才华出众的组织者。

142 过后不几天，我想查明组织中全然混乱的情况，那时我认为它是独特的，但后来才知道那种情况或多或少是共同的现象——至少在那个时候。也许我们的组织可能比通常的更稍微混乱一点儿。有一名代理人、一个妇女组织者、一个有点象是男子组织的东
西，以及一个更多地象是妇女组织的东
西。会长本人被局势弄得颇为困惑，他每当听到呼吁时便把脑袋缩进皮领中去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听到不少忠告。人们敦促我将那位代理人免职，并指派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似乎谁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作，但显而易见，有一方希望换掉地方上的一个宠儿。万幸，我拒绝了。那位代理人是几个月以前被指派的，他证明是一位好人——纯正的伦敦佬，没有什么知识，未受过教育，但是忠诚，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办事，人很能干。他引退以前，曾在五次选举中为我尽过力，我从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朋友了。好吧，假如我不想去掉代理人，妇女们的组织者怎么办呢？她应当是联合代理人或至少是副代理人。代理人对妇女组织者很不赞成——这种看法是很正确的。后来事实证明，她善于诽谤而不善于组织。有个指挥部吗？要占用会议室吗？什么时候提名呢？谁将提名推荐我呢？自由党人怎么

样呢？如果我去见奥尔德曼·X.的话，那就万事大吉了；因为人们推想，赞同联合政府的自由党人的那部分选票是他控制着的。我去见了奥尔德曼·X.。他原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虽然不无一定的不负责任的和蔼态度。事情就这样进行下去了。

我的妻子那时仍在给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喂奶，她立刻作了必要的安排，在竞选运动开始后不几天到达。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搬到城市另一所房子去，在那儿一位可爱而仁慈的主人柯克先生照料我们的一切，他多年来在每次选举之间和每次选举期间把我们都给宠坏了。我的妻子有些政治经验，因为她几乎从襁褓时期就在选举气氛中受到熏陶。但那些都是乡间的竞争，主要苦于冰与雪。我们的困难就不同了。无论如何，一种例行公事很快就定下来了。白天，你四处走访那些仍然开着的工厂，尽量和更多的人讲话。午后，参加一些妇女集会；晚上在学校召开一连串的会议——一夜两个或三个。它对于现在成百的曾参加过这些几乎是礼节性仪式的候选人来说是完全熟悉的，对我来说却仿佛十分陌生。我们尤其喜欢在会后，特别在夜间去工厂附近走走，那里火光冲天，而当铸造大型铸块时则犹如一座巨型熔铁炉在作业。起初，在那些教室里开会我感到非常困难。我与一个人结下了终生友谊，唉，现在他已故去。他白天整日为自己的生计而劳动，而晚间则通宵达旦地为党工作，他把自己献身于党了。比利·埃利斯有一次对我说：“你不善词令；但你是个好小伙子。”二十五年后，他对我的儿子说了同样的一番话。当他第二次批评我时，他说我已逐渐地有所改进了；对于下一代他同样充满希望。无论如何，有一个回答很受欢迎。在表决候选人的会议上，除了别的事情以外，我作为一位实业家和出版者而受到推荐。一个青年在大厅后站了起来，他显然已经受过中等教育。他说：“你叫麦克米伦。你们出版‘霍奈二氏代数’吗？”我答道：“是的，我们出版。”既然是那样，他说，“我就

143

不投你的票！”对此我回答说：“你一定是买到了那个不好的版本。你应该买有答案的，不要买不带答案的！”

也许是出于恶意，或是因为愚蠢，会议总是好象安排在幼儿园里。我依然可以看见大量的听众拥挤抢坐那些小长凳子。我立即开始明白了主持人的重要性和危险性。想保持事情相当安静的任何希望都可能由于他的开场白而很容易地破灭。如果他是一位地方上的雇主，用“你们雇员们”这样的话开头，那就糟了。起初我的那些演讲都加以润色，用于牛津大学俱乐部，比用于蒂勒里或波尔特雷克或帕拉迪伊兹·罗（这些都是久已清除了的贫民窟）等处更为适宜。人们偶尔以一种敬畏的态度来倾听这些讲话，这种敬畏常常是向一个传教士或一个训诫者表示的。那些演讲被高声喊叫所压倒那更是经常的事。不久我明白了，人们来的目的（如果有什么目的的话）是为了提问题的。甚至在我第一次竞选结束时，我就找到了一个窍门，就是在乱哄哄的地方不要去发表演说，而是把整个时间用于回答问题就行了。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发表演说似乎不能或只是偶然地涉及到使听众感兴趣的论题。在无线电和电视机使用很久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开会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时间好象没完没了似的——象在学校里那样——然后，突然间，投票的日子就来到了。人们象通常那样惊慌，那样到处游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假若不是我的代理人乔·库克稳重沉着，那就要使我感到有些焦虑。“有人在烟酒特许专卖处的上面开设了一个会议室！”“即使咱们进去了，也不会找到座位——说不定还会被送进监狱呢！”“什么专卖处，一个小酒馆吧？”“唉呀！不，是一家离开什么街不远的酒馆。”“某某请某某喝酒，要他投他的票。”“是谁？”“会议室里一个受了贿的小子。”“这是违犯刑法啊！”“一本小册子也没散发到哈特贝恩。”

“为什么没送到呢？”“索恩纳比没有竞选名片啊。”“那些名片是昨晚送出去的。”“对对，但约翰尼那个傻瓜给遗留在电车里了！”等等。

我费尽心力草拟了一份优美的竞选演说词，人们告诉我说，每个选民都将认真阅读这篇演说词。结果，或是出于政治偏见，或是由于厌恶，演说稿的绝大部分都被邮递员从联结斯托克顿和索恩纳比的大桥上扔到提兹河里去了。后来，我们听说这种举动还不是偏心的，所有候选人都吃过同样的苦头。

最后，投票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候选人无事可做，只有从一个会议室踱到另一个会议室，身上佩戴着徽章，他们的汽车上都披挂着缎带。我们党的标志是红色的，自由党的是兰色的，工党的是黄色和绿色的。

我的妻子很快就学会了拉选票的艺术，毕竟那只不过是做出一副自然、朴实与稍微谦卑的姿态而已。中产阶级的太太们企图劝阻她不要到那些叫做“不好的街”上去。在这次选举和后来的五次选举以及在选举之间的许多机会里，斯托克顿和索恩纳比那里几乎没有一家对我妻子的面孔不熟悉。人们总是殷勤地接待她，并且情意深切地长期缅怀着她。

投票日终于过去了，接着是计票的日子。镇公所书记长是个专横跋扈的人，在会议室里任何时候他都不允许人们发表意见，计票就在这间会议室里进行。他要求绝对肃静，好象在教堂里似的。¹⁴⁵事情已经很清楚，在选举的那一个星期左右期间，我们正在得到比预期可能得到的更多的支持。但是，自然我们不能断定自由党和工党之间选票的分配会是怎样的情况。计票工作以高效率完成了，因为镇公所书记长只雇用经过他自己挑选的人，他们干得又快又好。我的妻子已经精疲力竭，在计票期间她大都睡觉，这被许多人赞美为一种固有的恬淡和自我克制的姿态。

最后，当计票完成后，那可怕的时刻到来了，在任何一次选举

中对于一个候选人来说,都是最坏的事情。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接着,突然间成百张、然后成千张的选票川流不息地涌向某人的票堆。选举快要完成了。它全部结束了。我和我的支持者都未曾想到那战斗是多么地势均力敌。一时间,看样子好象我得胜了。如果我更有经验的话,我一定就要求重新计票了。也许什么地方有一小叠一百张的选票,其中九十九张是我的票,而上面压着一张工党或自由党的票。但我对这些奥妙全然外行。市长宣布了选举结果。候选人的得票数不相上下:自由党一万一千七百三十四票,保守党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一票,工党一万零六百一十九票。我们落选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胜利了。

未来如何呢?直到下次选举——或许至少四年那么长远——我将在圣马丁大街和我的同伙们一起工作,而不是在威斯敏斯特了。这是我所要求的——或者人们设想我曾经要求这样。在深夜里和第二天,我们得知鲍德温的赌博已经失败,博纳·劳也失去了他在1922年所取得的多数。在新的议会中保守党将有二百五十八席,社会党人将有一百九十一席,而自由党将有一百五十九席。谁胜了呢?看来这似乎相当模糊。谁败了呢?这却很清楚。在当时,考虑到保守党的席位遭到的巨大损失,那么仅以七十三票之差在提兹河畔被击败这一情况,就应视为一个不小的成功了。我们回到伦敦去了——情绪激动,兴高采烈,并不感到失望,并且期望着另一次战斗。当然,差数是如此微小,我们一定能重返斯托克顿的。

然而,我心里总是在想,我学到了多少东西。我没有工业生活
146 经验,没有跟失业或贫穷的痛苦密切接触过,对妨碍工业的一些问题没有技术方面的知识,而到这些人面前来,要求他们投赞成票,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厚颜无耻了。有一件事我很高兴。这不是在“安定”问题上竞选,这是为一个积极的计划而竞选——对抗那威

胁英国工资标准和就业机会的廉价进口工业品的保护贸易制度。鲍德温的话是很容易向那些已经失业或担心失业的人们说清楚的。廉价的进口货物开始涌进国内,甚至包括钢坯和棒铁,况且还有钢铁制成品。为了和其他国家作买卖,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关税税率。因此诚恳地提倡保护贸易是不困难的。我一直感觉到我们的政策对于许多工会会员很有吸引力,他们之所以不愿投我们的票仅仅是因为受到压力或团结的错觉而已。毕竟在工党崛起之前,工人阶级在传统上是站在保守党这方面的;小商人、店主以及中产阶级一般是站在自由党方面的。无论如何,这是一项政策,我们可以白天到处游说,夜间在教室里谈论,或者午后在斯托克顿市场中的十字形房屋里或是在索恩纳比的“五盏灯”那里,向那些大都是自行离开工作的听众们宣传。情况注定不久要恶化起来,甚至是灾难性的。同时,大规模失业这个问题从那时开始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后来一直继续了许多年。

第六章 选入议会： 最初印象和人物评论

1923—1924年的议会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任期最短同时也是最富有戏剧性的议会。选举结果于1923年12月8日宣布。保守党在下院的议员从三百四十四名减少到二百五十八名，工党从一百四十四名上升到一百九十一名。自由党因保卫自由贸易而暂时重新团结起来，他们的议员名额从一百一十七名增加到一百五十九名。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几乎是最后一次表面上言归于好，尽管他们是在一个互相猜疑很厉害的基础上一道工作。保守党因此便成了最大的政党；但他们失去了他们在1922年获得的超过所有其他政党的明显多数。工党可以在取得自由党的默契下组成政府，但只有自由党首先在选举中击败保守党政府才行。保守党若能与自由党达成协议使他们坚持反对工党的话，那么保守党便能继续当权。作为最后一着，如果认为防止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是事关紧要的话，那么，保守党人可以提出维持一个自由党掌权的政府。所有这些交换和结合，在选举后的几个星期里人们热烈地在辩论着。俱乐部里极为活跃。万物都处于适宜的环境。正如可以预期的那样，支持过联合政府并且仍然忠于联合政府的保守党大臣们，是对鲍德温和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工党政府掌权的那个运动的那些领导者们的主要批评者。奥斯汀·张伯伦、伯肯黑德，甚至鲍尔弗，都积极地为这个见解游说。以扬格为首的保守党干事们也为赞成一个在阿斯奎斯领导之下的自由党—保守党联合政府而辩护。《旁观者》的编辑在危机时刻通常是可以信赖的，他怀着似乎

想攻击一些编辑们那种奇怪的失常情绪，认为麦克纳应当成为首相。在那些岁月里，麦克纳怎样继续扶摇直上，那是极不寻常的事啊。先是博纳·劳，然后是鲍德温把财政大臣的职位给了他；接着圣洛·斯特雷奇先生——在《旁观者》的专栏中——选他当首相。由于他连议会议员也不是，并且他拒绝为自己谋求一个比伦敦商业区更为冒险或艰巨的席位（而任期内的议员又顽固地不想放弃），因此一切就都吹了。

鲍德温在这样的困境中不慌不忙，令人赞叹。因为他以有效地保护工业才能解决失业问题为理由而要求解散议会，假若他以排除工党为唯一理由而组成一个自由贸易政府，那他确实是既愚蠢又无耻了。一年以后，他确实把“保护”这个坚实的词儿冲淡成了一个模糊的词儿“维护”，于是他部分地陷入这个圈套之中了。同时，正象可以预料的那样，阿斯奎斯仍然很镇定，很坚决；他毫无幻想。假若保守党首相愿意与议会对抗，假若他在投不信任票中被击败了——而这在他的选举赌博失败之后似乎是正常的——那么摆在国王面前唯一的立宪程序就是派人召唤第二大党的领袖，那就是说，召唤拉姆齐·麦克唐纳。事实上，这就是真正发生的事。鲍德温当然决定不辞职，而是要与议会对抗。他被自由党和社会党人共同提出的一项动议所击败了。不知他是否预测过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反正对他不会有多少好处。工党竟然在历史上第一次组成政府，由此所引起的激动甚至惊慌，分散了对鲍德温错误估计竞选的注意力。此外，尽管阿斯奎斯的行动是爱国的和符合宪法的，但他的所作所为对于自由党的未来是生死攸关的。奥斯汀·张伯伦十分敏锐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在1924年1月21日的辩论中，他对自由党领袖使用了这样一些言词：

他作出了他的抉择，并且他用那个选择替自己树碑立传。他将作为自由党政府最后一位首相载入史册。他为自由党唱了挽歌。下一次当 149

国家被请求作出决定时，若是它想要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它就将选举一位社会党人；若它不想要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它就将选举一位保守党人。

这对自由党人来说，也许是难以忍受的。但这个预言证明是真实的，张伯伦所预言的事情持续了四十多年。

但自由党的投票除了播下了自由党本身崩溃的种子之外，还起了更多的作用。它有助于保守党重新团结。联合政府的大臣们——鲍尔弗、奥斯汀·张伯伦、伯肯黑德、沃辛顿—埃文斯——刚好在选举之前同鲍德温进行了相当含糊的谈判，由于事态的发展，他们同他们的老上级劳合·乔治分离了，并同保守党的主力和解。丘吉尔为此区区小事感到有些烦恼，那倒是真的。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丘吉尔以一个“立宪主义者”的身份在补选中参加竞选，得到了保守党人大量的支持，他的对手是一个正式的保守党人。丘吉尔只是被少数的几张选票所击败。在那之后，过渡变得容易了，并且一般说是受欢迎的。在1924年的大选中，他被通过作为一个“立宪主义者”埃平区候选人，由于享有保守党的充分支持，他获得压倒的多数而当选了。人生变迁，又回到原位。二十年以前的变节者就象“回头的浪子”那样，受到了欢迎。当1924年大选以后，鲍德温任命他为财政大臣的时候，这只“肥壮的小牛”证明了它的实际力量和技能，确实是令人惊异的。

我自然地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1923—1924年期间议会的发展。我又回到了实业界。但是不需很长的时间，一场新的危机即将闯入我的生活，这在不久便成为很可能的事了。如果议会持续四年或更长的时间的话，我的决定就可能推迟了。但是我开始意识到我应当比那更早些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我的伙伴们。一句话，我马上就应当回到斯托克顿去重新战斗，胜利就在眼前。

原因是，几个月过去了，社会主义政府的地位逐渐软弱。在外

交事务方面，首相兼任外交大臣，他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 150
国外他受人尊敬，在那些外交部长们看来，他不象寇松勋爵那样自
负，这是一种令人喜悦的变化。然而，到头来，他的敏感成了他的
祸根。

许多人设想过阿斯奎斯在 1924 年 1 月曾有过这种念头，就是
说如果他使保守党落选从而使工党执政，如果这样一个政府后来
在下院失败的话，那么一个议会尚未完全失去效用的这种旧学说，
便要得势了。在这个时候，国王便可召唤阿斯奎斯，从而组成一个
政府，保守党不管愿意不愿意，将被迫支持这个政府。这将不是协
议或交易的结果，而是情况所决定的。当时有许多人想象这是阿
斯奎斯的计划；但在公布的或未公布的文件，很难找到这种设想的
任何根据。阿斯奎斯在 1 月做了他认为他分内的事。看来可能
由于他是一个十分光明正大的人，他完全根据宪法惯例和国家利
益办事。如果什么时候有个工党政府的话，那时正是能在比较安
全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的时刻。如果麦克唐纳和他的朋友们作为回
报而有什么响应的話，阿斯奎斯肯定就会维持第一个社会主义政
府掌权几年。正相反，他们以粗野、轻蔑的态度对待自由党人。按
照当时的说法，自由党人被看作是“有耐性的公牛”，因而他们感到
厌烦。因此，当首相在坎贝尔案件和俄国条约这两个问题上都表
现得支吾其词，使自由党人厌恶到了无可忍耐的程度时，阿斯奎斯
便不得不做出反应。

但是对于议会命运中的所有这些迂回曲折，我仅仅是一个远
距离的旁观者。我从亲友中，特别是从我的姻兄哈廷顿和詹姆斯·
斯图尔特那里，听到许多那样的事情。他们俩在 1923 年的选举中
比我幸运。随着夏季的进展，我的希望与焦虑开始增长。最后，当
麦克唐纳拒绝了阿斯奎斯关于成立一个坎贝尔案件的小型特别委
员会的建议，并且在下院中他被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于 10 月 8 日

联合击败时，我认识到决定性的时刻很明显已经到来了。第二天
151 麦克唐纳晋见国王，要求解散议会。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国王很不
愿意批准这一请求——三年内举行三次大选似乎是强加给国家的一
副重担，使得商业完全混乱，对于就业也有不利影响。政治方面
的困难将一定得到解决也没有任何把握。某些权威人士从那时便
批评国王的这一行动。阿斯奎斯仅在几个月以前就曾公开说过，
国王没有义务批准解散首相不能正常控制多数的议会。在国王乔
治五世的传记中，哈罗德·尼科尔森告诉我们——那时我们所不
知道的——如果国王没有分别征询保守党和自由党的领袖们是否
他们能够或愿意组织政府，他就不接受首相的意见了。^①

这样，在我做为一个候选人第一次冒险之后不到一年，我发现
自己正在开始第二次冒险。这一次，从纯选举观点来看，形势大有
好转。麦克唐纳的软弱和摇摆不定使普通老百姓很恼火。在那些
持温和观点的人们看来，他受极左派的影响太过分了。关于俄国
条约，起初谈判破裂了，后来很明显在左翼压力之下又重新开始，
还有，由于类似的原因，首相起初拒绝给俄国一笔贷款，但后来他
同意了，这只是国际政治战场上的插曲而已。关于坎贝尔案件，总
检察长起初对一名共产主义鼓动者提出公诉，后来撤销了，显而易
见是应首相的请求——又是处于左翼的压力之下——这是一件次
要的事情，然而同样是意味深长的。对于敌对方面——无论如何
用国内政治的话来说——政府没有多少表示。

1923年我被一位自由党人击败；但是在斯托克顿我最危险的
对手那时似乎是工党候选人，而不是自由党候选人。甚至可能某
些保守党人为了排斥社会主义者在最后时刻投了自由党的票。因
此反对自由党人的口号很容易被接受，也很有效果。“你们把他们
弄进来了，我们现在要把你们搞出去！”在竞选运动接近尾声时，我

^① 哈罗德·尼科尔森：《乔治五世：生平及其统治》，第400页。

们在季诺维也夫信件(或者被人们称为“红色信件”)这一奇怪的事件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给英国共产党的一封密信的本文落到了外交部手里。这是通常的煽动性和颠覆性的材料。恐怕最为危险的是提到要在战斗部队中创建革命基层组织的那些段落。鉴于新近英国和俄国政府之间的友好谈判,似乎需要提出一份抗议照会。外交部建议麦克唐纳同意公布信的原文,尤其是因为据说《每日邮报》搞到了一份复制品,毫无疑问将在选举结束之前公布出来。但是可怜的麦克唐纳这回又不走运。信是真是假,我们也许永远无从知晓。至少他似乎是视以为真的,并在选举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对那封信进行了一些笨拙的辩解。除了别的笨拙、糊涂的例子之外,结尾时又加上了“红色信件”,它作为最后一项证明,说麦克唐纳及其朋友们不适于治理国家。的确没有一个保守党的候选人能要求更多的东西了。^①

然而竞选运动中有一种局势使我感到苦恼。鲍德温在一年前曾怀着深切的诚意坚决声明,直到他从博纳·劳反对英国工业保护贸易制度的誓言中解脱出来之前,他无法对付失业问题,一年之后,他却象他的前任一样,开始给自己戴上了同样或类似的枷锁。利奥·艾默里在他的回忆录中解释过,由于采用了那些在选举声明中司空见惯的、模棱两可的话,选举演说的第一次草稿是怎样使鲍德温处于一种完全自由的地位的。无论如何,在最后一个阶段,当艾默里那只指挥一切的、坚韧不拔的手暂时离开他的时候,便导致鲍德温发表了一个声明,而这个声明只能解释为一种不采取普遍的关税制度的诺言。确实“维护”工业这个概念被提到了应有的地位。但这将是一种个别的而不是一种普遍的途径。每种工业将

^① 季诺维也夫信件的真实性的真实性引起很大的争辩。据斯特朗勋爵说(《国内与国外》,伦敦,1956年,第56页),外交部常务次官艾尔·克劳爵士“本人相信那封信是真的”,并且是这样向麦克唐纳进谏的。大选之后的一次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必须显示出来因“不公平的竞争”而受到损害。尽管在选举时，我们中间那些象我一样相信保护贸易制度的人，企图把“维护”描绘得就象一朵玫瑰花似的——在它的新名字的遮掩下，闻起来好象很香——然而，我承认我有点动摇了。我记得我曾向当地各方面的名人征询过意见，我是否可以象上次一样，对于外国进口发表同样动人的演说。由于我征询意见的那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好象还记得我说过什么话，而所有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些是竞选运动中无关紧要的细节的插曲，因此我便紧紧将论点集中于保护钢铁工业方面。这至少给竞选运动带来了某种变化，它主要是集中攻击工党政府无能，并攻击自由党人使工党执了政。

老年人最悲伤的事情之一就是重读竞选演说。但是检查一下我自己在这两次选举当中的演说，由于恰当地提出了关税问题，我感到体面。在1923年的选举演说中，我曾说过，我要“维护、防卫、保护”，并且要利用新的税则做为“一个谈判的武器”。在1924年，我说过，凡是那些能证明并不是由于本身的过失而是在不公平的竞争中受到损害的工业，我都赞成给予“维护”。我主张这个方案当然包括我们的地方工业。这样我似乎很好地坚持了党的路线，尽管在内心里我为改变重点和削弱保护贸易的主旨而感到遗憾。

竞选运动确实是活跃的。许多集会吵吵闹闹，可是实际上被解散的却为数很少。一天一天过去了，越来越明显竞争将在保守党候选人和自由党候选人之间进行。许多温和的自由党选举人和那些在前次选举中认为自由党最有可能击败社会党人而支持了自由党的保守党人，都明显地倒向了我們这一边。我又一次被说服了去拜访某些自由党的显要人物——各种类型的印刷工人工会和戒酒协会的普遍受到尊敬的成员们——若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154 便能控制他们圈圈里的为数可观的追随者。但和以前一样，主要的工作还是逐街逐户，踏踏实实的奔走游说。我开始懂得个人

接触象公众集会一样重要，并且更有可能赢得选票。我妻子已成了这种艺术的一个很熟练的表演者。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我们的最后手段——一幅最动人的家庭图画——通过有点令人作呕的标题例如“投爹爹的票！”来传布。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对于这些传统的、我希望有效的办法难以坚信了。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多次访问斯托克顿，男女两方的组织都大大地加强了。在每个选区，我们都有一个得力的工作委员会。在十二个月当中，我出席了許多吸烟自由音乐会去激励男子们，而我的妻子也出席了同样多的茶话会去鼓舞妇女们。有些议会议员不喜欢这种拉选票的方法，并认为这颇有失身价。鲍德温生性敏感。他也持有这样的看法，并曾就这个话题表白过自己。^①至于我呢？却极其欣赏这种方法。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并且可以使我同大量的人接触，那些人平素我是遇不到的，而对于他们的困难和抱负我是很想知道的。城市的情况依然很糟，失业率非常高，并且注定还要升高。但是周围的气氛中有一种希望的感觉鼓舞着我和所有为我工作的人们。我年轻、热心，我的热情或许可以感染我所遇到的人们，而他们的选票正是我所寻求的。

这是一场十分令人振奋的竞选运动，结果在投票前夕各条街上支持我的人们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无论如何，这足以表明我们并没有被反对派所吓倒。我很抱歉，我带领队伍行进虽然给了这次示威相当大的鼓舞，但发生了不少轻微的冲突——幸亏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永远不会忘记公布那次投票结果的情景。镇公所书记长象前一年一样严厉，不准在会议室里发表任何意见。甚至当这个地区负责选举的官员向在大厅里的人们透露选举结果之后，他仍然不准吭一声。但当我们走出，来到那古老的巴勒大厅外 155
面临时搭起的平台上面时，那场面真是十分动人。由于我和我的

^① G. M. 扬：《斯坦利·鲍德温》，（伦敦，1952年），第24页。

妻子首先走出来，因而在数字公布之前，人们便知道结果了。宽阔的大街——北方城市的特征——看去挤得满满的。那天夜里居民好象全都上街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些仰望的面孔。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从千万个喉咙中发出的欢呼胜利的吼声。反对派的愤怒或憎恶的喊叫声并不能使这个场面稍有减色。我们无法从潮水般的涌来的人群中走开。警察要我们从大厅后面经由一条与大街平行的街道离去。我拒绝那样做。最后，作为一种折衷办法，我同意从大厅前面出去，警察在那里维持了一条通道。我同妻子上了一辆车的顶层，那辆电车不知怎么地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了。经过好一阵子耽搁，我们这才洋洋得意地乘车离去。

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很难有任何其他事情比第一次选举胜利更为激动了。对支持者的感谢心情，赢得所有人——赞成者和反对者——的信任的决心，实现了一个长时期抱负的那种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是生活中惊人的时刻。另外，对于那些遭到贫穷和失业如此严重打击的大众如此急于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我怀着一种责任感。

全国数字检查以后，发现保守党的多数票无论如何如何在工业地区并没有给工党的选票造成重大的损失。的确，在斯托克顿社会党人得到的选票是一万一千九百四十八张，一年前则是一万零六百一十九张。我的选票从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一张上升到一万五千一百六十三张。自由党从一万一千七百三十四张下降到八千七百五十一张。因此冷静地回顾一下，很明显，我们的竞选手腕、候选人的吸引力或者他妻子的妩媚——或者任何无聊的办法——都不是我们成功的原因。正如奥斯汀·张伯伦预言的那样，第一个社会党人政府的失败和混乱对于工党的选票影响不大，但对于自由党却是致命的打击。从全国总的来看，有四百一十九名保守党人
156 选入议会，工党有一百五十一名，而自由党仅有四十名。阿斯奎斯

再次失去席位，并且永远没有再进下院。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两党制从此占了统治地位，总的说来这样一直保持到今天。

议会于1924年12月2日召开。即使时间相距如此之远，我还能够回想起来，我怀着欣喜若狂的心情走进我的席位，加入到我的议员同僚们的行列。在这座会议厅中，过去我经常在旁听席上倾听辩论，现在我作为一名议员也有一个席位了。在这里，我至少可以在一届议会期间观察那些我非常熟悉其姓氏和声誉的大人物，注视重大问题的发展，倾听迷人的辩论，开始在这些高级事务中稍显身手，并且观看在我眼前展开的伟大的政治戏剧——不再作为一个观众，而是一个不重要的参加者了。

对于一位年轻的议员来说，第一次来到下院，恰如上学一般，场所的气氛很相似。有六年级的优秀生，他们坐在前排凳子上，他们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臣和反对党的领袖。即使在削弱了的自由党席位里，也坐着战争英雄劳合·乔治和塞缪尔、西蒙、艾尔弗雷德·蒙德以及其他前任大臣们那样的著名人物。在反对党那边，有以麦克唐纳为首的上届内阁，两边坐着斯诺登和阿瑟·亨德森。在我这边，有鲍德温、丘吉尔和两位张伯伦。所有这些前排人物组成了一个级长会，在校长或议长总的指引下掌管学校。地位较低的大臣们犹如学校中的中级生或那些刚刚在运动或工作上获得某种荣誉的学生，他们对旧生屈从奉承，对新生不摆架子。我们这群普通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谦恭和抱负，有时厚着脸皮，就象学校里低年级的孩子似的，他们为自己眼下的屈辱难过，希望在适当时机达到象六年级学生那样炫丽和显赫。自然，在1924年那届议会开始时，我并不知道要等上大约十六年我才能离开后排席位，在一个部里担任一个次要的职务。那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但我必须公平，没有得到提升是我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也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推行自己的计划和目的决心不足的结果。这种长期地、有时使 157

人感到灰心地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以外，结果证明并不是一种坏的训练。眼下我感到我是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议会的一个成员而被弄得神魂颠倒。我要等待，我要观察，我要学习。

确实有许多事情要学习。对于一个新来的人，下院最混乱的事情之一就是它那复杂的程序。除了围绕议会开幕式的那些传统的正式手续、召集下院议员到上院去、宣读国王的演辞、选举议长等等以外，那每天处理事务的方法，需要终生研究才能完全掌握。我必须承认，经过四十年的时间，我竟然发现，对处理事务的某些细节即使来一次初级考试，我也很难及格。那倒也是真的，非内阁成员的下院议员可以依靠“文案”极其同情的帮助，也就是说依靠那些在议会供职的秘书们。他们总是随时建议以何种形式提出问题以求与程序规则相符合，与处于委员会阶段的议案修正草案一致，或在议会发言，或是在常设委员会里提出。所有这一切的形式都受传统规则的制约，这些传统的规则是多年经验的产物。它们部分来自成文的议事规则，部分来自判例法——亦即许多世代许多议长所作出的判决——还有部分是来自公认权威厄斯金·梅，这几乎成了下院的“圣经”。某些新议员和许多局外人士都倾向于把所有这些精心制作的程序看作是没有必要的和陈腐的。的确，攻击它是很容易的。但是，这些批评可能不是出于无知和缺少经验，而是出自阴险的动机。各反对党的权利以及对于少数派的保护，这都是任何形式的民主政府所不可缺少的。这些都受到我们传统议会方式的保护。用翁斯洛议长的话来说，“即使‘装腔作势’也可能是对抗暴政的最后一道障壁”。确实，大臣们有时对强行制造的耽误很不耐烦。然而，我发现，同样还是这些人，当他们离任以后，却对那个准备好的防卫的方法感到高兴。况且，在我的政治生活的末期，对于那些看来没有任何效力的程序规则而进行的集会已经有了经验，对照之下，我为之震惊。例如，在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里,由于缺少任何有效的制度,经常导致危险的混乱。在安理会不分白天黑夜长时间的开会期间,提出各种决议案,但决议案的条款从未及时地“写在议事规程书”上,以供关系最直接的政府适当的加以考虑,情况经常是这样。大国的首都与它们在纽约的代表之间的文电来往十分频繁。手抄的修正案有时不预先通知便提了出来。时间因素的差别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这一点似乎无人记起。我曾了解到在清晨两三点钟(那时在纽约是午后九点钟或十点钟)便有电话打给外交大臣或首相,向他们请示,英国代表对于一项动议将怎么投票,关于这项动议的原件谁也没有看过,而又正在提出对这项动议的修正案。然而,有关政策的重大事件可能处于重要关头;而英国政府可能正在为那些它还没有适当时间加以考虑的重要决定承担责任。只有当你看到由于程序松弛而引起某些麻烦时,你才能懂得我们议会惯例的价值,这种议会惯例虽然显而易见有点繁琐,然而经过最近一百年来的修改,它目前的形式无论对于阻碍议事进程,还是对于保证合法的批评与讨论,都是卓有成效的。

在 1924 年,议会在午后 2 点 45 分开会,在正常的情况下于晚间 11 点休会。现在普遍提前开会,并缩短开会的时间(午后 2 点 30 分到 10 点),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形成的,后来一直坚持下来了。在我第一次选进议会时,由于那时我完全从事商业,除了某些特殊的原因以外,我到下午 4 点至 5 点钟才能赶到议会。因此,我常常误了“质询时间”,只有在我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己的问题时,我才在“质询时间”到场。这种情况不多。对于一个新议员来说,误了质询是不幸的,因为利用这种时机你能最容易地记住你的议员同僚们的名字。无论如何,通过各种途径,主要是认真参加 159
辩论,对于双方大部分人士的姓名和外貌我都熟识了。我也试图研究议会辩论的技术,这只能在议会本身辩论发言中学到。由于

听从了我的一些比较老的朋友的劝告，我在下院当了大约五个月议员了，而我还没有想要发表初次演说。

近几年来，除了重大时刻之外，议院不那么人坐得满满的了，出席辩论的情况也不怎么好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议员们下午和晚间在议院外面召集大量的会议所造成的。在保守党这边，这种惯例是在1923—1924年的议会开始的。鲍德温在1923年秋天遭到失败之后，党处于神经相当不安的状态。艾尔斯—蒙塞尔（主任督导员）在与他的一位前任克劳福德勋爵会商之后，决定建立一个组织，通过那一组织可以在党的领袖们与非内阁成员的议员之间保持较好的联系。显而易见那些非内阁成员的议员们曾抱怨领袖们不接触一般成员。这些委员会首先分别以不同的名称建立，如财政、国防、内务、海外事务，等等。主任督导员把这些委员会限定在一个相当小的数目。在1924年保守党胜利之后，局势不同了。党得胜了，由于它获得了一个如此巨大的多数，以至艾尔斯—蒙塞尔决定发展这种组织，成立一大批委员会，几乎每个部都有。他这样做的目的的一方面是想叫大臣们与党保持联系，但主要是要使议员们处于一种协调一致互不伤害的状态。但是参加这些委员会对于下院产生了不良的效果。这可能符合了督导员们的心意，但却损害了议会制度。

1922年委员会^①一如既往在继续着，并且还要继续下去。党在执政时，除被邀请外，大臣们是不参加这种委员会的。党在野时，卸任的大臣们可以参加。这种委员会是全党的，在困难时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在威斯敏斯特参加会议绝不是一个议员的全部工作。我还没有完全认识地方事务这副重担。在一个大的工业选区特别是

^① 这个委员会任何保守党议员都可以参加，它是从联合政府时期成立的。它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名称。

这样，那里经受着四年战争和几年失业与贫困所造成的一切特殊问题的痛苦。我把所有这些来往信件都保存了起来，已汇成大批卷宗。今天即使粗略地看一下那些信件，也会使人回忆起许多个人的艰难困苦与悲剧事件。唉！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很难给以实际的援助。然而同情似乎也总是受欢迎的，有时人们能够给以有益的劝告。那时我们称他们为“患者”，大体可分三类。战争抚恤金的安排总的说来是令人满意的，但是这些安排是按照许多复杂的规定来进行的，这些规定的应用有时导致真正的困难。在这点上，经常招致议员与大臣之间持续不断地进行通信联系。有时，为了使事件尖锐化，一次议会质询（文职人员对此是非常讨厌的）的威胁是个有用的手段。经常引起争辩的一个问题是辩论一个人目前的健康状况是全部由战争服役造成的呢，还是部分地由于入伍前的身体条件造成的。这似乎常常是颇为难以区别的。例如，如何弄清楚一个人是毒气攻击的受害者呢，还是他在童年时肺部就有毛病呢？一套先例和解释以及衡量尺度的放宽，渐渐地使得这个制度越来越符合一个合理的法规了。然而，频繁的体格检查和上诉评议会这种制度虽然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实行起来却常常很麻烦。我不久就发现，无论如何，对于一个议员来说，亲自努力去区分“假冒者”和真正的病号，那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这样作了，而且抚恤大臣开始对于他的实例产生信任，那么结果就很可能证明是令人满意的。

第二类个人问题，是失业问题，那时整个东北海岸失业数字都很高。在1924—1929年间，达勒姆和诺森伯兰两地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之间。情况分为两类。有些人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地每周来办公室一次，希望我可以对这个或那个雇主施加某种影响，帮助他们找点活干。不幸，在这期间，许多工业即使没有全部关闭，也在收缩。造船工业受到的压力尤为严重。161

我们那一带唯一给人一种新的生命与希望之感的工业就是布伦纳·蒙德商行,不久就以帝国化学工业公司闻名,同时这家先进公司野心勃勃的计划在比林厄姆发展起来了。结果变成了一家巨大的工业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直接就业机会和更多的间接就业机会。当然,在建设期间,许多涉及到的工作仅仅适合于我们一小部分失业工程师和造船工人。城市甚至需要临时招收不熟练工人,这是我在1929年吃了苦头后才弄明白的(因为正是这些投票人要对我的失败负主要责任)。

第三类情况是涉及有关领取失业救济金规章的。这一整个问题多年来在我们的议会讨论中占着主要地位,而且出乎意料之外地导致了工党政府最后垮台,它是1929年开始执政的,1931年下台。凡是一项重大的社会立法,无论多么进步,要想通过都会有许多困难。现在很难体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除了对工会或互助会的基金享有权利外,对一个失业工人来说,花完积蓄以后,那就只有依靠济贫法,其他什么也没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劳合·乔治政府采用了全国失业救济制度,尽管受到各种规定和条件的限制,无疑在大萧条到来时,把我们从有点象是革命当中拯救出来。

根据第一个失业保险计划,每周付给失业人员的款额与一项保险原则有明确的关系。这样一种体制,不管它多么适合于一般失业人数较少而又平衡地分布在全国的时期,但在失业人数很多,而在不久被称作“灾难地区”出现明显高峰的时期,则是完全行不通的。这时,需要采用某种形式的额外救济金,这种救济金的数目并不完全根据一个工人提供的和他的雇主为他所提供的捐款的多少来确定。这种“扩大的”、“非契约保证的”或“过渡性的”救济金,人们都用“施舍”这个侮辱性的名字称呼它,它本身就受到限制。当这些权利利用尽之后,那就只有求助于济贫法了——条件历

来较好的骄傲的家庭是厌恶济贫法的，而且因为靠地方税筹措资金，所以在—一个由于贫困范围广、负担已经过重的区域，济贫法造成的麻烦就越来越多了。

我的一大部分工作是努力处理许多两可之间难以确定的问题，并且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而呼吁特别处理。较为一般的问题也注定要占去我许多议会活动时间。对白厅以及纠缠着人类问题的英格兰南部缺乏了解；根据实际上是迷惑人的失业保险的数学概念而进行的法律上的和学究式的辩论；与其说是对人的还不如说是对保险统计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是使我头脑清醒的最初原因。我发现通信联系和个人接触很有意思，然而令人感到灰心丧气。战争年代的部队生活使我对普通士兵初步有所观察和接触。1924到1929年这几年我与工业城市中典型的工人阶级的男女有了同样的接触。当然，必须记住，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困难的情况。那些顺利地领到战争抚恤金的人，或者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人是不来我的办公室访问的。可是，唉，事态表明，痛苦与困难并不限于那些由于自己的错误或因某些生来的性格缺点而陷入灾难中去的人。这些灾难打击了我国许多最优秀的工人，他们具有悠久传统的技艺和技巧，并对他们长期受雇的公司忠心耿耿，这些人一想到接受施舍便感到憎恶。

在后来的几年，我曾找过那些反对充分就业原则的经济学家和报纸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党对于这项原则都很重视。尽管我承认“过多就业”的各种危险，我很少与那些住在舒适的郊外休养所中或坐在舒服的编辑者的椅子上写文章的人抱有同感，他们对战前状况的惩戒价值详加论述。命运注定我与大量失业这个问题朝夕相处一十五载。在工业领域以及在经济领域，这个问题都没有因为任何有意识的努力而基本上有所缓和。在希特勒的压力下以及最终在战争的情况下进行重新武装，才给失业

问题带来了令人可怕的解决方法。

163 除了同那些来我们办公室访问以及写信给我们的男女个人打交道外,当然,一个议员的正常义务是维护他的选民的利益,在地方上的重要场合露面。这首先使我接触到所有工业界的头面人物,使我们得以一起努力设法用各种手段帮助本地区。当然这就导致保护贸易制度和“维护工业”的辩论,这种辩论占去本届议会大量时间;此外还辩论出口信贷问题、合理化问题等等。议员的工作也包括参加流行的节日娱乐活动,从一场足球比赛到市长宴会。

另外,我们保守党组织通过所有通常的方式去做大量工作。我的妻子精力充沛、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所有这些活动之中。结果弄得生活相当紧张。在正常情况下,每个月我们总要去北方两三次——有时候还要多一些。星期四或星期五从金斯克罗斯乘下午1点20分的火车,然后在星期六或星期天坐夜车返回。凌晨时,达林顿车站是那样寒风刺骨,没有任何车站可以与之相比。可是,站长对我们十分体贴,把我们领到他那烧着炉火的、舒适的房间里。

把一位议员变成管理地方福利那样的官员,确实有许多不利之处。这样就侵占了他很多时间,搞得他精疲力竭,再加上下院会议每次必到,所以他就很少有什么机会认真地思考问题了。有时,人们羡慕十九世纪的议员,他们只是考虑每年需要访问选民一次或两次。关于这点,有一篇竞选演说很有代表性,据说我妻子家族的一位成员在接连几次选举中所发表的演说中都少不了如下的话:

选民们都很了解我的观点,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重复了。

甚至连迪斯雷利也满足于自己在埃尔兹伯里偶然举行的一次农场主们的宴会上发表的讲话。

这个逐渐形成的制度的另一个不利之处是对朝野两党前座议

员们都有压力。这导致一些大臣们或前任大臣们不可避免地不知不觉流入了他们党的那些稳可当选的选区。然而正是那些没有把握的选区最有意思。我们只是对于那些热烈支持我们的人们的见解和论点非常了解。经常与我们的批评者和对手保持接触是有价值的、正确的。虽有种种不利，回顾我与斯托克顿和东北海岸二十余年的联系，我缅怀感激之情。在那里，我吸取了一些终生难忘的教训。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它们可能给我留下了一个最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受益多于损失。

1924—1929年议会是由很少几位领导人物统治着的，他们当中最使象我自己这样一个新议员激动的是劳合·乔治。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是1913年在牛津大学俱乐部，当时他是接受校长吉尔伯特·塔尔博特的邀请而来的。他的访问在大学里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轰动。劳合·乔治那时作为一位激进的、几乎是革命的政治家，是一位引起激烈争论的人物。敌对党派一方面认为他是可恨的，另一方面又热爱他。当局非常担心，唯恐一场大学生的责骂可能发展成为有点象是骚乱的情况。警察全力出动。虽然劳合·乔治的演讲内容我现在已经忘了，但我还记得，他显示出来的非凡的口才把辩论大厅里挤得满满的人们都吸引住了。所有的人都着迷了，欣喜异常，深受感动，原先那些为嘲笑和起哄而来的人也是这样。次日早晨，吉尔伯特请我吃早饭，以便见见这位伟人；的确这是我仅有的一次同他晤谈的机会。

那些了解劳合·乔治青年时代和他当权的鼎盛时期的人对他已经有过许多描述，我对他只能略加说明。我只记得在长期衰落——一个悲惨时期——中他忍受着各种挫折，而情绪却一直很好。在以后的年代里，正如我将描述的那样，我和他有一些相当密切的联系，但在这届议会期间，我只能从远处留心观察他。

他的权力达到顶峰以后才过去了两三年，这届议会中没有人

相信他将永不重新上台。他仍然是伟大的战争英雄。当他起立发言时，议会里挤满了人，议员们匆忙地从吸烟室、饮茶室、餐厅、会议室、图书馆跑进来。对于我们青年议员来说，从来没有或者很少听过他讲话，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体验。既然他不再是一个前座议员，所以他何时发言便不能事先得知了。因此，在他发表宏论之前议会总是坐得满满的。经过一两次这样的场合之后，我注意到他采取的方法是经过巧妙选择的，以应付形势。他开始时总是态度平静，声音很低，轻描淡写地提一下前面的发言者，并奉送他们一两句赞美或批评之词。他宁愿激励议员们高喊“大声点！”然后，当听众聚精会神的时候，他便开始口若悬河，雄辩滔滔，细致刻划，精修言词。即使他未能使下院（他和他的党在其中形成了如此之小的少数）心悦诚服，而他却能够使我们所有的人都为之着迷。他现在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奇妙的脑袋，浓密的白发（在战时几年中，从墨黑变成雪白）；他的相貌颇富表现力，瞬息间从愤怒转变为迷人的微笑，不只嘴在笑，面颊和眼睛也在笑；尤其是他那双优美的手，真是一双演员或艺术家的手，稍微那么一比划，他想描绘的那幅画面便呈现在你的面前了。

1928年2月对讨论“黄皮书”的发言进行辩论时，自由党人占用了一天的时间。“黄皮书”就是那本著名的关于失业和重建的宣传小册子，是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之下由许多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编辑的。我觉得自己对绝大多数的建议抱有同感——或者说至少对于类似的总的路线抱有同感。这些想法中有些正是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企图以外行的但是诚恳的方式提出的。在辩论时我发了言，但是我没有象社会党人那样攻击这些富于想象力的计划，反而欢迎这些计划。然而，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行动，因为我知道，我们正在发挥的那些见解在我们自己党内决不是受欢迎的。因此，我想用某种带有偏袒的逗趣抚慰我的支持者。我表示我对于“黄皮

书”“抛弃科布登主义信条的那种比较用心险恶的粗糙的东西”感到高兴，并且对进步的保守主义从自由党正在变的稀稀拉拉的队伍中赢得新成员表示欢迎。所有这些糟糕的做法，今天我都以此 166 为耻。我附带说一下，准备这一论文的大笔费用是由著名的劳合·乔治基金支付的，这似乎对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人们想知道那些为这项基金捐款的贵族们对于他们慷慨大方的这个结果会做何感想？这是属于低级趣味的，尽管我的议员同僚们十分欢迎；劳合·乔治在答辩时十分正确地把这些意见斥之为“低级的嘲弄”。碰巧，后来不久，劳合·乔治同意前来参加我的一个朋友举行的一次小聚会，那是我自从牛津俱乐部见面以来第一次遇到他。我感到忧虑不安，唯恐他会记起并且怨恨我那么无礼地向一位那么伟大的人物掷以短小的标枪。他并未忘记，但他一点也不怨恨。他脸上现出最迷人的、使人宽慰的微笑，说道：“那天我很清楚你在搞些什么。这是一个惯用手法，我使用过许多次了。但是你是个天生的反叛者啊！”这样一来，我原先预期有些令人担心的那个夜晚，结果是既使人感到高兴，又令人难忘。

劳合·乔治具有一种伟大人物往往都不具备的品质。他善于听取别人发言。他喜欢诱导别人讲话，尤其喜欢逗引青年人讲话。那天夜晚他使我们那一小组人都感到，他以为我们有重要的东西抛出而使他热心听取。某些伟大人物就象山毛榉树一样，在它下面什么也不生长。劳合·乔治却象一株橡树，在它下面野花和丛林草木自由繁长。这是我同他在这届议会中唯一的一次接触，但我从未忘记他那相貌言谈的魅力。

在许多保守党领袖们中间，除了某些显著的例外情况，在这届和后来几届议会中诋毁劳合·乔治已成为一种风气。这多少是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不管是在内阁中还是在那些非内阁大臣中间，都是 1922 年颠覆联合政府的煽动者。直到他们决定推翻他之前，

他们一直高兴地在他领导之下工作，因此他们感觉对他有必要采取道义上的非难，以此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另外，劳合·乔治在总罢工中的路线，就我们现在所了解，根据当时复杂的情况，似乎是有些根据的，然而它在我们党内，而且的确在全国受到了怨恨。

167 顺便说一句，劳合·乔治的路线导致了与阿斯奎斯的最后决裂。鲍德温对劳合·乔治确实非常厌恶，他运用他那强有力的影响，告诫青年议员们不要被劳合·乔治迷住。虽然战时联合政府的领导人物奥斯汀·张伯伦、伯肯黑德，当然还有丘吉尔，仍然同劳合·乔治保持着个人之间的密切友好关系，但一些小人物喜欢顶撞他，厌恶他。随着议会时间渐渐过去，对于许多议员来说，那种看到劳合·乔治的名字在板上上升而引起的激动开始衰落。对于我呢，魅力与兴趣仍然存在。不论怎样，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中，这位最伟大的民族领袖所建树的丰功伟绩依然在那里：“当撰写二十世纪最初二十五年的英国历史时，人们将会发现，我们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的命运大部分是由这一位人物所决定的。”

劳合·乔治那独特无比的以及有点儿孤独的性格，由于自由党领袖们那小小的班子而显得突出了。阿斯奎斯已到上院去了。其他仅有的重要人物是塞缪尔和西蒙。十分明显，劳合·乔治厌恶塞缪尔，鄙视西蒙。他们对他怀有什么感情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塞缪尔的讲话总还是不错的，但绝不是很好。办起事来，他总是很有效率，但也不是非常漂亮。辩论时，他的论证条理分明，但是调门相当低沉——在他身上有点家庭女教师的味道。约翰·西蒙肯定是由于厌恶劳合·乔治，因而在这届议会期间，他很少注意下院的事情。然而在总罢工期间，他确乎是异军突起了。他在1926年5月6日的发言中，坚持认为总罢工是不合法的，罢工煽动者不能要求1906年“劳资争议条例”的保护，他那个发言对于结束总罢工起了重要作用。他暗示工会基金将不能不受影响；他说每个有

牵连的工会领袖都要“倾其所有负责赔偿损失”。这是不是好的法令，至今仍有争论。但这确实是很好的政治策略。它对职工代表大会的士气，起了明显的破坏作用。

在反对党方面，有两三位较为突出的。首先是麦克唐纳，那时正当壮年时期，或者说至少尚未显示出令人可以感觉到的体力和精神上的衰退现象，这种衰退后来把他压倒了。他善谈外交事务，那时我对于外事是超然的，因此，有几次辩论我未出席。但他很尊严，一般说来具有政治家的风度，尽管他也象每一个处于反对党地位的人那样，能够进行一些相当软弱无力甚至愚蠢的干涉。地位仅次于他的是菲利普·斯诺登，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斯诺登，不是后来举国一致政府的斯诺登。那时他的嘲笑是针对他的敌人的；在不到几年的工夫，他便把矛头转向他的一些老朋友了。最令人激动的辩论表演是斯诺登对丘吉尔；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施展出了绝妙的演技。斯诺登尖酸刻薄、冷酷无情，丘吉尔轻松欢乐、诙谐戏谑。至于其他工党领袖，我对阿瑟·亨德森记忆犹新。他不大参加辩论，但他辩论时语不虚发，而且感情真挚。至今他的形象还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和蔼可亲地站在下院惩罚法庭上，注视着他的群众。他是工党的最高组织者，他的群众对他都很敬仰和信任。人人都知道他这位“阿瑟大叔”。

下院反对党那边的普通议员席聚集着那些著名的克莱德赛德人。为首的同时也是最有势力的是惠特利，他有着极端的、几乎是革命的观点，并有着高超的管理才能。他的夭折是他那个党的一个重大损失。戴维·柯克伍德是一个天生的反抗者，然而岁月和经验已经使他开始成熟了；他感情爆发起来可真了不起，去发动一场猛烈的争论，他通常是可以依靠的。坎贝尔·斯蒂芬是个雄辩家，只要他起立发言，的确几乎就没完没了。开始时人们往往感觉他除了冗词赘话之外，没有什么可讲的；但事实上，虽然他的辩论

冗长啰嗦，但是清楚，并有逻辑性。他是我能够回忆起来的最出色的执拗人物之一——总是刚好“符合规程”。乔迪·布坎南是位和平主义者，也是一位反叛者，看上去象是一个愉快的学童在外面狂欢大闹。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尽管我们害怕他那张嘴。当他后来离开政界去主持救济会时，那项任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是，相貌堂堂、出群超众的人物自然要数詹姆斯·马克斯通了。对他曾经有过许多描述，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这位人物的奇怪难以捉摸的外表完全刻画出来。他那长长的黑发、凹陷的双颊、深嵌的两眼，加在一起使他看上去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他好象是直接
169 1789年跨步出来的。听他痛斥贵族——或他们的后继者资产阶级——人们感到他会高兴地宣布将我们吊死在路灯杆上，或者送上断头台去。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有一种幽默感，那是先天带来的呢，还是后天在下院里发展而成的，我不得而知。在我们所有的人狠狠地进行一阵攻击之后，他总是到吸烟室里同我们一起友好地交谈。我还记得他讲过一个以他自己为背景的故事。战时他被捕入狱，有一次当犯人围着院子阴郁地放风时，他设法与一两名同监囚犯交谈，问他们入狱的原因。一个因破门偷盗，一个杀人犯（“用一只瓶子猛击老太婆的脑袋”），另一个因为夜间行窃打人。可是当他们得知马克斯通是因为煽动叛乱而入狱时，便向狱长正式提出抗议，反对让他们同一个卖国贼在一起。在他发言时，议会挤满了人。不管我们尊敬的稳健议员中反对他的大有人在，他们也情不自禁地受到迷惑。他的许多发言我还能够回忆起来，但都显出同样的缺点。在发言的前二十分钟他总是把这个世界的罪恶描述一番——失业、贫困、贫民窟以及资本主义使苏格兰和北方的一半居民处于极坏的状况之下。听着这几段生动的話，你几乎能够看到那些挨饿的儿童、面容憔悴的母亲以及绝望的失了业的父亲。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开场白而已，后半部分

发言犹如漂流到沙漠中的大河似的，永远流不到海里去。他提不出什么实际的建议，他作不出什么有用的贡献。我们被他所提出的问题吸引住了。但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答案。

在那些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工党议员中，我也结交了许多朋友；主要是在饮茶室或吸烟室中，我们一块在那儿闲聊和喝茶。我们最尊敬的是那些稳健的工会领袖们——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有经验的勤勤恳恳的人。

在保守党方面，毫无疑问，下院各个方面的议员们都怀着类似的感情尊敬鲍德温首相。党内年轻而进步的那一派对他特别怀有 170
好感。他的那些发言，尤其是关于工业问题的发言，恰好抓住了特征，我认为那是恰如其分的，有启发性的。右翼，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工业家们”不喜欢他，这个事实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感情。以后，我将试图勾画一幅我所见到过的鲍德温的维妙维肖的画像。在这些早期日子里，我只了解他是率领我们在选举中获得大胜，并且靠着为人正派和公平的名声，得以受到全国男女工人支持的那样一个人。

他的不久以前的政策的某些方面确实使我们困惑不解。他是一位自由贸易主义者呢，还是一位保护贸易主义者呢？例如在1922年、1923年和1924年之间，纲领不断改变可以用政治的迫切需要来加以辩解，但是前后很不一致。另一方面他那关于美国债务的结算方案已为人们所忘却，而博纳·劳的抗议现在看来好象言过其实了。如同后来阿瑟·索尔特指出的那样，结算方案造成的真正危害是，使未来的关于政府间义务的整个范围的谈判会受到妨碍。这个决定既是不成熟的，也是片面的。然而，这是个已经议决的事件。同时，欧洲战争危险将再次出现，那是为时尚远的事。在1924年，似乎威胁着我国的大灾难是阶级战争。鲍德温力图结束这场战争。他好象继承了真正的迪斯雷利传统。他在劳合·乔治

的大联合政府中仅只扮演了一个较小的角色这一事实，反而把人们拉到他这一边。因为那时的情绪——在这届议会初期的确是那样——对于战时飞黄腾达的显赫人物有点厌倦了。如果说博纳·劳鼓吹过“安定”，那么鲍德温提倡的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他几乎连续任议会议员。一些不厚道的人们后来说，这是他唯一能够避免陷入麻烦的办法。但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公平的。他喜欢观察和研究他的议员同事们。他经常来到吸烟室。他很少和任何人说话，这是事实，但他总是友好地和人家点个头。我们感到，他象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孩子父亲那样关心我们。

在前次选举中，所有那些听过鲍德温广播演说的人都深受感
171 动。无线电广播(对于政治家们来说，幸而那折磨人的电视还没有发明)在1924年首次被有效地使用了。麦克唐纳甚至连劳合·乔治都从来没有掌握这种技术。麦克唐纳搞错了，把一部分讲台演讲广播出来，还附带着大会的全部插话与混乱情况，而他那雄辩术的风格——为大量的活跃的听众所欣赏——对人数很少的家庭听众小组来说，是没有效果的。鲍德温采用了一种方法——后来为罗斯福总统所完善——即所谓“炉边谈话”。他讲话简单、明确、适度，好象广播演说要点突出，——的确和电视广播一样——听众限于自己家中的两三个人，他们要谈话，不要演说。

在这届议会中，鲍德温在保守党的领导地位的确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在总罢工时期，他的智慧与同情心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前一年他那关于“国家征集法案”的著名演说那样。当此事近在眼前时，我们这个小集团在诺埃尔·斯克尔顿的领导之下，以代表团的资格去见他，要求他反对那个法案。他和蔼可亲地接见了我们，他好象听从了我们的劝告，这自然使我们感到满足。只是随着议会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当中一些人开始感到有些怀疑，不是对他的心愿，而是对他影响各种事情的能力和决

心。在总罢工之后，他有了一个压倒一切的坚强地位，他本来可以利用这一地位，但他并没有那样做——如同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他的某些同事们，包括内维尔·张伯伦在内，是希望他那样做的。他对劳合·乔治强烈厌恶，使我们感到太过分了。但他总是坚持说，那是基于道德上的理由。他认为联合政府的后期把政界的水搅混了，他下决心要把水弄清。他假装厌恶“知识分子”，那是高等知识人才的一种共同姿态；鲍德温的确更多地是位神经过敏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质朴的乡下佬。因为他是半凯尔特人的血统。他的父亲是伍斯特郡的一位铁器制造商，但他的母亲是苏格兰高地的一位著名传教士的女儿。甚至在那些日子里，他就厌恶那些报业大王，但是我连一个报业大王也不认识，所以这并不使我烦恼。

即使最肤浅的观察家也看得很清楚，鲍德温在一个危急存亡的时刻尽力发挥作用，然后需要休息与恢复。他非常紧张、神经过 172 敏，的确在每个方面是个与党的指导机关替他树立起来的“形象”——用个现代词儿说——相反的人物。人们说利物浦勋爵的政策秘密，就是他根本没有政策。对鲍德温来说，确实也有点是这样。保护政策、“维护”、保卫，尤其是欧洲问题，都没有使他过分地激动。他不是一位很好的行政官员。他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一位永远有影响的人物。他博得了反对党工党的尊敬，甚至友爱，这个事实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于我们领袖的钦佩。也不应当忘记，尽管遭到煤炭争议纠纷的毁坏，这场争议导致了总罢工，在总罢工结束之后，又延续了很长时期，但 1924 年至 1929 年的议会是一届伟大的、积极的议会。它标志着在历次进行的社会和行政的改革中某些最大的进展。关于这些，鲍德温是依靠内维尔·张伯伦和丘吉尔的。他忠诚而慷慨地支持了这两个人。

尽管我只是从后座认识内维尔·张伯伦的，只是和他谈了很

少的话，可是我了解他那推行他的政策的坚强信心和决心。据说1924年他在接任卫生大臣时，列了一张包括二十五项法案的清单，试图在议会可能持续四年或五年的时间内，把这些法案作为法律通过。实际上，他实现了其中的二十一项。他坚定地沿着明确标明的道路前进。首先，他与“寡妇、孤儿、老年抚恤金法案”——现代福利国家的一项基础——联系在一起，也和地方政府的各项重大改革联系在一起。他同情免除压在贫困地区地方税的某些沉重负担的要求，并在1929年地方政府法案中体现的减税建议和限制使用拨款的体制方面，他向着那些现在才被人们接受的概念大踏步前进。

173 对于那些象我一样和他没有个人交情的人来说，他是一位有点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他有一副嘲笑人的，虽不能说是蔑视人的模样；他的声音粗厉、刺耳。由于我已读过一些他的传记，特别是他的日记引语，我认识到在这副严峻的外貌之下，掩盖着一颗温暖的、富于同情和敏感的心。但那时这点对我来说并不明显，或者说除了他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之外，对任何人都不明显。我对于一次真正的善意行动评价很高。1927年春，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出版了一本名为《工业与国家》的小册子。这不是一部装模作样的作品，我认为写作态度还是谦逊的。我的合著人是鲍勃·布思比、奥利弗·斯坦利和约翰·洛德。这本书被视为我们党进步派的一份宣言。除了右翼报刊以外，它得到了其他方面的礼貌的评论，可是在死硬派中间却引起了一阵混乱。我十分出乎意外地接到了内维尔·张伯伦的一封信，日期是1927年4月26日，现将信的第一段引录如下：

复活节休会期间我一直在读《工业与国家》，我乐不自禁地向你和你的助手们祝贺，因为你们的著作富于启发性，也很有趣。我注意到某些评论不太友好，因此，尽管我不宣称对于你们的每个见解我都同意，但我

不得不说，你们的意见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而大部分对于保守党党员将起到或者说应该起到激励的作用。

他又继续送来打字打得很密的三大页书写纸，其中逐条论及我们的建议。这个行动是十分宽厚的，自然我表示了感激。但别有意思是，在议会剩余的日子里，他没有召我前去，也没有和我说过话。正如我将描述的那样，我和他会见过一次，那是我自己要求的，他接见我时颇为冷淡。内维尔·张伯伦在这届议会，象在前几届一样，证明了自己是英国改革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他的某些思想可以追溯到迪斯雷利；另一些可以追溯到他的伟大的父亲约瑟夫·张伯伦那未经审定的方案。其它的一些自然是遵循使得1906年自由党政府如此显著地前进的社会改革工作。他的心全放在这项他完全理解的工作上了。但他的感情不那么易于激动了，相反，他将他的心紧紧地扣在他的正式晨礼服下面，人们觉得他除了渴望提高效率以外，什么也不想了。事实上，对于穷苦人们的深切情感和同情在激励着他。无论是憎恶他的反对党，还是我们党内那些钦佩他的人，都不能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然而他在这届议会中坚持到底。如果说鲍德温本性懒惰，那么内维尔·张伯伦则是最为勤快的人了。以后那几年的动乱永远不允许掩盖掉这个时期的伟大成就。 174

在组成1924年政府时，鲍德温能够建立一个比1922年平衡一些的行政机构。平民增多了，贵族减少了。这意味着丧失掉了几个曾经很支持他的人，例如德文郡公爵、德比勋爵和皮尔勋爵。寇松勋爵离开外交部，荣任枢密院长。这些变动的结果，使旧联合政府的三位重要成员东山再起——奥斯汀·张伯伦成为外交大臣，伯肯黑德当了印度事务大臣，三人当中最惹人注意的是丘吉尔，他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在下院，除了出席外交辩论之外，奥斯汀·张伯伦很少露面。这些年来，我根本没有和他熟

悉，尽管后来当欧洲景象暗淡、险恶时，我与他友好起来。有一种刻薄挖苦的说法，说张伯伦总是正大光明地干，但总是失败了。但这确实是对他的浓厚荣誉感与忠诚的一种赞美。如果他选择了只顾自身利益的道路的话，他不只一次本来是可以得到首相职位的。

既然鲍德温总是建议年轻议员选定一组特殊问题去专心研究，既然我自己选区的情况自然地导致我去研究社会、经济和工业问题，所以我便把外交事务从我的兴趣范围内排除掉了。另一方面，我的两位朋友艾登和达夫·库珀却“专门研究”外交问题，不久就在这一领域建立了很高的声望。这就意味着我无法与奥斯汀·张伯伦接触。然而，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下院人物，我们就是为此而尊敬他的。在许多方面，他回忆起极盛的战前年代。在外表、服装和说话方式方面，他几乎象是一个旧时代的幸存者。他的大礼帽、他的夹鼻眼镜、他的优雅的礼貌和他那洪亮的演讲，使他和他的同事大不相同。顺便说一句，他是我看见的最后一个坐在下院议长席位上以便听取辩论的人。议员席上到处都挤满了人，他找不到一个座位。当议会召开委员会时，既然议长的席位名义上不属议会席位，所以允许——我想今天仍然允许——任何人去占用它。但是除了奥斯汀以外，我从未看见任何人试图占用。我也不认为任何其他能够侥幸占用这个座位。

从曾经在联合政府内供职过的杰出的保守党人那里来的第二个重要的新成员是伯肯黑德。从进入牛津大学以后，我同他有了一点交情。不管什么时候，我偶然遇到了他，他对我总是极其和善。即使许多人表示不赞成他那戏剧性的、有点象火焰般的性格，而人们都不能不称赞他那至高的天赋。我想是奥斯汀·张伯伦评论过他，“他将自己仅有的很少缺点显示出来，但却把自己的许多优点隐藏起来了。”虽然他偶尔来到吸烟室里，但对于我们这些下

院的青年人来说,尽管他是知名人士,然而却是一位相当冷淡的人物。我们仅仅通过传说听到过关于他在内阁中的特殊美德的叙述,关于他的智慧、节制以及他寻求和解方面的叙述。在总罢工期间,他的后一种品德是人所共知的。但当人们告诉我们伯肯黑德在上院很可能要发表一次演说时,我们那时常常排队前去听讲。我能清楚地回忆起他那仍然显得很年轻的体型,稍微有点驼背,他声音流畅,态度安然不看一次稿子,不出一一点错误,为偶然焕发的智慧所启发,将一个复杂的论辩展现在我们面前。可是在这届议会中,他的热情大量消耗,他不久开始衰退。在议会解散后不到一年他就死去。

在旧联合政府三个成员中的第三位对我们来说最富戏剧性,那当然是丘吉尔了——或者叫温斯顿,所有的人,不论敌友,都这样称呼他。后来人们对丘吉尔的非凡生活有所了解,很难回想起1924年他是怎样的一位人物了。他那时五十岁。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他已经创立了卓越的记录。他的生涯丰富多采,使那些怪癖的批评家们为之震惊,他们对于一个人在现代条件下竟能做那么多的事,而又做得那样好,实在难以令人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脱离的那个党很不欢迎他,而他加入的那个党又相当怀疑他。事实是,丘吉尔过去不是,从来也不是一位真正的党人。当必要的时候他总是热情地参与党派斗争。但在这些暂时斗争的背后,他始终看到国家这个形象。他为它的伟大过去感到骄傲,同时他断定它的未来也是同样光荣的。他一回到党的行列,马上就被授予财政大臣这一高级职务,这使得党内一些老的议会议员为之吃惊,甚至有些不安。强烈的保护贸易论者获悉这样一位不退让的自由贸易论者被安置在财政部的内殿里,他们感到沮丧。但是随着议会的进行,任何人都对他所运用的那种智慧、幽默、独创性以及雄辩才能表示钦佩。预算演说是一项艺术性工作。我们当中

从来没有人听到过任何类似的演说——语言那样精炼、论点那样缜密、掩盖弱点那样巧妙。假如象有时发生的那样，出现了裂缝，在财政法案的后一阶段需要一次退却，例如1928年煤油税的情况，那么，策略上的退却便在猛烈反攻的掩护下漂亮地进行。

在这届议会开始之前，我只遇见过丘吉尔一次。我想起他向我谈话时，态度优雅，彬彬有礼，他谈到我的伯父，以及他对我伯父于1906年出版第一部重要著作《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当时已经表示的善意。随着议会的进行，我也被计入他的朋友行列了。他培养年轻的保守党人，把他们视为“保守民主政体”的继承人。我们的一个伙伴布思比成了他的议会私人秘书。在议会后期阶段，他向我说出了有关重大减税方案的知心话。随着我的经历的展开和岁月的流逝，丘吉尔越来越变成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人物了。在他在野的漫长岁月里，我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从1940年起，不管他是在野还是执政，我都为他效劳，直到他退休时为止。但是我想描述的是1924—1929年的丘吉尔：盖世无双，刚愎倔强，令人振奋，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这给我们十分单调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种色彩感。阿斯奎斯在1915年10月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与丘吉尔的一次谈话：

177 在大约一刻钟的时间里，他有如瀑布倾泻一般不停地发出抨击与呼吁，而我很遗憾，在听得见的地方没有速记者，因为一些出口成章的警句是非常宝贵的。^①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由于没有这样的自动化的博斯韦尔^②，世界损失多大啊。当然丘吉尔的许多言论都记录下来。但是不可能把他那滔滔不绝的谈话所产生的影响描绘出来。他那激动人心的思想总是用同样有力的措辞表达出来。就是在这些年里，我初次品

① 牛津的伯爵和阿斯奎斯：《回忆与沉思》，卷二（伦敦，1928），第46页。

② 博斯韦尔（1740—1794），英国苏格兰人，著名的传记作家。——译者

尝了后来我有幸尽情享用多年的宴席。

奥斯汀·张伯伦由于担任外交大臣,他同下院有点疏远了,而伯肯黑德又在上院,因此保守党和政府便被三人——鲍德温、内维尔·张伯伦和丘吉尔——控制了。在那个时候,假若鲍德温辞职的话,看来很可能由丘吉尔接替他。在那种情况下,历史的确就可能不同了。众所周知,丘吉尔和张伯伦在执行社会和行政改革的伟大纲领方面,紧密团结,协调一致地共同工作。然而正如我将描述的那样,丘吉尔在财政部的统治地位以及他对于自由贸易主义的继续信仰,保证了鲍德温在选举期间所作的诺言得以审慎地维持下来。一项完备的关税政策只有在经济有点象完全崩溃之后才会出现。

除了这些人之外,政府各部还包括若干重要而有能力的人物。坎利夫-利斯特(先前的劳埃德-格里姆和后来的斯温顿勋爵)肯定最有才能。我那时开始同他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后来与日俱增。爱德华·伍德(后来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是一个惹人喜爱,很有趣的人。奥姆斯比-戈尔(后来的哈莱克勋爵)、沃尔特·埃利奥特以及尤斯塔斯·珀西都具有理解与接受的智慧。我们特别指望最后两人赞同我们正在试图发挥的见解。

在第一届会议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加入了青年议员小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初次进入议会的。人们通称我们为青年保守党人,并且给我们一个绰号,叫做“基督教青年会”。事实上,象所有这样的小组一样,会员资格既不严格,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教义。达夫·178库珀象艾登一样,主要致力于外交事务。那些在一起工作最为协调一致的或许是诺埃尔·斯克尔顿、奥利弗·斯坦利、约翰·洛德、罗布·赫德森、布思比以及后来的特伦斯·奥康纳。这些人是核心;而另外那些人则是来来往往,或者是含含糊糊地加入的。当然,我们这个小组智力最为突出、具有真正才能的领袖是诺埃尔·

斯克尔顿。是他发展了新托利主义的哲学，并偶尔以短小精悍饶有趣味的小册子发表这方面的文章^①。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多数人都稍大一点，他不仅博得了我们的喜爱，而且也博得了我们的尊敬。他的夭折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假如他活着的话，那很难说他的政治生涯将是怎样的。然而他对于政治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肯定地稳步与日俱增。在那些年代我的所有的朋友中间，我最钦佩的，也是后来我最为怀念的，要数诺埃尔·斯克尔顿了。

强烈反对我们并反对我们所有的理想的，是某些年纪较老的议员，他们大多是 1918 年联合政府的遗老，我们很不尊敬地给这些人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四十大盗”。报刊上那些较为客气的评论家提到他们称之为“工业家”。在他们中间有些非常令人愉快的人物，也有一些很有理智、很为杰出的人物。但以我们年青而热烈的心情看来，他们代表的是一些反动力量。

与那些“工业家”联系在一起，但还不是其组成部分的是那些政治死硬派，他们是战前那些大的斗争中的幸存者，而且注定在 1930 年为争夺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中成为鲍德温的主要对手。这些人的领袖是格雷顿上校，他是一位真正心地善良的人，但是有一副相当严峻的外表。他那干枯的小胡子、沉重的眼镜、相当凶恶的相貌，这一切使得某一位福尔摩斯爱好者给他起了一个叫做“莫里亚蒂教授”的绰号。这个名字被人们固执地叫了下去。

我所属的另一个团体主要是社交性质的；它的领导人是斯彭德一克莱上校，他是一位见解温和而明智并普遍受人喜爱的人物。我们一起吃饭，有时我们自己，有时请来一位客人给我们讲话——
179 一位大臣、一位文职官员或一位经济学家。这个团体没有特别的政治性质。它既不是右的，也不是左的。然而它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① 其中最早的《建设性保守主义》发表于 1924 年 9 月，对所有青年党员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任何个人的或政治的问题，总的说来可以相信它是持温和态度的。

我已描述过的这个由个人和集团混合而成的下院，是由我们那和蔼可亲的“校长”惠特利议长主持的。我已在五位议长之下当过议员。菲茨罗伊海军上校统治下院，纪律严明，但能为人们接受，因为他是绝对公平的。但他有点令人生畏。克利夫顿—布朗陆军上校迷住了下院，他用高超卓越的手腕操纵了紧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届困难的议会。“谢克斯”莫里森神采奕奕，他那深沉的苏格兰嗓音为所有的英国人所喜爱，他是用智慧与尊严掌管一切的。当我在希尔顿—福斯特手下工作的时候，他显示了类似的品格。至于我的第一位议长惠特利，我对他怀有深情的敬意，这种感情是任何青年议员对一位以同情与了解待他的议长所怀有的。他似乎总是能够洞察到那些不重要的后座议员的内心忧郁的，这些议员在几个小时的长时间辩论中都满怀希望地坐在那儿，等候能被叫到。如果最终在吃饭的时间能抽出五分钟或十分钟来与十多个议员在一起的话，议长先生不知怎么使人感到他一向乐意帮忙，不管他当议长时，还是多半他后来当议员时。某些人说他是位懦弱的议长；但所有的执政党议员首领都说，就那些很适当地保护议会的反对党与少数派的议长来说，惠特利先生是位仁慈的议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一时期里，他将自己那么多的时间奉献给了工业稳定的事业，这很能说明他的特点。联合工会理事会是在他主持下创立的，他在那里留下了纪念碑，至今通俗的说法，还是用他的名字称呼这个理事会。

第七章 二十年代的生活

二十年代是我们对稳定和进步的前景可以有一些信心的时期。虽然贫苦地区的情况每况愈下,而就是在这些地区,在战争年代却是繁荣的年代,那里工资高,储蓄多。在我国其余部分,贸易事业一般说来还是好的。新的工业迅速出现。同上一世纪的情形正好相反,这是人口大流动的开始。失业者中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男女,从北部迁移到中部和南部。大迁徙已经开始了。但是由于失业和萧条大体上仅限于某些地区,就全国一般来说,各个阶级的实际生活标准却在提高。虽然以战前的标准来衡量,捐税似乎是高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在今天来看我们应该认为它还是低的。所得税在1920年是每英镑六先令,但这个税率不断下降,到二十年代的后五年中,就成为每镑四先令了。即使对高收入阶层的附加税也从来没有提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规定的、现在仍然基本执行的那个等于没收的水平。虽然工资和薪金不算很高,但是生活费用也较低。整个十年中日用品价格不断下降。然而在生活费用降低的同时,失业率却上升了。虽然如此,对有职业的和有固定收入的人来说,低廉的生活费用确实是有好处的。对上等阶层和中产阶级的上层来说,生活的舒适程度虽不象爱德华时代或者乔治时代早期那样高,但仍然是相当不错的。关于雇用仆人,现在收入不太高的人家几乎已经不可能了,甚至收入高的人家也逐渐没有人伺候了,但在那个时候是很普遍的。当时家仆的数目在一百万人以上,主要是妇女。大多数的情况,肯定有四分之三,也许还要多些,是一个家庭只雇用一个人,他们都是在很简朴的

家庭劳动的。那些收入稍多的家庭则雇用两三人，甚至在那些现在
181
现在看来并不那么讲究的家庭里，可能有五六个仆人。比较富裕的人们，但还决不属于最高收入的那些人家，雇用的仆人就更多。至于那些豪门大户，仆人则多达二十至三十人。就所得现金来说，仆人工资是低的；但就实际所得，包括住宿、伙食等等，这些报酬使一般的家庭仆人足以愿意为一些人家用，而那些优秀的仆人则几乎是通过世袭的办法而得到补充。

在上等阶级或中产阶级上层一般家庭的生活中，“媒姆”无疑是家务活动的中心。我们的媒姆拉斯特太太是在我大哥出生后不久来到我家的。三十多年以后当我结婚时，她成了我母亲的女管家。她照管我们的家务，是由于她的决定，并得到我母亲同意的。在我结婚以后的头几年，她非常严格而又极为节约地管理我们的家务。我现在仍然能够看到她，外貌和衣着都没有变化，身材矮小，却盛气凌人，充满深情，但很坚定。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从学校回来，到家后总是先到她的住房里去。她在我们孩子们的身上也有同样的吸引力。同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年之后，她辞退了，但仍然是我们一位敬爱的朋友。令人高兴的是，我自己家里也同样出现了这种富有献身精神的故事。我们的媒姆韦斯特太太是1921年，也就是我们大孩子莫里斯出生那年，到我们家来的。后来她虽然辞退了，但仍然和我们一起住在我们花园尽头的一幢小型别墅里。那儿是孩子们和孙儿们活动的中心。

因此，在大多数家庭里，长期雇用仆人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而是平常得很。仆人并不一定只看工资或其他条件的，在“主人”或者“主妇”同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私人关系，它比现代作家力图使我们相信的那种经济关系更为可靠。这种情谊是以亲密无间的真情厚意和大量的私人交谈为基础的，无疑这还由于大量的促膝谈心及平等而慷慨地甘苦共尝而得到加强。

182 尽管我母亲要求的标准很高，可是多年来她一直继续雇用一些分管内外事物的仆人。例如，1906年我们雇用了—一个花园总管，直到1935年他死去以后，才以他的副手来接替。由于园丁的工资很低，五六个人的工资仅仅赶上今天一个人的。当然，在二十年代马车夫已经让位给“肖弗尔”^①——这是悄悄地进入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古怪的法语字眼。这些人分为明显的两类：一种是“亨利机师”，也就是那些年轻的、现代新型的机械士，通常他们穿一身蓝衣，只戴一顶便帽，这也就是制服了；另一种是肥胖的以前的马车夫，他们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象一个穿制服的仆役，系着皮绑腿，穿着长外套，坐在汽车驾驶盘的旁边，就象坐在马车驾驶座上，吆喝着开动那不听使唤的、有时是难以驾驭的汽车。我几乎相信，他们在车房里擦洗汽车的时候，一面嘶嘶地擦着汽车，嘴上还一面刁着一根稻草。

这些人家居住的房子，按现代的标准算是宽大的了——却常常不整齐而又很不方便。然而，对于孩子多的人家，这种房子却是十分适合的。的确，这些房子没有那种现在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舒适的设备，但在大的住宅里，洗澡间已逐步安装了起来，虽说还远不是普遍的。我的岳父在1909年继承了查茨沃思的宅邸，在那样一座宏大的公馆里，还只有一个洗澡间。在那些已有可能取得、或者人们坚持要有更大发展的地方，洗澡间也还没有提高到象现在住房占有的那样重要的地位。房客不能期望都有一个自己支配的洗澡间，你得站在走廊里，等候轮班洗澡。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居住的那些房子，最大的好处，总的说来就是有可能逃避喧闹。在我们居住的老房子里，甚至在我父亲把它重建之前，一直备有单间供我和我的兄弟们在里面学习。那时，不管在中学还是大学，最难和最费时间的课业都是在节日或者假期里作的。我清楚记得那个

^① “肖弗尔”(Chauffeur)，法语小汽车司机一词的译音。——译者

时间表,每天在家里要读书七个小时,甚至八个小时。除非有一个单间,尽管是一个小间,与家庭生活的主要活动隔离开,否则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作业计划。现在年轻人似乎都学会了全神贯注的本领,对电视、无线电广播、留声机等噪音的干扰,或者对小孩们吵闹的游戏,毫不在乎。对此,有时我羡慕得竟至失神。这必然要引起过度紧张。不管怎么说,在二十年代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房间”。

183

物价的降低和纳税不重,在这一时期可能使富人认为,生活有所改善,大致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并且同样有可能使收入一般的人认为过得很舒适。每一个阶级有职业的人有理由希望逐步提高生活水准,同时依靠实际工资和收入能够生活得很好。在整个形势完全发生变化的时代,这些年代激烈的劳资争端如果说只关系到工资的降低,而不关系到工资的提高,那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在引起全国总罢工并在全国总罢工结束之后又持续了好几个月的煤矿停工中,压倒一切的问题就是经济上需要降低生产成本(工资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以适应正在衰落的市场情况。这就不得不做出许多类似的再调整,有时是通过协商,有时则是经过巨大而痛苦的冲突才做出的。的确,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承认需要进行所谓的“再调整”。非正统的经济学家为反对恢复货币按票面价值兑换黄金所提出的重要理由,就是认为改变货币价值这种再调整的办法会比试图按行业减低每一个人的工资要简单得多。实际工资必须降低,这种看法是被人们接受了。不过问题在于:是通过详细谈判还是单凭一项通货贬值法令?然而,这些年来,有职业的人,不管是挣工资的还是领薪水的,有收入的人,不管是劳动所得还是不劳而获,尽管他们有着某些忧虑和担心,似乎都没有理由不满怀信心地展望着日趋稳定的前景。

教育制度继续依据一贯的方针。在普通教育方面,旧学校被

拆掉了，而代之以较好的学校，因而取得了进展。中等教育虽然不是显著地，但也稳步地扩大了。在我们的朋友和亲戚当中，他们的

184 男孩一般都是先进寄宿的预备学校，然后再进公学，至今仍然如此。在二十年代，这些人家的女孩开始到学校读书，或许只有那些“显贵之家”是例外，他们仍然认为“家塾”或者在别人家听课更为适宜。一般说来，所有上等阶层或中产阶级上层的男孩都被送到远处去受教育。某些大家族仍受传统影响，放弃了这种机会，其中也许要算拉塞尔一家最为突出了。其后果是好是坏，我不愿下判断。然而，一般说来，我认为现在被叫做“统治集团”的人都进过公学。我从来也不认为这确乎是一种危险的阶级差别。毫无疑问，由于人们怀疑公学是裙带风的工具，那种“校友情谊”造成了许多损害。可是现在许多强烈反对公学的人他们本身就曾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或是受害者。任何民主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时常受到一种可以说是政治上的“道德重整运动”的侵犯。这些人认为必须起来向世人解释，统治阶级的人们不仅无用而且有害，教育他们的那些学校则是反社会的。事实上，住校的孩子和在家受教育的孩子之间的主要差别是由于离开他们的父母而造成的结果。一个男孩从八岁或九岁就离开家庭，从这时起直到大学毕业，除了圣诞节、复活节和暑假的几周的时间外，都不在家里生活，他们被迫养成一定的独立精神。小小的年纪就被扔进生活的洪流，任其沉浮。有些人肯定是要沉下去的，或者根本不见了，或者注定有时要浮到水面上来，不是违犯刑章受到警察法庭的审判，就是沦为极端的、从事颠覆活动的分子。然而大体看来，其中大多数人终会设法为自己找到一条谋生之道。这种在早年就发展的自力更生精神，是在幼年就有机会离家的孩子跟在家受教育的孩子的主要差别，前者避开了自私的父母的漠不关心或者慈父慈母的钟爱，而这两种情况同样可能对孩子们都是有害的。这种差别不是阶级的，而是实

际经历的,是否应该继续下去,人们肯定将很快作出判断。在我谈到的那个时期,总的趋向是赞成扩大教育权利,而不是破坏它。

这些回顾看来可能使我的读者失望,他们会相信二十年代的 185 英国生活是狂热而又邪恶的。当然,那时有许多不同的集团和派系。有一派人多半是受到了插图的报纸的鼓励,声言要组织某种机构,用势利人的老话来说,即所谓“社会”。他们的会员包括哪种人很不明确,一方面包括男女名流,另一方面也包括“食客寄生虫”和“逢迎权贵的人”(萨克雷^①特别喜爱的人物的后裔)。此外还有一群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好象在伊夫林·沃的小说中描绘得维妙维肖,生龙活现。但是,即使确曾有过这种人,而年轻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要是把他们当作典型人物,那就不聪明了。确实也有过所谓“生气勃勃的小伙子”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似乎也不过是在古老主题上加以新的改变而已。这种风气在许多世纪以前就开始了,人们称之为“把看守人惊醒”。当前其主要目的是使那些令人尊敬的人们,特别是父母们,受到震动。如果一场争吵能招来地方官或者报纸编辑的谴责,那他们就确实成功了。然后就是赛马界——现在也的确还有这样一帮人——和娱乐界,政界和文学艺术界。各界人士往往混合在一起,但从广义上来说,二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同战前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多大本质上的差别。

我在前面的一章里曾试图描写我自己的家庭和经历,它沿着同样的路线继续前进。在出版事业方面,有关纯粹技术与业务的问题,随着老一辈的伙伴开始从实际经营方面引退,我哥哥和我发现我们管得越来越多了。除此以外,同我们的主要作者进行个人接触也还是满有趣味的。我常常会见拉迪亚德·吉卜林,有时是在俱乐部里,有时他到我的办公室来谈些问题。我有两三次到苏塞克斯他的贝特曼宅邸家里去拜访他。严格说来,他并不作什么

^① 萨克雷(1811—1863),英国有名小说家。——译者

事了，所有的事情都由吉卜林太太或者他的文学代理人瓦特先生代办。但是他偶尔也乐于了解一下关于插图和开本方面的意见。他非常缄默，而我总觉得他似乎是一个颇为悲伤的人。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独生子在战争中死去。我记得他专心致志写作爱尔兰
186 警卫团的历史，作为纪念他死去的儿子的赞词。当我认识吉卜林时，他已经退隐了，偶尔也在牛排餐馆吃一顿午饭或者在格里利恩饭店进晚餐，在这些地方他有时谈话很随便。他仍然是最高级的记者，总是对于搞任何阴谋诡计的能手或轰动一时的惊险事件的主角很感兴趣。他非常慈祥而且彬彬有礼地接待我；然而他未曾向我暴露过他自己的思想。

关于托马斯·哈代我只能想起一两件事。我偶然为了一件什么小事到多塞特他的家里去拜访他。他面颊红润象苹果，而且你会觉得他有一种被称为“艇长的苹果”那样一股淡淡的酸味儿。我的伯父弗雷德里克·麦克米伦爵士喜欢谈起当年他跟哈代一块吃午饭的一次轶事。哈代在青年和中年时代曾为一般公众所忽视，而只投合少数读者的心意，到了老年才逐步成为上流社会所欢迎的人物了。他住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邻近的一些大户人家的主人很想同他“交往”。一个原因是由于哈代夫人的鼓励，另一个原因是托马斯·哈代本人也不完全反对。哈代有一种特具的带讽刺的幽默感。有这么一次，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其中包括一两位贵族妇人，在马克斯大门他的小小的餐厅里吃午饭。一位夫人正好坐在哈代的身边，有点感情冲动地俯身对他说：“哦，哈代先生，亲爱的哈代先生，给我们谈谈苔丝姑娘吧。告诉我们苔丝对你意味着什么。”哈代向坐在对面餐桌另一头的我的伯父喊道：“布兰克夫人想要知道关于苔丝的一些事情，我说些什么好呢？不管怎么样，弗雷德，苔丝对你我来说，可是一棵摇钱树呀！”

我跟休·沃波尔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我为他出版了他的极为

成功的几本小说,并常常去看望他。他现在不再那么时兴了;但是他以完美的文笔又写了一本很好的小说。他非常敏感,特别是对来自他那些同辈作家的批评;但是在这种奇特的妒忌和缺乏自信心的背后,他为人却十分厚道,并能体贴别人,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伙伴和忠实的朋友。

查尔斯·摩根是我哥哥丹尼尔的密友,而我也跟他过从甚密。我觉得他严肃高尚,具有魅力。他的作品在法国比在英国的评论界和读者中总是更受欢迎,而法国人对他的怀念也更为诚挚。 187

耶慈惯于未经事先通知就走进我在圣马丁街的办公室里来。我还记得他那耀人眼目的风采,饰以一个漂亮环夹的领带飘动着,以及他那副多少有点惹人注目的诗人和梦想家的容貌。但他也是一个讲究实效的人,而绝不鄙视出版方面的那些通常的问题。

在我们的目录中选了不少爱尔兰派作家的作品。老一辈的作家有乔治·拉塞尔(“AE”),他常常在来信的开头画上一幅美妙动人的水彩画,我至今还保存着他的几封这样的信。《金罐》的作者詹姆斯·斯蒂芬斯自己就很象一个矮妖精。他喜欢事先不通知就不声不响地溜进我办公的房间。他总是把门推开一半,把头伸进门里来,这时只要稍加鼓励,他就会让整个身体闪了进来。可惜的是,由于他依靠无线电广播和在报刊上投稿就很容易谋生,这使得他晚年不再想从事严肃的创作。每当我催促他再写一本书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回答:“我能够靠讲话赚钱,干吗还要写作呢?”这个流派中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西恩·奥卡西。他跟他那位有才华的妻子经常到苏塞克斯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我看到他因有了名声而感到越来越高兴。尽管他自称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我却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仁慈、最真诚的一个人。他和罗纳德·诺克斯尽管很不相同,却都是圣洁的人。

我们那些年的生活，不管是在切斯特广场还是在桦树林宅邸——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们的子女，经常在这两个地方同我的父母长时间住在一起，有时他们回到卡多根街去，我们还在那里借住——都是丰富多采的，社交生活也是愉快的，在业务与政治方面的活动也极为繁忙。我们有许多政界和文学界的朋友，我不时到伊顿和牛津去。特别是我在牛津跟厄克特和汉弗莱·萨默尔关系密切。但是由于我们的家庭日益扩大，我妻子又钟爱子女，再加上朋友们频繁来访，因此对一般的娱乐活动我们并不是很积极，也不大接受别人的邀请。我们这种有点孤独的态度对我们倒也无害。

188 我妻子的家风从来就不是那么“时髦”的。一代代的公爵根据他们自己的性格喜爱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热衷于乡间生活或勤俭持家，一般说来都是守大财主的本分的。从事政治活动也是他们的天性，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几乎都自动地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他们这家人都诚挚地崇尚学术。公爵夫人的家庭也是这样。我记得我们婚后不久到博伍德去的一次访问，我妻子的祖父兰斯多恩老勋爵正在那里欢度他的晚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在格拉德斯通内阁供职，后来又辞退了。他担任过加拿大总督和印度总督。他是二十世纪初叶保守党政府的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并且是同法国人订立的“英法协约”的主要设计人。战时他在阿斯奎斯第一次联合政府中任职。由于1917年公布了“兰斯多恩信件”，他受到了严厉的非难。这一信件提出了——如果不是明确地鼓吹——在欧洲自行毁灭之前争取和平的可能性。当时他已是一个老人了，我仍能看到他在他那著名的书房里坐着，翻阅一本印刷和装订都很精致的名著。他同一两位客人在一起，主要是他自己家里的人，过着极为恬静的生活，他终生保持着一位贵族的仪表和性格。根据自由党的传统，他能很快吸收激进的新思想，不过这些思想仍是用古老的模式铸造出来的。在博伍德有一种风俗特别使我们感到高

兴,可以说是从前那种游园会的遗习。兰斯多恩夫人(她的孙子们都管她叫做“莫德奶奶”)早餐后总是问她的客人们,如果“克兰老爹”(兰斯多恩勋爵)认为这样好的话,他们喜欢不喜欢换换花样,来一个野外午餐。只要勋爵一表示赞许,一切就安排了。第一次我还以为这需要步行或乘车,坐汽车或者坐马车,也许是在树林中或山坡上吃一顿不很舒适但颇愉快的午餐。上午过去了,我开始对要发生的事情感到纳闷。下午一点钟我们准备动身,我们这一小群人离开家门口走了约有二三百码就来到了湖畔。湖畔有一个游艇停泊处和一个农舍式的避暑别墅。午餐早已摆好了;象在家里一样,桌子上也摆着常用的银器和玻璃杯盘以及餐巾等。男管家和一两名男仆在那里伺候。事实上这顿“野餐”同平时的午餐并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是离开了宅邸,走在几百码之外,并在游艇停泊处上面坐了一会而已。午餐过后,并喝完各种各样的中人心怀的葡萄酒和咖啡以后,我们就回家了。这次伟大的远征就算完毕了。这并不是说兰斯多恩勋爵在青年和中年时代都不曾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运动员。这位老人用以代替远足的方式,我感到有点动人。

也许一年里我们最盼望的一段愉快的时间就是圣诞节。最初,我们是轮流在桦树林宅邸跟我的父母一起或者在查茨沃思跟我妻子的家人一起欢度这个节日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孩子多了,而且也大了,我的父母鉴于我的妻子急切盼望着一年一度能同她分散各处的家人聚首,就无私地催促我们到查茨沃思去过圣诞节,而让我们在别的时候到他们那儿去。查茨沃思圣诞节的聚会的确令人难以忘怀。现在想起他们就回想起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离今日英国几乎象《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罗斯托夫伯爵的家庭那样遥远。

在查茨沃思,人们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欢度圣诞节的。除了孩

子的数目越来越多以外，每年都是一个样子。到了二十年代末，这些孩子已经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除了公爵和他的夫人以外，德文郡这一家人就有两个男孩和五个女儿，他们都已结婚。节前一两天，他们就开始从国内各地陆续到来。每一家平均约有四个孩子。因此，这些孩子，连同跟随他们的媒姆和女仆，总共约有五十来口。此外还有侍女和随从，总人数就不下六十口了。另外还有别的客人：有时是我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辈的人；有时是“莫德老奶奶”——兰斯多恩勋爵的遗孀。按照由来已久的惯例，年年都来共度圣诞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通常是公爵或公爵夫人的两三个远亲。再加上副警卫官厄斯金先生，他是大警卫官的儿子，大警卫官是卡文迪什一家终生不渝的朋友；此外还有曼斯菲尔德先生。这两个人在公爵袭位以前就已经是圣诞节的客人了，那时公爵住在兰开夏郡霍尔卡府第。他们两人常常称公爵夫人为“艾薇夫人”，这是建立已久的友谊的一个标志。他们被称为公爵亲密的老友；自然公爵对待他们比平常更为缄默。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公爵总是这样跟他们打招呼：“喂，吉姆”，“喂，沃尔特”，而当他们离去的时候，公爵就说一声：“再见，吉姆”，“再见，沃尔特”。就我所知，他们并不再交谈什么。我敬爱的内姐，公爵未亡人玛丽的家庭与经历却十分不同。我最初还以为她一定感到卡文迪什一家人长时间的沉默寡言有点难以忍受，因为她是塞西尔家族的一员，而塞西尔家的人总是海阔天空谈个不停的，有时还进行热烈的、语锋凌厉的争论。公爵却不喜欢争论。

所有这些圣诞节客人和他们的仆人，加上这家长年和临时雇用的仆人，聚集在这所大房子里的人大约有一百五十多名。当然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个陌生而又令人兴奋的世界。他们被仆人们娇惯坏了，而主仆之间许多人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当人们领着你穿过大厨房，庞大的餐具室和地上铺着石板的拱顶肉类贮藏室，特别

是那个比许多肉铺还要大的、挂着一排排全牛全羊以及各种野味的大屋，这时你总会感到这是一种新的乐趣。许多客人，包括我们家在内，是骑马来的。因此马厩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不断有人前往参观，每一群马都有跟来的马夫陪伴着。参观杯盘室可能得到特殊的享受。在一位年老已退职的男管家的照管下，这里收藏着大批餐具，许多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旧物。一套套美丽的威廉和玛丽时代的调味用具就收藏在这里，此外还有一套金质餐具。在某些节日里，例如圣诞节或者举行其他重要宴会的日子，最贵重的餐具便在餐厅里摆了出来。但是除了那些日常应用的餐具外，这些珍品大部分都由那位忠实的守护人小心警惕地看管着。

每年圣诞节的仪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所有客人头一天就来齐了。每一家到达的时候，“艾薇奶奶”就站在台阶上迎接他们，在台阶顶端可以从外厅走进通往色彩鲜明的大厅的通道。我的孩子们至今还记得她们依次欢迎每一家客人的情景：车辆在大门门房前驶过，她总是在一定的地方。她和蔼而又端庄，身穿深色的、飘垂的长外衣，从来没有改变。虽然禀性羞怯而沉默寡言，但她和公爵一样，对小孩并不压制。当然女婿们很快就了解到需要打发他们的家人搭乘早班火车先来，以便自己在伦敦办理一些重要的事务，随后更舒服地来到。

圣诞节前夕这个家庭也和全国每一个家庭一样，母亲们忙着把礼物装在长袜子里挂起来，把儿童室装饰一番，一直忙到很晚上床睡觉。在我们家，巧得很，也和许多别的家庭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愉快地照旧进行，只是稍有一些变动。孩子和孙儿孙女们每年都聚集一堂来欢度这个盛大的节日。

圣诞节到了。早晨八点钟就摸黑穿过公园到教堂去；接着回来吃早餐，一上午都在津津有味地摆弄小礼物。气球鼓胀起来了，喇叭吹起来了，四轮滑冰鞋都拿出来试验一番。再没有比在这里

穿四轮滑冰鞋滑冰更好的了。自始至终都玩得很好，特别是在雕像走廊和橙桔暖房的石板地上速滑更好。接着在公园里的教区教堂做晨祷，教堂里会众挤得满满的，容纳不下。唱的赞美诗都是大家熟悉的，布道演说温和而简短。牧师喜欢被人邀请去打猎，公爵虽然不大说话，但记性却很好。圣诞节午餐孩子到一定年龄可以参加——要严格遵守规矩——然后摄影。那时在室内照像的巧妙办法还未发明。于是我们大家排队来到花园里一个特别冷的通风地方，这里靠近橙桔暖房外边的“花神庙”。各代人终于依次排好了位置，然后一年一度的合影就完成了。每年参加照像的人数不断增加，幸而没有挤坏了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过。接着就在花园里散步，人们认为这有益于健康，在圣诞节欢宴以后，这肯定是大有好处的。

192 在查茨沃思认真保留下来的一个旧传统，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在家庭小教堂里作晚祷。那些熟悉查茨沃思的人，一定记得那个有着美观的圣坛和精巧的天花板极为美丽的十七世纪后期的建筑杰作。乡村的风琴手和唱诗班都前来参加礼拜式。两排詹姆士一世时代的椅子整齐地面对面地摆着。一边坐的是男人，另一边是妇女。当教堂里所有的客人、仆人和随从客人来的仆人都到齐了，到会的人数可真不少！礼拜的仪式总是在跪唱同样的一首“祈福圣歌”的声中结束：

在天之父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得到你的保佑；
我们为你的存在而欢乐，
并分享你慈悲的怜悯。

* * *

保佑我们一夜得平安，
得到你在天的爱护；

我们在世之日你和我们同在，
然后把我们都接上天堂。

这首圣歌来源不明。

查茨沃思有两种天气，都趋向极端。有时气压低，气温适中。这时天色阴暗、多雨、浓雾，令人讨厌；有时气压高，就会下雪、结冰，这时可以玩雪橇和滑冰。我以极其欢乐的心情追忆着那些圣诞节——花园和公园里美丽可爱的大树，我们的住房在冬日斜晖的照耀下闪着奇异的金光。在日常工作中，天气起着重要的作用。按照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习俗，每天早饭时在一张精美的肯特式边桌上放着一个本子，上面记录着一个园丁搜集的当天的温度、日照时间和雨量。公爵每天早上都要仔细地、不动声色地研究这份资料。

圣诞节这天午茶后举行授受礼物的仪式。这个仪式在“雕像走廊”举行，那株高大的圣诞树就竖在那里。首先，送给仆人们所有的礼物都由孩子们依次分发；然后是小孩送给大人礼物；最后 193 才是各家亲戚送给孩子的礼物。那些礼物也许不及今天的贵重和精巧，但由于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互赠礼物，所以数量是非常可观的。

圣诞节过后的节礼日，活下来的孩子（经常有孩子因感冒或者过度兴奋而死亡）都动身到贝克韦尔去观看高峰猎人和猎犬集合的情况。这次集会是由我妻子的姐姐莫德·贝利和他丈夫埃文联合主持的。这是当地打猎爱好者，其中包括很多孩子，从四面八方云集一处的一次大集会。节礼日这天不打猎，因此所有聚集在这里的人都可以欢度假日。那些不打猎的人，这一天可以睡觉，或者打桥牌，或者看书。在以后几天就恢复打猎了——而且可以打个痛快。然后参加集会的一些年龄较大的人就开始离去。不过母亲和孩子们通常还要逗留两三个星期，而父亲们则在每周末回来继

续参加打猎。这次重大的家庭聚会终于在大家恋恋不舍而又感到取得重大成绩的情况下，直到新年以后才告结束。

有一年，我的妻子提醒我说，那是她认为幸福达到顶峰的一年——在儿童室里不满四岁的小孩就有十四个。卡文迪什家的人一向是非常喜欢小孩的。老公爵病后，除了很少的场合以外，脾气变得很不好，难以接近，甚至很乖僻。但是对孩子们，特别是那些很小的孩子，他却还象往常一样。他们并不怕他，还要逗他笑，丝毫也不把他的残疾当作一回事。而公爵呢，也非常宠爱他们，把他们惯坏了。甚至他们踏了他那只患风湿痛病的脚，他也不在乎。

返回伦敦或苏塞克斯的家中，同前往欢度圣诞节几乎是同样的大事。除了当时每人随身带的大量行李外，还有全部礼物。有一年我以罕有的无私精神同意和我的家人一起回家。除了孩子、媵姆、仆人、马匹、狗、玩具（机械玩具和其他玩具）和行李之外，我们还带回来一件送给我大女儿的礼物——一只小猪。这是自用农场下的一窝小猪中最小的一只，是我女儿的好朋友希姆韦尔先生送给她的，希姆韦尔先生几乎管理着查茨沃思的一切巨细事务。这
194 只小猪很长时间被豢养在我们苏塞克斯家中的幼儿室里。它很干净，懂得人意，从哪一点看都是一只讨人喜欢的小玩物。它象狗那样忠诚，跟着它的女主人到处跑。有一次，它掉到游泳池里去了，我跳进游泳池救了它一命，在孩子们中间以勇敢博得了很高的声望。啊，后来这只小猪简直长得太大了；有一天小孩们都不在家，它失踪了——但愿它有一个好的归宿。

我描绘了一幅古老家族的生活图景，但这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仍然把宗教和家庭节庆恰当地结合起来，毫无疑问，这种形式直到今天还在全国继续着。但是以家长为中心的在大家族范围内进行庆祝却肯定是过去的事了，因此也许还值得

回忆。

查茨沃思的这种集会在整个二十年代,并在以后的十年中,一直延续下去,直到1938年公爵逝世以后才停止。幸运的是,查茨沃思到现在还是一所私人住宅,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它在我的内侄女的照管下比在我岳母的惨淡经营下更加美丽了。可惜的是,查茨沃思的一些宝物已被遗产税那贪婪的巨口吞没了。然而大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当然在哈德威克和康普顿街的大住宅关闭之后,以及随着伦敦皮卡迪利广场德文郡府第的变卖,查茨沃思独得好处,因为这些大家族所收藏的许多美妙的绘画和家具,如今都集中到这里了。许多人认为只是自上一次大战以后,这些历史上有名的住宅才向访问者开放。这是不对的。《傲慢与偏见》的读者会记得,查茨沃思花园一直是向公众开放的。查茨沃思宅邸每当春夏与早秋的那几个月里,每个星期都同样向游览者开放三四天。据记载,甚至早在小汽车和公共汽车出现之前,那时就有不少访问者来过,其人数之多确是惊人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有一年,来访的游客近八万人。如今,每年有二十五万多游客前来参观,不仅对偶然来访的游客提供令人满意的方便,而对愿意详细研究那些图片、绘画、书籍和手稿的学者们,更是予以关怀和照顾。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查茨沃思宅邸正由它现在的主人精心管理着。尽管它还是那样美丽,但我记忆中的查茨沃思已经变了。现在它虽然还是一座私人宅邸,但当然更象一座博物馆了。

从这个时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就是举行大小规模的招待会。这种招待会在议会开会期间不断地在伦敦举行,有时在索尔兹伯里夫人、伦敦德里夫人、阿斯特夫人或德比勋爵等大的住宅里,有时则在象我们这样的小住宅里。我们常常在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现在要举行这样的宴会是比较困难了,因为饭店和俱乐部已取代家庭而成为宴会的场所。或者那种

不可能有真正友谊的、令人讨厌的鸡尾酒会必然已经代替了盛大的晚宴。这些变化比乍看起来似乎发生的变化要重要得多，因为政党的领袖和其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女主人以及许多议员，都把在大小宴会上招待他们的同事及其妻子看作是一种责任和乐趣。通过这种办法，我们互相熟悉了；而一位议员的生活，尤其是他夫人的生活，是令人感到愉快而有趣的。况且为了交谈和辩论而不断举行的那种聚会比现在更不拘泥于形式。此外，许多乡间住宅——哈特菲尔德、克莱夫登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几乎是政治家、艺术家、作家、外交家等人每周聚会的场所，他们可以安适地相处而不拘形式。说真的，没有什么事能比在一所巨大的英国住宅里举行乡间宴会更为愉快的了。除了必须出席宴会并一般是在午饭时到达外，别无其他任何规矩。另外，在一大群朋友当中，一伙人各自组织起来，有的打高尔夫球，有的打网球，有的散步，有的聊天或者安静读书。

关于所谓“克莱夫登派”^①人们写过许多严厉的非难文章。尽管这件事确实属于我即将叙述的下一个时期的内容，但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作者们所说的许多事情，是言过其实的，或者是不真实的。我妻子和我都是克莱夫登和圣詹姆斯广场的常客，并受到南希·阿斯特极为殷勤的接待。她的性格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她笃信宗教而有高尚的情操，并真诚爱护她的一切同胞。她也是一位最忠诚的朋友，她总是乐于助人，既热心而又富于感情。同时对于一切她认为有益于人类的事业，她总是热情支持。在另一方面，她是一位高贵的女主人，尽管她邀请客人也许过于不加选择。在圣詹姆斯广场或克莱夫登她的家里，你可能遇见，而且也确实遇见了各种各样可以想象得到的人物。和她从前或以后的

^① “克莱夫登派”指 1939 年对轴心国采取绥靖政策以求避免战争的一群英国保守党人。——译者

许多人一样,她也许有点过分热衷于追求当代的名人。然而,她能慷慨招待客人,使其欢乐。这些客人中大部分喜欢争辩,而有些人则是辩论的对象。的确,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几年,象洛西恩勋爵、内维尔·张伯伦、杰弗里·道森(《泰晤士报》的编辑)以及汤姆·琼斯这些人,都经常是她的座上客,他们都是“绥靖主义者”。汤姆·琼斯日记的读者一定会意识到他们活动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这些人在那个危急时刻所奉行的政策是得到了阿斯特一家人的赞许的。不过,他们的家却成了公开论坛,而激烈的争论,无论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都受到鼓励,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

还有一家人,由于他们对我特别友好,我也必须回忆一下。从提兹河畔的斯托克顿到温亚德只有五英里远。在我担任斯托克顿议员的那些年月里,伦敦德里勋爵和夫人使我们感到他们的家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随时都可以借用他们的房子,而我们似乎总是受欢迎的。在那里同样也常有代表各种职业的不同类型的人们的盛大聚会。伊迪·伦敦德里夫人在一群特别要好的朋友中间简直就是“瑟西”^①,我以能够作为她的一个亲密朋友而自豪。她是我所熟悉的人们当中最富有活力的一个。毫无疑问,她是有缺点的,但我宁愿只记起她的高尚品质,也许其中最可贵的是她的为人忠实。只要她和一个人建立了友谊,并引为亲信,那她的友情就是始终不渝的。在人生正常的浮沉中,人之常情常常是这样的:一些人,甚至是一些“大人物”,他们无意之中成了人们政治命运的很好的晴雨表。当一个人的身价降低了的时候,他就会感到他并不完全受人欢迎。一旦他的身价提高了,人们对他的接待也会随之热心起来。但是伦敦德里家的人并不如此。在我坐在议会后排席位上的整个长久年月里,虽然我愈来愈反对

^① 瑟西,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女魔。——译者

党的领袖们的政纲，甚至断绝了跟保守党督导员的关系，可是查
197 利·伦敦德里和伊迪·伦敦德里对待我仍然一如既往。她始终是一位善良和忠实的朋友。我当上了首相以后，她告诉我，她感到高兴，但并不惊讶。然而在我时运不济时，我也没有忘记过她的友谊。

近来外界的生活情况瞬息万变，对于往事作一些追忆，看来还是值得的。当我能够从商业与政治活动中得到短暂的休假的时候，我就尽情地享受这种假期的愉快和乐趣。我承认，从我在斯托克顿跟可怜的失业者在一起呆了不多几天，到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支配或享受不同程度的舒适生活和物质财富，这是一个转变期间，在此期间我经常不断地感到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假如在旧的生活方式方面许多美好的和丰富的东西已经消逝，那么想到这些巨大的差异在我这一生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裂痕一定要较好地弥合起来，这是用大方的、富有创造力的政治手腕来提高多数人的水平，而不是用猜疑和不怀好意的政策来集中力量推翻少数人。

第八章 1924年至1929年的议会

198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普遍乐观的时期，而这样说是相当正确的。虽然国内国外存在着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但似乎没有理由怀疑，过去曾为我们很好地服过务的发展进程在未来还会继续进行下去的。在国内联合内阁垮台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届保守党政府；工党政府第一次执了政。工党政府的出现使得许多人担心害怕，但毕竟这绝不是一次革命事件。即使它在行政管理上造成了许多混乱，为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海外英国的高大形象或声誉并未降低。身兼外相的首相在欧洲受到尊敬与赞扬。甚至带有根本性的经济与工业问题，在当时使国内不同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除了在战时那样迅速地得到发展、而现在却陷入了严重困难之中的造船业和重工业之外，许多新的正在发展的企业都生气勃勃，就业率与利润率都很高。贸易差额虽然大家公认不完全令人满意，但问题并不严重。我们正进入英国恢复金本位长远旅程的最后阶段，恢复金本位是正统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盼望已久的事。其他国家已经采取或者即将采取同样的步骤。

象我这样的一些同萧条地区接触密切的议员，自然而然地用带有偏见的眼光来看待这整个场面，但是更善于权衡利弊的观察家都意识到那普遍的充满自信的感情。自从大战以来，变化当然是有过的，而且必然的。战前那种古老方式的生活将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些变化，或许是社会风尚方面的，或许是政治权力平衡方面 199 的，并不显得比第一个改革方案以来一百年间我国曾经愉快地、成功地克服的那些变化更为重大。我必须探索的、经历了五十年过

程的那些根本而又几乎是革命性的改变，仍然是模糊的。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已从世界上撤出，或者确切的说已从欧洲撤出，然而，在尽一切努力解决或者至少在改进那些因和平条约，特别是因赔偿和政府间债务纠纷而引起的灾难方面，美国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它经常犹豫不决。俄国仍然是一个谜。工党政府对苏联人怀有好感，这首先导致他们在法律上承认了苏联，接着便建议贷款给它。但是这种政策产生了相当令人沮丧的结果。尽管俄国肯定是要发挥巨大的作用，然而它的未来，至少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依然是神秘难测。

帝国似乎有些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虽然 1926 年在帝国会议上承认了每个自治国家的独立地位，并且不久即将通过立法正式规定下来，然而帝国这个巨大的结构仍然相当稳固。为印度设计一部宪法的任务是会有困难的，但并不是办不到的。殖民帝国平静地、而不是沉着地在其演变的道路上前进着。至于防卫，这是一个严格节约的时期。做为财政大臣的丘吉尔，事实上回复了他在 1908—1911 年所采取的态度，那时他和劳合·乔治一道强烈反对麦克唐纳决定建造特大的无敌战舰。在这届议会中，丘吉尔的目的同十六年以前的一样。但因为这不是一项通常与他联想在一起的政策，所以也许值得回想一下他的那些论点。在每一个场合，他都感到战备浪费公众的金钱，不如花在社会改革上更好一些。很久以后，丘吉尔坦率承认麦克唐纳在第一次大战前关于无敌战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他看来，满有理由认为 1924 年的形势完全不同了。正如我叙述的那样，国外的外交地位似乎大大改进了。意大利表示友好，法国愿意合作，而德国明显地处于一种虚弱状态，当时唯一的潜在敌人似乎就是日本。丘吉尔任职不到一个月就于 1924 年 12 月 15 日请求外交大臣向内閣发表一项声明，考虑到合理的可能性，在今后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内，不与日

本作战。他送给奥斯汀·张伯伦一份他写给鲍德温的信的副本，在这封信中，他对于增加海军支出预算表示忧虑，这个预算看来要从1924—1925年的五千五百万英镑增长到1927—1928年的八千万英镑。在空军预算中也将不得不考虑增加大约五百万英镑。在丘吉尔看来，所有这些使得减轻赋税成为不可能了，并且使社会规划方面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象往常一样，他的主题提得很有分量，论证也生动有力。结果“十年无战争”这个学说受到赞同，并做为一个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逐年得到发扬。丘吉尔因此得以能够比伦道夫勋爵以来任何一位财政大臣更带劲地为经济事业而奋斗——而他本人却没有遭到那同样的灾难性后果。同时，回想到保守党政府在执政五年之后把我们的武装力量搞的甚至比他们在1924年看到的更为陈旧过时，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英国的经济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尽管我们受到失业之苦，可是我们并不关心国际收支平衡，或者一个通货过分膨胀的制度。

因此，这些潜伏着的未来的巨大发展似乎是被合理地控制了。如果我们讨论这些巨大发展的话，我们不会发现它们过于令人惊恐，至少在短期之内是如此。因此，在1924—1929年那届议会——那时我初次参加议会——期间，人们的情绪是抱有缓和的但却是合理的希望的。许多东西要变化，许多东西要改进，许多老朽之木要砍掉，许多新的计划与方法要采用。但是报酬似乎是可以得到的。从战争结束直到1929年这一期间，尽管有着那一切损失、一切悲哀以及一切人间悲剧，而在人类面前似乎呈现一个美好的远景。我们信任国际联盟。“结束战争的战争”这句话并未成为一种嘲弄。

的确，欧洲形势已经稳步地改善了。1924年接受道威斯计划以后，在欧洲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真正的复元时期。彭加勒倒台和赫里欧上台后，法国从鲁尔撤退了。在战后最初那些年代里，德国

未来的军事力量是一件那样不值得惊恐的事情，以至使英国的许多主要政治家以更大的怀疑看待法国的优势。例如 1923 年 2 月，伯肯黑德勋爵提请上院注意法国引以自豪的二千架或更多一些的第一线飞机，对比之下，我们则只有可怜的四五百架飞机。在整个那些年代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的朋友以及批评者往往过分强调法国的力量。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法国所遭受的那可怕的灾难，以及在南部战线的进攻中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损失，再加上后来在凡尔登遭到的伤亡，确实把法国进行军事侵略的精力永远摧毁了。法国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安全。然而关于安全问题法国感到在谈判和约时受骗了。在巴黎谈判中，它放弃了对莱茵边疆的要求，作为明确的交换条件是它将得到英美的保证。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威尔逊总统在巴黎被打败了，实际上他在华盛顿被打败了。是美国拒绝给法国以保证，结果使英国的保证以不了了之；是华盛顿拒绝参加国际联盟，是华盛顿不接受和约，并因此而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种。

然而，在这些年代里，人们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23 年在鲍德温时代，赔款委员会建立了一些专家委员会，道威斯报告就是这样产生的。1924 年 6 月，麦克唐纳和赫里欧接受了它的条款，召集了在 7 月开幕的伦敦会议。8 月，德国前来参加会议，并且达成了协议，不仅是为履行道威斯报告，而且也是为了从鲁尔撤军。这的确是一个建设性的时期。确实，到 1929 年由于美国投资开始缓慢下来，德国因而不能如期偿还债款，于是在赔款安排上做若干改变那是必要的。然而，1929 年扬格计划进行了某些适当的调整。在另一方面，1924 年 10 月国际争端和平解决草案在大会上得到承认。保守党人执政之后，立即拒绝了这个草案。一些人迄今依然感到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即使不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并且感到最后的和最好的加强联盟的尝试因此失败了。另外，很明显

大自治领国家将不会受这样一项安排的约束——它们甚至不会承担洛迦诺公约的任何责任——而且对于其他许多国家最终是否会承认这个公约也有怀疑。此外，如果这个文件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的话，那么它在事实上，除了关于向国际法院保证提出所有应受法院审判的争端之外，没有强加任何尚未被国际联盟的成员根据盟约第十六款应承担的义务。^①无论如何，在这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之后接踵而来的洛迦诺公约，似乎是寻求和平的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在伦敦召开的会议是一个历史上的特殊事件，奥斯汀·张伯伦在那里招待了白里安、施特雷泽曼和其他一些政治家，包括墨索里尼和贝奈斯在内。除了取得一致的几点之外，例如法国和德国西部接壤处边界的互相保证，以及英国明确承担的义务，洛迦诺公约的签字是一个真正的收获，并被视为英国外交上的一次了不起的胜利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尽管德国东部边界并未同样受到保证，但是大家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信任国际联盟盟约。洛迦诺公约签订以后，德国于1926年被接纳加入国际联盟。1925年，为了计划中的一次裁军会议，建立了一个预备委员会。尽管这暴露出了意见分歧，1928年的英法妥协也没有完全解决它，然而，普遍的情绪依然是乐观的。美国、英国和日本在1927年举行的海军三强会议的失败并不曾显示将成为一场大灾难，当塞西尔勋爵辞去政府职务以示抗议时，公众感到有点迷惑不解。最后，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非战条约做为国家政策的一份文件，除了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以外，对所有的人来说，似乎是人类努力和寻求和平的历史上的一个明确转折点。

因此，在这届议会中，人们将很容易看到，除了那些专门研究外交事务的人之外，除了外交事务中那些冲击着总的经济问题的

203

① C.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伦敦，1964），第181页。

方面,如赔偿问题以外,我们大多数人都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去了。在国外,我们感到相当放心。世界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还有许多挫折与障碍,但是总的趋势似乎是前进的。最极端的人物从法国政治界消失了,而更“欧洲式的”一些人士象赫里欧和白里安取而代之。似乎没有理由不看到目前的德国领导人,或者去怀疑他们的真正信义。英国外交大臣以其全部长期的经验和使其成为一位可以信赖的政治家的那种高度真诚向我们保证,洛迦诺精神将遍及欧洲。在这届议会结束后仅仅很短的时间,经济崩溃就到来了。紧接 1930—1931 年世界危机那场灾难之后,罪恶的幽灵再次被放了出来。

在这种情形下,议会和国家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事务方面。在这点上,鲍德温所采取的两项重要决定限制了范围;第一项决定在临近选举之前作出,第二项决定在政府组成的时候作出。基于他的选举保证,他不能提出任何普遍的保护贸易制度。这项诺言也不局限于食品。它同样适用于一项普遍的财政关税,或者适用于从总体说来的工业的保护措施。因此,在我们财政体系的这些方面的任何改变都被局限于重行征收所谓“麦克纳税”,这种税已经在前一年与英帝国国内商品特惠关税协定一起被斯诺登免除了;被局限在恢复关于任何现存税收的特惠关税,主要适用于干果以及其他类似商品的小范围内;最后,被局限于在“保护”这个标题之下出现的任何东西。如果曾经有过对于这些保证进行不那么严格认真解释的任何想法的话,那么任命终生都是自由贸易论者的丘吉尔当财政大臣,那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了。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怪现象。丘吉尔和斯诺登尽管在辩论中经常对立,而且有时对立得很厉害,但在财政和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方面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两人都是信心很足的自由贸易论者,并且他们都喜爱“正统”财政学。的确,正如斯诺登几年之后表现的那样,他

对社会主义逐渐幻灭的过程坚定了他对科布登^①主义的信仰。他们两人也都同意需要继续一项紧缩通货的古典财政制度。偿债基金被丘吉尔严格地坚持着，斯诺登也完全赞同。丘吉尔第一个预算的一个特色是1925年恢复金本位，它受到斯诺登的欢迎，并且得到议会中各党的普遍支持。的确，尽管在丘吉尔私人圈圈内流露出一些怀疑，但我记得顶多也就只是两三个议员，著名的有罗伯特·霍恩和布思比，在发言中反对这个决定。议会外面，在伦敦商业金融区以及各商业圈内，这一多年努力的顶点普遍受到赞扬。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副议长文森特·维克斯先生，他辞掉了英格兰银行董事会的职务，以示抗议。凯恩斯在经济学家当中是唯一的一位重要批评家。事后聪明并不难。然而，受到批评的金本位重建问题就不全是那样了。关于这件事，有些令人信服的论点。这是一个与其他国家的一般政策相一致的步骤，并且有助于促进在欧洲和世界重建一个有秩序的兑换体系。兑换率定为4.86美元一英镑，这是战前的平价，那就更不可靠了。使英镑“盯着美元”证明是一个代价昂贵的信义行动。

尽管接连几届政府的紧缩通货政策对于恢复金本位是默从的，并且得到恢复金本位的帮助，从而减少了国内的费用，并且对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助益，然而降低工资的做法相应地引起了长期而尖锐的斗争，终致酿成煤炭纠纷和总罢工。按照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大大地抵消了国内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好处，并且对于再调整的进程丝毫没有帮助。很难谴责丘吉尔采取了这个决定。毫无疑问，他感到盲目地遵循所有专家们的意见，对他来说，是违心的，勉强的。在他一生的任何时期中，这肯定不是他的天性，正如他在战时内阁时期所采取的更为重大的决定中所表现的那样。但是在彻底研究了一切论点，并且探索了问题的每一个方面之

^① 科布登(1804—1865)，英国的自由贸易提倡者。——译者

205 后，他很少——如果有过的话——拒绝他的技术顾问所采取的受过考验与持久不变的见解。在这一问题中就是如此。

然而，一方面在这些正统财政学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维持进口自由和普遍贸易自由，政府政策是积极而富有想象力的。它的首次迹象在 1925 年的预算中显示出来了。宣布恢复金本位和维持一个高额的偿债基金，全都受到了普遍的赞同。此外它还包括三个主要的建议。第一个是将所得税减少六便士，还对那些收入较少的人大量减轻赋税义务。第二个是重行征收麦克纳税。第三个是为寡妇、孤儿和老年人的利益而创立的津贴制度所拟大胆计划的大纲。这既是强制的，又必须尽的义务。它是同现行的国民健康保险和劳动赔偿以及失业保险方案相辅而行的。这样它就为走向全面保护制度采取了第一步，保护了工人阶级的人民群众使其免受易于遭受的所有主要风险。豁免捐税自然是财政法案的一部分，如同重新恢复的麦克纳赋税一样。津贴计划，尽管在预算演说中说得很响亮，但担子却落在内维尔·张伯伦肩上，他不得不根据一个长而复杂的法案去贯彻执行。

丘吉尔的预算演说在保守党内引起了极大的热情。除了实质之外，整个方案宣布时所采用的那种方式也很引人注目，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丘吉尔的被任命，在党内一些较老的议员中可能引起的任何疑虑不安都消除了。对于那些较年轻的议员来说，它仿佛是建设性改革时期的开始。1925 年 4 月 30 日，在预算决议的辩论中，我利用这个机会发表了我的第一次演说。除了在战时“爬出战壕进攻”之外，几乎再没有什么经历象这次那样惊人的了。的确，在许多方面，这两件事是很相似的。等待的时间很长，精神非常紧张。接着是那个不可改变的“进入战斗”。尽管督导员们和议长好心相待，常为一个年青议员安排好，通知在什么时候可能叫到
206 他，然而当这个时刻真正到来时，仍旧有一种茫然慌乱的感觉。你

同十几个别的议员站在一起，议长喊出一个名字来，你几乎分不清是否是你的名字。你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但是当其他人一个个都坐下来了，便可断定你现在必须上场了。你也许把演讲稿已经写了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你若呆板地照读稿子，这样你就违反了严格的议会传统；你也可能试图记熟讲稿，但一上场，你可能把它全部忘了。最可靠的办法是记提纲，记某些要点，还要记下几句你认为是最动人的语句。议会的桌椅排列很不好，当你站起来发言时，前面的凳子好象正卡住你的膝盖，这样就给你一个感觉，好象要朝前倒在地上。可是，你必须摆脱这些困难，才可以开场。大概再没有比照本宣科读旧稿，特别是自己的稿子，更为枯燥无味的了。那些演讲稿经常是晦涩难懂的，或者那些看来颇为引人注目的论点都随同过去论战的陈词滥调而消失了，而那些逗趣的话也似乎同上一代的已被忘却了的杂耍剧场的频嘴一样而平淡无味。但是，一个初次上台的发言无论如何会引起会场的某种兴趣的，人们都愿静听，不予打断，并大加赞扬，除非发言者公然不遵守议会的传统习惯。

在重念我的讲稿时，我发现，我比通常预期或准许的更爱争论了。但是，我希望回答反对党对主要预算建议进行的相当猛烈的攻击，并且要向政府显示一下这一预算建议是多么受到欢迎，特别是受到党的较年青的议员的欢迎。在向议会恰当地提出特殊要求后，我继续讲下去：

我们听过一篇前任财政大臣的讲演，里面充满了他惯常的手法，并且使用了大量他发言中惯常使用的尖刻语言。我并不因此而非难他，因为我认为，这一预算的提出，他是感到事情颇为棘手的，这很自然。当财政大臣在阐明他的建议时，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某些可尊敬的反对党议员们脸上的那种表情。最初，他们自然不得不洗耳恭听财政大臣将要说些 207 什么，但是他们立刻对他的建议的大胆及其分量感到吃惊，而最后，我认

为，当他们想到这些建议一旦在全国被接受时，他们是会感到惊恐和失望的。也许，从他们的观点出发，认为所有这一事情的可悲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对这一事情增添了一点困难。^①

当然，这里指的是新的津贴建议以及作为这个预算的主要目的为其提供的财源。然后，我相当大胆地继续说下去：

前任财政大臣常常表示，对于自己造成的创伤毒药总是更令人疼痛的，但是我们可以预期，对于这件事将使他更感到痛苦。^①

我然后转到麦克纳赋税上面去，这一赋税受到了自由党和工党批评家们的攻击：

关于麦克纳税，我知道工党和自由党都会对于它的重行征收表示不满，这是很自然的。正直的可尊敬的西斯旺西议员（朗西曼先生）说过，重行征收麦克纳赋税不是一项经济方面的而是一项政治方面的改革。如果可以的话，我愿冒昧地提醒他，麦克纳赋税的取消是一个政治步骤，它是由于试图巩固一下那个不太巩固的、当时存在于自由党人和工党之间的联合。它也掺杂着一定的经济学家卖弄学问的因素。^①

由于这些我打算以后提出的意见，与辩论的进行关系不大，所以我把话题回到斯诺登：

他说这是一个富人的预算，这话颇为轻率。你认为他所支持的免税政策影响着所得税交纳者当中所有较贫穷阶级的大多数，我认为那是在这届议会中做出的一个极为可笑的声明……关于豁免低级所得税这个问题，前任财政大臣说那是坐在他后面的那些党员们一直提出的一项建议，并且他确信他们不会反对这个他们当政时曾对之表示过同情的建议。这就是症结所在。如果这些建议是那些坐在他后面的党员们在他们仍然当政时提出来的话，那么一切还算万事大吉。他们表示同情，但从来不给以实际的支持，并且对整个预算情况也是一样。这个预算并不是就其真正的价值进行辩论，而是以一种十分偏狭的心胸去看待。照我的看法，这主要是由于反对党的情绪低落所致。^①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25年4月30日。

由于所有这一切都似乎进行得很好，我便鼓起勇气讲了一段我已准备好了的、但未完全决定使用的稿子。回顾起来，它竟然会是完全适当的，或者说，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党内我们这一翼的存在甚至能被承认。这对我来说，似乎不可思议，而事情确是这样。在休息期间，我注意到拉姆齐·麦克唐纳作为反对党的领袖发表了一篇演讲，他谈到了那些所谓的“青年保守党人”，并且呼吁他们从保守党转过来，加入真正的进步党派——工党。这自然使我们感到飘飘然，因为我们的存在甚至于已被人注意了；我认为这是一次不应错过的时机，因此继续讲了下面的话：

如果不是失礼的话，我愿意说说下面的事。反对党领袖在休息期间发表的议论中，向某些年轻的与比较进步的保守党议员发出呼吁，要他们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我很了解，当一支军队的将军认为一半人要叛变了，而另外的一半则多少处于一种消极失望状态的时候，他是希望得到一些新兵的；但是我可以向他保证，假如他认为我们这些人既如此年轻又如此没有经验，满可以使我们落进他那个笨拙的圈套，那就未免太误解民主保守主义的道德原则和理想了。他完全不懂得那些理想和原则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以为他和他的党只需要把一种乱七八糟的杂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开胃品，部分地由被驳倒了卡尔·马克思的经济观点的渣滓所组成，搀和着一点科布登主义的风味，被前任财政大臣很好地上面加上了冰花，并加上了一点戈伯尔派议员（布坎南先生）的姜末，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向我们提供就行了——如果他以为这就是要给我们焦干的喉咙的一口酒，并且以为我们会乐意接受它的话，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①

接着我回到主要问题上——重大的津贴法案以及支持这一法案的预算建议——说了这样一些话：

在这个问题上可尊敬的反对党绅士们陷入了困境之中。他们还不很确定是否要采取这样一种方针，即：正当他们极端不能自制地去在俄

209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25年4月30日。

国阴谋诡计的浊水中洗澡的时候，是说我们正在偷走他们的衣服呢，还是他们自己说衣服并不怎么好。他们尚未拿定主意，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承认这些建议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对此我十分确信，对于我和对于许多别的同我持相同意见的人来说，虽然我们是一群年轻的、新到来的、没有经验的党员，但这样的一个预算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而且我们申言，这一预算表明，当保守主义忠于自己的时候，什么是保守主义能够做的和它一向所做的。^①

当我结束发言时，掌声四起，随后的发言者向我作了一般的祝贺。全国性的报纸既称赞，又表示友好——从《泰晤士报》到《每日镜报》。地方报纸则非常热情。我的朋友们都大加赞扬。我等了五个月；我算熬出来了，在这次演讲——我的初次交锋——中，我达到了我的目标，安然渡过，同过去某些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的初次演说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名声。我开始写文章投稿，论述住房和地方税额改革问题，通过报业辛迪加在许多家外省报纸上发表。那些关于住房的文章论及到许多在二十多年以后变得对我那么熟悉的问题——包括消灭贫民窟以及打破常规的快速建筑法。在查阅一篇1925年9月投给一家地方报纸的稿子时，有一句话是我1951年的口号：“住房问题不是什么保守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人道问题。”

在寡妇、孤儿和老年津贴法案提出的同时，张伯伦在议会里提出并贯彻执行的地方税额和定价法案，使我把注意力集中到整个地方税额问题上。在这个大胆的改革当中，打下了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结构的基础。这是政府未来工作的关键，因为若没有它就不会有地方政府的改革，也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住房政策，或一个将救助失业和贫穷的费用从总体上说在全国展开的适当方法。因此，我那些广泛发表的文章便集中论述那些不公平的事情：如那种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25年4月30日。

将最沉重的负担压在最无力承担它们的地区，和压在形式过时、效果不定需要改造的定价制度的地区，这无论是在党内，还是总的说来在全国，都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方针。地方税收当局从一万五千多个减少到二千个以下，在地方上引起了许多反感，尽管这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变革，如果地方税要实行划一的话。任何扩大的体系，或者通过一次定额拨款或者通过别的办法，都依赖着这个定价的统一或定价的合理统一，这样对较为贫困的地区便能有所助益。老的济贫法管理员的消失也不受人欢迎，因为许多人担心新的当局的同情心将不如老的。结果是，新的和不可避免的较高的定价在1929年大选前不几天公布了，这一事实同其他因素连在一起，造成保守党在竞选中的失败。这些就是进步的惩罚。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发表演说，我都是这一切政策的热心支持者。

除了这些活动之外，我在1925年6月被邀请去伊斯特本参加一次补选，在那儿我就保守主义的原则发表了一次演说，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因为某种原因，《泰晤士报》对我那篇演说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报道。另外，他们的记者在评论这篇演说时写道：

伊斯特本的想象力受到了麦克米伦上尉的一次非凡演说的触动，他是青年保守党员之一，他以他那罕见的才智和清新精神的一系列演说的初次引起了下院的注意。我有这样的想法，他所重新提出的所谓保守主义的真正基本原则，很可能证明是这次选举中突出的问题。

我担心我所说的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我所说的只是迪斯雷利的“青年英格兰”加上沙夫茨伯里、约·张伯伦以及所有其余的人一些主张的混合物。但是出人意外地似乎在那个惬意的海滨胜地引起了反响。《泰晤士报》记者还说：

在这个季节和这种气候里，伊斯特本是一个沸腾的南方海滨的游乐城市，但即使如此，那里对麦克米伦上尉的演说的评论还是显示出，人们对政治投机和试验并不是不喜欢的。

211 怀着同样的心情，我在樱草会^①的圣乔治聚居地重复了同样的感情，获得了同样的成功。这使我相当惊奇，因为迪斯雷利传统在理论上尽管受到尊敬，但实际上，那时在樱草会的成员当中并不怎么处于支配地位。幸亏自从那时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种写作和演说，加上6月在关于贫困地区的辩论的一次小的介入，除此之外，经常去斯托克顿访问，还有我自己在出版事务中的日常工作以及正常的家庭生活的乐趣，这一切使得我整个夏天很愉快。然而令人不安的阴云正在聚集。1925年的预算同所有减免赋税和给人民以其他好处的预算一样，开始受人们欢迎，但不久就开始对它逐渐淡漠了。正如我从那时以后所了解的，人们对于好处是不会拒绝的，但是不久这种好处就淡忘了。津贴法案当时被当成一项完美的改革受到称赞，但再过两年，谁也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当时失业数字继续上升。虽然总的就业人数增加了，关于青少年就业情况也相当令人满意，但长期失业的人数却在增长。因此商业萧条似乎在加深，在议会夏季会期结尾时，煤矿罢工好象就要来临。大量的补助金赢得了时间进行了一次调查，但危机仅仅是被推迟而已。11月末，对失业问题进行了辩论。汤姆·肖展开了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我在督导员们当中的名声仍然良好，我被推举来进行答辩。《泰晤士报》把我描绘成能够“彻底地仔细分析它”，这是奉承。但是尽管我准备竭力攻击劳工部前任大臣，因为他徒劳无益地试图对那些在他任职期间把他搞得非常不舒服的人们进行报复，但我不想满足于仅仅发表一次演说。我第一次提出了一项政策，在议会的整个其他时间我继续为之斗争。我的主张是：保险应被限于这样的一些情况，即要有一个真正的保险制度，并且不应把基金无限期地去补助那些身强力壮的雇员，如

^① 樱草会，1883年为纪念迪斯雷利(1804—1881)而建立的政治协会，宣扬他的保守主义。——译者

果他们已从他们和他们雇主所拿出的捐献中将所产生的、由保险统计员计算出来的要求补助的权利已经耗尽很久的话。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不应被要求为此负担而另行捐款。保险不应置于济 212 贫法之下，济贫法仍然由地方管理和支持。必须有一个全国救济的新措施，并且在全国范围进行。我同样坚持，在这样做之前，除了放宽保险的严格规定之外，别无他法。但这是一个坏的抉择。它是由被保险人自己、由他们的雇主、以及在甚至不再得到契约保证救济的地方由纳税人支付的。然而，它完完全全地是一个全国性重担，应当在全国范围内负担。这些见解得到大多数报纸的友好评论。政府自然并没有过分地进行干涉。他们推进他们的措施以增进基金的借入能力。任何更为全面的、更为合乎逻辑的方案是未来的事情。可是，假如说我知道的话，内维尔·张伯伦和丘吉尔的积极的头脑，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了。

当时，煤炭工业象过去一样，如此经常又一次成了经济与政治冲突的中心。战后的头几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煤炭的需求都是良好的。但是随着萧条的开始，特别由于影响了重工业，国内需求开始下降了。同时，法国和比利时的煤矿产量逐渐开始得到恢复。可是，法国对鲁尔的占领以及随之而来的静坐罢工，对英国煤矿业来说，是一笔突然而来的横财，煤炭在国外大量销售。单只这一因素就支撑了 1921 年制定的三年工资解决方案。1924 年一项新的对于劳方更为有利的协定被资方接受了，但真是一种奇怪的嘲弄，麦克唐纳竟劝说法国撤出鲁尔，并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把英国煤矿业在其占领期间捞到手的好处又丢掉了。此外，1925 年夏天按平价恢复金本位给煤炭出口强加了一个进一步的障碍。新的工资结构不能维持了，1925 年年中资方通知予以结束。舞台似乎为一次罢工准备停当了。这次罢工将可能得到其他重要工会的支持，并且将发展成为某种总罢工。矿工们坚定地提出了他们的

口号：“工资一个便士不能少，工时一分一秒不能多”，经过长时间
213 谈判之后，政府最后同意，在一个新的调查将对工业的整个未来进行考虑期间，付给必要的补助金。在这个基础之上，劳方代表同意同计划中的委员会进行合作。补助金预期约为一千万英镑。事实上，金额达到了二千三百万英镑。这本身就是一个形势恶化、国内外煤炭需求下降的征兆。因此，罢工在最后一分钟——1925年7月31日——被防止了。议会休会，我们大多数人把这些烦恼抛到脑后去了。可是，它们在几个月的耽搁之后又突然向我们袭来，并且用了一种戏剧性的方式。

调查被委托给一个皇家委员会。赫伯特·塞缪尔爵士同意担任主席。他的同事们是一些有才华的知名人士：赫伯特·劳伦斯爵士，他是一位银行家，以前是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参谋总长；威廉·贝弗里奇爵士，一位已经出名的行政管理人員和经济学家；以及棉花大王肯尼思·李先生。

他们的报告在1926年3月发表。对于煤矿工人联合会所强调的问题中的大部分，他们都赞同工会的论点。他们支持桑基委员会已经建议过的煤矿开采权国有化，但是甚至1924年的工党政府仍未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热烈赞成大规模的工业改组，但是在私人所有制之下，而且也没有任何全面的强制办法。为了取消没有希望的浪费单位和在工业结构中保证普遍的改进，他们力促煤矿企业合并。还有其他一些有关研究和分配的论点，并且建议政府在这些领域内给予援助。另外，他们提出许多措施，希望通过这些措施改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例如，煤矿委员会、家庭津贴、分红制、建设更多的煤矿井口浴室、工资照发的假日（当经济情况允许时）、以及各种鼓励生产的其他方法。^① 资方不喜欢所有这一切，并且顽固地坚持他们自己的一切不加变动的立场——只有工资是

^①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298页。

例外,那就是必须减低。紧迫的问题仍未解决。如果补助金取消了, 214
并且塞缪尔委员会强烈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补助金重复出现,工业
将怎样继续下去呢?没有人否认利润的赚头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
失,同时,每个煤矿现在都在蒙受损失,或许约克郡和诺丁汉郡一
部分除外。因此,为了弥补这一差距,必须对工资做出某些牺牲。
但即使在这方面委员会也尽其可能帮助工会。他们反对增加工
时;他们赞成全国协定而反对地方协定;他们建议在实际工资缩减
之前,关于改组工业和改进工业效率,应有一个真正的协议。

无论是资方还是工会,都对这份报告无动于衷,仍然顽固下
去,可以说达到了愚钝的程度。煤矿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赫伯特·史
密斯只能不断重复同一口号而已。组织秘书库克更为聪明,但更走
向极端,采取同样顽固的姿态。在3月11日报告的发表与全国在5
月3日陷入总罢工这一期间所进行的漫长而错综复杂的混乱谈
判,出现了大量的文献。自然我们后座议员只能在报纸上读读报
道,以及偶尔听到一些流传于议会走廊里的流言蜚语。将近4月
底陷入僵局以后,还有人告诉我们大有希望找到一种方案,在政府
赞助之下重开谈判。据信鲍德温和伯肯黑德为解决问题特别卖
劲。他们进行了许多尝试,以找出一种合适的措词,不仅职工大会
的工业委员会能够同意,而且煤矿工人联合会也会认可。

煤矿工人联合会的不妥协态度迫使其他工会的领袖们发布指
示,要举行一次总罢工来支持煤矿工人。这是人们从来就知道的
为解决煤矿争执失败后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后果。5月2日星
期天夜里在唐宁街最后的谈判破裂后,总罢工发生了,情况多少有
点含糊不清,现在依然没有弄清。

当我们5月3日星期一下院开会时,气氛很紧张。鲍德温解 215
释局势时,语调温和,斟酌再三。我倾听了这一发言,也细心听了
铁路工人全国工会著名的、杰出的书记J.H. 托马斯的发言,他

也是小心谨慎地说得合情合理。劳合·乔治对工业上的同情罢工和胁迫政府的总罢工之间所作的区分似乎是有点诡辩，这没有使下院满足。既然每个人都同意，在不减低工资的情况下，避免总罢工的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继续发给补助金，这似乎是相当特别的申辩。第二天，鲍德温在一个委员会办公室里向保守党议员大会讲话，在讲话中间他提议工业选区的议员可以在本周末到那儿走走，看看情况进展如何。我遵循了这一意见。星期三有一次关于紧急法规的辩论，在辩论中托马斯对于星期天夜里谈判结束的真实情况的透露使得许多保守党议员大为心烦意乱。他声称政府趁着发生在《每日邮报》办公室内的一次罢工就宣战了，而他和他的同事们则仍然想寻求一种和解方案。辩论进行了长时间以后，鲍德温解释说，印刷工人工会的直接行动标志着总罢工的开始，并且告诉大家总委员会已经失去了控制。政府在总罢工的威胁之下，在谈判中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外，煤矿工人十分清楚地表示，工会理事会除了谈判之外无力做任何事情。他们能够谈判，但是他们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没有一个方案具有任何价值，如果没有煤矿工人联合会表示同意的话。

这是教人放心的，但是我注意到达夫·库珀在他的日记中使用了这样的话：“我仍然认为政府过分急于停止谈判了。”^①今天来判断是非是困难的。肯定说，大臣们感到他们已经让步到家了。

216 第二天西蒙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演讲，断言总罢工是违法的。这在议会内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久以后法官阿斯特伯里先生在高等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中支持了它，这一事实增加了它的影响。

这些天来几乎不断地进行辩论——或者关于紧急法规，或者关于休会问题。下院的普遍调子和情绪是认真负责和给人以深刻

^① 达夫·库珀：《老年人忽略了》（伦敦，1953年），第150页。

印象的。除了工党极左翼之外，发言者都力求公正和温和。不管参加斗争的某些工会会员的见解将是怎样，很明显那些头头们深为烦恼，并且象其他每个人一样，切望寻求一项解决方案。离现在多年了，已经读了发表过的许多材料，但是仍然没有一幅清晰的图景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可以肯定，在内阁内部如果没有意见分歧的话，至少心情是不同的，这正如在工会运动内部一样。某些大臣可能欢迎《每日邮报》事件，以结束政府正在继续陷入的那种形势。这种形势越来越危险了。政府有被指控为在最后通牒面前屈服的危险，并表现犹豫不决，如果不是软弱无能的话。毕竟，罢工在几小时之内就要开始了，为了要使国家生命能够存在下去，必须采取措施。然而，鲍德温在伯肯黑德支持之下毫无疑问奋斗到最后一刻，力求找到一种方案。别的那些人，其中最重要者大概是内维尔·张伯伦和霍格了，他们或许认为游戏玩得时间不短了，并且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结束这个捉摸不定的局面，要正视问题。在工会一边，托马斯、普格以及所有其余的人都力争从煤矿工人领袖那里获得某些让步，不管是多么小的、多么谨慎的。他们完全没有做到这些。他们的同事们仍然顽固不变。

回顾所有这一切，很清楚，这场悲剧性的冲突是由于双方的所谓“盟友”不妥协态度而无可奈何地才发生的。象历史上许多国家间的战争一样，这场内战本来是能够避免的。如果资方毫不含糊地接受了塞缪尔委员会关于改组工业的建议，如果政府立即实施这一建议——假如他们沿着强迫统一的路线走得甚至比实际报 217 告更远一些的话，那就更好了——那么煤矿工人联合会精神上的地位将会大大削弱，而工会代表大会的领袖们的控制将会得以加强。但是保守党舆论对于国家如此严厉地干预工业，尚未有所准备。同样，其他工会领袖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进行任何改组时所需要的那个时期——至少六个月的期间，或许甚至

一、二年的期间——必须在工资结构方面做出某些让步，以便使工业继续下去。其实是，尽管当时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它，全国工会会员所感觉到的辛酸痛苦越来越厉害了。只是全体人民良好的本能和传统使得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件发生而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害，的确连一条生命也没有丧失。自然，政府利用补助金赢得的那个时期，利用得相当有效。一个全国范围的组织建立起来了，把基础放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地区结构上。在欣然前来的志愿者们的帮助之下，人民有吃有喝，生活过得相当舒适。从这点看，把日期选在5月初那是再幸运没有了。天气很好，有一种假日气氛，至少开始时是这样；许多人都为从事新的令人激动的工作而快活得不得了。国会议员们成了搬运工人和列车员；有些人甚至去开火车头。大量的各阶层的男男女女当了公共汽车售票员、卡车司机、小卖部帮手，等等。主要的服务事项就这样进行下去了。一般相信，许多人在这个工业部门罢工，在另外的行业里却自愿干活。然而，幸亏总罢工统共只进行了九天左右的时间，假如斗争拖长的话，双方情绪肯定会恶化起来的。

听了鲍德温的意见，我于星期五前往提兹河畔。我的朋友和邻居伦纳德·罗普纳是塞吉菲尔德的议员，他为我开着一辆敞篷汽车高速前进。我在斯托克顿呆了两天，星期一又循公路返回。在
218 斯托克顿我发现市长和那些志愿组织都在艰苦地工作着，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件。可是矿区附近各村，有一种相当紧张的气氛，并且发生了许多小“事件”，经谣言一传就夸大了。某些人自然大肆“渲染”，认为革命就要发生了。我驾车偕同市长前往纽卡斯尔，地区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那里。我们打算同主管人金斯利·伍德谈谈。电力有困难，但一艘潜艇的全体船员即将到达。然而，在整个东北地区一切似乎是相当平静。我没有感到什么忧虑，但是在我们自己人民的两部分之间竟出现这样规模的冲突，使我感到颇

为伤心和丢脸。战争够糟糕的了；象内战那样糟糕的事则更要坏一千倍。但不管怎样，我记得，斯托克顿的警察甚至同那么最易激动的罢工者之间很明显关系却是良好的，这从警察的平静态度上可以看出来，这特别使我感到欣慰。我走进办公室去看警察长，象我经常习惯做的那样，问他生活过得怎样。他是一位巨人，身高足有六英尺以上，四肢发达，一双非常有力的手，在和你友好地紧紧握手后，你会感到相当疼痛。当我走进时，他正在打电话，抱歉地叫我等一回儿。我记得他这方面说的话（他正在同他在达勒姆的同事交谈），大致这样：“啊，他们拦住了一列火车，在——，并且把几节车厢推翻到路堤上。现在谈谈下星期四的警察音乐会吧。我很渴望上次被放在第二号的那个姑娘能有一个更好的位置——我说在下半场吧——她演唱得好极了。啊，他们推翻了一辆有轨电车，拦住了一些公共汽车，在——。对，我想我们会很好处理的。可是关于音乐会呢。我差不多已把我们所有的票都卖完了，如果你有剩余的，还可以多卖一些。”我倾听着他们的谈话，感到愈加钦佩。他们这段谈话使我信心倍增。

关于那位警察长我还有另外一段回忆。在一次大的公众集会上，当我的妻子同我正一起通过拥挤的入口进入会场时，一个男人喊出一声无礼的、十分猥亵的下流话。我看见在附近逗留的那位警察局长用手套抽了那人的脸一下。几个月后，我因事有机会去 219 看他，想起那件事来。我问那个人是谁，他出了什么事？“滑稽，你竟提起那件事，先生”，他回答说。“你可能难以相信，先生，那个家伙第二天前来向我诉苦，说我敲掉了他几个牙齿”。你怎么回答的呢，警长？”“你问我怎么回答的，先生？啊，我对他说，‘算你幸运了，小家伙，我的手没有套在手套里呢’”。

在前往北方之前以及我回来之后罢工延续的那几天里，每天晚上在议会散会以后，我便到印刷厂广场去帮助包装和发送《泰晤

士报》，这些报纸是由志愿劳动印制出来的。我知道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并没有干很多活，但我们却受到了厂方极其厚道和殷勤的款待，并且获得了最近的一切消息。另外一些更富战斗性观点的议员，他们到《晨邮报》报社去执行同样的任务，这个报社已被丘吉尔接管过来发行《英国公报》。丘吉尔象我们当中任何人一样，对导致罢工的那种局势叹惜不已。做为财政大臣，他非常乐意提供原来的补助金，希望避免争执。当总罢工结束时，他成了一位在悲惨的几个月里热心提倡和平的人，当时煤矿罢工拖长到那年12月。然而，在实际总罢工的那些日子里，如同他一贯的性格，他在争论中是一位积极而自信的参加者。《英国公报》发表的某些声明人们认为是不明智的、挑衅性的。但是丘吉尔认为，处于战斗中，政府最好是赢得胜利，并且越快越好，尽管他并不喜欢这种战斗。关于他的这种见解有些事以后还会讲到。

总罢工终于在5月12日宣告停止。职工大会的领袖们到唐宁街去了，同意立即结束总罢工，“以便进行谈判”。鲍德温回答问题时，向他们表明，随后向下院表明，他将尽一切努力去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解决煤炭问题的方案。当他走进下院时，我也在场，他在那儿受到了很大的、理所应得的欢迎。他仅仅说了几句话，但很得体，温和而感人。然而，他那早日解决煤炭问题的希望却是要落空了。

只要总罢工是一次胁迫议会的企图，它在一个很久以来习惯于立宪政府的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整个说来，因公众反应而得来的荣誉大部分是属于鲍德温的。这对于他是一个胜利，一次个人的胜利。如果不是因为普遍信任他的公正感和他的光明正大的品质，即使是那些温和的工会领袖们也会发现他们自己将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境地。的确，尽管总的来看人们——罢工者和非罢工者——脾气很好，但假如罢工再持续两个星期或者甚至一

个星期，那么形势很可能发展得非常险恶。但是职工大会的领袖们相信，鲍德温的心意是诚实的，而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确实很焦急，害怕总罢工延长工人松乱，他们控制不了。以同样的精神，当一个令人烦恼的局势在5月13日开始发展时——就是第二天——还是鲍德温帮助使局势平静下来的。许多人回去工作时发现不给他们工作，或者给他们的条件与他们罢工时已得到的条件不同。因此，类似的第二次总罢工开始了，下院各方一致对于那所谓的普遍遭殃表示厌恶。温和的工党领袖们受到很大压力。我们党同样感到关切。鲍德温再次采取了一个坚定的立场，反对任何利用重新雇用罢工者的时机来减少工资、延长工时、或者恶化工作条件的企图。这使下院得到安慰。第二天我们得知，当时同码头工人、铁路以及其他工业方面，即将达成协议，因此，工作逐步趋于恢复。总罢工就这样结束了——一段极端不幸的经历。关于这件事最值得称道的，也许是人们普遍下定决心，不允许这种事再发生。而迄今为止，的确没有发生。

劳合·乔治曾经说过，鲍德温是一个权迷；他将权集中起来，积聚起来，但是从不动用它。的确，这是对鲍德温在总罢工失败以²²¹后的无所作为所做的一个公正的批评。他在全国的地位无比强大。他受到各方面同情与各行各业男女人士的信任。假如他提出一项明确而简单的纲领来结束煤炭争执的话，他能够毫无困难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的党和议会。他坚决信守他在总罢工期间和罢工过后发过的誓言。他在议会里和在广播中都同样那么明确肯定。但在当时，象在其他时间一样，一种奇怪的倦怠似乎征服了他，几乎象是精神和心理特别紧张而引起的体力方面的后果。根据他的诺言，他确实毫不拖延地把两方面拉到一起来了，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包括一项全国性协议——通过谈判减低工资，而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原样不动——以及建立一个在一位独立的主席领

导之下的全国工资委员会。他提出来一项三百万英镑的拨款以渡过难关。而同时正在做出一些新的安排。关于塞缪尔报告的其他一些建议,他答应将几乎所有主要之点向议会提出法规,但完全删去了特许权的国有化。劳资双方即时的反应都是使人失望的,这正如他所能预期到的。但是,鲍德温满足于一个严厉的谴责。他不想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恰恰相反,就政府承担任何立法而言,那就是暂时停止七小时法案,并且仅仅是促进,而不是强加各种关于煤矿合并与改进管理方面的建议。暂停七小时法案将使矿井中的法定劳动时间从七小时增加到八小时,这引起了极大的怨恨,尤其是因为它不是赫伯特·塞缪尔及其同事们所建议。我鼓起勇气在许多保守党议员中间,其中包括一些大臣,散发了一份短短的备忘录,关于应该做什么提出了我的见解。我现在还存有这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合并应当强制进行,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开采煤炭的权力可以由一个煤矿企业强制取得。我敦促政府现在应该提出自己的建议,广泛地以塞缪尔报告为基础,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盲从地依附他。对于一个非内阁成员的下院议员来说,这是一个颇为大胆的步骤,但是我在党内和某些大臣那里得到了很大的支援。可是,政府满足于立法——关于时间和改组两方面的——而这不能导致一项一致赞同的解决方案。资方表现得较通常更为固执和残酷,甚至干脆反对政府干预工业,特别是煤炭工业。

夏季几个月过去了,政府重又陷入一种明显的冷漠状况,不想结束争执,或者创造一个较好的工作条件。我们当中一些人草拟了一项对处于委员会阶段的煤矿工业议案的修正案,它尽管没有走得象官方工党修正案那样远,但建议通过向铁路和运河委员会呼吁,在进行仔细、独立的审查之后,搞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强迫统一计划来。这项修正案是莱斯利·斯科特爵士提出来的,他和我

紧密地在一起工作；这一修正案还得到了艾尔弗雷德·蒙德爵士的支持，他在工业问题上的见解从来都是进步的。可是，他的见解在委员会中被拒绝了，这个机会竟让它从我们的手中溜掉了。在夏季期间，当鲍德温在度假时，丘吉尔竭尽全力把双方弄到一起。他似乎准备大胆前进，并且以暂时停止最近的修正案为威胁来压制资方，这项修正案把容许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八小时。然而，毫无疑问，因缺少他的同事们的支持，他被迫退却，从而给政府和党的声誉带来了恶劣的后果。这一缺点特别使 1924 年曾支持过我们的那些温和的选民感到厌恶，而这些人同情对下次选举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争执就这样拖下去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争论的确从来没有得出任何准确的结论。煤矿工人越来越顽固，资方也是如此。最后，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地散了伙，逐渐达成一些地区协议。雇工们都绷着脸不高兴地溜跬回来干活；一次重大的机会被错过了。

所有这一切使得我和我的朋友们再次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在现代条件下工业与国家之间的正确关系的问题上。保守党从整体来看似乎吸收了自由党旧的放任主义概念。可是，有大量的、不断 223 增多的人们，特别是在党的青年人中间，对于这种空谈理论的态度不耐烦起来了。这年(1926年)9月，我就政府对于工业的作用发表了一次演讲，并呼吁对此给予新的解释。这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报纸上描述说，劳合·乔治倾听了这次演说，并明显地表示赞同。但是赞同的决不仅他一人。当然，我们运动的目标是试图对于政府、资方和工会之间整个关系问题进行更有建设性的讨论。它呼吁要认识工会的重要性的和发展工业中的伙伴意识。我们认识到，除了电力工业之外，还有别的一些企业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搞某种形式的公共控制了。我们也恳请发展仲裁与调停的法定方案。《新政治家》报道说，我们的观点“在内阁中有一些同情者。鲍

德温先生的主意人们猜想是举棋未定。”但是在当时，无论如何这些努力证明是失败了。在年终时，杰克·希尔斯少校和我写信给《泰晤士报》，论述“工业和民主”，结果招来大量来信，大多是赞同我们的观点的。但是报界大都抱敌对态度。《晚旗报》攻击我们，也同样批评那些写信支持我们的人，因为表示的意见“同工党政府的前任财务大臣威廉·格雷厄姆先生的思想流露在本质上是难以区别的。”别的右翼报纸也不赞成。

做为这些辩论的一个结果，这年冬天我们的一个小组在这些问题上开始了进一步的工作。结果我们写成了一本名叫《工业与国家》的小册子，并在1927年4月出版。^①现在要是试图陈述这本小小的、谦逊的小册子中的一些主要论点，那就令人厌烦了。实际上，这是第一次企图在纯粹私人企业和集体主义之间设计某种连贯的体系。这是一项后来我称之为“中间道路”的政策；这是一种在战略上国家广泛控制、而在战术的运用上则置于私人经营之下、私人所有制同公共所有制并行的工业结构。我们请求至少在某种工业内给予某种形式的集体买卖以法定权限，按照1921年法令中铁路所采取的方针。我们提倡扩大联合工业委员会，并扩大其已经增加了的权力，在合适的地方扩大劳资协商会议。另外一些事情涉及到一个经济总参谋部，以及将某些地方税的负担转移给国家财政部。内维尔·张伯伦给我写了我已提到过的那封友好的信，就是关于这本书的。其他的一些评论自然并不是如此表示赞同的。《星期日画报》那时似乎鼓吹极端右翼保守主义（也许是老式自由主义），它这样描述我们的小册子：“它所鼓吹的不过是或多或少轻轻地加以掩盖的社会主义。”《约克郡邮报》把它称为“一个未经公认的纲领”。《每日邮报》惊叹为什么“这些先生们在保守党内依然赫赫有名”。《泰晤士报》比较友好，说这本小册子“写得

^① 几个署名者见本卷原书第173页。

令人钦佩，其主导思想是真诚而不轻率地竭尽全力将那些陈腐的偏见和口号丢在一边”。

总罢工的不幸岁月促使我们去试图发现某种建设性的代替社会主义的办法。在以后十年中，我用种种方法试图同各式各样的友好团体，以及不同的组织和运动，通过书籍、小册子、讲演去宣传这个主题。事隔四十年之后，当时看来好象是幻想的东西，现已变成平凡的事情，并为人们广泛接受了。潮水确实向前流动；虽然我们仍然在同现在人们称之“混合经济”的那个问题在搏斗，但是国内所有的党派事实上都已经把这个观念当做象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所必需的实用基础接受下来了。被采用的许多方案，都是遵循着我们尝试性地、无疑带点外行味道地试图探索的总方针。

整个冬天据说内阁都是在讨论劳资争执法案的细节，这个法案作为总罢工的一个结果是很必要的。人们相信某些人支持一项有限法案，它只限于宣布一下总罢工是非法的；另外一些人则希望将涉及工联主义力量不断增长的各个方面的许多条款都包括进去。还有另外一些人，象现在我们从内维尔·张伯伦的日记中得知的²²⁵那样，希望提出一项性质上不完全是消极的、而包括某些更有建设性因素的议案。党严重分裂了。唯一取得一致意见的就是必须要有某种法案。

今年春天，在批准华盛顿八小时工作日协约这个议题上，党的两翼之间发生了初步的争论，对此政府采取了一种拖延策略。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别的事情上一样，我觉得自己和那些平常不参加我们小组实际工作的议员们搞在一起了，他们是阿斯特夫人和亨利·本廷克勋爵；后来，一些议员象罗布·赫德森、特伦斯·奥康纳、罗伯特·纽曼爵士、卢克·汤普森、威廉·萨格登爵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同样开始在失业这一紧急问题上以及在保险制度的作用方面，进行鼓动。在华盛顿协约这个问题上，有关的大臣阿

瑟·斯蒂尔—梅特兰处于困难的地位；他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并且也不很善于讲话。我在他之后发言，我很怕自己说出这种话：“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演说并不意味着有任何特殊的含义。”杰克·希尔斯和站在我们一边的其他一些人参加了对大臣的批评，并且在1927年2月和3月就这个主题进行的两次辩论中，政府受到无情的对待，经受了《经济学家》所谓的“一位劳工大臣的几乎是可怜的吞吞吐吐的辩解”的痛苦。阿瑟·斯蒂尔—梅特兰是位具有相当魅力、学究式的知名人士；但在演讲时一般说来至少是不够连贯，思想混乱。他是这样一位大臣，用心是好的，但是过于听从他那个部门的意见了。不论在内阁中还是在议会里，他都按旨宣科。这不是大臣们所赞赏的。

1927年5月初，劳资争执议案终于提出来了。它的主要条款如下：宣布非因劳资争执而罢工者仍被雇用时的任何罢工或资方封闭工厂，都是非法的，企图或策划通过使社会遭受苦难以胁迫政府的罢工或资方封闭工厂，也是非法的。这样作法是想防止总罢工再度出现。但这似乎将这个禁令扩大到了任何形式的同情罢工。它宣布恫吓是非法的。它将工会提出的在任何国家征集的“退出合约”用“订立合约”来代替。它防止确定的公务员将来参加任何其他组织，而只能参加他们自己的工会，这些工会是保留给王国政府从业人员的。^①

这些条款使我以及那些同情我的人，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毫无疑问，某种形式的立法是需要的。我在二读议案时发言，并总的主张必须给予这个议案以广泛的支持，但它不应当单靠它自己行事，它必须伴以一个进步的社会改革纲领，以及一个贯彻建设性精神的改造工业的方案。我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任何政治行动，无论是行政的还是立法的，都有两重性。它有两种

^①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336页。

反应，人们经常需要从两种观点去考虑。第一是你所做的，或通过行政方法或通过法案……除此之外，还有次要的后果，其性质更为广阔，影响更为深远，它更难解释，但把这些后果看作同直接的和首要的后果同样重要，正是有政治家眼光的人们的责任。^①

我继续说道：

……法案的一些重要意图，其用意是想使总罢工成为非法的，想防止恫吓，想防止为了政治基金而向那些不愿捐款的人收集款项，在我看来，这是能为通常的明智的人们所接受的。但是，可能有人会说，或将来有人要说，还有次要的后果。反对这个法案的真正论证……那是由许多反对党议员提出来的，向那么明智和富有经验的政治家格雷勋爵发出呼吁的论证，并不是说这个法案的意图是错误的，不是说法案的条款是要不得的，而是说对于处在目前特殊情况下的我们工业结构的那种微妙形式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心理影响，很可能是坏的，对于社会福利很可能是危险的。^①

我回头讲讲 1925 年关于国家征集的麦奎斯顿议案，^② 以及鲍德温要求议会拒绝这项议案所作的精采演说。当时他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我要求议会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不要先开第一枪，不要引起一次骚动，它可能是与工业安定背道而驰的。

他就在这次演讲结束时提出了这样的呼吁，“让上帝赐我们的时代以和平吧！”我继续辩论说，我们确实没有先打第一枪；总罢工的影响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都使得现在采取某些行动成为必要的了。²²⁷ 关于那些次要的后果，我做了如下的答辩：

……公众，归根到底，那些不属于一定政党的温和派人们，依我看来，将不会宣称这个法案的一些条款是错误的或不公平的。但是那些次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27 年 5 月 2 日。

^② 这项议案体现了工联主义者在有义务资助一项政治基金时以“订立合约”代替“退出合约”这一原则，1925 年在鲍德温的提议下该议案遭到拒绝。它的原则为 1927 年法案所采纳。

要的后果将不大可能取决于法案本身，而是取决于通过法案的那种情绪，取决于执政党所推行的政策纲领……如果这个法案是一次总的向右转的序曲的话，如果它意味着反动政策开始的话，那么我便不得不承认这意味着我有幸成为它的一个成员的那个党的末日的开始，这也意味着温和的反对党所有成员的末日。它意味着所有的政党都被极端分子所俘虏。但是假如保守党继续推行它的纲领，把这个议案通过成为法律，坚持它重新执政时的那种精神，在它当权时期支配它的领导的那种精神；假如它泰然自若地推行自己的纲领；……假如它对于许多赋税和财政问题、社会和道德问题、国际改革问题、华盛顿协约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不愿采纳一项大胆的政策；假如它以那种精神继续稳步前进，而选民们则必须判断一下这是否是一项以反动精神通过的报复性法案，或者判断一下这是否是以真实的愿望将真正错误纠正过来而通过的一项明智的法案，那么我就毫不怀疑，选民们裁决这个法案将是正当有理的，裁决它通过成为法律是明智的。^①

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方针，但它至少是诚挚的。在总罢工以后党在全国作为整体是要求某种行动的。我们能够做的一切，就是试图减轻任何立法对工会权力和力量的任何有害的影响。

228 在委员会阶段，我在试图改进草案方面发挥了某些作用，并使政府对草案进行了许多修正，这有助于弄清楚同情罢工本身不是非法的，而工会领袖们的全部权力应该受到保护。莱斯利·斯科特爵士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修正案，它受到温和的讲演者的广泛支持。这项修正案甚至在原则上也受到反对派的欢迎。这个议案对于在基本工业中的罢工做了某些规定。我们的修正案是想为公用事业部门中可能发生的罢工事先提供一种延缓与调解的制度。艾尔弗雷德·蒙德爵士再一次帮助了我们。的确，他对修正案签了名，在发言时强烈支持我们。这次劳合·乔治总的来说认为这个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27年5月2日。

议案是令人惋惜的,但同时他又做了一次强有力的发言,恳求政府接受我们的新条款。在为修正案发言时,我提出了我平日提出的问题。在处理了消极的立法之后,政府什么时候提出改善经济与工业条件的积极建议?这位劳工大臣虽说一般是有同情心的,但他把演说集中在论述技术方面的困难,答应建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所有党派的大臣们在处境困难时都向之求助的一种手段。我们的这一努力没有产生出什么很实际的结果;但是这次辩论仍是相当有益的,有助于给讨论带来一种较好的气氛。二十年后,劳资争执法案被1945年取得胜利的工党政府废除了。但是许多别的事情也发生了变化,正如这项法案的通过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好事一样,它的废除也没造成很大的损害。

真是一个奇怪的嘲弄,多年以后我在基思·法伊林爵士写的《内维尔·张伯伦传》一书中读到了张伯伦日记(1927年6月16日)的这样一段引录:

在新的条款中有一条是莱斯利·斯科特提出的,他受到蒙德的支持,事实上这一条款跟我差点采纳的那一条款相同……这次辩论由于不采纳我的建议,说明我们的损失是多么大,例如,劳合·乔治抱怨说,这个法案只是一次攻击,政府本应对工业形势进行一次调查,提出某种建设性的建议。自然,这恰恰就是我的观点。^①

当时我们不曾知道在内阁之中我们还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说来真是遗憾啊。 229

劳资争执法案的通过,尽管它损害了总的气氛,但仍然留下了某种希望,即走向调合的活动将不会是完全失败的。我受到这次辩论的鼓舞,受到莱斯利·斯科特爵士修正案的鼓舞,以及工党一些发言人不完全是没有希望的态度鼓舞,我试图继续行动以加强由于鲍德温直接提出呼吁而取得的成果。我于1927年6月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伦敦,1947年),第159页。

中旬写给西德尼·赫伯特一封信把这件事做了，他是我的一位亲密朋友，又是首相的议会私人秘书。我敦促他利用他的影响，在这年秋天或第二年早些时候，赞成提出一项处理包括仲裁和调解在内的整个工业关系问题的议案。我们应该给联合工业委员会某些权力，并且应当提高它们的重要性。劳资协商会应当扩大，特别是那些组织方面较差的行业应该这样。假如这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劳工大臣认可的答复便应当使之成为一种现实；不是一种逃避行动的手段，而是促进它的一种手段。为了及早做出有效的决定，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委员会。对于这个呼吁我得到了非常同情的答复；但实际上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当时，长时期煤炭争执的恶果已经显示出来了。失业人数在1926年4月稍稍超过一百万，这是1921年以来最低的数字，但此后失业数字急剧上升。^① 鲍德温似乎对局势失去了控制，而党被各式各样的细小的、或至少是不相干的问题搞得昏头胀脑。那些顽固分子对内维尔·张伯伦的许多改革计划正在进行抵制，我们的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那些夭折了的改革上院的建议上，党在这个问题上分裂为旗鼓相当的两派——赞成的与反对的。赌博税和祈祷书的争论耗费了许多议员的精力，而重大的全国经济问题却继续摆在那里没有解决。由于这些年来欧洲和世界总的来说在恢复元气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因此这就越发令人恼火。

在这些年月里，不管是议会还是公众，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失业问题全神贯注的那种程度，今天人们是难以想像的。战后景气结束之后，直到1929年末，失业总数很少少于一百二十五万左右。尽管每年那些很有把握的预言说，商业就要复元了，其实并没有真正改善。自然，工党优哉悠哉，它不顾国外形势，宣称这些麻烦都

^① 除非另有说明外，全部失业数字指男女受保险者，数字引自《联合王国统计摘要》(1935—1936年以后为《每年统计摘要》)。

应归因于“制度”；唯一的疗法就是社会主义。保守党则相信，在国内市场搞保护贸易，相应地扩大帝国优惠制。但是他们在1924年选举中所作的保证使他们不能采用这种医治办法。在议会的几个阶段，曾有过一些强大的运动支持在广泛的基础上使用“保护关税”的方法。但是鲍德温把这看做是违反他的保证精神的，如果不是违反保证词句的话。试验诉讼^①是钢铁工业；不管党内有多少强有力的拥护者，也不管工业内部雇主和雇工的要求，他还是坚持他的决定。的确，他由于丘吉尔——一位坚定的自由贸易论者——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使自己加倍承担了义务。艾默里是保护贸易主义者的可敬的领袖。但是鲍德温总是能够使内阁中的这两部分保持平衡，而艾默里的压力，正象他本人描述的那样，是容易躲避或抵制的。^②在自由贸易总的体系范围内对付失业的其他一些计划，只剩下受到财政部支持的各式各样的国内发展方案。尽管劳合·乔治和其他一些人树立了难以轻视的范例，但在这些方面并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此外，鉴于正统的货币政策是以恢复金本位来保证的，因而这样一些计划必须保持局限于极其适当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落入了我们自己设下的陷阱之中。剩下的一切就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处理支援失业者的各种方法，而不是处理失业问题本身的各种方法。自然，只要失业数字继续保持在这样高的水平之上，那么这个战前提出的、经过修改的最初的保险方案就会受到极大的财政压力。然而，人道主义要求严格的保险统计规则应该不时地有所放松。这样使基金愈益亏空起来。1920年法案是在一个景气时期通过的，规定救济金的支付限制为每六个星期

231

① 试验诉讼，同一审判厅有同类诸案件时，约定将一付诸审判，依其判决而决定其他案件。——译者

② L. S. 艾默里：《我的政治生涯》，卷二：《战争与和平，1914—1929》（伦敦，1953年），从第493页起。

的缴纳可以得到一个星期的救济金，一年最高限度只能领取二十六周的救济金。此外，在提出申请之前必须缴纳十二次，并且他必须有能力工作，而且可以得到工作。到1920年年底，失业总数上升到七十万人。^①甚至这个数字还是可以应付的。但当情况趋于恶化时，后继的历届政府不得不用修正法案去应付紧急情况，对有关救济金条件和维持基金的问题都进行了修正。对所谓“扩大的救济金”与“受赡养者救济金”都做出了规定。“扩大的救济金”是由主管大臣斟酌付给那些如不是因商业萧条能够正常地做出充分的贡献而有资格被录用的雇佣劳动者。这自然使得成千上万的过去一直没有机会作出自己一份贡献的工人不致不发给救济金而去依靠济贫法案。由于这些让步，虽只仅仅限于他们这些人，到1926年年底，基金已无力支付，由财政部预付达二千一百万英镑。在1925年，指派了一个由著名法官布兰尼斯伯格勋爵领导的委员会来考虑整个方案，并提出变更办法。对那份报告是一致同意的，工党首席代表邦德菲尔德女士也表示赞成。扩大的救济金将被废除，将来在申请前的两年中要求三十次缴纳的保险规则要严格实施。大臣权宜决定的权利不存在了。年轻缴纳人的新等级将建立起来，缴纳较少，救济金也少。训练方案提出来了。雇员的缴纳数额要随着偿付能力的回复而减少。但当1927年秋政府决定要制定法律时，工党提出了强烈的反对。由于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女士曾支持布兰尼斯伯格报告，他们陷入了一定的困难。于是他们便抓住这个有限理由，即除了减少未来缴纳与训练方案以外，政府已接受了这个报告。为什么采取这样的选择呢？更进一步的争论是，为一个新的青年男女阶层建议的救济金比率是很不适当的，只能导致他们身心堕落。但在主要问题——恢复一项正确的

^① 劳工部：《1923年7月全国失业保险报告》（伦敦，1923年）。这个数字是指劳工介绍所登记的人数，包括一部分没有参加保险的人。

保险方案和废除扩大的救济金——一方面，他们却处于相当为难的境地。

在 1927 年 11 月初对二读议案进行辩论之前，贫困地区严重不满，唯恐这个议案通过成为法律后，将由于扩大的救济金的终止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申请贫困救济的增加而使已经负担过重的济贫法愈益加重负担。此外，即使这个方案已经执行，对于保险统计的健全性，《泰晤士报》上的批评依然很激烈。在二读时，我发言反对这个议案的某些重要特征，得到了许多同事的支持，其中包括阿斯特夫人。在 1925 年冬关于这个问题的各种辩论中，我已将我的主要异议表示过意见，当时我提出了一个对付长期失业的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我的主要批评如下：即使是在严格的保险统计基础之上，这个议案也不是健全的，因此不能以财务公正为理由而为之辩护。其次，假如在失业比通常地区人数更多、时间更长的那些地区内很大一批人被剥夺了扩大的救济金的话，那么，他们将必然会成为济贫法和地方税的一个负担。这就会在那些无力承担的地区内给工业和居民增加负担。根据最低的估计，十五万人可能要依靠地方税。我认为对于那些有困难的人的问题，不管是由于失业还是由于别的原因，应该分为三类。老年人和体弱者，这些人很可能在全国分布相当均匀，因此，在必要的时候，应当受到传统方法——济贫法的援助，那是合情合理的。其次是失业保险制度，象起初打算的那样，它主要是针对那些失业不是定期的、不是永久的或者不是持续很长时期的人。人们可称前者为“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出出进进”。这样的计划可以议案为基础，但也许能加以修改，让某些行业组合在一起，付出较多的缴纳，有资格得到较高的救济金。第三，财政部而不是地方税要对长期失业者负起责任，特别照顾那些很可能在他们自己的行业内将永远找不到职业的人们。这些人不应当永远处于仅仅领取救济金的境地。成年人重新

233

训练方案和青少年训练方案应当立即开始。当人们能够去一个较繁荣的地区找到工作,那就应当给予帮助,以鼓励他们从贫困地区外迁。在帝国内部移民也应包括在这样一个计划的范围之内。我认为我的论点是经过很好思索过的,是很受支持的。但是部长的发言把我们搞乱了,他似乎对于根本问题是那么迟钝,促使我不得不进行一次也许比适当的批评更为尖锐的批评。我这样说:“我不能肯定大臣们对于‘扩大的救济金’还未用尽他们的权利;我不愿说他们不是‘真正地在寻找工作’,但是我希望他们将不会发现自己属于那些‘很可能在将来得不到就业’的人们的范畴。”这些话自然是从这个方案或先前那些方案要求内的词句中挑选出来的。我的攻击使议会大为震惊,但也使议会开心。报界总的说来支持我所发挥的那些更为广泛的论点,尽管他们对于我攻击执政党重要议员感到有些不满。在第二天的辩论中,政府得到我们这一方面的支持,但总的说来,政府有些震动。结果,部长作出了一两个实质性的让步,特别是有关付给青年失业者救济金的比率问题。然而,政府坚持“两年内支付三十次”的规定。

234 不应忘记那时的苦难是一种真实的苦难。在许多地区,一个身强力壮的男子,不管他多么热切希望,却没有机会找到适当的工作。在关闭了的造船厂和抛弃了的钢厂中是不能得到工作的。困苦不仅仅落在纳税人的身上。对于济贫法的传统厌恶以及被迫接受地方赈济的耻辱感,使那些最优秀的工人几乎是在做出任何牺牲之后才去求助于济贫法当局的。

委员会详细讨论了“两年内支付三十次”这项条款。在这次讨论中保守党的反叛以罗布·赫德森的最有才智的、最动人的演讲带了头。他后来在丘吉尔的战时政府中成了一位杰出的农业大臣,他不幸夭折,实在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关于这项特殊条款我们投票反对政府的有八人之多。我这样作还是第一次。在后来的十年

期间证明这样做远不是最后的一次。

这个议案的讨论未经重大修改就最终结束。然而，它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戏剧性方式把地方税与生产工业上不公平负担的问题突出了出来。其他一些问题也涉及到了。随后，议会任命了工业转移委员会去处理我所提出来的主要论点中的一个。这算做了一些事情。在1928年11月失业基金议案进行二读的时候，我得以再次就我的立场进行辩解。最后，在1929年3月，阿瑟·斯蒂尔—梅特兰被迫宣布，“三十次支付”限制的実施将被推迟，而这项支付限制是导致我们这一小小忤逆的原因。在取得这一让步的活动中，我们小组由于其他一些议员的加入而增强，加入的人包括罗杰·拉姆利(后来的斯卡布劳格勋爵)。大臣宣布以后，我在一份受人欢迎的报纸上看到了“青年人对了”这样的标题，感到高兴。这是这届议会中差强人意的事件之一。然而，这一决定逃避了任何激进的改革。它只不过是继续那个落在基金身上的不令人满意的扩大的或过渡性的津贴体系而已，即使按当前失业比率，它也必定会导致这个基金陷入更大的亏空之中。在下届议会中，当国家受到打击、经受整个世界那种经济暴风雪的冲击，失业人数上升到二百五十万以上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时，是社会主义者财政大臣发觉这个基金的破产是英国国外信誉受到损害的许多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这届议会注定就象它开始时那样，将在一种改革精神中结束。1929年春，在最后阶段完成时，《泰晤士报》这样写道：“做为目前这届议会主要措施的地方税改革这个伟大方案……是一个它的编制者满可以引以自豪的方案……它将成为二十世纪杰出的立法成就之一。”接着它给予张伯伦和丘吉尔以共同的赞扬。这是这一漫长的光荣争论的终结。张伯伦渴望完成那项他当卫生大臣时为他自己规定下来的任务。这包括改造地方政府的一项重大措

施。为了使这样一项改革名符其实,并具有实效,就不仅仅需要涉及各级政府的组成及其权力,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郡级市和郡议会;同样极其重要的是改变财政部补助金的整个体系,这样可以保证最需要的地区得到国家基金的最大援助。内维尔·张伯伦充分意识到了改革这个方面的重要性,并且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他都不断地强调指出目前体系的不合理。无论如何,他看到用他自己的方式通过以整批补助而不是比例补助的办法加以纠正,着重支持比较穷困的地区,对有关团体的特征与需要给予适当的注意,而感到满意。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向财政部提出的要求只是一项少量的“甜头”(三百万或四百万英镑)。这将保证新的方案有如《艾丽斯漫游仙境记》一书中的那渡渡鸟主持的竞赛一样;大家都能得到某种奖品。内维尔·张伯伦的方案与丘吉尔的另外一个方案相对抗,后者是以直接津贴与减税为基础的,开头好象是一种代替方案,但是最后成为一项补充了。内阁旷日持久的斗争
236 序幕现已揭开了。^①有一个时期,它似乎注定要导致激烈的冲突,致使倡导者中的这个或那个辞职下台。

当时,我经常见到丘吉尔。他自然没有向我泄露过正在发展着的严重局势的任何细节。因为当张伯伦正埋头于他的改革方案,计划要产生更好的地方政府,更合理地分配国家补助的时候,丘吉尔正对一个更为野心勃勃的计划感到兴趣,甚至热衷起来了。由于他所强烈坚持的意见和首相的许诺,保护贸易政策被排斥到一边,同时由于按照劳合·乔治和其他人的那雄伟的计划,花在失业者方面的任何大规模的开支遇到了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的抵制,因此前景似乎很黯淡。然而,丘吉尔那富于想象而又灵活的头脑是不能容忍一个拥有强大多数的伟大政府注定象笼子里的松鼠那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145—147页;麦克劳德:《内维尔·张伯伦》(伦敦,1961年),第126页。

样,绝望地、徒劳无益地在里面转着圈子的。贸易没有象大人们预言的那样得到恢复;失业数字没有下降;出口没有增加。党的热情在第一年受到了救济金方案的激励;第二年它从首相处理总罢工中得到了来自他人的荣誉;在第三年里,它被煤炭争执那漫长而阴郁的几个月弄得消沉下去了。一种要求某种程度的保护贸易的新的动荡,或者至少要求保护越来越受到外国进口损害的重工业,使党受到折磨。内政大臣乔因森·希克斯——一般人称他为“吉克斯”——由于对共产主义和英国国教派(他似乎把这两者看作是对人类同样危险的东西)轮番攻击,因而给人们提供了一出相当轻快的喜剧。但这些是不够的。人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不用保护贸易或通货膨胀的办法,去援救受到最大经济压力的四、五种基础工业。在政治上如此重要的农业,同样正在需要援助。

随着议会继续进行,丘吉尔以其特有的善意越来越对某些青年议员接近,特别是在那些所谓党内“进步分子”中间。我在许多场合,对于现行地方税制度和落在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身上的过多的负担那种不公平,曾进行过争论。在差不多两年中,我在议会以及给报纸和期刊撰写的文章中,始终如一地遵循着这一方针。我为《银行家》写的一篇论述“我们的中世纪地方税制度”的文章把这种情况认为是通过地方税基金平均化的办法,将实行于伦敦的制度扩大到整个国家。我并论证说,必须加以处理的远远不只是穷困地区与富裕地区之间的差别问题。我们也必须在某些人开始称之为英国的“荒芜地区”内努力促使工业发展。只要这些地区所必须支付的地方税同利润极不相称,而对成本却是很重的负担,那么我们就将永远不能使现有工业得到改善,或者把新的、正在扩大的工业吸引到这些地区里来。

丘吉尔已经开始盘算一种救济方法了,特别是对于重工业。这种方法将有助于抵抗要求保护贸易的压力,同样将应付财政部对

通货膨胀的恐惧。它不会拖延太久，像准备就业特别方案那样。它将立即实施，并且在那些尽管困难重重但基础较好的工业实施。一句话，他的想法是要完全免除工业和农业的地方税负担，而以财政部的直接津贴来弥补地方当局的损失。由于纳税人从价格下降中得到好处，这对生产企业的需求将不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

张伯伦的和丘吉尔的这两种政策尽管在某些意义上是一致的，但几乎经过两年的讨论才合流。皮特关于罗纳河同索恩河的汇合所做的著名隐喻，是指纽卡斯尔同福克斯之间的联合而言。“尽管他们不同，”他大声说道，“至少在我看来，他们是一体，但愿他们长久地继续和谐地为了国家的荣耀团结在一起。”皮特的攻击有着辛辣的讥讽味道；但是也够奇怪的了，内维尔·张伯伦和丘吉尔为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工农业减低税收这样的重大方案而终于合作，
238 却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在这届议会结束之后，英国在差不多十年的期间注定在一个平庸无为的政府统治之下。张伯伦命里注定要继承一份令人伤心的遗产，而他正是这份产业的一个共同创造者。事实证明丘吉尔幸运一些，对他自己和国家都是这样，他在1940年掌握最高权力时，两手干净，名声不坏。

到1927年年底，内阁还不曾达成一项决定，但是据张伯伦的日记所透露，在那年12月处于生死攸关的内阁里，除鲍尔弗和伯肯黑德以外，所有的人都反对丘吉尔。那时正好在圣诞节之前，丘吉尔似乎心境沮丧，有失败主义情绪。还是引用张伯伦的日记吧，他说：“如果首相（鲍德温）和我不同意，他将放弃这个方案。他不准备再遇到一次加利波利的情况，^①而当批评之风开始吹起时，他会发现自己非常孤单。”^②

① 加利波利，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曾进攻这里，但遭到失败。——译者

② 伊恩·麦克劳德：《内维尔·张伯伦》，第126页。

1927年秋，我们当中一些人意识到，卫生大臣和财政大臣之间的争论不久必将达到顶点。这两位大臣之间主要的分歧点，现在大部分已经消除了。张伯伦承认，为了适应工业与经济形势，某种工作是必须的，这比只是地方政府的改革还要进一步，而地方政府改革不过是抛出三、四百万英镑，作为糖衣而已。丘吉尔开始承认，农业应当完全减低征税，而工业必须做出某种贡献。这应当对利润采取统一收费率收税呢，还是按某种比例收税呢，当时关于这一点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在12月11日，由于听说所有这些事情都在临近一个关键时刻，并且我在同丘吉尔进行私人谈话时受到了鼓舞，于是送给他一份有关我的观点的备忘录。他在1928年1月5日作了如下答复：

发现某人领悟到了一个巨大计划的实质与分量，这总是令人高兴的。我之所以让你成为这个计划的参预者，因为我肯定你将会丰富它的预备性讨论，并且也因为——尽管你可能忘记此事——两年多以前，你对地方税收制度偶然做的一次评论，第一次在我的脑海中种下了或许会成为一个重要事件的种子。

总的来说，我们同意你在你的《方案的资金》一书中所倡导的方针。事实上，你在这个题目下所作的陈述，几乎完全同我在这儿 239 独自一个儿得出的决定和论点相吻合……

他继续说：

下一次当你来伦敦时，假如你要访问财政部的话，我的私人办公室将会把我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拿给你看，你能够在那儿阅读……我现在正计划把这件事在11日或者12日提到内阁去，并且请求一个由五人或六人组成的委员会同我一块儿研究……

继我以前在1928年1月2日写的那封信，我又附去一份备忘录，进一步支持丘吉尔对工业捐献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的那些建议。他在1月15日答复如下：

我认为你关于利润税对留给地方税三分之一的赞成与反对意见的陈述,是那样清楚,是那样经过仔细斟酌的,因此我将它送给了首相。我想你若知道他在星期四那天向我谈起这件事使用了极为赞美的措词,那会引起你的兴趣。

1月和2月的形势在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丘吉尔和张伯伦两个人都很清楚,谁也离不了谁。丘吉尔终于接受了工业支付要用适当税率而不是利润税,或任何其他统一税率制度,不过要根据估定的价格。张伯伦也继续要求工业赋税应该高达三分之一。丘吉尔则赞成五分之一。那并不需要一位已经工作了接近十五年的内阁成员来预言说,其结果将是一种妥协。他们最后同意征收四分之一的赋税。这样就使工业得以免除了百分之七十五的纳税负担。自然这一个插曲使我感到非常兴奋,一点也不亚于我因受到丘吉尔的信任而感到的那种兴奋。在某些细节上,争论仍然继续进行。大家同意这四分之三的减税应适用于工厂和车间,但不适用于办公室;大家同意农业土地和建筑物要全部取消征税,而对于农场住宅的赋税仍然应当征收。接着关于铁路、运河、港口和码头的大争论开始了。张伯伦坚决反对在这方面减税。丘吉尔受到了一些青年朋友们的鼓舞,坚决进行攻击,他意识到他赢得了他的主要之点,不管这最后一次争执的结果如何,他不会受到严重的
240 损害,因此就更加坚决。运输在我以及我的一些朋友看来似乎是重工业成本的一个如此重要的部分,以至我们坚决赞成减低征税。我同布思比,还有其他一些人,做为代表团于4月中旬去见内维尔·张伯伦,催促他接受我们的论点。我们根本没有受到很好的接待。张伯伦完全没有一点热情,的确很明显,他对于我们的到来感到有些烦恼。多年以后,每读到他以下这段日记摘录,我便感到好笑:

……在同这些青年人讨论内阁所辩论的问题适当与否时,令人难

受,只和他们简单地争辩了几句,我便说我要去同国会议员谈话了。①

这个小小的越轨行动本身倒没有什么,但令人不愉快地一位大臣的那种冷淡拘谨而另一位大臣的那种温暖亲切之间的对比,在我们脑海中更加鲜明了。既然中央办公厅和督导员们赞成我们的意见,张伯伦便让步了。

尽管情况复杂,酝酿的时期又长,丘吉尔的计划本质上是简单的。大约二千九百万到三千万英镑可以弄到手,这笔钱在那时是为数可观的。如同后备军一样,这是一个机动部队。它将用在战线紧迫的地方。战线的软弱部分显然是重工业和农业。因此,一千七百万英镑要用来把工业支付的地方税减少至四分之一。为使土地和农业用房完全免除地方税,因而提供的资金将要求追加四百七十五万英镑。铁路和码头以及其他方面得到的好处将达到四百万英镑,但条件是这一切都应该完全通过减少货运费用这种形式来实现。我竭力坚持这个条件,因为我知道这些办法能够给煤炭、铁和钢的运输带来极大的帮助。最终,为了使地方政府改革得以实行,大约需要三百万英镑。这个宏伟的全部计划在1928年的预算演说中被描绘得极其动人,这个演说是丘吉尔的一大胜利。对于那些热烈追随他而又“参与密谋”的青年人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为了提高国家必要的税收,要增加的赋税之一是石油税。每加仑要四便士,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算高。我在12月11日给 241
财政大臣的备忘录中,曾经提出了这一点。我谈到了石油税:“你愿意让人家说,你一只手在救济工业,另一只手却强行增加新的负担吗?”我自己感到,就工业而言,这还算不上是一项巨大的课税。关于游乐汽车驾驶者,我想他会有点抱怨,但既然收税确是很低,他不久也就会把不满忘记掉了。自然,在那个时候,石油征税是个

① 伊恩·麦克劳德:《内维尔·张伯伦》,第127页。

新事物，国内税收正向未知的汪洋大海发展，到处都是暗礁和浅滩。除了轻油和重油问题之外(柴油那时才刚刚发展)，不久发现在许多农业区域，特别是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煤油是正常的、的确也是唯一的照明燃料；一些相似的其他油种被广泛地用来烧饭或作他用。在一个时期，看上去似乎整个预算可能会严重地被这个未曾预见到的困难所打乱。我仍然能够回忆起，当财政大臣在下院正维护着其他某一项修正案的时候，我正在他的房间里，并倾听着那些烦恼的文职人员与博学的科学家们讨论是否可以找到某种措词形式，或某种定义，去守住丘吉尔后来提到的所谓“化学边界”。这些教授中有一位我现在仍能见到(虽然我已忘记了他的姓名)，他白须飘飘，有长者之风，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幸而定义恰恰适时提出，灾难从而避免。当然，预算仅仅表示出了那个宏伟计划的主要轮廓，以及支持这一计划所必须的财政措施。减税法案和地方政府的改革后来在会议期间提出。

在预算辩论中我发了言，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宣传这一方案。我在各种刊物和地方报纸上写文章，参加议会辩论。我也在许多选区中讲说这一方案。销售行业与生产工业在同一基础之上分享救济，造成了很大的骚动。对此我在议会内外都反对。在下院一次关于失业问题的不信任投票的辩论中，我断
242 言减低征税是生产者政策的第一阶段，它将补偿由于恢复金本位对工业所造成的某些后果，而不损害国家债权的利益。我希望下一阶段财政部应对所有那些不具备条件领取保险津贴的失业者负责援助。这样，生产者、雇主和受雇者将同样受到帮助。

使减低征税计划能有效执行的必要措施，结合地方政府的改革，由内维尔·张伯伦在11月的一次全面的、有说服力的演讲中向议会提出。总的说来，他的演讲对议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929年2月，这个议案最后达到了三读。在未来的岁月里，尽管有许

多变化和动荡，但并没有人试图把这位大臣在这个宏伟的法案中所创造出来的地方政府的广阔结构加以改变。若是张伯伦还活着的话，想起在这两年来占用他巨大精力的方案的这一部分已经经受住时间和经历的考验，他一定会感到高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使工业得以一直运转的诸条件，由于成本和价格水平已经大不相同，全国范围内的分配大为稳定和多样化，四十年以前压得那样重的那些特殊负担，现在相对说来不那么繁重了。的确，负担开始更重地落在自己房子自己住的人的头上，而工业的（虽然不是农业的）非常适合当时条件的减低征税的计划自然消失了。不论是丘吉尔还是那些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在那几乎将任何一种其他计划都排除掉的政治与经济的形势当中，都不会宣称工业减税比迫切的、临时性的救济工作更重要些。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这一组织具有永久性价值。支持张伯伦伟大工作的那些主要原则是没有改变的。自从那时以来，不管做了些什么改变或适应性变化，都没有离开他的宏图大略。这样，在1929年春，这个大胆的、全面的计划便取得了它最后的立法形式。这届议会进入了最后一年，不久就解散了。至少它是在积极的调子中结束的。

第九章 重大危机： 1929—1931年

1924年10月选举出来的议会于1929年5月10日解散。5月30日举行投票。保守党在四年半时间里的成绩是绝不可等闲视之的。在外交方面，洛迦诺公约被认为是一项相当大的成就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虽然它未经与国际联盟协商而有着漠视国联的恶名，某些保守党人肯定会是这样想的，并把罪责归咎于整个保守党。在国内方面有了许多改革与进步。“保护”关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只要情况许可，有可能进一步向前发展。学校与住房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在兴建；被视为在政治上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生活费用，在这个时期大幅度地下降了。尽管差不多有一百万人失业，但更多的人有了工作；现在人们所说的“现代化”的基础已经有效地建立起来了，在电力供应规划方面和在地方政府改革方面都是这样。后者一旦发挥作用，将导致比较公平地分担义务，大大地为生产工业减轻负担。《泰晤士报》用下面这样的话总结这一经历：

在最近五十年的历届议会中，我们发现仅有两届或三届能与过去四年半期间的产品在质量与数量上相匹敌。^①

然而，保守党人被一些大大小小的困难弄得处于不利的地位。碰巧增加了的地方税估价，虽然不是按每一英镑收税，但做为地方
244 政府改革方案的一个必然副产品，在大选前不久公布了。的确，纳税人自然也是投票人，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投票前不几天才收到增

^① 《泰晤士报》社论，1929年6月5日。

加了的估定的税额。这引起了广泛的不满，特别是在房产主和中产阶级选民中间。同时，执政差不多五年之后，失业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全国很大一部分地区。虽然数字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比我们执政开始时也好不了多少。旷日持久的煤炭争执，听之任之月复一月地拖了下去——这是鲍德温最致命的灾难性的错误，他没有努力支持丘吉尔提出的一项解决问题的倡议——这给全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至少在特伦特河以北是如此。最后，尽管我们能够提出一项相当好的方案，但它并不怎么鼓舞人心。它反映出一种厌倦的和有点失败主义的情绪。没有号召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行动。

看看我的竞选演讲稿，看到我把工业现代化，特别是铁路系统现代化，作为重要的特征，我觉得很好笑。我很快被选进大西铁路董事会，^①从而使我能够比较细致地研究这个问题。但我不能声称我预见到了比奇翁时代。^②鲍德温选择的竞选口号使得我们的纲领不可能披上原本能够披上的富有魅力或浪漫色彩的外衣。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人！通过所谓“小姑娘”投票权，他使得全体选民的数字增加了数百万人，这次选举青年比以前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在这样一届议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完全无鼓舞力量的口号“安全第一”向人民呼吁。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涂遍全国的标语画，上面画着鲍德温的大脑袋，嘴里叼着烟斗，下面写着“安全第一”几个大字。然而这个似乎经常做事做得恰到好处而从不过分的人，正如尤斯塔斯·珀西勋爵提醒我们那样，他基本上“满足于把自己当做政府的代言人，而不是它的指挥头脑”，^③他在危急时刻不仅能够显示出真正的感情，而且同时还能够显示出高度的政治远见。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谋略上挫败劳合·乔治。在维护他的领导地位的斗争

245

① 从1929年到1940年我是董事，从1945年到1947年我再次成为董事。

② 理查德·比奇翁自1963年以来任英国铁道部大臣。——译者

③ 纽卡斯尔的珀西勋爵：《某些回忆》（伦敦，1958年），第128页。

中,他向罗瑟米尔和比弗布鲁克这些报业大王挑战,并且将他们彻底击败。他的传记作者 G. M. 扬·鲍德温曾经说过:“我的最险恶的敌人也永远不能说我不了解英国人民。”这倒是很实在的话。但奇怪的是他犹豫不决,没有继续用大胆的腔调讲话。他的策略是战术性的,是防御性的。他不喜欢大的进攻性的战略计划。也许是 1923 年的决定——突如其来的未获成功的保护贸易呼吁——及其后果而动摇了他的信心。“安全第一”无论如何透露出一种性格,这种性格不能应付那些即将威胁文明世界生命的可怕的危险。无论如何,在两年的时间内,鲍德温可以满有理由地声称,就是这个使他在 1929 年选举中失败的口号,已证明是一个联合内阁的成功重整旗鼓的口号,保守党人在这样一个内阁里是主导因素,并且赢得了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胜利。工党在 1929 年有二百八十八人当选为议员,成为下院最强大的政党,在两年稍多一点的时间内便被这个口号搞得减少到仅有五十二个下院席位。这真是政治上自相矛盾的咄咄怪事。

在 1929 年的选举中,如果说保守党的纲领不令人鼓舞的话,那么工党的政策就是因循守旧的了。他们依靠他们正常的呼吁——失业数字、缺乏任何政府政策、所谓的递减税制以及一般坚持以前和以后对两方都有好处的口号“是改变的时候了”。那时完全在劳合·乔治控制下团结起来的自由党,能够对左右两派都进行攻击。保守党人都睡大觉去了。毕竟是保守党议员穆尔-布拉巴宗上校为了对其直接上司无可救药的不称职发出抗议,他于 1927 年辞去运输部次官的职务后,以独特的叫声挖苦说:“下院政府大臣席发出的鼾声响彻全国”。

一些年来,在劳合·乔治的庇护下,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意见书纷纷出笼:“土地与国家”(1925 年)、“煤炭与动力”(1927 年)、“城市与土地”(1927 年),以及其中最主要的“英国工业的未来”(1928

年),这就是所谓的“黄皮书”。这总起来成为一本通俗的小册子,名为《我们能够克服失业》。它的扉页题词简单扼要:“我们过去为战争而动员——让我们现在为繁荣而动员。”它的长远政策溯及热那亚会议,阿瑟·索尔特总是把那次会议描绘为劳合·乔治运气的转折点,或者是欧洲最后的一次机会。当时这项政策是一个呼吁,在国外是稳定黄金价格和扩大贸易;在国内呼吁为工业提供较方便的资金,以及改进工业效率。他也提议大规模地重新分派工人,发展新的工业。关于金本位问题他很慎重。他推荐“一项适合保持金本位、将能取得英国价格方面的更大程度的稳定、并为英国工业提供较为方便的资金条件的货币和银行政策”。^①但是劳合·乔治和自由党的主要努力集中在短期上面。广义地说,这些建议就是对于道路、住房、电话、电力供应、排水系统、铁路发展以及其他规划等规模巨大和野心勃勃的措施,这些措施将最大限度地保证就业,以及“补偿社会不想用于投资的冻结储蓄”。这后一句话自然是凯恩斯政策用于实际政治的第一个实例,这就是承认萧条的原因之一很可能是由于投资率不再与储蓄率相等。在这次大选中,所有报刊都对选民的那种漠不关心与无精打彩的表现进行了评论,自由党在它那最伟大的领导人的指挥下,对这次重大的努力的确并不缺乏热情。五百名自由党候选人投入了战场。劳合·乔治本人跑遍全国进行演说,自由党的领袖们在另外两个党的猛烈谴责声中,暂时把他们彼此非常厌恶的感情隐藏起来了。由于我们选举制度的作用,尽管自由党得到了五百万张选票,但他们在下院仅仅取得五十九个席位,其中之一王室法律顾问威廉·乔伊特先生旋即叛变到工党那方面去了。许多议员对于这一突然改宗表示愤慨,劳合·乔治在一次有力的演说中也对他进行了攻击。他使用当时的行话宣称,不会有人指控他“不是真诚地寻找工作”。²⁴⁷

^① 大卫·劳合·乔治:《我们能够克服失业》(伦敦,1929),第7页。

丘吉尔气度比较大一些，据说他在吸烟室里评论说：“他行事的方法不对头。假若他到我这里，我就要向他讲解变节的技巧了。”

我成了反对政府的整个运动的一个牺牲品，这个浪潮将我迅速冲走。工党候选人以获得一万八千九百六十一票领先，我名列第二，得票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张。自由党得票一万零四百零七张。在前次选举中，我取得了三千二百十五票的多数；那时工党是以二千三百八十九票的多数领先。选民确实增加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在比林厄姆拓展而流入了一些挖土工所造成的。但是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在1924年曾经得到自由党的大量支持，而这一次那些老自由党人都转向正统的自由党候选人了，他们无疑也在劳合·乔治的呼吁背后聚拢起许许多多犹豫不决的人。选举结果宣布之后，出现了那通常的激动场面，胜利者欣喜若狂，失败者含泪饮泣。当投票的结果开始从全国传到我们这里，我了解到失望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在我们这个小小集体中，达夫·库珀、赫德森、洛德、特伦斯·奥康纳以及其他进步人士如亨利·本廷勋爵等人，都被刷下来了。只有奥利弗·斯坦利、布思比以及拉尔夫·格林继续保留下来。第二天，整天都忙于在我们的支持者中间进行通常的访问，以示感激和安慰。我们下午离去。火车上有许多工党议员前往达勒姆，去庆祝他们自1924年失败以后的复兴，这是可以理解的。多尔顿也同样是闹嚷嚷的。当他们所有的人在金斯克罗斯受到以奥斯瓦德和辛西娅·莫斯利为首的支持者搞的那兴奋激昂的集会所欢迎时，我的妻子和我曾勉强搞了一次颇为软弱无力的反示威活动。过了两年，当我们在1931年选举后，乘着同一列火车回来时，我不禁想起多尔顿的那种情景。那时他的地位同我的正好颠倒过来了，莫斯利离开了工党政府，也脱离了工党。

就全国的投票情况来说，保守党人干得也并不坏。在普选中，

他们得的票数大大超过八百五十万张，而工党的票数则在八百五十万张以下。他们之所以仅仅得到二百六十个席位，而工党却得到二百八十八个席位，那是计票方式所造成的。更重要的是由于自由党获得的票数很多；因为自由党人是以一个统一的政党进行活动的，其纲领富有生气。在以前几年里，三者间的体制对保守党人有利，从那时以后，甚至直到今天，从全国整体来看，它已证明对保守党是一个不利条件了。 248

在失败之后总是那样，在报纸上或外部，很快就开始涌现出大量的解释与互相指责。尽管诸如《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观察家》、《旁观者》以及大部分地方报纸，对年轻的和进步的保守党人的消失哀叹不已，而其他一些评论家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式。《每日邮报》抱怨说，“大选前所搞的保守主义并不是保守主义。以大败告终的是半社会主义政策”。^①它接下去抗议为“象哈罗德·麦克米伦上尉那样的半社会主义者们”准备任何空位。这个论调在《星期六评论》上得到共鸣，它嘲笑达夫·库珀和我本人“只不过是些乔装的社会主义者罢了”。^②

这年秋天，关于保守党政策的前途讨论继续进行。接近十月底的时候，内维尔·张伯伦就关税问题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说。他从选举中汲取了一个重要教训。它的结果之一是使保守党从过去它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誓言和条件之中解放出来了。石板擦净了，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在上边写那些经过适当考虑和适当谘询后，他们认为似乎是值得表现出来的东西。自然这个重要声明意味着，保守党现在没有什么禁戒了，能够考虑新的政策了，例如一项普遍税则（用以同“保护贸易”相对抗）以及帝国优惠关税的广泛扩大。就在那同一天，我在伦敦就同样的方针做了一次演讲，我在演讲中

^① 《每日邮报》，1929年6月22日。

^② 《星期六评论》，1929年6月29日。

对于比弗布鲁克勋爵的论文给予这个主题的促进表示欢迎。那时候，自然在帝国自由贸易方面的重大冲突尚未出现，而且张伯伦和比弗布鲁克的关系很好。不幸由于青年人的习性，我听任自己口若悬河，华而不实，因此被人广为宣传，而我严肃的辩论却不怎么受重视。²⁴⁹关于在失业、重工业、工业改组等方面缺少建设性政策一事，我注意到我们必须避免这样一种局面，即在下一次选举时，英国人民将会发现“那同一个老的影子内阁依然在投出阴影，直至它因其自身的劳累而渐渐消逝。”在那个时候，我处于运动冲劲的顶端；为了改变党的最高阶层，撤换老的领导人，以便为提升更加充满活力的人物让路，这些运动在政党中是很普遍的。我没有想到在大约三十年之后，我竟然发现自己成为这样一些鼓动的攻击目标。

然而，在选举之前以及其后，我都承认并赞扬鲍德温为在我国加强温和力量，减少极端与激烈感情所做的无比贡献：

这种温和的稳定进程深深地影响了党派政治。国家的整个情绪比五年前较为沉着冷静了。当时那激动得达到爆发点的忿怒情绪，现在平静缓和了。从狭隘的党派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党的运气可能由于这个变化而大得其利；对国家利益也一定很有好处。也许在写这些时期的历史时，这一稳定进程可以证明既是鲍德温先生政治上的坟墓，又是他的政治上的纪念碑。^①

在某点上，它是一个不祥的预言，因为社会主义党好景不长，不久就衰落得很厉害，在以后四年间一直没有恢复过来。这大部分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但这对鲍德温最重要的成就来说，它却是一份公平而应得的礼物。

1929—1930年的冬季期间，争论在保守党各派之间继续进行。某些人把我们的失败归咎于一项过于激进的政策，以及抛弃了

^① 《圆桌》，1929年6月19日。

保守党很高的原则；另外一些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要求未来要有一项更为积极的政策。11月我在《星期六评论》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试图阐述一个现在似乎仍然很熟悉的主题。在第一篇文章里，我以青年人那种自信断言，在我看来什么是目前领导的弱点：

今天保守党的基本弱点在于它目前思想的混乱。在一些紧迫的问题上它没有明确的政策；它不感到自己应有一个明确的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它有那么多“未解决的问题”，那么多狭隘的见解。它是保护贸易主义者，同时又是自由贸易的信徒；是帝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是革新的又是因循守旧的。在某些时候它赞成国家对工业情况进行干预，在另外一些时期它则采取放任主义。根据不同方面施加的不同分量的压力，它一会儿遵循这种政策，一会儿遵循另外一种政策。有时候怀念沙夫茨伯里^①和迪斯雷利而受其支配，它似乎就要恢复英国青年党；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它则显得非常接近于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一种翻版。一会儿几乎是一毛不拔，一会儿却又几乎是挥金如土，它的财政政策呈现出一系列令人困惑不解的矛盾。^②

在第二篇文章中，我陈述了那些我认为应当指导我们的原则：

以我看来，似乎有三类主要问题等待解决。第一，从纯技术方面出发，对工业体系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有效、更经济的组织。第二，我们必须认识这个体系的人员中间存在着那种不安和没有凝聚力的基本原因。第三，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想出一种办法扩大可利用的市场，保证我们自己的工业尽可能多地分享那些市场。^③

我把这项政策概述如下：

……工联主义必须专心致力于三个伟大的目标——我们经济方法的现代化、我们劳资关系的博爱化，以及我们国外市场、首先是我们的帝国市场的扩大化。

① 沙夫茨伯里(1801—1885)，英国慈善家。——译者

② 《星期六评论》，1929年11月2日。

③ 同上书，1929年11月9日。

当时我必须考虑我自己的未来。在最初几个月里，工党政府干得相当好；在外交方面确实干得很好。工党的温和派很明显在政府中占优势，这就在全国产生了一种宽慰感，如果不是信任感的话。尽管美国的萧条已经开始，但它对世界范围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因此，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为什么新议会不应该干到任期届满。我自然渴望重返下院，体验一下迄今为止我还不曾有过的那种当在野派的经历，这可以有较大程度的自由，而且甚至在后座议员中间受到鼓励。在12月，我接受了希钦保守党协会的邀请，去
251 当这个选区的候选人。任期内的议员盖伊·金德斯利少校因为商业原因渴望引退，大家同意尽快举行补缺选举。他同我心里想的都是1930年春某一时间。可是，他感到在1930年5月举行一次补选，按现有条件来说，那是不明智的。由于比弗布鲁克参加竞选运动以及反对党的领袖的运动，将会出现混乱与分裂，因而存在着危险。全国农场主联盟主席住在那个选区内，他们可能要提出一名候选人来。如果没有自由党候选人的话，那么自由党人鉴于关税问题的重要性，可能在这个时期投票支持社会主义者。那位现任议员的见解是“席位可能很容易地便丢掉了”。虽然失望，我还是向他的那些论点屈服了。事实上这时我的旧伤复发，走路一跛一跛地，非常疼痛，这使我感到极端烦恼。后来，在1931年夏天，我迫不得已出国，试图进行必要的治疗与休养。1931年2月，金德斯利少校通知我说，他明确地得出结论，进行一次补缺选举可能是灾难性的。我除了接受他的诚挚的意见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尤其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以极端小心谨慎著称的人。大约在同一时期，伦纳德·罗普纳先生（那位议员的叔父）曾被接纳去接替我在斯托克顿的位置，但由于家遇丧事与健康不佳，而放弃做未来的候选人。我把斯托克顿移交给他照管是极其高兴的。他是一位慷慨而有名望的人物，在地方上受到普遍尊重。他在市长任内政绩卓

著,他似乎比任何其他我们能够发现的候选人更有可能赢回席位。

1931年3月,我收到了一份由我往日的一些支持者签名的斯托克顿委员会的呼吁,催我回去。经过一定的谈判之后,事情准备妥当。希钦保守党人够好的了,表示了他们的遗憾,但对我的动机表示充分理解。我爽直地指出,我抛弃斯托克顿唯一的考虑就是希望尽可能早地进入议会。这是一致同意的计划;但因为各种原因,未曾认为它是切实可行的而将它付诸实施。由于把握不定这届议会还能持续多久,现在要求一次补选似乎太晚了。因此,我感到我应该到斯托克顿去,这正是为了党的利益。希钦保守党人对我送别,十分友好,对我很有帮助,他们赞扬我返回从前的选区所表现的“热心公益的精神”。 252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在1931年5月回到斯托克顿接纳大会时受到欢迎的情景。在车站上我们参加了隆重的欢迎会,各条街道都挤满了人群。在希钦受到了照顾我很感激,回到情感所系的北方去,我真高兴。没有几个月可等了。

1929年到1931年这两年是一个政治上日益混乱和复杂的时期。显著的特征表现在:一方面是夺取保守党领导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工党政府逐渐分裂。鲍德温为反对那些要求他去职的势力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终于在1931年3月因威斯敏斯特的圣乔治著名的补选结果而获得胜利。在十八个多月里,竞争来回摇摆不定。比弗布鲁克勋爵在1929年7月开始了帝国自由贸易运动。尽管多数保守党人承认他的政策的形式原始,不是切实可行的,然而,约瑟夫·张伯伦举起了旧的旗帜,自然赢得了很大的支持。1930年初,鲍德温由于他在纲领中接受了对于工业制成品的充分保护贸易和帝国优惠制,但拒绝对食品征税而遭受到压力。自然,这不能使比弗布鲁克满足,他照样感情激动。在1930年6月鲍德温召集了一次保守党国会议员和候选人的会议。他要求并且获得了一次

信任投票。在这次活动中，他大大得助于罗瑟米尔给一位保守党议员的一封信，他引用了它，颇有效果。报业大王厚颜无耻，不仅要求知道政策是怎样的，而且要求知道在下届内阁班子里鲍德温最重要的同事的名字。鲍德温对这样的要求——他恰当地称之为“傲慢的要求”——给以泰山压顶般的回答。内维尔·张伯伦接着便
253 登场了，在6月底极其忠诚地接受了担任党的主席这项困难而又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完全控制了调查研究部。鲍德温借助于张伯伦的威信，得到了大量的力量。人们普遍相信，由于他头脑清楚，逻辑性强，是能够开展一项更富建设性、更积极的政策的。

然而，党内的不稳情况并未减轻。丘吉尔仍然是一位公认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在下院他带头激烈反对政府，据说他赞成同劳合·乔治和自由党人达成一项协议，把政府赶下台，在保守党—自由党合作的基础上进行选举；换句话说，就是恢复旧的联合。几乎没有任何计划能比这更使鲍德温和张伯伦感到厌恶了。这两个人对劳合·乔治极不信任，非常讨厌。南帕丁顿于1930年秋输给了一个受到比弗布鲁克支持的无党派的候选人，这件事动摇了但并没有毁坏鲍德温的地位。可是，到1931年2月，领导又成了问题。张伯伦在日记中记载着，他“正从全国各地收到一些信件和消息”。^①然而，除了在背后说他的朋友和领袖的坏话，此外他别无其它可做了。丘吉尔由于印度制宪建议的问题而从影子内阁中引退，对此他强烈反对，尽管他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以卓越的气势和技巧对政府进行了攻击，却使保守党感到很高兴。2月26日内维尔·张伯伦从主要代理人那里收到了一份非常令人沮丧、带有浓厚的失败主义色彩的备忘录。在同奥斯汀·张伯伦、霍尔、坎利夫—利斯特、主任督导员黑尔什姆以及布里奇曼等人磋商之后，大家同意内维尔·张伯伦把这份文件拿给鲍德温一看。^①对于鲍德温仍然要任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185页。

职与掌权多年，想起张伯伦日记中那些真实的话，真是有趣：“我认为除了威利·布里奇曼之外，人们都认为鲍德温必须辞职。”^①

然而，报界大王们再次出来为鲍德温救驾了。圣乔治的补选标志着斗争的结束。在近代政治史上，这是最不寻常的插曲之一。²⁵⁴ 现任议员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死了，人们提议把这一席位让给穆尔—布拉巴宗上校，他以不能支持鲍德温为理由而拒绝了。这件事是很不利的。受到比弗布鲁克和罗瑟米尔支持的欧内斯特·彼得爵士当时宣告，他想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竞选。3月1日那天下午，鲍德温决定立即辞职。布里奇曼敦促他坚持干下去，至少几周也好。很清楚，圣乔治补选将决定这个问题，不管它的趋势怎样。这样鲍德温便留下来了。^②

自从著名的威斯敏斯特选举受到高级辉格协会与伦敦下层民众共同支持的福克斯被选为议员以来，还从未发生过任何可以比得上这次戏剧般竞争的事情。达夫·库珀以惊人的胆略首当其冲，进行了一场漂亮的竞选活动。尽管同比弗布鲁克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达夫·库珀还是无情地对他和罗瑟米尔进行了有力的攻击。选区的一部分是由一些时髦的大商号组成。它们的主人及那时与之住在一起的许多雇员构成了选民重要的一部分。全“社会”都团结在达夫·库珀的周围。黛安娜夫人已成为一个著名而深孚众望的人物了；甚至德文郡的乔治亚娜公爵夫人也赶不上她漂亮可爱。在每间客厅、每座地方大厅和每所学校都开过会。激动情绪日益增长，进而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鲍德温有一种起而应付一次真正危机的惊人的本领，他不久就从几周前的那种心情中恢复过来了。在女王大厅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他出来直接向报业大王们挑战。他攻击他们的品格与手段。在一生中他这一次发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185页。

^② 同上书，第186页。

怒了。他讲话的顶点是将永远留在政治历史上的一句名言：“对这些报纸的占有目的就在于权力，但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权力——这是古往今来婊子的特性。”^① 达夫·库珀以接近六千票的多数赢得了那次选举。反对鲍德温的运动开始消沉下去了，不久随着全国形势向一次危机发展而完全结束。此外，报业大王们失去了他们的权力，从未再夺回来。

丘吉尔 1931 年 1 月退出影子内阁对于未来具有同样的重大意义。他强烈地反对在印度执行的政策，实行那种政策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印度政府自治。因此他对于他的同事们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工党政府而采取的方针，表示极端不满。尽管当举国一致政府在这年早些时候组成时，他以特有的慷慨在保守党议员会议上提议投鲍德温的信任票，然而，他注定在十年的时间里没有担任职务，也没有控制一些主要事件。假如情况不是那样的话，历史可能确实就不同了。当丘吉尔重又上台时，英国再一次处在交战中。

回顾一下为保持领导地位鲍德温所进行的斗争，事情似乎很明显，他事实上受到了他的许多对手的保护。党的进步分子对他明显地不能设计或者不能在公众中间解释一项改革政策，不管多么表示不满，但对他在印度问题上的态度只有称赞。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能够得到右派的支持，但不能博得中间派或左派的支持。同样，那些受到比弗布鲁克如此积极推行的帝国自由贸易改革运动一般目的吸引的人们，不能接受他这些计划的细节。此外，他们越来越不愿参加一个对他们的领袖进行那样激烈的人身攻击而发起的运动。这儿又是那样，比弗布鲁克决不能得到他和罗瑟米尔那不稳定的联盟的帮助。比弗布鲁克怀有一个目的，这在

^① 一般相信，这些话是鲍德温的表兄弟拉迪亚德·基普林送给他的。这些话确实是和他相称的。

许多人看来那也许是空想,而他却稳步地、始终一贯地追求了整个一生。罗瑟米尔既反复无常又不公正无私。因此当鲍德温奋起反击时,他能毫不困难地把党团结了起来。他关于印度的出色演讲以及他对报业大王们的毁灭性攻击,大大地增强了他的形象。如同他一生经常那样,他不仅能够博得议会内外保守党人的同情,而且也能博得他的同胞大众的同情。

在这一时期,有关它的内部历史现在已部分地揭露出来了。我们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同我一样不再在下院当议员的人们,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大都茫无所知。通过偶尔的演说或文章,我竭尽全力使我们在上届议会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能够保持下去。在这方面我特别得到了诺埃尔·斯克尔顿的同情和帮助。但他在1929年11月警告我说,“你不会从现今保守党那里得到思考与献身的反响。在他们承认有必要思考之前,他们还必须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这可能是一个几乎比下院内外任何其他党员对政治更具有建设性思想的人在一种不寻常的沮丧心情下写出来的。那时我们很难知道,我们纯党派的困难在仅仅剩下两年的政治发展中,何时将能获得解决。在我那新选区的一些大会上,我坚持我的见解,但是我开始愈益坚定地转向需要关税和保护贸易制度方面:关税做为报复手段,保护贸易则做为一种手段保护我们困难严重的重工业。与此同时,我和比弗布鲁克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讨论。由于年轻缺乏经验,有一个时期,我总想出来公开支持他那改变领导的活动。比弗布鲁克比一些人对他称赞的更为明智,更为慎重。他敦促我置身于任何可能使我为难的局势之外,并且不要作任何危害我的地位的讲演。我当时仍然希望早日有一次补缺选举,他甚至竭尽全力以防止来自农场主或其他方面的任何无党派的反对。正如事情所证明的那样,我们的道路注定多年没能再会合。的确,除了一两次之外,我不记得是否还曾看见过他。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早期的一个阶段我在供应部当了他的副大臣，才又经常见面。那个时候我才懂得正确评价这个不可思议的刚愎自用的天才人物他那非凡的才华。

如果说在整个这届议会反对党处于混乱状态的话，那么一种同样的分裂很快就开始冲击政府了。他们起初满怀希望，而且获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国外。在海牙会议上——处理那令人烦恼的赔偿问题的一系列冗长的会议之一——斯诺登几乎取得了一次胜利。虽然所取得的结果同他有力地保卫英国利益所做的完全不相称——这一成功的斗争总数也不过是扬格计划名义上的年金二百万英镑而已^①——但是他赢得了已经开始对不断向他们要求做出牺牲感到厌烦的英国人民的赞同。亨德森做为外交大臣负责签署了所谓“非强制条款”，根据这项条款，英国有义务将一切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裁决。这受到了广大舆论的欢迎，大家在国际联盟和一个和平解决国家冲突的国际体系中看到了未来最美好的希望。1929年10月同俄国恢复外交关系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更不用说商业团体了。施特雷泽曼之死给未来投下了阴影；但希特勒起而掌握实际权力仍然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尽管在德国议会里纳粹党的席位1930年9月从十二席增加到一百零七席，而出现令人担忧的迹象。

尽管法国和意大利持反对意见，海军会议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至少导致三大强国——美国、日本和英国——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巡洋舰的数目限制为五十艘，决不符合英国海军以及在战时保护商船这一极其重要任务的实际需要。丘吉尔据此对协议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但是公众却觉得某种协议至少总比什么也没有好一些。1930年6月法国军队最后从莱茵兰撤离，这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日期还早得多，这标志着国际和解进一步发展了。亨德森在

^①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374页。

日内瓦对一些事情的处理在国内和国外都赢得了赞许。他是一位最孚众望的外交大臣，他的国际声誉成了政府的一份财富。1929年秋麦克唐纳对美国的访问很成功；英美关系近几年来不很融洽，这次访问使之相应地得到改善。最后，朝向印度宪法坚定前进和召开圆桌会议，为麦克唐纳提供了一次施展他那调解才能的机会。²⁵⁸这个机会很快就被他抓住了。鲍德温给了他慷慨的帮助。因此，无论在外交领域或者帝国事务方面，工党政府都发现自己并不处于困难的境地。恰恰相反，尽管保守党反对派对于这方面或那方面的批评，政府还是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指望普遍的支持。的确，与其说是在政府方面，不如说是在反对派营垒里露出了裂缝。

对于麦克唐纳和他的同事们来说，不幸的是，象过去和后来那样，公众经常对于国内问题比对国外问题更为注意。真正的考验来自国内。在普选时，社会主义党提出了大胆的主张。他们而且唯有他们才能处理失业问题。他们没有很明确的计划，但是他们许下了非常美好的诺言。通常被人们看做是一位严肃的政治家而受到尊敬的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小姐，甚至轻率地断言，失业可以在三周之后得到救治。大选中获胜的政党往往发觉自己面临履行自己誓言这样的难题，那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就工党政策纯社会主义方面而言，麦克唐纳的困难在某种意义上由于两个因素而显得单纯了。首先，由于下院的组成没有明显的多数，这意味着政府必须依靠自由党的支持。这是将社会主义试验放在隐蔽地位的一个适当的借口，试验社会主义的愿望在他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遥远了。“进化的”是他现在用来描绘他那社会主义招牌的一个词儿。其次，核心内阁是由温和主义者组成的。左翼领袖们，象惠特利吧，明显地被排斥在外。如果说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正在消灭殆尽，那么斯诺登的社会主义在事情压力之下几乎早已烟消云散了。事实上，他的观点同那些主要的十九世纪激进分子的观点

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对紧缩甚至比对改革更为热心。他同样坚决反对带有劳合·乔治那种扩张主义观念气味的东西。确实，他同意任命 J. H. 托马斯负责就业方案，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党的老战士乔治·兰斯伯里、苏格兰事务部政务次官托马斯·约翰斯顿以及奥斯瓦德·莫斯利等人的协助。但是，斯诺登说得十分清楚，这个机构不会作出任何有效的东西。各处是可以做出一些小的让步的，从而装饰一下门面。因此，议会那时仓卒通过的发展法令和殖民发展法令，只不过是“授予权力”而已。财政部的“看门狗”将努力使他们自由的地位得以严格保持。斯诺登在下院谈到失业救济计划的时候，使用了这样一些预兆不祥的词语：

需要耗费巨大经费的方案只有等到繁荣恢复的时候。

更加简明地陈述一下跟一个萧条时期公认的纠正方法正相反的东西，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形下，尽管麦克唐纳庄严建议议会要象国务会议那样行事，试图从总体上来说使议会分担他的一些责任，但是一些更为怀疑的议员则看出这个宣布意味着他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事情。在 1929 年 6 月选举的时候，失业人数是一百十六万四千人。这被工党抨击为不能容忍的数字。到 1930 年 6 月时，失业数字达到一百九十一万一千人；而到 1931 年夏天，失业数字达到二百七十七万人。这是对社会主义者在大选时所提出的崇高愿望这件事情的严酷回答。当然，这并不是政府的过错。但是他们倒霉“正好赶上战后国际经济的不健全的结构开始崩溃的时候上台”。^①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它发生的原因。但正如历届政府把功劳当作好运一样，在我们生活于这个政治上严厉的世界时，他们必须承担恶运的重担。假若反对党议员对前届政府在四年半的时间中对他们所做的一切谴

^①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 357 页。

责都未报复的话，那么他们就确实是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克制了。在四年半当中，他们几乎每个月都遭到一次在失业问题上的不信任投票。他们对形势恶化是那样地悲叹，要想他们不利用它是不可能的。

如果失业数目不能减少，那么对失业者仍然必须设法维持。²⁶⁰ 1929年选举之后不久，内维尔·张伯伦要我去见他，讨论失业保险的前途问题。这是使我感激的一次恭维。我还记得在一次交谈中，他对我在前届议会中所采取的方针表示出一种令人料想不到的同情。同时，他感到这个问题将是工党政府唯一弱点，并认为我们应当制定出我们自己未来的某种方针。因此，我送给他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概括了我的观点，其中有些后来成了国家援助委员会的内容。

当时，一个辛辣的讽刺，采取一系列措施这样的任务落到了做为劳工大臣的邦德菲尔德小姐肩上，这些措施不是在三周之内消除失业现象，而是增加财政部对于失业基金的补助。在议会开会后不久，增加补助首先就成为必要的了；在秋天，要求了一笔更多的款项，在此同时，做了某些重新安排，以便让一大批人得到过渡性救济，即使他们未能缴纳最低数目的税款。关于证明他确是“真正在寻求工作”这个责任迄今为止都是落在申请人身上，对此她也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件；作相反证明的责任则落在劳工介绍所官员身上。在这项议案的讨论过程中，政府被迫委派一个皇家委员会，检查这个制度的整个作用。

1930年春，兰斯伯里、莫斯利以及约翰斯顿关于减少失业的建议提交内阁。这些建议收录在一份文件里，它不久就以“莫斯利备忘录”为人所知，而且很快就出了名。内阁在5月否决了这些大胆的计划。一个月之后莫斯利辞职了。他的主要思想尽管大部分同工党的竞选诺言一致，但也包括一些新东西：在工业部门尽早退

休;以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同外国特别是帝国范围内的生产者的进口限制和大宗购买协定;英国农业的发展;公众监督下的工业合理化,以及一个经过改进的工业发展贷款制度等等。这些思想,至少做为一个行动的基础,将被许多无党派的批评家接受。莫斯利在工党的一次估计形势的特别会议上博得了极大的同情。但在这时候他犯了一个致命的过错。他不仅坚持在表决中当然只能得到有限支持的投票,而且怀着颇为好斗的情绪,在工党1930年的会议上继续进行斗争。在他自己看来,对这种表演他是满足了。但是,在同年12月,他发表了一项受到A. J. 库克以及包括斯特雷奇、比万和W. J. 布朗在内的另外十七名议员支持的声明;^①接着在1931年初,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宣布成立“新党”。不难看出,不管他的建议有多大价值——这些建议是值得注意的——但他在战术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有的青年人(正如我亲身体验到的那样)都感到锻炼耐性是不容易的。但是回顾往事,事情就很清楚,假如他当时承认暂时失败,并继续进行宣传鼓动,而同时留在工党的话,那么他的地位就会很牢固了。六个月以后,当崩溃到来时,党发觉自己分崩离析,莫斯利本来有可能受到欢迎,参加核心集团。假若他能够获得同议会外的旧工党政府的领导成员们一起重新选举的话,那么他就会发现,他的对手只是兰斯伯里和艾德礼,前者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年事已高的人物,后者在那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人。这样,党的领导大权可能很容易地落到他的手中。自然,所有这一切事后容易认识;然而,教训却有待人们去沉思默想,细细玩味。相当傲慢与急躁的性格结束了他的议会生涯。后来,当他隐蔽在议会以外的运动中,试图将法西斯主义引进英国的时候,他就注定要失败了。然而,在早期阶段的1930年春天,他在所有的党派中都有很多同情者。不管是否明智,可能是不明智的,我

^①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359页起。

忍耐不住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这引起了一阵哄动。这封信于1930年5月27日发表，它最重要的段落如下：

形势……相当简单。做为1929年大选的结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组成了，在实施社会主义者对人民所做出的那些诺言（这些诺言特别要消除或缓和失业现象）的任务中，奥斯瓦德·莫斯利被委派担任了如果不是第一把手，至少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政府负责处理我们的事务的那十二个月的过程中，人们曾严肃地强调了这个问题，而失业的压力几乎增加了一倍。面对着这场惊人的、甚至是特别严重的大灾难，奥斯瓦德爵士似乎设想出了一个新颖的，并且毫无疑问，根据所谓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所公认的标准来看也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真的主意。他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并且实际上竟把它交给了他的领袖，这份备忘录提议试图执行至少是某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誓言和许诺，而社会主义党就是利用这些誓言和许诺取得了政权。 262

这份著名的备忘录被认为是一天才的学究式的杰作，无疑在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大臣们中间激起了各自不同的情感，有的屈尊俯就来欣赏，有的温文尔雅地给以非难。但当这份文件上升……到……一份最后通牒的地步时，确实首先遭到怀疑，然后遭到极端厌恶和愤慨。

假如这些感情只限于社会主义党“资格老的政治家们”的话，那我就不会感到奇怪，一定不会感到惊恐。但是我承认，先生，我不理解是什么原因通常导致您和那些非社会主义者评论家们对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的立场抱这样没有欣赏力的态度。在我们的政治中，每当一个政治纲领为选举目的服务以后就被抛弃，这难道是公认的规则吗？一个政治家受到的赞扬同他执政时履行在野时许下的诺言的程度成反比，我们会接受这种玩世不恭的见解吗？……您的议会通讯员今晨评论道，奥斯瓦德爵士（在社会主义党会议上）的演说“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绝大多数建议都已经在《劳动与国家》一书中公布于众了”。这正是我的观点。假如这些建议新奇的话，社会主义内阁也许早已予以适当地抵制了。事实上这些建议是他们自己的正式计划书的一部分……

只是“选举诺言应当履行”这样一个建议，似乎使不只一个党的温顺

和平的人们骚动起来，它使所有政党中的所谓“温和派人士”受到极大的震动。它是一个新的但却是危险的试验，如果听任它不受挑战即行通过的话，那么后来它便可能成为一种奇异的先例传播开来，带来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必须立即做出一个榜样来。我们必须阻止腐败。不论什么人，只要破坏了政治游戏的规则，以至提议一个政治家应当说出他心中所想的事，表示出他所说的话的意思，那么他就必将立即受到严厉的惩罚，“以便杀一儆百”。

263 那封信继续对保守党的领导进行了一些苛刻的评论，并且表示希望那种在既自相矛盾又含糊不清的纲领基础之上进行竞选的惯例应该结束。一家报纸把我的信描述为“才华横溢，但欠慎重”。它的确是不慎重的。

我同奥斯瓦德爵士的友情很浅，尽管他的妻子是我的妻子及其家庭的一位老友。作为这个事件的结果，使我同他在后来几个月中进行过多次交谈，他那敏锐的智力与精明的才能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年晚些时候，我一度想和他的“新党”进行合作，因为他的纲领中有许多论点在我看来似乎既合情合理又具有建设性。但过后想起来，显而易见那些传统的政党都过分热衷于深壕固守，以至他发起的主张独立之类的运动都不成功，即使是对付那时正在逼近的一次如此严重的危机也是一样。人们尽力忠于他们自己的党，并且努力从内部去影响党的政策与性质，这在我国是一种深刻的、无疑也是一种健全的政治本能。这也许往往令人厌烦，使人扫兴，但它似乎可望导致一些结果，而不至在一种幻灭的心情下背离而去。我对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后来采取的方针深感遗憾。即使他的忠实朋友，如斯特雷奇和比万，当看到他的运动及其包含的每一件事情开始发展成为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时候，也都离开了他。这整个故事有些象一出悲剧。伟大的天才与性格的巨大力量被白白地浪费掉了。在那些离开莫斯利的人们当中有

一个叫阿伦·扬的，他曾是莫斯利的助手，并且不止一次是工党在伯明翰的候选人。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感到走向法西斯主义是十分令人厌恶的。我们建立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谊。在后来与我有关联的一些任务中，我曾得以利用扬的经验 and 敏锐的智力。

莫斯利辞去政府职务，以及保守党和自由党对政府政策的联合攻击，导致了劳合·乔治重新企图同麦克唐纳妥协。但这也使自由党产生了分裂，同另外两个党所受到的分裂打击相似。劳合·264乔治发现自由党在1929年的选举中所取得的新的团结，实质上是虚假的。自由党不久就养成了一种习惯（顺便说一句，后来他们经常遵循这个习惯），那就是在受到投票的考验时，他们不以一个单一的团体行事。当劳合·乔治试图向右转时，他将失去更左的议员们的同情；当他试图向左转时，他就遭到了右翼的反对。自由党人开始在不同的投票厅内进行投票。有时他们的小团体分裂成三股：第一股赞成政府，第二股反对，第三股弃权。后来在两个主要团体西蒙派和塞缪尔派之间发生的那种裂缝，那时就开始了。

当所有的政治党派陷入一种把握不定和有些混乱的情况时，政府则莫名其妙地犹豫不决。政府本身的弱点同它的对手们的弱点基本相同。在1931年的预算中，斯诺登并未真正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由于他接受了自由党的一项建议，按照著名的格迪斯委员会^①的方针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推荐节约，因而一次保守党的不信任投票最近被延缓了。在委任一个由乔治·梅爵士^②领导的委员会的时候，斯诺登一定会知道他正在盲人骑瞎马——或

^① 在埃里克·格迪斯爵士领导下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922年推荐了严厉的节约。

^② 做为议会辩论的一个结果，在2月任命了一个由咨询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前秘书乔治·梅爵士任主席的委员会提出节约建议。

许是正在埋下一颗地雷,因为乔治·梅的报告后来弄得臭名远扬。据多尔顿^①说,同他的愿望相反,内阁在这个月否决了对保险津贴的任何缩减。然而基金不断增加着的开支将证明是政府崩溃的根本原因。很可能他感到梅委员会的报告将使他的党醒悟过来。因此,他仅仅做了些小的调整,并将征税稍微增加了一点便平衡了他的预算。他增添了一项未来对土地价值的征税以贿赂自由党人。但是预算并未做出真正的尝试去应付当前的困难,至少没有根据大家认为是斯诺登赞同的正统方针。

265 夏天过去了,那曾经冲击整个欧洲的暴风雨在表面上看没有到达英国。恰好在议会休会之前的一次辩论中,虽然斯诺登和张伯伦根据先前的协议都发出了严重警告,但并未采取行动。议员们都象往常一样纷纷离开去度暑假。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紧张日子并未察觉。当他们假满归来时,发现一个由麦克唐纳主持的新政府,靠所有政党拼凑起来,而工党的大部分处在反对党的地位。这是举国一致内阁,它注定至少在形式上延续到1940年由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取代为止。

关于1931年危机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形势,人们已经撰写了千卷万册书籍。某些主要演员——包括斯诺登和赫伯特·塞缪尔——他们自己作了叙述。还有其他情况,象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吧,他们的传记作家已经发表了大量从他们自己的日记和记载中摘引的片断。一些不重要的人物,他们只是事件的陪衬者,例如多尔顿,记录下了他们自己的感想。麦克唐纳保持沉默;任何根据他的文件的叙述都无法得到。国王乔治五世的作用被他的传记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描述得相当细致。对于整个故事的细致分析包含在R.巴西特所著的《一九三一年》一书中。他谨慎仔细地估量了所有的证据,要对他的主要结论持不同的意见那是

^① 休·多尔顿:《回忆录》,卷一:《追怀往事》(伦敦,1953年),第264—265页。

困难的。然而个人对这样一种局面的作用和反作用总是含糊不清。即使时间已相距很远,但 1931 年这出戏,作为一件趣事,无论从人的观点还是从技术观点进行研究,还是大有裨益的。

不管他晚年的失败情况怎样,那主要是由于身心疲惫所致,麦克唐纳肯定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他是工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他在下院的少数议员中建立这一组织,在他的权威之下有力量两次组阁执政。他给工党带来尊严与信誉。在国外他受到赞扬;在国内,直到他同党的主体于 1931 年决裂之前,一直受到他的支持者的崇敬。他举止文雅,谦恭有礼,真诚自然,惹人喜爱。当他决定组织举国一致内阁的时候,他做起来是很留神的。266 他知道他会成为众矢之的,受人辱骂,被斥为叛徒。他的境遇要比约瑟夫·张伯伦 1886 年那时的境况更为艰辛。张伯伦把一个他自己曾是其中一位热心而积极的成员的老党分裂了;麦克唐纳则暂时把一个事实上他自己是创立人之一的党毁灭掉了。但从所有的叙述来看,尽管麦克唐纳对于他的许多同事的那种狭隘很明显是讨厌的,但他对于他们的利益还是关心的。他并没有真正地努力去把内阁的或青年大臣们的主体吸收到自己的周围来。对于那些政治生涯即将结束的人们,他却乐于跟他们在一起,例如斯诺登、桑基大法官、J. H. 托马斯等人。但是一些年轻的人们,象赫伯特·莫里森等,肯定是同情他的,而麦克唐纳却似乎劝止了他们。换句话说,他满可作为一位政治家,不单单思考那些他看来是国家的迫切需要,他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坚信的那些短期的、暂时性的能够驾驭的危机,他也想到未来。他意识到,假如工人运动丧失了它的所有温和分子,那就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害。在事态的紧迫压力之下,工人运动可能遭到挫折。但它将复兴,并将仍然保持着左派渴望的那种固有的样子。这样来加以判断,那么,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而麦克唐纳的品行确实是令人钦佩的。

某些证据证实，麦克唐纳在事件发生之前几个月就在考虑一个举国一致内阁的可能性了。举例说吧，从内维尔·张伯伦 1931 年 7 月 6 日的日记来看，似乎麦克唐纳已经向保守党主席斯通黑文勋爵吹过风了，尽管他补充说，在向鲍德温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都同意“我们的党（保守党）一时一刻也不会容忍它”。^① 多尔顿在他的回忆录中坚持说，鲍德温和麦克唐纳之间很早就曾进行过一些会晤。还有其他类似的证据，说明鲍德温和麦克唐纳在春天进行过多次友好的会谈。从麦克唐纳的观点来看，这种谨慎似乎是明智的。同样，在这一时期他同劳合·乔治的许多交谈根据他的处境那是必不可少的。他毕竟是一个在下院中没有明显多数的党的领袖，因此他同其他两党的领袖们进行接触，那是很自然的。可是，鲍德温不同意参加“正式的”会谈，拒绝一项为劳合·乔治所接受的关于失业形势进行磋商的公开建议。

在莫斯利辞职以后，我还同他保持着联系，不时同他进行讨论。1931 年春他也和其他一些所谓“青年保守党人”以及自由党人和社会主义党人打交道，看看为了通过一项建设性的计划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联合。如布思比在回忆录中详加叙述的那样，这事是被鲍德温发现的，鲍德温谴责布思比和他的朋友们不是带领他们自己的一群猎狗打猎。^② 由于不久鲍德温把自己的那群猎狗同另外两群合并到一起，因此在这中间是有一定程度的幽默感的。无论如何，不能宣布麦克唐纳的任何深谋远虑的计策为有罪，也不能宣告他在那种情况下采取了非正常的行动而有罪。斯诺登的真正地位自始至终似乎更不鲜明。政府同意设立梅委员会是因为在几个月前受到了自由党修正案的压力。某些评论家认为委员会报告的发表时间定为 7 月 31 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那天是议会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 189 页。

② 罗伯特·布思比：《我为生存而斗争》（伦敦，1947 年），第 92 页。

暑假休会后的第二天。但是希望避免议会辩论，可能是由于想在休会期间维持住工党政府，也可能是想把它毁掉。

没有证据证明有任何精心策划的阴谋。危机本身摆脱了政治家们的控制。事件的经过如下：5月11日奥地利最重要的银行安斯塔尔特信贷银行破产，德国银行体系有瓦解的危险。6月20日胡佛总统延期一年偿付的建议，尽管是一个应付局势的有益而真诚的尝试，但是并不足以制止局势恶化。英格兰银行以及总的来看英国的银行体系，都竭尽全力以应付德国经济迫在眉睫的崩溃。确实，它们这样做是冒大风险的，因为他们短期借进长期贷出。但那毕竟是一个中央银行的业务。现在世界上大的金融机构互相帮助已成为公认的义务了。恐怕英国当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是他们同意了一项“停顿”协定，不收回贷给德国的款，不采取类似的安排来保护英国。事实上，法国人立即开始以极大的速度从伦敦大量提取黄金。 268

当时在英国发生的某些事件增加了国内的困难。皇家失业保险委员会在6月底作出报告，建议缩减津贴和增加缴纳。由于大家都理解的政治原因，政府是不能接受这件事的。7月初，等候已久的麦克米伦勋爵财政和工业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了。这未必就是一个透彻清楚的报告，对一个陷入混乱的政府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帮助。甚至由凯恩斯和其他几个人签署的少数委员报告也不会立刻有所助益的。整个报告是一些最优秀的专家多年来工作的成果，而它却是文不对题。7月30日议会开始休会度暑假。大臣们和议员们都分散到英国各地和欧洲大陆。象往常一样，鲍德温到埃克斯累班去了。7月31日，梅委员会报告出笼了。它确实耸人听闻。它到处动摇人们的信心。它要求削减开支一亿二千万英镑，其中一部分显然一定要落到失业保险体系方面。不几天以后，由纽约和巴黎提供的两笔各为两千五百万英镑的贷款迅速消失。

用一种办法把钱很快弄进这个国家，又用另一种办法很快把钱花光了。大臣们需要应付的就是这种局势。大臣们对于需要采取激烈行动并无争执。他们对于当局提出的传统解决方案也无异议。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根据经验写书，他们关于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的冲击各有不同的描述重点。当对于应该施用的救济法还依然争论不休的时候，对于导致这种局势的事物因果关系，人们没有什么争执，而麦克唐纳和他的同事们在8月就必须应付这种局势了。恐怕当时令人不能解释的是，不仅英国而且还有其他大约二十个国家恢复了金本位，从而导致黄金严重缺乏和更为严重的分配不当。那时黄金为许多国家储备所需要，这种对于黄金的吸引力本身就是紧缩通货的，并且是这一整个时期价格稳定下降的原因。黄金的年产量赶不上人口与贸易的增长。运送美国和法国的黄金并不是象在输出国那里那样被用来作为同样多的货币或信贷的基础。的确，从1926年至1931年额外流到法国一国去的黄金就等于世界新开采的黄金总产量。此外，英国按老的平价恢复金本位，作为一项补充，它要求工资、薪金和成本来一个相应的调整，而这又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危机逼近时，不仅整个世界发生困难，而且英国的出口货物按照货币计算更加昂贵了。用索尔特的话来说：“总之，1931年的英镑跌价表示经济力对于货币行动的胜利。”^①

但是对于整个工党内阁的真正指责，并不是说他们在原则上同财政部的见解有分歧，而是说他们没有贯彻那些原则的逻辑结果，而那些原则是他们接受了的。确实有象利奥·艾默里或凯恩斯那样的更为有胆量的人物，如果由他们主管的话，他们很可能遵循一种不同的方针。但是工党大臣们，不管他们后来可能怎样抗议，他们除了是些古典教义的恭顺信徒之外，不能自称为什么叫别的

^① 阿瑟·索尔特爵士：《恢复：第二次努力》（伦敦，1932年），第67页起。

人物。一句话，他们接受了诊断，但是拒绝进行治疗。他们同意大规模的节约措施。他们只是对任何缩减保险津贴的问题犹豫不定，最后进而从中破坏。这是工党的“圣牛”，是不可接触的。当然，支付已感不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辩论。然而，同较低的工资等级相比，并且考虑到它们新近的增长，它们决不是可以轻视的。此外，它们真正的价值较前几年大有增长，这是由于价格不断下降和随之而来的生活费用的减低。那些犹豫不决的大臣可能会要求立即 270 对进口货物强加某种控制，以此作为削减保险的替换物。他们这样的行动很可能得到很大的支持；因为危机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由于一个不平衡的预算。预算赤字甚至将比已经预料到的一亿七千万英镑还要高，而不是一亿二千万英镑，斯诺登在内阁会议上和在会外充分利用了这一事实。但这是以全部偿债基金保持在五千万英镑为基础的，它本身就是紧缩通货的。差额能够如期偿付，正如最终那样，那是通过直接税和间接的附加税来完成的。那个不平衡的预算无疑是由于全世界对于英镑实力缺乏信心。但正如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那样，真正的原因是支付平衡中不断增长的差额。大多数大臣都赞成百分之十的财政关税。但是他们不敢坚持这一点以对抗斯诺登的断然反对。他们可能已经建议采取特别措施去缩减进口物资。这些措施事实上举国一致内阁在秋天通过非常进口法令就要提出来的。他们能够得以制定限额、进口控制、大宗购买以及其他等等，而这同他们自己的教条是密切符合的。但是在那些带来灾难的内阁中所有的争论都明显地局限于制定如何执行必要的节约的细节，以减少预算赤字。更大的一些问题甚至连考虑过都没有，更别说坚决提出了。

因此，麦克唐纳和斯诺登的建议是根据对局势的判断，这种判断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确实为工党内阁的所有成员所接受。换句话说，当政治危机突然发生之时，在一般的局外人看来，关于应该

做什么似乎工党政府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做起来却畏缩不前。他们许多人对于他们的目的毫不动摇。“假如必须要做的话，就留给保守党员吧。”这是他们有点不令人鼓舞的呼声。因此，尽管削减本身不受欢迎，但这是工党正式立场中的致命弱点；公众不久就弄明白了真相。

271 在这些严峻的日子里，公众看到大臣们、银行家们以及很快还有其他政党的领袖们都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他们并不知道那些导致内阁分裂的内部争论。接着，随后在议会开会期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的内阁内层的讨论和许多大臣们各自的见解都为人们所知。的确，在这方面，那些辩论是异常激烈的，似乎没有哪位大臣想保持通常那种缄默。随着议会的连续讨论，越来越多的事情被暴露出来，并且经常争论不休。的确，舆论被所有这样的相互指责弄得有些厌倦了。事实为自己说话了。在两天的时间内，麦克唐纳不再是工党政府的首脑，而成为举国一致政府的首脑了。新的内阁迅速组织起来。内阁包括十个成员：工党四人，保守党四人，自由党二人。麦克唐纳自己的内阁同僚只有斯诺登、桑基勋爵和托马斯继续留了下来，保留他们的现任职务财政大臣、大法官以及自治领大臣。鲍德温成了枢密院长，这是个挂名的闲差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十分有势力的位置。霍尔就任印度事务大臣，内维尔·张伯伦成了卫生大臣，坎利夫-利斯特则成了商务部大臣，自由党领袖的副手赫伯特·塞缪尔成了内政大臣，里丁勋爵任外交大臣。政府的其余职务都由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显要人物担任。只有很少几名不参加内阁的大臣和一两年轻的大臣来自工党。

当这个给人深刻印象的班子宣布时，在国内外都大受欢迎。这是另一个“全部天才的内阁”，或者象丘吉尔据说曾评论的那样，是“一个接近于全是天才的内阁”。有两个重大的遗漏。丘吉尔被

排除在外，肯定是因为他那关于印度的见解。但是没有给他机会去考虑在国家的紧急关头，他要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去修改或者放弃那些见解。劳合·乔治由于一次以前和以后经常改变了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患了重病。他突然卧床不起，并且被迫经受一次很大的手术，这使他无法行动。对于他的某些追随者来说，可以这样推 272 测，这场不合时宜的病可能不是完全令人讨厌的。另外一个遗漏是约翰·西蒙，或者说是最近几个月来正在向右转的那个自由党人团体的一位代表。他的时运不久就来了。

当然，这不是一个在老的和丧失信誉的字义上的联合政府——象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那样。这是一个举国一致内阁。它的形成并不是作为一个无期限的联合，而是在一个短期的、有限目的的联合（它实际上继续了以后九年），据说英国不喜欢联合，但是象法伊林指出的那样，“英国并不反对联合，如果他们避开这个名字的话”。^①的确，麦克唐纳的成就简直是无与伦比的，甚至胜过了皮尔的成就；因为当罗伯特·皮尔在一次类似的危机中支持自由贸易，从而违背了保守党的意愿的时候，他立刻被迫离职，并且永远没有再重新掌权。麦克唐纳将能继续留任四年。国家工党——人们当时这样称呼它——所发挥的作用实在无法同皮尔派相比。皮尔派的各种集团已经太多了。

举国一致内阁勇敢坚毅，努力肩负起他们的任务。他们征收直接的和间接的新赋税以支撑预算。他们采取必要的节约措施，包括削减全部皇家服务人员的薪俸和减少失业津贴，他们以生活费用大量下降来为此辩护。从失业保险基金中的支付限制为二十六个周，假如申请者已经做出了充分的缴纳的话——这并不是一个不够慷慨的条款，因为这样得到的津贴几乎肯定要超过由保险统计员严格计算出来的缴纳价值。但是在二十六个周结束后，更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93页。

进一步的救济(“失业救济金”不是由缴纳筹集资金,而是由纳税人筹集资金)将不是按照权利来支付,而是根据申请者的需要来支付。这将由地方当局的公众救济委员会评定。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原则并不是不公平的;但是个人收入的调查以及全国对规则所作的不同解释,将成为重大痛苦的根源。

273 政府能够控制一个微小但却够用的多数,以此在下院为他们的建议进行斗争。不是批评他们在诚意或效率方面事实上不能“拯救英镑”。尽管采取了行动,英镑继续受到压力。9月15日因弗戈登的海军部队叛变是否是进一步挤兑黄金因而导致停止黄金支付的最后决定的原因,那是无法加以证明的。^①事实上,英镑定价过高,不能维持老的平价。但这对于所有党派里的那些真诚而高尚地为维护英国正直信誉而一起斗争的人们决不是一个谴责。假如没有做出削减的话,假如没有征收新的赋税的话,没有疑问英镑就要狂跌,就要相应地影响进口和出口,并发生有如总崩溃的情况。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记忆犹新,其他国家遭受了类似的灾难。在全国团结这一行动中的精神努力带来了许多物质上的好处。然而,随着时间一周周地流逝,实际问题出现了。政府的未来怎样呢?8月25日麦克唐纳发表声明,指出组成一个举国一致内阁只是为了应付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一旦任务完成后,它就将解散,这一声明是完全诚心诚意的。但事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鲍德温8月28日在他自己的党的会议上,在一片掌声中重复了这一诺言。黑尔什姆补充了一个附加条款,以两个月为合法的持续期限。但艾默里立即在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一想法的难处:

^① 两个团体对于强加给所有皇家雇员的削减表示异议。法官们在准备提出志愿缩减的同时,采取了高度宪法原则的立场,那就是他们的薪金不能由行政当局的一项法案就给改变。削减对海军入伍士兵的影响很厉害,他们采取实际行动进行了反对。

人家告诉我们说,这将只是几个星期的工夫,还说,接着新政府的成员们就要“屈从于合作者了”,再加入他们各自的党派,在主要问题上进行搏斗。经验表明,一个内阁仅仅对付一个问题就有多么困难。新的问题出现了,必须一一对付,这有助于证明延长政府的存在并巩固它,是正确的。^① 274

经过巧施妙计,几周以后困难圆满解决了。

在下院中没有一个党占有明显的多数。新的工党政府显然无法组成,因为议会地位由于没有麦克唐纳及其友人,甚至比以前更为软弱。一个保守党政府将不会有独立的多数,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例如一般税则,它认为这些措施对于处理一些基本问题是必要的。组织自由党政府是不可能的。然而,诺言是许下了,在这个条件下举国一致内阁便成立了。

议会于9月8日开会。当麦克唐纳和亨德森两人隔桌面对面地入坐时,真是一个生动的时刻。这两位终生的朋友曾共同创立了工党,共同组织了两届工党政府,如今他们永久分离了。据艾默里看来,丘吉尔既放肆而又胡闹。^② 但是丘吉尔演说的主要意义在于他接受了关税的不可避免性,并且呼吁自由党人共同予以支持。他还说选举越早举行越好。所有这一切,象当时丘吉尔的演说那样,经常被一些权威性的评论者认为是真实的,因此有点粗俗。但自然他是正确的。议会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似的,要在其剩余的任期内坚持下去,这是不可想象的。此外,英格兰银行于9月21日停止黄金支付之后,发生了一个新的情况。保守党人越来越坚持举行一次选举。自由党人提出一个有独创性的论点,说我们既然停止了支付黄金,英镑贬值已自然而然地鼓励了出口,妨碍了进

^① L. S. 艾默里:《我的政治生涯》,卷三:《无情的岁月,1929—1940》(伦敦,1955),第62页。

^② 同上书,第64页。

口,那么不管以前的各种论点是什么,现在关税便无必要了。如果
275 不需要关税,同样也不需要举行一次选举了。这似乎是受到致塞
缪尔的一封信的支持,麦克唐纳在那封信中说:“很明显,现在进行
一次选举甚至连理论上的理由也没有了”。^①在两周以内议会就被
解散了。

保守党人地位巩固,他们继续加快步伐。他们准备继续那个
联合,但“只有在迫使塞缪尔以及那些不妥协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辞
职这样的条件下”。^②麦克唐纳摇摆不定。他最初想同意举行选
举,并发表联合宣言;接着,在自由党人的压力之下,他又摇摆回
来。最后,内维尔·张伯伦提出了一个方案,可称为“大夫的嘱
托”。举国一致政府将象一个联合政府那样,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下院,而把政策留待他们重新掌权后再行决定。对于这个方案进
行了许多次讨论,劳合·乔治对自由党人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叫他们
拒绝在所建议的基础上参加。他对于他称之为塞缪尔的背叛愤
怒得要发狂了。^③最后,自由党人接受了这个方案的一个修正案,
这对每人都似乎是一个美妙的解决办法。

大家一致同意政府将作为举国一致政府解散议会,重新选举
下院,让一个政党的领袖自由地提倡他所喜欢的任何政策。这个
有点奇妙的政治合作基础似乎很适合所有有关的人。麦克唐纳能
够发表一个一般宣言,赞同全国团结;塞缪尔能够鼓吹自由贸易;
而鲍德温则可以为保护贸易进行辩护。如果不是在这样危急的时
刻,一个政府呼吁支持这样一个纲领,那人们就要一笑置之。然
而,够奇怪的,在政治家看来似乎是荒谬可笑的事情,而在普通老
百姓看来,则是合情合理的。工党政府垮台了。人民所要求的是

① 罗伯特·布思比:《我为生存而斗争》,第94页。

② L.S.艾默里:《我的政治生涯》,卷三:《无情的岁月,1929—1940》,第67页。

③ 弗兰克·欧文:《暴风雨的历程》,第720页。

一切怀有善良愿望的人们应当团结在一起，并充分利用这种情况。他们对于保护贸易—自由贸易本身的论战并不那么太感兴趣。象往常一样，由于他们走在那些热心的党人的前面，他们正在开始感到关税论争有点过时了。

所有这种反复在 10 月 5 日告一段落，议会立即解散，选举定于 10 月 27 日举行。

276

在 8、9 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在德国住院，试图恢复我的不良的健康状况。不仅旧伤使我极感痛苦，而且因此使我患了一种神经衰弱症，以致我的健康很坏。可是，我不久就开始好转了，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从国内传来的消息。亲戚朋友对我很好，几乎每天给我传递消息。这些消息将大混乱描绘成一幅生动的图画。我的内兄哈廷顿勋爵在 9 月 16 日给我的信中对于西蒙的演说进行了很有趣味的描述，他嘲讽地叫那篇演说为“一篇杰作”。

他用一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话解释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如何最诚实地在几百次会议上结论性地证明了出口是为支付进口这一建议，当发现这个建议是不真实的，那又该是多么令人难以为情。

信中继续写道：

当斯诺登用嘶哑的嗓子解释说，最近两三天他才第一次看清他的老伙伴们的真实面目时，他那夸夸其谈的演说真够自负啊。

南希·阿斯特在 9 月 25 日写的信中，对于海军回到普利茅斯的情景进行了一番十分凄楚的描述：

希望清静一下，上周末我前往普利茅斯，发现自己卷进海军事件中去了。看到伟大的大西洋舰队回到普利茅斯海湾时，没有人欢呼迎接他们，真是令人悲伤。好多好多人拒绝出去观看他们，年老的水兵们站在那里泪流满面。事实上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严重。水手们感到不满，他们也知道走通常路线将要花费几周的时间，而他们知道削减要从 10 月 1 日开始；因此他们采取了他们认为将会有效的那个唯一的方针。

我的妻子继续不断地把她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新闻写信告诉我，敦促我尽可能长时间呆在外面，以完成我的治疗，因为是否将举行选举还不一定。我的内兄嫂哈廷顿夫人描述她同一位自由党朋友的晤谈，他说：

277

……由于塞缪尔确实对自由贸易抱坚决明确的态度，因此，关于选举，他把它搞得复杂化了。我把你告诉我的关于他鼓吹在巴勒斯坦征收关税的事告诉了她，但她对此一笑置之。

9月21日她写给我一封信，对于放弃金本位的决定给予了颇为有趣的描绘。她说，一位伦敦财政金融界的朋友，“我想他懂得事情很多，他说，假如我们保持镇定，那可能是对于贸易最好不过的事了”。后来，她从德比郡来信说：

鲍德温先生和鲍德温夫人一直在这里，直到今天下午，他不得不在参加内阁会议时才离去。

他看样子忧心重重，但是我认为总的说来他还是很沉着的。他不断地抓耳搔腮，那是他内心紧张的唯一标志！

恐怕我收到的大量书信中最有趣的要算克兰伯恩勋爵的那封信了。他的信正好是在自由党人置劳合·乔治于不顾，最后决定继续团结以前写的：

按照目前进展的速度，本届议会剩余的两年半的时间，在国家领导人还没有下定决心采取自由行动之前很久，恐怕就要过去了。下次发生危机时，一定要安排一下，让劳合·乔治把病床移到离家比原来近一天路程的地方。内阁整天忙着往返于丘特。在他们的办公室或者在下院都看不到他们。人家告诉我，本周星期二在内阁会议结束时，拉姆齐说：“怎么样，明天下午我们再见面吧？”“我怕不成”；塞缪尔说，“我必须到丘特看劳合·乔治去”。“好，星期四怎么样？”“我怕不行”；里丁说，“我必须到丘特看劳合·乔治去”。“好吧，我怕星期五对我不方便”。拉姆齐说。“我必须去西翰”。“什么！”斯诺登说，“你也必须去看他？”“我说的是西——翰”。无论如何，他今天访问他去了。还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

去或者结果怎样。但我不相信他们能再拖延多久了。我们应当在明天或后天得到通告。

尽管所有这种地位之争可能被认为与国家必须尽力设法解决的那些困难相比是不值得的，然而低估许多政治家在自由贸易问题上诚恳地坚持着的那些有力见解是不公平的。旧的见解在论战中被提出来了，这一论战几乎是以神学般的热情辩论了一代多的时间。现在几乎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似乎是一个要按实用主义方针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对许多较老的政治家来说却是基督教《圣经》中的“约柜”。甚至连丘吉尔在这个时候也不能从支配过他青年时代的那种历史性辩论中解脱出来。尽管他在议会中明智地承认普通关税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他这样做是立足于实际形势的，而不是因为他在理智方面心悦诚服了。很快，这个他好长时间以来那样坚持的问题由于外交形势的恶化以及新的、可怕的危险的出现，就相对地变得不重要了（至少对他是这样）。278

一般相信劳合·乔治对抗举国一致政府更多地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理论上的根据。在他失权以来最为严峻的时刻中，他发觉自己被病魔弄得无能为力，这真是一个恶运。他一定感觉到，假若他不受到挫折的话，那么他就会在处理这个危机方面发挥重要的，也或许是决定的影响。他知道早日举行选举一定意味着保守党的重大胜利。尽管他几乎不能参加选举，但他却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在演说中他使用了一些尖酸辛辣的语句。他把举国一致政府称为“一个在爱国要求掩盖下的党派阴谋”。^①他可能忘记了1918年秋对于他自己的选举的那些批评了。

解散议会一经正式宣布，我的妻子便给我发来了一份电报，叫我自己决定，看看是否我已恢复健康，可以回去竞选。我一点也不怀疑，健康当然要恢复，但是斯托克顿也要夺回。在这两者之中，

^① 弗兰克·欧文：《暴风雨的历程》，第720页。

市议会选举更为紧迫。我仍然相当虚弱，走路还得拄拐杖；但我设法在竞选活动开始后几天到达了。我的妻子已经工作半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了，组织工作正趋于完成。我发现那种在全国锐意执行的策略在地方上也同样在进行。首先，现任工党议员赖利先生将怎么办呢？我想谨慎的做法是发表声明，假如他以麦克唐纳和政府的一位支持者的身份参加竞选的话，那么我就退出竞选。我一声不响。这是一个极其令人焦虑的时刻。要是结果弄清楚了他是一位爱国者的话，怎么办？幸运的是，他果真是一位忠诚的党人，我用不着做这样重大的牺牲了。那可肯定要吞下一颗苦药丸了，如果将希钦的安全席位放弃之后，我感到不得不去支持我在斯托克顿的老对手的话。我从来就感激他的坚定忠诚。其次，自由党人会干些什么呢？恐怕一切事情都要取决于此。在这个选区有一个预料得到的自由党候选人。他肯定不能取得胜利，但他可能阻止我取得胜利。经历了许多反复变化，结果达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安排。在米德尔斯布勒的两位自由党人可以在没有保守党对手的情况下去进行可靠的竞选，而自由党在斯托克顿则退出竞选。金斯利·格里菲思是一位干练的议会议员，他那时是西米德尔斯布勒的议员。假如自由党有任何前途的话，那么他就有一个辉煌的政治生涯。

我们的宣传很简单，很容易被人接受。我们所必须做的一切就是集中在工党大臣们和前任大臣们互相谈过的事情上。达勒郡直到那时还是工党的一个据点。自然，正统工党的全部力量集中反对麦克唐纳。似乎他不可能保持住他在西翰的席位了；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开始听到了甚至那边令人鼓舞的消息。麦克唐纳紧紧地掌握着人民，因此人们对他进行的那些尖刻而不公平的攻击遭到不好的评价。斯诺登的广播与报纸文章也是尖刻的，但它们都是那样充满讽刺，才华横溢，以至影响极大。在论战中证实他是一位

真正的斯威夫特，^①他几乎同样地善于冷讽热嘲。在选举接近结束时，朗西曼制造了关于邮政储蓄的一个极为有害的故事。大多数人觉得这是很不公正的。他宣称人民的存款被借给了保险基金，并有损失的危险。实际上，在手续程序上并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毫无疑问，朗西曼打算辩论的是，假如发生了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那么人民的储蓄，不管是存在邮局，还是存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最上等的安全机构中，到头来将证明是没有价值的。还有，我们并不因为在讨论中提出枝节问题的是一位最有声望的自由党人而感到遗憾。 280

我不记得在斯托克顿有过任何更为激烈的竞争。对我来说，那些挤满了人的教室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大楼内外听众激动的呼喊声与反对的喊叫声至今仍在耳边。在选区的大多数会议上，根本不可能发表演说；但通常为质询与答问安排一定的程序。老手们经常告诉我说，一场吵闹选举是一个好的预兆，一切都很安静意味着反对党是有信心的。由于他们对我个人并不特别反对，因此他们认为假如确有把握取胜的话，便没有必要大声叫喊去压倒我了。但是假如他们认为他们将要败北的话，那么吵闹就开始了。在二十二年多的时间内我在斯托克顿进行了六次竞选，的确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在地方上如同在全国一样，对工党前任大臣们提出指控的主要理由是怯懦——他们玩忽职守。在一个当时有那样众多的人依赖所谓“失业救济”的社会里，家庭经济调查和削减失业津贴自然是十分不得人心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全国说来，国家需要这一观念胜过了个人利益。此外，人们广泛的常识使失业者相信，假如举国一致政府重新掌权的话，那么回到工业城市就更有找到工作的希望。

投票那天到来的时候，我们都有胜利的信心。但当数字实际

^①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译者

发表时，双方似乎都感到有些茫然。我们曾预期取得三千或四千那样的一个多数。但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正好超过一万一千票的多数。我得了二万九千一百九十九张选票，我的工党对手得了一万八千一百六十八张。然而，当细查数字时，工党选票仍然保持相当稳定——仅仅比两年前少八百票。情况是，一万名自由党人肯定是相当一致地投了我的票。就选举进行中那些戏剧性的情况而论——党被自己的领袖们所抛弃，政府的突然瓦解，混乱与叛卖的感觉——工党的得票数还是明显地说明党员的忠诚。举国一致政府获得压倒多数的真正原因是在那么多的席位上所进行的一对一的两人竞选。^①

从全国总的情况看来，1931年投政府候选人的票是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投工党票的则是六百五十万人。当选的五百五十四名议员支持政府：保守党人四百七十三名、西蒙派自由党人三十五名、塞缪尔派自由党人三十三名，以及国家工党十三名。首相麦克唐纳以五千九百五十一的多数票在西翰胜利当选。在达勒姆郡，如同在约克郡和兰开夏郡一样，在那些地方从来都是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的铁打江山，现在一席一席地垮了下来。这在我国历史上恐怕是一次最大的压倒一切的胜利。我怀疑将来是否能有与1931年10月27日大选结果相等，或者与之相匹敌的情况。11月2日，鲍德温在同国王的一次会见中，“明白表示他将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因为首相对他的新党一无所知，特别是对那些保守党人——他们中间许多人年轻、冲动、野心勃勃——他们没有机会出名，因为没有反对党可以攻击”。^②在随后的十年之中，这个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被克服了，但是大量的问题产生了，因而发言反对政府是不会有有什么困难的。

^① 休·多尔顿：《回忆录》，卷一：《唤回昨天》，第297页。

^② 哈罗德·尼科尔森：《国王乔治五世：生平与统治》，第494页。

第十章 抢救灾难

282

在我称之为“重大危机”的1929—1931年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使我们许多人意识到或半意识到,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末了的几个场面的确是富于戏剧性的。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垮台和以他为首的举国一致政府的组成;社会主义政党的分裂;维持金本位的斗争,从而避免了据认为放弃金本位就不可避免要发生的大动乱;停止支付黄金的决定,以及与之俱来的、或许说由此促成的因弗戈登港舰队的“叛变”,所有这些事件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段引人注目的、没有先例的历史。尽管新政府的威信足以使英镑避免灾难性的崩溃,可是我们似乎正在驶入方位不明的新海域。同时,美国的大萧条促使它收回现有的对德国的短期贷款,并停止一切对外贷款。那时,魏玛共和国日益虚弱,成了一个普遍忧虑的根源。欧洲的实力和欧洲人在全世界的威望和权势所依赖的全部坚实基础,几乎已经倾圮了。结果,我们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所根据的许多设想,开始受到怀疑。甚至对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来说,新的问题也似乎需要新的解决办法。

大战结束以来,经历了整个二十年代,欧洲得到了惊人的恢复,这正象我们现在所体会到的,一方面是由于美援的大量流入,但在另一方面也由于欧洲政治家在处理最令人困扰的国际难题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尽管债务和赔款问题仍然象乌云一样笼罩着欧洲,然而为减轻债务和赔款的压力而采取的一个接一个的措施,却起了很大的缓和作用。在道威斯计划以后,协约国先在鲁尔撤兵,后来于1930年又在莱茵兰撤兵。1929年的扬格计划进一步削减

283

了赔款。用史末资在 1919 年的话来说，虽然“旧的欧洲已在解体”，可是国际联盟似乎注定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成为“这个巨大的遗产的继承人”。如果说英国经济形势的进步还跟不上别的话，我们却很有信心地希望，随着国际贸易的恢复，我们的主要困难是会得到克服的。

1931 年发生的事件，对于想恢复到 1914 年以前“正常”状态的希望，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战争必然引起一些巨大的变革：在经济和金融方式上的变革；更大的是关于社会正义概念的变革。但直到 1931 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这些变革将不会或不能按照整个十九世纪创造的越来越多的财富及其分配方式所形成的进化型式变化。我们只要去掉由战争及其后果对贸易人为地所造成的障碍，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然而在 1931 年以后，我们中间许多人却感到病症更加根深蒂固。情况变得很明显，旧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已经垮台，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即使在欧洲，甚至在美国也是这样。因此，对整个制度必须重新估价。它也许不能再存在下去了；它肯定不能在没有激烈变化的情况下再存在下去。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我和我的许多朋友就是以这种心情，按这种思路行动的。在二十年代，我们集中精力来减轻贫困，并采取特别的金融措施，使困难最严重的工业部门得到救济。当时，可以期望世界贸易体系逐渐恢复，使英国出口贸易恢复其实力的条件再度形成，从而为英国经济的稳定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到了三十年代，类似革命的形势发展了，不仅国内如此，在海外也是这样。这就导致以新的表现形式进行政治及经济试验，这些试验真是刻不容缓地以新的独裁政治及更加嚣张的旧的独裁政治的面目出现。至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向来是如此依赖出口的，形势就变成灾难性的了。1929 年，英国出口价值约为八亿三千九百万英镑；到 1931 年，就下降到四亿六千一百万英镑了。

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这种疾病传染多远呢？它成为我国特有的疾病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与此同时，物价一直下降，给负债人和制造商带来了难以忍受的重负。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煊赫一时的英国实力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英国在陆、海、空各方面所能部署的军事力量是卓越的，它与工业和经济结构方面力量的显著恢复相比也毫无逊色。即使现在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在1914年到1918年期间，英国以借款方式所进口的物资少于它以贷款方式向其盟国供应的物资，因此实际上它是以自己当时的生产来维持其整个战争消耗和民用消耗的。这确乎是了不起的成就。^①

但是，那些英雄的日子看来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金本位的崩溃以及我们的银行系统尽管得到了大量外国贷款的支持，也无法克服危机，这可能是由于过早地企图重建伦敦往日的金融霸权。但是如果是这样，即使是那些责备银行家经营不善或者埋怨他们轻率地采取向海外慷慨支付短期贷款政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经过十年的努力，企图恢复正常状态又一次证明失败了。仍然必须继续试行关税政策，那是正确的。但是，即使举国一致政府中的那些保守党势力能够推行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向往的远大抱负，我们中也几乎没有人认为，关税本身和仅仅依靠关税能够医治象我们现在这样似乎已经根深蒂固的困难。因此，在我第一次当选为议员的1924—1929年的那届议会里，我以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减轻失业带来的困难，这特别是因为他们影响了贫苦地区和我自己的选民。当时我开始感觉到还需要作更多的事情，有必要采取更为激进、更富有想象力的办法。我们必须重新审查英国工业的结构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它从经济上说来似乎已经崩溃。同时，面对令人惊愕的失业数字，不能忽视缓和的办法。到1931年6月，失业人数总

^① 阿瑟·索尔特爵士：《恢复：第二次努力》，第211页。

计已达二百七十万七千，也就是占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这个数字注定还会上升，在形势开始转变之前定必达到将近三百万。在“特殊地区”——“贫苦地区”很快就为一个如此投合官方心意的婉转说法所代替：长时期的萧条确实带来了一些特殊问题。许多人（实际上是全家）长期没有工作，没有工资，因而带来相应的艰难和困苦。他们的衣服穿破了，家具失修，储蓄花光，房子坍塌。每周弄到的钱，不管其来源如何，对一个失去工作不过几周的人来说也许还可以应付，但是对于那些陷入了几乎是永久性失业境地的人们来说，却是怎么也不够花了。这对年纪较大的人来说，当然影响特别大，他们感到迁移到比较有前途的地区去，或者使自己适应新的工艺，都更为困难。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斯托克顿主要大街上走来走去，或者聚集在索恩纳比“五盏灯”附近的人们那绝望的面孔。对于他们的妻子和母亲的那种忠诚和毫不畏缩的勇敢精神，我们不管怎样加以歌颂也不为过分，她们常以微薄的收入不断想方设法供养丈夫和孩子，使现有的生活勉强维持下去。即使在英格兰南部，残废的或者失业的退伍军人在大街上乞讨的情景，那时已司空见惯了。有时候这些悲惨的人们的示威采取了更有组织的、但仍然是可怜的形式，比如人们称之为“饥饿游行”。在这些示威游行中，贾罗失业工人的游行是最强烈的，因为随着帕尔默造船厂的关闭，这个镇上几乎唯一的就业门路也断绝了。当然，国家、地方和个人都提供了救济和援助，其规模之大无论在我国或任何别的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但是施舍，不管是来自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或者邻居，都不是人们愿意接受的。他们要求的是工作。英国的经济确实出了毛病，而且几乎是致命的，它的大部分机器设备
286 备和人力资源闲置不用，在有些地区正在烂掉了。

一直到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这些严酷的情况充

斥着我的生活和思想的背景,从那时起,重整军备再加上举国一致政府经过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得的恢复,这才带来了一点缓和。那时我既没有权威,也不负什么责任。我以普通议员的身份注视着情况,并竭尽全力和聚集在我周围的人一起寻找并促成短期和长期的解决办法。我很少梦想到,多年之后竟然不得不去处理那些经常侵袭英国经济的、性质完全不同的麻烦问题。这些麻烦问题不是来自失业,而是由于过分就业;不是由于机器设备搁置不用,而是因为资源过分紧张;不是出于人和机器的后备力量等待投入经济战役,而是由于完全没有后备力量,因为所有的人员和机器都充分用于第一线了。那时候,不仅我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危险,就是任何一个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确实也没有碰到过。在我们经历过的好多年中,全国失业率常常是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而在某些地区则达到百分之四十或者更多一些。如果有人告诉说,总失业率将下降到百分之二左右,在某些地区还要更低一些,又说这些几乎是乌托邦式的情况将会带来一些新的麻烦问题。对这些话我们是要怀疑的。但是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准备接受这样的情况。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问题正在开始发展,这些问题尽管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还没有发展到需要立即调整那些我们直到长大成人一直遵循着的基本概念,但却是在我从政的五十年中英国政治家必须尽力解决的问题。

在国防方面,为了指导财政大臣和陆海空军大臣,在大战结束后不久制定了一项原则,即至少在十年内预料不会发生大的战争。这条“原则”长期以来一直是而且到那时仍然是一条指导性政策。由于裁军会议开始其漫长而又毫无结果的谈判,这项“原则”确实在1932年被取消了。但是直到1931—1935年那届议会的最后几年,英国重整军备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

287 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令调整了帝国的体制。这个法令正式承认在白人自治领方面的旧殖民体制的结束，并同意建立一些独立的国家。各自治领由于都对国王表示忠诚，实际上结成一体了。但是，这些自治领在国防或外交政策方面并未构成一个统一的或紧密结合的单位。在经济方面，1932年夏天举行了渥太华会议，人们对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实际上是令人失望的。差不多三十年前约瑟夫·张伯伦所抱的幻想证明是行不通的，这多半是因为我们不愿承担巨额的食物税。关税特惠制的建立对英国本国和自治领都有好处，英国和自治领也达成了协议，不增加现有的工业品关税率。英国对帝国各地的出口这样就开始扩大了；但是帝国关税同盟的概念却消失了。尽管这种概念以前曾经是合乎时宜的，但仍消失得太晚了。

大战刚一结束，欧洲就开始恢复，几年里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又被1929—1931年期间发生的事件重新投入混乱之中。英国政府由于在1931年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而得到了加强，从而提高了英国的声望，并在精神上增强了信心。为了决心保持稳定和财政正常，人民欣然接受了对工资和养老金的削减。与此同时，大家一致同意全世界的危机只能由国际共同行动来解决。1932年的洛桑会议终于标志着德国赔款实际上结束。把希望寄托在1933年举行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注定是要破灭的，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行动。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的全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云集地质博物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但是任何希望恢复以依附于黄金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固定货币为基础的国际银行制度，都证明是虚幻的。罗斯福拒绝了参加任何这样的计划，而且干脆下决心开始了美元贬值的过程，他的这一行动一定使得所有那些饱学之士显得几乎跟博物馆里收藏的那些希奇古怪的史前动物一样陈旧过时，这些人在麦克唐纳的主持下，在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面前

开了一些毫无结果的会议。美洲就这样粗暴地插手破坏了欧洲怀旧的希望。^①

美国总统的行动具有破坏世界会议的效果，却并不是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他意识到萧条和由它造成的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价格已经跌落到低于成本的水平。如果不扭转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刺激生产。但在美国和在英国一样，降低成本需要降低工资比率，而降低工资比率是缓慢而困难的。因此，他决定采取激烈的行动来提高物价。依靠正统的办法——“公开市场”买卖等——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由于需要弥补的裂缝太大，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因此他选择了货币贬值这样一个直接的办法。由于伦敦国际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使不同货币之间的汇兑比价波动很大的状况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总统的行动就成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在有关国家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破灭了。实际上，由此而产生的美元价格的上涨大大低于美元贬值的数额。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结果的原因是，美元贬值使世界各地的黄金价格下降。这转过来却导致了一股紧缩通货的新浪潮，从而对那些一直想把它们的货币再次和黄金连系起来恢复金本位通货，使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价趋于稳定的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个教训是两方面的。第一，任何这种行动要想收到效果，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而不是在一国范围内进行。这一点现在仍然适用。第二，如果一个小国的货币发生贬值，影响还小；如果一个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大国也这么做，其影响的范围一定是很广泛的。^②

如果对长期的问题应该加以研究，可能的话应该加以解决，那么短期的困难也应该处理。新的议会一开会，政府就发现自己面

289

^① 1933年9月至12月间，美国财政部以持续上涨的价格购买黄金，使美元纸币的价值贬低大约百分之五十。

^② 阿瑟·索尔特爵士：《政治人物》（伦敦，1947），第180—182页。

对着需要处理的庞大的——仍然不断增长的——失业大军这一紧迫问题。根据 1931 年的经济法令和接着颁布的枢密院训令，还根据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标准救济金”按比例削减——“标准救济金”是指一个保了险的职工有权领取的救济金，根据他本人的交纳以及雇主和国家两方提供的款项。对以前称为“无契约义务的救济金”，现在称为“过渡性救济金”的，也作了类似的削减。“过渡性救济金”是支付给那些已经用完“标准救济金”的职工。在这些削减的数额恢复以前，当失业问题在某些地区仍然是严重的和长期存在的时候，济贫法就必然相应地承担相当的负担。虽然在 1924—1929 年议会期间在张伯伦领导下进行了改革，济贫法现在由郡或行政自由市而不再由原来的贫民救济委员执行，然而它仍然是地方的而不是国家的责任。不过，人们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即维持失业者的生活费用，不管他们是否花完了他们的保险金，应该由国家来负担。因此，财政部就不得不承担支付过渡性救济金在 1931 年估计需要的大约四千万英镑。

政府在不能接受任何永久性的、更为激进的立法的情况下，在这些年采取了一些暂时性的法案，借以延长对付危机的应急制度。关于过渡性救济的条件，所有保守党议员都同意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因为很明显，过渡性救济并不真正是一种保险。这笔钱不是由受款人自己事先提供的，也不是在他工作时别人为他缴纳的。对需要救济的评定，或者象后来称之为“要求救济”的评定，为了防止乱用纳税人交纳的金钱，因而这种做法是正当的。诚然，工党政府在垮台以前接受了家庭经济情况调查的计划，这一事实是在 1931 年大选前的论战过程中透露出来的。尽管在大选时和大选以后工党利用了保守党支持家庭经济情况调查
290 所引起的不满，可是该党在纯理论上的回答却是非常有效的。它本来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并且曾经得到社会主义政党内阁全

部成员的同意。

然而，这个新制度实际执行起来却引起了极大的不满，而且这也不无道理。因此我们的确对它提出了批评，而且我认为对某些苛刻的规定以及使用标准的变动提出批评是有道理的。动用个人储蓄到什么程度，为支持个人需要儿女的收入到什么程度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困难问题。由于我们对选区居民经常进行访问，我们对这一切有所了解，在 1932 年和 1933 年，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有时甚至是剧烈的讨论和辩论。此外，由于过渡性救济的标准数目在很多情况下是十分不够的，这就使济贫法也要负担一部分，这就意味着——这正是我们认为的不公平之处——以地方上难以忍受的负担来应付事实上是全国性的灾难。也许值得回顾一下这个制度第一年的实际执行情况。申请过渡救济金的人（那就是说他们已经用完了法定保险的权利）中的百分之五十继续得到全份救济金。换句话说，委员会认为他们需要全份。百分之三十的人得到的救济金少于全份。百分之二十的人被认为不需要救济。很自然，在后两种人中就很有可能引起争辩和责难。

把过去争辩的细节一一加以回顾未免乏味。救济的实施逐渐变得更带普遍性，而且也更带慈善性。政府终于制订了一项永久性计划以取代暂时性的应急制度。我现在了解到我当时确实不知道的一件事：原来早在 1932 年 10 月，内维尔·张伯伦就曾向其内阁同僚提出了一项全面计划，要地方当局和大臣们摆脱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工人的全部救济工作，而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个依照法令产生的机构。这样，他就改变了看法，同意了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争辩了多年的观点，即失业问题应该全面由国家负责解决。也正象他所考虑的那样，条款不应该只限于支付现金。应该使失业者有受教育、接受训练、志愿工作、娱乐、移居海外和迁往国内比较繁荣的地区的机会。他的意见在内阁里引起了非常热烈的争论。最

后的计划多少有点妥协的气味，其中包括对某些新工种的工人大大地扩大失业保险，包括一项由法定委员会保证其偿付能力的保险基金；对于那些没有保险的人，由劳工大臣负责掌握政策，但他无权对特殊情况作出裁决；包括依法建立一个不受干扰的失业救助委员会，负责救济和训练有工作能力的失业人员，按户进行家庭经济情况调查，但这种调查是合乎人情的，不把残废补助金、一定数量的积蓄或生育补贴考虑在内。^①

政府的建议终于提出来了，这自然受到了最关心此事的议员们的欢迎，尽管这些建议在某一方面没有贯彻以前论战中提示的内容。例如，1933年6月，政府实际上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即有工作能力的失业人员将来应由国家负责安排。我在下院说：

如我所理解，今天大臣的一项重要声明是他重申政府已经决定有工作能力的失业人员将来应由国家负责。政治活动中一项少有的趣事就是亲眼看到，在开始时被视为异端的主张，正在变成公认的信条。我们现在看到这项原则在保守党全党都得到了承认，但是，议会秘书处一定还记得，它并没有得到象1924—1929年政府那样的支持。我希望在大臣进行答辩时，我们将听到他宣布他的意图是：所有适宜于被工业部门所雇用的工人，不管他们保了险还是没有保险，都将被置于劳工部的管理和照顾之下，而这项原则将被保持在即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新计划之中。^②

292 当新法案^③中的财政决议^④出笼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感到一些不满，因为一部分负担——大约百分之五——仍然由地方负责。我们认为这一点违背了几个月以前所作的保证。因此，我提出了批评：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231页。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3年6月14日。

③ 《失业法案》，1934年。

④ 《失业(财力)》，1933年12月18日。

财政大臣失去了大刀阔斧干一场的机会。他准备承担照管失业人员百分之九十五的义务，而对其余的百分之五却踌躇不决。他说，地方当局应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财政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我认为我们历史上有一个长期公认的原则，即掌管某项事业的当局也为这项事业筹措款项。这项事业将由国家机构管理，那么，根据什么原则要地方当局为它提供资金呢？这本来是一个表示度量的好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被错过了。这位十分令人尊敬的先生象一位胆小的情人，打算改变结婚仪式，他对他的新娘说：“我把我的百分之九十五的财物交给你；那其余的百分之五得你自己去找了。”^①

当法案在 1934 年 5 月提出时，反对党工党主要方针就是攻击各种形式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保守党人都能全力支持政府。国家负责这一观点广泛地被接受以及失业救助委员会的成立，这就几乎完全取消了旧的济贫法的作用。只有老年人和病人由地方经费照顾。这个制度经过一个不稳定的开端而完善起来，那是因为某些救济规定定得很低。它逐渐稳步地巩固起来，受到公众的支持。这个制度的最后组织形式是国家救助委员会，它在保留了查明所有的财力以及是否加以补助这一原则的同时，经过公众同意，有效而又合乎情理地掌管了非常庞大的基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毒害我们国家生活的溃疡之一，就这样成功地被切开了。

受到代表工业席位、特别是代表英格兰北部工业席位的“全国性的”议员们充分注意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所谓“贫苦地区”。我们越研究这个问题，就越认为需要采取一个彻底的全国性的解决方案。1932 年 11 月，我就曾批评过在南方发展新的工业城市，而与此同时筹措同样多的社会资本在北方投资却是可行的。可是，最初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困难的解决可以不对财政或经济政策进行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3 年 12 月 18 日。

根本性的改变。换句话说，这个问题被认为不过是一件只需要提供某种临时性救济的事情，去等待全国性的恢复从中心地区自动地扩展到边缘地区。

我们今天和那些当时住在我国比较繁荣的地方的人们一样，很难掌握整个郡甚至整个地区遭受灾难的全部严重情况。因此，仅仅是从1932年起，主要由于议会不断施加压力和进行鼓动，注意力才开始集中在贫苦地区及其特殊需要上。哪些地方属于这一类型是很清楚的，或者是相当清楚的。这些地方包括苏格兰工业区、英格兰东北部从太恩河到提兹河之间的地区、南威尔士、西坎伯兰。北爱尔兰当然有它自己特殊的、几乎是地方性的困难，尽管它在政府后来的建议中实际上并没有被列为贫苦地区之一。兰开夏的纺织工业区情况也是这样。但是，不管地理区划是怎样精确，症状却是一样的。概括地说，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重工业和老的出口工业的崩溃。造船业、钢铁业、纺织业等部门的情况是相同的——没有订货或订货下降，销售疲软，潜在的生产过剩，缺乏有效的组织去争取并掌握可能得到的市场。

如果经济后果是严重的，那么对人民生活和精神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总的说来，人民勇敢地、听天由命地承受了落在他们身上的打击。然而对于那些——尤其是年老的——长期失业的人，精神和肉体上的影响越来越令人吃惊。年复一年过去了，失业者除了可以分配到一点救济以外，还可以得到私人基金的帮助和救援。社会服务中心和一些类似的机构开始满足人们在娱乐和教育方面的某些需要。然而，私人慈善机构在这方面所能作到的必然是有限的。后来，财政部对全国社会服务委员会的工作提供资金，这对社会救济工作也是一个补充支援。

294 1932—1933年的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坏的一个冬天。南威尔士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而东北部的失业率也经常为

百分之二十七。个别市镇受到的打击甚至更为严重。贾罗的失业率是百分之六十七，格次黑德为百分之四十四，阿伯蒂莱里接近百分之五十，默瑟尔提德维尔接近百分之六十二。^①即使在繁荣的市镇和地区，失业率可能也在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八之间，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数字几乎就算是“完全就业”。当然，有相当多的青年人移居外地。但是，这只能使那些留下来的人的情况更加恶劣。当张伯伦以一种多少有些粗鲁的坦率宣称，失业问题还要再继续十年的时候，爆炸性的事件发生了。四十名支持政府的北方议员马上要求首相麦克唐纳接见他们的代表团。议会里的北方集团在提出其他建议的同时，呼吁政府“着手进行一项深思熟虑的在公私两方面扩大就业的政策”。1933年2月18日的《曼彻斯特卫报》这样评论道：

倘若不是处在情况那么严重的时期，看到一个保守党代表团恳求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首相为失业人员的利益采取国家行动，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国会内外的不安继续增长。但政府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或者即使有的话，他们也没有透露出来。1934年1月宣布的决议应该可以说是一项例外，那就是政府为丘纳德航线第534号邮船提供资金，它后来成为“玛丽皇后”号。有趣的是张伯伦认为这个办法不仅为克莱德造船厂的工人找到了工作，而且为把丘纳德和白星航线的合并提供了一种手段。^②这确实是一种切实可行并富于建设性的“好计划”。

1933年初，失业人数仍然略低于三百万。但是不久在全国许多地区就开始有了一些改善。这对为贫苦地区作些工作，当然增加了压力。最后，在1934年3月，《泰晤士报》发表了关于达勒姆

^① C.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464,465页。

^②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235页。

郡情况的三篇说服力很强而又很动人的文章。来自这样一个忠诚的地区的揭露性文章很有效果。内维尔·张伯伦在他的日记中透露出对政府方面日益发展的反对派惶惶不安。他对任何批评都感到愤懑，认为这是不忠诚的表现，他特别提到三类人：

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那些自以为他们应该作官的人，他们要向政府表示，把他们排除在政府之外是犯了多么大的错误；那些要表现他们自己在察觉别人弱点方面是多么高明的人。^①

他特别悲叹

政府公债可怕的暴跌，而保守党内青年知识分子却不断地唠叨和吹毛求疵。^②

然而，即使仅仅根据政治方面的理由，作一些姿态也是必要的。于是，在3月底任命了四位委员调查苏格兰、西坎伯兰、达勒姆郡、太恩赛德和南威尔士的情况。我当然欢迎这个决定，尽管由于委员们调查的地域没有包括蒂兹河沿岸，我心里有点地方情绪。政府声明保证说，这些“调查”仅仅是试验，并不一定就要救济这些地区。我在下院辩论说，对贫苦地区的问题不可能有一项容易的或纯地方性的解决办法。

我们将不得不把很大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用以指导那些允许发展的地方和地区新工业。^③

这在当时是令人皱眉头的，它被认为是革命的、破坏性的理论。可是，它后来却被人们当作常识接受了。

于是委员们——两个商人和两个政府的低级官员——开始进行工作了。其中一位低级官员是海军部文官大臣尤恩·华莱士海军上校。他的报告发表后，人们认为是最富于想象力、最富有建设性的。可惜的是，尤恩这位尊贵的老友不久就死掉了，他的突然的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233页。

② 同上书，第239页。

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4年3月22日。

夭亡引起了广泛的哀悼。

任命几个委员去发现苏格兰、达勒姆或者南威尔士多少有点滑稽。这个岛毕竟既不是太大,也不是无人勘查过,以至需要劳驾这些勇敢的利文斯通们和斯坦利们。^①然而,由于此举终归会带来一点好处,我们北方议员就聪明地在这一阶段不提出什么批评。那时候,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它甚至受到英国政府的注意。此外,由于首相是来自达勒姆的议员(他于1931年胜利地保住了锡赫姆的议席),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得到最高领导的同情。

我并不过分希望这份报告会导致一项巨大的或者全面的计划。尽管财政形势有了好转,政府似乎并不想着手采取雄心勃勃的措施。1934年秋季这份报告发表以后,在议会答辩会上是有机会对报告进行一般性讨论的。在讨论的第二天快要结束,在休会——当晚上十一点休会——前几分钟的时候,我非常幸运地应邀在会上发言。这使我有机会占用剩余的一点时间说几句话,目的在于引起议会和报界的注意,而把我的主要发言留到第二天进行。这是许多非内阁成员的下院议员希望采取的、但很少有可能办到的一种策略。

由于充分意识到政治上的危险,我仔细地准备了我这两天的发言。但我感到,我必须把政府对这些人道问题在我看来是处于昏睡甚至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唤醒。即使是任命调查委员这件事也是在舆论压力下促成的,特别是《泰晤士报》的文章,它(正象我提醒议会注意的)

……第一次向许多南部读者透露了这些地区灾难深重的全部实况及其辛酸而阴沉的情景,这些地区长期以来饱受折磨,其情况是这个国家比较繁荣地区的许多居民所不完全知道的。^②

① 利文斯通(1813—1873)和斯坦利(1841—1904)都是英国的非洲探险家。——译者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4年11月21日。

297 我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委员们的报告终于把事实真相在总体上说来摆在人民面前了，这是一项巨大的收获。他们现在必须决定，是应该采取小的、畏缩不前的措施呢，还是采取大的、果断的措施。在头一天晚上的讲话中我用几句话作为结束语：

战争并不是由统帅部派人到前线战壕进行视察因而有时带来好处的唯一行动。我很高兴，这一回政府派人去访问达勒姆的帕斯痕达勒和南威尔士。^①

第二天议会开会时，我因首先发言取得了很大的有利条件，全体议员都出席了，聚精会神地听我发言。在我之前张伯伦以财政大臣的身份发表了一通颇为模糊的讲话，并没有明确表示政府究竟打算采取什么样的准确行动。他指出，某些建议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问题。我评论说，一位大臣对任何一件事说出这样的话，这通常意味着他已决定对此事不想采取任何行动，我这样说恐怕太刻薄了。我的朋友奥利弗·斯坦利当时任劳工大臣，他曾作了一次更富有建设性的发言，为此我对他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把他的发言价值和财政大臣的发言价值作了对比。象我原来所想的那样，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困惑。其次是选择哪些地区进行调查的问题。如果那些地区将成为接受救济措施的地区，那么把太恩赛德包括进去而不考虑蒂兹河沿岸，就不可能认为是正当的了。把兰开夏郡全部排除在外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威根的失业率为百分之三十，布莱克本为百分之三十二，伯肯黑德为百分之三十八，而在柴郡某些市镇失业率竟高达百分之五十。于是，我就提出质问：

……你怎么能说，这些地区不能得到救济工作的好处，不能得到委员们慈善措施的救援，而你仍然打算在今后二、三年继续你的研究性的实验呢？那正是首相前几天告诉我们的。^②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4年11月21日。

② 同上，1934年11月22日。

为了替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辩护，有如下一种论点，所有这些行动只是一些更大问题的一项研究工作。但究竟需要研究到什么程度呢？²⁹⁸

至于除了救灾工作以外的更大的问题——解决失业问题所依靠的全国性大问题——在南威尔士和达勒姆进行研究是没有必要的。一位伟大的保守党人过去曾经对另一个问题说过一句话，其正确性在当时和现在是一样的。在谈到印度边界问题时，贝肯兹菲尔德勋爵说过这样一句名言：

“解决印度问题的钥匙不在赫拉特或坎大哈；解决印度问题的钥匙在伦敦。”

现在失业问题也是一样。解决问题的钥匙不在达勒姆，也不在南威尔士，而在唐宁街和思雷德尼德尔街。^①

接着我把文官大臣(尤恩·华莱士)的建议和他的一些同事的建议加以比较。他的确没有在“更大的问题”面前退缩。在他的报告中下面的一段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

海外投资对现代发明促成的日益增长的工业活动会不断地提供出路的那种理论已经不能再被认为是公理了；这个国家似乎终于可能不得不对国际贸易达到平衡而感到满足，这多多少少符合于伦敦商会那时所主张的方针。^①

对这一点和它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并引用了有关文件的一些话，我和奥利弗·斯坦利在某些方面是有冲突的，他显然感到不安。接着我用以下的话对文官大臣作为一位计划理论和扩张主义理论的新成员而表示热烈的欢迎：

文官大臣对我国的经济问题只是瞥了一眼，但他在几个星期看到的比政府在三年里看到的还要多。我不知道他要采取什么方针。我不知道他是否打算贯彻执行他的政策，他是否将继续在政府里任职，他是否考虑到政府会不会接受他的观点，但我能向他担保，如果他决定政府不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4年11月22日。

接受他的观点他就不在政府里呆下去，那样他会受到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使他能领导一场推翻政府本身的改革运动。^①

299 不管尤恩·华莱士使用什么方法，他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诊断，甚至概括地提出了治疗方法：

大受咒骂的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可用作新资本的剩余。它必须把它的剩余作为投资。如果它不能在国外投资，那就必须在国内投资。现在它不能，或者是拒绝在国内外进行投资。^①

我引用了《泰晤士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支持他的看法，它指出银行有的是钱，但是除了购买公债券以外，却找不到一种投资办法。我补充道：

我们的剩余既不在国外投资，也不在国内投资。因此，我们的金钱“打扮得漂漂亮亮，但却嫁不出去”。^①

流行的曲调是变化的；但只要提及当时受欢迎的事情就能促使辩论缓和起来，使听众高兴。我接着说：

我的尊敬的朋友文官大臣看到了这一点。他触到了痛处。如果这个制度要继续保存下去，它必须向国外扩展或在国内扩展，再就是同时在国内外扩展。如果它的剩余不能进行投资，那就必须减少剩余，不是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就是增加社会福利；但如果在这些方面什么也不作，那它就会为自身重量所累而沉没下去。^①

这篇演说的其余部分还呼吁政府采取更为广泛、更富有想象力的方针，并处理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了救济而成立的举国一致政府的时代已接近结束。现在应该是开始重新建设的时候了。重新组织工业和进行重要投资以增加就业——这些都是迫切需要的。如果私人投资一时还办不到，就必须进行公共投资。这篇演说最后几段多少有点讲求修辞，但却很受议会的欢迎。也许是不太聪明，我也说了一句俏皮话，很自然有几家畅销的报纸从我的演说中把它挑出来了。委员们的报告中提到了一项可行的有益工作，那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4年11月22日。

就是清除许多矿区里有损乡村面貌的那些年深日久的矿渣堆。这种想法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和兴趣。因此我说了以下的话：³⁰⁰

迪斯雷利先生以前说过，他看到面前有一排死火山。我不愿如此无礼，但是确有一些本来可以清除掉的废弃的矿渣堆。^①

那时坐在前排的我的一些朋友感到好笑；但决不都是这样。

原来名为“贫苦地区法案”，后来在上院改为“特殊地区法案”的那个法案，在进行二读时简直没有讨论的余地。财政决定限制得很紧；修正法案的机会，不管是扩大地区，还是扩大根据法案任命的委员的职权，也相应地受到限制。当然，对于这一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但那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此这个法案的三读比通常更为重要，参加辩论的人也很多。这在我是最后一次阐述自己理由的机会：

在这个法案的最后阶段，我们现在能看到它的真正的前景了。委员们被派往贫苦地区，引起了很大的希望。这是政府正式承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而当报告发表时普遍认为委员们超额完成了任务，并提出了具有真正价值的报告，因为他们在编制报告时表现出了深思熟虑……当然，由于希望显然是破灭了，从而产生了某种失望之感。群山经历了分娩的痛苦，却生了一只小老鼠。我的十分尊敬的朋友劳工大臣在对委员们的报告进行辩论的初期，呼吁我们不要贬低这个法案条款的重要性。我想我能够代表我自己和我的那些在辩论时发了言的尊敬的朋友们说话，我们做到了他那呼吁所要求于我们的。我在任何阶段都没想低估这个法案的重要性，我认为它是伟大的，但这个法案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比起来，却只不过是一只小老鼠——一只漂亮的小老鼠，很好的小老鼠，有益而且有用的小老鼠，然而也是一只可笑的、用显微镜才能看到的、小人国里的小老鼠。^②

奥利弗·斯坦利以一种嘲笑的但是多少有点伤人的方式跟我开玩笑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4年11月22日。

^② 同上，1934年12月13日。

笑,对此我回答如下:

301 ……对议员们说来,在他的政治生涯的突出成功和我的失败中间,他的发言看起来好象是一种隐蔽的但仍然是有力的对比。然而,我对那却一点也不感到沮丧。我很高兴他身居显要……但我感到对于这些事情,即使我们这些不任公职的议员也有我们的用处。如我的十分令人尊敬的朋友所熟知的,最熟练的骑师也须借助于鞭子和踢马刺,特别是当他跟一匹执拗而又懒散的坐骑打交道时更是如此,我感到我也许在某些方面对他还有点用处,尽管他必须否认跟我有何关系,并且设法隐瞒——而他总是隐瞒不住——他对他现在的主人兼教练员的政策显然是不大耐烦的。①

关于他现在在内阁中的地位,我不禁补充说:

然而,他已经得到了一项很大的好处。他以前的同盟军是粗野而不成熟的,而他现在有了内阁成员们作为他工作的鼓舞源泉。挑剔的食客不仅选择他们的菜饭,也看重共同进餐的人选,如果他对跟他一伙的人感到满意,我对我的同伴也感到十分满意。①

在最后提到这位劳工大臣时,我说:

也许他认为是摘掉假面具的时候了。我的真正令人尊敬的朋友说:“我们现在都是计划者了。”我有一点比他强。他说话的时候,我能看见他的同事们的面孔。他在发表这个历史性论述的时候,在他某些同事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满意和高兴的神情——我想他们是参与策划的人;但在其余的人的脸上却不禁露出不自然的苦笑。比尔博姆先生写过一句真实而又俏皮的话,“人生是一所没有铁栅栏的监狱。”一个内阁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议会在今后两年要写出怎样的历史。我不清楚我们是否还会继续任其自流……而不制定政府的广泛的政策,但我知道,即使对政府政策范围感到不满而仍然留在政府中的成员们身上,担负着巨大的责任。我们有言论的自由,而他们却有保持沉默的责任。①

我之所以引用了这一段冗长的讲话,因为把当时议会辩论的风格和特征表达出来,也许是令人感兴趣的。现在的情况变化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4年12月13日。

很大；今天流行的一些更加直接了当的方法也许有它们的好处。但用轻剑击刺是有其乐趣的，而用短棒猛击是不行的。

1935年7月9日，在这届议会临近结束时又对这个使人忧郁 302 的题目进行了一次讨论。这次讨论同样是没有结果的。到那时情况越来越清楚，特殊地区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单独处理的问题。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所进行的辩论和争论越来越变成关于政治和经济总政策的讨论了。到1935年7月，麦克唐纳作为首相静静地逐渐隐没，而鲍德温可以说逐渐显现了。可是，令人感觉不到处理问题的方法有什么变化，因为这两个人曾经长期在一起工作，非常融洽，越来越相互尊重，相互同情。他们两人都回避采取行动，只注重气氛。在这次辩论中，新首相又重提过去的希望和保证。当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在本年或下一年必须举行的大选中，保守党大概会失去一些议席，而工党在议会的议席将大为增加（这一点他大概是欢迎的），他的政府几乎可以肯定将以压倒的多数重新执政。因此，他有点不耐烦地告诉我们，他毫无疑问认识到需要把新的工业吸引到古老的地区去，但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也想不出什么积极的建议。他还说他认为他必须主要依靠继续执行他那迁移人口的政策。总而言之，我大声回答说，我们只好去见我们的人民，并对他们说，“你们现在意气沮丧——你们一定会变成被抛弃的人们”。

我再一次阐述了各项行动计划，这些计划是我到那时为止和各政党许多男女人士思考和合作的结果。其中大部——新工业区，使用计划许可证，扩大电力分配，通货扩张，建立学校、大学、医院和各种公共设施等——早就被采纳了。那一次辩论在政治上主要感兴趣的事或许是劳合·乔治的职位问题，他当时正打算重新侵入政界。我讲了一段鼓吹加强公共设施的话以后，我认为说明下面一点是公道的：

我想发表一点个人意见,我知道有人说不管是谁只要提倡这样一种政策,就是以某种方式跟确实令人尊敬的卡那封选区议员劳合·乔治先生联合在一起。我们都很高兴这位确实令人尊敬的绅士又恢复了他的积极的政治活动,但我或许可以说——我希望不讲任何他可能反对的话——我和我的朋友们宣传这项政策已经四年了。我们党的北方集团以及在各种活动中和我合作的朋友们,各政党和团体的人——经济学家,思想家,研究这些问题的各种人——宣传这项政策已经有四年之久了;而即使我们中了术士的奸计,他也无法先期施展他的魔术;我们做这件事是完全依靠自己的。然而,我欢迎这位确实令人尊敬的绅士重新从事政治活动。更有甚者,全国各种集团内正增长一种新的感觉,觉得现在可能实行一种更加积极的政策,而我想任何合情合理的公正人士会说,这之所以可能主要是由于政府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不管人们对过去如何评价,对于未来我们现在可能拥有过去梦想不到的财富和权力。^①

当时,我因主张发展公共建筑而受到许多责难,因为政府终于至少已经以适当的热情着手执行这项政策,这就更加令人奇怪了。诚然,正在准备大量的资金以从事各种有益的重要发展。尽管张伯伦十分当心,他骨子里是个温和的扩张主义者。也许我提出论点的方式使正统人士感到震惊。我承认我当时认为这个呼吁并不是不合理的。我是这样说的:

到目前为止,公共建筑仅仅涉及生活必需方面。难道不需要花些钱在生活乐趣上吗?难道不需要一些娱乐设施、空旷的地块、国家公园以立即保持农村已经受到威胁的美景,并给我们伟大的人民带来永久的快乐吗?难道不需要建造华美的公共建筑吗?一项合法的公共建筑总要有了一定的收入,这种令人沮丧、阴沉的观点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根据这个观点,佩里克利兹^②就不会建造巴台农神庙,除非他能向占据前座议席的同事们表明,从那些来看神庙的游客那里得到的收入能够继续不断地支付利息和偿债基金。甚至我们中世纪的祖先——我猜想今天的彻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5年7月9日。

② 佩里克利兹(公元前495—429),希腊政治家。——译者

头彻尾的商业家把他们叫作蒙昧主义者——也为我们建造了修道院、教堂、学校、靠基金维持的机构，我们仍然把这些建筑归入我们最伟大的光荣建筑之列，而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在这些建筑中长大成人并受到鼓舞和教育的。甚至那些暴君，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如凯撒和墨索里尼，也是遵循这个传统的。^① 304

贫苦地区这一严酷问题占领我们脑海和心田几乎长达十年之久，它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想到这一点不免令人感到奇怪。诚然，即使在全国就业水平很高的时候，这些贫苦地区的某些地方——苏格兰、默西河畔和东北海岸——也经常处于不够繁荣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既充分利用了制定计划的全部消极权力，也采取了积极办法，吸收一些工业迁到这些地区，它们迁到那里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失业率约为百分之四、五，有时约为百分之六，那时全国其他地方的失业率却是微不足道的。我担任首相后对这些困难经常给予极度重视。因为我要承认，我总是担心这个老问题还会以别的形式连同它的辛酸的往事再次出现。我很清楚三十年前一个地方的失业率尽管还算低的时候，如果它大大地高于全国失业率，那就会产生真正的不满情绪。以前的记忆和恐惧还没有完全消除。在我国这些地区继续存在着隐患。因此在我掌权后，许多人——甚至我的同事们——认为我过分重视这些问题了。甚至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决定不要忘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教训。

在这届议会结束时，这一段颇为阴沉的历史达到了它的最后阶段。1935年7月，根据法令任命的委员之一马尔科姆·斯图尔特爵士发表了她的报告。他的报告谈到的情况是可悲的。除了这一情况外，很明显他发现自己被烦琐的公文程序所束缚，处处受到劳工部的限制。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5年7月9日。

实际上他的报告回复到华莱士海军上校一年前概述过的建
305 议；这些建议更早以前就由北方集团提了出来，它们后来又被未来
五年小组（以后我将论及）吸收进他们的政策中，而那时重新积极
参加政治的劳合·乔治又宣传了这些建议。

马尔科姆爵士提出的每一项建议——提高在学年龄、六十五
岁退休、缩短工作时间以及公用事业和发展的工程——都受到同
样公式的对待。政府将予以“仔细的考虑”。甚至在下院的最后
一次辩论也象闹剧一样地结束了。劳工大臣——当时为欧内斯特·
布朗——被推举出来发表一篇阻碍议事进行的演说，以答复社会
主义者提出的不信任投票。这项任务需要某种技巧或者至少是机
敏灵活，但这跟新大臣刚强、单纯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是一个
个性很强而讨人喜欢的人，在包括我在内的朋友中，他以收藏和研
究大量图书而知名，而在整个下院他那洪亮、象在兵营场地上回荡
着的嗓音，也是出名的。这一次很明显他说的是他的主人（财政
部）的话，因此他的演说彻底失败了。辩论的结果也失败了。在最
后几分钟，在前座议员讲话结束之后，我站起来说了一些最后的批
评的话。工党督导员没有提议终止辩论，因此这次不信任投票因
为讨论延长到休会而被搁置了起来。

这一场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就这样结束了，在辩论中我和我的
朋友们受到了新闻界和下院友好、同情的关心和支持。

尽管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然而却有一些进展——也许比
我们当时认识到的要大得多。此外还撒下了种子，它们在以后几
年里长成了茁壮的、果实累累的植物。

同时，另一些更加浓重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着整个历史舞台。

尽管某些保守党和国家自由党议员，特别是那些代表困难严
重地区的议员，对政府持批评态度，有时甚至对政府在处理他们所
代表的那个地区的困难问题时明显的无能为力感到愤怒，他们却

十分热情地支持举国一致政府的总政策。我们本来希望在某些方面会进行更多的根本性改革；但我们也承认正在作出的成绩。现代人们对这个阶段的成就的批评确实并不是完全公正的。举国一致政府是在发生了一次信任危机以后执政的，而在那时英国的声望下降到了一个低水平。在那届议会的四年任期中，我们国家的地位大部分得到了恢复。对于这届议会任务的重要性和成功的程度，还缺少公正的评价。然而，甚至无情的历史学家最近也承认了这些事实。“经济恢复在 1931 年毫无希望，到 1933 年还很渺茫，而到 1935 年就很明显了。”^① 政府确实没有因为这种改进而受到感谢。主要原因也许是这样的：“象萧条一样，经济恢复也是不平衡的，因此人们过于注意贫苦地区的苦难，从而忽视了别的地区经济的恢复繁荣。这就是以后加意宣传的‘饥饿的三十年代’的神话的基础。实际情况却是大不相同的。”^②

从所有这些平凡的征象来看，变化确实是显著的。这个阶段开始时对外贸易逆差为一亿零四百万英镑，而在这个阶段结束时却获得了三千二百万英镑的顺差。^③ 生产指数表明，生产不仅上升到了 1929 年（危机以前）的数字，而且超过了大约百分之十。失业人数减少了一百万。1935 年失业总人数二百万人仍然是吓人的，但动向却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再过一年，那就是说到 1936 年 7 月，失业人数已下降到一百六十万了。同时，就业人数却稳步上升，其速度大于人口的增长。

在财政和金融方面，政府运用了它的权威和由于实行温和的扩张主义政策而从世界上取得的信任，对薪金和救济款的各种削减逐渐得到恢复。尽管有人鼓动推行更为有点通货膨胀的政策，

① C.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 432 页。

② C.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 435 页，根据 A.E. 卡恩：《世界经济中的英国》（纽约，1946；伦敦，1947），第 126 页。

张伯伦在 1933 年顶住了要求制定一个不平衡预算的压力,即使这样,1932 年的赤字却是用借款来偿付的,而 1933 年的预算事实上也没有能提供一笔偿债基金。张伯伦在他的预算演说中为他的立场辩护,提到了那些主张故意制定不平衡预算的议论,这些议论得到了“某些杰出的经济学家、有权威的新闻记者的支持,如果我的情报是正确的话,还得到了某些尊敬的下院议员的支持”。

1934 年有了二千九百万英镑的节余;失业救济金完全恢复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薪金削减的那一部分恢复了一半;在所得税标准税率上增加的六辨士的紧急税额被取消了,并对收入较少的所得税纳税人作了让步。1935 年下半年工资的削减部分全都恢复了。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鉴于即将执行关税法规,在第一年冬天颁布的授予商务部以征收关税直至百分之百的权力的非常进口法令是预防垄断的。园艺品关税条例提供了一项保护水果、蔬菜、花卉生产的措施。这两种条例都被自由贸易主义者和政府接受了;第一种条例被认为是合理的保护措施,第二种被认为仅仅适用于奢侈品或半奢侈品的进口。张伯伦在 1932 年的一次动人的演说中提出了普通税则。在那次演说中他声称,由于最终能实现三十多年前他父亲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政策,他感到自豪。原先估计这个税率将促使举国一致政府中主张自由贸易的成员辞职,特别是国家工党的斯诺登和正统的自由党人塞缪尔和他的朋友们。但由于运用了巧妙的、政治上前所未有的方法,这种情况得以避免,这就是被人称为“各持异议的协议”。这种方法在十九世纪的头二十多年的许多内阁中确实采用过,用以处理大伤脑筋的天主教徒的恢复公民资格问题。但那时候是在一个没有形成法律的问题上同意各自保留不同意见。这一回我们目睹了一幕不寻常的景象,赫伯特·塞缪尔对把他不赞成以内阁名义提出一项措施这件事记录下来,不仅感到不

满，而且对他的同事们的愚蠢行为进行了一次猛烈和极为有力的攻击。这种事件在任何正常情况下产生的议会里是几乎不可能的，也是在任何按正常法规行事的议会不可能办到的。

这项税则预计可带来三千五百万英镑的收入，这笔钱足够弥补赤字。同时把战时公债的利息成功地由百分之五改变成百分之三点五，这就立刻节省了二千三百万英镑，最终将节省四千万英镑。尽管洛桑会议没有同意完全取消战争债务和战争赔款，但由于接受了德国同意一次偿付的赔款，那次会议事实上标志了赔款问题的结束。渥太华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是令人失望的，虽然这次会议至少也取得某种协议。但接受帝国特惠制对自由贸易主义者来说是太过了。斯诺登、塞缪尔和阿奇博尔德·辛克莱在1932年9月辞职了。我怀疑这是否是鲍德温和张伯伦深以为憾的一个原因。他们一定会由于相应地减轻了比弗布鲁克勋爵对他们的压力而感到很大的补偿。从下院的观点来看，如果塞缪尔派转成反对派，西蒙一派保持不变，那么两派在人数和辩论力量上是相等的。

此外，政府还认真负责搞了许多实验。在1932年建立了外汇平衡基金，后来基金增加到三亿五千万英镑，这件事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农业方面在沃尔特·埃利奥特强有力的领导下，做了许多事，采取了各种措施，一方面实行定额分配制，另一方面对甜菜糖实行补贴，以便在农村中重建某种程度的繁荣。1932年的小麦法令事实上给了农民一种有保证的价格。对大麦和燕麦耕地也给以补贴。耕地面积开始迅速增加，以后一直贯彻着的农业政策的基础建立起来了。

在基础工业方面，在钢铁工业中开始了某种程度的改组，这种改组在下一届议会中继续得到执行。对不定期货船给以补贴，英国造船厂下水船只的吨位开始缓慢上升。在政府资助下建造“丘纳德航线”是另一种非正统的试验，它在保守党某些非常因循守旧

的议员中受到极大的反对，但却受到进步派强有力的支持。在煤炭工业方面情况不那么好。原来设想在 1930 年法令推动下进行的改组与合并延缓了，在这一届议会中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处理这个问题。甚至连皇家土地国有化也推迟了。

总的说来，在行政和立法两方面，这四年是有稳固的进步的。批评政府的人们所反对的不是政府行动得太快，政府应该行动得更快一些。我们不相信经济恢复会自动地来到，也不相信在“重大危机”时期以前为我们服务得很好的旧制度能够恢复。在国家和工业之间的关系上必须有新的计划、新的措施以及新的概念。对工业自身也是一样，应该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如有必要的话，还是用强迫的办法对内部加以整顿。

关于这一点，根据 1932 年法令授予进口关税咨询委员会以权力是重要的，授予棉花行业的、用来强制执行在工资协议上多数人意见的权力也是重要的。同样在追求现在所谓的“现代化”问题上，政府承继了前工党政府提出的伦敦客运法令，并把它订为法律。甚至对国家发展也做了一些事。电话事业得到拨款三千四百万英镑。伦敦运输公司获得了一项三千五百万英镑的担保；房屋和清理贫民窟的补助金也决不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随着议会工作的进行，我和我的许多朋友更加相信我们经济制度的基本弱点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治疗。为了这个目的，在这一届议会期间和下一届议会的头几年里我献出了我的全部力量。

在叙述这个仍旧具有某种历史趣味的经历以前，描绘一下那些年月里的下院——我们历史上最奇怪的几届议会之一——还是恰当的。

这一届下院甚至在议员的席位上，也呈现出一幅不寻常的景象。工党减少到大约五十席。他们占据着——但没有坐满——反

对党议席。塞缪尔派自由党人在渥太华会议以后对政府越来越持敌对态度，他们的议员大概共计三十五人，坐在下院中立党席位的两排上——第二排和第三排。西蒙派人数和塞缪尔派人数相当，他们和支持政府的一群议员混合坐在一起。保守党有四百七十余席，占据全部政府这一边的席位，还扩充到反对党的区域里坐中立席的自由党人之后的两排席位。在那届议会之初，我们中的某些人就坐到这两排中的一排里去，这使我们便于面对着保守党的大部和政府里的核心人物。我们的坐位成了保守党内的“山岳党”席位。 310

议员们的生活是轻松愉快的。政府拥有那么大的多数，因而除了偶尔有出席议会的紧急命令外，不太强调要定时出席下院的会议。在可能开长会的时候，督导员们制定了一项轮班制，有些人认为这个制度有点不妥当，可是事实证明非常方便。由于党派之间力量的不平衡，我们辩论的性质明显地受到了影响。工党的代表是那么少，政府的支持者感到有更大的自由提出建议、动议、甚至批评，这在政府拥有较小的多数时是不大可能的。这反过来对党的纪律起了一点松弛作用。许多次辩论是以奇怪的超党派的腔调进行的。麦克唐纳在 1929 年要求的“全国委员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在 1931 年实现了。

工党所有的主要人物都落选了；前工党内阁中只有建筑工程大臣兰斯伯里在选举中保留下来。这并不完全是我们的选举制度造成的，虽然政府方面通过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地方上的安排肯定获得了很大的好处。无论如何，全国选举的可靠票数已经公布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数目——一千四百五十万票对六百五十万票。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见过象 1931 年 10 月那样，对政府的信任投票竟获得那么大的压倒多数。

工党领袖是乔治·兰斯伯里。他能干而又勇敢地执行着一项

困难的任务。在麦克唐纳任首相期间当过议会领袖的鲍德温，对兰斯伯里表现了特殊的礼貌和善意。但是兰斯伯里并不是一个劳工运动真正的代表。他的和平主义的观点绝没有受到他的追随者的赞同，随后在他的更为坚强的同事中引起了很大的愤怒。虽然他们在这一届和下一届的议会中一贯投票反对增加任何军备，但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和我们中许多人一样，信任由国际联盟所提供的集体安全。但是他们没有好好地想一下，国联如何能提供这种安全，英国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合理贡献。

次于兰斯伯里的是第二把手艾德礼。他是由于赫伯特·莫里森失利而获得这个位置的，莫里森在南哈克尼选区以几百票之差失去了议员席位。莫里森实在不走运，因为如果他能勉强地被选上议员的话，他肯定会成为工党的第一把手或第二把手。如果那样，随着事态的自然发展，他会成为1940年丘吉尔内阁的副首相，从而在1945年他会当上首相。我一直认为莫里森的运气太坏，因为他具有明显的议会工作和行政工作的才能，以及颇大的政治勇气。由于莫里森在1931年失败这样一个偶然机遇，艾德礼取得了原来十之八九是莫里森的那个地位。多年以后当艾德礼辞职的时候，对莫里森来说，时间已经太晚了。

在1931年选举中保留下来的工党议员主要是由矿区选出的，或者是由一些最老、工业水平最高的地区选出的。他们竭尽全力进行了坚决的战斗。他们当然有充分的发言机会，他们中许多人也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他们对那些有争议的法案进行了坚决的反对，有时他们迫使我们用表决的办法来中止辩论，或者迫使我们整夜开会。他们干得很出色，我们尊敬他们。某些保留下来的工党议员属于独立工党，那时由马克斯通领导，他们在辩论中仍然令人生畏，仍然给人以深刻印象。

在这届议会开始的时候，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不仅博得我

们的喜爱,而且获得我们的尊敬。反对党对他一直是很凶的,常常是不公平的。但他经常成功地从甚至是最猛烈的攻击和喧闹的干扰中摆脱出来。象在前几届议会时一样,他发表有关外交事务的讲话很有趣,也很有说服力。但随着议会的进行,他变得越来越含糊,在其他一些事件上甚至没有条理。他的视力开始衰退。虽然鲍德温慷慨地支持他,他仍然日趋孤立。他有些演说讲得那么曲折,那么神秘莫测,似乎没有意思。他开始丧失勇气。虽然一向品格高尚,可是却变得头脑糊涂。然而,即使是处于衰退阶段,他仍然是个高尚而又近乎传奇式的人物。要准确地描绘他的总的一生即使现在也是困难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从前的朋友对他近乎残忍的批评,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散漫的作风在保守党一般成员中产生了不耐烦的情绪,这就使人们大大地低估了他这个人的品质与事业。总有一天要恢复他的本来面目。 312

鲍德温当了麦克唐纳的第二把手。从一开始真正的权力就越来越多地落入鲍德温之手。他是议会和全国最强大的政党的领袖。他成功地胜过了前一年对他的领导地位的攻击。他向新闻界巨头们挑战,并战胜了他们。当他处于反对党地位时,他在不止一次的机遇中要求并得到了他的追随者的相当大的多数的支持。在新的情况下他什么也不怕。丘吉尔在举国一致政府开始成立的时候还没有被包括在内,他当时几乎倾其全力反对印度的符合宪法的前进。奥斯汀·张伯伦自愿“为年轻人让路”。内维尔·张伯伦明显地被挑选出来作为鲍德温的接班人;但他对他的前途很乐观,没有表现出任何急于要真正接班的迹象。鲍德温担任着一个闲差事,这对他非常适合,因为作为枢密大臣,他既不冒政府各部门职务的风险,也没有各部门职务的麻烦。他是下院的领袖。他定时出席下院会议,于是了解了两方面的所有议员。他不急于接过麦克唐纳的位子。鲍德温确实是在麦克唐纳明显地不适应他的

工作时，才同意担任第一把手的。这是 1935 年 6 月的事，当时这一届议会几乎已有四年的历史了。在理论上鲍德温摆出要支持进步派的样子，他也的确准备提拔一些进步派的成员。但在事实上，正如珀西勋爵所说的，他总是“可以说是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唱得合调”。^①同时，从整体上来说，他单独控制着党的所有派别和议会。他很少受到强有力的攻击，如果议会激动起来或是难以驾驭时，他总是能够毫不困难地使情况缓和下来。他在辩论时的公正态度，他的生活知识的渊博和宽广，他那迷人的风度，还有他那只需用几分钟的回忆或推究哲理就能避免一场困难的辩论或摆脱一次尴尬处境的巧妙方法，所有这些品质使他成为一个卓越的议会雄辩家。

政府里仅次于鲍德温的最有实力的人物是内维尔·张伯伦。正象他在日记和书信中所透露的那样，他时常私下抱怨，他要和两个庸主打交道。然而他事实上是当时的权臣。他在内阁和枢密院里所说的话最后都被接受了。他的活动能力是如此之强，因而他对别的部门的同事毫不犹豫地给予帮助和建议。许多最后由别的大臣提出的计划都是和他那不知疲倦的热情分不开的。正象他的日记所透露的，他有时极想经管外交事务。当希特勒先是威胁要占领奥地利，以后又退缩了回去时，他在 1934 年 7 月一天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段话：

我很高兴地听说墨索里尼调动了军队。这是德国人唯一能够理解的事情……我感到不满的是，我们没有因此拟定我们的外交政策。^②

可惜这种感情没有继续影响他的行动，他也不了解需要多大军事力量以及如何迅速建成这支军事力量。张伯伦不是下院的宠儿，他从来也未获得一个主要的大臣必须得到的反对党的重视。这种缺陷部分是礼貌上的，部分是感情上的。他对于那些他认为是观

① 纽卡斯尔的珀西勋爵：《某些回忆》，第 130 页。

②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 253 页。

点可笑的人，怀有一定程度的智力上的轻视；他把工党中的大部分人都归到那种范畴里。但是他不能隐瞒这种看法，他说话的腔调中常常流露出对他的政敌某种程度的挖苦，甚至是粗暴，这种态度 314 起码在最高层人士中是不符合下院真正的传统的。在我们的议会制度中，可以猛烈打击别人，也可以受到猛烈的打击。人们对这些打击是不会长期放在心上的。但是目中无人和傲慢自大却是伤人的。无论如何，张伯伦是一个威风凛凛的人。他的演说准备得特别好，也很有说服力。如果说他的嗓音嘶哑难听，而且常常是软弱无力，他的议会风度却是很好的。他能毫不费力地引用事实和统计数字。他那细长的身材穿着传统服装（他通常穿燕尾服，带硬翼领），他那穿戴考究的仪表，他那乌鸦似的相貌，他那完美的克制功夫，所有这些特点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议会活动家。我眼前仍旧浮现他的形象，笔直而且自信地站在专用席上。但他受人尊敬，威严而不讨人喜爱，只有少数他的亲密的、了解他那外表阴沉而内涵仁慈的人除外。

在政府里其他保守党成员中，坎利夫·利斯特^①是当时和以后在我的印象中最能干的人。遗憾的是，由于需要，举国一致政府成立的时候，为了在保护贸易者和自由贸易主义者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他没有回到商务部任职，在商务部他本来会在英国的工业改组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他当了殖民大臣，因此除了偶尔参加有点特殊性的辩论外，他是不常来下院的。

自由党两翼的头头一开始都参加了政府。约翰·西蒙当了外交大臣——一个灾难性的选择。除了让他担任的那个职务以外，他的明显的才智几乎做任何别的工作都更为适宜。人们常说一个律师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外交大臣，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西蒙在法律方面所受的训练使他好象急于要把一个问题的两面搞清楚和

^① 后来的斯温顿勋爵。

搞准确,甚至很公平,而不是要采取某一特定的方针。对于政府的专职顾问来说,这样做也许是可以称赞的,但这是一个大臣身上的严重缺点。我记得多年以后丘吉尔常说,外交部的话象基督教赞美诗一样,用对比的词句对于某一行动举出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不幸的是,他们列举的理由总是模棱两可,因此你最后得不到任何明确的应该倒向哪一边的指导。西蒙的讲话与此大致相同,他的行动也是这样。

315 在西蒙派的其他人中,就我记忆所及,霍尔—贝利沙虽不能说是一个最了不起的人物,也可能是个突出的人物。他的事业一直到某一个阶段是非常成功的,但是他不能也没有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

赫伯特·塞缪尔是正统自由党人的临时领导人。我在第一次当议员的那届议会里对他形成的印象一直没有改变。他的演讲总是论点很强,甚至极有说服力,可是缺乏热情。他的追随者之一艾萨克·富特却不是这样。这个人的一生受到两种幻影——克伦威尔和绝对戒酒主义——的鼓舞。不管正式讨论的题目是什么,他确实很少能在演讲中不提这两点或两点之一。这两点对他来说就象迪克先生^①年表中的查理王的头一样。我紧挨着坐在他后面保守党的一排议席上,在他提到克伦威尔的时候,我不禁用清晰但是并不尖锐的、估计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你是指那个老酿酒商威廉斯吧!”这是跟他开玩笑,但是无法制止。这样总是使他恼火。但他是一个好人。

资历仅次于塞缪尔的是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他很有吸引力,很有礼貌,有时甚至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仪表英俊,衣着漂亮,稍微有点口吃,但这没有损害他的演说,反而使他的演说更好了。

^① 迪克先生是英国名小说家狄更斯所著《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个疯癫人物。
——译者

他几乎象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

在我第一次参加议会时,当时最伟大的人物是劳合·乔治,尽管他已经不担任官职了。在这届议会的第一年,劳合·乔治大病后仍在康复中,他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他对塞缪尔和他的另一些追随者在选举上达成协议大为震怒。他决不宽恕塞缪尔。政府享有压倒多数,使他没有任何机会施展议会或政治花招。在他的一生中,这一段是个不愉快的时期。可是,在这届议会临近结束时,他戏剧性地重新出场了。他以他的1929年纲领为雏形,并参考极有价值的专家意见,对国家发展和解决失业问题提出了他的计划。这是英国的“新政”。1935年夏季,政府着手审查他的计划,召开了一些长会和讨论会。人们普遍猜测劳合·乔治可能即将参加政府。这特别受到当时已经不担任官职的奥斯汀·张伯伦的催促。^①鲍德温肯定对这个主意耍了花招,可是支持这个主意的新闻界却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最后还是毫无结果。我想原因是人事关系,而不是政策问题。因为当时的政府正象他们广泛声称的那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着手实行扩张主义的纲领。但是鲍德温憎恨劳合·乔治,他对劳合·乔治既害怕又不信任。汤姆·琼斯是在这个问题上骑墙派之一,他是当时最古怪而且近乎阴险的人物之一,他自由自在地在鲍德温、劳合·乔治和阿斯特家族之间奔走。照琼斯的说法,劳合·乔治认为内阁委员会对他“有耐心和礼貌”。琼斯实际上告诉鲍德温:据他看,劳合·乔治更为关心的是采纳他的纲领,而不是他的官职。^②对于政策本身,鲍德温并没有什么高超的意见。但是他日益强烈地反对以任何形式和劳合·乔治合作。内维尔·张伯伦对劳合·乔治是同样地嫌恶,这是根据第一

316

^① 查尔斯·皮特里爵士:《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传记和信件》,卷二(伦敦,1940),第399页。

^② 托马斯·琼斯:《日记和信件,1931—1950》(伦敦,1954),第146页。

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劳合·乔治手下当大臣时的感受。内维尔·张伯伦在1935年2月的日记中有一段泄露了他的想法，这段日记描述了在奥斯汀·张伯伦叙述他和劳合·乔治的谈话以后自己的反应：

我解释说我不打算和劳合·乔治在内阁中共事。奥斯汀马上打断了我，他说“我认为你错了”，但我继续说我的动机不是对他个人的嫌恶，而是深深地相信我们的想法是互不相容的。^①

不管内维尔对他哥哥说些什么，他对劳合·乔治的个人嫌恶不知不觉地超过了他们的意见不合。

因此，在这一届议会期间，除了在最后的年月里，劳合·乔治的出现是间断的、不经常的。当他讲演的时候，他讲话的口才和力量一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不能够长久不断地继续努力。不过，他那良好的情绪和脾气仍然未变。他对自己当时不起什么作用并没有表示怨恨情绪，虽然他以前曾经掌握过比他同时代任何人都要大的权力。主要的大臣以及保守党就整体来说不信任劳合·乔治的原因之一，或许就正是他这如此显著的品质。劳合·乔治喜欢行动。他喜欢作事情。有时候他做了错事，但是他不能忍受无所作为。如果他要权力，那不是为了把它储藏起来，而是使用它。

如果说劳合·乔治的社会生活事实上已经结束，那么丘吉尔的最伟大的时代则尚未到来。在1924—1929年的那届议会里，丘吉尔曾经掌握过一个有权的职位。他任财政大臣，曾经是政府里的第二号人物，达四年之久。虽然他仍然不被保守党的某些派别和一部分公众所信任，但他在当时还是被认为是可能继承鲍德温的人。在第二届工党政府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和斯诺登斗争，这使整个议会都感到高兴。他那卓越的议会才能从来没有表现得比那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242页。

时更为突出。博林布鲁克有一次这样描写过下院：“谁都知道那个议会的特征；他们象猎犬一样，喜欢起那些能给他们指出猎物的人来了，而且他的嗥狗声也常使他们受到鼓舞。”但丘吉尔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和保守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有分歧。他完全不同意鲍德温支持工党政府的印度政策和印度总督欧文勋爵^①的行动。因此他在1931年1月退出影子内阁。其后几年中这个裂痕扩大了。丘吉尔也不满足于只是在形式上反对政府。在印度走向自治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他都竭尽全力进行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到将近一百人的巨大数目的保守党议员的支持。他组织了印度保卫同盟，在以后的四年里对政府的措施进行了最坚决的反对，包括一项流产的尝试，即求助于议会特权以反对德比勋爵和他的朋友们。这种鼓动工作以特有的力量从下院转移到保守党的一些会议上，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得到了大量的支持，有时候力量很接近，但 318 是一直是少数”。^②

保守党的大多数人认为他的态度是反动的和不现实的。我们都记得一百多年以来英国对印度的政策是引导它发展一种自治制度，这种制度必然合乎逻辑地最后使它获得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独立自治领一样的地位。鲍德温的一些声明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既富于想像力又站得住脚。他在1934年12月的一次讲演中有一段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要记住：我们在一个世纪以来教导印度的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宣扬英国的制度和民主以及英国一切其他的事情。我们给它上了这一课，它要求我们兑现。世界上到处都刮着一股民族主义和自由之风，这股风在亚洲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强烈。由于我们说“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我们是否就成了不大地道的保守党人了呢？那些说“这个时间可能

① 后来的哈利法克斯勋爵。

②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一：《风云紧急》，第62页。

来到——总有一天”的人难道就是更加地道的保守党人吗？^①

丘吉尔在那个时期的孤立获得悲剧性的结果。丘吉尔倚靠极右派，在总体上损害了他在保守党的地位，也伤害了他和自由党以及国内非党人士的感情。在那几年里，德国的威胁正在发展，纳粹主义正在开始兴起，丘吉尔的一切警告，正象他自己描述的那样，没有起一点作用。诚然，西方盟国仍旧拥有巨大的优势力量，不到1936年以后或者甚至更晚到希特勒的侵略不能制止时，仍旧没有有力的论点说明我们有必要冒风险。但在这一届撒下不幸种子的议会里，由于人们普遍怀疑丘吉尔的判断是否可靠，他的演讲和重整军备的要求不管是多么切合实际，都受到了损害。在印度问题和帝国事务上，看来他保持着不切实际和反动的观点。保守党的广大群众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鲍德温、哈利法克斯和内阁其他人员是正确的，而丘吉尔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就难于想像在外交问题和重整军备的问题上情况能够完全得到改变。

丘吉尔在一般人认为是人生中最好的十年里——55至65岁——不得当权，不管是福是祸，这是他的命运。1935年年中在麦克唐纳隐退之前，风传要邀请丘吉尔参加政府。印度法案业已通过，他参加政府的障碍已经排除了。鲍德温和他的老友杰弗里·道森（《泰晤士报》编辑）以及汤姆·琼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反对丘吉尔的议论和反对劳合·乔治的议论是一样的。1935年5月在鲍德温和道森的一次讨论中有一段话最能泄露真情：

……和已经发表的某些声明相反，他个人并没有反对意见，但是温斯顿可能会成为分裂的力量，尤其是因为外交关系和国防将是最重要的问题。^②

然而，在整个的那届议会中丘吉尔的讲演一直是重要的事件。

^① G.M. 扬：《斯坦利·鲍德温》，第188页。

^② 《泰晤士报史》，卷四，第二部分：《1921—1948》（伦敦，1952），第722—723页。

当他把注意力从印度问题转向重整军备时，他几乎是独自地以突出的精力和韧性开展这一运动的。因为我那时的兴趣集中在别的一些问题上，尽管我们仍旧维持着友好关系，但我和他的联系并不象上一届或下一届议会期间那么密切。1921年丘吉尔在写给劳合·乔治的一封信中议论道，“多数人在退职后就默默无闻了”。^①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这种情况。下院中两个突出的人物仍然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

在下院里还有另外一些重要人物。前铁路领导人 J. H. 托马斯在不幸消失之前是个有力的、很孚众望的人物。萨姆·霍尔以谨严而又巧妙的手腕领导了印度问题的谈判。但他不是党和议会的宠儿。他太拘谨，太好吹毛求疵。劳工大臣哈里·贝特顿很受尊敬，甚至被人热爱。沃尔特·朗西曼是个有点莫名其妙的人物。他曾经在战前几届著名的自由党政府中任职，因而他具有那几届政府遗留下来的人物所特有的某些魅力。他虽不是个激动人心的却是个有能力的演说家。他的演说中的事例和数字都安排得很好。他的讲话很象一个公用公司董事长的演讲。劳合·乔治不喜欢他，断言“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自己辩论的要领，但是却能打动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他从来不说‘船在卸货’，却说‘搬货下船’。这就使未出过海的人感到印象深刻。”^②这是颇不公平的批评。但是朗西曼对于政府的主要价值是，他虽然来自最受尊重的自由贸易的环境中，但却毫无异议地日益相信了保护贸易。

在1924年那届议会里我们的旧团体中，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后座议席。那些人当中最突出的是安东尼·艾登。他一进入下院就和达夫·库珀专门研究外交事务。1926年他成了当时的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议会私人秘书。他的初次演说就和他以

^① 比弗布鲁克勋爵：《劳合·乔治衰亡史》，第114页。

^② 托马斯·琼斯：《日记和信件，1931—1950》，第351页。

后在外交事务辩论中所作的贡献一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1931年9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1934年1月1日他被任命为内阁中不担任职务的掌玺大臣。他继续作外交部的一般性工作，但是集中精力于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的会议。正象他以后向鲍德温指出的那样，日内瓦事务事实上是外交事物，要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多年以后我任命爱德华·希思为掌玺大臣，让他在布鲁塞尔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进行谈判时，我仍旧没有忘记这一点。但情况当然大不相同。那时外交大臣霍姆勋爵是上院议员，尽管希思在下院代表外交部，任命他的首要目的是要他进行复杂而又困难的谈判，期望能够导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这是他全神贯注的任务。此外，霍姆和希思在所有一般问题上都是一致的，这和艾登与西蒙或霍尔之间的关系不能相提并论。

321 在战争刚结束后进入议会的年轻人当中，艾登的高升是最惊人的。我从没有听到过对他的批评；他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紧跟他之后得到高升的另一些人是：达夫·库珀、奥利弗·斯坦利、罗布·赫德森以及特伦斯·奥康纳。这些人都逐渐挤进了大臣的行列。这使我们的团体剩下不多几个人了，但是我们毫不困难地吸收了新的信徒。

有一条教训可能是值得记下来的。在每届议会中年轻的议员都亲眼看到同时代人的擢升。如果他们自己有作官的雄心，他们是难免某种不满或嫉妒的心情，这种心情他们必须尽力克服。毕竟应召者众，入选者少。正象后来别人常常提醒我的那样，职位的数目总是有限的，一个人如不挤掉别人是无新位置可找的。但新任命的大臣们有同样的义务在行为上小心谨慎。他们不应当过于迅速地或过于自负地采取前辈政治家的姿态，那只会激怒在竞选中被他们超过或抛在后面的伙伴。多年以前一位非常敏锐的观察家说过，“我认为没有一种语言比大臣的语言更容易。一个人在一

周内就能学会。”但是一个被吸收进政府的新人，特别是如果以前批评过政府的人，不应该表现得很快就掌握或者非常熟练地使用大臣们的惯用语言。

在政府掌握如此大多数的议会里，议员们必然有机会在议会内外参加种种非官方委员会的大量讨论。除了“1922年委员会”——它是保守党内所有议员都可以参加的，它成为有点象是后座议员们每周一次的会议——之外，有针对各种特别问题，例如外交、财政、住房等党的委员会。我定期出席那些使我特别感兴趣的委员会。此外还有许多完全是在非正式基础上组成的团体。正是在这些团体里我们刻苦工作。那一届议会一开始就组成了北方集团，它是由所有支持政府的占有北英格兰席位的议员组成——总数约有四十人。它的主席是这个地区资历老的议员尼古拉斯·格拉顿—多伊尔爵士。因为它是在地方性的基础上组成的，这就自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代表许多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分歧的观点。我们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对我们地区的生活和未来影响最大的问题上。当我们的建议侵犯高级政策的范围时，这就有时导致分歧或者妥协。不过，我们为了北方的利益，对政府保持着一种非常一致的、颇为有用的压力。萨姆·斯托里、卡思伯特·黑德勒姆（直到他当上官为止）、罗杰·拉姆利、路易斯·斯皮尔斯和其他许多人在我们的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另一个团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承继前“基督教青年会”的——集中力量于政策问题上。汤姆·马丁是这个团体的积极而又忠实的秘书。我们的人数在十八至二十之间。在后一个阶段我们得到尤斯塔斯·珀西勋爵的宝贵帮助，他证明是一个最勤勉、最有用的力量。我们之中最突出的议员是罗伯特·伯奈斯（他是作为一个国家自由党成员参加的）、安东尼·克罗斯利、杰弗里·埃利斯、爱德华·格里格、理查德·劳、休·莫尔森、查尔斯·皮特、二位林赛（肯尼思和诺埃尔）、汉密尔

322

顿·克尔以及保罗·埃姆利斯—埃文斯。随着这届议会的进展，我们能够在党内施加不可忽视的影响。党的督导员们对于我们的行动肯定是熟知的，他们肯定并不总是加以支持的。但是在这一届议会期间和下一届议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想不起由于我开始在议会里发表越来越强烈的意见而引起对我的安适的社会生活的任何干涉。我谨慎地——和我一块儿工作的人也是一样——紧紧抓住那些我们努力使它成为自己的议题的东西。如果说我们对这些议题吹毛求疵，那么在所有别的事务上却是一贯支持政府的。只有在非常个别的情况下我们中间才有人到反对党的投票厅去投票，我们也不是在所有各种议题上提出过分苛刻的批评。这样我们才没有被划入不忠诚、倔强的反叛者范畴之内。议员同伴们，甚至党的机构，对坚决所持并坦率发表出来的观点是宽容的。如果一个议员或议员集团对政府所有的观点——不管是大小，也不管和他们的主题有无联系——一贯加以攻击，他们马上会被当作闹别扭和爱吵闹而受到制止。甚至许多人都认为似乎是“古怪的行为”；如果是真诚的话，则受到原谅。

一直到慕尼黑时代有了深刻而损伤性的裂痕，党才开始分裂，并扩展到日常社会生活中去。在那之前，我想不起任何由于我的行为而引起议员同伴或督导员办公室的敌意，甚至大臣们自己（除了极少数）也没有表示敌意。

第十一章 访问俄国

324

在许多观察家眼中，正当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不是处于临死前的痛苦中，也似乎处在衰落中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人却明显地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取得了稳定。在我的政治生涯最初的几年里，英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感情处于轻视和恐怖之间。但到了1932年，许多英国人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的一片广大土地上强行建立起来的政权到底是否值得仔细地——如果可能的话客观地——研究呢？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些开始利用当时可以获得的旅行便利的游客中，具有客观态度的人却是很少的。在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馆中工作了三年的斯特朗勋爵对英国旅客通常的反应作了一段很好的描绘。他说他们对俄国的看法倾向于反映他们自己的右翼的或左翼的信仰。象韦布一家这样的知识分子特别易于受骗。他用一句显著的话总结了这种通常的反应：“在三十年代，对苏联事实的介绍仍然是一种主观现象。”^①

无论如何，在1932年在我的同胞中很少有人能够或渴望进行这样一次旅行。若干商人和技术人员去那儿或长或短地呆了一段时间。到那儿去的还有一些工会领袖、少数议会议员以及一些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的同情者。还有一两个知名之士，例如肖伯纳和阿斯特夫人，他们的结伴旅行受到了广泛的宣传，尽管他们去的目的似乎是交谈而不是专听别人的介绍。当然，现在是条条大路通向莫斯科。现在有川流不息的旅客，他们的旅行有的带着好意，有的带着敌意，有的为了作买卖，有的为了进行政治活动，

^① 斯特朗勋爵：《国内和国外》，第61页。

325 有的人旅行甚至有寻欢作乐的癖好。此外，还有一些艺术家、科学家、作家进出铁幕。这种交往全都是有价值的，也是健康的。在三十年代的初期却不是这样。因此在1932年秋季，我决定最少进行一次短期访问。我十分清楚我在几个星期内是不可能获得具有特殊意义的知识，我只能看到人家给我看的東西，我所能得到的消息也只是人家希望我得到的。不过，我想那将是一件有趣的经验，甚至是件开心的事。我决定丢掉我自己的先入之见。但我希望其结果使我将来更加明智地阅读和研究在那个使人迷惑的舞台上可能出现的事态进展。我的朋友阿伦·扬和我同行。除乘船以外我们都坐“二等”，有时坐“硬席”，我们认为这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看看普通人民。

大家都知道一个旅客经历的详细记载是令人乏味的事，但我在这儿发表了一些我给我母亲书信的摘录，因为它们可以给人提供一幅值得记录下来的图画，这幅图画是俄国在三十年前如何出现在一位不具偏见的观察家眼前的景象。^①

寄自“合作号”客轮

1932年9月1日

8月30日

不管俄国的五年计划可能多么确切，我们的五周计划不象完全按照着安排进行。我们本打算乘“捷尔仁斯基号”客轮在8月31日启程。实际上，由于接受了旅游局几乎是可怜的恳求，我们乘坐“合作号”于8月30日开航。

它是一条小船——我认为不会超过二千至三千吨。船很干净，显然保养很好。这只船是俄国制造的。

我们住在一间相当漂亮的有两个卧铺的客舱里。一般的卫生

^① 纯粹个人和家庭的事务略去。某些重复删掉。其余则照原样引用，无重要更改。

设备是够好的。但是洗澡间却很糟，尽管有好几个热水龙头，却几乎放不出热水来。

在船上转了一圈，和船上唯一懂点英语的高等船员——我想是个大副——谈了几句话以后，一个秃顶、长着一副地道鞑靼人面孔、和蔼可亲的老服务员来通知我们吃晚饭。晚饭有茶、熏鲑鱼、326冷火腿以及干酪。看来面包是充足的，奶油也是这样——至少对我们是如此的。

8月31日

除我们之外只有两个头等舱旅客——一个住在列宁格勒的德国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在五六个三等舱旅客中(船很空)有两个美国人。其中之一是个美籍俄国人，他前往德文斯克附近的老家作一次短期访问。尽管他带着感情称赞新俄国，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却是一个地道的纽约佬。另一个美国人是个带点感伤的老年绅士。他是一个“社会学家”。我想他一定是在某一个大学里担任着某种职务。他到俄国来是想对它作出某种有主见的判断。他总是骄傲地说，“我的脑子里完全是空白。”由于他没有带任何关于俄国的书籍，又不打算请向导，也没有任何介绍信，除了美国话以外不懂任何其他外国语言，于是我想，他的脑子会是很长的时间保持着那种平静而纯洁的状态。

如果说这条船上的旅客很少，那么船员却是够多的了。船员的男女人数大体相等。非常奇怪，就我所见，服务员全是男人。就餐时的侍者肯定全是男性的。但是妇女确实是被雇用来当水手的。有一个女船员整个上午一直坐在据我看是最危险的高处，在那里试着油漆桅杆。我认为她干得很好。妇女还擦洗大部分的甲板，擦拭铜器，等等。船员好象都吃得很好，都很快乐。他们都不说英语。他们是愉快的，见人总是笑脸相迎。

由于船员们似乎每天干活八小时，因此他们的人数很多。此外，据德国工程师说，每个俄国企业或事业单位一般雇用比它实际需要多百分之二十的人员。船上的无线电收音机和留声机不少，声音不断从船上的各个角落传出；此外，德国工程师弹钢琴，大部分船员都大唱其歌。总的说来，生活是很愉快的。

寄自“合作号”客轮

1932年9月3日

327 “计划”肯定进行得不顺利。我们现在仍旧在汉堡，而不是已在去列宁格勒的路上。昨天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卸货上，卸的主要是兽皮；然后他们开始装上大量的物资——钢条、钢坯、各种机器设备。装货工作大约进行到今天夜里，然后我们动身到俄国去。

看到俄国人从德国大量购买钢铁和机器设备，使我感到烦恼。德国正借给俄国我们所拒绝的比較长期的信贷。但德国贷给俄国的是来自我们的银行家用英国货币贷给德国的巨额贷款，对这些贷款（自从1931年8月停止支付协定以来）德国却拒绝偿还。因此，我们实际上是在财政上支持俄国，并且用我们的资金间接地在今天正装运的这些货物上进行冒险——只不过这些货物来自德国的斯图加特和埃森，而无论如何不是来自英国的米德尔斯布勒或斯托克顿。

寄自“合作号”客轮

1932年9月4日，星期日

食物相当好，虽然颇为单调。我们有充分的面包和奶油；鸡蛋是经常吃的，只是不新鲜。肉也不太坏；但是他们烹调的一只鹅和几只鸡，我想一定是沙皇政权时残留下来的。船上的医生无疑是船员中最聪明、最愿意帮助人的。大多数俄国人似乎很不愿意谈论政治。

这条船上的船员宿舍非常好。他们都有卧舱（两个或四个人

一间),卧舱里都是普通床铺,而不是吊床。他们有一间很好的娱乐和阅览两用的房间,在那儿进行文娱活动或举行讲演。他们似乎极愿接受各种教育,不管是职业性的(关于航海事务方面)还是一般性的(主要是政治和经济方面)。船员们选出自己的苏维埃即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和船上的官员商议对船员有影响的问题。就我所知,这个苏维埃管不了船长,但如果它愿意的话,它可以向上一级苏维埃申诉。

出了娱乐室就是列宁室。这个小房间里 有桌子和椅子,船上的苏维埃经常在这儿开会。在主席座位的上方挂着巨幅的列宁像,墙上挂着用作讲授使用的一支步枪及其各个部件,并有一条标语:“所有真正的工人必须学会用这个武器反对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前几天的某一个夜里,所有的船员举行了一次大会,会后接着唱歌等等,用以庆祝革命日程表上某一个周年纪念日。这十分有意思,但是他们似乎很严肃地对待这件事。

寄自伏尔加河上(在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之间) 1932年9月6日

我希望寄去的几张明信片你已经收到了,但觉得不是很有把握。俄国邮政效率之低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已引起最高当局——斯大林等人——的震怒,他们已要求早日进行改革。

我们于7日早晨在列宁格勒登陆。我们一上岸马上受到向导——一位金德尔弗罗因德太太——的接待。我们在列宁格勒期间由这位女士负责照顾我们,还备有一部大型轿车(林肯牌)供我们使用。

金太太显然是一位具有丰富知识、聪明而有个性的女士。自那以后,我们从未遇到象她那样给人好感、那样能干的响导。当然,她是真正“资产阶级”出身(用这里的话说)。我想她的父亲是个医生或者那一类的人。她的丈夫(原籍德国)是个会计,从事生产中

的成本核算和经济研究工作。

在旅馆(这个旅馆设备很好,虽然美国人所谓的“管道系统”不大好使。)吃了一顿快餐后,我们开始观光这座城市。人人知道彼得大帝宏伟设计的总计划,在浸饱水的沼泽地上建筑一群如此宏伟、富丽堂皇的大厦,这一现实的物质成就本身就是惊人的。更令人惊讶的是一系列宽阔的大街和林荫大道(涅夫斯基大街等等)、漂亮的政府机关、宏伟的大教堂、礼拜堂等等,在所有建筑中最具特色的自然是彼得和保罗要塞。当然,有许多最惊人的建筑是他的继承人的功绩。这个城市确实没有按照他的意图发展,而是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甚至发展到涅瓦河的另一边了。然而,这个城市的总的特征却要归功于它的创始人,他在这里留下了他的印记。甚至十月革命也予以尊重,这位伟大皇帝的雄伟的骑马雕像,仍泰然自若地被允许留在那儿。

我们驱车在市区大致巡视了一番,市城的外貌给了我们良好的印象,之后,我们前往艾尔米塔什美术博物馆。在我们驱车前往时,最引人注目的(除建筑等以外)是街道上呈现的奇怪景象。人行道上到处非常拥挤。(列宁格勒的人口在最近一些年里几乎增加了一倍,现在接近三百万。)电车在宽阔的大街的正中间行驶,车上同样拥挤,或者说挤得象一窝蜜蜂,粘在这些陈旧、噼啪作响的机器上。但是大街本身——就是两边人行道和行驶在街道中心的电车之间——却完全空闲着。除了我们这些旅游局的汽车外,几乎看不到一部小汽车。有很少一些“敞篷四轮马车”被保留下来了。甚至连二轮轻便马车也难得看见。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英国道路和街道交通的人,这是一种奇怪的景象。

艾尔米塔什美术博物馆有许多珍藏,这不需要我多说。我主要是想看看伦勃朗的画,那都是些杰作。但是因为我们到这儿来主要是看新鲜事物的,而不是看旧的东西,所以在美术博物馆没有

花费太长的时间。接着我们去参观我所见过的最奇怪的展览，叫做“反宗教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在古老的圣伊撒大教堂里面，把这个教堂接收过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办这个博物馆。它由一系列的展品组成，用来说明人类许多种族世世代代迷信上帝的旧的愚蠢行为。与此相对比的是展出了(从宣传的观点来看运用了大量的技巧)一些科学上实有其事的东西。如果你能想象到韦尔斯利用《金树枝》创作出一篇适合于英国小学低年级学生智力的、针对宗教的讽刺文，那你就可以对这个独特的博物馆有一概念了。

下午五点钟我们吃了午饭。俄国吃饭的方式是，每日三餐，即早餐、午餐和晚餐。早餐在上午八点到中午之间的任何时候；午餐从下午三点到六点；晚餐从九点到午夜。330

午餐以后，我们又驾车出去，特别是去看看这个城市比较贫穷的地区，和为了应付严重的房荒正在建造的一些新楼(巨大的用混凝土建造的公寓式房屋)。我们还参观了一所“文化之家”——一种工人俱乐部或工人会馆。这些俱乐部是新政权一个伟大的特征——也是最好的特征之一，它们提供了成年教育以及娱乐方面的真正需要。

八点我们去看歌剧《伊戈尔王子》。这出戏演得非常好，尽管还没有(我相信)达到莫斯科的水平。据我看来管弦乐队是很好的，舞台布景好极了。歌剧院是一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当然是旧政权时代的)，其大小和英国特鲁利街的剧院差不多。看到观众坐在这非常华丽、典型“资本主义”的歌剧院里，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御用包厢(在正中)是官员们专用的，两边主要的包厢(以前是皇室专用的)也是这样。其他包厢的间壁已被拆掉，因此三排包厢成了三排楼座。剧院挤得满满的。我们坐在正厅后座上。观众中似乎有一半是无产阶级，一半是政府工作人员或技术工人。他们聚精会神，似乎认真地欣赏这次歌剧的演出。我想工会是买的集体票，

他们的票价特别便宜,其他的票价为三卢布到十二卢布。

我应当对食物说几句话。食物是足够的,但是烹调得很坏,引不起食欲。列宁格勒肯定缺少奶油、鸡蛋,在某种程度上也缺少肉类。我们的旅行当然是属于二等的,但即使如此,我们所得到的东西要多于(当然是这样)普通老百姓。鱼(主要是鲟鱼)相当好,干酪也不错。这里有一个头等旅馆,有人告诉我那儿吃的和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大旅馆一样,不过它的价格是惊人的。

9月8日

331 吃完早饭,在旅游局办事处作了一些安排之后,我们前往参观一所产妇之家和儿童福利中心。这是一所主要的实验和教育中心,它对城市及其管区的其他诊所的工作负有责任。据一位负责的女医生说,他们现在已达到全城的孩子(我猜测“资产阶级”不幸的残余分子的孩子是例外)都在医院里接生的程度(由于全城有三百所以上妇产医院)。所有在校的孩子都由教育当局免费发给牛奶。七岁以前的孩子(他们七岁入学)由儿童福利诊所免费供给牛奶等。我们看到母亲和孩子们来拿用瓶子装好的牛奶。每个工厂配有一至数名医生,据认为他们和来诊所询问医疗知识的孕妇进行联系。要搞清我们听到的话哪些是实有的,哪些仅仅是未来的“计划”,当然是很难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诊所似乎管理得很好,虽然我说它在清洁和管理方面还赶不上我们最好的福利中心。

这个事特殊的——可能是不太引人注意的——一面是随之而来的流产合法化。这件事现在已经得到法律的认可;而且,任何不希望要孩子的孕妇在法律上说有权利在国家医院里做流产手术。列宁格勒去年做了大约两万次这样的手术。

下午两点钟我们到一家电话机工厂去。这家工厂原先是由一家瑞典商号爱利克森经营的,当然在十月革命时充公了。由于原

先的厂主累年积月地训练了一支有两千名熟练工人的队伍，新政权当然可能在这个工厂获得成功。或许这就是让我们去参观的原因。不管怎样，这还是一次令人感兴趣的参观。这个工厂（每天两班）现在雇用男女工人七千名。经理——他极为友好——向我们介绍了技术和劳工两方面的组织情况。

我们在五点半吃午饭。午后八点我们去看电影——还是挤满了人。这部电影（和绝大部分电影一样）性质上是属于宣传的。它描绘“集体”农庄比旧的个人占有制度优越，以及新的科学方法比传统的耕作方法具有更大的生产力。

十点半我们才吃晚饭。第二天上午十二点半我们在列宁格勒 332 呆了多事而有趣的两天以后，赶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我们坐的是“硬卧”车厢，每室有四张卧铺（或者木头架子）。每一个卧铺备有一个褥垫和一条毯子。我们没脱衣服。在充分开放暖气（证明并不全然有效）以后，我们上了床，接着就睡着了。

寄自伏尔加河上

9月9日，莫斯科

我们到达的时间大约是十点半（仅仅比通告的时间晚一个半小时）。我们在车站受到旅游局一位向导的迎接。她是个中年人，面貌黝黑而丑陋。她英语说得一般，但是显得很能干，主动热情。她是个敏锐的、精力旺盛的共产党人。

我们下榻的旅馆——莫斯科旅馆——肯定是属于二等的。那么我们就成了二等旅客了！在莫斯科有两个很好的旅馆，但是人家告诉我房价贵得出奇。我们没有洗澡间，也没有热水。食物很差——比列宁格勒那儿的还要坏——但数量充足。到处都很好的是茶，每餐都有。汤也是好的；可是鱼和肉却糟透了。

大约十二点（正午）一部小汽车（旅游局提供的）来到了（我们的向导随车一块儿来了），我们绕城一般地看了一下。这使我们首

次看到克里姆林宫(古老的有围墙的内城),中国城,即鞑靼城(也有一道城墙围着),以及现代化的市区。我们被领去看了一个庞大的工人运动场和娱乐场(革命后修建的)以及一个巨大的、摆满了新式飞机的飞机场。到处都有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和许许多多士兵。

在莫斯科看到的景象比在列宁格勒所看到的更为繁荣。由于莫斯科再次成为首都,当然处于有利地位。人们似乎穿得更好些;有更多的汽车等等;由于它是个把诸如英国政府机构所在地、伦敦商业区和维多利亚大街合为一体的地方,因而有更大比例的高薪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有许多新建筑的大厦——大部分是受到德国和瑞典的影响而有所变化的美国摩天大楼式的建筑物。我认为它在设计上是同种类型中最杰出的,虽然建造质量似乎相当差。在比较贫穷的地区,正在繁忙地建筑巨大的公寓式的住房,在旧有的大厦(当然,所有的猎园巷和五月市^①现在都成为工人的公寓了)和俱乐部及“文化馆”上面增添楼层,等等,等等。大部分街道正在翻修。新的下水道系统正在安装。到处是变动、凌乱、重建和骚动。警察是优秀的——在帮助处于困境的外国人方面,和我们的警察一样地有礼貌。每个人似乎都对外国人感兴趣,至少在表面上对他们很友好。

每天下午二至四时列宁陵墓对公众开放。每天有一至三千人排成长队等着进去参观。陵墓是一所用红黑色大理石建成的漂亮建筑物——相当矮,有点埃及风格——竖立广场上,正好在克里姆林宫的下面。我们被领了进去(没有排队等候),那真是一幅奇怪的景象。列宁的尸体防腐以后躺在玻璃棺里,防腐造成的苍白的蜡一样的面貌看了使人有点不舒服。列宁的头部是生得很好的——前额很高,面目清秀——瘦削而带贵族气派的鼻子,小而漂亮的贵族气派的双手。人们虔诚地排成纵队走过,象他们以前瞻仰某一

^① 猎园巷和五月市本是英国贵族居住的地方。——译者

个圣人遗体一样。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这是很有效果的。即使在共产主义下，人的本性依然存在。人们渴望崇拜某种东西或某一个人。基督被拿走了，由列宁取而代之。

此外，我们还参观一些其他的東西，其中看了一所监狱。向导坚持要我们去，我们勉强同意了。这显然是一所关押最坏犯人的监狱，而政府明显地对它在监狱改革上的成功感到自豪。所有犯人在监狱里的纺织厂干活，赚得很少一点工资。犯人选出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即苏维埃，以便和狱长商议对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似乎可以随意来去，每年获准有一个星期的假期（如果他们因为行为良好而获得这种假期的话）。大部分犯人刑期都很长，但是他们能得到很大幅度的减刑，因此一个表现良好的犯人最长刑期事实上变成了三年左右。显然只有两个犯人假期后没有回来。拿监外条件和监内条件相比，这可能并不说明监外条件更好。但是据我推测，一个逃跑的犯人实际上是没有出路的。警察制度比旧俄时代更严密，更有效得多。而且，没有通行证他不可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没有身份证，特别是没有工会证，他不可能在国家企事业单位找到工作。他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因为私人雇主没有了。他将得不到配给证，因此就没有吃的东西，只能靠偷窃或犯罪过活。

我带着介绍信去问候大使埃斯蒙德·奥维爵士，可是他休假不在。但是大使馆已经接到外交部的通知，说我要来访问，一等秘书斯特朗先生以最高的礼节和最诚恳的态度接见了。我和他十分有趣地谈了一会，在七点半左右我离开了大使馆。他为我举行了一次令人很满意的鸡尾酒会，并用他的小汽车送我去看歌剧。歌剧是《白雪公主》——一出典型的俄国歌剧，演出很成功，而就我的鉴赏标准来看，不管从哪一方面说表演都是非常好的。演出令人高兴，但是长得可怕，因为幕间有相当长的休息时间，让人谈话并吃

点东西。我们吃了一些极好的熏鲑鱼，饮了一点啤酒。大约在午夜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旅馆。我们不得不步行回去，差一点迷了路。那里没有出租汽车，少数残留下来的轻便马车要价太高了。

9月10日

某官员知道我是一位议员，蒙他的好意我今天得到一部汽车使用，这一特权旅游者通常是得不到的，至少二等旅游者是得不到的。上午我们到政府各机关去，递上我从英国带来的介绍信。我和对外贸易部的一位M. 德沃拉茨基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会见（用法语进行）。他是第二把手；他的上级度假去了，我希望在我返回莫斯科时见到他。我们就英苏贸易状况、贸易平衡以及进出口商品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得到了我所需要的数字。在整个会谈中我让他自己谈话，而他确实也很喜欢这种作法。我对俄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了解。

335 下午两点钟，我们去参观一所新的工厂食堂。这所巨大的“自助食堂”雇用了三千人，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对男女工人供应廉价的饭食。它每天供应一万八千份，而似乎组织得极好。（所有这些特别待遇当然只限于工会组织内的无产阶级。）

午饭后，稍事休息，我们到电影院去，看了另一部宣传电影，片子拍得好极了。电影的名字是《通向生活之路》。它的主题是政府采取种种办法收容并在劳动营地训练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以及堕落的儿童（由于内战造成的），使之成为有用的公民。和所有的宣传一样，有点过分了。但是影片的艺术性很强，很有趣味。

9月11日

早晨我们去参观克里姆林宫。宫殿已改成历史博物馆，那些教堂（其中有三所在宫墙之内）也成了宗教艺术品等的陈列馆。

宫殿里的收藏品是很有趣的，但是我没有看到最好的东西。我相信许多最好的东西没有展出。那些收藏的礼服很豪华，上面镶满了各种宝石，但却有点粗俗。有大量各个时期的服装等物品，还有各个时期的四轮大马车、加冕典礼时乘坐的四轮大马车、普通四轮马车以及马夫号衣等物品。

一般教堂或者大教堂，特别令人感兴趣。政府从研究文物的观点出发，对这些教堂照管得特别好，大量的修缮工作以及清除过多的涂抹和粉刷工作等，也在进行。

一点半，正在此地访问的四位年轻的保守党议员请我吃午饭（在一家时髦的饭店里），他们是：曼利、米切尔、安斯特鲁瑟一格雷以及麦克莱。他们请我吃了一顿美妙的午餐——鱼子酱和雉鸡。我想他们很富裕。

从三点半到四点半，我会见了外交人民委员 M. 李维诺夫，他的职位相当于我们的国务大臣。说得一口极其流畅的英语，对人非常和气。

晚上十一点我们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前往伏尔加河上的下诺夫戈罗德。这个城市在奥卡河和伏尔加河的汇合处，往日以每年一度的集市而著称（自从农业集体化以来，这个集市就被取消了）。³³⁶这次旅行真是令人作呕。我们坐的是一个没有隔开的长车厢（就象地下铁道的车厢一样），我想车厢里大约有二十六至三十人。木板从边上（以奇特的角度）合拢来构成卧铺。垫褥（徒有其名）是有的，但是要使它不落到卧铺下面去，那是极端困难的。幸而火车速度每小时从未超过二十英里左右。人们（各阶级都有，有工人、官吏、农民等等）是可爱的。扩音器在大部分时间里高声放送古典音乐（幸而共产主义禁止爵士音乐），人们整夜吵闹地吃喝各种食物和饮料。我要遗憾地说，暖气证明不起什么作用。（我希望这个政府象消灭富农一样地消灭臭虫。）我们到达下诺夫戈罗德已经精疲

力尽了,时间在上午十点左右。

9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

这儿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可爱的青年向导(一位大约二十二岁的姑娘),她把我们领到旅馆。火车站位于河的东面,要是前往市中心区、克里姆林宫或是北部市区,人们必须横渡奥卡河。道路就在浮桥上,因为冬天河水结冰,浮桥每年都要卸走然后再重新铺架。一架高出水平面的桥梁正在建设中。当然啦,这些河流的水面高低相差很大——多至二十至三十英尺或者更多。现在河水很浅;但是在4、5月间,在冰雪融化以后,水量一定很大。

旅馆还过得去。仍旧没有洗澡设备,但是有一种喷水微弱的(冷水)淋浴,这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一些。先浑身上下擦上肥皂,然后站在喷头下冲一冲,这样至少可以清洁一些了。

吃过老一套的冷鱼、干酪等的早餐(大约在上午十一时)以后,我们便出发去观看下诺夫戈罗德景致。

寄自伏尔加河上(在萨拉托夫和斯大林格勒——以前叫察里津——之间) 1932年9月17日

337 下诺夫戈罗德的旧城和通常这样一类的城堡一样,建筑在一个俯瞰着河流的山顶上。这个城堡或称内城,由一块大约和罗马军营那样大小的场地构成,四周由高高的砖墙——一种美丽、古老、带粉红色的砖——包围着,附有通常的辅助建筑城楼、城门、堞眼等等。这些城堡的大部分建于十五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它们象征着俄国人和鞑靼人之间的长期争霸斗争。在以后的日月里,城堡自然而然地成了政府的所在地。例如,这儿有一所非常美丽的十八世纪住宅,它以前是总督的官邸,是按照古典式样建筑的,现在当然成了政府所在地,被当地苏维埃所占用。在这个建筑物的旁边,革命以后建筑了一所附有一些办公室和一间很好的大厅的漂

亮市政厅；这所建筑的式样是现代化的，所有线条都是直的，还装上了玻璃，不无特色，也是美丽的。

接着我们去浏览市场。这儿的人群富有画意，有各个民族和各个种族的工人和农民，从纯粹的斯拉夫族到鞑靼族和蒙古族，形形色色。服装正是人们通常联想到的农民穿戴——短衫、棉袄、高统皮靴、树皮和绷带裹腿、长袖长衫、皮帽子以及各式各样的上衣。妇女们头上还扎着头巾。喧闹的情况是无法形容的——各种气味也是这样——不梳不洗的人们、肉类、水果、蔬菜、向日葵籽、牲口，等等；还有人们难以想象得到的苍蝇。市场有三种——第一种，属于合作社的摊子；第二种，属于集体农庄的摊子；第三种，少数残存下来的小商人的自由市场。最后这一种常常出售质量较好的物品，但是价格很高。他们由于课税越来越重而难以存在下去，只能完全倚靠贩卖在社会主义摊子上可能买不到的某些特产品，并对他们的商品索取过高的价格，才能维持下去。

看了市场以后，我们乘坐小汽车（连同一位向导都是旅游局提供的）到卡车工厂去，这个工厂离市区大约十公里。

那条道路和“拓荒”国家（俄国至今还是一个拓荒国家，它在很多方面使人想起加拿大）所有的道路一样，质量非常低劣。经过炎热、尘土飞扬、颠簸的奔驰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那个工厂。这个城镇——它确是城镇——建筑在森林中间。树木已砍伐用了；但是周围仍然明显地是无边无际的枞树、桦树和白杨树的丛林。我没有搜集这儿人口的确实数目，工人中当然有许多是从下诺夫戈罗德找来的。但在你知道这个工厂的年计划产量是十四万部卡车时，你可以推测出这个企业的规模。巨大的厂房、食堂、公寓住房、俱乐部、剧场等等，在最近两年里迅速地建立起来了。住在帐篷和临时营房里的陆军分遣队正在帮助建设这些工程。一切都仍然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和俄国的许多事情一样，这项“计划”肯定尚未达

到正常运转状态。使我们大为失望的是,不许我们进入任何车间。官方的产量数字仅为每天四十至五十辆左右卡车(一年两万辆),肯定出现了某种障碍。但这样大规模的奋战肯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们可以设想困难——主要是训练熟练工人——将被逐步克服。雇用了大量外国工人——美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以及比较高级的外国技术人员。由于工资政策的改变,根据工人的技术情况准许有不同的工资级别,以及用计件工代替计时工,优秀的工人每月能赚到五百甚至一千卢布。

我们回到旅馆,饭后在市内和城头上散步。那是个美丽的黄昏,接着是一个爽朗、月光普照的可爱的夜晚。在漫步的过程中,我们交上了好运。当我们看到市政厅会议室里所有的灯都亮着,我们就问向导能否设法进去看看。她自告奋勇去试试看,在和把门的人商谈很久之后,准许我们进去,并在讲台上给我们安置了座位。听众有男有女,大约二百来人,坐在一个马蹄形的礼堂里,座位象剧场里的一样,逐排上升。台上坐着二十或三十人——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台的每一端各有一个讲坛,形状象教堂的道坛。在其中一个讲坛一个人正在发言。经询问后我们得知,我们被准许参加的这个大会是一次以下诺夫戈罗德为首府的全地区共产党代表会议,代表们正在参加由党召集起来讨论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各方面教育问题的特别会议。发言人是地区的共产党书记,他在向会议致开幕词。代表们包括各种类型——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以及一些明显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他们大概是一些技术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顺便说一下,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任何保守党议员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发言人首先谈到教师问题,必须培养出更多的教师,他们的地位必须提高并付以较高的工资,他们必须受到更为适当的训练,他们必须通过当地俱乐部内特设的阅览室等组织得到更好的学习条件。然后他谈到书籍和报纸。必须

增加农村图书馆的数目，必须印刷和发行更多的报纸。必须传播更多的共产主义原理和“经济唯物主义”的知识（现在这种知识在学校里代替了宗教教义）。这些和与此有关的一些事情是他讲话的主题，这个讲话热情洋溢，非常流畅。听众似乎颇感兴趣，虽然有一些人好象嫌话过长，走到休息室静静地吸烟去了，这正象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可能的出现的情况一样。讲话以后有一段休息时间，然后才开始正式会议。这时我们被通知离开会场。

9月13—17日

13日上午大约11时我们登上了内河轮船，船在正午前后开航。下诺夫戈罗德和斯大林格勒之间的距离约为一千二百英里，但是船的航速很慢，因为船必须沿着一条最困难的曲折航线前进，以避免伏尔加河特有的沙滩。每年这个时候河水很浅；我想像航行的困难多少有点象上溯尼罗河那样。这条船是一条平底暗轮汽船，吃水很浅；舱位分成四等。这次旅行我们属头等舱旅客。我们各有一个很小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不大好用的脸盆。可是船上有一个洗澡间，经过和轮机员长时间交涉以后，洗澡间有时能供应热水。头等舱有交谊室，窗上装有大块玻璃，它的前部有十分舒适的椅子；二等舱在船的尾部。三等舱和四等舱在甲板下面，那儿的条件是极为恶劣的。轮船完全挤满了。在俄国人们似乎老是在旅行。无数的农民在不同的码头上船或下船，形形色色和各个民族的农民都带着大量的行李，大概包括着他们的全部财产。茶、西瓜、葵花子人们吃起来没完没了。

头等舱里大部分是度假的或是到某一个新地方去旅行的红军军官和工程师。他们都很讨人喜欢，很有礼貌。他们弹钢琴，唱俄国歌剧里的片段；他们和我们下跳棋，还向我们提出有关英国的无数问题。农民也很能唱歌——令人愉快的合唱成了黄昏时常有的

场面。昨天夜里船员们举行了一次苏维埃会议，对他们的衣食不足提出抗议。他们叫来了船长，对他进行质问，最后他同意以后要搞得更好一些，并在斯大林格勒给他们买些新工装裤。

这条河的大部分河面很宽（我想其变化大约在四分之三至四分之一英里之间），但是航道却非常窄。我们经过一些村庄，在某些大市镇停泊。停泊期间我们可以下船，散散步，看看风景，其中最有名的是喀山、萨马拉、沃尔斯克、萨拉托夫。它们是供出口的水泥（用沿途大部分地段绵亘右岸的小山里的白垩和石灰石做原料）的主要产地，也出口水果、谷物和木材。巨大的木排顺流而下，直到阿斯特拉罕；捕鱼似乎是许多人的主要职业。

这是一次非常平静的旅行，（除去了生活条件糟糕以外）我十分愉快。我们和同船旅客的谈话使我们获得了许多知识。人人都说情况比从前好多了；有些人极为热情，他们有一种“圣战”精神（如果能用这个共产主义词汇的话），当然，所有年轻的一代就象我们接受资本主义一样，把这种制度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制度。在学校进行强烈的宣传；取消所有的宗教教育，即使在自愿的基础上也不准许；一周六天的制度，星期日被取消了，引导青年人只用日月计算时日，而不再用周名（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等等几乎不用了）；对共产主义的物质成就感到自豪——所有这一切暂时满足了或者似乎满足了普通人的愿望。当他们开始解决物质问题而“斗争精神”开始泄气，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谁也难说。

寄自莫斯科

1932年9月25日

9月18日，斯大林格勒

这个城市原叫察里津。它现在的名字肯定是由于想消除对旧政权的一切记忆，并尊崇俄国共产党现任书记，也就是俄国事实上

的独裁者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它以前是个小小的商业省城，由于在伏尔加河上的位置而相当重要。它现在正迅速地变成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上午从十一点到三点我们参观了建筑在市郊的巨大的拖拉机制造厂。可惜今天是假日；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工厂的一般布局(规模巨大)和各种各样的住房、俱乐部、工厂食堂、娱乐场所、学校、诊所等等，这些都是为工人而建造的。工厂大约雇用了一万八千人；年产量定为五万台拖拉机。这个数字(和“计划”里许多其他数字一样)还没有达到。尽管如此，很明显产量确实很高。我们和一些担任指导员的美国人进行了有趣的谈话。他们认为俄国农民脑子是快的，而且善于适应，他们是热心而精力充沛的学生。但自然由于缺乏机械方面的经验，把许多工作搞坏了，一些贵重机器因为使用不够熟练而常被损坏。

这次参观花的时间很长，但是极为有趣，而且我们有一位特别聪明能干的向导，他从拖拉机制造厂一开办就被雇用在厂里工作了。大约在下午4点钟午饭后(在俄国可以随时吃饭)我们到当地的一家电影院去，看了一场有关克里米亚内战的宣传电影，该片把那时的困难情况和现在的幸福情况作了对比。克里米亚(即以前俄国的里维埃拉)现在成了那些需要特别治疗的工人的医疗所，从前的旅馆和别墅今天改成了招待所和疗养院。

晚上11点30分我们动身前往罗斯托夫。

9月20日，罗斯托夫

上午9点，我们乘车去参观一个大型国营农场，他们称“索沃霍兹”。这意味着国家是雇主，而农民是被雇用的工人。这和“科尔霍兹”(集体农庄)大不相同，在集体农庄农民联合起来，把他们的土地、牲畜、农具合到一起，组成一个单位由他们自己经营，在把收成的一部分交给国家以后，他们再进行分配。

这个国营农场名叫“骆驼”，大约在两年以前组成。它主要占用了黑土区顿河哥萨克人荒废的或未开垦的土地。这些哥萨克人曾用这些土地经营大牧场和繁殖马匹，只有很少的土地用于耕种。土地面积极大——共有二十五万英亩。这些土地被分成每块大约二万英亩的单位，每个单位都有一名管理人。农场的总部是个小居民点，那儿居住着大部分专家和许多工人。农场大约雇用了三千人，几乎已完全机械化了。这个农场只生产小麦、玉米、大麦等。我们看了正在进行着的秋种，拖拉机拉着大型的美国机械。

构成农场中心点的村庄似乎安排得很好，住房也相当好。和通常的情况一样，住房是一套套的公寓式房屋，而不是分开的房子。有普通的诊所和托儿所；但是这儿和工厂的情况不一样，大约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女工。

农场招待我们吃了一顿最好的饭，我们受到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殷勤、更亲切的款待。我们的向导是一位可爱的青年人，他曾在美国中西部某一个州住过，英语说得很好。这儿的农村除了土壤更黑、更肥沃以外，很象加拿大的大草原。地里从未施过任何粪肥，但它似乎(至少在现在是这样)肥力是用不完的。当然按照英国的标准每英亩的产量是很低的——但在另一方面土地面积是如此之大。当我们乘汽车从罗斯托夫去农场时，发生了一件稀奇而又惊人的事情。我们在路上(大约在从罗斯托夫去农场的中途)有一次急转弯，忽然看见在路旁不超过二十码的地方有两只大鹰静静地站在那里。我们停下了汽车；那两只大鸟一点也不害怕，因此我们就有时间十分靠近地把它看了几分钟。这真是一个壮丽的奇观。最后，仔细看了我们一会以后，那两只大鹰慢慢地振翅起飞，庄严地离开了。

傍晚，吃了饭以后，我们到一个露天公共娱乐场去，看了一场西尔卡西阿人男女舞蹈演员非常美妙的演出。那些舞蹈与其说是

美丽,不如说富有画意;音乐颇为粗犷。

罗斯托夫和南部地区一般说来似乎比俄国北部繁荣得多。到处有较多的食物;人们显得更加愉快而不怎么紧张(就紧张这一点来说列宁格勒是我们到过的地方当中最厉害的),而罗斯托夫通常有一种资产阶级的、快活的姿态,它和其他城市形成奇异的对照。我不知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如果不是纯粹气候影响的话。

寄自莫斯科

1932年9月26日

9月21日,罗斯托夫

上午(11点到2点)我们被领去参观一个刚刚建成的制造各种农业机械(不是康拜因——而是播种机、犁等)的大工厂。我认为这个工厂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翻砂车间是个极好的车间——自动化制作铸模(即使在道尔曼·朗公司我也从未看见过这种装置,仅仅听说这是一种新式的美国装置);一条传送带把铸模送到一个地方,在那儿把铸铁熔液浇注到铸型里——一般说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设备。锻工车间是一个优良的车间,但我认为还没有那么有效地把工作组织好,这儿有很多工作还是手工操作,而在现代化工厂里应该由机器操作。也许机器还未运到,要不就是机器太贵了。木工车间非常好,但是工人似乎不太熟练。这个车间的新奇设备是一种吸进锯末的系统,它由管道吸进锯末,再运到烧锯末的炉子那里。这个工厂叫谢尔马什,大约雇用了一万八千人。我们搜集到了许多关于工人级别和工资等级的统计数字。工人根据技术的不同分为八级。最高一级只有一百六十八人;最低一级却有七百七十八人。主要部分为倒数第二和第三级(即第六级和第七级,这两级大约有八千人)。工资按件计算。最低一级保证最低工资为每月七十五卢布;最高一级的工资为二百七十八卢布。从

这一点人们可以看出新的非平均主义政策已经前进得多么远。现在强烈的趋向是付给最好的工人以最高的工资，而计件工资（现在只要技术上可以办到就普遍实行）很有助于加强这种趋向。

9月23日，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现在是乌克兰共和国的首都，这是个非常有名的城市。旧都基辅（我以为）它那美丽如画的城楼、圆屋顶、伊斯兰教尖塔、钟楼——是具有宗教热情和丰富多彩生活的旧世界。哈尔科夫有点象美国芝加哥——灰色，有效率——或者说颇有效率——有着巨大的、摩天大楼式的公共机构和位于市区边沿的庞大的工厂。象我们访问过的所有的城市一样，革命以来这里的人口增加到以前的三倍，或者几乎四倍。成群的农民被产业工人较好的条件和较高的工资吸引来了。例如哈尔科夫十五年前的人口刚刚超过二十万。现在人口超过了七十五万。巨大的拖拉机制造厂雇用了二万三千人；围绕着工厂的特定郊区住着五万人。此外，世界上最大的汽轮发电机工厂正在建筑中。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使人惊奇的，甚至使人感到愕然的城市。人人都对未来有着疯狂般的热情。这和繁荣时期加拿大或美国城市的气象一样。我不知道是否将出现不景气！

9月23日，莫斯科

我们乘坐的从哈尔科夫开出的火车有些晚点，我们到达旅馆并盥洗吃饭完毕后，已经接近午后两点了。我访问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办公室，和会长 M. 阿姆杜尔进行了一次长而有趣的谈话。我发觉他已经收到外长 M. 李维诺夫的指示，要他为我安排我所要求的各种会见事宜。

下午5点左右，我们去看一位杜兰蒂先生，我们有一封给他的介绍信，我们和他一直谈到快到8点。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位很

有才华的记者,从 1921 年起就住在俄国。人们普遍认为他比任何外国人都更了解俄国,也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曼彻斯特卫报》的代表张伯伦是个例外,以后我将会见此人。顺便提一句,真够奇怪,这儿(莫斯科)竟然没有我们英国任何一家大报的代表。只有德国和美国的新闻界派有真正合适的代表在这儿。

杜兰蒂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俄国是有希望的,但他认为今冬将不好过。由于工业效率不高和对农民进行过度的压榨,工业产量和农业生产都很低。在资本货物(即生产资料)上的巨大投资造成了消费品的极端缺乏。这意味着不可能吸引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真正努力去干,因为他们的劳动报酬仅仅是纸卢布而不是商品。同时,由于世界市场价格的下降,为了筹集同样数目的外汇就必需增加出口的数量。因此在城市里引起了食物等物品的缺乏。但是如果压榨得不太厉害,消费品的生产终归会大大增加,而农民(不管是单干农民还是在集体农庄干活的农民)的生产也就会上升了。

9 月 24 日

下午 1 时我会见了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即部长) M. 罗森戈尔茨和他的几位同事。这些人中最有才干的是 M. 奥津基,他不久将到伦敦去。我们对贸易、贸易平衡、俄国所承担的义务、信用状况、贷款可能等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可惜 M. 罗森戈尔茨不能说英语,但 M. 奥津基英语说得很好,因此谈话进行得相当自然。这次谈话大约持续到 3 点 30 分,随后我们回到旅馆吃饭。 346

寄自莫斯科

1932 年 9 月 27 日

9 月 25 日

11 时我们履约去见 M. 勃罗伊多,他是一个名为“帕尔季斯达

特”——即共产党出版事业——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这位杰出人物是一位老一代的革命家，有着极其引人之处。我原以为他是个双手沾满了鲜血的人，其实他十分和蔼可亲，并颇有风趣。他非常殷勤地接见了我们，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聚集在他的房间里。

他为我们摆出了丰富的奶油、干酪、鱼子酱、面包，还有清香的加糖茶——这是我们在俄国吃到的最好的一顿饭！接着他开始非常详细地、颇为自豪地介绍了他的事业以及他是如何领导的。

“帕尔季斯达特”是党的机构，而不是政府的机构。但是在这个国家里，党和政府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结合在一起的。“帕尔季斯达特”出版全部宣传性的书籍和小册子，数字无法统计。它自己有发行这些出版物的书店，当然除此之外它还利用各个地区党的机构。生产和销售的数量都是惊人的。例如，他们曾收到斯大林的一部新著三百五十万册的订单。事实上，由于纸张的严重缺乏，他们只发行了一百万册。

除了纯宣传性的书刊以外，“帕尔季斯达特”还出版所有带倾向性问题的书籍，例如历史、经济学、逻辑学、哲学等等。所有这些中小学和大学用书的编写都带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因此这些书籍属于“帕尔季斯达特”的范围，而不属于国家出版垄断机构“奥基兹”。“奥基兹”只出版那些不会引起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问题的一般书籍。“帕尔季斯达特”还出版反宗教的教科书。他们不象我们那样在学校里拨出时间进行宗教教育，却每天都有反宗教课程——这是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谈完了他的出版物的题材以后，我们讨论了一些技术问题——纸张、印刷、装订等等。他还解释了他和他自己的书店的关系，他和国家出版公司所属书店的关系，以及折扣率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几乎持续到2点30分；后一部分主要是我对许多有关英国书籍的出版问题以及我们企业的性质和范围问题的回答。

我的下一个约会是会见一位 M. 纳格列尔，他是财政部长格林科的副手。他完全是个另一类型的人——不是革命领袖，而是一位典型的政府官员。他可爱而聪明，精通外国语言，消息非常灵通。我们进行了一场最有趣的关于俄国财政状况、对外贸易以及和增加对英国贸易的可能性的讨论。我们还从两个国家各自的观点十分详细地讨论了进行一项英俄贷款的可能性。

俄国人似乎很喜欢和我们谈话，从来没有表现出因为太忙而不愿谈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怎样设法完成他们的工作。

傍晚 7 点，我们去了一次向玛克西姆·高尔基致敬的大游行。

寄自列宁格勒

1932 年 9 月 28 日

我们看到的这一特殊庆祝仪式——这是每年一次的高尔基周——是官方组织的一个盛大的集会。集会在大歌剧院举行。台上坐满了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加里宁——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即全苏主席——主持会议。在一个长桌——当然铺上红布——后面坐着许多有名的人民委员，即部长和另外一些政府或党（更为重要）的著名人物。稍过一会儿，高尔基终于进来了。人们热烈鼓掌。接着亨利·巴比塞^①也来了。人们鼓掌更为热烈。后来斯大林（非常谦虚地）来到了。全体听众起立，热烈欢呼表示欢迎。（大使们仍旧平静地坐着不动。）当然，斯大林在政府里没有担任或者只是担任了很不重要的职务。但他是党的书记——因此他是俄国实际上的独裁者。外交官向加里宁（一个克莱因斯^②式的人物）递交 348 国书，但是他们知道谁真正统治俄国，党的机构远比名义上、宪法上的政府机关重要。接着开始了歌颂高尔基的讲话——冗长不

① 巴比塞(1875—1935)，法国作家。——译者

② 克莱因斯(1869—1949)，英国工运家和政治家。——译者

堪。首先，一个文艺评论家讲了一个小时。随后是位名叫伊凡诺夫的作家，幸好他临场紧张，讲不下去了。教育部长讲了三刻钟；接着亨利·巴比塞也讲了话；然后一位诗人朗诵了他自己作的一首长诗来歌颂高尔基——接着是不同的政府成员，他们宣布了各种通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向高尔基表示敬意，受到了雷鸣般掌声的欢迎。(1)授予高尔基列宁勋章——相当我们的一等功勋章。(2)下诺夫戈罗德将改名为高尔基城。(3)莫斯科的一座剧院将以他的名字命名。(4)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莫斯科的主要街道之一将以他的名字命名，等等，等等。

在所有这些仪式和其他讲话以后，便宣布休会吃些点心。(所有这些吹捧的演说没有一句是出自斯大林之口，他不引人注目地坐在台上的第二排和一位青年人交谈。这个政权正在变得非常拿破仑化，那整个晚上他们讨论的题目都是那个被类似皇家恩惠所垂青的青年是怎样一个人和他的前途。)这些演说似乎使听众极为高兴，还有授与高尔基以荣誉的那些通告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听说知识分子中有一些牢骚，纷纷议论高尔基在意大利的别墅，他的四部小轿车，还有他那懒惰、自命不凡的家属，我想所有这些开销都是来自他在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版税。顺便提一句，有点莫明其妙的是，这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向右转的例子，即有些流言蜚语说亨利·巴比塞演说的语气受到最高当局的责难。据说他的讲话太极端，太强调“世界革命”。这被认为是危险的，“方式不好”。

在演说等活动之后，有一段休息时间。我们离开座位到以前御用包厢后面的一间大屋子里去，那儿的一张餐桌上摆满了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美味——完全是旧俄式的。接着是一场极好的音乐会，由歌剧的管弦乐队演奏柴可夫斯基、鲍罗金、李姆斯基-科萨柯夫等人的作品，还有歌剧院合唱队演出的各种歌剧的片段。我们还听到当今俄国舞台上第一流悲剧女演员朗诵的高尔基的一段

作品。在这以后，又休息了一回，又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大约 11 点 30 分或 12 点)演出高尔基的剧作《底层》(我想是)，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最佳俄国男女演员的全部明星主演。第一幕演完后，快到半夜一点，我们便回去睡觉了。

9 月 26 日

今天主要的时间用于访问国家出版公司的 M. 卢波尔。这个公司实际的头头是 M. 托姆斯基，但我猜想他在那儿主要是以一个老的党的领导人和革命家的身份出现，而 M. 卢波尔乃是主要的决策人。我和他进行了一次最有趣的讨论，从 11 点谈到 1 点 30 分，讨论了他的企业中的每一个细节，他给我提供了许多详情(资产负债表等)和他要人为我写的一份特别记录。使人遗憾的是，他不会说英语或法语，而翻译人员说得也不太好。但我仍然和这个性格可爱而有吸引力的人进行了一次最愉快的谈话。他给了我各种文件的副本，其中包括他和作家们订立的合同。从出版者的观点来看，我应该说这个制度有些东西值得称道。肯定没有版权代理人进行打扰。

9 月 27 日

上午我们观光游览，去看了中央反宗教博物馆，十分有趣，但是没有列宁格勒那一个博物馆安排得巧妙。这个博物馆还要更粗糙些。但是它给宣传提供了一个好主意，它(在实际上)攻击宗教没有攻击迷信那样厉害。

我们还参观了十分有趣的托尔斯泰博物馆和一个叫作“手工艺之家”的地方。“手工艺之家”出售乡村的现代手工艺品。我认为那些东西做得很差、难看，几乎是些没有人想买的东西。

我今天遇到一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青年人，他在那儿的工作 350 是安装从一家英国商行买来的机器。这位青年对那个特殊地点的

相当坏的情况作了一番介绍——我认为最坏的是，许多劳工是被强迫的劳动者，他们来自阿斯特拉罕，是那里被剥夺了财产的“库拉克”(富农)，他们每月只赚五十卢布——普通工资的三分之一左右——他们的待遇非常之坏，以至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和想法寄托于日本侵略俄国的可能性上。

9月28日

上午9点左右我们到达列宁格勒。盥洗和吃饭以后，我们和以前照顾我们的那位优秀的向导(金德尔弗罗因德太太)一道去沙皇村——从列宁格勒乘火车大约要半小时。叶卡捷林娜宫——一种凡尔赛式的宫殿——的确好极了。它建于不同的时期，但大部分可和法国豪华的标准相比美。装修未免有些俗气，虽然有几个漂亮房间。舞厅好极了——我认为比玻璃画廊好得多，尽管其情趣有问题——就象在玛瑙室或者天青石房间那样——但它的外表是无与伦比的，十分华丽，甚至极其壮观。最好的房间之一是一间摆着一些精妙的屏风和橱柜的中国漆器的房间。

另一座宫殿——亚历山大宫——是一座普通的古典式建筑，没有什么特殊的风格，但有强烈的人情味。沙皇尼古拉和他的妻子自1905年革命以后就一直住在这儿(在那以后他们再也没去过彼得格勒的冬宫)。他们的私人房间开放给人们参观；甚至他们孩子的房间和玩具也是这样。那些私人房间都是为沙皇特别装饰的，难以形容地陈腐——就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一个外省资产阶级的家庭。这里充满一种奇异的悲怆气氛。皇后的卧室(摆设着坏得不能再坏的枫叶式家具)的墙上仍有三百幅圣像。随身护符、耶稣受难像和各式中古时代的遗物——加上蓝白花的糊墙纸、放在铜框架里的数不清的照片——给人以十分奇特的印象。

总的说来，这些宫殿新政权保管得很好。但是宣传无处不有。

在叶卡捷林娜宫的所有漂亮房间都提醒人们，宫廷是这样的豪华，而农民是如何挨饿，如何遭受欺侮。在一个房间里，陈列了许多长袍等物，一张长长的告示说，这些奇装异服在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仍在流行。有一张英国国王宣布议会开会的照片（剪自《插图伦敦新闻》），还有一张乔治五世的加冕照片。当我正在颇有兴趣地观看这些照片时，我的眼睛突然被一个熟悉的面孔吸引住了——这是拜厄姆·肖画的德文郡公爵穿着长袍的画像。我猜测那是他在参加加冕典礼，手里捧着个托垫，上面放着王后的皇冠。我不知道这幅画怎么会落到布尔什维克人的手里，但是在画像上方有这样一句大快人心的题词，“资本主义国家旧政权下依靠剥削工人阶级为生的典型的特权贵族。”³⁵¹

* * *

我选择了一个在共产主义制度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时刻到苏联访问，但在我出发的时候并不知道。斯特朗勋爵曾用下面一段话对这段时期作了很好的描绘：

我在莫斯科三年另几个月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斯大林巩固他的个人统治的时期；是苏联大规模工业化采取紧急步骤的时期；是农业集体化、消灭富农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谨时期；是苏联面对德国和日本的威胁开始把它的外交政策演变为对非侵略性强国进行合作的时期。^①

我记得很清楚，他那时是驻莫斯科的代办，对我表示了最大的善意，几乎象在他的书中所陈述的那样，为我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

象艾丽斯^②那样，进入一个镜子世界是一种奇异的感受，那儿的每一件事都和我们预期的恰恰相反。我脑子里记起了三件事。第一，海关似乎很随便，有点马马虎虎；这是切合实际的，因为俄国

① 斯特朗勋爵：《国内和国外》，第60页。

② 艾丽斯是英国作家道奇森（笔名卡罗尔）所著童话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译者

几乎什么东西都缺。一般的看法认为，好象是不管什么人，只要他们给俄国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就给国家做了好事而不是坏事。唯一的例外是书籍。书籍受到严格的检查。我带了一册希腊文的荷马著作，它在那位官员眼中似乎是一种假冒俄文的劣货，也可能是某一遥远地区的语言，而《奥德赛》则是一种宣传武器。第二是，共产主义信仰受尊敬的程度已和它的对立面在西方国家所受到的尊敬一样。我记得我被领进一所学校，受到一位面貌可憎的女校长的有礼貌的接待。在外表上她和我们英国典型的乡村女教师没有什么区别——短头发，夹鼻眼镜，带着有点非难人的表情。我提出关于课程的几个问题，她明确地作了回答，并对学校的进步表现出明显自豪感。我冒昧地问他们是如何开始一天的教学活动的。她惊异地看着我，好象我提出了一个轻率的问题，于是就回答说：“唔，当然啰，我们一天的教学活动是从反宗教课开始的。”她说这话的态度，正好象我在英国的一所教会学校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受到的恰如其分的斥责：“唔，当然啰，是从祈祷上帝开始。”

第三件事是，我和我所乘坐的俄国船上的随船医生的一次长时间的讨论。这次谈话象同所有俄国人的谈话一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英语说得很好。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从前是个职员。他曾在外国干涉俄国的战争中和内战中参加志愿军，受过重伤。在我记忆中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对苏维埃政权有鉴别能力的支持者。他不是个党员，但是今后他可能要求入党。他谈得比我所期望的还要爽快，这或许是因为那个小小的谈话室很背静，没有别人。他几乎谈论了所有有关我们对他们经常发出的言论。他抱怨英国的虚假宣传，资本主义国家雇用的许多特务所干的颠覆和反革命的勾当，帝国主义包围俄国并终于进攻俄国的阴谋。他最后的呼吁显然是真诚的：“如果你们别管我们的事，不再继续搞间谍活动和宣传活动，事情就会更好一些。”

有一件事情特别使我高兴。虽然俄国人至少在别人能够偷听的地方不愿意坦率地谈话，但显然仍被允许象安全活瓣似的编造并欣赏他们喜爱的笑话。这些笑话非常流行。我想举一个例子。俄国什么都很缺乏；成群的人包围了每个铺子和每辆电车，而大量的主要是希望获得更多食物的人们由农村流入城市，这就使情况更加严重了。人人跑来跑去，但是火车根本不够用。火车站的情景就象人们在印度看见的一样。人们成百甚至成千地在车站院内耐心地等待着。干什么都得排成长蛇阵。（几年以后我才在国内见到长蛇阵。）但就在这个已在发展着的等级制度的社会里，当然给予高等阶层——工作人员、官员等等——种种有利条件。在流传的笑话中，有一个最为流行，说是有一个人，看见在某一个铺子或售票处的外面排着一条长蛇阵，他愤怒地打着手势，推开众人挤到前面去，大声喊叫，“让开，让开，我这里有不用排队的许可证。”被冒犯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回答道：“你这个大笨蛋。这个长队中的人都是有许可证而不用排队的。”1940年我在军需供应部工作，当时各方面为争取优先权而进行斗争，我想起了并曾引用过这个故事。陆军、海军、空军——每一个军种都把他们的特殊要求注上“最紧要的”标记。结果是什么都成了最优先，一时把混乱的情况弄得更加混乱了。

在几个星期中我们参观了从列宁格勒到罗斯托夫的大片国土。我进行了多次谈话，交谈的人不是最高级的人物，而是在莫斯科有点地位的官员。我对这些官员不是特予重视。毫无疑问，他们对所有的人谈同样的事情，我没有听到新的东西，也没有新东西可以报道。当然，我的目的之一是要了解一下，如果能够提供信贷，可以做点什么事情来增加我们的商品出口，特别是重工业商品的销售。很明显俄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经济革命，把一切力量用于尽快达到具有一个高度水平的生产能力。人民的消费品被剥

夺了,以便集中精力搞生产资料。我还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它可能
354 能对也可能不对,即俄国的主要困难是它几乎还没有从封建主义
中摆脱出来,就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
而不想经过产业革命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所形成的正常发展过程。
因此他们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工作,想在五年内完成别的国家需要
几代才能做完的事情。这当然意味着大量的牺牲。还存在着一定
的质量低劣问题,特别是在建筑和其他工程方面。由于无知和缺
乏经验,他们在使用高价买进的贵重机器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高级当局在计算上还有一些严重的错误。或许最明显的缺陷是在
运输方面。铁路系统似乎完全和沙皇时期一样。卡车很少,小汽
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这是一场巨大的努力。

当然我无法看到表面之下的事情,尽管我怀疑这是一个残忍、
专制的警察国家。另一方面,我深为普通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善良
和亲切所感动,特别当我们离开大城市前往南方的时候。这些现
在都成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对俄国比那时有了更多的了解,他
们也幸而正在学会更多地了解我们。

回到英国之后我只限于对我的选民作一次非常客观的讲话,
而没有装出一个俄国事务专家的样子。但我学到了很多对我有用
的东西。我必须承认当我穿过边界回到西方世界时,我似乎是从
一个恶梦般的世界返回到现实世界。那时我想到俄国人或许会有
同样的感觉。谁是世界上的疯子?是那些住在精神病院里面的人
还是那些在精神病院外面的人?这个问题仍未解决。

第十二章 重建

355

1931年危机以后全世界都提出了这样一个相同的问题：旧制度还能幸存下去吗？它能得到挽救吗？如果可能，怎样挽救呢？俄国用建立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虽然法西斯政权至少在理论上体现了一种混合的制度，但意大利已经采用了一种高度控制的经济。仍然处于彻底崩溃痛苦中的德国，迅速走向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美国仍然忠于自由经营和竞争，可是尽管它有巨大的资源而且需要进口的东西不多，它仍然处于一种无望的混乱状态之中，几乎无法救治了。

英国通过伟大的全国自我克制行动，采用传统的补救办法来应付当前的形势。英国人民在接受这些办法时牺牲了他们自己的享受和生活标准，表现了他们在紧急关头时一贯具有的纪律观念。不过，金本位却不能维持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管理通货的时期。我们如果不是使我们自己与世隔绝，至少是不得不设法保护我们自己以免遭受那股横扫世界的经济飓风之灾。我们眼前的危机过去了；政府和人民的坚定性表现出，尽管英镑贬值了，它还没有完全失去控制。英国还没有发生象德国1923年通货膨胀那样的问题，没有由此发生那种破坏性的社会影响。

然而却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怎么办？政府的政策除了采取通货收缩这样一个猛烈的经济措施外，似乎局限于采取关税制度。人们相信这个制度本身就会打下恢复的基础。我们

356 中间有许多人不能接受这个判断。怎样才能使物价水平提高到一个可以导致更大的贸易活动的有利可图的水平呢？怎样才能提供就业的机会呢？怎样才能把闲置的资金引导到投资中去呢？我们认为这需要一个更为广泛、更加富有想象力的计划。我们欢迎把强制实行保护关税作为第一步，或者至少把它作为一个更为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在关税的安全范围内，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必须决定由什么机构来执行关税制度，以及这个制度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在1932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一辩论占去了许多时间。《泰晤士报》发表了三篇关于“正确的关税政策”的文章，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应该建立什么类型的关税委员会。我于1932年1月18日投书《泰晤士报》，讨论关于建设性地运用关税以提供增加工业效能的机会。我强烈主张关税本身不会达到我们大家公认的真正的目的。的确，如果对低效能和老办法采取保护政策，提高消费工业品特别是出口工业品的价格，那么可能害多而利少。由于钢铁工业比较复杂，部门较多，这一点就特别显著。当然，唯一的办法是要弄清楚关税是否可能成为工业改组的工具？内维尔·张伯伦也有这样的看法，他在1932年1月写给斯诺登的信中概述了下列意见：

……把统一关税率和附加关税的权力结合起来……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以前任何一届政府从未有过的手段，借以劝导或强迫——如果你喜欢的话——工业部门整顿它的组织。我特别想到的是钢铁和棉纺织工业；我对保护关税制度的好处的信念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盲目的程度，以至闭眼不看这样一些工业部门彻底改组的极端重要性，看看它们将来能否免于灭顶之灾。^①

张伯伦2月4日在下院的讲话中，强调计划中的关税委员会的任务是鼓励提高工业效能，而不仅仅把它自己局限于提出一张税率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203页。

表。这就是张伯伦非常具有说服力地宣布他父亲的政策的最胜利的那一场辩论。 357

在同一辩论中，赫伯特·塞缪尔也提出了一项通过一个工业委员会来进行改组的计划，尽管他是个坚决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我的主张是把两种手段结合起来。要把关税用来促成工业改组和合理化。我极力主张关税委员会不应该仅仅是个司法机构。它应该处于一个发展委员会或工业委员会之间，筹划国家经济生活的发展，帮助工业部门在变化了的情况下进行改组。这可能引起国家对私人利益的干涉。但是保护主义者无法对这个论点进行攻击，因为放弃自由贸易肯定意味着结束放任主义。我对这个争论总结如下：

这样改变财政政策是否取得成功这一整个问题，取决于关税委员会的人事和赋予它的职权范围。他们是必须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在象炼钢工业这样一个部门，如果委员会纯粹是司法性质的，无权提出自己的建议，自己也无权作任何事，而只能决定赞成哪些关税或者反对哪些关税，那么保护贸易制度就没有作用了。但是如果授予它以咨询权，并能使它改变成为一种真正的发展委员会，如果它有权力——通过一系列小组委员会和不同行业打交道——从各个方面在技术和财政上对工业的改组和重新改变方向上都有所帮助，那么我们将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有一个能够带来两个满意的结果——一个受到保护的市場和一个经过改组的工业——的委员会。^①

新闻界许多部门对这方面的想法表现出相当大的同情。例如《星期日泰晤士报》为我发表了一篇我称之为“创造性的保护贸易制度”的论文；《泰晤士报》在它的一些社论中表现了相同的态度，对于法案的执行方法和关税委员会的组织和职能都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在3月以私人名义散发了一本名为《国家与工业》的十六页的小册子。我没有发表这篇东西，除了散发给全部议员——我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2年2月4日。

358 认为他们对此可能发生兴趣——以外，我只赠送给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一批人。我发现这是宣传我的思想的有用的方法。

《国家与工业》的论点是简单的。进口关税法令的通过将标志着英国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一个时代的结束。从现在起，受到考验的将是保护贸易制度，而不是自由贸易制度。如果关税根本不是相互吹捧的玩艺，也不是用来保护低效能的，更不是一种剥削消费者的手段，那么执行这个新政策的正确的行政机构选择好了没有？因为关税必须在英国工业复兴中发挥一种创造性的作用。进口关税咨询委员会——根据进口关税法案建立的关税委员会——因而将成为这个机构的拱心石。但它会被工作压垮。它会被不适当地专业化。它不应当建立自己的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如果它想工作迅速而且具有建设性，它就需要向那些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这些问题具有真正经验的人征求意见。我的方案是授权该委员会为全国每一个大工业部门建立充分代表劳资双方的代表机构。这样的代表会议应向工业顾问机构提出报告。这个由生产工业和消费工业的代表组成的议会附属机构应该研究关税制度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即使不能达成协议，这个委员会至少能够获得必要的情报。我继续论证说，这种在政府及其代表和工业界之间的不断接触是有效地抓住其他政策，特别是帝国贸易政策的必要准备。我们在对付金融和货币问题时同样需要这样一种机构。我们必需认识这些新情况。近年来政府对工业事务的干涉已经不断增加，但是这种干涉是用一系列特别办法进行的。如果不从上面把委员会偷偷塞进工业部门，而是从下面来吸收，那肯定是会更好些。这样就会把权力从国家转移到这些工业会议，并由各单位自下而上地进行集中管理。某种形式的职务上的代表性是必要的，

359 因为当时的根本性问题既是政治家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专家要解决的问题。我的论文是根据进口关税法令引起的行政问题所写

的，因而接着考虑了已经进行或正在变成必要的各方面扩大政府权力的问题，并提出一项计划，就一种在有组织的工业和因关税政策不可避免要产生的新机构之间的合作制度略示梗概。这本小册子在新闻界广泛流传，并得到大量友好的反应，虽然很自然地也引起了一些敌意的批评。当时，进口关税法案在议会通过。当然也就产生了咨询委员会。不幸的是，没有赋予它与工业协调的职责，也没有设立这样的工作的机构，而职责和机构这两项确实是必要的，如果保护贸易制度是复兴赖以建立的基础的话。

5月中我以同样的方式散发了一个更长、更有雄心的名为《下一步》的文件。这个文件尽管是不够成熟的，却试图对这些根本性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并提出一些解决的办法。扉页上的内容当然也是颇具雄心的。

几项简短的解释：

- (a) 需要一种包括政治、工业和金融这三者所有领域的全面的国家政策；
- (b) 英国能够独立采取的、走向重建的行动；
- (c) 如何在现代条件下保持经济的平衡和稳定。

其论点如下：

繁荣可以解释为这样一种经济情况：所有生产力——资本、劳工和资源——被充分利用以达到生产能力的最大极限来供给人们的需要。

经济平衡不是静止的平衡，而是在动中保持平衡，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平衡可能受到金融政策的干扰，例如减少货币数量和降低货币周转速度，提高借款利息以及通货紧缩等政策；也能受到政治政策的干扰，例如降低进口税或高额税收等；或者受到工业政策的干扰，例如浪费性的竞争和包括低效率的组织机构及销售办法在内的陈腐的工作方法。

十九世纪处理这些因素的方法——让市场需求来调节生产的平衡和把金融政策置于能自动调节信贷政策的金本位上——只能在市场不断扩张、工业获得的不断增加的盈余能被引向新的投资渠道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这种办法已经不起作用了，因为在经济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世界的发展是遵循竞争的道路，而不是互相补助的道路。与此同时，农业和工业两方面的劳动生产率都已经提高了。此外，让那些估计错误的企业家破产来取得平衡，这在大规模生产和固定资本耗费巨大的时代，已经成为经济灾难而不是一件小小的不幸事件了。

要代替旧的放任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创造经济繁荣，并提供某种有组织的办法来保持平衡。需要一个中央组织来指导经济上的努力和投资的流动。麦克米伦委员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最近的报告中都拥护这种方向。

通货的再膨胀是任何计划必不可少的预备工作。必须采取非常的行动把经济从严重的萧条状态中解救出来。必须在企业家中树立信心，他们由于物价下跌而受到了损害；由于缓和因经济萧条所造成的困难而需要交纳的高额赋税受到了损害；还因负担各种形式的固定利息支出而受到损害——这种负担由于来自生产不平衡所产生的商品的币值增高而增加，而保护黄金储备的紧缩通货政策加剧了这种负担。

通货再膨胀达到 1928 年批发价格的水平需要批发价格上涨百分之三十。即使提供低利息的借款，也很难保证企业家乐于进行新的投资。因此政府就不得不准备着手处理这个为工业家所不能利用的新资金的问题。政府保证的本身将能产生很大的信任，足以说服企业家进行投资。这项政策不会和要求政府实行节约相矛盾，因为这是资本账目项下的措施，如果它产生预期的效果，它就会因营业的恢复而增加收入，并且因为工业方面的就业恢复正

常而减少政府的开支。

只要进行有计划的、集中的指导，通货再膨胀的一些主要危险——英镑猛烈贬值、投机、新的不平衡——就会缩小到最低限度，因而能避免使人们的信心受到破坏。

批发价格上涨的全部影响不应该反映在零售价格上，而零售价格自 1928 年以来仅仅下降了百分之十；但是如果生产和销售上的改进不能抵消批发价格上涨的影响，那么对零售价格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在我所建议的经济体制中，劳工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我提出如下的纲领：

1. 一个对我们国内市场科学的、有选择的保护制度，其目的在于

(a) 保持我们的收支平衡。

(b) 从奢侈品中取得必要的收入。

(c) 把我们对外国供应品的依赖减低到我们的对外销售和具有健康特征的投资所需要的水平。

2. 建立每一工业部门或某些工业集团的全国代表会议，其任务为使有关工业走向最大可能的政策上的统一和必要程度的集中管理的方针下，鼓励并协助在采购、生产、销售、和研究上的有效合作。

3. 建立一个代表下列各方的投资和发展委员会：

政府——通过关税委员会。

工业——通过 2. 所提出的全国代表会议。

金融——通过扩大了权力和职能的“银行家工业发展托拉斯”这样的机构。

这个机构将使政治、工业、金融诸方面的政策平衡一致起来，联系起来。它将象麦克米伦委员会报告所鼓吹的那样，把投资引向正确的途径。英国工业联合会最近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4. 用下列办法使通货再膨胀达到 1928 年的价格水平：

(a) 一项给予工业借款人以低息贷款的银行政策。

(b) 为了在当前不利的市场条件下鼓励资本扩张，政府保证将实行

通货再膨胀政策。

(c) 通过投资和发展委员会作出努力，把新资金引向资本现代化，该委员会将把银行家工业发展托拉斯、关税咨询委员会以及工业会议的代表们的努力集中和协调到一项经济扩张的共同政策上来。

(d) 在不利的市场条件达到使借款人丧失信心的程度时，授权投资和发展委员会接受新的资金用作贸易机构的补助金，如有必要也用于打算帮助该委员会系统提出的经济重新调整计划的工作方案……

5. ……中央银行采取一种在存款和投资之间保持平衡的严格政策，作为确定向借款人收取利息比率的决定性因素。

许多这样的想法当时被认为是新奇的。其中有些证明是行不通的。另一些则是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即萧条十分严重，需求远远低于供应潜力，我们的人力和机器力量大部分闲置未用而提出的。可是我们提出的主要原则和鼓吹的某些方法，当时看起来几乎是革命性的，而在今天已被普遍接受了。

这本小册子在新闻界也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大量的信件从各方面寄来。其中一封是赫特伍德的艾伦勋爵寄来的，他表示同情。这是我和他第一次通信。在最有趣的信件当中，有一封是朗西曼的：

可是我仍然感觉到的主要困难是这样一个问题——供过于求是否存在。在我看来尽管有那么多反对的论据，供过于求能够而且也确实存在，昨天小麦市场的情况使我加强了这一论点。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作为政治家必须注意现在正在采取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段，而据在我看来，尽管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反对，现在采取的办法却是一些独立的办法，而不是互相依存的办法。这种情况和您的总的论点一点也不矛盾，然而弄清楚我们是否要我们计划中的出口或进口贸易进行管理，那是极为重要的。情况显得十分可怕，出口贸易好象会继续萎缩。^①

一个知名的航运世家的成员、终身坚持自由贸易的人能具有这样

^① 《沃尔特·朗西曼来信》，1932年6月7日。

的见解,这一事实表明世界上的传统制度已经崩溃到何种程度。我从梅纳德·凯恩斯那儿收到了一封特别有趣的信:①

我非常喜欢您寄来的小册子。我以为我的批评实在是由于您处在一种中间状态而引起的。但是由于您要求我提出批评意见,我想给您提一两条值得提出的批评。

1. 我的主要感觉是,您还远没有足够的勇气提出发挥国家投资作用的建议。您现在的努力似乎是把国家应该起的作用限制到最小的程度,您所致力的是想通过把私人企业和国家津贴结合起来的办法来取得效果;我怀疑至少在当前这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如果需要作为刺激用的金额不大,您的办法可能有用。但是现在即使一个人得到国家的全力支持,要想完成充分数量的投资也是非常困难的……

2. 您没有引起人们注意政府当前政策矛盾的程度。他们仍旧坚持使用许多在通货紧缩时期流行的格言和口号……

3. 您是否明白价格首先上涨是不可能的?作为购买力大量增加的结果,涨价才能出现,而购买力大量增加是增加商业活动或发展计划所带来的……

4. 您对节约不是说了太多的好话了吗?我认为预算节约这个问题是困难的。表面上节约有许多心理上的益处,它为改变债务状况开辟了道路,它还倾向于降低长期利率;与它相反的办法对商业界的情绪也是有害的。但是它不能阻止实行通货紧缩的经济,因而可能对企业利润有害……我想提出的办法是,在当前的情况下通过取消偿债基金把重点放在减税这个目标上。保持靠税收而存在的偿债基金是纯粹的、百分之百的紧缩通货……

总的说来,凯恩斯很自然地十分重视通货再膨胀和货币政策。就我来说,我则认为这仅仅是政策的一部分,许多人同意我的这种看法;而有效的工业组织和“合理化”一词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也是同样的重要。人们讨论了我的建设性建议——有时受到赞许,有时

① 1932年6月6日。

受到批评——但是我的诊断至少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赞同。在1931年危机期间，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无情的节约和保护关税制度上。现在纯粹的紧缩通货经济，如果推行得过了头，肯定地说其价值似乎是很值得怀疑的。保护制本身只能使低效率固定不变。为了提高物价水平，舆论界逐渐倾向通货再膨胀和所谓“创造性的保护制”，即采取不论什么样的办法或机构，使最高度的工业效率和工业改组出现，尤其是在基础工业部门中。

我们现在也因不再受金本位的束缚而开始感到宽慰。只要我们谨慎小心，而不是仓促地制定过高的计划，我们肯定可以利用这种新的自由。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正导致对处于旧放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采取全面的考虑。

因此，这对支持人们所谓的“计划”政策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可能有人要问，怎么会在1931年经济危机以后如此迅速地、适当而又真心地提出扩张和通货再膨胀的要求呢？那时候，用艾伦勋爵的话，“除了几个开明但是还未被承认的理论家之外……所有的人都相信必须以某种形式的节约为代价，来保持稳定和金本位”。^①此外，不管怎样为管理通货辩护，那些曾经把印刷机掌握在手里的欧洲大陆国家的经验却是很不能鼓舞人心的。黄金意味着稳定。^②所有这一切论点都是为了恢复黄金制度，并企图用一切可能办法坚持这个制度。反对麦克唐纳的大多数工党同事的主要理由是，他们既没有向整个金本位制度挑战的聪明才智，也没有真正的勇气在这个制度受到压力时用一切办法去保卫它，不管这些办法如何不受欢迎。举国一致内阁在最初组成时曾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他们投入全部力量进行战斗。但是他们失败了；因而不得不放弃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可是，他们所作的努力是有成果的，

① 阿瑟·马威克：《克利福德·艾伦：公开的阴谋家》（爱丁堡，1964），第110页。

② R. 巴西特：《1931年》（伦敦，1958），第339—340页，转引罗宾斯教授。

没有造成金融方面的惊慌失措。英镑的价值并没有下降到很惨的地步。经过若干月以后，在不同的货币之间建立了大致符合真正购买力的平价。再没有必要疯狂地执行紧缩通货的政策了，而这种政策在危机的时刻无疑是正确的。因此所谓的通货再膨胀——既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紧缩通货，而是一种合理程度的信用扩张——已经成为可能而且是合乎需要的。

此外，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片面的、保守的自由贸易的镣铐。奇怪的是，工党政府没有找到一种有适当收益的关税政策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大家相信多数工党大臣本来是会同意这个方针的，但是被斯诺登压服了。^①现在，作为“进口关税法令”的结果，正在建立一个关税机构，与某些外国标准相比它还是不那么过分的，但是它足以保证合理地增加购买力，并使我们国内的市场活跃，不致立即造成廉价外货泛滥成灾的现象。

因此，我们小组开始更加重视我们在货币及工业方面的政策。然而增加货币数量本身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货币使用的周转率及其保持平衡从而使存款比率和投资比率保持相等，这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有低利息的贷款，但是我们也有游资。因此，催促政府着手制定将其经费用于生产计划以及对地方当局类似的计划慷慨提供资金，就成了我们的一部分鼓动工作。在这一届议会结束以前，这个问题就象它在1929年确实经历过的那样，成了一个剧烈争论的题目。到1933年我已能就这个论题在议院发表讲话而无需害怕它会引起自发的反对了。我在1933年3月的一场关于经济问题的辩论中，已经可能在没有太多困难的情况下为增加政府 366 经费而进行申辩了：

人们几乎可能主张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政府应该把它的活动经常运用到和私人进行的活动正好相反的方向上去。在繁荣时期，个

^① 休·多尔顿：《回忆录》，卷一：《追怀往事》，第267, 299—300页。

人自由投资,甚至达到投机的程度。在那个时期,政府应该是个“对物价看跌的人”。它应该节约,它应该采取收敛政策。另一方面,在萧条时期私人不愿投资时,那正是政府进行投资的时候。困难的问题是政府是由个人组成的,它和私人一样受到同样心理力量的支配。在贷款利息为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房屋造价为一千四百英镑的时期,我们造了成千上万栋房子,自那以后我们就债台高筑。现在,在萧条时期,我们能以低息借款、房子造价也低时,我们却有点不愿拿政府的钱投资了^①。

这是十足的凯恩斯学说,在大约十年以后作为战时联合政府产物的关于充分就业的著名白皮书中已成为普遍公认的学说了。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即使它的正确性已被公认,但这个学说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在繁荣时期,增加政府开支——道路、学校、大学等等——的要求很难加以反对。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打开龙头。要关掉龙头,甚至要减少流量,已经证明是不那么容易的。凯恩斯在晚年时承认,制止要求过度耗费资源的过分的压力是困难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尽管现在至少普遍承认有这种需要,而且已经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以求在各有关方面对此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机构。

在这一年期间我继续努力工作。我几乎向所有全国性和地方的主要期刊投稿。我也给另一些杂志和报纸写文章,只要我的意见能为人所知就行。我在“扶轮国际”的地方分社发表讲话。我做报告;我参加辩论;我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宣传我的看法。我就是这样成了全国性的小有名望的人物了。

367 当时,“计划”这种概念本来是声名狼藉的,而它开始逐渐获得一定程度的欢迎了。除了受到各种实业界人士和理论家——巨头们以及一些狂热分子——支持的“政治和经济计划协会”这样的组织以外,适当结合和协调一致的中央和地方计划这种概念开始占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3年3月8日。

了上风。我于1932年年底在下院说过为自由经济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又说除了由工业界、金融界和政府协作的计划经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而我已能获得许多知名的权威人士的声援。“计划”曾经是个卑鄙的词儿,它逐渐缓慢而稳当地变得受人尊敬了。

我于1933年2月,以后又在3月,在下院为一个更富于想象力的政策辩护。资金是可以得到的。银行存款在上一年增加了二亿五千余万镑。但是银行贷出的款项仅仅增加了一亿三千万镑。杰出的经济学家阿瑟索尔特爵士和第一流的银行家鲁珀特·贝克特先生都同意,纠正这种持续存在的紧缩通货的现象的唯一迅速而有效的办法,就是立即并断然改变对国家和地方公用支出的限制。我宣称,“很明显,在需要做的事情当中,首先是住房问题。”3月8日,在关于批发价格水平的辩论中,我说:

象我所建议的政府支出,如果规模太大,可能有引起英镑过度下跌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现在并不是一件象越狱那样可怕的事。英格兰银行总裁正在被迫购买外国货币和黄金,其目的是降低而不是提高英镑价格。^①

我在结束这一发言时用尽力奉承大臣们的语言发出下面的呼吁:

我想政府已经通过他们政策的第一阶段使英国在花钱上安全。一方面确实是由于运气好,另一方面是由于有良好的安排,现在有可能在这个已经建立的基础上盖房子了。我认为他们可能获得一般政府所不能经常得到的好运气。如果他们现在愿意勇敢前进,在这一届议会期间就可以出成果。他们能够做的事并不是一般政府都有机会去做,他们能够收割他们自己播种的东西。^① 368

但是这个呼吁没起什么作用。财政大臣在他的答辩中没有表明意见。

两个星期以后,在讨论整理公债基金法案时,我勇敢地要求至少在这一年搞一个收支不平衡的预算: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3年3月8日。

因此，财政大臣将必须决定他是否准备在事实上为1933—1934年度采用一个某种程度的不平衡预算，其措施之一是把偿债基金减少到零，其二是把税额减低到政府当年的支出超过他们从纳税人那里征来的税收。当然，这是一个很不正统的计划，一个除非在大危机时期是不会真正提出的计划。但是……下面的说法却很象是对的，即在今后的年月里，用过分武断地坚持正统学说的办法和用其他办法一样，都可能导致不平衡的预算，我不认为必须改变年度预算的实际程序，当然，做到那一点不可能不全面打乱我们议会全部程序。假如需求能被刺激起来并使物价上涨的话，为了证明所谓的三年计划的预算是正确的，为了替1933—1934年的不平衡的预算进行辩护，并在预期下一年度国家收入将重新上升的情况下，改变年度预算的实际程序就是不必要的了。^①

为了增加消费从而刺激投资而提出的这一减税请求，以及在三年预算计划的基础上提出的不断增加的基本费用，再次被财政大臣拒绝了。然而，它却受到两位前财政大臣丘吉尔和罗伯特·霍恩令人难忘的支持。议会和新闻界也不是不赞成这个请求的。而且，由于偿债基金在这一年的预算中被悄悄地遗忘了，政府至少是采纳了我的一部分建议。

1933年全年我在一个下院普通议员和不担任官职的个人的可能范围内，继续进行了积极的活动。我得到了某些北方集团议员的援助，特别是托姆·马丁集团内我的朋友们的援助。但是总的说来，这是一场孤立的、没有收获的斗争。可是我从来没有后悔。我的意见中可能有许多是难以实行的；有些可能是不成熟的。然而，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年月，我感到根据今天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当时比那些对我很不赞成的人更加同情、用现代的话说更加“拥护”那些意见。

我自己家里人非常理解我这段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生活。我的父亲以他那种安详和多少有点怀疑的态度，对任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3年3月22日。

何形式的正统作法都要怀疑。母亲热望我成功，对我在政治上的孤立她感到迷惑，但是她对我是忠诚和热心的。我妻子家里的人在传统上对于古怪的人是偏爱的。如果说我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有着古怪的见解，那么在多年以前谢尔本勋爵——比他更近代的有他的后代兰斯多恩勋爵——早已是这样。长辈们和表亲们也都是这样。他们都是辉格党的传统。

这一年间，尽管我在我的企业和这些多方面的活动中工作艰苦，我的健康却开始增进了。我计划并完成了一本颇有雄心的书，我的思想在此书中进一步发挥了。这本书在1933年12月出版，书名《重建》。书中对我在过去那些小册子里和我建议的行动计划里所陈述的，得到更详细的分析。买过此书的读者和评论它的报纸都给以好评。甚至那些不完全接受我的诊断，或者我所建议的治疗方法的人，也使用了“做了一件极好的工作”、“可贵的贡献”、“激发思想的”、“表达了令人信服的思想”等词句。有一家期刊竟称它为这一年最重要的一本书。所有这些议论都是令人鼓舞的。《经济学家》周刊当然是持批判态度的，因为它当时坚持放任主义这一传统。然而，它那两栏严肃的辩论正是我所欣赏的赞词。他们发表了一篇长篇的回答是非常好的，而所有这一切使人们对我宣传的观点更有兴趣了。^①

广义地说，“计划”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概念来说，正在赢得许多方面——其中有些是预料不到的——的赞许，我的这一主张被证明是正确的已是毫无疑义的了。我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些话：

计划这个概念慢慢地但是肯定地站住了脚，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的 370
真正性质已经显示了出来。它是从工商业生活的现实中产生出来的观点。它在理论家中找到的信徒还没有从一些工业家中找到的多，那些工业家看出，计划这一概念和他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发现所必需追求的目

^① 对本现已绝版的书的论点感到兴趣的人可参看附录 I 中的一篇摘要。

标是一致的。

人们欢迎我的思想，这促使我坚持下去。我决定不但在政治家中，也开始在工业家中制造舆论。同时，在整个冬天和整个春天，这本书一直销路很好，并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收到大量的信件，其中有一些也许是值得回忆的。首相(麦克唐纳)感谢我送给他这本书，以多少有点含糊的语气写道：

……我将带着这本书去苏格兰，因为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但我的思想不够集中，因而对此未能系统研究，很感遗憾；不过我知道别的大臣正在研究这本书。

大主教坦普尔使用了一句措词文雅的话，这句话我仍然记得：

……不仅感谢您送我这本书，而且感谢您写了这本书。

R. H. 托尼评论说：

值此对重新改组的方式意见纷纭的时候，您在书里把改组的必要性阐述明白，让人理解，实为一大好事。

有几个大臣，包括桑基(大法官)和黑尔什姆，使用友好的措词给我写信。加文为我在《观察家》写了一篇社论，以丰富的动人的语言表达了他对这本书的赞许。最富有特征的也许是鲍德温亲笔写的一封信：

蒙您送来大作，我非常感谢。我认为您最后的一段表达了我的观点。我一定仔细阅读。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段，我谈到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个极端：

如果在已经侵害了世界的歇斯底里症中，我们用这两股政治思潮制成一种新的合成品，这在英国的天才对人类进步的许多贡献中不会是最小的贡献。这和我们的传统将是一致的，而且和一个长期以来擅长政治艺术的民族的愿望是一致的。

在议会外，正在出现许多团体，它们都对计划的一般概念发生兴趣，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那时我带头发起一个明确的工业改组运动。在亨利·蒙德(梅尔切特勋爵第二)的帮助下，那年夏

天成立了工业改组同盟，他当了那个同盟的副主席。小小的执行委员会包括罗伯特·霍恩爵士、议员西里尔·恩特威斯尔少校（一位纺织业制造商）、前大西铁路公司经理费利克斯·波尔爵士、威廉·弗思爵士（钢铁大王）、瓦伦丁·克里托尔爵士（知名的工业家）以及马尔科姆·罗伯逊爵士（斯皮勒公司的主席）。在委员会的六十个人当中有许多实业家、经济学家和一些议员。在这些人当中，代表钢铁和汽车这两项大工业的约翰·比尔爵士和赫伯特·奥斯汀爵士给了我们特殊的力量。坎梅尔·莱尔德公司的莱昂内尔·希琴斯先生以及马克斯和斯潘塞公司的创建人之一伊斯雷尔·西夫先生，也和我们在一起。另外还有巴克利银行的弗朗西斯·古迪纳夫爵士、议员卡思伯特·赫德勒姆、奥利弗·利特尔顿（即后来的钱多斯勋爵）、弗兰克·普拉特（纺织机械部门）以及西博姆·朗特里。在以后的两年里，我们在这个组织中进行了大量支持改进工业体系的宣传，并逐个研究了每个工业部门的问题。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设法通过一项法案，在政府的指导下，对一个工业部门受到大多数支持的任何一个工业改组计划都给予法定的权力。对居于少数地位的单位、对工人的利益、以及对某工业部门产品的消费者，都要有适当的保护。从1934年秋直到这些改组计划受到迫在眉睫的战争阴影笼罩时为止，我们一直大力地不断宣传这些思想。为了阐明我们的建议，梅尔切特勋爵在1934年11月以普通议员身份提出法案的形式竟向上院提出了在这些行业的“权能赋予法案”。这个法案是在有限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涉及十五个主要工业部门，例如采矿、钢铁、造船、化工等等。这些部 372
门都列在该法案的一览表内。农业、电力、和煤炭部门由于在现有法规中已经有所规定，因此不包括在内。法案讲得很清楚，它具有“自行斟酌执行”的特征，每个工业部门可自行决定是否利用这个法案。此外，关于任何一项计划的实施以及商务部对该计划的进

展进行指挥的权力和责任,都订有保证条款。

关于纺织工业,当多数雇主在工资和劳动条件上所作出的决定强加给少数持不同意见的雇主时,政府在实际运用这些思想上取得了某些进展。我们提出如果这个原则在工业的一项职责上——确定工资和劳动条件——是正确的,为什么不能把它运用到工业组织的本身上——调查研究、交易、卖出等方面呢?因为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正是由这些方面的效率所决定的。

在这一年里,我和我的许多同事通过工业改组同盟或别的途径努力进行工作。我们在全中国许多会议上发表演说。我还成了工业管理学院的院长,这个学院在一个新的领域里做了极好的工作,那就是工业管理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相同的总目标。1934年10月,我顺利地在新加坡安排了一次会议,本地的一些议员,其中包括卡思伯特·赫德勒姆、休·莫尔森、和托姆·马丁,都登台发表了演说,支持我们正在宣传的原则。很多来自东北部的杰出的工业家也支持了我们。尤斯塔斯·珀西勋爵和我合作,发挥了他的重大的影响,他和我一起参加了在全国各地举行的一些会议。在这一年秋天的保守党会议中,我们甚至在舆论上多少引起了一些惊愕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关于工业改组和需要一项权能赋予法令的决议。因此,我感到我们在议会内外都有了进展。在1931—1935年那届议会临近结束时,373 珀西参加了政府(任不管部大臣),因而在一段时期里使我们得不到他的帮助。幸好在下届议会开始不久他辞职了,理由有点奇特,说他无事可做。

1935年3月十四名议员和我合作出版了一个名为《就业计划》的小册子。这表明那些不担任官职的议员具有广泛的兴趣,我们的组织也增加了一些新兵。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的最聪明、最有力量的朋友之一是杰弗里·埃里斯,他是保守党深受尊敬的议

员之一，他所起的影响和他的任何表面的政治成就是完全不相称的。他宁愿搞商业和工业而不愿当官，但是他在幕后很起作用。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厚意。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实际问题上怎样把一般思想变为有效的行动。我们的小册子《就业计划》也就是人们一般称之为“职业计划”的那本书，成了我们在整个1934年和1935年大力推行的运动的基础。^①

这个混乱、困难的时期的特征之一就是产生一种感觉，即在这些和与之类似的一些思想中有许多共同之处，它可能为不同政党、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所接受。执政的党派很自然地倾向于强调不同之处。但是难道可以设法找到并加以强调的一致之点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谈吗？至少就处理目前紧迫的需要而言难道不能通过这些办法把一项现实的行动计划付诸实施吗？那时还有大规模的失业。还存在着由于长期没有工作而意冷心灰的年龄越来越大的人们的问题。在各方面都仍然存在着提高效率的问题。当时仍有扩张的需要。尽管有了某些改进，还有一段长路要走。难道不能劝导人们集结到我们正在一起走着的那段道路上来吗？

各政党和非党的许多男女人士由于受到这些情感的鼓舞，急于对短期的需要而不是对长期的理论加以强调，他们渐渐地聚集到一个运动里来了，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未来五年小组”。小组的领导人是克利福德·艾伦，^② 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士之一，374也是最有吸引力的人士之一。他开始踏进社会时是一个极左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叛逆者、一个拒服兵役的人，后来他成为独立工党的一位重要成员。1931年工党大分裂时，他和拉姆齐·麦克唐纳共命运。在工党的危机时刻他写了一篇有力的文章支持麦克唐纳勇敢的决定。《每日先驱报》拒绝登载这篇文章；可是它却由《曼彻

① 附录2载有这本小册子的名称、绪言和署名人。

② 赫特伍德的艾伦勋爵。

斯特卫报》发表了，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后来成为国家工党的主席，并在麦克唐纳的建议下授与贵族爵位。尽管他的健康一直欠佳，他对他从事的任何事业所付出的精力和热情却是无限的。1933年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对日益强大的欧洲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英国受其传染的危险越来越感到烦恼。1934年2月他起草了一项反对这些倾向的宣言，我和其他一些保守党人对此欣然加以支持。这项宣言名为“自由与民主领导”。它实际上呼吁用理智和善意来代替偏向和成见。

1934年夏末在牛津万灵学院开了一次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结果组织了一个多少还算紧凑的团体。建议由一个经过仔细挑选和力量均衡的委员会筹备出版一本书，并征求二三百名男女知名人士为之签名。组成了两个小型起草委员会，一个是关于国内事务的，另一个是关于外交事务的。我参加了第一个起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时在我伦敦的家中开会，有时在牛津开会。

这本书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政策的；第二部分是关于国际关系的。我只参与第一部分的工作，积极参加这一部分工作的是杰弗里·克劳瑟、阿瑟·索尔特以及休·莫尔森；威尔·阿诺德-福斯特也很起作用，对工作极为热心。可以想象得出，由这样一些忙于其他工作的人们所组成的这样一个成份杂乱的队伍，完成这本书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直到1935年7月底，《未来五年》这本书才出版。

论述经济政策的第一部分是社会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之间
375 的一种妥协；但这种妥协非常适合我的口味。再把那书的第一部分从头看一遍，那时一定似乎是宁左勿右，尤其是在有关增加对公用事业或半公用事业控制的建议方面，例如运输、煤气和电力。我的保守党同事和我很自然地在这些问题中的某些问题上作了让步，以换取别人对我们在工业组织问题的观点上所作的许多让步。

然而在其他所有方面——关于资金的运用，关于扩张，关于发展，尤其是关于国家和地方编制经济计划的问题——《未来五年》的政策和我已经在我的演说和著作以及通过和我有联系的组织所宣传过的，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可能已经被用政治术语公正地描写为有点“中左”。

至于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它呼吁通过国际联盟真诚支持集体安全。由于这一点至少是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而且又是他们不久将在 1935 年举行的大选中竞选的基础，我的保守党朋友们和我感到赞同这项宣言的这一部分没有什么困难。但是舆论主要感兴趣的倒是第一部分，认为它更为精确，更为实际。总共有各个党派的大约一百五十名知名的男女人士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名。这些人大部分不是以政治家身份出现，尽管其中大约有十六名议员，他们多半支持政府。这些人中包括这样一些“令人尊敬的”保守党人，如杰克·希尔斯少校、特伦斯·奥康纳以及杰弗里·埃里斯。在工会领袖中我们得到了机车司机和司炉联合会书记英国职工大会前主席约翰·布朗利和英国职工大会的另一位前主席当时的钢铁业联合会书记阿瑟·皮尤爵士的支持。在宗教人士中有伯明翰的主教(巴恩斯)和约克的大主教(坦普尔)。代表文学界的有大哲学家 S. 亚历山大教授以及象劳伦斯·豪斯曼、吉尔伯特·默里、德斯蒙德·麦卡锡、H. G. 韦尔斯这样的作家。经济学家处于显著地位，其中最突出的或许是阿瑟·索尔特，他是主要的起草人之一。就是在这几个月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建立了被证明是终生不渝的友谊。 376

正如所预期的那样，这本书在新闻报道和专门评论中，都受到了广泛的注意。而且由于签名人的广泛性，它总是受到人们带着敬意的、有时是带着热情的重视。^①

^① 附录 3 载有签名人名单和该书第一部分所提建议的摘要。

如果没有艾伦勋爵的几乎是使徒般的热情，这个计划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结果。我们合作的精神是纯洁的。为了把精力集中在重点问题上，我们尽力撇开在最终目的上的分歧。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旧有的争辩对我们说来似乎是不相干的。因为很明显，“在今后的许多年中我们的实际制度无论如何将是一种混合的制度”。我们同样认为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争端已经过时，对问题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却是唯一明智的方法。我们全都赞成需要某种机构，“借此用设计和计划来代替临时凑合与和稀泥的老传统”。

关于《未来五年》的复杂情况之一是即将来临的大选和混乱的政局。劳合·乔治带着他的“新政”政策回到了政界，用他的全副精力和组织得很好的宣传提出了他的政策。在一段时期里人们还不能断定政府对他的东山再起将如何对待。最后，他的计划遭到拒绝——部分理由无疑是因为计划是他提出的。事实上，劳合·乔治的政策既不是认真仔细地制定的，也不象我们的政策那样新奇。但是政府不愿和劳合·乔治合作的情况一旦大白于世，他打算发动的运动似乎必然会由对国家政策作出贡献而变成另一次争权行动。然而他否认这一点；在宣布他的新计划的大会上，他宣称他的运动也将是“非党派性的”。因此，许多象阿瑟·斯蒂尔-梅特兰爵士（此时已不担任公职）、尤斯塔斯·珀西以及伦敦德里那样的保守党人把它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贡献。丘吉尔也表示热烈欢迎。

377 这种局面在“未来五年小组”中造成了某种困难。在我们的这本书即将出版之前，举行了几次具有一定秘密程度的讨论会，研究是否让劳合·乔治作为一个签名人。正如艾伦所说，我们不愿使“新政”终于变成一场“新的游戏”。因此决定不让他签名，而让事情自然发展下去。劳合·乔治的下一步将组织“争取和平与重建行动

委员会”，并在全国展开一个集会运动。就我来说，我充分准备好在非党派的讲坛上出现，条件是它应该确实是非党派的，在这一点上另一些保守党人步了我的后尘。因此我参加了在中央厅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但随着大选的来临，形势显然变成既是微妙的又是使人为难的。艾伦、克劳瑟、沃尔特·莱顿爵士^①和我代表“未来五年小组”于8月12日在彻特会晤了劳合·乔治。这次茶会不用说使一些政治上温顺和平的人士骚动起来，也在新闻界引起了一场大骚动。曾经有过许多关于组织一个新的“中间党”的议论，但这当然是非常现实的，而且在任何时候也没有人打算这样作。作为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向我们的同事们建议，我们不应以小组的名义参加会议（不管个人怎样作法），因为这种行动和我们原来的组织精神是相矛盾的。这个问题在11月达到了严重关头，此时大选已经开始了。我们中的某些人以工党身份参加竞选，有些人以自由党人身份参加竞选，有些人以保守党人身份参加竞选。在斯托克顿不久前有一位自由党候选人出现在舞台上，而这一场三角竞选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艾伦作了巨大的个人努力去劝说塞缪尔撤消作为自由党候选人的身份。但是这个尝试失败了，因而我不得不和两个敌手进行竞选。

“行动委员会”无论如何是起了一点作用的，因为它给所有政党的候选人都送去了征求意见表，这种作法给候选人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由于大选临近，和通常的情况一样，候选人变得更易于接受建议，他们的观点也变得更有伸缩性。就我而论，我并没有困难。我已经打算根据《未来五年》的纲领竞选，劳合·乔治没有必要提出问题给我制造麻烦。

378

所有这些活动都属于战前那些古怪的年代，现在已经大部分被遗忘了。这以后接着而来的可怕的事件，无疑使现代读者觉得

^① 即后来的莱顿勋爵。

这一段时间似乎多少有点遥远和朦胧。但是也许值得至少把我的经历记录下来，因为我的经历在当时许多和我年龄相仿、阅历相同的人中是有典型性的。我承担的工作是沉重的，结果也似乎是常常令人失望的。如果没有作为我的秘书和主要助手，我的朋友阿伦·扬的热诚工作，我的工作是不能进行下去的。我和他是在工党政府期间结识的，直到1940年我参加丘吉尔政府时为止，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以后他到了文官部，一直工作到他的政治生涯结束。尽管我们积极的合作到那时不得不终止，我仍然保持着对他的友谊和热爱。在这里我希望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这就是1931—1935年那一段经济重建运动的史话。我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段，因为我把我的智慧和努力几乎全部献给了它。但就在我们坚持不懈、经常希望争取国内改革和进步的同时，世界上正发生许多事，这些事件注定要使这些讨论变成似乎无足轻重，使这些劳动变成微不足道。丘吉尔所谓的正在酝酿着的风暴最初只不过是天边的一点乌云；但是在这些年里它开始扩展了，不久就将横越天空，饱含着危险，威胁着人们的命运。

第十三章 决定命运的年代： 1931—1935年

379

当保守党政府在 1929 年大选中失败时，它在国际以及国内方面结束了一个不是没有成果的任期。

1924 年的道威斯计划开始大量按比率缩减赔款，1929 年接着又来了个扬格计划，这是实际取消赔款的 1932 年洛桑会议前的最后阶段。由英国、法国和德国相互自由磋商而成的 1925 年的洛迦诺公约作为欧洲和解和消除旧有争执的转折点而受到欢迎。结果是德国于下一年在一片喝采声中参加了国际联盟。1928 年的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被大部分国家所接受。最后，从 1929 年开始了协约国军队全部撤出莱茵兰的过程，1930 年 6 月完成撤军，比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日期要早好多年。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稳步走向和平的虚构情节，人们竟至深信随之而来的将是裁军和建立国际联盟的有效权威。

然而，1935 年春，艾登在西方政治家中第一个访问了莫斯科，他和斯大林讨论了迅速恶化着的形势。斯大林认为形势比 1913 年还要坏。尽管艾登仍然可以声称，作为争取和平因素的国联的存在是战前所没有的，但斯大林却在回答中指出，“在 1913 年只有一个可能的侵略者德国，而今天却有两个，即德国和日本。”^①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带来如此激烈的变化，使 380
几年前崇高的希望烟消云散了呢？

首先是日本。它的侵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三年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伦敦，1962），第 154 页。

半以前，在 1931 年秋天，日本发动了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满洲危机正象它被称呼的那样，被证明是对整个国际联盟组织的一次重大打击。这是国际联盟盟约受到一个头等强国严重嘲弄的第一个实例。在那以前，有些较小的事件被以各种方式宽恕和容忍了。但是这一回是一个大国的大片领土被另一个国家明目张胆地侵占了。这是征服，接着就是吞并。

日本对国联权威这次成功的挑战，毫无疑问必然使盟约的先天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使盟约对“爱好和平的国家”能提供自动安全这一信念的危险性变得更加鲜明。但是有些理由似乎把远东危机列入一个特殊的类型。这些理由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美国没有参加国联，这对欧洲是危险的，对东方是致命的。如果美国有那个决心，它是有力量对日本采取有效行动的。由于美国不愿以行动代替语言，国联成员中唯一的另一个头等远东强国——英国——必须独自挑起重担作出有效的制裁。但是英国的海军力量在前些年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十年无战争”这一信条和缔结的一些海军条约，大大地减低了我们在远东海上的力量。在严格削减国防开支的期间——这种削减正象我们已经描述过的，是丘吉尔一开始掌管财政部时就有的特征——丘吉尔和当时的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之间，在对待远东可能出现麻烦的意见上是有分歧的。丘吉尔主张钱可以更好地花到别的地方，他要求内阁接受这样的原则，即在今后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内和日本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外交大臣强烈反对。接着在财政部和外交部之间发生了不断的争论，这倒也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

381 但是实际上，财政部的意见至少在坚持十年信条方面占了上风。可能有人认为，海军的弱点不会妨碍采取经济制裁。可是，如果国联宣布经济制裁，这个担子仍将落到英国身上。没有理由相信，以经济制裁来威胁，或者甚至实行经济制裁就够了。日本人可

能已做好了决定，用武力打破封锁，而英国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就没有希望用足够的武装力量对日本施加压力。海军部明了这一点，它及时把这种情况报告了当时的外交大臣约翰·西蒙。^①那时候大量流传，现在美国仍然普遍相信，西蒙拒绝了美国史汀生国务卿的建议，而这项建议可能不久促使美国分担经济制裁的责任。即使这个颇有点含糊的瞩望也决没有任何实际的真实性。美国考虑的是作出姿态，而不是行动。然而这个西蒙拒绝史汀生帮助的故事很快就升级到定论的地位。这个故事根据的完全是幻觉。根本没有这样的建议。美国的建议充其量也不过是某种形式的道义上的压力。史汀生第一个意见是对日本的征服宣布“不承认”主义。第二个是建议乞灵于1922年签订的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公约。这两者都不会影响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决心。国联理事会确实在1932年2月曾通过一项“不承认”的决议，但这证明是一种无聊的姿态，而在那时候美国国务院对这种姿态也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了。然而不幸的是，西蒙处理美国国务卿的建议的方法是不适当的，引起了严重的误会。一场含糊不清的电话交谈和一些混乱的通信是这一传说产生的基础，而这个传说损害了两国真正的利益，因为它是基于误解的。西蒙虽有非凡的才干和智力，但却既不灵敏又没有手腕，而这些却是一位外交大臣所必须具备的。史汀生终于毫不困难地让西蒙当了替罪羊。^②除了在美国产生恶感以外，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本国和其他国家许多忠实支持国联的人疏远了西蒙。可是阻止日本侵略的失败不能完全归罪英国。这是国联的失败，它缺乏力量，也是美国的失败，它缺乏决心。

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这个插曲并没有打破英国对国联的信任。对日本最初还是有点同情的，它的无容置疑的经济利益

① 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二辑，卷九（伦敦，1965）。

② 范西塔特勋爵：《迷雾中的行列》，第437页。

和权利受到当时中国全面混乱的损害。无论如何，国联，甚至英国，又能怎么办呢？活动地点远离本国大约一万英里，离新加坡也几乎三千英里。这是一次挫折，但也不一定是最后的失败。下一次考验注定要在几年以后发生于非洲，牵涉到一个似乎比较容易控制的欧洲国家——因为交通线不是通过太平洋，而是通过地中海。

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对于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来说有两个必需的条件。第一，必须单独或与同盟国共同具有足够的武装力量；第二，必须有坚定的舆论。关于国防，英国实行了彻底的裁军，这完全符合那种许多人认为包含在凡尔赛和约中的精神。在1926年到1931年期间，我们整个的国防费用实际上是下降了，而所有别的国家的国防开支都大大地上升了。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裁军的经历和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经历没有什么不同。英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显然是期望别的工业大国都效法它。同样，尽管英国几乎在全球所有的地方都承担了义务，英国却单方面实行了裁军，希望别的国家都这样作；带头是我们的责任。然而，只要英国和法国一致采取坚决的行动，局势仍然是可以挽救的。正如丘吉尔曾经强调的那样，直到1934年底，德国违反条约义务重整军备，或者可能由于我们这些盟国的强烈行动阻止住，或者可能用同等规模的重整军备与之对抗。^①正如现在我们知道的那样，甚至希特勒在1935年断定在空军方面已达到英国那样的水平，这也只是虚张声势。直到1936年3月以后，当德国军队重新占领莱茵兰，并开始在那儿设防以后，英法的地位才开始严重恶化。在整个这一段时期里，英国人民是相信国际联盟的，有些人是狂热的，其他人是不太热心的。国联取得了普遍的支持。确实没有任何政党在忠于国联盟约这个原则问题上敢于表现出似乎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40页。

犹豫不决。美国参议院否决威尔逊总统的条约所造成的对国联力量的严重打击，并没有使我们失去信心。英联邦的大自治领一方面担心承担象洛迦诺那样纯粹地区性公约特定的义务，一方面毫无异议地承担了国联盟约规定的一般责任。日本的蔑视使我们更为坚决地坚持把国联当作我们政策的基础。

德国在 1926 年获准参加国联受到了欢迎，认为这把事情推进了一大步。直到德国在 1933 年终于退出了裁军会议和国联，情况才清楚了。事实上国联依赖的是英法两国坚固的同盟，而这个同盟又从另一些可能受其影响的国家取得支持。这确实成了丘吉尔在以后的年月里对国联的概念。只是在国联的掩护下，英法的力量才能用来保卫和平。在 1931—1935 年，如果我们和法国人紧密配合，仍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来遏制德国。当时有一种舆论支持通过国联以取得“集体安全”这一概念，如有必要，国联是可能起到至少保卫欧洲自由的另一个大联盟的作用。

在这届议会期间，我全神贯注在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我没有试图细致地注意国外情况的进展。年青的后座议员常常受到人们好心的劝告，不要试图过问国事的全部领域。他们应该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有点儿专门化。 384 在外交事务方面我确实满足于一般遵循政府的指导。而且，我信任并且尊敬象安东尼·艾登、达夫·库珀、约翰·洛德（后来的韦克赫斯特勋爵）等那样一些当时的杰出人物，他们都是国联的坚强支持者。艾登先是当外交部次官，以后当掌玺大臣，他处于统率地位。他那出色的战争经历，他的魅力，他的多才多艺，他的卓越的辩才，他对各政党男女人士的吸引力，所有这些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

如果说实力尽管已经削弱，但还没有最终丧失的话，那么不论在英国和在法国都没有顽强而又大胆地执行任何明确、坚决的方

针政策。这无疑一部分是由民主和议会制度固有的弱点所造成的。在法国，左翼和右翼政府以惊人的速度互相交替，任何时候都没有执行过明确的方针。法国的军备在理论上是强大的，实际上逐渐过时。它的军队的效力一贯被它的朋友们夸大了，而且被日益衰落的旧的和传统的战略及战术概念所支配。法国不是个侵略性强国，完全不是。法国最重要的是寻求安全。但是法国政治家们的逻辑性和现实性是太过分了，以至不可能在为集体安全体制而通过的书面许诺中去找安全。他们问道，履行许诺的兵力何在？然而，在这追求安全而没有效果的活动，他们发现自己和英国历届政府是矛盾的，英国政府求助于裁军——法国对裁军的实际进行是怀疑的——以后又求助于在法国和德国之间保持平等的原则，这套办法法国是难于执行的，因此本能地不予信任。

英国舆论是可悲地陷入混乱之中。就在灾难临头之前，英国人民甚至不去考虑另一次战争的可能性。上次战争的破坏性是如此可怕，以至“不能想象”在文明国家之间能够再次爆发这种不光采的、可耻的互相残杀的战争。战争不仅是不能忍受的，而且是难以置信的。我们的占领军发现德国人民是正派的、令人尊敬的人民，他们并不真想打仗。想打仗的不过是德国皇帝和军国主义分子。唉呀！我们忘记了在整个历史上德国人是多么容易屈服于这种领导，只要战争——象在俾斯麦指挥下那样——时间是短促的，而且是成功的，他们是多么欣然赞扬战争。但是据信具有比1914—1918年更为可怕的破坏性武器的现代战争，那将证明是文明的终结。

因此正当危险似乎逐渐在发展的时候，“和平主义”以各种形式——或者在和平协会和卡农·谢泼德的赞助之下，或者在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有名的（或臭名昭著的）决议中表达出来——流行了起来。这些年来由兰斯伯里领导的议会内的工党，另外还有劳

工运动,事实上已普遍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如果他们不是居然真心打算这样做的话。自由党也采取了相同的总路线。所有的人都在集体安全中寻求保护,而个人对集体安全的贡献却似乎少得厉害。

甚至在日本顺利地进行了侵略和希特勒崛起之后,对国联及其盟约会自动起作用的信念还继续存在。希特勒主义第一次发表政见并没有引起过分的忧虑。我们毕竟已经见到了墨索里尼和法西斯的意大利,其效果似乎并不太坏。1931年以来的经济暴风雪和它引起的失业以及与之俱来的中产阶级的毁灭发生了影响,而希特勒是这些影响几乎可以预见到的反作用。当繁荣再次确立时,第一阵激动将平静下来。此外,由于倒霉的巧合,英国人民第一次听说到希特勒时,很难把蓄着查利·卓别林式的小胡子、永远穿着雨衣的这样一个人认真当作一回事。当然,没有人曾经费脑筋去阅读《我的奋斗》。也没有任何人能看到在他那微不足道的外表后面的深谋远虑、狡猾和恶毒的头脑。在某种花言巧语的伪装下,他的脑子里隐藏着一种欺骗和邪恶的结合体,这只有在现在,在所有文件已经公布以及全部罪恶真相业已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才能被充分识破。

还有两个受到权威人士鼓动的信念深深地渗透在群众舆论之中。第一个是坚信军备是战争的主要原因。^① 知识比任何人都丰富的爱德华·格雷爵士不是在1914年宣称“欧洲军备大量地增长,由军备引起的不安全感和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吗?” 386

唉呀,战争的原因比这复杂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决不是军备,而是侵略成性的德国决心用武装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欧洲。凡是读过战前年代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不为爱好和平的强国为避免军备竞赛所作的真诚努力所感动,也没有一个人不为他们在不向日益增长的德国压力屈服的情况下,接受不受欢迎的需要所

^① 约翰·F. 肯尼迪:《为什么英国睡着了》(伦敦,1940),第40页。

表现出的那种对抗精神所感动。然而，军备竞赛本身引起战争的说法，却成了公认的定论。

第二个同样牢固的信念是，增加任何老式的军备或者使陈旧的军备的任何现代化，都是违反国联的总目的和国联的性质的。甚至当一些本身忙于重整军备的大强国退出国联时，我们全国仍然强烈坚持这种观点。这一点是可以反驳的，但却不能忽视。据说“没有裁军，国联就没有现实性。”^①可是有了裁军，结果国联却没有力量了。

在所有这些犹豫和混乱之中，有一股更加强大的力量在影响英国的良心。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对德国和它所受的待遇感到不安。英国打赢了这次战争，而只过了几年，英国公众就以特有的宽宏大量开始对德国人感到过意不去。他们甚至产生一种有罪的变态心理。他们颇以 1918 年的选举为耻。他们对约定压榨德国“直到骨头咯咯响”的卑鄙性感到遗憾。凡尔赛和约刚刚缔结就受到猛烈的攻击。凯恩斯和他的论点非常容易地受到了公众的认可，而“迦太基式的和平”这句话也就拘泥固执地传开了。还有一种感觉，即盟国从总体上说共同把极为严格的裁军强加在德国身上，而它们自己在这一方面却不实行这个协定。丘吉尔在他的几次演说中使用并重复了一句有名的但是多少有点矛盾的话来描述这种普遍的感情。他宣称，“消除战败国正当的冤气应该在先，裁减战胜国的军备应该在后。”

387 但那些怨气究竟是些什么呢？在经济方面，赔款的全部历史是一部忧郁的历史。现在看来似乎不能令人相信：严肃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能够建议用任何已知的办法，把最初提出的那样的赔偿总额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去。如果用黄金支付，肯定很快就会达到支付能力的极限。如果用货物和劳役支付，对接受

^① 约翰·F. 肯尼迪：《为什么英国睡着了》，第 41 页。

赔款的国家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可是，真够奇怪的，美国政府对它的盟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欠它的债务所持的总的态度，受到同样幻想的支配。他们要求偿还，但是他们筑起一道关税壁垒，企图使偿还成为几乎不可能。无论如何，赔款事实上不是由德国人支付的——考虑到他们对法国和比利时残酷的破坏，赔款肯定没有达到不公平的程度。在最初阶段他们从国外借来全部——甚至更多——必须付给债权国的款项。当外国贷款停止时，赔款也就暂停了。甚至在这以前，赔款数额已经减少了；而在1932年洛桑会议以后赔款事实上已经停止了。诚然，1923年占领鲁尔区时彭加勒的政策导致了马克的猛烈通货膨胀，德国政府就利用这一点使法国政府上了当，而这又反过来对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起了严重破坏性的影响。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到1932年为止已没有再进一步缔结其他协定，也没有消除什么怨气。是凡尔赛和约的政治方面成为后来的怨恨吗？但领土的解决办法并不是不合理的。莱茵边界并不是让给了法国，尽管法国在安全上受了骗，并且为了安全它放弃了要求。对归还阿尔萨斯—洛林确实没有人提出疑问。在边界上中欧和东欧新出现的某些国家的德国人成了少数民族，对此肯定是有一些冤气的。但是这些国家如果要成为实际存在的事物，这是不可避免的。要是散居整个欧洲的许多少数民族都严格运用威尔逊民族自决的理论，那将造成荒谬的局面。必须接受某种实事求是的安排。

常常有人说，由圣日尔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所确定的奥匈帝国的消亡，使东欧分裂成许多灾难性的小国。这种说法可能是 388 正确的。但这不是政治家们在巴黎所犯的过错。就在战胜的协约国的代表聚集到一起开会的时候，奥匈帝国瓦解了。各民族集团自行宣布独立，任何外部权威都不可能用可以想象的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也无法把它们重新统一到任何可以接受的政治组织中来。

从经济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可悲的。在昔日构成旧帝国的集团之间组织任何自由贸易联盟都失败了，这就导致了极端经济民族主义的突然出现，使整个的财富与繁荣相应地下降了。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是由和平缔造者的错误计划所造成的。自然力量爆发了，而这是无法制止的。这就把奥地利本部置于危险的境地，维也纳成了没有帝国的帝国首都，这是真实的。然而在这次大战之间国联是能够救助奥地利的经济的；自 1945 年以来，特别是自 1955 年签订奥地利条约以来，我们了解到即使是领土已经缩小了的奥地利国也能生活下去，而且活得健壮。

事实上，德国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抱怨归结到这两个论点上。凡尔赛和约内关于罪行的条款也成了问题。的确人们不能“控告整个民族”。可是许多年代以来普鲁士的政策经历确实是邪恶的。梅特涅曾经断言，“普鲁士的全部政策在于扩大它的领土，扩充它的势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决心采取任何手段，并且不顾国际公法和一般的道德原则。”^①腓特烈大帝开始的事业在该世纪末被他的继承人所遵循，并被俾斯麦继续推行下去。它在 1914 年鼓舞了德国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希特勒在玩世不恭和犯罪方面，不久就超过了他们。

389 坚持罪行条款或者要求强加于人而不是协商而成的条约，不是聪明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为，这是不错的。然而任何没有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要体会英法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四年苦难刚刚过去时的强烈感情是不容易的。要求至少表示一下悔恨难道是很不合人情或者很不人道的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产生这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和整个德国缔结和平条约是不可能的。在庄严的审讯以后，战犯受到了惩罚。同时，德国人民，尤其是普鲁士人民，受到了可怕的报应；因为德国被瓜分至今已二十

^① 阿尔杰农·赛西尔：《梅特涅》（伦敦，1933），第 24 页。

年，它在精神和政治上被分裂了，这就显得更加严酷。

然而关于这些被击败者的不满情绪，丘吉尔曾不止一次用这样有名的词语叙述这个国家当时大多数人的混乱的但是豁达的看法。当时存在着一种犯罪变态心理；存在着一种情绪，认为德国人经历了一段苦难；尤其存在着一种对法国人的愤懑之感，他们特别被认为对待德国太坏了。对法国军队力量和效能作过高的估计这一事实，使我们更不能忍受他们明显不愿裁军的态度。我们对法国的不安全感也没有给予充分考虑，这种不安全部分是由于德法两国在人口上差别越来越大，部分是由于法国以前的盟国不愿对它保证安全。此外，德国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巧妙，德国人的抱怨随着寻求补救办法而与日俱增。不幸的是，公众和议会都不重视丘吉尔话里所包含的警告。不管抱怨是否正当，如果被击败者真有怨气，或者有人经常重复这种说法，并用蓄意的策略使他们怨恨，胜利者过早地抛弃他们自己用以防卫的军备是不明智的。丘吉尔语言的重点可能出现了不同的解释。结果抱怨情绪，不管是真是假，很快成为希特勒成功地暗中动摇他的国外敌人的信心和鼓动本国人民狂热情绪的主要工具。

同时凡尔赛和约的裁军条款从来也没有认真执行过。十万名军队很快就成为军官和军士的骨干，时间一到，随时就可以进行扩军。别的条款也被巧妙地回避了。赛克特将军的秘密计划的全部情节实在令人吃惊，那就是不顾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存在，作好一切准备，使德国新军和新总参能够出现，就象新凤凰从老凤凰的灰烬中飞出那样，同时新武器也从工厂倾泻而出。^①英国和法国政府对这种回避情况并非不知，他们也同样清楚俄国正在给德国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36—37页；J. H. 摩根：《军备条令》，第一卷（伦敦，1945），全文；J. 惠勒-贝内特：《强权的复仇》（伦敦，1953），全文。

以军事援助。

也许还不能断定魏玛共和国全部民主派部长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些欺骗行为。然而很清楚，从施特雷泽曼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他曾积极唆使进行重整军备，他使白里安受骗，也是有罪的。在洛迦诺谈判期间，他了解并且赞成德国军事当局完全违背他们的条约义务。

这就是群众有时以冷漠的态度，有时以失望的心情注视着裁军会议冗长而含糊的争吵的背景。

仔细描述这六十个国家参加的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著名会议，是令人乏味的。会议准备时间很长；为了准备一个详细的议事日程，技术委员会在日内瓦开了好几年的会。裁军会议于1932年2月在阿瑟·亨德森的主持下正式开幕，他在工党政府垮台以后同意继续担任这项工作，将他一生中所余的几年光阴贡献于此。他对这个难以处理的问题提供了热情和常识，很快就获得了代表们的信任和尊敬。

筹备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清单不包括除了德国以外任何国家兵力的特殊限制。德国政府立即宣布，任何这样的歧视都是不能接受的。结果花了很多精力搞出来的原来的计划只有很快放弃了。在这种形势下，成功的唯一希望应该是加速促成某种替代的计划。但是西蒙的做法是慎重甚至是拖拉的。德国人显然要求平等待遇。法国人得知德国人对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并不在乎，大为吃惊，因此难以赞同德国人的要求。在耽搁了六个月之后，英国人企图打破僵局，提出了一项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第一步所有国家的军备都应削减。人们常常说，如果这项包含着最后平等的建议早一点在布吕宁政府仍旧执政期间提出，它可能为取得最后意见一致铺平道路。当然，在这方面的成功可能维持住布吕宁政府；但是，这也很难说。在他5月垮台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已不得不靠行政

命令而不是靠议会办法来进行统治。德国是同样的一个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风暴的牺牲品，在这个国家里的柔弱的民主幼苗也就因紧张而变得弯曲并且枯萎了。艾登确实表示过这样的看法，要是早一点接受平等的原则，那就很可能拯救了布吕宁。但他指出，即使这样，法国对安全的要求也是要满足的。我们也不应忘记，甚至在魏玛共和国的治理下，许多准备恢复德国军事力量的措施也在进行着。在这些措施中，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在1930年所作的第一批试验中，最终制成英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得不遭受的最可怕的武器——V₁和V₂。

在希特勒终于掌权前的八个月的间隙期间，德国正式提出了要求平等。在此期间他们当然是公开地破坏了凡尔赛和约；然而英国的舆论对此却持和解态度，甚至偏袒德国。9月，布吕宁的继任人巴本宣布德国将退出裁军会议。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看来是开始四强——英、法、德、意——会谈。在有美国观察员参加的四国会议中，麦克唐纳和赫里欧就一项巧妙的方案达成了协议，据认为这样可以克服分歧。德国将给予“能对所有国家提供安全这样一种体制的平等权利”。因此，在11月接替巴本的施莱歇将军同意德国代表于12月返回日内瓦。然而他证明不过是一个暂时掠过舞台的鬼影，而希特勒马上就要占领这个舞台中心了。1933年1月底希特勒当了总理，从那以后，尽管开了各种有时显然颇具希望的协商会议，没有任何建议，不管是多么灵活，多么宽宏大量，能获得希特勒的真心同意。不应忘记，在希特勒的一生中，他从来不和别人缔结他打算接受约束的协定，也从来不作他不打算破坏的许诺。当然，他也有挂虑的事，因为他不得不冒很大的风险。在他统治的初期尽可能表现得理智一些对他是合适的，因为他必须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他的邪恶的计划是早已定好了的，而且确已公布于世，凡是愿意了解这些计划的人都可以读得到的。不幸的是，很少人

读过这些计划。如果他们读过的话，希特勒所作的许诺就会被认为仅仅为了捞取选票而不予轻信。后来显示出来这个特殊人物不仅有一个纲领，而且打算彻底实行他的纲领，甚至要超越它。西方的议员们先是怀疑，然后是愤怒。

裁军会议没有受到阻挠，它令人赞扬地坚持进行工作。1933年3月提出了麦克唐纳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各国武装部队的实际数字以及对军备的大小和类型的限制。法国军队将减少；德国将获得和法国相等的地位。为了支持这一计划，阿瑟·亨德森遍访欧洲各国首都。当下院辩论这个计划时，丘吉尔感情大爆发：“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军队。”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句话“博得的却是那种难堪和反感的脸色”。^①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后座听到他的讲话，也记得他对麦克唐纳计划可怕的反击给人造成的印象，在讲话中他称裁军会议是“一出庄严和拖延的滑稽戏”。但是，艾登的答辩是有力和有效的。他自己为拯救裁军会议所作的不顾一切的努力鼓舞着自己，这是符合英国人民几乎一致的希望和愿望的。我
393 记得我被这两位发言者深深感动，虽然当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的详细情况。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了艾登，他似乎体现了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人的全部愿望。英国计划的新特点是，应该有一个五年时间的阶段来试验国际控制的效能。如果这个建议被接受，我们至少可以试验一下这种控制能有多大现实意义，以及德国人如何乐意地打算容许国际控制发挥作用。

1932年3月，在裁军会议开始它的严肃的工作后不久，日本人建立了伪满洲国。一年以后，在1933年3月，日本退出了国联。这些情况是国联盟约的原则崩溃的不祥预兆，至少在远东是这样。5月17日，希特勒作了一次和解性的演说——企图表示抚慰的多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60页。

次演说之一——他在其中宣布他愿取消所有的武装部队并销毁全部武器,如果别的国家也这么做的話。他发布了一系列的宣言,试图分裂盟国并在其中制造混乱,这是其中的第一次。在最近几年里,我们已在别的一些裁军会议上听惯了这些一般化的声明。这些声明听起来很漂亮,但是没有实际意义。然而在1933年6月,有一种短暂的乐观气氛,因为德国至少在口头上接受了一项具有两个监督阶段的建议。但是那时法国政府却开始后退了。

在往返多次以后,西蒙于1933年10月代表英国政府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在五年期间既不裁军也不要重整军备,但是应有国际监督。五年以后应该有谋求所有国家和德国处于平等地位的裁军。^①希特勒一眼看出他在5月的演说所引起的危险。他立即发出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并同时决心退出国联的通知。这标志着裁军会议的结束,或者事实上的结束。裁军会议延续到1934年6月,但是它那缓慢死亡却造成了可怕的损失。只要会议在开,英国政府就不愿着手任何真正重整军备的计划来损害会议成功的机会,而直到那时为止,会议成功的机会是不存在的。因此,直到1934年7月才决定并宣布第一次加强皇家空军。 394

取得一致裁军的希望终于成为泡影,这对英国公众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我们曾痴心希望,因为我们认为采取各种办法还是可能达到裁军的目的的。公众并没有因前次发生的许多例证而铭记德国人自己已经把凡尔赛和约的条款置诸脑后。在这一方面,正象我已描述过的那样,人民群众模糊地认为凡尔赛和约犯了罪。他们还认为国际正义要求对德国和法国同样待遇。这种感情也没有因希特勒于1933年初掌握政权或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而大量减弱。甚至希特勒镇压所谓的罗姆反对他的阴谋的莫名其妙的故事以及镇压中可怕地爆发出来的强盗式的暴行,对他们

^①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425页。

也震动不大。现在人们相信，在1934年6月底，有五千人至七千人被“干掉”。那些血洗的日子本应该能警告我们，我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记得当消息传来时我正在乡下参加一次别墅聚会。参加那次聚会的某些人最后成了绥靖政策的主角。我回忆起他们尽力寻找借口以自慰，说罗姆和他的朋友们除谋反之外道德上也败坏：希特勒可能是个暴君；但他本质上还是个清教徒。

到了1933年10月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时，德国退出了裁军会议，此时公众的情绪不是恐惧德国，也不是为英国单方面裁军而担忧。那是热烈地要求进一步裁军，以及政党趁机控告政府“贩卖战争”。那时候我几乎不参加这些辩论，但是却被这种情况所激怒。几天以后在基马尔诺克补缺选举中轮到我发言了，在那儿期望起决定作用的是在东富勒姆选举中获胜的工党候选人，他攻击对手保守党人“支持军备”。我在竞选演说坛上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听众对此并没有表示不欢迎的样子，特别是在我依靠苏格兰低地人在逻辑能力方面优于伦敦佬的时候。真够奇怪的，正如鲍德温后来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所泄露的那样，虽然富勒姆竞选的失败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但他似乎无视政府候选人在基马尔纳克的重大成功。一反当时的一般情绪，那些年里丘吉尔为重整军备进行的战斗，以一种偶然的但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插入的方式进行着。我几乎听了他的全部讲话，包括他在1933年11月的那次对德国重整军备的速度和数量的警告。可是他却更为重视当时正在谆谆教诲德国青年的新的纳粹哲学；他说，“从野蛮时代起也无法找到与这种哲学相比拟的东西”。^①但是议员们，除了少数例外，只是称赞他的口才而不想考虑任何别的。在工党和自由党方面，认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恶意的、危险的。保守党人受到震动，感到不愉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3年11月7日。

快，但是他们信任政府，并且设法说服自己，尽管军事预算逐年减少，为了保卫自己并在国联盟约的指导下起应有的作用，对英国说来，必需走的步骤是不会被忽视的。而且，只要还有一点达成裁军协议的希望，任何普通下院议员都不愿意作任何事情来妨碍或阻挠任何有成效的谈判。我们几乎不知道，艾登当时是在暗中呼吁增强我们的国防借以提高我国的威信的。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的缄默正是我们的愚蠢，也可能是我们的软弱。然而，由于国家之间和政府之间的谈判还以各种方式在继续着，各国的主要部长们还奔走于各国首都之间，那些不担负主要责任的人就满足于追随他们热爱和尊敬的领袖人物了，这种现象也许不是不自然的。

继1932—1934年的裁军会议以后，又开了许多别的这样的会议。这就轮到我对许多这样的会议发生个人的、细节的兴趣了。会议相同的特征总是反复出现：专家们做了令人赞叹的工作，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作了预备性的说明，大量日益增多的卷宗、备忘录和决议，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休会，以及秘密的私人会谈。我认识到了在所有这一类谈判中，除了达成协议的决心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起作用。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决心，不管是多么煞费苦心的建议，不管是多么精巧的计划，都不会成功。因为国家军备触及到国家生活中最敏感之处。但是，如果在领导人物中突然出现共同的心愿，想在有限的领域内至少达成某种协议，那么行动就会是迅速而有把握的。1963年美、苏、英三国同意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这项条约确实是有限的，但具有深远的意义。数月甚至数年地继续讨论下去；对每一个可能发生的漏洞进行漫无止境的审查；不断发现几乎不能探测的新的试验方法。最后，在几周之内，我发现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先生欣然同意一项简单的但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所有大气层的试验。取得这种进展的决心突然变得明显了；用一种可被接受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决心的方法

因而只是几天的事情了。

在德国决定退出裁军会议及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于1934年6月垮台之间的几个月当中，紧张的外交活动在继续进行。英国的大臣们尽力宣传收录在1934年1月底发表的备忘录中英国的最新计划。这是进一步努力用一种现在所谓的“一揽子交易”重新安排各个项目以寻求解决办法。在罗马方面，墨索里尼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虽然他警告西蒙说，德国决不会同意它的武装部队少于三十万人。墨索里尼开始对奥地利问题感到苦恼，因此仍然有意寻求协约国的支持。在巴黎方面，一个陷入斯塔维斯基丑闻阴谋泥沼的政府刚刚垮了台。另一个以尊敬的八十老翁M. 杜梅尔格为首的政府充当了临时代替者。在柏林方面，虽然英国大使警告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德国都打算在陆上和在空中重整军备，但气氛并不是不利的。在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之间，在强加的条约和自由谈判的条约之间，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分清界限。最后，希特勒象破坏凡尔赛和约一样轻而易举地破坏了洛迦诺公约。

希特勒当时同意了法国可以在一项十年公约的头五年中保留他们的重型装备。德国的空防能力应为其所邻各国空军力量总和的百分之三十；而且，作为对法国的一项特殊让步，德国的空军不得多于法国空军的百分之五十。黑衫队和冲锋队（即准军事组织）不进行武装，而且将来也不进行武装；它们甚至可以接受检查。这些建议似乎不无小补，虽然没有人问及例如如何查明俄国空军力量的问题。但是法国人对此感到疑虑。这些所谓的准军事部队能在几周以内动员起来，这将大大增加德国军队的潜力。德国人已经用大规模生产民航飞机的办法破坏了凡尔赛和约。这些飞机可以很容易地改装成军用轰炸机。最后，有什么国际制裁来保证法国的安全呢？艾登想说服英国政府作出某种保证，它应比我们根据国

联盟约所承担的正常义务更加明确，甚至比根据洛迦诺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更为有力。可是他的同事们却不愿提供帮助。接着在4月德国预算发表了，大大地增加了军事费用。

诺曼·戴维斯先生为了作出帮忙的姿态，在5月代表美国对日内瓦全体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重要声明。他说尽管美国渴望和别国合作保持和平，“却不愿参加欧洲的政治谈判……也不愿承担任何用武装力量解决任何地方的任何争端的义务”。^①事情就是这样。最后，在5月末，巴尔图在一次漂亮而尖刻的讲话中给裁军会议最后一击。

在所有这几个月里，英国舆论越来越担心，分歧越来越大。有一股舆论以不断增强的热情紧跟和平主义者的倡导。“保证和平联盟”广泛寻求支持，及时地发展了至少十万名会员。^②工党和自由党尖刻地极力反对任何加强我国国防的措施。保守党人因裁军失败而感到沮丧，因而忠诚地支持由政府提出的任何增加军费的预算，并乐意接受更大的预算。丘吉尔继续严重警告。总的说来，他对法国人的批评比对德国人多；因为德国人以更加巧妙的办法提出他们的问题，虽然就象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他们全无诚意。但是居统治地位的情绪仍然是赞成国联及其盟约，不惜以必要的力量来保持和平并惩罚侵略者。集体安全这一题目虽然其含义不明确，但却是鼓舞人心的。它可以把背景和意见很不相同的人们团结在它的周围。

我当时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主要是和一些中间和左翼观点的同情者紧密合作。我和我的保守党朋友们都毫不感困难地把我们和最后体现在《未来五年》一书第二部分中的思想联系起来，即关于和平和国联的那些段落。因为那个主题是关于集体安全所以归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92页。

^②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538页。

结到国联盟约。1934年3月，当我在自己的选区讲话时，我宣布了这个观点。反对党已经开始发动了甚至对有限程度的重整军备的攻击，对此我进行了反击。我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们必须要么放弃我们的义务，采取意味着不道德和危险的孤立政策；要么为了集体安全体制竭尽我们的全部力量，象一个负责的国家里的正直的人们那样担负起我们的责任。

当1934年夏季临近结束时，俄国参加了国际联盟。这是一个充满了良机的引人注目的事件。李维诺夫不久就开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要他享有斯大林的信任，就有很大的希望期待俄国成为德国的坚决反对者。俄国人并不隐瞒他们由于希特勒的野心所产生的惊恐。在将近五年以后，李维诺夫下台了，这表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对西方盟国失去了信心，他们认为在可能时最好还是自行其是。

其时，希特勒继续巧妙地反复无常。他非常机灵地进行宣传。我们后来学会了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他的庄严声明，他的每一次要求都是迫不得已最后才提出来的，并且认识到他对任何国家提出的片面不侵犯条约，看上去对人有帮助，实则是具有毁灭性的行为。他的私人接见具有同样的危险性。为了适应不同访问者的需要，他能显出他的性格和他的政策的适当的一面。他欺骗了并迷惑了象兰斯伯里、洛西恩、罗瑟米尔、阿诺德·托因比、伦敦德里、艾伦、汤姆·琼斯、和劳合·乔治这样一些卓越的、类型不同的人物，真不是平常的手腕。当人们考虑到，这些访问者中至少有某些人，如果不知道希特勒政权的其他方面和他的警察国家的残暴，也肯定知道他的种族迫害并对其感到遗憾，那么希特勒的成就确实是惊人的。有人几乎希望希特勒在高升到掌握独裁权力以前没有失掉在1932年会见丘吉尔的机会。不幸丘吉尔对希特勒的掮客说，“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希特勒听到这句话以后，取

消了会见丘吉尔的要求，因此，用丘吉尔的话说，“他失去了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①

在1934年结束之前，一个巨大的不幸冲击了欧洲。10月9日，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图在马赛被暗杀了。这个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建立一个坚定的巴尔干以对抗两个独裁者的可能性减少了，希望有一个坚决的法国政策这件事也化为乌有了。巴尔图有一些缺点，但却具有许多足以抵消这些缺点的好品质。如果说他的舌头是尖刻的，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见解是正确的。法国的名声于前一年冬天被搞臭以后，他做了很多工作来恢复人们对法国政府的信任。他对希特勒的目的和野心不存任何幻想。因此，他看不出宽恕德国破坏现有条约的行为是为了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希特勒都打算重建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力量。因此巴尔图指出，用签订新的条约来代替已被破坏了条约的办法得不到什么东西。他大大地补偿了最近对法国的盟国“小协约国”所造成的损害，这些国家嫉妒四强会议，怀疑在日内瓦以外的地方所有的谈判。他尽力设法缔结一项相互保证不受德国侵略的东欧公约。这位国王也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可是没有留下能够继续他的事业的继承人。这次凶残的谋杀在整个巴尔干引起了强烈的愤慨，当这个事件被提到国联理事会时，只是由于艾登的巧妙处理，才防止了引起重大的纠纷。但是这个事件造成了危害。在未来的年月里可能建立一条牢固阵线来抵抗希特勒的那些力量，受到了一次几乎是致命的打击。赖伐尔接替了巴尔图。

1935年开始时给人带来了希望。由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十五年期满后，在萨尔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该地区未来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人们非常担心，唯恐德国人在投票前可能发动一次暴动，或者变换办法，制造一种普遍混乱和骚动的状态。主要由于艾登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65页。

的努力,国联理事会作了安排,调动军队维持治安。特派员是一名英国外交官,名字叫杰弗里·诺克斯,他在整个投票期间表现得非常镇静和勇敢。结果,由于英国、意大利、瑞典、荷兰提供的军队到场了,公民投票在没有发生任何不幸事件的情况下顺利完成。支持把萨尔区归还德国的票占压倒多数。法国人原来满怀信心地期望无论如何将有一个相当数量的少数反对票,可是他们失望了。但凡尔赛和约以适当的方式在没有引起麻烦的情况下执行下去了,这一事实使人安心。而且,这件事有助于加强国联的威信。然而,英国政府在总政策上仍然拿不准下一步怎么办。他们应该在欧洲国家武装力量的水平问题上放弃进一步取得全面协议的尝试吗?他们应该终于转而认真改造和重建英国国防吗?结果他们决定两个政策同时并行。因此,2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有法国总理弗朗丹和法国新任外交部长赖伐尔参加的会议,在会后的几个星期便决定进行一次新的努力,和德国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为了这个目的,商定由西蒙和艾登访问柏林,由于俄国人、波兰人、和捷克人急于要和事态的发展保持紧密的联系,也同意艾登接着挨次访问莫斯科、华沙和布拉格。

因此,一方面和解政策再次付诸行动,新的一套参加国际四人牌戏的人选也准备好了。另一方面我们制定并发表了政府的国防计划。3月4日由首相麦克唐纳签署的著名的白皮书发表了。它曾经是内阁多次讨论的题目,许多大臣,包括内维尔·张伯伦在内,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白皮书是英国国防状况和政府计划的综合写实,这两方面都要求陆海军装备现代化以及加快1934年7月宣布的增强空军的建设。这些计划包括在五年以内增加四十一个空军中队。根据白皮书这个期限将被缩短。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这些建议确实是适中的,使军事预算仅仅立即增加大约一千万英镑。引起公众注意的是提到了德国以及德国“蓄意危害和平”的

政策在它的邻国中造成的忧虑。因此白皮书引起了反对党一阵强烈抗议，他们把白皮书描绘成“对德国的侮辱”。就在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希特勒作出了反应。他得了感冒，因此不能接见英国的大臣们。在那以后，事件迅速不断发生。3月9日希特勒正式宣布建立由浮夸成性的戈林指挥的德国空军。我们在五年以后才了解到更多的有关德国空军的事情。艾德礼于3月11日发动了一次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一方面不承认单方面裁军，一方面猛烈攻击白皮书是一个反动的、挑衅性的宣言。同时，他断言他信任集体安全体制的功效，而不承认国际联盟的虚弱，当时德国和日本已经退402出国联，美国一直就不是它的成员。事实上国联所倚靠的是在意大利和一些小国支持下法国和英国能够部署的那一点部队，但这种支持是不可靠的。

就我这样一个当时也强烈相信集体安全的人看来，白皮书提出了无可争辩的事实以增强英国对集体安全体制的贡献。奥斯汀·张伯伦的地位或许比他在以前当权时影响更大，他以长辈政治家的身份对艾德礼作了一次有力的回答，下院反响很大。对于白皮书中的建议，政府毫无困难地取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保守党为似乎终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感到宽慰。尽管重整军备是分散在一个长时期内进行而且是根据不给国家经济增加额外负担的方式计划出来的，它在国防问题上表明了一种比迄今流行的看法更为现实的态度。

3月16日，希特勒开了第二枪。他宣布采用征兵制，建立一支超过五十万人的陆军，编成三十六个师。3月18日，英国政府提出了一项反对这些单方面破坏凡尔赛和约的抗议，但是他们颇为软弱地接着问道，他们想知道访问柏林是否可以进行，因为那时希特勒的感冒已经治愈，访问日期确定在3月25日。用艾登自己的话说，“更明智的办法应该这样说，希特勒在西蒙访问的前夕单

方面破坏了条约,使访问失去了任何作用而推迟了,但是我将按照已经安排的程序继续我的旅程,前往其他国家的首都。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报以外交感冒。”^①可是,我们还无意进行这种会谈。

因此,西蒙和艾登开始了他们的旅程。但他们要发现在德国得到的是简直不起任何作用的安慰。希特勒提出了他那一贯的声明,否认他决心想做但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去做的一切事情。他决不会兼并领土;兼并只会引起经济上的困难。当然,在中欧和东欧大规模兼并领土是他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他不想把奥地利合并进德意志帝国;可是事实上他安排了在1934年夏季刺杀多尔富斯,希望通过此举能完成德奥合并,他只是由于害怕法意两国反对他,才被迫退了回去。他不过要等待几年而已。对捷克斯洛伐克绝不会有任何困难;他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有一项仲裁条约。我们在适当时候就会知道他所认为的仲裁是什么意思。德国将永远不会对俄国宣战;这个许诺将在一种特有的背信弃义情况下再过一段时间才受到破坏。他不能重新加入国际联盟,因为盟约是根据凡尔赛和约制定的。当西蒙温和地说明凡尔赛和约和国联盟约能够在法律上分开时,希特勒高兴地给予了绝不是不友好的回答。但是当时还有殖民地问题。德国被置于一种不能统治殖民地的下等地位。这是不能容忍的。最后,他向英国提出了不久即为人所周知的建议。我们伸出一下友谊之手不是会更好些吗?英帝国是大的而也是脆弱的。英德联合能够强大到共同对付全世界。至于西蒙提出的东欧洛迦诺公约这个问题,他一点兴趣也没有。

所有这些讨论当然是毫无所获。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在会谈期间,出现了一些希特勒假装愿意热诚考虑的计划:例如安排一项海军协定,以及某种关于空军均等的全面谅解,据此法德两国空军力量应该相等。关于后一项,他提出一项声明,而此项声明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129页。

传到全世界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西蒙和艾登宣布,德国空军事实上那时已和英国空军相等。很难理解为什么他要作出这一项在后来证明几乎肯定是不正确的声明。这造成两项惊人的后果。英国政府相信了这项声明,并把它当作真的接受下来,但由于英国政府以前在议会以及对英国公众所发表的那些声明,那就只有当众出丑了。关于白皮书的辩论和更进一步增加空军力量,就成为压倒一切的了。希特勒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也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但它还有第二个影响,这可能是他真正的目的。它使英国政府匆匆忙忙地答应了德国元首5月提出的建议,限制德国海军力量为英国的百分之三十五。404

不久在原则上接受并在这年6月签订的英德海军协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海军部认为他们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德对抗的回忆和大战中的经历肯定把他们迷惑住了。他们确实相信应该贪婪地抓住任何确定两国海军数量的协定。但是他们承认德国有权建造凡尔赛和约禁止建造的潜水艇,其数量可达英国潜艇力量的百分之六十,而在例外的情况下可达英国的百分之百。德国政府是例外情况的唯一判断人。此外,德国人庄严宣布潜水艇永远不会用来袭击商船,这被认为是一项有价值的让步。在我以后多年的经验中,我发现海军将军们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在接触政治时是特别容易受骗的。他们肯定认为我们政治家在讨论海军问题时同样是力所不及的。但是在这里是和在一个在主要问题上而不是在次要问题上公开而邪恶地违犯它的庄严条约义务的政府缔结的一项协定。这里宣称制造潜水艇纯粹是为了防御,可是很明显,一个德国潜艇舰队的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目的是再一次以扼杀来恐吓英国。西蒙在谈判中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霍尔以海军大臣的身份主持了这次谈判。法国人除告知大概的条款外,其余一无所知。他们没有被征求同意,甚至也没

有要求默认。他们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是关心我们自己的安全，保护我们自己的岛屿，保持我们海军的优势。赖伐尔有充分权利不仅感到怀疑，而且感到愤怒。我们的专家们也没有劳神去调查德国的真实情况和他们建造海军的设备。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德国人在多数情况下是在物质条件许可下尽快造船。^①在某些等级的舰船方面，他们引用所谓有伸缩性的条款，不顾英国的抗议，建造了超过条约规定的舰船。但是由于各种理由，肯定是由于其他方面需要装甲钢板，他们没有达到所允许的总吨位。他们自然而然地集中建造潜水艇。只是在这一方面他们完成了被允许的全部限量。一旦他们达到英国的百分之六十，他们就很自然地利用协定附文把数量提高到英国的百分之百了。^②最后，就象后来所证实的那样，希特勒对待这个条约就象对待所有其余他签字的条约一样，把它当作一张废纸。

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在进行着。在和希特勒会谈以后，艾登访问了莫斯科，带回了斯大林对德国的威胁感到震惊的消息。如果那时候设法和俄国达成某种协议，就能够建立一个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联盟。但是俄国当时和后来一样，被认为太软弱而又非常危险。他从莫斯科到华沙和布拉格去，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西蒙向希特勒提出的唯一的积极计划是东欧洛迦诺公约。这个计划立刻被拒绝了。可是只有这个公约——或某种与之类似的东西——才是东欧国家所需要的。在缺少这种公约时，这些国家期望能有某种代替它的东西。但是艾登没有授权向它们提出任何建议。不幸的是，他乘坐老旧的飞机长途旅行，回到英国时已经精神疲惫。因此他没有出席在斯特雷扎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08页。

② 同上书，第108—109页。

举行的决定命运的会议，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袖们预定几天内就在那个地方开会。

艾登一回国马上在病床上对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两项严肃的警告。第一，作为访问德国的结果，他发表了西蒙完全同意的看法，即不管德国军备的精确力量的真相如何，对希特勒的企图和德国投入重整军备的巨大努力是无需怀疑的。在已经宣布的数字以外，我们应该特别考虑扩大空军。^①第二个警告具有紧迫性，他敦促首相和外交大臣要不失时机地就墨索里尼正在准备进攻阿比西尼亚的问题当面提出质询。因为那时阿比西尼亚的乌云已经升起在天边，举目可望了。西蒙向他保证，他一定把这一点放在心上，并且为此目的将携带外交部的阿比西尼亚问题专家。^②结果，这个题目根本没有提出来。它很自然地被赖伐尔小心地回避了，他脑子里有其他的方案。我们的沉默是不能原谅的。确实有一点为墨索里尼的要求张目；他所获得的如果不是一项保证的话，至少也是一个明确的印象，即关于阿比西尼亚是不会有有什么麻烦的。这个公报的本文把注意力集中在三大强国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任何单方面的违约行为”上，把它解释为给墨索里尼在非洲的侵略“解除警报”，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外交事件迅速接踵而来。从4月15日到17日国联理事会开会，他们无视《泰晤士报》的抗议，谴责了德国违反条约义务在陆空两方面公开大规模重整军备。5月2日，作为更进一步的保险措施，法苏两国签署了法苏条约。不幸得很，尽管条约规定，如果有任何一方无故受到攻击，双方应相互支援，但因为并没有接着举行参谋人员的会谈，它的作用削弱了。希特勒在5月21日发表了一篇讲话，他一方面为他拒绝凡尔赛和约裁军条款进行辩护，另一方面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186页。

② 同上，第179页。

答应遵守由自由谈判缔结的洛迦诺公约的全部义务，这可能是以上外交活动的后果，也可能仅仅是希特勒促使协约国互相猜疑的政策的一部分。他特别把莱茵兰的非军事化作为他愿意尊重的条款之一。他愿意和除俄国以外所有德国的邻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在空军方面和西方强国均等他感到满足。他将把他的海军限制为英国海军力量的百分之三十五。^①英国政府正象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很快就接受了一项海军协议的机会。但除了工党和《泰晤士报》领导的那部分舆论以外，这个橄榄枝并没有受到很认真的看待。鲍德温起码在表面上对这相当注意。但空军力量均等消息的泄露使公众受到了震动。下院接着来了另一次戏剧性的论战。

议会对英国国防弱点，特别是空防弱点的一系列讨论，确实是引人注目的。我参加了全部讨论。我对这个题目一点也不了解，我对它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但是我以越来越大的兴趣倾听这些讨论，并被下院出现的正在变化着的情绪和倾向吸引住了，对这种变化我后来就得以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丘吉尔于1933年11月放了他那重整军备战役中的第一炮。以后他满足于主要是根据纳粹运动的特征提出警告，我们当时对这个运动的性质才刚刚意识到。但几个月以后，他致力于更为准确的辩论。他在《风云紧急》那一卷中，对如何匹马单枪坚持这个战役作了令人难忘的描述。对于这位主要演员已经非常生动地描述过的故事，我只能以一个沉默听众的身份增添一些印象的回忆。

正象丘吉尔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无论多么有节制地增加国防经费，反对党都加以猛烈攻击，这就改变了他在议会里的地位。他那时至少在有限程度上成了政府的一个支持者，而不是一个公然反对政府的人了。在1934年7月的辩论中，他证明在空军方面德国将趋向和英国均等。他们的空军实力已经接近英国现有防护国

^①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539页。

内的空军力量的三分之二。他预言即使政府的新提案实施以后，到 1935 年底德国空军在数量和效率上将和英国空军差不多相等。同年 11 月，他对挤满了人的下院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他断言 408 德国空军根据凡尔赛和约是不合法的，德国政府还没有公开承认其存在，但现在实际上和我们自己的空军接近相等。鲍德温接着讲话，完全否认丘吉尔所提数字的真实性。他说，“德国空军实力非但不是至少和我们的空军相等，或者甚至比我们的空军还要强大，而我们估计我们单在欧洲就将仍然超过他们近百分之五十。”他坚持认为这种情况至少要保持两年。他不肯预料两年以后的情况。甚至关于未来的情况，他也断言丘吉尔的数字是夸大了。下院当然把这个声明当作是权威性的。以往越来越感到不安的保守党人于是大为宽慰了。然而，在 1935 年 3 月 19 日空军预算被提出时，丘吉尔再次诘难。空军部再次毫不动摇。空军部次官菲利普·萨松在答辩时口若悬河，信心十足。两周以后，在 4 月 3 日那天希特勒亲自对西蒙和艾登所作的声明公布了，说德国在空军方面已经达到和英国均等。结果引起了轰动。

丘吉尔自然恢复了进攻。他的讲话受到了深切的注意。他对自己不能使议会和国家重视他的警告而感到失望的心情曾加以描述，这是事实。^①我听过他那一段著名的讲话，他追述了圣约翰大臣在二百多年以前的泄密——阿尔曼萨战役的失败由于议会通过派往作战的军队只有四分之一到达现场——对下院所造成的影响。那时下院沉默达半小时之久，没有一个人想发言。丘吉尔当时正在写马尔巴勒传记。^②他的头脑里充满了那个惊人时代的历史，因此这件轶事很容易就出现在他的头脑里。但是丘吉尔猜测 1935 年的下院漫不关心，不受感动，那他是错了。尽管丘吉尔的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 96 页。

② 温斯顿·丘吉尔：《马尔巴勒：他的生活和时代》，四卷本（伦敦，1933—1938）。

409 答辩非常激动人心，鲍德温在5月22日的自我检讨甚至更令人吃惊。虽然他坚持他在头一年11月提出的对当时英德空军力量的估计，但承认他对未来数字的估计却是错误的。他说，“我的错误在于对未来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我完全错了，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受骗了。”接着他勇敢地将罪责归于自己，从整体上看也归罪于政府。“我们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要负责，我们都应受责备。”丘吉尔描述了他对下院的反应感到惊讶。^① 下院不象他所预料的那样至少要求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他们的情绪完全不是这样。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人当然不关心，因为他们已在反对甚至是有节制地增加军备，而这种增加是已经决定了的。可是甚至保守党人也缓和了。大体说来，下院被“鲍德温的坦率迷住了”。他的坦率似乎弥补了他的过失，并且确实对一位如此直率的大臣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热情。但这并不是英国下院的异常反应。这是它的传统的一部分，就象在学校里一样，议员们钦佩一个坦白的孩子。在特罗洛普写的小说之一《公爵的孩子们》中有一节准确地描写了这一点。有两个人正在讨论下院里最近的一个场面。议会旁听席里的一位旁观者谈到一位议员对下院的感受：

回答是“是的”，“因为他‘坦白’。事实是，如果你爽快地‘坦白’，下院什么都可宽恕。假定我杀死我的祖母，并在被询问时承认我做了这件事……”尼德戴尔勋爵然后站了起来，就象在下院里进行演说那样开始发言。“‘议长，我很遗憾，那位老太太确实在我激怒时惹翻了我。不幸得很，我手里有一根很粗的棍子，我就用棍子打了她的脑袋。没有人能对这件事象我这么悔恨！没有人能那么深切地感受我所处的地位！我在下院呆了多年，许多绅士非常了解我。议长，我想他们会承认我不是一个缺乏孝道或是不具备普通人性的人。议长，我对我自己在狂热的一霎那所干的事感到悔恨。我现在说明事实，我把自己交给下院处理。’我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99页。

相信我会获得一场喝采，而这场喝采我确信用别的办法是永远不能得到的。”

鲍德温也是这样。在霍尔—赖伐尔协议失败后，他再一次坦白，也再一次“犯了错误未受处分”。具有浓厚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希特勒那时的声称是不真实的，而鲍德温的引人注目的“自我检讨”也是不必要的。对事物比较的标准完全一致起来是有困难的。在编成的空军中队和尚未编成的空军中队之间，以及在第一线力量和后备飞机之间，当时耍了许多花招。当希特勒说已经在实有飞机上取得均等时，他大概是说了过头话。而真正的比较在于两个国家的生产资料 and 发展的可能性上。一支空军不是一个静止的组织，全部情况取决于工业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或能够适应制造大量产品。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中居于首位的东西。

在以后三四年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在斯温顿勋爵富有想象力和精力旺盛的管理下，如果说我们在战争爆发时没有取得数量上的优势，我们却在质量上取得了优势。为了做到这一步，必须承担很大的风险，飞机图样从画板上拿下来直接投入生产。因为那时的机械较为简单，这种做法是一种成功的合法冒险。如果没有这一措施，在法国沦陷之后的不列颠之战就不能支撑下去。

所有这些使我日益关心的事件促使我和丘吉尔恢复较为频繁的接触。他没有劝我不要再继续走经济和社会重建的道路。确实，当我开始被当作一个怪人或叛逆者时，他始终向我表示最大的照顾和尊敬。但他给我印象深刻的意见是，如果不以更大的努力保卫我们自己和我们朋友，我所从事的全部计划都要失败。德国将在世界上取得统治地位；除了可耻的投降或进行一次长期的、破坏性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也是用一种逐渐扩大支援他的范围的办法来改进他的地位。在后来的两三年间他能够把许多

在政治生活中意见分歧的分子团结在自己身边。他的集体安全的概念可能比国联的热心家含糊不清的口号更为现实一些。但是他开始认识到，在国联的保护下，而且只有通过这个手段，才能把具有广泛基础的支持者集合起来，对德国侵略作出必要的反应。由于国联失去了一些主要的强国——美国、德国、日本——集体安全只能是由一些较小国家在它们能力范围内支持的、由法国和英国领导的联盟。实际上，这和英国在漫长的历史上多次领导的反对一个强国统治欧洲的大联盟，没有多大区别。但是这是能够产生团结和崇高的献身精神的唯一基础，如果英国想要发挥它的全部力量，这个基础始终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 1935 年春季和夏季是令人焦急的几个月。尽管不停顿地进行了外交活动，在和德国人达成令人满意的安排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只有海军协定除外，而这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某些人强烈反对而另外一些人却嫌不足政府重整军备计划，使舆论多年来第一次正视了令人非常讨厌的现实，而这却是在此后可怕的十年里他们注定要与之进行斗争的。其时，舞台上正在出现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的另一个转折——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

时至今日可以扼要概述一下这个故事。在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有一笔旧帐需要清理。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忘记 1896 年在阿杜瓦的战败和耻辱。在大战后的头几年里，意大利似乎满足于和平渗透的可能性，由于有那种想法，他们在 1923 年倡议接纳阿比西尼亚为国联成员。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怀疑推选一个仍旧生活在原始情况或者至少是中世纪情况下的国家进入国联是否明智。然而，别的国家屈从了意大利的要求。1933 年，正象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墨索里尼开始拟定他的计划。计划规定或者完全吞并阿比西尼亚，或者象当时法国在摩洛哥或者英国在埃

及那样,享有最高的权力地位。军事准备在 1934 年就完成了。在那年年底,在一个叫做瓦尔瓦尔的地方安排了一个平常的边境事件。意大利向阿比西尼亚发了一份抗议照会;而阿比西尼亚则根据 1928 年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的条约要求仲裁。意大利人拒绝了这个要求。因此,在 1 月初,阿比西尼亚根据有关战争威胁的国联盟约第十一条向国联提出了申诉。经过商谈之后,意大利在原则上同意仲裁,但却不失时机地在厄立特里亚集结了军队。仲裁安排失败了,这肯定是意大利人所希望的。阿比西尼亚于是根据第十五条提出申诉,要求国联理事会调查两国之间的争端,并设法使双方谈判或者在两国之间调停。这是 3 月 17 日的事情。这一天是个不吉利的日子,因为这是希特勒宣布实行征兵制并建立庞大的德国军队的第二天。因此,理事会的注意力已被一项似乎更为严重的事件所吸引。的确,就是根据希特勒的这个行动,才安排了 4 月 11 至 14 日的斯特雷扎会议。而就在国联理事会进行协商的缓慢过程中,很多时间被耽误了。意大利人在继续集结力量的同时,采取了拖延政策,答应进行谈判或仲裁,但是在程序问题上又拒不同意。快到 6 月底时,英国政府由于担心在意大利作为一方,法国和英国作为另一方之间的裂缝日益扩大,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项建议。他们向墨索里尼建议阿比西尼亚把欧加登地区相当大的一部分割给意大利。英国为了缓和形势,将在泽拉为阿比西尼亚提供一个出海口,并在英属索马里兰划出一条走廊作为回报。自然墨索里尼傲慢地拒绝了使阿比西尼亚有所收获的建议。这个建议事前没有通知法国,加之我们在英德海军条约上蒙蔽了法国,其唯一的结果是增加了法国的猜疑。

就在这以前的 6 月 7 日,麦克唐纳和鲍德温调换了位置。鲍德温当了首相,麦克唐纳当了枢密大臣。自从 1931 年经济危机以来,他们一直和谐地在一起工作。如果说鲍德温因为政府几乎完

全由保守党的选票支撑而享有实权的话，他在行使权力时几乎是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外交部的人员变换更为重要。西蒙调到内政部，他的确更适合这个位置。西蒙虽有完全良好的意图和充分使人满意的愿望，他在外交部却是一个很大的失败。他似乎没有区别重要事务和琐碎事务的判断力或天赋。就象威廉·詹姆斯曾经谈到詹姆斯·布赖斯那样，“对他说来，所有的事情生来就是无所谓的，相等的”。西蒙在内政部就轻松得多了。他二十多年前在阿斯奎斯的政府中确实是一个有成就的内政大臣。不幸得很，当哈利法克斯勋爵以后当上了驻上院外交国务秘书时，西蒙被引进在有关外交事务的大型辩论中支持政府。在这一方面，他从来也没有表现得有说服力，而是有时候使人恼火。说来有些离奇。我始终觉得西蒙是会处人的，对人是友好的；他的悲剧在于他要讨人喜欢。人们，尤其是政治家，就象孩子一样。他们常常拒绝那些想讨他们喜欢的人，却尊敬那些以某种冷淡甚至轻视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人。没有象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西蒙由艾登继任，而是由萨姆·霍尔继任。鲍德温似乎曾对此犹豫不决；可是内维尔·张伯伦却坚决支持霍尔，他认为艾登可以等一个时期。结果他只需等待几个月就行了。

当时，由于意大利公开地、毫不掩饰地进行军事准备，议会和全国的忧虑都增加了。有名的六月和平投票的结果并没有使国内的形势更为明朗一些。和平投票是由年高德劭受人尊敬的赛西尔勋爵主持的，由国际联盟协会组织的，实际上是全国性的非官方的公民投票。检票人提出了许多问题，收到的回答数量大得惊人。这是和盖洛普民意测验完全相反的一种办法。它记录了一千一百多万人的回答，而不是只询问一两千个当作典型代表的少数人物。所有的问题都多少有点倾向性。例如：“你赞成通过国际协定全面裁军吗？”这个问题特别使人想起一个男孩被他父亲询问有关讲道

内容的故事。那个男孩想了半天以后说，讲道的内容是关于罪恶的事。那个自己没有去做礼拜的父亲说，“好的，可是传教士关于罪恶讲了些什么呢？”经过深思以后，那个男孩回答说，“他反对罪恶”。别的一些问题具有类似的性质，要不就是如此明显以致没有提出的价值。例如：“英国应该仍然留在国际联盟内吗？”但是有两个问题具有重要价值，虽然它们已经成为很被误解甚至歪曲的题目。它们的内容如下：

假使有一个国家坚持要进攻另一个国家，那么你认为其他国家应联合起来采用下列手段强迫它停止进攻：

- (a) 经济和非军事手段？
- (b) 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①

对于这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当中的第一个，一千万人的回答是赞成的，只有大约六十万人反对。因此，有压倒多数的人支持对侵略者进行所谓经济制裁。对于第二个问题，有六百七十八万四千人投票赞成，有二百三十五万一千人投票反对。^{①②}因此在投票中有绝大多数——几乎是三比一——赞成用武力作最后的手段。

保守党领袖们普遍认为和平投票的组织者是公开的或隐蔽的和平主义分子。例如，内维尔·张伯伦在他的日记中露出焦躁和愤慨之情。他轻蔑地谈到“国际联盟协会的那些怪人”。^③我当时认为这是对形势的错误解释，而我现在相信我的许多朋友当时对此也有同感。肯定地说，争辩在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是多少有点不现实的。经济制裁越有效，就越可能挑起战争。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九百万投票人中有接近七百万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愿意而且确是决心为正义事业而战，如果

①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 542 页。

②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 237 页。

③ 伊恩·麦克劳德：《内维尔·张伯伦》，第 181 页。

在国联的赞助下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①

毫无疑问，投票人中有许多人没有体会到如果必须采取军事制裁的办法(当然在和平投票时阿比西尼亚事件存在于每个人的
415 脑海之中)，主要的担子将落在英国身上。因为制裁很可能包括使用海军封锁意大利，切断它去非洲的交通线。如果决定这样做，这些行动只能由英国以及在次要的程度上还有法国的舰队执行。

等到议会在8月初闭会时，情况明显地向危机方面发展。英国所有政党的意见明显支持国联采取制裁政策的立场，迫使意大利放弃侵略。新闻界除了《每日邮报》和《观察家》以外，都接受这个方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机关报《每日快报》是强烈反对意大利的，《泰晤士报》和《旁观者》也是这样。道森^②对希特勒每次破坏条约的举动或侵略行为从来都不太激动，但对墨索里尼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针。这肯定是由于一个简单的理由。道森对欧洲不太感兴趣；但作为一个由米尔纳^③传统教养大的帝国主义者，他对非洲非常关心。他不喜欢墨索里尼要控制尼罗河水源或者想在苏丹与我们为邻的打算。英国政府——仍旧在麦克唐纳和鲍德温的统治之下，虽然这个合伙字号那时已改称鲍德温和麦克唐纳——因此必须决定政策并坚持下去。全国等待着，而在这度假的几个月中，人们焦急地等待着。舆论很是动荡，就象通常处于重大危机的时刻一样，再一次出现可能产生类似全国团结的形势。除了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兰斯伯里或卡农·谢泼德的追随者——以外，所有的人都能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到一起。结果，这个良机却失去了。直到五年以后，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这种机会才再次出现。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33页。

② 杰弗里·道森，《泰晤士报》编辑。

③ 米尔纳(1854—1925)，英国政治家和殖民行政官。——译者

为了确定政策，内阁长时间开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有两个外交大臣——霍尔和艾登。因为艾登那时已经当了掌玺大臣，这是内阁的一个成员，此外还兼任了国联事务大臣。鲍德温在掌舵，但是他渴望尽快撒手不干，并且一般说来他是讨厌外交事务的。内维尔·张伯伦当时非常好战。他在7月的日记中写道：

最理想的办法是说服墨索里尼放弃使用武力的打算。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使他相信，他没有别的选择……例如我们能截断他通过苏伊士运河运送补给品的通道。如果法国人同意发挥他们的作用，最好的办法是私下去见墨索里尼，预先通知他我们的看法和意图。^①

甚至迟至11月末，他在日记上还写下这样的话：

如果有别人愿意带头干，那太好了，但是作为最后手段……我们自己应该带头干，而不要让这个问题拖延下去……^②

（这和所谓的“石油制裁”有关。）内阁中较年轻的成员就个人讲都被认为是支持国联的人。可是他们集体的决定是什么呢？

他们确实是面对着一个进退两难的严重处境。情况发展得很明显，无论如何必须很快作出决定。两条道路摆在大臣们的面前，不管哪一条，只要勇敢地继续走下去，就可能避免几年以后发生的大灾难。

第一条道路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意大利倒向德国一边。尽管英国舆论对墨索里尼和他计划中的侵略日益增长着敌意，还是完全能够找到理由为意大利采取象其他欧洲列强早些时候把它们意志强加给非洲各地的同样办法，在阿比西尼亚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建立权力进行辩护。此外还能提出论据来说明，阿比西尼亚政府的性质是不值得文明国家支持的。这是一个封建国家。内战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奴隶制度盛行。此外，结构残缺不全的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265页。

② 同上书，第272页。

国联,显然无力制止意大利,或者用制裁为手段来强制执行一种解决办法。能够期望的最好的办法是某种解决方式,一方面可以保留阿比西尼亚皇帝名义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把实权交给意大利。⁴¹⁷这对于使当时对德国决不是友好的意大利在迫在眉睫的更大的斗争中站在正确的一边,具有实质的、可能是决定性的好处。此外,传统上对意大利采取敌视态度的法国政府,在英国强大的压力之下,最近对意大利采取了一种较为友好的态度。墨索里尼本人在多尔富斯谋杀事件时由于在1934年把若干师军队开往勃伦纳山口,有效地制止了希特勒冒险搞德奥合并的政变。在斯特雷扎会议上把意大利保留在正确道路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至少就欧洲而论是这样。

在斯特雷扎会议上对非洲问题保持外交上的沉默,使这个方针较易执行。通过允许墨索里尼为阿杜瓦的耻辱报仇,并建立一个可与其他欧洲大国的殖民地相匹敌的非洲帝国,英国和法国将加强联盟,并制止希特勒肯定正在策划着的东南欧危险的发展,即使他的更大的野心只是被人怀疑而已。

当然,这样一个政策可能象是玩世不恭的,但它却是现实的。它和那种认为应给国联以支持的英国人的强烈感情恰好相反。但是由于国联没有军事力量用作威胁,也没有使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从而不能有效地行使它的权威。英国舆论——尽管和平投票明显地表现出,如果采取集体行动,它是愿意承当军事制裁的——似乎把和平当作它追求的首要目标,因此或许能够引导它接受其结果,尽管它并不喜欢这种手段。而且,这根本不牵涉到完全抛弃国联的问题。唯一必要的是让事态谨慎地如别的国家所愿意前进的同一速度向前发展。显然,如果法国和英国不愿带头,小国除了通过决议或试图采取某种经济压力之外,不会作出更多的事情来。集体行动不需要公开反对它,但是能够让它终归失败,那样就使墨

索里尼晓得了辩论和呼吁，甚至连国联倡导的无关大局的制裁在内，都不需要非常认真地去对待。

丘吉尔为德国危险所缠住，他本能地感觉到，失去意大利的支持归根到底等于意大利参加一场反对我们的战争，这对我们说来是一个过重的负担。外交部卓越的负责人范西塔特和丘吉尔同样对德国感到恐惧，也采取了同样的方针。因此他在斯特雷扎没有敦促，甚至没有提醒外交大臣需要提出阿比西尼亚问题。这样一种政策当然意味着今后不再把国联及其盟约当作制止侵略的有效工具了。但是可以这样问一下，国联有什么能够成功的现实机会呢？希特勒仍然不过处于野心勃勃的军备计划的初期阶段。他在奥地利受到挫折，如果有意大利的帮助，我们肯定能够制止他。如果奥地利能保住，捷克斯洛伐克就会相应地得到加强。尽管有了一些不祥朕兆，莱茵兰的重新军事化还没有发生。如果法国和英国仍旧坚定地站在一起；如果英国的重整军备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推进；如果法国较为坚定的分子受到鼓舞也这么干，那么尽管国联失败了，却可能建立起一个联盟，把那些小国团结在一起。如果西欧保卫得很好，也许能够作出满意的安排在东方把希特勒遏制住。阿比西尼亚将被牺牲，但是它是一个缺少有力的中央政府或进步文明的国家。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暴君专制、奴隶制度和部族战争的野蛮的国土”。^① 考虑到危险和灾难就要到来，难道这个代价太大而不值得付出吗？

在7月11日的辩论中，丘吉尔对这样一些忧虑作了谨慎的发言。他承认不管国联可能作出什么决定，我们必须发挥我们的作用。但是他又说：“在这些问题上，不能要求我们去做超出我们责任的事情”。^② 可是很明显，除非英国出面带头，而且实际上做出超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30页。

② 同上书，第131页。

过它责任的事情，否则国联一定会失败。他在结束讲话时呼吁重视英意之间如此光荣的传统友谊。丘吉尔在8月初和霍尔的私下谈话中重复了这些警告，并特别提出需要和法国达成明确的谅解。他这样说：

419 我说，我认为外交大臣可以以他能够带动法国那样的程度同国际联盟一起来反对意大利；但是我又说，他不应该给法国施加压力，因为法国同意大利订有军事条约，而且它还有对付德国这样一个急务。^①

第二条道路同样很明显。它将使阿比西尼亚危机成为国联的试金石，并且保证它取得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必须带头。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对法国施加所有可能的压力，并且使它安心，我们的重整军备计划将和形势的实际需要相称。因此我们应当保证，由于这个较小的独裁者的失败或者垮台，所有民主自由力量就能够发挥作用，用以遏制那个较大的独裁者。困难也不象看上去的那么可怕。德国由于地理条件和军备现状这两方面的原因，不大可能对意大利进行帮助。如果迅速、有力、并且有选择地实行财政和经济制裁，那是能够使意大利的局面无法支持的。例如，当意大利发动阿比西尼亚战争时，石油制裁就能够使它早日把战争停下来。用国联的名义和在国联的许可下采取行动，英国和法国的舰队能够封锁意大利，使意大利人不能使用苏伊士运河。由于他们的军队在非洲陷入孤立，他们的交通被切断，意大利政府除了向世界舆论屈服，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当然这会有风险。英国海军参谋部把马尔他岛的弱点和主力舰可能受到损失等情况向政府作了汇报。鉴于存在着远东危机，损失主力舰一事他们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和我们即将遭受的危险比起来，这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相信英国政府正在严肃地执行这样一种政策，丘吉尔在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32页。

一次和意大利大使格兰迪的谈话中试图讲清楚这些危险，让他记住英国舆论的力量。^①在更早一些时候，他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已经向墨索里尼发出了一次严重的警告：

违反整个世界的善良意愿，又没有制海权，就把一支由二十五万意大利优秀子弟组成的军队开到离本国二千英里外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岸去，然后在那种形势下，进行很可能是一系列的战役，攻击一个民族，而那块地区又是四千年以来没有一个征服者认为值得去征服的，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以国家前途作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②

内阁无疑在这两种选择之间犹豫了很久，虽然他们对它们的了解可能不象我现在解释的那么清楚。等到下院在8月1日辩论时，他们似乎已经作出了决定。新任外交大臣断然宣布政府支持各项条约和国联盟约。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我们决心尽我们的义务。他相信法国人也会这么做。第二天议会夏季休会。

在议会休会期间，由于外交大臣很自然在辩论中使用了仔细选择的词句，对政府决定的任何怀疑被日内瓦出现的一些事件驱散了。艾登忙于工作。在他的热情领导下统一了国联大会的意见，如果预料中的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进攻开始了，就对它执行制裁政策。我们现在知道，但当时不知道，艾登要使他的法国同事赖伐尔满意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赖伐尔仍旧希望找到某种办法，使意大利保留在正确的一边。他是个机警的经纪人，他相信英国政府在紧急关头可能不愿正视问题，后来情况证明这不是没有理由的。甚至解除对阿比西尼亚的武器禁运这一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这一问题已经敦促了好几个月了。这项禁运适用于意阿两国，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公平的，但事实上完全不公平。意大利多年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附录 A，1935年9月28日，第533页。

^②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35页。

来一直在准备战争。阿比西尼亚没有任何现代化武器，也确实没有任何种类的大炮。劳合·乔治在夏季之初曾在私人谈话中敦促取消禁运。艾登同样认为保持禁运极不公平，但是他的地位低于外交大臣，他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去做。因此赖伐尔就拖延下去了。然而，所有的怀疑似乎被霍尔9月11日在日内瓦的讲话消除了。

421 霍尔对国联全体大会发表的讲话对世界震动很大。可能他和他的顾问们完全没有预料到反应会那么大，引起的热情会那么强烈。用他自己的话说，外交大臣决定“向大会发出一项重新鼓起信心的呼吁。往最好处说，它可能翻开重振国联的新篇章；就是最坏，它也可能用显示国联的热情这样一个办法来吓住墨索里尼。如果其中有吓唬人的成分，那是因为此刻‘吓唬’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①令人感兴趣的是，现在获悉那个讲话草稿不仅由外交部的顾问们而且由内维尔·张伯伦逐字逐句研究过。^②下面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段：

国际联盟支持集体维护盟约的完整，特别支持对一切无故寻衅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的集体抵抗，而我的国家是和国联站在一起的。英国民族过去几周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不是变化不定的、靠不住的感情，而是国际行为的一项准则，他们和他们的政府坚决、持久、绝对坚持这一准则。

当然有一个附带条件：“而这个附带条件似乎更加强了保证”。^③其内容如下：

如果要承担责任，必须集体承担。如果要为和平冒险，必须大家冒险。多数国家的安全不能只由几个国家的努力来保证，不管这几个国家是多么强大。我代表联合王国的英王陛下政府可以这样说，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政府在它的能力范围内，在打算履行国联盟约加给它的义务

① 坦普尔伍德子爵：《苦恼的九年》（伦敦，1954），第166页。

② 伊恩·麦克劳德：《内维尔·张伯伦》，第186页。

③ C.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544页。

方面,决不落在别的国家后面。

诚然,仔细读一下这些词句,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的行动将完全取决于其他成员国的合作。但是整个讲话的大意很清楚,英国打算坚决而又积极地带头。据艾登记载,比利时代表M.许曼兹总结了这篇讲话的影响如下:“英国人已经决定制止墨索里尼,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这的确是这篇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唯一可能的解释。^①丘吉尔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读到这篇讲话时感到激动。他说,“它使主张大胆地把正义和实力结合起来的英国力量联合起来。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政策。”^②英国人也不仅仅满足于言语。就在第二天的9月12日采取了在性质上不可能被误解的行动。“胡德号”和“声威号”这两只战列巡洋舰在第二巡洋舰队和一支驱逐舰队的随同下,开到了直布罗陀。

在英国,对外交大臣的讲话和海军示威的反应是迅速的,印象很深的。民族团结感和自豪感经常潜伏于我们民族中间,再次激发了出来。自从大战以来,我们苦于一种幻想破灭感。“为英雄准备的故乡”——这是劳合·乔治用来描绘紧接在胜利以后那个社会革命的一句蛊惑人心的名言——变得毫无结果。随之而来的反而是长期的萧条和失业。所有这些转而造成了分裂和论战。贫富之间的鸿沟,在贫穷已演变成近乎绝望的那些年月里更难忍受,增加了阶级感情的怀恨。可是,仍然渴望团结。这种感情在年初国王乔治五世在位二十五周年庆典时以异常的形式表现了出来。那时人民表现出的热情是对国王和王后在他们所统治的整个困难年代里所表现的良好榜样的歌颂。而且它的含义不只这一点。这象征着国王和王后的全体臣民真正走到一起来了。这是一种家庭聚会;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各城镇的贫穷街道的庆典更引人注目了。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262页。

^②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35页。

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一天我和我的妻子驾车走遍了斯托克顿。所有街道，从这一边到那一边，都挂满了旗子。各阶级和各种政治面貌的男男女女聚集到一起，共同欢庆。在一种相似的团结精神中，
423 由于英国政府的坚定声明，似乎出现了一个新的目的和建立在过去伟大成就上的一种未来的新信念。我们再一次在世界上要占据我们应有的地位。美国是中立的，德国是敌视的；民主国家那时指望我们，我们不应使他们失望。英国又成了领导者了。

这对工党的影响是直接的。和平主义分子在议会里势力很大，但在支持工党的投票人中根本没有构成多数，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所有的人至少在原则上是国联的拥护者。许多反对重整军备的人也要求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反对墨索里尼了。欧内斯特·贝文所领导的坚强的运动以越来越大的气势向前发展。9月底在布赖顿举行的工党会议上争论达到了顶点。兰斯伯里和克里普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贝文使出他的全部力量反对他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他谴责兰斯伯里把运动置于完全无望的境地，他使用的“到处见人就兜售自己的良心，要人家告诉他应该怎么办”这句话已经很出名了。支持制裁的决议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10月8日，兰斯伯里辞职，艾德礼当选接替了他。

当议会于10月23日复会时，意大利已经开始进攻阿比西尼亚了。国联理事会在一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意大利“无视国联盟约，发动战争”。为了准备必要的制裁，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对阿比西尼亚的武器禁运解除了——虽然为时太晚，但无论如何算是一种姿态。大家看到艾登在推动这些积极措施上起了主导作用。对于一个如此年青的人来说，他那时的地位是很突出的。那时我对他的了解并不象以后那样深。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初次了解并钦佩不仅是他的手腕和热情，而且是他对伟大事业的真诚献身精神。当然，我们当时不象他的传记传开以后所了

解的那样，并不知道在那具有决定性的几周里他的任务是多么艰巨。从9月的崇高理想如何逐渐滑向国联努力的终告失败这一漫长的过程，在他的书中作了美妙的描述：赖伐尔诡计多端；虽然他⁴²⁴变幻无常难以捉摸，艾登却能努力使他就范——如果不是伦敦政府的经常反复，霍尔的出尔反尔，艾登的努力是可能成功的。^①霍尔不久就对自己以前所干的事感到吃惊。他在公开发表勇敢的言论以后，已经私下变节了。我们在罗马的大使也没有采取一项非常坚定的方针。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对墨索里尼的威胁所作的犹豫不决的答复，肯定传到了巴黎，鼓励了赖伐尔以及那些和他同样害怕的部长们。可是所有这些情况，对我们都是隐瞒的。至少在表面上，情绪还是坚决的。在实行制裁上，拖延似乎是国联体制决定的，不可避免的。任何表示光荣解决的愿望都没有设想到丢脸的退却。尽管内阁可能在暗地里一直是迟疑不决，我们后排议员却相信这一回英国是决心“干到底”了。两天以后，10月25日决定宣布解散议会，并决定11月14日举行选举投票。我们很难知道，那时选出的下院注定要渡过四年不稳定的和平时期，接着又要渡过六年历史上最为恐怖战争时期。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15,16两章。

第十四章 1935年的大选

在1935年的大选中我又参加了斯托克顿的竞选，这是十二年中第五次了。那时我在那个市镇已经出了名，有相当数目的追随者。尽管当时保守党拥护我的人觉得我似乎有点古怪，他们对待我仍然具有明显的耐心和谅解。因为天天面对着这个“贫困”地区严峻的现实，他们不象我在大城市里的一些朋友那样很容易地受到对我政治行为的批评的影响。在北方，他们倒是赞成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他们当作知心人。他们从没有反对过我在前面阐述过的经济和工业政策，也从没有反对过我所用的那种激烈的言辞。因此他们并不反对我与执政党观点的偶然抵触。1935年1月劳合·乔治已经开展了他的“新政”运动。虽然我未能参加他在班戈举行的开幕式大会，但是我在对新闻界发表的一项声明中明确表示，我和我的许多朋友总的说来是欢迎他的建议的。《未来五年宣言》在7月发表以后，于是很自然地就有人在议论劳合·乔治的行动委员会与我们的未来五年小组进行合作的事了。然而到了8月大家就清楚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两个团体在形式和目的上都是没有关系的。一个是政治运动，而另一个则是由各个政党的个别成员聚集到一起，赞同一个总的纲领并希望总的能引导舆论界。这并不妨碍我们中间许多人以个人身份支持劳合·乔治。因此，7月间我在伦敦举行的行动委员会会议发表讲话。10月1日，我和属于各政党的许多北方议员一起出席了在纽卡斯尔举行的一次性质相同的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所有这些不同运动的意图都是要激励政府采取更主动的措施解决失业

问题。

我承认，当我在夏天接到一个建议想使我在英国南部获得一个完全有把握的席位时，我曾一度受到了诱惑。我的一位好朋友在6月告诉我，他已下定决心不再参加竞选。他跟他的负责人磋商之后，确信如果我愿意把我的名字提出来，我就可以代替他被提名为未来的候选人。但是我在1929年竞选失败以后就回到了斯托克顿，那时我不认为背弃斯托克顿是对的。因此我答复如下：

十分坦率地说，我觉得如果我放弃斯托克顿的席位，那我就要犯错误了。第一，人们不被击败是不会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的；第二，因为我现在感到有一个好机会击败社会党人占有这个席位……现在我能够对保守党的领袖们多少持一点批判的态度，这对我的独立地位是合适的。……如果我当选为蒂兹河畔斯托克顿的议员，我就能从这个地位出发，较为自由地来发展我认为是必要的路线。关起门来说，我感到我越来越跟现在控制着保守党的那种看法脱节，我倒是愿意冒一次在北方被击败的危险，在那里我确乎是代表一种明确的观点的。如果事情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我可以退出政界而专心于个人事业，对此我近来大为忽视。

《未来五年宣言》发表时，我在我的选区举行了一次大型公开会议来解释它，并明确表示选举时我打算支持这一方针。快到9月底的时候，在斯托克顿自由党人协会的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获得了他们的一致赞同。

尽管就业形势有了某些改进，但是东北海岸地区的情况仍然很糟。我当时知道我要面对的形势与1931年的形势完全不同，那时我们可以把责任完全推给工党政府。而且，我以前的对手是一个令人愉快但并不出色的人物，而现在我却面对着苏珊·劳伦斯女士这样一位更为有力的竞争者。她在长期从事劳工运动中证明是 427 其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该运动最有能力的行政人员之一。她曾经是一位有成就的大臣。她能够在选区内外把一群热心的支持

者团结在她的周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看有没有自由党候选人参加竞选。我很清楚在上次选举中我得到了大部分自由党人的选票，据认为在一万和一万五千之间。毫无疑问我还得到了一定数量的工党支持者的选票。如果有一位自由党人参加竞选，我的处境就会十分窘迫。我的一些自由党朋友，包括劳合·乔治在内，曾多次设法使我能得到彻底的胜利。然而，当地的保守党人却坚持提出一名候选人在邻近选区西米德尔斯布勒和颇负众望的自由党议员金斯利·格里菲思竞选，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人就不愿为了对我有利而在斯托克顿退出竞选。行动委员会在选举时没有提出候选人，而是把一份征求意见表分送给所有的候选人。在回答这份意见表时我补充道：

无论作为《未来五年》这本书的起草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还是在行动委员会所召开的各次大会的演说中，我都支持这些在下院提出来的建议，这是众所周知的。

现在随表附上一份我的竞选演说，你们可以看到这份演说稿是按照独立的方针起草的，这可以表明我是怎样设法向斯托克顿选民陈述这些建议内容的。

我在保守党内的其他朋友——休·莫尔森、维维安·亚当斯、尼古拉斯·格拉顿—多伊尔、登维尔、罗伯特·阿斯克、和其他十或十二名候选人——对行动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作了全面肯定的回答。尽管我的自由党对手也作了满意的回答，但是劳合·乔治在竞选期间特意尽力帮助我。他在选举广播演说中以及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的声明中，都称赞我在议会中的工作，并且提到我们在失业这个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他还私下写信给我，表达了他个人的良好祝愿。我还同样幸运地得到了选区内外主要自由党人的大力支持。这些人中包括斯托克顿自由党人协会的两任前任会长，以及吉尔伯特·默里教授和斯科特—利杰特博士。这里我难免要引

用吉尔伯特·默里的信：

亲爱的麦克米伦先生：

虽然我不是你们党的一个成员，但是我一直以最热诚的赞赏和同情注视着你所倡导的建设性政策的计划，如果我是斯托克顿和索纳比的选民，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投您的票。

您的忠诚的

吉尔伯特·默里

因此，在竞选运动中对国内问题方面，随着选举工作的开展，我觉得越来越有信心了。我还必须赞扬保守党的指导机关。不管他们对我的正统观念作何感想，他们没有想要削弱我的地位，而是对我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帮助。

至于外交方面，我也很适意。虽然在这四年当中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但是我很自然地也发表了许多关于欧洲和世界问题范围广泛的演说，对我的选民更是这样。跟我所有的保守党朋友一样，我是国联的一个衷心的拥护者。1934年3月，我在当地的国际联盟协会发表演说，谴责孤立主义，主张英国在日内瓦起积极和主要的作用。1935年3月，我在英格兰北部发表了一篇演说，使我获得一定的名声。我在演说中提出有必要对付正在进入世界的“新野蛮主义”。我还说，“除非我们准备作出巨大的牺牲，我们就不能战胜这种行为。如果我们要和平，我们必须准备为集体安全制度而斗争。”因此，我在支持《未来五年宣言》第二部分涉及外交政策方面并无困难。随着阿比西尼亚危机愈益紧迫，我对政府将采取什么方针担心起来。但是霍尔在日内瓦的演说消除了我的全部忧虑。为了支持他所采取的大胆的以及我们认为坚定的方针，《未来五年宣言》的许多签名人，包括我在内，于9月17日写信给《泰晤士报》，对他那坚定的声明表示欢迎。当时我们知道法国人有些踌躇，因此我们主张应该明白表示英国对国

429 际联盟盟约全面支持,这种支持不仅适用于阿比西尼亚危机,而且也适用于任何类似的情况。这封信继续说道:

外交大臣的声明使目前情况产生了最好的希望;最大的困难是以前从没有发表过这样明确的宣言。当前的问题很可能取决于象法国——它的有效的合作在现在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些国家是否感到,假使在其他地区对和平发生威胁,它们能依靠英国所采取的那样类似的政策。

这里我们确实已经击中了要害。法国的疑虑除了由于当时法国内部虚弱和赖伐尔天性多变以及它对英德海军协定不满以外,多半是由于英国一贯不愿承担义务,特别是不愿对付臆想中的意外事故。这种犹豫不决就是我们在阿比西尼亚遭到可耻的失败以后又在连续的危机中节节败退的原因之一。

9月27日,又是在议会开会之前,我联名写信给赖伐尔先生,在信上签名的有许多代表广大英国舆论界和很多团体的重要人物。它包括六或七位保守党议员,以及大学、教会和英国社会其他方面的许多代表。这封信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这个集体原则不仅必须适用于制止侵略一个非洲的弱国,它必须同样地适用于防止或制止在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侵略。我们知道这就是广大英国人民的决心。

如果英国政府真正下定决心继续贯彻霍尔的日内瓦宣言,这样的支持就会给他们以鼓励。议会面临着就要被解散的前景,给10月的议会辩论投下了暗影,可是执政党前座议员却没有说出任何给我们泼冷水或引起我们怀疑的话。在经济制裁生效以前外交大臣应邀赴意大利以达成体面的协议,这并不是不合情理的,也决不是表示退却。因为国联理事会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寻求一个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而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着的。霍尔确实表示过并没有跟法国人讨论军事制裁问题,然而我们却自然而然地设想,舰队

的调动一定是得到法国的同意和赞许才进行的。因此选举开始之后使我有点吃惊的是，劳合·乔治不仅攻击政府利用国际危机来赢得选举的胜利以继续执政，而且发出警告，政府不会坚持执行看来已经是确定了方针。他抱怨自从阿比西尼亚第一次向国联求助以来，问题长期拖延不得解决，从而使墨索里尼能够集中兵力进攻阿比西尼亚而没有受到任何干涉。甚至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周以后，执行制裁的日期也还没有定下来。自由党人支持政府；工党甘冒内部分裂的危险，甚至更换了领袖，以支持国联。但是政府却似乎踌躇不决。他对制裁又加上了一句尖刻的话。“制裁太晚了，救不了阿比西尼亚，却正在关键时刻救了政府。”这句话使我困惑；但并不过分。保守党的宣言是明确的。领袖们作出了保证。而且，我也知道，艾登正在竭力鼓动国联的其他成员国在日内瓦程序许可的情况下尽快促使采取有效行动。我不能相信这种责难，即政府仅仅是为了竞选的目的而利用这种危机。无论如何，我已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决不放弃我要求选民支持的那个政策。

在斯托克顿举行的选举是沿着我那时已经熟悉的路线进行的。我的竞选演说只是“未来五年”计划的摘要。我散发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其中包括当地和全国各方面知名的自由党人的来信。我们经常在学校教室里和几个可供使用的会堂里开会，也经常发生争吵。在赶来发表演说支持我的外地人士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要算艾伦勋爵了。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在楼上一间挤满了人的房间里召开的一次会议，也不会忘记他发表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演说。他是一位伟大的讲坛演说家：漂亮的脑袋，奇妙超俗的神态，精选 431 简炼的词句滔滔不绝。他对我在政治上所做的工作大加颂扬：

他本来是可以博得党的正常的称赞的。他本来是可以干出一番事业，获得荣誉和舒适生活的；但他相反却一直坚持要对我们国家整个政治生活做出独立的贡献。

他表现得很勇敢，百折不挠，而在他表达自己的见解时所表现的那种谦和尤为突出，这一点现在正开始博得全国人民的爱戴。

演说一开始就不断为“卖国贼麦克唐纳”以及类似的喊声所打断。但在结束时他使听众着了迷，他抓住了听众。

对于一个候选人来说，每次选举都是一次强迫苦役。幸而选举的时期不长。每天晚上在日历上把这一天划掉就感到轻快。到了投票那一天，人已经精疲力尽，简直顾不得选举结果了。投票前夕集会以后，我的支持者组织一次穿镇游行已经成为惯例了。这一年的游行看来比以前更加热烈。幸而在我们和我们的对手之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冲突。我只担心一件事。我在竞选中只是吁请投票人运用理智，我没有把握我是否能够把我试图处理的那些复杂问题解释得足够简明。这次选举的结果还是良好的。各政党得票数字是：保守党二万三千二百八十五票，工党一万九千二百七十七票，自由党五千一百五十八票。我以四千票的多数超过了劳伦斯女士，而自由党人却丧失了老本。因此很明显，我不仅获得了保守党的票，而且还得到了自由党和温和派的大量选票。我在第二天发表的一项声明中用了以下的词句：

我已要求选民给我比以往更慷慨的授权。如果仅仅作为政府的一位支持者而当选，那我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尽管我对政府在过去四年里为从商业萧条中恢复过来做了不少工作而予以高度评价。

我要特别感谢选民们给了我以特权。

当地的报刊采取了同一个调子，强调指出我的独立的竞选运动。他们把劳伦斯女士的失败描绘为“对社会主义者的残酷打击”。另一方面，大城市的几家报纸却把我的胜利看作是“政府的巨大成功”，这⁴³²不免使我感到有趣。我至今仍然不能肯定这是否完全代表官方的看法。不过，这证明经济萧条地区的选民跟社会主义结合得并不是那么紧密，以至不愿去听那种有道理的论点。

大选的结果是通过对鲍德温及其政府的信任案。保守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自由党国家派和工党国家派赢得了四百三十二席，而在议会解散以前是五百十二席，大选使政府获得了二百四十九票的多数。尽管工党的阵地有所恢复，席位由 1931 年的五十二席增至一百五十四席，对于象莫里森、克莱因斯、亚历山大和多尔顿这样一些重要人物当选也感到满足，可是他们仍然处于毫无希望的少数派的地位。参加政府的自由党塞缪尔派下降到二十席。赫伯特·塞缪尔本人失去了达温的席位。

不管劳合·乔治的竞选运动对总政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在新的下院得到什么东西。政府拒绝接受他的计划，也没有表示要和他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另一方面，选举之前人们纷纷议论丘吉尔将重新在政府中任职。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拒绝考虑吸收劳合·乔治入阁这样一个事实好象他们准备接纳丘吉尔。下院普遍认为他将被安排担任海军大臣。劳合·乔治对这一点是怀疑的，他曾对汤姆·琼斯说，本届政府中所有成员“都会投票反对他人阁，因为他具有超人的智力和经验”。^① 鲍德温早在 5 月就确实和道森讨论过这个问题。丘吉尔自己也描述过当时甚嚣尘上的他将被邀入阁的谣言。“但是当鲍德温先生获得胜利的数字公布之后，他立即通过总部宣布无意邀我参加政府。”^② 因此下院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仍将留在后座。平庸的人们却占据最高的统治地位。

在竞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激烈的竞选争夺中——人们几乎没有时间仔细聆听领导人的演说。每一分钟都用于争取选票，⁴³³ 进行个人接触，参加室内和户外的会议。但是在保守党宣言公布后，我很高兴地看到保守党至少在外交上没有犹豫不决，并增强

① 托马斯·琼斯：《日记和信件，1931—1950》，第 351 页。

②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 141 页。

了外交大臣在日内瓦所作的历史性演说的作用。国际联盟将“仍然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拱心石……因此在目前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的不幸争执中，我们要继续尽力之所能支持国联盟约。我们迄今所奉行的政策决不会有所动摇。”

关于重整军备，全国人民对此并不怀疑，——至少工党发言人是这样的。艾德礼对于需要一项“庞大而耗费巨大的计划”加以嘲笑。阿瑟·格林伍德谴责内维尔·张伯伦是个“十足的恐怖贩子”。莫里森把张伯伦、丘吉尔和艾默里叫作“好战分子和军国主义者……(张伯伦)宁愿在死亡的手段上花钱，而不愿在生存的手段上花钱。”^①当然，在反对党的脑子里毫无疑问知道政府的意图是什么。鲍德温清楚地表示必须有一个扎扎实实的计划。他在对和平协会的演说中以及他在广播中，确实再一次向听众保证“不会有庞大的军备”。^②但是据我看，这些话并没有减弱他为适应我们的需要和世界混乱而危险的局势的需要而要有一个军备计划的决心。他在好几次演说中都强调需要有海军和空军，又强调指出我们在裁军而别的国家却在重新武装这一事实。我们现在知道内维尔·张伯伦本来是想把重整军备作为主要问题来竞选，而且在8月曾向鲍德温提出了这项建议。可是鲍德温一方面提出在目前国际危机中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来进行选举，另一方面却更愿意强调对国联的支持，并为重整军备辩护，认为要使集体安全制度有效这是必须的。在选定选举时间这一问题上，艾登有些疑虑。他本来是想采取另一个计划的。首相应当召集各党领袖们，向他们

434 阐明在目前情况下重整军备的必要性，并吁请他们协助。如果他们愿意给予合理的支持，选举就可以延期举行。他甚至对霍尔说，他认为“利用紧张局势而得到多数人投票的选举策略”，在某些人

① 伊恩·麦克劳德：《内维尔·张伯伦》，第184页。

② A. W. 鲍德温：《我的父亲：真实的故事》（伦敦，1956），第242页。

看来可能是“一种卑鄙的伎俩”。^①但是鲍德温毫不怀疑政府所采取的进攻范围是在策略上经过精选的，而选举的结果也证明了他的精明。当然，我们当时对这一点是完全不知道的。我自己还觉得政府完全有理由要求选民授权，使它能执行支持国联的政策，坚持反对墨索里尼侵略的坚决立场，以及执行重整军备的计划，使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作用，并抵制独裁者日益增长的狂妄气焰。

事实证明，鲍德温的办法是诡诈的。他的演说是经过精心设计以迎合各种不同意见的。他说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不会采取单独行动。这使懦夫们得到宽慰。他又说不会有很大军备；这使反军国主义者感到满意。我们一定要坚决支持国联；这跟霍尔在日内瓦的讲话一起捞得国际联盟的票数。在这危急的日子里政府必须充分注意外交事务并保证得到国民的支持；这就说明进行选举是正当的了。艾默里曾经公开反对政府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的行动，并认为把墨索里尼推向希特勒的怀抱是愚蠢的。他对鲍德温的策略表示了他的颇为轻蔑的看法：

……调子喊得比联合到一起的反对派都高，扮演集体安全的真正战士在
一阵正直的义愤浪潮中重新执政。这种诱惑是无法抵抗的。^②

我认为这种评价太苛刻了。艾默里看问题既清楚又客观。但鲍德温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肯定觉得自己的阵地已经加强了，足以抵御任何真正的战争危险。象米考伯^③先生一样，他希望时来运转。不管怎样，关心国联是否起作用是正确的。重整军备是正确的。因此仔细推敲字眼，算计着以后采取何种行动方针似乎较为适宜，这样争取继续执政是正确的。

同时，尽管丘吉尔怀疑在他看到的已迫在眉睫的一场更大的 435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280页。

② L. S. 艾默里：《我的政治生涯》，卷三：《无情的岁月，1929—1940》，第170页。

③ 米考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译者

危机中迫使意大利站到错误一方去是否明智，他还是团结在一项还算清楚而又明确的政策那一方面。但是曾经表示过同样怀疑的艾默里却继续批评国联的弱点，并且相当坦率而又坚定地说出了他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政策。他10月在伯明翰的演说曾遭到内维尔·张伯伦的驳斥，张伯伦把他的演说说成是“对现实恶意的歪曲”。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要么我们在日内瓦为和平与安全尽最后的努力，要么我们就胆怯地投降，那样我们将违背自己的诺言，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引以为耻。”^① 这些语言是激烈的，而且是出自张伯伦——他说话用词一向谨慎小心——这就使所有怀疑的人哑口无言了。

但是如果说政府由于巧妙地选择了选举时间——政府完全有权利这样做——而获得了一次重大的选举胜利，他们在道义上必须贯彻——尽管时而出现某些保留意见的言词——人们相信是他们明确而坚定的意图——制止墨索里尼。到了11月下院开会时，议会内外就没有人怀疑这是他们的坚定目的了。

^① L. S. 艾默里：《我的政治生涯》，卷三：《无情的岁月，1929—1940》，第175页。

第十五章 疑虑和迷乱

436

当议会于1935年12月3日开会时，议员们的心情是平静的，甚至是低沉的。尽管政党之争不免尖酸刻薄，但是选举显示出罕见的基本一致。除了极端和平主义者——他们的观点为工党绝大多数党员所断然抵制——以外，其他人一般地甚至热情地赞赏政府对当时的紧急问题阿比西尼亚危机所采取的方针。回想起来，霍尔9月11日著名的演说博得的压倒多数的支持，很清楚是由许多不同的意见和动机临时而且几乎是偶然地凑到一起所形成的。

首相和他的主要同僚急于得到加强国防的权力。无人能够否认，要英国在集体安全制度中充分发挥其作用，至少某种程度的重整军备是必要的。鲍德温后来在一次有名的演说中曾解释过，他认为一项为时已晚的重整军备计划，很明显至少可以获得全国默认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在摸清全国舆论动向方面，谁也没有他敏感了。作为身负重任的首相，一旦他的计划孕育成熟，他有责任不仅讲明重整军备的必要，而且应保证它在议会内外在广泛的赞同下能够有效地去实现。尽管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人用过甚其辞的话攻击他，制造了非常荒诞的所谓他的“检讨”——说他自己为了选举的目的长时间隐瞒了重整军备的必要，虽然他完全意识到了它的迫切性——这些断言来源于曲解他的言论。总之，鲍德温在1935年看到了墨索里尼残酷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机会，这在一两
437

年前是不存在的。因此，作为一个讲求实效的政治家，不管他如何怀疑国际联盟的政策最后能否成功，他还是乐于抓住这个机会，在不引起过分分裂的情况下扩充并改进战斗部队。他把适应我们国

防需要的现实主义态度和为支持国际联盟的集体力量而产生的理想主义的高涨热情结合起来，希望能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完成重整军备。

别的人愿意支持他可能是由于一些不同的理由。丘吉尔以及那些想法与他一致的人把国际联盟及其机构看作是一种确保欧洲联合反对希特勒的工具，他们知道希特勒对世界和平的危险远远大于墨索里尼。一旦试图使意大利在这场迫在眉睫的斗争中站在我们一边的政策证明是不可能的，他们就满足于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国内进行必要的重整军备，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团体，在英法的领导下抵抗他们预见到的更大的危险。此外，他们还希望用这种政策能最不费力地得到美国的同情，最终得到它的帮助。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可称为热心支持国联的人在赛西尔勋爵和强大的国际联盟协会的领导下，呼吁全国中间和非党派人士的舆论，同意外交大臣的政策回到——可能是晚了一点，但仍然是受欢迎的——国联盟约的纯正原则上来。

其次，有些极端忠于帝国而较少关心或了解欧洲的人把墨索里尼想要吞并阿比西尼亚看做是对英国在非洲——索马里、肯尼亚和苏丹——的利益的威胁。此外，意大利不断增长的扩张是对英帝国地中海生命线的威胁。这个集团虽然不大，却很有影响。它的领袖是《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结果，那家报纸后来成为所有热衷于“绥靖政策”者当中最富灾难性的热心者，这一回却全力支持霍尔，只要他遵循他9月的方针就行，而当他放弃这个方针时，就猛烈批评他。

438

最后，政府反对公然侵略的立场受到一些广大群众的欢迎，他们即使模糊地但的确认识到了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也认识到英国长期以来是寄希望于国联的，更认识到如果国联不能制止象墨索里尼这样一个二等独裁者，要依靠它去制止希特勒那就更不

可能了。可是为了团结起来抵抗日益增长的德国威胁,我们必须指望国联,而国联是在英国的、人们也期望要在法国的领导之下来加以巩固、加强和促进。我们所能采取的办法或者是孤立主义,但由于我们有世界范围的帝国利益,这一办法不能拯救我们;或者就是恢复地区性联盟和巨大的军备。而按照当时公认的历史判断看来,这种作法是造成了世界大战那种紧张的原因,而不是其症状。

因此,面对 1935 年议会的那届政府,其道义和政治上的地位都超过任何一届政府。首相的威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人们普遍信任他。他处于宝塔的顶端。然而政治上的变迁就是这样奇怪,新议会开会后不多几天他的地位就动摇得很厉害,似乎站不住脚,更不用说恢复以前的稳定了。他在下院突然失去了威信。他好象差不多害怕下院了。他很虚弱,为自己辩护,几乎丧失了信心。但是在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之前,由于他巧妙地处理了终于导致国王爱德华八世逊位的国内和帝国的严重危机,他命中注定恢复了大部分失去的地位。

这样议会就在平静的气氛中开会了。12月3日宣读了国王的演说辞。接着在既不兴奋又不激动的情况下对这个演说进行了传统的辩论。关于国内事务那一部分的辩论是反复讲述一些陈旧论题和重复议员们在竞选演说讲坛上的讲话的好机会。12月5日辩论外交事务,对裁军问题、中国问题和埃及问题进行了一些杂乱无章的讨论。在讨论了这些题目之后,外交大臣霍尔仅仅用低沉的声调再次说明国联关于阿比西尼亚问题的政策,并叙述了目前执行制裁的情况。他在讲话快要结束时向墨索里尼及其同胞呼吁,不要怀疑我们支持国联的动机是邪恶的。他以为仍应尽力以求解决问题。“把意大利、阿比西尼亚和国际联盟各不相同的目的调合起来”。^①他还继续说:“法国人和我们不仅打算继续努力,而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5年12月5日。

且还想在日内瓦会议前还有的短时期内加倍努力。”^① 随后奥斯汀·张伯伦讲了一些一般支持的话,但他又补充说,他希望能说服国联和它的成员国迅速对石油出口实施禁运。他说这是一个既迅速又有效的制裁办法。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于12月5日,没有引起议员们特殊的兴趣,更不用说引起怀疑了。12月6日是星期五,继续辩论农业、失业等各方面的问題。接着议员们分散各地,去度周末去了,预计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回来,既不兴奋又不激动,参加最后阶段的会议,对反对党各项修正案进行正式表决。可是,当我们回来时,我们发现自己突然投身到最不寻常的议会戏剧之中,仅仅在两周内就使政府为了保存自己被迫牺牲了它的外交大臣,否定了他的行动。

霍尔—赖伐尔协定这样的奇怪事件现在已成为历史陈迹了。主要当事者和真正的牺牲者霍尔庄严地、令人信服地叙述了他自己的经历。^②作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的艾登,其地位特别微妙,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③从这些材料和其他资料中可对这段古怪的插曲构成一幅相当完整的图画。当时那些不了解内幕的人当然不知道霍尔为什么突然改变态度,向赖伐尔投降,并背叛了我们直到最近一直非常明确地保证过的政策。与此同时,我们几乎被公众的反应弄得不知所措:先是感到茫然,然后感到耻辱和愤怒。艾登告诉我们,在霍尔动身去巴黎之前他曾警告他的同仁要防备赖伐尔。440 他最近在日内瓦对赖伐尔的狡猾方式确实有一些痛苦的经验。霍尔回答说他无需担忧:“我不会做任何使你承担责任的事。”^④然而这正是霍尔有意或无意做成的事情。霍尔在下院作了成功而令人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5年12月5日。

② 坦普尔·伍德子爵:《苦恼的九年》,第十三、十四章。

③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十六章。

④ 同上书,第298页。

欣慰的演说两天以后,即 12 月 7 日就去瑞士度假溜冰。他的健康状况很坏,急需休息。很不幸,他同意在巴黎停留下来,和赖伐尔进行会谈。外交部常务次官范西塔特和他一起参加了会谈。范西塔特如此恐惧德国,以至他急欲帮助法国,并阻止意大利最后陷到德国那个阵营里去。到 12 月 8 日下午,赖伐尔和霍尔策划了一个可能解决阿比西尼亚问题的方案。这个方案跟格兰迪与范西塔特在 12 月 3、4、5 日会谈中所提的建议大体一致。这个方案实际上把阿比西尼亚的三分之二交给意大利控制。作为交换条件,阿比西尼亚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获得一条通向出海口阿萨布的走廊。然而由于阿比西尼亚即使沿着走廊修建一条铁路是否能够获准还不清楚,这项建议几天之后就受到《泰晤士报》毁灭性讽刺的猛烈攻击,被称为一条“骆驼走廊”。不幸在赖伐尔的高压下霍尔不仅同意而且草签了这一方案。这样做范西塔特是断不会同意的。同时霍尔同意了一项公报,这个公报明确声明,虽然双方同意了一项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的准则,但是不能发表,因为还没有把它的条款向英国政府汇报。这真是天真的期望。如同在这种场合下具有一般程序经验的人都会设想到的,这件事在当天晚上就泄露给新闻界了。第二天即 12 月 9 日早上,法国报纸相当精确地报道了会谈提出的条件。艾登直到 12 月 9 日上午才在外交部收到由莫里斯·彼德森从巴黎带回来的正式文本,莫里斯·彼德森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和他的法国对手 M. 德圣康坦商讨一项解决办法的可能性。范西塔特仍然留在巴黎,设法和赖伐尔共同解决未了事宜。由于他知道电话不安全,他不能对艾登说什么。霍尔消失在开往瑞士的火车中,与外界断绝联系许多小时。法国报纸泄露出来的事情当然立即就被英国报纸转载过去了。晚报上刊登了一些情况,当然在 12 月 10 日即星期二报纸的头条新闻上刊载了全部真相。

因此，内阁处境非常为难。它不得不迅速做出决定。因霍尔在火车上，无法和他联系；但他在离开巴黎前曾打电报给他的同僚，要求他们赞同他的方案。所以内阁要么必须支持他们的外交大臣，要么就是否定他。但是他不在场，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法。这就难怪内阁成员推测他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了。或许他已发现赖伐尔决定要打退堂鼓。或许当我们在地中海处于困难时法国人拒绝继续实行制裁或对我们进行军事援助。可能是霍尔感到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自己和墨索里尼开战。总之，他不在场，他不能解释或为他的决定进行辩护。鲍德温出于好心，并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因而没有召他回国。鲍德温后来感到，在这一点上自己犯了严重错误。^①但是不管怎样，霍尔星期一到达瑞士，星期二——决定性的一天——他第一次去溜冰场就摔伤了鼻子。^②即使鲍德温召他回国，他至少两天内不能动身。^③但我怀疑他回来不回来能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一经同意了赖伐尔的这些建议，那就造成了真正的危险。赖伐尔已经让霍尔签了字，他不可能让霍尔和他的同僚们脱钩。如果我们当时就象我们最后所做的那样否定了这一方案，赖伐尔也同样会拒绝扩大制裁范围，特别是有关石油的制裁。

12月10日即星期三，在议员质询的时间我正在下院。报纸
442 上刊登了耸人听闻而又相当准确的关于霍尔—赖伐尔交易的报道。领导反对党的艾德礼很自然地向前首相提出了秘密情报的质问。鲍德温处于最难堪的地位。内阁也是第一次知道霍尔在前一天所做的事。内阁会议于下午6点举行。但是对议会却没有可以奉告。在艾登的压力下大臣们决定至少应把霍尔—赖伐尔协

① A. W. 鲍德温：《我的父亲：真实的故事》，第290页。

②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303页。

③ 坦普尔·伍德子爵：《苦恼的九年》，第184页。

定的条款立即同时通知罗马和亚的斯亚贝巴。但是他们几乎不能在外交大臣不在的情况下抛弃他。因此艾登受命向两国首都“介绍”计划中的协定。霍尔没有被召回国，似乎有一线模糊的希望，即在向国联报告这项建议时，其内容总可能有所改进。^①而这些事首相一点也不能透露。因此他十分自然地尽力回避问题，说他没有检查报纸上的报道，而消息确实有所泄露。他心神不安而且表现了出来。（我现在比当时更能同情他。）他仍然不很知道有关霍尔—赖伐尔方案计划中的程序，内阁还没有作出决定。在艾德礼和辛克莱提出许多问题以后，鲍德温只能重复说，任何计划都必须得到国际联盟、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三方面的同意。由于对国王开幕词的辩论尚未结束，政府无法避免一场立即进行的讨论。原来商定在当天下午7点30分左右就自由党提出的对国王开幕词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紧接着就对当时所能了解的形势进行了一场短促而紧张的讨论。我从头至尾听完了这场讨论。我记得我非常同情艾登，他被迫回答利斯—史密斯代表反对党提出的一些尖锐问题。他情绪很好，非常冷静，设法在二十分钟以内使正在增长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但是他只能重复说，国联理事会曾要求法国和英国寻求一项谈判的基础，这项要求是在国联全体成员国完全了解并且十分赞成的情况下提出的。他说报纸上发表的霍尔—赖伐尔协定的说法有一些不准确和非常不准确的地方。他声称下一步将采取什么程序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强调说这些建议并不一定代表英国或法国政府的观点，它仅仅是一项可能有用的建议。他就是这样尽力把整个事态缩小了。回顾这件事，当我们现在知道他当时所经受的困难时，感到他的行为确实值得赞叹。因为除了这些等于完全向侵略者出卖的建议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以外，赖伐尔还坚持把建议通知墨索里尼，但不要通知阿比西尼亚皇帝。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304页。

换言之，就是应该通知罪犯而不通知受害者。赖伐尔想走得还要远。他威胁说，如果我们坚持要告诉阿比西尼亚人，他就要我们同意放弃任何石油制裁问题。霍尔不在国内，艾登必须承担这一切压力，他在不完全了解霍尔讲过什么话的情况下，对赖伐尔作了坚定的回答。但是艾登一定会因为那个勒索者迅速地开始使用那种已经坦率地交给他的权力而感到震惊。当然，这一切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一定增加了艾登的负担，对这个负担他却非常愉快而勇敢地公开承担起来了。继艾登之后还有许多人讲话；可是下院如此混乱，人们愈来愈不能听下去了。大家都在等待首相回答问题。大约9点3刻他站起来了。由于已经商定在10点终止辩论，他巧妙地尽量给自己留下最少的时间。反对党已经宣布，他们将一反常规，投票反对国王开幕词。尽管不承认这是对国王无礼，但它却是“对似乎可能发生的可怕的犯罪行为”提出抗议的唯一手段。^①

鲍德温尽了最大的力量。他宣称“我的嘴巴还没有启封。假若这些困难过去，我要申述，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人到议会投票厅投票反对我们。”^②那时和后来都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认为他指的是英国舰队的虚弱。有的人认为是指赖伐尔和墨索里尼商妥了全部计划蓄意出卖他的英国盟友。据鲍德温的儿子说，鲍德温的意思是他在道义上确信赖伐尔已被墨索里尼收买，但是他不能直截了当地这么说。^③他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其余时间消磨掉，他只能一般地从哲学观点思考国联的困难，形势的复杂，战争的危险，以及人性的弱点。我们都要从经验中汲取教训。艾登第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5年12月10日。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5年12月10日。鲍德温在1933年11月另一篇文章里曾引用了“嘴上贴封条”这句话。许多人还记得著名漫画家洛利用这句话作画——鲍德温总是被画成嘴巴上交叉贴着两片橡皮膏。

③ A. W. 鲍德温：《我的父亲：真实的故事》，第291页。

二天将到日内瓦去，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将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事情办得不很好；但这是在条件许可下所能尽力做到的。他在结束时干巴巴地说，他希望立即表决，以便政府能结束关于铁路资金法案的财政决议的委员会审查阶段，希望“在我们急欲体会过圣诞节之前”完成这项程序。^① 鲍德温在这方面的希望太一厢情愿了。在体会过圣诞节之前，政府支持者的普遍反抗和空前规模的舆论高潮迫使政府全线退却，并在仓皇溃退中抛弃了外交大臣。

首先决定在霍尔不在国内时艾登应尽力掌握形势。赖伐尔继续进行威胁。他似乎确信墨索里尼将接受所建议的条件，而阿比西尼亚皇帝将拒绝接受。因此他再次要求英法约定，如果阿比西尼亚不接受建议就不实施石油制裁。艾登说服了内阁，使内阁相信这是一项不可能办到的要求，唯一能够做的事是到日内瓦去，采取问题完全由国联自己解决的方针。虽然最初鲍德温出于对同僚的忠诚，决定顶着风暴前进，可是几天以后压力变得不可抗拒了。全国各地的批评越来越厉害。《泰晤士报》以一系列讽刺性社论带头攻击；而道森竟然反对鲍得温，这的确就象布鲁特斯反对凯撒一样。如果这场风暴仅限于畅言无忌的少数左翼批评家或国联的狂热支持者，政府无疑是能够平安渡过的。一天一天过去，情况变得清楚了，下院内外的政府支持者开始是迷惑不解，然后就是愤慨，最后燃起了真正愤怒的烈火。到了周末，艾登在日内瓦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在并没有否认亲子关系的情况下，对待他们的孩子不是慈爱，甚至是厌恶。在周末期间，包括星期一即12月16日在内，当霍尔回国时，受人指使的报纸刊登消息说，内阁将应付挑战，支持外交大臣。内阁的一些年轻成员——沃尔特·埃利奥特、奥利弗·斯坦利、奥姆斯比—戈尔和其他一些人（内维尔·张伯伦轻蔑地把他们叫做“儿童团”）——正在逼迫霍尔辞职。他们好象和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5年12月10日。

《泰晤士报》有密切联系，该报的新闻栏以及评论栏都登载了煽动性的内容。直到星期二即12月7日，鲍德温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但是党内的造反太过火了。那种激烈程度只有后来的慕尼黑事件发生以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情况可以与之相比。政治观点通常有分歧的那些保守党议员，这一回愤怒地汇合到一起来了。工党提出了一项动议，根据这项动议要进行辩论，要求否定霍尔—赖伐尔协定的条款。实际上大家都同意这一动议。可是在我们这一方面却在努力寻求各种别的方式。最有名的是我与之有联系的以斯皮尔斯将军及其他人的名义为代表的组织，在第一批签名人当中包括了不同观点的议员。由于当时坏习惯的影响，我写了一封信给《泰晤士报》。这里我不禁要引述几段：

446

先生，考虑一下首相新外交政策受到的有限支持这一特点，确实一定会使他恼火的。下院站在政府一边的许多议员公开造了反；更多的议员感到焦急和担忧；仅有的全心全意支持者却来自六年来一贯坚定地同鲍德温先生的主要政策斗争并暗中破坏他的领导地位的人们……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和半官方的辩护士们预测将发生一场辩论，在辩论中首相将被迫串演《匹克威克外传》中胖孩子^①这样的滑稽角色，他们还用种种悲哀的、具有凶兆的预言使我们不寒而栗。人们暗示我们头脑单纯的代表们已成为狡猾的法国人奸计的受害者；法国政府已拒绝进行进一步的制裁，特别是石油制裁，并且拒绝给予海军援助，如果英国和国联离开法国独自行动的话；最后，有人暗示说，意大利军队可能以势不可挡的灾难威胁英帝国全部严阵以待的战斗力量。

……可能我们确须应付目前这种形式的国联的失败或瓦解；可是我们却毫无理由去帮助削弱几星期以前国家授权我们支持的那个组织。

我从未参加过被谋杀的人的葬礼；但是我以为在这种葬礼上要把送葬人和凶手区别开来。

① 胖孩子是狄更斯小说中人物，除吃睡外，无所事事。——译者

这封信于12月18日发表,其他的报纸也广为转载或引用,这是与惯例相反的。

激动不安继续增长。支持政府的议员对选举后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早感到无法适应。如果这场危机发生在三年或四年以后,议员们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找到一些为形势变化辩护的理由,这样说法决不是讽刺。可是他们竞选讲演的余音犹在缭绕呢。他们还记得忠于国联和集体安全的那些声明,就是用这些声明他们赢得了选民的支持。许多最可靠、最受人尊敬的政府支持者感到受了污辱。他们受骗了;假使他们现在听从党的命令,他们自己会觉得因欺骗了投票支持他们的人而犯了罪。

关键的一天是星期二,即12月17日,和通常一样最受尊敬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奥斯汀·张伯伦——他本人就是以前的外交大臣——给予最后一击。在外交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事实上这是一次保守党所有后座议员参加的会议,他在讲话中表达了普遍的看法,他说,“绅士们是不这样行事的”。这样就解决问题了。霍尔⁴⁴⁷被迫辞职,几天以后艾登被任命接替他的职务。艾登不急于接替他。他认为恢复原来形势的唯一办法是奥斯汀·张伯伦再任外交大臣。他把这个看法坦率地对鲍德温说了。可是鲍德温回答说,奥斯汀太老了,而且他也这样告诉他了。奥斯汀·张伯伦第二天告诉艾登说,他自己对那次谈话的看法是“鲍德温说我老糊涂了。”^①他可能是老糊涂了。但是他决定了霍尔的命运,由于他的干预,保守党的督导员相信这场运动已经结束了。直到辩论的前一天,人们预料霍尔将在专用席上以外交大臣的身份为自己辩护。12月18日是星期三,夜间很晚的时候才正式宣布他的辞职。不管是否正确,议会内外的民主程序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利。公众很少干涉议会的形势;但是只要干预的话,其威力一般说来是决定性的。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316页。

政府决心抛弃其外交大臣并可能放弃其政策这一声明，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辩论的全部性质。如果他们坚持对抗，没有疑问他们会遭到他们队伍内部一定程度的反对，而这种反对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生存。我们那位很有能力的督导员戴维·马杰森依靠魅力和军事化纪律相结合来统治党，他不抱任何幻想。掌握这么大的多数，当然可以进行许多冒险。如果投票时弃权或投反对票的危险仅限于象我和我的某些朋友这样的少数怪人，他是会冒这种险的。但是当焦虑甚至是愤怒传播到政党的中央机关时，那就除了让步之外别无他法了。异口同声要求废弃霍尔—赖伐尔协议的各种修正案上的人名，清清楚楚地装在党的督导员的脑子里。党的左、中、右翼都同样被惊动了。只有那些反对国联的全部观念的少数人兴高彩烈。倒霉的萨姆·霍尔已经回到了英国，但由于那一场意外事故碰伤了鼻子，他仍然不能离开卧室，但是必须通知他，为了慎重，如果不是为了正义的话，需要他做牺牲品。和通常一样，被丘吉尔描绘为“担负国家大事的驮马”的内维尔·张伯伦被派去执行这个任务。虽然这场辩论在结束时避免了一次由于表决不能确定而产生的骚动，但还是有戏剧意味的。为了挽回政府的面子，对工党提出的弹劾动议急急忙忙地泡制了一次“非官方的”但却是官方授意的修正案，记在温特顿勋爵的名下，他后来以他那无与伦比的风度提出了这项修正案。这样很清楚，全党将团结起来。在辩论开始之前，霍尔亲自做了解释。一般都认为他解释很庄严，又很成功。他当然拒绝了让他认错的建议，并坚持辞职而不愿放弃己见。由于内阁不会支持他，他决定以卸任大臣的身份来进行辩护，而他本来是应该以现任大臣的身份来辩护的。他在这一点上肯定是聪明的。他作了几乎长达三刻钟的演说，直率而且毫不后悔，为他的行为进行辩护。结果他成了当时最受人注目的人。他坚决拒绝认错或者后退。他的辩护是以战争危险作为

基础的，尤其是英国将单独作战。他以有力的语言指出：“没有任何其他成员国调动了一只船、一架飞机或一个人”。^①这与我们命令地中海的英国舰队采取预防措施以及增援埃及、马耳他和亚丁正好形成对照。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又太过分了。他的辩论归结起来是：制裁在相对无效的时候，那是保险的；一旦制裁开始有效，它就太危险了。

……迄今为止这种经济压力还没有使我们进入危险之中。现在我们既然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假使我不说明我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更为危险的阶段，那我就对议会不坦白。^①

以后发言的人赶紧抓住这一论点的根本性错误。温特顿勋爵的发言并没有使情况好一些，当时他宣称，“如果因实行石油制裁而引起了意大利的武装反抗，这就不符合政府在选举中所作的保证”。^①这肯定是不真实的。霍尔讲话坚定而有力，但是他的论证的逻辑和9月他在日内瓦的演讲以及受到国民热情支持的政府执行政策完全相反。他表现出他心里喜欢满足意大利人的政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开，如有必要的话，就牺牲阿比西尼亚。 449

那时霍尔本人如果说没有博得别人爱戴的话，却是一个受到尊敬的人。他始终证明是一个能干的大臣，虽然他那拘谨和颇为装腔作势的演说并不动人，但是他的实际行动却达到高度议会水平。在长期——将近四年——处理有关印度改革的建议时，他顶住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虽然面临着丘吉尔及其朋友们令人生畏而又持久的反对，但是他仍然以无限的耐心和极大的勇气使他的方案最后获得成功。在慕尼黑事件前后那个时期的后一阶段，他在理论和道德上都退化了，成了内维尔·张伯伦最坏的和最会拍马的顾问之一。但是在1935年12月，似乎很难想象他怎么会犯了如此严重的判断上和策略上的错误，以至在这样危险的一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5年12月19日。

个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正确的解释是，他有意或无意地奉行着一项两面政策，一方面是国际联盟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姑息意大利的政策。这样的两重性本身自相矛盾，是一定要导致灾难的。当他启程度假时健康状况的确不佳，不宜处理业务，特别是和赖伐尔这样的一个狡猾的家伙打交道。他在瑞士发生意外事故在时间上说是极为不幸的，因为这使他不能在风云开始紧急时立即回国。而且，由于霍尔为人谦虚，言行拘谨，因此连他的不幸人们也感到有点荒谬。一个中年的外交大臣本不应该溜冰了，而在这个特殊危机时刻，他竟选择这样的薄冰练习技巧，这就自然而然不断引起一些俏皮话了。

450 然而，每一个发言的人，不管对他的政策多么不满，都以议员对一个垮了台的大臣总是宽宏大量的态度对他表示同情，而这种同情决不是虚假的。我听完了辩论的绝大部分，而且还能记得这场辩论给我造成的印象。艾德礼在霍尔之后发言，他在那种情况下的任务是轻松的。他根据事实宣称，几乎整个下院都支持他那个动议的实质。他很快采纳了这个论点——制裁正在开始生效，而这正是制裁的目的。因此，为什么要放弃制裁呢？应该加强制裁。如果有危险的话，在执行这项政策以前就应该考虑。

接着是首相发言。在困难时他象往常一样，施展了他那卓越的“规避行动”的本领。首先，他把自己的讲话缩短了——大约半个小时。其次，他不打算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辩护。他从一些概念和个人的回忆讲起，主要是描绘政治的残酷性。他甚至追述了以前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他的朋友伊兹利勋爵就是突然摔倒在地，死在他的脚下的。他引述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当时写给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信中有点沉闷的言论，“政治是一种该死的行业”。（我记得我当时就认为这段轶事对霍尔来说，是颇不适当的，也是令他沮丧的。）接着他坦率承认，他对自己在这段插曲中

的行为是不满意的。他或许不应该在他的朋友健康欠佳时让他去巴黎进行一场艰难的谈判。联络中断了；他对那里的消息不很了解。尽管他的同僚有病，他应该立即把他从瑞士召回；这一点对他说来是判断上的错误。然后他继续说，自从大战以来滋长了各国外交大臣之间个人讨论的习惯，而不依靠通过大使来谈判的老规矩，他对这种做法的坏处进行了许多责难。他还继续说，他或他的同僚们一点也没有怀疑到他们会不忠于选举时所做的保证。然而，他承认这些建议太过分了。因此他对国内表现出来的感情并不感到惊讶；他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是出自良心和荣誉感的。⁴⁵¹

我知道我面临的时刻发生了某种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国人最深厚的感情，大家发表了一些意见，引起了内心的反应。我再次检查了我所做的一切，我觉得有了这种明显的感情，在这个国家里即使把这些建议作为谈判的条件，也不可能得到支持。我觉得不可能会有那么大的舆论力量，而政府的民主政治在处理象这么重要的问题时需要民众意见。^①

他又说（由于在这个论点上下院正变得有点难于控制了）：

现在情况非常清楚，这些建议是彻底和完全地死亡了。本届政府肯定不打算使它们复活。在谈了议会和全国的感情之后，我也许可以把这一点作为补充。当我知道我是正确的时候，如果发生风暴，我就让它来冲击我，我或者安然无恙，或者被冲倒。在检查了自己之后，如果我感到在风暴中有些情况表明，不管是怎样出于无意识，我做出了不明智或不正确的事情，那我就向它低头。^①

鲍德温再一次使用了他拿手的技巧。他“爽快承认”了错误。议会再一次接受了这一奇怪的辩解。辩论的其余部分尽管是高水平的，却在相当平静的气氛中进行。奥斯汀·张伯伦在他那严父般的发言中抓住了艾德礼在攻击首相时颇不明智地说过的的一句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5年12月19日。

话。艾德礼是这样说的，“你的荣誉处于存亡关头”。奥斯汀·张伯伦回答说，一旦说了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保守党员会弃权或投票反对政府。这是心怀忧虑的政府支持者在焦虑的时刻特别欢迎的一种事情。

在这么多年之后，没有必要去追述在那难忘的一天里所整理起来的全部论点。可是却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感情是在我们这方面的。尽管奥斯汀爵士为他的老同僚慷慨辩护，但这确实是一个
452 事关荣誉的问题。哈罗德·尼科尔森作了一次最有力的发言，他率直地说：他渡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怀疑他自己是否能在完全诚实的情况下保住议席。他断言，那些仅以微弱多数票当选的议员感到，如果在选举时宣布任何这一类政策，他们就不可能当选。假若不是霍尔辞职和鲍德温坦率地承认错误，他就认为正确的做法是用辞去自己议席的办法把他获得的授权归还于那些选举他的人。这个论题贯串于整个辩论之中。同样还出现了另外一个在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的论题。尽管大臣们发表了声明，尽管首相和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结束辩论时发了言，尽管继续存在许多不能肯定的事情，但是人们似乎日益怀疑国际联盟是否能经得起对它的权威所进行的打击。

一月一月地过去了，这些怀疑增加了。任命艾登代替霍尔为外交大臣，很受欢迎，特别是受到党内年轻议员的欢迎。我们对他的信任超过了对政府任何其他成员。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虽然由于保守党和公众成功的造反挽回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荣誉，但是我们在危机中的作用所受到的损害是无法弥补的。艾登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但是制裁政策逐渐消失了。石油制裁实际上从未实施过，即使实施那时也可能为时太晚了。在几个月以内，意大利的远征获得了成功。5月初，阿比西尼亚皇帝从亚的斯亚贝巴逃到了英国，过着高贵的流放生活。1936年5月9日，墨索里尼正

式宣布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并把阿比西尼亚皇帝的头衔转加到给人印象不深的意大利国王的头上。

三十年以后的今天，对当时看来似乎无法解释的政治阵线的变化作一个公平的估价是比较容易了。现在很清楚，霍尔的确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他被1935年9月自己在日内瓦的讲话所激起的热情程度吓了一跳。他也没有认识到，当时英国立即向地中海舰队进行给人深刻印象的增兵对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霍尔出自对德国的焦虑和只要可能就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开的决心，他把自己在日内瓦的讲话和我们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当作对墨索里尼的恐吓，另一方面当作对他的刺激，让他认真考虑五国委员会不久将提出的建议；而五国委员会的提议和霍尔—赖伐尔的建议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并无性质上的差异。^① 453

内维尔·张伯伦的作用不太清楚，可资印证的东西也是矛盾的。但是在11月和12月初，在力促实施石油制裁问题上，他与艾登非常一致，这一方面是为了要给美国人和德国人以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希望一个独裁者的失败将影响另一个独裁者。

艾登在日内瓦始终是支持继续前进的。他没有被墨索里尼的威胁所吓倒，也没有因马耳他或英国舰队可能遭受到“疯狗式”的袭击而惊慌失措。他不相信如果施行石油制裁，墨索里尼就会动手打仗。他认为墨索里尼很可能寻求某种退却的办法。

鲍德温认为大选的巨大收获是取得了重整军备的授权。他不打算做任何可能卷入战争的事情，因为他和别人一样知道我们国防上的弱点。他不打算对意大利冒险，同样，他后来也不准备因希特勒重新武装莱茵兰而对他冒摊牌的危险。他无疑牢记了这样的

^① 五国委员会是由国联理事会在9月初任命的，用来寻求解决阿比西尼亚问题的办法。英、法、西班牙、波兰和土耳其是成员国。西班牙代表德·马达里亚加先生被选为主席。

论点：鉴于来自日本的危险，我们担不起在地中海损失任何主力舰的风险。

情况也很清楚，内阁没有真正考虑霍尔—赖伐尔计划，在霍尔去巴黎之前肯定没有讨论这项计划。如果他们真正相信范西塔特在私下里和艾默里在公开场合极力主张的观点，当他们初次听到霍尔—赖伐尔建议时，他们就不会感到惊讶和厌烦了。同时，大臣们也一定会知道赖伐尔犹豫不决的态度。法意两国参谋人员之间在年初的秘密会谈，也为大家所熟知了。和意大利友好对法国军事力量的重大利益，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因此，象常常发生的那样，内阁可能两头落空。他们不愿继续前进，冒险找墨索里尼的麻烦，但他们又耻于后退，和他妥协。这个计划的讽刺性根本在于几乎可以肯定阿比西尼亚皇帝不会接受它；至于墨索里尼是否接受，甚至也不清楚。在秋季实行石油制裁本来可能成功，但是到年初意大利已有足够的物资至少可以用来发动一场短期的战争了。德国人很自然地采取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他们煞有介事地拒绝向意大利出口原料，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制裁政策一致的。他们无疑是在观望形势，然后动作。假如墨索里尼遭受了那怕是微小的挫折，假如更进一步墨索里尼被迫放弃对阿比西尼亚的冒险，毫无疑问会对希特勒的愿望有巨大的影响。几个月过去了，英法政策很明显失败了，希特勒与罗马保持接触，他无疑取得了墨索里尼的默许，重新武装莱茵兰，而这是违背他曾庄严保证要遵守的那个洛迦诺公约的。

或许值得追述的是，英法两国对阿比西尼亚战争进程的军事上的估计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意大利人至少在1937年春季以前是征服不了这个国家的，到那时，即使是比较温和的制裁也会影响意大利的经济。如果我们给了阿比西尼亚足够的武器，这一预测也许能够证实。即使如此，破坏作用比步枪和机枪还要更大的

是毒气的使用。由于阿比西尼亚人通常都是赤脚作战，毒气使他们遭受到极大的痛苦，由于毒气的灼伤使他们几乎无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只有投降。无论如何，决定性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等到专家委员会报告进一步的制裁时，重新武装莱茵兰已迫在眉睫了。在对意大利实施石油制裁达成任何决议之前，法国政府想了解英国对制裁德国将采取什么行动。这一更加迫近我国的严重危机对世界和平具有更大的威胁，因此在政府思想中占据了首要位置。亚的斯亚贝巴沦陷之后，人们认为最好尽快结束这一段悲惨的历史。 455

1935年底艾登继任的职位确实是一个倒霉的职位。他促使国际联盟委员会积极行动起来的一切努力都证明是毫无效果的。再早一些的时候，他在内阁中为实施石油制裁而激烈斗争，并在他后来发表的一份备忘录中表明了他的观点。如果他那时掌权的话，他可能更好地执行一项更强有力的政策。“到12月初，国联的绝大多数成员国都说，如果其他国家都同样行动，他们就支持禁运，而罗斯福总统也在设法对美国石油公司施加压力，使它们不增加对意大利的出口。”^①三十年后，他肯定了这一看法：

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一项坚定的政策会迫使墨索里尼以阿比西尼亚皇帝可能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如日内瓦五国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些条件。这就会不可估量地提高国联的威信，而且会成为对希特勒有益的警告。^②

如果不错过这一机会，世界事件的发展会有多么大的不同啊。事实上，阿比西尼亚崩溃的历史只是由于当时政府方面象它经常表现的那样缺乏决心，加以在两个相反的政策之间摇摆不定，而这两者本来都可能给我们带来安全的。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295页。

^② 同上书，第296页。

1936 年头几个月，艾登发现自己碰上了弗朗丹，此人既承继了赖伐尔的位置，又承继了他那自相矛盾的政策。这种局面很快就完结了，然而，即使是最后阶段也留下了特别不庄严的痕迹。6 月 10 日，内维尔·张伯伦在保守党政治俱乐部的讲话中把继续或加强制裁的政策说成是“疯狂到极点的……我不说它包含着战争，但是却包含着战争的风险，这还不显而易见吗？”这样一来，政府的政策似乎不是在下院由首相或外交大臣宣布，而是由财政大臣在 456 社交宴会上的讲话中宣布了。当时，张伯伦为他的过失向艾登道歉，而艾登以他那惯有的礼貌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保证。我们现在从张伯伦的日记中得知，他的行为是有意的。“我没有和安东尼·艾登商议，因为他肯定会要求我别把我的这些建议讲出来。”^①当然，这对下院的影响是爆炸性的。第二天，艾德礼就张伯伦的声明提出了“秘密通告”的质询，而首相无疑和别人同样地感到诧异，但他不得不尽力来摆脱困境。

6 月 18 日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艾登竭力为政府的决定辩护，并要求下院正视事实，即制裁未能达到原来所强加的目的。阿比西尼亚已被征服，抵抗几乎停止了。尽管形势是令人讨厌的而且的确是危险的，可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形势。另外一些甚至更加迫切的事情要求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加以注意。接着而来的是劳合·乔治令人难忘的而确实具有势不可当的攻击。虽然他拿艾登和他的前任作了对照，他说艾登的前任“在他的政策被抛弃时，还是体面地辞了职”，^②但他对待艾登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伤心。然后他加进一段尖锐讽刺霍尔的话，原来霍尔在几周前作了一次对首相献媚的讲话之后，被重新召回政府，当了海军大臣，这使许多政府的支持者感到非常讨厌。他这么说：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 296 页。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 年 6 月 18 日。

他（霍尔）确实曾一再保证，经过一段政治上孤立时期以后，他会东山再起的，而当他回来时，他发现风向是适合于一个哀声苦诉的小羊的。^①

劳合·乔治以他那最为可怕的腔调继续说了这样一些严厉的话：

我在议会里呆了将近半个世纪了……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英国大臣，他当前据有仅次于首相的最重要位置，来到下院说，英国被击败了，⁴⁵⁷英国和它的帝国被击败了，我们必须放弃我们已经承担了的事业。^①

他那最厉害的打击却留给了鲍德温。他引用了首相对和平协会的讲话：“让我们的目的坚定，步伐稳健而具有信心。”他继续说了这样一些具有毁灭作用的话：

这就是坚定的目的；这就是具有信心的步伐——逃跑……这个在选举前夕发表的讲话是向全世界保证我们要信守诺言。选举结束后仅仅几周，他们就违背自己的诺言去进行背信弃义的谈判。在这个火炬的后面排列着五十个国家。他们说，“英国首相带领着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在前进，我们要排成队伍紧跟在他的后面。”阿比西尼亚人相信这个讲话；我国大多数人民也相信它。政府承担这项重任不过几周，这个火炬就暗淡下来。今天晚上火炬熄灭了——唛的一声；这唛的一声将轰动整个世界。^①

凡是听到这个讲话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不寻常的力量和嘲笑，而这种力量和嘲笑又因在激动时他总是用起威尔士语调而来加强，特别是当说到“唛的一声”时。他在结束时话锋转向了内维尔·张伯伦，并引述了张伯伦的选举演说，还非难了张伯伦最近越权宣布了政府的外交政策。

财政大臣的演说已经被引用过了。我打算冒昧地再宣读它的一部分。这位令人十分尊敬的绅士是王权的继承人，而最近他一直在试戴王冠，看看是否合适。为他着想，我希望这顶王冠对他是不合适的。可是他不仅试戴了王冠，而且已经掌握了大权——这正是君主软弱无能时继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年6月18日。

承人所做的事情。这位十分令人尊敬的绅士在上次竞选时说：

“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或者我们在日内瓦为和平和安全尽最后一次努力，或者我们就胆怯投降，违背我们所作的全部诺言，使我们子子孙孙引以为耻。”

今晚我们已经胆怯投降了，懦夫就在这里。^①

记录上也提到了丘吉尔，他把这次演说称为一次空前的、最伟大的议会表演。这次演说肯定使下院政府大臣席陷入混乱。那一天首相似乎大为震惊。但是那时放弃这一事业展开的争论是很激烈的，当正式的不信任议案于6月23日提出时，整个保守党只有听从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摆布。西蒙受命进行主要答辩，他作了一个杰出的法庭辩护式的答辩，并捎带着引用劳合·乔治不由自主参与的倒霉的声明，这个声明宣称，这个国家的人民决不会为奥地利争端而准备打仗。这一危险而又完全离题的言论，表明了劳合·乔治某种程度的衰退和他对形势的理解。他在莱茵兰问题上的态度是软弱的。仅仅在几个月之后，他竟愚蠢到会见了希特勒，至少暂时他成了希特勒魅力的牺牲品。

然而，不管问题的必然结果会怎样，我觉得自己本人处于非常不幸的地位。我参加竞选，相信政府会下决心制止墨索里尼。但在国内事务方面，我是坚持自己的计划的，对于这个计划我要求充分的行动自由，我获得了选民对这个计划的支持。在外交事务问题上，我感到可以毫不犹豫地信赖政府坚定的保证。我那时真不知道我如何能够光荣地背叛那些投票支持我的人。我的最亲密朋友之一维维安·亚当斯也是一样。因此我们两个都采取了严重的步骤，我们不仅仅对不信任决议弃权，而且在反对党投票厅里投了票。在这种时候这样做，那就意味着人们必须至少暂时和执政党的机关脱离关系。对我向来是宽宏大量的督导员没有采取行动。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年6月18日。

这就确实是向我暗示，并不打算今后不再向我发布命令。可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由我自己作出决定是更体面一些。经过考虑之后，我给首相写了下面的这封信：

1936年6月29日

亲爱的首相，

鉴于6月23日即星期二外交事务辩论后我所投的票，特别是因为您对我个人多方照顾，我认为应该向您解释一下。

在上次大选时，我向我的选民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给予举国一致政府一般性支持的同时，我要用演说和投票的方式来推行我个人保证过的某些特殊政策。

在这困难时期，虽然我仍然支持举国一致政府，而且将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旧可能在执政党投票厅里看到我，但是在某些已经发生或似乎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上，我不能支持政府，而政府也许是有权期待从那些接受执政党命令的议员那里获得这种支持的。因此我想，如果不再把我看作是现政府的正式支持者之一，那或许就更好了。

您忠诚的

哈罗德·麦克米伦

对此我收到了下面的正式复函：

1936年7月7日

我亲爱的麦克米伦，

收到了您的来信，信中告诉我您感到不能再接受举国一致政府给执政党议员的命令。对于您认为有必要作出的这个决定，我感到遗憾。

您忠诚的

斯坦利·鲍德温

然而我的选民并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而是团结起来支持我。我在我的选区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当地的报纸描绘这次会议形成了“热烈的场面，这使人想起了在上次选举时宣布他当选为议员时的情景”。无论如何，我决不想对我的行动表示歉意，也不打算缩

小正在增长着的危险。为感谢他们在会议上对我的支持,我说:

据我看来,我们如何领导,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而且关系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未来,也就是这个社会的宗教、秩序、基督教义、进步、自由、和所有不因信仰及政党不同而人人所关心的东西,以及我们许多同志已经为之牺牲而现在我们中许多人愿意为之献身而感到光荣的东西。

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这些话似乎并没有夸张。

460 我收到了大量表示同情和赞许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或许是值得追述一下的。这是梅纳德·凯恩斯的来信,他以特有的同情说:

听说您现在拒绝接受执政党的命令了,我对此感到关切,但并不感到意外。我不知道这将怎样了结。如果您走得那么远,这或许意味着在内心里您正倾向于某些更为重要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可能没有什么不同,因而我很愿意有一天和您谈谈这个问题。

这以后我们之间讨论了多次,事实证明这些讨论在我旅途中的下一阶段——编写一本有关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巨著——是很有益处的。

为了把这一段史实说得完整一些,我或许应该补充一下:当鲍德温在1937年隐退,内维尔·张伯伦当了首相的时候,我又要求接受党的命令,这一要求很快就答应了。张伯伦乘机给我写了一封友好的信,内容如下:

我很高兴地从您的信中得知……您在希望保持保守党一贯给予党员个人的行动自由的同时,愿意重新接受执政党的命令。我同意您的看法,如果您加入政府正式支持者的队伍,您能够对我们诚心关注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将非常高兴地看到您再度厕身于政府支持者的行列。

根据我当时对他的了解,我相信他将执行比他的前任更加坚定的政策。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我注定是要失望的。

当时正是1936年春天,西方国家的安全和力量受到了致命的

打击。希特勒于3月7日下令重新军事占领莱茵兰地区。虽然这一事件在英国没有引起明显的惊慌，也几乎没有引起议会或政治方面的激动，但实际上它比那如此长期而又尖锐的辩论题目阿比西尼亚问题远为重要，影响也更为重大。也许今天很难体会这一行动的含义。根据凡尔赛和约第四十二、四十三和四十四条建立了一个“非军事地带”，规定在莱茵河左岸或五十公里以内的右岸地带德国不得建设防御工事、军事设施、或任何种类的军事部队。⁴⁶¹此外，在这个地带内不得举行军事演习，也不得有任何供军事动员之用的任何设备。这些规定对法国极端重要，可是不能仅仅依靠当时已无信用的凡尔赛和约。希特勒不能把这些说成是所谓的“强加给战败国的单方面的苛刻条件”的一部分。因为这些都曾被洛迦诺公约特别确认并重新制定，而该条约则是德国自愿参加的。希特勒曾一再宣称，他将认真遵守那些德国自愿签订的条约。

因此，毫无疑问，从道义上的观点来看，重新武装莱茵兰就是公然背信弃义。根据洛迦诺公约的条款，这是“未经挑衅的侵略行为”，需要立即采取对抗行动。这样一种违反条约的行动应立即提到国际联盟，而国联必须建议各条约签字国援助受到侵犯的国家。因为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来看，德国行动的后果是可怕的。只要莱茵兰不设防，德国在欧洲任何部分进行侵略，法国就能给予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反击，就能对德国的要害地区发动进攻。但是一旦德国军队重新占领莱茵兰，而更重要的是重新设防莱茵兰，主动权就从西方盟国手里转到纳粹独裁者手里了。一条新的兴登堡防线就可能建立起来，而且确实立即开始建立了。我们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痛苦的经验，它让我们回忆起这种防线和克服这种防线所需要的可怕的生命上及时间上的代价。

不管英国政府私下关怀的是什么，但从他们公开声明中好象看不出他们已经完全理解希特勒这一突然行动的政治上和军事上

的重大意义。舆论含糊而混乱。用洛西恩勋爵的话来说，普遍的看法是德国人有权“进入他们自己的后园”。在下院里，几乎我的全部朋友，不管政治上是右或左，都似乎是比较无动于衷。劳合·
462 乔治的“行动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希特勒违反凡尔赛和约和各盟国政府在裁军上的失败相提并论，这就完全没有考虑后来对洛迦诺公约的破坏。对此我提出了强烈批评。的确，除非常有限的一部分人以外，都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允许希特勒的行动继续下去，那将成为历史上的转折点。因为这将使西方盟国在不多几年内面临着这样一种冷酷的选择：或者在欧洲许多部分向侵略投降，或者在可能最坏的条件下进行战争。在适当的时候，德国将威胁中欧和东欧，根本不怕法国任何有效的军事手段。法国对那些集合在它领导之下的国家的支持，自然而然地就被切断了。由于“横跨德国大门口的屏障”^①不断巩固，英法两国1938年支援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39年支援波兰的力量，就相应地受到阻碍和削弱。如果参谋长们提出过什么建议的话，却直到现在还没有透露出来。但是有两个主要人物写了有关莱茵兰危机的详细说明。一个是丘吉尔，他当时作为一个不担任官职的议员，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另一个是最近刚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艾登。概括地说，艾登赞成英国政府不采取行动，并且为之辩护；而丘吉尔却把莱茵兰危机看成是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最后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据艾登说，尽管法国提出了抗议，但并没有作出应付形势的有效的军事计划。然而，即使没有实行总动员，法国军队本来也能占领这一地带的重要地点，在适当时候逐出德国军队，重新建立法国占领区。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德国军队绝不可能进行长期抵抗，如果法国施加强大压力，德国将军们就要迫使希特勒退却。不幸的是，政府和最高统率都没有把决心和手段配合好。

^① 温斯顿·丘吉尔的讲话，《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年3月26日。

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反过来占领萨尔区；但是艾登——可能正确地——认为世界舆论会反对——在这样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他的看法是一个重要的、但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意见。艾登说法国军队进入莱茵兰赶出德国军队，英国舆论是不会赞成的，甚至感到惊慌，他的这种说法肯定是正确的。这样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如果引起流血”，可能要严重削弱英法同盟。这是一些有力的理由。然而我认为，如果法国行动迅速而有力，英国就要被迫随之行动了。艾登在他总结中的最后一句话无疑是正确的：

现在我认为真实的是，法比两国政府当时没有得到他们国家舆论的充分支持，让他们使用精锐部队，而由于是民主国家，他们不能在没有舆论支持的情况下这么做，即使他们想要这么做的话。^①

很难看出这和两年后慕尼黑投降时的辩护有什么不同。可是1938年德国在莱茵兰建立防御工事以后，再对它采取军事行动那是困难的和危险的，而在1936年就会容易些，并且也会成功。

和对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冒险时的辩论明显的对比是，下院的辩论软弱无力，死气沉沉。许多保守党人甚至反对艾登在这悲剧性的事件中所能争取到的一项成果——英法两国参谋人员的会谈。人们都知道政府的某些成员，特别是西蒙（当时任财政大臣）和金斯利·伍德（一个在卫理公会教徒中的特别重要的人物）都不高兴提起非常容易使人回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年月的任何事情。托马斯·琼斯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围绕所谓的“克莱夫登派”活动的主要人物的一次会议，^②会议的结果非常可怜。参加会议的人包括阿诺德·托因比，他访问德国刚刚回来……他和希特勒会见长达一小时四十五分之久。他确信希特勒诚心期望欧洲和平并与英国建立亲密友谊……”^②《泰晤士报》那篇标题为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354页。

② 托马斯·琼斯：《日记和信件，1931—1950》，第179—180页，第181页。

“重建的良机”的社论，明显地接受了希特勒新近提出来的互不侵犯条约——最近一次侵略行为的正常伴唱——的表面价值，它引起了特别泄气的影响。如果说英国舆论混乱，那么法国的观点就象法国内阁反映出的那样，是踌躇和摸索。仅有四位内阁部长赞成军事行动。^① 什么计划也没有。在大选前几周进行总动员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某些法国人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的确，在希特勒做出决定的时候，他发现英法两国政府都已开始受到迷惑，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意识到自己军备有缺陷，另一方面由于这两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愿望是，几乎不惜一切代价，非常强烈地要求和平。

希特勒善于选择时机。象往常一样，他在侵略之前的前奏曲是故意保持平静。最近几个月，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然而希特勒却没有采取行动。甚至在2月底最后批准法苏条约也没有立即引起反应。在这个月的月底，希特勒接见法国《晨报》记者时仍旧表示了友好与和解。^② 气氛是如此之好，以至法国驻柏林大使提出就法德之间的全面缓和问题进行讨论。3月6日，艾登以外交大臣的身份向德国驻伦敦大使提出了一项关于缔结“空中洛迦诺”的建议。^② 然而就在第二天，德国军队向前推进了。希特勒已经知道，英国有一种习惯，法国也正在形成这种习惯，即从星期五到星期一停止工作。这一回，就象他后来经常的做法一样，他在星期六采取了行动。当他犯罪厚颜无耻地破坏国际义务的同时，他以惯有的狡猾手段向西方大使们提出各种未来的缓和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在莱茵河两岸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这就会拆除法国以巨大代价苦心经营的全部防御工事）。他还建议订立一项限制空军的条约，以及和它东面的和西面的邻国订立通常的互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347页。

②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564页。

不侵犯条约。最重要的是，他提出重新加入国联。以花言巧语来掩盖其冷酷残忍的行动的手法是希特勒的拿手把戏。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对他有所怀疑了。但是直到最后，还是有许多可尊敬的人们上了当，特别是一些宗教界人士和记者。他们已经忘记，或者从未听说过从前俄国的一个谚语：“你喊得声音如此之大，我仍听不见你所说的。” 465

现在没有必要详细追述这次事件中的各种活动：法国部长们匆忙赶来伦敦；向国际联盟提出正式呼吁并在国联理事会上申诉；国联理事会在伦敦和巴黎多次召开会议；国联理事会对德国的行动进行谴责；部长和外交官们随着一场国际危机的出现而来去匆匆，等等。忙碌地从事于这些无效的外交姿态的艾登对这些事情作了忠实而精确的描述。盟国的努力毫无结果。艾登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是“参谋会谈”，但就英国而言这些会谈也证明是有点敷衍塞责的。参谋人员除了哀叹亡羊补牢已无用处之外，的确没谈什么。重新武装莱茵兰对英国舆论来说似是件小事，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结果证明它是起决定作用的。这是引起雪崩的石块，而这场雪崩在它一路破坏的进程中是注定要把全世界都卷进去的。

如果我这时不时常和丘吉尔交往，我肯定要随波逐流和大家一样充满自满情绪。有些反应实在是令人奇怪的。内维尔·张伯伦为了挽救和平，想向德国奉送一块殖民地。劳合·乔治声称，存在着“挑动希特勒的东西”，这说明如果不是完全原谅他，也是解释他行动的原因。社会主义政党的老领导人斯诺登被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所打动，请求不要忽视这一建议。但是丘吉尔以他准确的洞察力看到了实情。如果允许德国人沿着莱茵河完成其巨大的防御工事，他们便可以随意放手在东欧和中欧进行侵略。整个欧洲——当然是整个中欧和东欧——将落入他们的手中。此后事情就是这样。两年以后，在慕尼黑又犯了在生死攸关的军事据点上有

关战略重要性的同样错误，虽然规模上小一些。张伯伦似乎没有认识到，捷克人不仅仅是被要求放弃几平方英里的领土，他们被迫放弃一条具有良好自然条件的、工事巩固的、可以防守的防线。一旦丧失了这条防线，他们就失去了一切，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也就注定了。托马斯·琼斯记载了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和鲍德温的一次谈话：

一种反来复去的想法是“他使这个国家免于战争”。“当德国重新进入非军事地带时，我为此焦虑了三天，这时有人大呼应该占领莱茵兰。”^①

丘吉尔在议会内外竭尽了全力。他描述了他如何劝说法国外交部长弗朗丹采取坚定立场。^② 赖伐尔在年初就垮台了，弗朗丹接替他当了外交部长。我记得很清楚有两次和弗朗丹相见。第一次是在斯皮尔斯将军安排的午宴上，第二次是在同一天的晚上丘吉尔举行的晚宴上。在这两次宴会上弗朗丹当然都大吹其牛，并以表面上的诚意宣称：如果英国愿意带头，整个欧洲就将跟上来。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现在不制止德国，以后就没有希望约束这个国家了。我对这个人及其高大的形象印象很深。但是我记得甚至在那时我就有个感觉，觉得他有点毛病。他指责的话说得太多了。他甚至试用了一点讹诈的办法，因为他认为，如果英国现在不出来制止德国，法国将被迫采取亲德政策。他暗示他自己是不会反对这种政策的。丘吉尔很想信任弗朗丹，并竭力激励他。但我感到他有点被弗朗丹欺骗了。说到底，还是应该由法国带头，而英国则必须跟上来。确实，英国政府如果更有眼光和决心，就会鼓励法国了。但再一想，我感到弗朗丹想逃避责任，并把罪责推到我

① 托马斯·琼斯：《日记和信件，1931—1950》，第206—207页。

②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53—154页。

们身上。无论如何，没有迹象表明法国将采取行动。甚至在丘吉尔的宴会上进行坦率而冗长的讨论时，弗朗丹仍一直要求英国首先采取行动。可是，弗朗丹和丘吉尔的这些会见和谈话对我影响很大。在辩论中我不能发言，我向一家报纸投了稿，阐明了我的怀疑和忧虑。 467

总的说来，这个国家仍然是十分平静的。在伦敦曾经有过“战争的谣言”；在外省则几乎没有什么波动。

这并不是完全健康的现象。在我国一部分人中有夸大危险的倾向，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则有低估危险的倾向。

然而，就当前的危机而论，国民的直觉是更为正确的。现在不会有战争。

但是，将有一种确立一代人和平的全面解决办法吗？或者只会是一种休战的局面——一种疯狂进行军备竞赛的战争间歇期，在两三年的时间内一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战争。这才是要在今后几周内解决的真正问题。如果这个重大问题在我们思想中处于首要地位，伦敦当然要紧张不安了。

我们对德国在良心上感到不安。我们对凡尔赛和约感到不快。我们对和约签订以来我们的政策感到不快。

尽管我们厌恶纳粹精神的许多方面，我们自问我们究竟要负多少责任。

我们记得我们所拒绝于自由德国的那些事情，我们被迫给了极权主义德国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记得施特雷泽曼和布吕宁所受的屈辱；我们想知道我们对希特勒取得胜利要负多少责任。

我们也不能把这些责任推给法国人民和法国政府。要他们带头干是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的。

要他们做出让步是困难的。那种责任落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却逃避了。

主要的责任落在两个人身上，他们是不能推诿的。在将近十三年来这个国家是由鲍德温先生和麦克唐纳先生共同或单独管理的。正象他

们逃避社会和经济问题——结果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今天差不多处于工业繁荣的顶峰，有二百万人失业和（据约翰·奥尔说）近一半人口营养不良——他们也逃避外交问题。他们听其自然。他们认为事情不用管它就会“自行解决”。他们对我们的政策没有提供任何强有力的指导。

他们把无所作为抬高为原则，把软弱无能奉为美德。

468

这就是当前危机悲剧性的特征。现在不会有战争。但是，除非现在解决问题——一种只能由我们国家强有力的领导才能作出的解决办法——在1940年或1941年将发生战争。

除非现在就建立一种新的欧洲体制——一种和平体制，对它的严密的考查是军备公开的原则，这种公开军备应根据领土和经济问题的协议来进行国际检查和监督——我们将经历一个具有强烈猜忌和敌对情绪的疯狂重整军备的时期，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

这次危机是“阿加迪尔”式的；^① 如果不以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加以处理，1914年就会随之而来。

这个国家是平静的。我担心这可能是一种假象和虚假气氛。

因为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德国关于和平的申述是真诚的，现在就让我们建立新的和平体制。如果德国拒绝了和解的合理条件，因而证明没有诚意，让我们现在当它比较软弱的时候就对它施加压力，而不要等到1940年或1941年，到那时候德国就会非常强大了。

听其自然是毁灭性的办法——可是听其自然却是首相和枢密大臣这两位政治家的习惯，他们似乎已把这种习惯当作一种政策——几乎当作一种信条。

现在就让我们与德国和解，或者现在就对之施加压力。但是绝不要以后付出极大的代价来购买一种不可靠的和平。^②

我把很久以前写过的这些话再重抄一遍，不是因为这些话本身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而是因为这些话表达了我（和另外一些人）当时

^① 阿加迪尔，摩洛哥西南部港口，当时法德对峙，造成1911年的国际危机。——译者

^② 《星报》，1936年3月20日。

的感受。对凡尔赛和约和我们对德国的处置感到有罪，这种想法当然是夸大的。但是这种想法当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无论如何，要求或者与德国和解，或者就对之施加压力，或者争取和平，或者进行战争，事情必须这样。什么也不做是要带来灾难的。

在这个时刻采取行动，很可能导致希特勒垮台，并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只能从考虑那次战争产生的一切后果，来认识这种犹豫不决带来多大的灾难。如果由另外的人——巴尔图或丘吉尔——掌权，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避免。然而，这或许把个人的影响说得太过分了。英国人民和整个英联邦人民当时的情绪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来争取和平。这种失败主义和真正的理想主义多少有点混合到一起了；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表现癖”。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看到这同一症状重复出现；青年男女们躺在地上反对“炸弹”；大学生辩论他们是否愿意为国家战争。469 差别是何等的巨大啊！美国的孤立主义以及它坚持拒绝在欧洲发挥任何作用，它抛弃国际联盟，1934年的约翰逊法令和紧接着的1935年的中立法规——这样肯定使民主国家重整军备更加困难；不愿意作出任何援助的姿态，所有这一切都给英国增加了困难。但是决定权当时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既然美国人民代替我们承担了主要负担，我们只有称赞他们这几年来接受教训的彻底性。

当危机过去以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危机延缓以后，希特勒就尽快地在莱茵兰设防，同时以巨大的规模重整军备。英国政府也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鲍德温终于同意了由一位大臣专门负责协调国防工作的意见。任命谁是一个猜测很多的问题。许多名字被提了出来——内维尔·张伯伦、金斯利·伍德、斯温顿、朗西曼以及包括霍尔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就在莱茵兰危机之前举行了一场关于国防问题的辩论。霍尔在议会后座上发了言；用张伯伦日记里的话来说，他非常令人恶心地想获得官职。

他开始讲话时还好，但是他在结尾时竭力赞颂斯坦利·鲍德温，这使议会大为震惊，让人听起来象是明显而笨拙地企图得到官职，给人的印象坏透了……^①

在3月7日以前，人们不断强烈要求丘吉尔出任国防协调大臣。然而，作为希特勒侵略行为的结果，政府人士似乎认为不应当作一些使希特勒苦恼的事情。内维尔·张伯伦的日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周末的事件（希特勒占领莱茵兰）为排除温斯顿和萨姆提供了极好的理由，因为他们两个人在欧洲都有名气，而在这关键时刻使他们加入内阁可能造成危险。英斯基普不会引起猜忌。他不会激起热情，但也不会使我们陷入新的困境。^①

470 因此，象这样一个极端重要职位的人选就落在副检察长托马斯·英斯基普的身上了。这位先生是一个称职的律师和容易相处的议会人物，他受人欢迎，轻松舒适，但是没有军事或行政方面的经验。他一点也没有不讲情面的决心，只有具备这样的决心，这个职位才能在这样一个时刻产生效果。丘吉尔描写过首相如何挑选人材而使“新闻界和公众感到惊讶”。^②惊讶几乎是一种打折扣的说法，甚至失败主义情绪最浓的人和首相的崇拜者中最会拍马的人，也都目瞪口呆。一般人的说法是，自从喀利古拉^③让他的马当执政官以来，还没有这样的事。

同时，在艾登的压力下，法英之间的谅解有点接近军事同盟了。英国根据洛迦诺公约重申它对法国和比利时的义务。参谋会谈得到了认可。公函也交换了。可是在几个月内，比利时自动要求放弃洛迦诺公约对它的保护，并认为恢复原来的中立状态更为明智，这或许是对这些空姿态最好的评价。

① 伊恩·麦克劳德：《内维尔·张伯伦》，第193页。

②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56页。

③ 喀利古拉，罗马帝国皇帝，以残暴闻名。——译注

这关键性的几个月对我和我的观点影响很大。我甚至决心以更大的努力从事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工作。在我看来，只有对失业和贫困这些灾难重新发动进攻，发展更为公平的经济条件，我们才能获得力量并得到国家所需要的团结一致。与此同时，我立即越来越深地参与了丘吉尔正在努力从事的把保守党人、工会会员、自由党人、以及实际上所有相信集体抵抗的人联合起来的运动。

两个独裁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阿比西尼亚和莱茵兰的胜利相应地增加了他们的势力。墨索里尼放肆地藐视国联的权威——国联会员国在1935年9月最初热情地跟随霍尔有力的领导时英国人夸耀说，那是一个国家领导着五十个国家。结果就流行着一种对意大利真实力量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估计。多年来墨索里尼的外交是通过设在驻英国大使馆内效率很高的间谍系统来帮助进行，这是真实的。电报和各种各样的文件，包括对远东形势在军事上的悲观估计^①，都从大使的办公桌和字纸篓直接到了意大利外交部。在后来的一个阶段，奥斯汀爵士的遗孀张伯伦夫人作为一个游客来到了罗马，这就增加了误解的危险。张伯伦夫人与她那高贵的丈夫不同，她已经成了法西斯主义蛊惑的牺牲品，坚信墨索里尼的工作和品质对人类是有好处的。艾登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以后，意大利政府就不必只是倚靠间谍了。“绥靖政策”越来越公开了。如果说墨索里尼的姿态多半是一种讹诈，正如后来所证实的，不能忍受战争的严峻考验和压力，那么希特勒取得的地位却是牢的，而且越来越巩固了。在莱茵兰地区建立防线的工作在1936年其余的时间里和1937年全年加紧进行。到1938年春，希特勒准备再次搞突然袭击了。在这种危险的形势下，许多不幸的混乱思想充塞了英国和法国的舆论，这把政府、议会和人民的注意力从

^① 休·吉布森(编辑):《齐亚诺日记,1939—1943》(纽约,1946),第95页,1939年6月8日。

威胁他们的真正危险上转移开了。

在这些动乱中破坏性最大的是西班牙内战。历届英法政府为这个问题连续奋斗了三年。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独裁者们不顾西班牙人民的痛苦，只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同样，俄国政府尽管可能已经看到延长这一场战争对他们有利，但却认为在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中支持他们自己的一方是责无旁贷的。只有英法两国政府试图减轻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至少也要把这场战争限制在西班牙人的范围以内。如果主要的欧洲国家的军队无限制地把西班牙作为合适的战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一决雌雄，那么全面的欧洲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从英国的利害观点来看，当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向艾登提出不干涉政策时，艾登支持这项政策是正确的。根据某种证据不足的说法，法国总理布鲁姆在1936年7月访问伦敦期间，企图说服英国政府站在西班牙共和党人一边进行干涉，其理由有二：第一，他们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第二，他们对英法两国是友好的。^①布鲁姆自己从没有这么说过，而艾登却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②莱昂·布鲁姆和他的人民阵线政府里的部长们都非常清楚，任何公开的干涉对法国都是极端危险的。这将加重法国人民的分裂，使之成为极端敌对的两部分，因而会极大地妨碍对付日益增长的德国危险如此急需的军事准备工作。而且，要是欧洲列强公开出面干涉，而不是暗地援助或派遣志愿军，几乎一定会引起全面的欧洲战争。法国国内形势已经很不稳定。右翼和左翼以日益增长的仇恨互相怒目而视。许多右翼法国人培育了对法国左翼分子仇恨和厌恶的感情，他们对德国人反而没有这种敌对情绪。“宁要希特勒不要布鲁姆”已经成了一种

^① 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伦敦，1948），第260页，谓此点为路易·莱维先生所谈及，据称莱维为布鲁姆的密友。

^②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自401页起。

反动口号。同时，人民阵线本身是一些政党的联合，尽管它同情西班牙共和党人，可是任何要求公开干涉的建议就可能使它分裂。鲍德温在1936年秋季的几个月中健康欠佳，多少有点失去作用，艾登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正确地决定支持法国政府的“不干涉”政策，自始至终绝对忠诚地与其朋友布鲁姆执行了这个政策。企图阻止武器全面流入西班牙，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它或许更能使人信服，但不太容易公开讲清楚。如果向两方面都供应武器，西班牙叛乱者肯定将比合法政府干得更好。因为这时德国已经大规模进行武器生产了。甚至意大利也有不少多余的武器。从英国或法国武器库中拿出任何东西，就要进一步减少他们本来就很少的物资。⁴⁷³避免公开干涉从而几乎无疑地避免了公开战争，很明显这是正确的。在下列问题上向独裁者挑战其结果可能是无法再坏了：英法两国的舆论在同情谁的问题上是不一致的；两国都大量裁减了军备，而且最近承认了希特勒在莱茵兰的突然行动，同意德国在进攻和防御力量上令人可怕的增长。研究历史的艾登也非常清楚，假如冲突能加以限制，公开的干涉能够避免，即使佛朗哥最后胜利了，他也未必会认为自己因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能够提供的武器或志愿军的援助而受到了他们的特殊恩惠。艾登没有忘记威林顿公爵在经历了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之后所说的名言。那位公爵宣称，“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象西班牙那样，外国人可以对其事务进行干涉但却捞不到什么好处。”西班牙人民的自尊非常强烈，他们的爱国心达到狂热的程度，因此，即使一个曾对他们造福最大的国家要求在损害西班牙的荣誉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给予报答，整个国家就会立即团结起来进行激烈的抵抗。从英国和法国的观点来看，最严重的危险是在冲突过程中，至少是暂时性的，可能要求转让某些军事据点。巴利阿里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就是可能有这样危险的地点。的确，意大利人似乎至少能够暂时盘据在巴利阿里群岛。但是就象

后来所证明的那样，西班牙人的情感是不许割让哪怕很少一点地方的。

艾登相信，德国和意大利除了在西班牙摧毁一个左翼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获得满足以外，他们都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利益。由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确实承担了一次大风险。鉴于首相在这个时期几乎完全不管外交事务，他几乎独自承担了这一任务。当然，以后还有几次令人焦虑不安的时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艾登的预见证明是多么准确。甚至在1940年法国沦陷——这件事在1936年和1937年是无法预料的——以后，佛朗哥还拒绝了摆在他面前的那些诱惑。

474 因此，不干涉政策很明显对英法两国都是有利的。不幸，由于在这场长期战争中不可能使不干涉政策行之有效，这就对英法两国的舆论和士气起了灾难性的影响。法国的痛苦不断增长，几乎达到了在共和国历史上无法与之相比的程度。布鲁姆及其政府感到越来越难以维持他们封锁国境、不让武器和志愿人员通过的政策，也无法抵制要求给予西班牙政府某些援助的压力。共产党人的要求增长了，右翼的愤怒也相应地增长了。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法国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重整军备的计划实际上也陷入了停顿。然而，据说在完全不顾法国空军的迫切需要，库存引擎日渐陈旧和废弃不用的情况下，一些飞机和装备正被秘密地运送给了西班牙政府。法国右翼的这些责难对独裁者有利，对德意两国运送与对方可以匹敌的补给品提供了借口。从这次交易中佛朗哥收获很大，但法国却被削弱和分裂了。

在英国，随着西班牙内战猛烈地继续进行下去，左翼的舆论开始放弃他们早先支持的不干涉政策。真够奇怪的，多少年来一直激烈反对英国以任何形式重整军备的工党和左翼的政客们，现在也吵吵嚷嚷要求向西班牙运送武器。许多年轻人——决不是都具

有社会主义的同情心——参加了国际义勇队去支持西班牙政府，为他们的信仰英勇战斗。同样，一些保守党员，特别是天主教徒们，因为教士、僧侣、修女遭受到骇人听闻的暴虐而激动，参加了叛军队伍。这样一来，在英国产生了有点类似“舆论危机”^①的情况。在需要全国团结的时候，西班牙内战成了一个引起尖锐分裂的因素。虽然议会内外的许多工党领袖继续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唯一可行的政策，可是某种程度的悲哀和阶级意识却发展到了我以前确实没有经历过的地步。在议会以外，各种运动组织起来了，帮助 475 这一派或另一派。一个庞大的宣传和编印小册子的运动开始了。但是，在英国和在西班牙一样，有一些奇怪的矛盾。西班牙内战并不象许多人所宣称的那样，是受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外界压力的结果。那纯粹是西班牙人的事情。它根源于西班牙人的特性和历史。可是西班牙古老地区和省区的划分造成了一种特别的、常常是不合理的混乱状况。例如，巴斯克人所在的几个省——包括天主教徒、保守党人和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支持共和党人，而共和党人肯定是被他们看成是无神论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同样，在我们国内的分裂活动中，一位支持西班牙政府最有力的组织者和小册子的编写者是阿索尔女公爵，她最近还在保守党政府担任职务，在议会仍然是一位强有力的保守党代表。这样一来，赤色公爵可以敌得过赤色教长了。^② 这些情绪当时都很激昂，都很猛烈。奇怪得很，这些情绪还证明是持久的。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佛朗哥政府是稳定的，完全控制了局势。英国人成群结队去西班牙度假，人数不断增加。工党政府不顾西班牙能够很容易使大为削弱的英国遭受麻烦和损害，却用种种办法来侮辱西班牙政府，可是这仍然被认为是正常的。

①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 577 页。

② 坎特伯雷教长休利特·约翰逊此时开始变得声名狼藉。

因此,在这决定命运的几年里,不仅法国和英国的舆论严重地分裂了,而且两国的议会、政府、新闻界和民众的注意力也忽视了即将临头的真正危险。我记得丘吉尔曾以极大的热情和我谈起西班牙问题的这一影响。他决定宣布自己中立,因为他的眼睛盯在真正的敌人身上。我在我的小范围内也采取了同样的方针。¹还有一个副产品接踵而来。尽管墨索里尼最近表现出公然不顾他自己的义务,艾登在他的同僚的压力下于1936年底同意了和意大利签订“君子协定”。^①他很快就从西班牙事态的发展中认识到,这个地中海亲善与合作的宣言事实上毫无价值。如果艾登的政策就德、意、俄三国给双方运送武器和志愿军来说是失败了,那么它的某时的成功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名望。1937年秋,英国和法国宣称,他们反对来历不明的潜水艇的公开海盗行为。在这两国政府所召开的尼翁会议上,他们已能推行由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实行巡逻的计划。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不喜欢这个计划,但是由于运用了效果良好的策略,艾登迫使他们两人就范。尼翁会议的结果使独裁者们遭受了一次挫折。由八十艘驱逐舰组成的英法舰队横扫地中海的壮观,还有后来墨索里尼要求准许参加搜寻他自己的潜水艇。凡此种种,使许多非常厌烦连续败退的人和国家拍手称快。

总之,在这个较大的问题上艾登引导英国政府作出了正确的决定。由于英法两国军备不足,需要补充,这特别表现在空军方面,如果卷入西班牙战争那就等于发疯了。他坚信即使佛朗哥获胜,他也不可能对独裁者们表示多大的感激,这个判断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墨索里尼肯定把干涉看作是“面子”问题,当然,出于他的豺狼之心他也希望得到一点战利品。希特勒眼光更远,也更狡猾,他看到使西班牙这口大锅保持沸腾的每一好处。佛朗哥非常迅速或非常彻底的胜利并不是他的愿望。如果西班牙内战所造成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二卷,第六章。

的内外紧张局面延长下去,法国和英国一定会被削弱,或者最终被卷入旋涡。这样德国就可以在1938年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论点是希特勒在1937年11月向他的外交部长和参谋长们提出的。^①无论如何,法国和英国在情绪和感情上是能够保持分裂的,他们的愤怒能够被转移到他们自己的头上,而希特勒为了控制全世界正在编制新计划,策划新阴谋。

如果说西班牙内战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对威胁欧洲和平的迫在眉睫的危险起了分散注意力的主要作用,那么在一个短而关键⁴⁷⁷的时期内另外一个问题又使首相和内阁为之分心了。这是由于国王爱德华八世要求筹办婚事所引起的,这件婚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宪法危机。

这个可悲的故事的全部情节已由温泽公爵本人和其他主要人物或传记作家们详细叙述了。我是在牛津大学认识威尔士亲王的^②;以后又在联队里与他接触过;我在加拿大总督府工作时,他对加拿大作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在后来几年里也偶尔见过他。但我和他的关系只是相识而不是友谊。我和我的妻子都没有和他的亲近人物有过交往,因而我仅仅风闻在1936年夏秋间开始传播的谣言。国王在继承王位以前和以后,对贫困地区遭受痛苦的同胞表示明显的同情,这在他的许多国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个人很喜欢他那直言不讳的评论。例如,1929年1月,他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在访问达勒姆期间,就公开表示了他那真诚而深厚的感情。在逊位前不久,巡视南威尔士期间,他在排着长长的队伍欢迎他的那些失业矿工面前,不止一次激动地说,“一定要采取措施”。所有这些表现,虽然在政界可能不完全受到欢迎,但却受到他的很大一部分国民的喜爱。然而当危机出现时,首相和政府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献集》,D辑,第一卷(伦敦,1949),第29—39页。

② 威尔士亲王是英国太子的称号。——译者

坚持国王不能和一位有两个活着的丈夫的女人结婚，这无疑受到全国以及自治领的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支持。国王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只要这些话不是无礼或者不恰当的，那么国王就会始终正确而又体面地对待。他从没有坚持过任何可能不受他的人民欢迎的方针。贵人和贱女结婚的想法过去也曾有人提出，但是一旦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国王马上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478 后来几年在我担任外交大臣和首相期间，我曾多次会见温泽公爵。他的魅力仍然未减，所有了解他的人对他仍然敬爱。但是目前关于这件事我必须追述的是王室危机的某些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因为除了牵涉个人问题外，从大处来看它对公共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在整个夏末和秋季的好几个星期里，首相和他的主要同僚几乎只是关心这个微妙而又难办的局面。国王打算结婚的消息12月2日才传开，12月11日他就退位了。虽然公开的危机时间非常短促，可是大臣们在一个紧要的时刻却忙于处理这个事件所引起的纷扰和骚动。鲍德温的议会地位因春天的国防辩论受到了严重损害，他几个月来一直在进行休养。由于这个原因，在西班牙动乱期间他对艾登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他对国王事件处理得很巧妙，完全恢复了他在议会、全国和整个联邦的威望。在这件事情上，他那特有的才能和可爱的品格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国王问题好象是一个最高的“家族”问题。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没有人能比鲍德温更巧妙，更令人钦佩，或更为稳妥了。在几周的担心之后，问题最后还是解决了，约克公爵被宣布为国王乔治六世。君主政体虽然有所动摇，但却没有受到严重损害。新国王和王后不久就受到他们全体人民的喜爱，并赢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由于一场不幸的灾难，在我们国内事务的关键时刻逊位危机达到了顶点。丘吉尔“把那些看到未来危险并决心以实际手段来保卫安全和自由事业的各党男女女士聚集到一起”的运动，已经成

功地开展起来了。他把他的政策称之为“武器与盟约”。12月3日在阿伯特纪念堂举行了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保守党右翼（如劳埃德勋爵）、保守党左翼（象我自己这样的人）、国际联盟协会的领导人、许多工会的一些代表、和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职工大会书记沃尔特·西特林爵士担任会议主席。这次庞大的集会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丘吉尔召集来的全部力量可能成功地动摇首相已经被削弱了的地位。我们可能强迫他们改变政策或更换政府，或者既改变政策又更换政府。可惜，由于灾难性的巧合，会议竟在逊位危机来临时举行。^①丘吉尔在阿伯特纪念堂说了一些同情国王的话，后来他又在下院请求拿出时间并慎重考虑这一问题。他同国王的另一些朋友集在一起，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某些可能让贵人和贱女结婚的解决办法。在下院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忧虑，但是他的干预受到了冷遇。我记得很清楚，各方面——保守党人、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普遍对他表示敌意。传闻在那令人焦虑的日子里，经首相同意，国王和与他保持接触的丘吉尔商量过。丘吉尔因自己在下院引起的反对——甚至是愤怒——而感到愕然和震惊。然而，丘吉尔毕竟是丘吉尔，这只不过更加坚定他的决心。他继续请求大家“保持耐心和不作仓促决定”。^②但是议会和全国都反对他。他那长期处于阴暗中的、刚刚冒出来的阳光普照的形象，再一次又暗淡下来了。公众对他的判断力的信任动摇了。阿伯特纪念堂大会的全部影响被破坏了——首先是由于国王逊位，其次是由于丘吉尔的威望灾难性地下降。

要恢复形势是不可能的了。鲍德温的威信大为加强，而丘吉尔的威信却下降到了零点。鲍德温一直当权到1937年5月新国

^① 关于国王恋爱事件的首次消息于12月2日发表。阿伯特纪念堂大会于12月3日举行。

^②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71页。

王加冕之后，那时他把政权移交给内维尔·张伯伦。六个月的宝贵时间就这样被浪费掉了，而后来成为国家救星的那个人却仍然不被人们信任，也不起什么作用。当时据说，丘吉尔的行动是由于这样的希望所激起的：他可以利用王室纠纷所引起的混乱来推翻鲍德温政府并夺取政权，他知道只有他能运用这个政权来防止战争，如有必要，用它来进行战争。这是鲍德温的朋友和丘吉尔的敌人共同赞成的看法。这种看法以后又一直被许多回忆录和历史的作者所重复。就我当时对丘吉尔的了解来看，我不相信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以后三十年间对他的了解来看，我肯定说这是捏造。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弱点，而许多人却认为这正是他性格中最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他的豪爽。他本能地对任何处于困境的人充满同情。对一个国王来说，这不仅包含了对君主极大的尊重，而且包含了个人对君主的爱戴和忠诚，这就象激励古代的骑士那样。下面引用他自己的话：

在国王爱德华八世童年时代我就认识他了，在1910年我以内政大臣的身份在卡那封堡一次盛大的集会上宣读了立他为威尔士亲王的诏书。我觉得我有义务对他效以最高的个人忠诚。^①

这是丘吉尔动机的真实写照，在那忧虑的日子里他的行动就是受这个动机所驱使。他不想搞政治阴谋来推翻政府。他想的是一个臣民对自己的国王应尽的义务——国王的困难使这种义务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然而丘吉尔的动机在一个没有什么浪漫主义色彩的时代里是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旧有的反对他的那种偏见又复活了，而旧有的对他的猜疑更加牢固了。所有这些对国家是极为有害的。

因此国王的逊位除了包含惋惜、困难和危险外，还引起了致命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71页。

的精神涣散,使政府忽视了眼前的主要危险;它巩固了一位虚弱的首相,使他继续掌权五个月;它损害了当时活着的那位最伟大最有远见的政治家的名声和政治形象。

第十六章 中间道路

1936年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一开始就是令人悲伤的。我的父亲于3月底去世。如果他再多活几周，他就满八十三周岁了。尽管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为重病所苦恼，他几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对世界和世界上的活动很感兴趣。在逝世前的二三年，他除了身体非常虚弱之外，还开始丧失视力，几乎完全失明。他终生是一个求知欲强烈的读者。他的主要乐趣被剥夺了，可是他很有耐性地忍受了下来。我们能够设法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读给他听。当我的孩子们假日在家的時候，他特别喜欢他们大声读给他听。我的父亲是沃尔特·司各脱作品的酷爱者，特别是有关苏格兰的小说。说他每年都把这些心爱作品从头至尾阅读一遍，这并不夸张。和许多老人一样，他宁愿坚信他所知道是好的东西，而不愿尝试那些他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常常就这一点跟他开玩笑。有一天，当我在傍晚到他伦敦的家里去看他，问他如何消遣时光时，他忧郁地向我诉说：“我不得不承认，听人高声朗读司各脱的作品似乎有点多余了。”他最后安详而平静地死去了。但是这对我们一家人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尤其是由于他在很长的时间里对家人一直热爱和耐心谅解，并给我们非常可以信赖和完全无私的支持。这对我母亲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她那不屈不挠的勇气也消失了。她几乎不愿再活下去。不到十八个月她就在苏塞克斯与世长辞了。我在美国时，听说她跌了一交，病情严重，我就立即回国。幸而我及时赶回家来，看到她渡过她那令人难忘的最后几天。我的父母合葬在我们霍斯特德—凯恩斯教区圣贾尔斯教堂安

静的墓地里。我的母亲终年八十二岁。

我一生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我的双亲以不同的方式对我所进行的教导。他们对我们的愚蠢行为能够原谅，只要那些能使他们的孩子快乐或帮助他们前进的事情，他俩无不尽力为之。我的孩子是我们家仅有的儿孙，他俩当然特别喜欢。虽然我的父亲一辈子专心于商业和个人事务，他仍然鼓励我母亲参加各种公共活动。因而她成了维多利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并多年担任该会的名誉司库。我的父亲虽然为人腼腆，沉默寡言，可是了解他的人都喜欢他。他的判断正确，一贯勤奋。他确实有一种惊人的刻苦耐劳的精神。我们的出版事业在教育方面的发展主要归功于他。我的母亲比较容易激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颇有抱负的，她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了她的孩子，一直到死她对戏剧性的人生怀有近乎强烈的兴趣。她自己的一生，从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决定离开印第安纳州小小的乡间的家庭以来，一直是类似探险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政治生涯直到最近一定使她失望，因为我选定要走的道路不象是取得官职或显赫职位的道路。然而她对我正在努力提倡的总的打算却是完全同情的。虽然她不完全理解那些支配我的论点和感情，她对我最后获得成功却具有极大的信心，一种近乎迷信的信心。她相信结果一切都会是顺利的。她的逝世使我丧失了一种巨石般的、毫不动摇的支持。由于我的弟兄们都没有儿女，规定在她逝世后苏塞克斯的房子由我继承。在我父母在世的时候，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每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那儿已经成了我们真正的家。我母亲在她建造的、而且大部分是她自己设计的房子上，在她设计的花园上，以及在她栽植的树木上都留下了痕迹，所有这一切在我写本书时仍然如在目前。有些年龄较大的佣人是从小由她教育并照顾长大成人的。虽然——或者可能是因为——她要求的标准非常严格，佣人们总是很好地为她效劳，那些

483 为她工作的人不仅尊敬她，而且对她很有感情。在她死后这么多年里，我在这里常常感到她就在我的眼前，而在困难或犹疑不决时，我感到她在鼓励我。

我父亲 1936 年 3 月逝世几周前，乔治·麦克米伦死去了，他是我伯祖父亚历山大的儿子，是麦克米伦第二代的三位合伙人之一。他和我父亲在最后两三年已不再主动关心他们的出版事业了，但在那时以前是一直从事这一业务的。第三位年纪大的合伙人是我伯父弗雷德里克·麦克米伦爵士。他于 1936 年 6 月初逝世，终年八十四岁，在逝世前几个月，他的身体仍然完全健康。他和我父亲不一样，他是个现在所谓的外向性格的人。他喜欢朋友，好客，喜爱娱乐、运动和游戏。但他决不忽视他的事业。他每天来公司；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上午晚来一回，但总是在午餐前一小时左右来到，他在那里每天主持合伙人会议。虽然他已逐渐把经营管理权交给我哥哥丹尼尔和我，但他在把权力转移给我们的同时，仍能充分了解业务进行情况。因此，他的意见总是明智的，很容易征求到，而且也受欢迎。他在书业中工作了七十年，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无与伦比的。他那准确而敏锐的判断对我们和公司都用处很大。直到他去世时，人们都只认为他是个六十岁的人。每天上午来办公室之前，他都在海德公园骑马。如果不是发生了一次意外事故，我确实认为他会多活几年，但在当时这种意外事故差不多是致命的。在他来苏塞克斯参加我父亲葬礼的那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滑倒了，跌伤了臀部。他后来恢复了健康，我见他仍旧精神很好，对事务十分关心。但是仅仅在我父亲去世以后两个月，他在 6 月也逝世了。

我们家族企业的三位长辈合伙人兼产权主要所有人，在四个月内相继去世，这就很自然把一副非常重的担子加在我哥哥和我的身上。至于日常管理工作，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因为我们已经

积极而有效地管起来了。但是在转让或购买股票方面执行遗产税情况必然就很复杂。即使当时的税率还不太高，我哥哥和我仍多次焦虑地讨论是否可能保留一种私人 and 家族的企业。一个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企业，在没有任何外界投资的情况下，只依靠谨慎的经营和自我牺牲——换句话说，即继续不断地把利润作为再投资——来提供经费、维持经营时，很自然几乎没有什么流动资金来应付因实际上所有业主死亡而引起的沉重的征税。然而在那时候，遗产税还不完全是惩罚性的。经过多次考虑以后，我哥哥和我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凑足款项，付清需付的税款，把企业保留在家族手里。当然，现在一家私营企业（或所谓的“不许外人加入的公司”）已招来当局没有好意的注意。曾经被认为是美德的东西——节约和再投资——现在成了一种罪恶，以特别税款来惩罚它。

然而我们决定继续干下去；我也从未懊悔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在政府任职期间，主要的担子落在我那忠实的哥哥丹尼尔身上，他一辈子始终是一个保护我、亲爱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不在政府中任职，我就尽力帮助他。我最后在 1963 年退出政界，回到家里，一俟健康恢复，就立即尽力给予帮助。

因此，从 1936 年到 1938 年这几年里，我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用在这些家庭和企业事务上。然而，我仍然坚持政界工作。那时候我年轻，似乎干什么事总都有时间。我有充分的精力和热情。我自己的孩子正开始长大，并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我们大部分时间住在苏塞克斯，1937 年我母亲逝世后我们完全搬到那儿去了，放弃了我们自结婚以来就居住的伦敦住宅。尽管那时候私人事务对我的压力很大，我仍然有力量在议会和我的选区完成公务，并进行我从事的一般政治活动。

国内有很多事情要做。即使战争已威胁着我们，我们仍然能够创立一个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在目标上

485 团结一致，并自信有能力至少部分地控制自己的命运。就在这种心情下，我积极参预国内战线的许多活动，直到战争不仅变得迟早不可避免，而且显然就在眼前时为止。

因此，在以后的两年半时间里，象在上届议会期间一样，我主要致力于经济和工业问题。丘吉尔和我的友谊使我能够了解国防方面的进展和不断增长的德国威胁。由于我逐渐相信外部危机正在深入，我们正不知不觉地走向或者是可耻的投降，或者是进行一场准备不足的战争。因此我对内部重建的兴趣开始下降，除非是为了对付外来危险而把它作为增加力量的一种工具。转折点当然是慕尼黑事件。从那时开始，所有的怀疑都没有了。那时剩下的只有一个问题：这一场冲突将在什么情况下何时发生。

我从办企业中抽出来的时间分别用到三个主要活动上：第一，是对和我已经有联系的其他政治团体继续共同工作。第二，在议会发表演说，在全国发表讲话，以及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等等。第三，我决心另写一本气派更大的书，作为《重建》的续编。

我在第十二章曾经叙述过，“未来五年小组”几乎完全是在赫特伍德的艾伦勋爵鼓动下成立的。《未来五年》这本书的全文本和节本于1935年夏天出版，受到了令人鼓舞的反应，并对舆论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大选以后对这个小组的前途曾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它是否应该满足于由于这么多杰出人物聚到一起而取得的成果，首先是1934年发表宣言，其次是1935年7月出版那本篇幅较长的书。它是否应继续以社团资格活动呢？如果是这样，采取什么形式，为了哪些明确的目标呢？经过大量讨论以后，“未来五年小组”于1936年2月中旬重新组成一个固定的组织。它不是一个新的政党，而是一个“压力集团”。^①它在新闻通告中明确表示，它主要关心的是出版更多的文件和其他形式的宣传品。它被描绘为

^① 资本主义国家中为影响政策或舆论而组织的集团。——译者

“各政党人士的联合组织，但不属于任何政党，其成员对最近将来的具体行动计划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除了偶尔搞些出版物以外，这个小组将从事研究工作，建立和其他类似团体进行磋商的委员会，筹备会议和讲演，以及筹派代表团与大臣们及地方当局接触。它不打算象国际联盟协会那样吸收大量普通成员以与现有的党派或团体竞争。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包括约克郡大主教(坦普尔)、赛西尔勋爵、知名工业家瓦伦丁·克里托尔爵士、工会书记阿瑟·皮尤爵士、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和洛西恩勋爵。主席是艾伦勋爵。当时的拉斯金学院院长巴勒特·布朗担任名誉秘书。我是几位名誉司库之一。工作委员会主要由原来那本出版物的起草委员会成员组成。我们进行了大量讨论，研究能否出版一种周刊或月刊。在我的经验中，尚未碰到过当一群业余活动家试图进入报纸、杂志、书籍出版等要求严格的行业时所引起的那么多的困难和摩擦。我们并不回避意见冲突，这些冲突也许是在如此复杂的队伍中必然产生观点分歧的一种症状。然而，费了不少心思之后，才筹足了创办名为《新观点》月刊的款项。1936年6月《新观点》第一期出版，办了约有一年。这不是有利可图的事业，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对自己在这份刊物上贡献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一点也不感到后悔。刊物和我们小组政治活动的实际工作是由我的朋友阿伦·扬和休·索伯恩以及我们的编辑亨利·布林顿负担的。

同时，对于“未来五年小组”的作用问题，开始有了不同意见。由于政治危机日益增长，我越来越盼望我们这个小组作出实际贡献。我们这个小组不是当时唯一存在的这类团体。劳合·乔治的行动委员会仍然存在，这个组织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支持了我的许多朋友和我自己，以及其他一些团体。我们是否应当和他们联系并共同对政府施加有效的压力呢？艾伦勋爵怀疑这个方针是否明

智。他对于和劳合·乔治合作的任何可能性都特别怀有敌意。然而法国人民阵线在1936年春季的胜利并不是没有引起英国的注意。我们不应该发起某种广泛的人民阵线，把保守党进步分子、激进分子、自由党人、以及社会主义政党内准备争取实现有限目标的成员都团结在一起吗？艾伦勋爵宁愿让“未来五年小组”继续起学术的和教育人民的作用，他或许是正确的。我希望小组进入当前的政治生活领域，这个领域那时非常混乱，几乎迫切需要领导。

如果我们不是顺利地创办了《新观点》杂志，这些问题绝不会这么严重。由于《新观点》是一种定期刊物，它必须对当前正成为紧迫的政治问题有一种看法。结果，在长时间的和友好的商议之后，艾伦勋爵、巴勒特·布朗、阿瑟·索尔特和我负责拟定改组计划。大家一致同意了一项计划：《新观点》正式和“未来五年小组”分开。两个单位各走各的路，虽然我们领导成员中有许多人对两者都是支持的。《新观点》提出了下面的五点纲领：明确的集体安全政策；取消失业救济中的财产调查；在贫困地区采取有力行动；自愿降低关税；大力扩展政府对工业的控制，在某些情况下发展成为公有制。支持这样一种纲领，我们就有可能团结那些赞同《未来五年》一书中所体现的思想的人们。

1936年全年和1937年春天，我积极参加这两个单位的工作。“未来五年小组”能做大量有用的工作，宣传我们赞同的方针，特别是关于这样的问题，如分配牛奶、提高受教育的年限、贫困地区问题以及这个组织能够施加影响的其他国内事务。它也没有忽视在较大论题上影响舆论的任何方法。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和国外形势开始恶化，让两种活动根据相同的方针但在不同的组织推动下进行工作，显然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这份杂志——我对它有相当大的影响——继续要求把一些组织和个人组成一个民众运动，来进行政治活动。艾伦勋爵认为，

“未来五年小组”应赋与来自各政党的签名者一种义务，必须倾其全力于小组工作，而小组的工作仍然保持在原来的学术和宣传的基础之上。我肯定他是对的，而我却有点急躁。当然，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仍旧是友好和亲密的。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象他那样聪明、那样真诚、那样坚持不懈、那样吸引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五年小组”按照旧的方针行事已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了。它于1937年2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一个优先考虑的纲领》，这本小册子很实用，很有价值，它给我们出了题目，使我们可以进行大量演讲和出版小册子，对此报纸上也出现不少文章和来信。可是，在政治气候不断变化的情况下，这样的团体和运动是不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去的。当其任务完成以后，就不应该存在下去了。因此在这一年年底，大伙儿认为最好结束“未来五年小组”，正式结束的时间是1937年11月25日；大伙儿同意，通过出版《未来五年》一书和后来的小册子《一个优先考虑的纲领》，已经胜利地实现了提出的目的。

回顾“未来五年小组”的工作，现在读到一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极为平凡而在当时却象是对正统政治家左右两翼都具有颠覆性的建议，真是令人感到奇怪。下面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调和的例子：

历史上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思想与国家掌握所有权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思想之间——的论战，如果用当前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似乎大大地离开了题目。因为很明显，我们的实际制度在今后很多年内无论如何将是一种混合的制度；我们的经济将在很不同的程度和方式上，既包括国家直接所有和控制，公有或半公有企业的管理，并且也包括在适当的公共管理的结构内将继续存在的私人竞争企业的领域。^①

^① 《未来五年》，第5页。

这种“中间道路”为这样一群意见分歧的但在当时颇有名气的人物所接受，可是执政的保守党和工党的舆论都同样对此感到震惊。无论如何，中间道路的效果似乎很好。

直到1937年底，我继续倡导采取联合政治行动。但是当时可以利用的一些组织都不够强大，不能用它们实现任何有效的计划。行动委员会开始衰落，因为劳合·乔治认识到这一组织不可能推翻政府，甚至连影响政府也作不到。此外，我们中许多人对他在1936年9月访问希特勒——一次奇怪而又令人烦恼的插曲——感到沮丧。另一些团体，例如工业界基督徒联谊会，它的政治目的非常模糊。人民阵线宣传委员会几乎完全是左翼，工作并不很有条理。因此到1937年底，这些种类各别的运动，不管是学术性的还是在狭义上是政治性的，都很自然地接近结束。这些团体复杂多样，是弥漫全国日渐增长的无能为力和近乎绝望的情绪的一种征兆。后来，艾伦勋爵自己似乎陷入了对德国不可思议的幻想之中。由于他具有高尚的理想主义和不屈不挠的勇气，他相信他能够在我们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斡旋。因此到1938年我们开始疏远了。他的动机和许多其他人的一样，是非常高尚的；但是据我看来，他想做的事情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绥靖”的想法开始支配他的头脑。他和张伯伦一样，认为可以由四强会议作出某种安排来避免战争。他把自己体质虚弱的一生中最后的几个月贡献给了这一尝试。他于1939年初死去，在慕尼黑事件之后，但在希特勒夺取布拉格之前，他的逝世虽然使世界上失去了一位无私与精神高尚的人，但至少也使他自己免除了幻想破灭的痛苦。

一年年过去，下院越来越关心重整军备的主张和欧洲的焦虑。
490 然而它对经济、工业和社会问题继续感到兴趣。虽然近年来贸易明显恢复，对这一点政府是有权要求人们称赞的，但根本性的弱点依然存在。失业人数已经下降，但只是刚好低于二百万。不能充

分就业的情况是普遍的。特殊地区已有某些改进，但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贫困地区”。贫穷以及很多营养不良的情况虽然大部分被隐藏起来，但却为从事社会工作的人们所深知。如果说已经完成了某些工作，可是很多事还要做。直到鲍德温于1937年5月辞职时为止，财政大臣一直是内维尔·张伯伦，他的办法比他的继任人西蒙更为灵活，可以说西蒙的逻辑思维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准确无误地达到错误的结论。议员们此时更为普遍地研读主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虽然他们从大量越来越流行的复杂的术语中分析出实质的含义方面感到困难。在保守党左右两翼许多议员推动下，1936年秋甚至组成了一个研究金融问题的强有力的小组。因此有可能对四五年前几乎不可能理解的方针问题展开一场辩论，而这场辩论是不会为议会所忽视的。

可是在这段时期内，我的主要工作是忙于试写一本书，以发挥过去几年来就充塞在我脑子里的总主题。因此，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我很少想到在这些大的原则问题上发表意见。我满足于不时干预一些当时发生的较小的但却是重要的问题。然而，作为我从事的主要工作的开端，我于1936年5月在有关财政法案的辩论中发了言。在这次讲话中，我尽力通俗地陈述了一些凯恩斯的想法（我对他当然是十分赞赏的）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作了这次不无影响的讲话之后，直到两年以后我的书写成之前，我没有再接触这个题目。

许多当时似乎是新奇和荒谬的论点现在已经是极平凡的了，只是因为那时我的许多论点似乎使我的议员同事们感到奇怪，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也许会使人感到兴趣。我很幸运，叫我发言时 491
议会辩论快要结束，下院座无虚席。我这次发言的时间比以前要长一些——整整半个小时。我避免攻击政府，也不说那种可能引起暂时的轰动并在外界造成某种声名狼藉的刻薄话。这是一场严

肃的辩论，我很幸运下院也是这样对待这场辩论的。我首先谈到财政大臣(张伯伦)和反对党主要发言人(利斯—史密斯)都认为商业盛衰周期性的不可避免性是一种教义，包括在长时期的萧条中带来大规模的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灾难。我试图对“这种经济上的加尔文主义”加以审查而提出下面的问题：

我们准备接受经济上的宿命论呢，还是我们具有自由意志呢？我们能否运用人类的智慧解决这些问题中的某些，还是这些问题是所有制度——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所固有的呢？二百万失业者以及贸易的或盛或衰，这些困难是地方性的呢，还是流行性的？这就是我们应该用我们的脑子解决的问题。^①

我继续谈到在几年前我已形成的观点，即对待这个问题的实际办法是找出能保证繁荣的条件是什么。首先，应尽可能在当前的货物生产与供应上保持平衡，从而可以使它们相互交换。其次，在储蓄比率和储蓄款项中转为投资的比率之间应保持平衡。对于我称之为功能平衡的前一种平衡，我是这样说的：

……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办法，或者是自治的办法，或者是国家控制的办法，或者是所谓的计划，以及其他办法，把工业组织起来，尽可能使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保持合理的平衡，以阻止物价因生产过剩而下降，而生产过剩对生产者、雇主和雇工都有极坏的影响。这一点已由历届政府，特别是本届政府，作为它们政策中的一个重大项目。它现在正几乎是政府现行政策的一部分。^①

我在这儿有点夸大了在工业改组方面所取得成就的程度，但是我并不想引起争论。我急于要从我经常谈到的这部分问题转移到在
492 当时说来更为新奇的我的两项建议。因此，我继续说：

如果储蓄的比率，也就是说购买力没有消费掉的比率，和它以生产资料费用的形式重新进入市场的比率不相等时，那就会出现萧条，因为购买力减少了，物价下降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例如通货膨胀方面或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年5月20日。

其他方面的,使投资比例超过实际储蓄,那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繁荣和物价上涨。^①

我继续问储蓄的目的是什么。压制消费的目的是什么?它在经济上的目的是明显的。它是为了更新陈旧的生产资料,以新制的生产资料代替之,或者创造新的。当然也可以设想,有一种社会除去偶尔需要一张特殊的犁或一张特殊的铲以外,根本不需要在生产资料上花钱。那种社会是原始的和静止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俄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那样,在生产资料上投入了过多的力量,因而随之发生了真正的困难,因为没有充足的消费资料——食品和衣着——供应人民。

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求得真正的平衡,这是国民的最大利益。^①

但是储蓄的人是一般男女,他们的目的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经济出发。笼统说来,当时一年约二亿六千万镑至三亿镑的大量存款并不是富人存的,而是中产阶级和穷人通过他们的互助会、储蓄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储存的。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是为了安全。今天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使这些存款——它们在正常的情况下购买由政府担保的金边股票,在当时(虽然不是现在)是不能用于工业投资的——通过某种方法流到正当的市场,用来更新或扩大工厂。我指出,当时由于这个原因,在金边股票市场上存 493
在着巨大的货币压力,因为大量的存款是安全存款。我这里举出最近的“玛丽皇后号”事件作为例证:

这儿不是弄到七百万英镑来建造这条船的问题,而是弄到正当性质的七百万英镑。人们可以弄到要求安全的七百万英镑,但不能弄到追求投机的七百万英镑。一旦政府保证这项借款,这就很容易吸引那要求安全的七百万英镑来建造这只船。^①

在列举更多的这一类事例后,我恳求政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采取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年5月20日。

类似的行动。但我补充说，仅仅使可供投资的存款比率和生产投资相等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即凯恩斯称之为实际需求论的，也必须考虑在内——也就是花在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上的总金额。我说，我们在某些方面必须抛弃经典理论，虽然它在我们多数政府顾问中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根据这个理论，失业乃意味着工资太高，而治疗失业的真正办法是降低工资。我先不考虑这一事实，即这样做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工会系统和整个社会服务组织一直是支持工资的。这有着历史事实，1925年我们曾试行减低工资，几乎在1936年引起一场革命，这一尝试终于在1931年失败了，那时我们放弃了金本位。我认为这不仅在政治上和实际上是错误的，而且在理论上和技术上也是错误的。它假定有那么一种工资的经济水平，处于这个水平就可以保持充分就业；这种理论当然意味着，由于减少实际工资使生活费用上涨就造成了失业，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工人经常更多地考虑货币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我们知道，减低工资就减少了实际需求，因此旧经典理论的这一看法本来就是错误的，那就是认为有一种理论上的水平，如果工资能被强压到这个水平，就会有充分就业。^①

在进一步讲了一段涉及实际需求问题的话以后，我指出除了技术上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心理上的因素：

494 我认为可能有人用事实来争辩，说一个社会的收入增加了，它消费得就更多，但是它不会是收入增加多少消费就增加多少的。那就是说，越富当然消费越多，但就一个社会来说，它仍然是注意储蓄得更多一些的——因此，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增加储蓄的倾向，而不是增加消费品的消耗。^①

当财政大臣提到社会服务及其经济价值时，我接着就祝贺他触到了我称之为极为重要之点：

我不大相信，本世纪以来社会服务的发展不能说成是拯救我国资本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年5月20日。

主义社会的东西，不是它为了政治或人们称之为人道主义的原因来加以拯救，而是因为在象英国这样一个从1900年以来一直是发展的、健康的社会里的过分储蓄倾向必须纠正，代之以一种迫使存款进入流通并购买消费资料的倾向，而社会服务所做的正是这些事。在倾向增加储蓄比率而不是增加消费资料消耗数量之时，必须强迫存款产生一种积极的需求。怎样才能办到呢？有三个办法。更多的基本建设费用——对此政府已在着手进行而且必须决心继续进行——增大消费，以及减少为了安全目的的储蓄。^①

增加养老金和人寿保险将有所帮助。增加社会服务，关心我国存在的贫困和营养不足，将迫使更多费用转入消费资料；“通过扩大而不是妨碍社会服务事业，我们将不仅做了人道主义的好事，而且从资本主义社会观点来说，也是一种健全的经济过程。最后，还有一个用强迫存款进入投资的办法来增加投资总额的问题。”^①在谈了几段关于低利借款和我们从管理通货可能获得的好处之后，接着我试图答复说我是在要求纯粹的通货膨胀之类的反对意见：

尊敬的议员们会问，“这和通货膨胀政策有什么区别？”有一点区别，而且据我理解政府打算实行——我相信是这样——的货币政策只有这一点区别，就是你必须在执行这个政策时有一个适度的就业的标准。^①

最后我说了这些话：

495

如果你根据那些争论点实行你的政策，并把就业作为你的标准，你就可能使社会福利开支继续维持下去，并能继续迫使资金转入投资等方面。用就业作为你的比率尺度，将不会有真正的通货膨胀，除非你……在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就业水平之后还继续这么做；我的意思是说，由于各类不同工业的要求发生变化，总是会有一定数目的人不能雇用，总是会有一定数量的人因意见不合而失业。达到可以合理地预期到的最大限度的就业之后，假如我们仍将用就业数字作为未来的管理“管理通货”的标尺，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标准使我们迅速免于这样的困难：或者是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年5月20日。

陷入我们十年前曾经陷入的紧缩通货的泥沼，或者是处于因强制执行这一政策过了头而引起的有同样危险的通货膨胀的局面。^①

我用这些带有相当理论性的论点打扰了议员们，可是他们听起来还相当注意，我对此表示了歉意以后，又回过头来谈我开始时所说的事情。政府当然说这种改进应归功于他们的政策。社会主义者回答说，已经出现的这点改进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发生过了。可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仍然存在着失业和贫困。因此，我们好象一定得接受这样的必不可少的事：

“还要争论干什么？还要烦恼干什么？还作出努力干什么？还担心出事干什么？”我不相信事情真会是那样。为了解决这些毕竟不是不可克服的问题，我相信通过运用人类的智慧，加上人们的主观努力，是能够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我仍然相信自由意志。^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与之进行斗争的是过分就业和通货膨胀这样的危险，今天回想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在两次战争之间这种情况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然而，事情毕竟就是如此。

虽然直到 1938 年春，在我自己写的书里我更充分阐明我的思想之前，我在下院不再进一步详细重复这些思想，但我经常以不同的方式使这些思想继续得到充实：给重要的刊物撰写文章，对许多不同的组织发表演说，对扶轮社或商会谈话，或者偶尔给报纸写信。

当时，对公共建筑工程应在刺激经济上起作用的长时间的讨论中，没有充分注意到在“打开龙头”问题上，甚至在是否需要承认某种程度的通货再膨胀的问题上，要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计划，不管是地方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都需要相当的准备时间。这些计划不能临时凑成。我们很快就在重整军备方面理解了这一点——在决定扩充和取得成效之间是一段很长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 年 5 月 20 日。

的时间。但是“被蝗虫吃光的年代”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民用计划。因此，我不断请求，除了在金融和经济方面为大的公共建筑工程政策辩护的意见外，至少应准备好计划，以免弄得毫无准备，手忙脚乱。我在1937年4月在关于特殊地区法案(修正案)的一次简短的发言中发挥了这一思想。我故意用夸张而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了这一点：

政府用来取代军备——军备本身或许在我们的通货膨胀中取代了去年的住房建筑大发展——的政策是什么呢？假设万一发生了最坏的情况；假定希特勒先生、墨索里尼先生、我的朋友外交大臣以及布鲁姆先生取得了协议；假定发生了最坏的情况而又存在着普遍的裁军；假定普遍和平这一灾难降临世界。德国的失业率又恢复到百分之四十。我们这些地区的失业人数将恢复到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还是百分之五十呢？^①

对这一辩解政府——自然而然地——没有反应。

当时，特殊地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逐步扩军刺激了某些重工业也不解决问题。因此，这些地区的需要仍然是代表这些地区的双方下院议员不断施加压力的主题。主要批评之一是上届议会最初调查所引起的特殊地区的定界问题。在第一次承认这个问题的1934年法令提出时，我们听说这是试验性的，法令没有提到的地区不用抱怨，因为在任何永久性法规中问题将得到重新审议。可是从来就没有审议过；当1936年和1937年提出并修正这项法规时，来自各方面的议员，包括前财政大臣主要工业家罗伯特·霍恩爵士在内，联合起来提出抗议。这个期间的劳工大臣一直是欧内斯特·布朗。他有政治勇气，可是没有一点想象力或独创精神。然而对他却不能太恼火，因为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升上来的，他先在正规部队，以后又在政界工作。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7年4月6日。

他开始是一个自由党党员；然后他成了一个自由党国家派；现在他是一位举国一致政府的全心全意、十分真诚的支持者。用塞缪尔·巴特勒的话说，他是一个就字面意义讲最坏的老好人。随着时间的过去，对特殊地区定界这个问题引起的情绪渐渐尖锐起来，因为由于这一定界许多最应受益的地区被排除在外，来自政府法规的好处得不到享受。总共有多达四十名保守党议员于1936年11月联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由于太恩赛德包括在名单之内，提兹河沿岸对被排除在特殊地区名单之外特别感到不满。多年以后在我任首相时，我看到同样性质的困难出现。甚至总的说来在全国充分就业的时候，也有必要采取特殊步骤把工业放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某些落后地区。回忆这些旧的论争，我当时一贯支持那些即使是难以确定的两可情况的要求。到1937年，由于建造新飞机厂和其他一些军备工厂，工业地点问题有非常现实的重要意义。空军部决定在繁荣——或比较繁荣——的南方的梅登黑德建造一座新飞机工厂，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我写给《泰晤士报》一封信，对这个决定提出了抗议，许多别的人，包括前国务大臣伦敦德里勋爵在内，也参加了我的这一行动。这是政府承认其计划不合理并撤销其决定的少数事例之一。这一被《泰晤士报》形容为“几乎体现了一切可以想象到的轻率方式”的计划，很快就被取消了。作为这个事件的结果，整个问题更为广泛地为人们所讨论，

498 我和我的朋友们长期以来提出的请求引起了很大的同情。保守党议员不管是否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都开始发生越来越大的兴趣。我们原来的委员会扩大了，并且受到象沃尔默勋爵这样的议员们的支持，他还成了特殊地区小组的主席。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和其他一些人，包括尤斯塔斯·珀西在内，在这次运动中参加到我们这方面来了。最近吸收的新成员中还有罗纳德·卡特兰。我记得很清楚他在议会的初次演说，说理清楚透澈，感情深厚真挚，

使下院深受感动。可怜的罗纳德·卡特兰！我一生中见过许多年轻人盛年夭折，他就是其中的一个。^① 他具有各方面的优良品质——魅力、能干和勇气。我很快就开始和他紧密合作。1938年我和他共同给皇家工业人口分布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意见书，建议全部拆毁我们一些古老城镇的贫民窟和鄙陋的居民区，并在富有想象力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新城镇的计划。我们还建议用批准的办法来调节工业发展，与此建议一并提出的还有拉平交通费以利于工业迁移到较远的地区。在这些年代里，我发现卡特兰是一个忠实而又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当最后的危机逼近时，甚至他的热情也开始下降了。就在战争快要爆发的前夕，他在议会最后的一次演说中对政府不能跟上事态的发展，爆发了极大的愤怒和蔑视，这使张伯伦及其朋友们极为怨恨。但这是一个感到毁灭即将来临的人的呼声。

和我具有同感的议员们感到愤怒的是财政部和劳工大臣对整个问题的态度。虽然1936年的特殊地区重建法令确实已经给了少数地区一些帮助，但那决不是富有想象力或激动人心的工作。当时的政府（我猜想在它前前后后的各届政府也是这样）推行了一项特别使人恼怒的方针。大臣们继续宣称如果任何人有更好的计划，他们将乐意加以考虑。对此我不禁反驳道：

政府往往说——我知道这种说法是现代政府共有的特征——如果 499
任何人能想出一个好计划，他们将准备考虑它。但是我想指出，政府不象文官考试委员会那样的考试机构，他们说，“你必须给我们写一篇论文，我们将给它打分数，如果写得好就给你一笔奖学金。”他们是政府，如果他们管理不了，就让他们把位子让给那些能够管理的人。^②

① 他于1940年6月在掩护敦刻尔克撤退的后卫战中阵亡。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年12月8日。

在我的选区内靠近我的家乡的地方，我们至少已经按照一项特定计划取得了一些进步，减轻了一些由于长期失业所造成的困苦。在这些困苦中最坏的东西或许是一种无用之感，一天天一周周等待下去，感到无人关心。在各方面的朋友和各种机构的协助下，我们能够在镇上买下一所被废弃了的船坞。我们计划利用已不再需用的办公室和周围的空地办一个社会服务中心，在那里可以享受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娱乐。全国社会福利委员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资金，伦敦郡议会工作人员协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管理费用。为了纪念我父亲和我祖父，我为这个计划捐献了大量赠品，我可以高兴地说，这项有益的工作当时进行得很好，并且证明是有点用处的。当然，在战争爆发后，这项工作就没有必要了。然而，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还有许多其他我曾起过一点作用的事情。其中有失业保险基金问题，由于贸易得到改善，有了六百五十万镑节余。政府决定利用这一款项来减少捐献，理由是这样作将减轻工业成本。我们中许多人则希望用这笔钱提高救济金。这个问题或许是个半斤八两的问题，虽然我认为我这样说是对的：如果人们在任何工业区内有工作的人中举行公民投票，为了能看到不幸伙伴们的救济有所增加，他们会准备继续付出额外的金钱的。但是，如果这个论争不是由于咨询委员会作出了一项令人遗憾的估计，它不可能引起这样大的激动。咨询委员会——政府就是依靠它的报告的——估计在500 今后的十年里失业人数很可能接近百分之十七。在议员们看来这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的看法，接着就来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我激动地说：

我不知道谁企图毁灭资本主义，谁企图支持资本主义。你们可否严肃地宣称：我们坐在这些议席上的人有义务维持和发展的社会制度，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在今后十年里势必将近

二百万人长期失业？^①

除了这个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关于提高受教育年限的讨论，抗议一项主张普遍减税的计划以免使这一改革几乎不起作用，以及平时假日第一次成为法定假日后的工资照付问题——以外，我主要从事写书——在如此众多公私事务烦乱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我的朋友阿伦·扬诚意的帮助，我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

由于其他事情很忙，写书的时间比我预期的拉长一些，直到1938年5月书才出版。当时，象丘吉尔、艾登那样一些我对他们的判断力极为信任的人的头脑，越来越被迅速恶化的欧洲情况所占据了，可是广大公众还觉察不到将发生什么事，他们对有关经济和社会改革这样的老问题还是能够接受的。我的书《中间道路》^②虽然很自然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批评，却博得新闻界热烈的欢迎。在仔细审阅我保存下来的有关这本书的评论时，对于他们对我的著作提供大量篇幅的慷慨态度，很受感动。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本严肃认真的书——长达四百页——另一方面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图表和统计资料。

这本书的主题是遵循我多年来的一贯方针，但是溶合了所有过去曾吸引过我的论点、思考、思想、和希望，成一整体。它以陈述 501
现代社会需要开始，强调整个人民群众中发生的贫困和安全无保障这两个祸害。由西博姆·朗特里、约翰·奥尔爵士和其他一些人仔细搜集的证据证明，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所赚工资不够购买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衣着、燃料和住所。而且，他们的收入总是不稳定的。或许值得指出，这种对事实的分析没有受到任何评论家的认真责难。这种分析对我青年时代的英国来说是太真切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6年4月8日。

② 哈罗德·麦克米伦：《中间道路》（伦敦，1938）；再版名为《中间道路：二十年以后》（1966）。

了,而且几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情况一直是这样。幸运的是,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现在已采取了必要步骤,如果不是消灭的话,至少也是大大地减轻了规模广泛的困苦。

讲明了这些困窘之后,我就转而谈论补救办法。笼统说来,当时英国有两股思潮。有一些人相信,对私人企业听之任之,允许它不受限制地进行活动,结果它会比任何其他制度生产出更多的财富。诚然,支持放任主义观点的人近来在保护关税问题上分裂了,而在经过多年斗争之后,由于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后胜利,他们就相应地削弱了。而且和工会体系一起兴起的所有对自由市场的干涉,大大地破坏了旧的传统地位。然而,大多数的保守党人在实行了关税改革之后,却没有正视胜利后的必然结果。总之,由于他们中许多人早先是辉格党人,即自由党人,他们象珍爱传家宝一样珍爱自己的意见。他们的一般观点是“干涉越少越好;让私人企业自己行动吧”。当然,代替这个原则的办法正开始受到广泛的支持。虽然社会主义仍然是工党标榜的学说,而且仍旧被郑重地写入正规的工党党章,但它几乎不是该党的实际纲领。当时还没有人(现在我也断定只有很少几个人)认真建议把全部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国有化。

502 我在本卷里试图解决的问题是,阐述一个明确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可以改组工业生产和分配,对进出口问题和金融及投资实行新办法,以便达到实现现代化社会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战略上的中央统一计划,同时在整体上保存工商业的战术上的独立和维护政治及经济的自由。走这条路同时结合适当办法,不仅可以保存自由,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和最有效地组织生产和分配财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为计划资本主义张目。

对我的书表示兴趣的不仅有政治家和政治方面的作者,而且还有学生和经济学家,对此我当然感到高兴。除了对一些个别的

建议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以外，大量的的是对我写本书的目的表示同情，称赞我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我感到有一种普遍愿望，即要求在极权国家难以忍受的限制和在旧自由主义下不受限制地滥用自由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从某些观点看来，不断加剧的国际危机似乎强调需要增加财富的生产和全面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

本书的出版很自然给我带来了大量的信件。艾伦勋爵此时仍然在专心从事一些更为重要的事情，他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

您的书质量很高，我热烈地向您祝贺。尽管您还有其他别的工作要做，您能设法写出这样一本准确而详细的书，使我感到惊奇。我认为它是我看到的同类书中最好的一部。

利奥·艾默里写给我一封信，这封信特别受我欢迎，因为他代表着党内某一不同派别，而这一派和我所属的那一派是有点不同的：

这本书充满了很好的资料 and 方向着实正确的论点。我不能说 I 同意您的每一详细的建议，但是书中在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顽固的个人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一条中间道路。

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信中写道：

承蒙惠赠《中间道路》一书，实在非常感激。我打算写这封信向您表示，我是多么赞赏这本书，并认为它的出版极为及时。我为明天的《每日电讯》报对这本书写了一篇短评，并且还在我们小小的党刊上提到它。

我认为此书具有真正的重要意义，并将在今年今后的每次讲话中提到它。

他和我在国内政策和国外危机问题上的观点后来证明是非常相似的。加文的信非常具有特色：

相信我，任何不同意见过去和现在都不能改变我对您的著作的评价，这本书充分体现了您的思想和良心。获悉在《中间道路》一书中将能读到所有这些，因此，您送给我这本书我感到光荣……

当然，这本书的出版也使我接到许多邀请，要我去做报告等等，我都尽量予以满足。

我的主要工作就要最后完成了，到时候我能够重新转向在下院宣传我的想法这一重要工作。

很快就出现了两次这样的机会。第一次是关于失业和经济形势的一般性辩论，时在1938年3月末（当时我的书正在印刷中）。在谈了一些党的主要意见分歧之后，我宣布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旧的争论，而是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待。

失业问题仅仅是目前我们国家存在的问题的一半。如果失业是这个国家的全部问题，我会感到好过得多。然而就业不足的问题和贫困问题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任何人读过对这类问题有所研究的人所写的客观报告——约翰·奥尔爵士和他所写的全部报告，朗特里先生和他的著作——能不认为，除了失业问题之外，还有几百万人的生活没有达到现代社会应该达到的生活水平这样一个问题吗？那正是和某些人暂时失去工作以及某些人工作不足同样重要的问题。失业本身并不是坏事，上层阶级的人如果没有工作，就称之为逍遥。真正的问题是没有足够数量的钱。^①

504 接着我阐明了我的主题工业改组、较好的分配制度以及增加消费。我问道，真正能抵抗萧条的是什麼，解决过度储蓄的真正办法是什麼？那就是多花些钱。如果说我们在大萧条中遭受的痛苦没有美国人那么多，那是因为我们有了社会保险制度，而他们却没有。因此美国的萧条和我们的相比就更为严重。为了夸张这个论点，我说了这样一些话：

一个访问者从另一个行星到这里来，看到这个国家，他会说，“是的，你们有这么多福利事业。你们为人民做出了这么多的好事。你们免费教育你们的孩子，但却不给他们吃的，你们为什么教育他们呢？”这对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3月23日。

他说来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是的，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总是把免费送给某人他并不特别需要的东西当作体面的事。但是给一个人粮食，给一个人房子——哦，不好，那就使他成为穷人了”；不过，你怎么能使已经是贫穷的人再穷呢？我是永远也不能了解的。^①

在冒昧提出至少可以在更合理一些的基础上分配牛奶的建议以后，我继续说：

……我很严肃地说，从人道主义观点和技术观点两方面来说，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的达到稳定的方针……就是在绝大多数人民中提高总的生活水平，增加财富分配，增加消费力。而且，你还要有一项不是基于既得利益的政策，而是准备采取全新的分配标准和新方法的政策。^①

我不得不提出问题来结束我的发言：

……难道这个议会不是有时远离人民所想和所希望吗？如果我可以以同等的尊敬态度对两伙尊敬的、十分令人尊敬的先生们说话的话，那么我要说，谁坐在哪个座位上，这有什么好计较的呢？这对他们的关系不大。议员的名字只有几年，几乎没有超过十年的，对议会之门来去匆匆——他们远远没有电影明星出名；你从内阁决不可能得到象你从今天的好莱坞得到的那种名声。他们在几年后就进入另一个议院，在那儿用冷僻的、不为人所知的名字伪装起来，终于消失在政治的冷宫。谁关心这些？民主政治不关心，十分令人尊敬的先生们自己不关心。我们在这儿是为公众服务，而公众对我们政治上的所有的老一套实在有点厌烦，而对提出他们认为可能给他们以所需之物的途径和方法感到兴趣。他们对私人企业和社会主义、保护制度和自由贸易等旧的术语感到厌烦，但对任何将给他们以某些东西的运动感有兴趣，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是能用我们 505 所拥有的资源、所掌握的技术和科学，靠我们的干劲、进取心、努力、智力和意志创造出来的。迟早这种民主或将死亡，或者苟延残喘，并多半徒劳无益地在和我们的全部想法相反、我们大多数人一想起就害怕的某些别的统治方法中寻求手段；或者我们，不管是坐在下院那一边的尊敬的先生们，还是如我所希望并相信的那样是我所属的那个政党，迟早将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3月23日。

领导这个国家稳步地，不是用革命的方法而是用仍然是进步的、雄心勃勃的方法，实现已经摆在那儿等待我们夺取的那个新社会，如果我们有勇气抓住今天已为我们准备好的那些机会的话。^①

这一次我至少有一位同情的听众。我收到贾罗的工党议员埃伦·威尔金森小姐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以极大的兴趣倾听了您的演说，对此谨表祝贺。

威尔金森小姐一般被称为红色的埃伦，她是一位具有极端观点的左翼社会主义人士。她在1940年加入丘吉尔的联合政府，这使丘吉尔自豪地说了这样有名的话：“我组成了历史上最广泛的政府，其成员包括从多洛布伦的劳埃德勋爵到埃伦·威尔金森小姐。”

为了引起我的议员同事们的注意，我对这些较大的问题还作了两次演说，只要有可能我就略为提一下，只要合适我就激发他们的情绪。第一次是在1938年4月27日关于预算的辩论会上，第二次是同年6月24日在关于劳工部拨款表决的辩论会上。在预算问题上人们通常是呼吁节约。对于其中一位的呼吁我说了下面一些话：

这位尊敬的议员作了一次我们惯常从伦敦金融界权威们那儿听到的讲话。人们常常象彼拉多^②一样提出几个问题，也象彼拉多一样不等待人家回答。他说对民主政治严峻的考验是收支相抵的能力。这种说法在好多年以前曾被米考伯在一些私人问题上以一种更为引人注意的方式提出过。我不认为它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特别严峻的考验……有任何一种独裁政权企图提高收入使其与支出相等吗？^③

506 当时，因重整军备而需要高税率和国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的停滞不前，使财政部有这样的看法：不应为了实现社会改革计划再提供更多的款项。可是，尽管有这种限制主义的和几乎是紧缩通货主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3月23日。

② 彼拉多，犹太总督，曾审判耶稣。——译者。

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4月27日。

义的观点，仍然有一百七十五万人无事可干；仍然有许多资源、工厂和资金闲置未用：

我们是否打算坐在这儿并且说：国民收入永远不能扩大，这种一年十亿英镑的巨大负担——我们都同意这个数目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预算数字——将要变成越来越重的负担，而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呢？^①

我继续说：

尽管我已列举了有这么多人失业、工厂闲置未用、许多事情未做等这些情况，我不相信在这个国家面对着要大炮还是要黄油这一冷酷的选择，我们竟然无动于衷。这种局面是荒谬的。^①

时代已大为改变，和旧时代不同了：

政府早晚将被迫承认，形势已和格拉斯通时代不同了，那时收二便士或六便士的所得税，但是在现代税收制度下，政府是工业的主要合伙人。他们征收工业利润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作为所得税。如果我们采用超级所得税制，政府要拿走利润的一半。没有人比政府更为真正关心营利工业的生产了，但是政府是一个坐享其成的合伙人，他们拿走利润的一半。^①

这一点在那时是一个完全新的主题，而我提出这个主题的方式似乎引起了议会的兴趣：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完整的国家工业制度，我并不在意人们称政府为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它是人民的合伙人，而政府今天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有权利也有义务要求有效地组织商业和工业，借以产生它可能保证其收入的效果。因此，我认为不应只从静止的观点来看这个预算，说它需要筹集这么多款项。如果我们想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艰难岁月，就应从能动的观点来对待它们。我们能做什么；政府能做什么来增加财源，使它的生产更为有效，使它的分配更为实际？^①

农业大臣刚刚提出了一项牛奶销售的新制度，这是我们现在已经产生的得到普遍赞同的广泛的国家结构的一个小小的开端。这个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4月27日。

新制度当时受到左右两方面的许多议员的强烈反对。关于这方面我说：

我在议会小憩时，从报纸上看到农业大臣打算提出一项更好地组织牛奶分配的法案。我发现这立刻引起了——正象这样一些计划总是要引起的那样——一阵由那些认为计划可能因此受到有害影响的人们发出的令人厌恶和令人恐怖的大吵大嚷，特别那些认为自己领导这类运动颇为合适的报纸更是这样。但是能说明下面的事例是正当的吗？即英国的牛奶零售价格为每加仑二十六便士，非熟练劳动每小时为十三便士；美国的牛奶零售价格也是每加仑二十六便士，而那儿的劳动代价则为每小时三十三便士。瑞典的牛奶零售价格为每加仑十二便士，这正是英国价格的一半，而其劳动的代价却是英国的劳动代价的一倍半。瑞典的工资水平较高，而牛奶的销售价格正好是英国牛奶销售价格的一半，有没有什么理由呢？这就是我要政府做的那种事情。^①

我在结束时谈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现在看来似乎是非常清楚的，而在当时却引起了相当大的注意和意见冲突：

今天的所有现代化政府，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必须是生产方面的合伙者，而且必须共同计划生产和分配。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将做出比发表关于民主政治的演说——我们非常喜欢这么做——多得多的事情，我们将做出比发表民主政治远胜于独裁政治的演说多得多的事情。我们将证明，在议会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下，我们能比任何别的制度更有效地组织生产体系，我们能利用科学和技术力量开发前所未有的财富。在这个新世界中，政府和工业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在国家的各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伙关系，这种关系将提供使我们能承担这些令人惊愕的重负的唯一办法，那就是通过不断发展国民经济使这些重负相对缩小。^①

在所有这些问题被慕尼黑危机赶出我们的脑海之前，我们举行了另外一次辩论。关于劳工部预算的分歧集中在拉什克利夫勋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4月27日。

爵领导下的一个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失业保险前途的报告上。利奥·艾默里早先曾提出过一项高尚的请求，对工人阶级的家庭发放家庭津贴并改善其生活条件。任何了解全部辩论的人，对当时我们与之作斗争的事情所能描绘出的画面要比今天一个读者可能得出的印象要真切得多。一幅当时需要做的事情的图画或许是对现在已做的事情最好的评价。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少困难，我们不应忘记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苦恼。在提到艾默里的感人肺腑的演说之后，我继续说道：

首相在星期二演说中的一段话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他的演说涉及一个完全不同的题目，即外交问题。他在谈到世界某些地区的严重情况时说了这样一些话：

“的确，如果不是中国离我们如此之远，如果不是我们平时的感受远远跟不上那儿正在发生的事件，我想由充分评价这些事件而产生的怜悯、恐怖和愤怒之情可能促使这个国家的人民采取他们可能从来也没有仔细考虑过的行动。”^①

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遥远的事件不可能同近在我們身边的事件具有同样打动我们的力量，可是在这些国内问题上并不只是地理距离的问题，而是由于某一部分人缺乏想象力所造成的巨大的意见差别的问题，这些人一直不能真正认识到（正象我们在这个议会里一样）我们广大同胞面临的问题。我们那些在上星期日参加礼拜的人可能已听到那天宣读的福音书中富人和穷人的寓言中的奇妙的词句——令人恐怖的字句：

“而且，除此之外，在我们和你们之间一条巨大的鸿沟趋于固定。”

那种想象中的巨大的鸿沟，那种无力使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国家内在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这就是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政府不采用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革命的办法，就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他们害怕在这方面得不到充分的支持。对首相的话加以解释就是：如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6月21日。

果这个国家生活比较舒适、比较有势力的一半人口对另一半人口的生活环境不是那么陌生，不是和他们的日常感受距离那么遥远的话，那么这种怜悯、恐怖和愤怒之情可能促使我们采取一种充分有效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卓越的报告充满了单个的、详细的事例，我不想用大量的数字来打扰这个委员会，但是如果任何一位尊敬的议员翻到第一百七十页，他会找到一个居住三间房的住宅里的家庭的记录。情况如下：

“第一间。申请人(户主)、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申请人)、侄子(申请人)、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这间屋共住十二人)

“第二间。转租给一个男人(申请人)、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

“第三间。转租给一个男人(申请人)、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

“三间共住人数=二十六人。”^①

我然后引用了这份最近报告的作者拉什克利夫勋爵的资料和著名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的一些估计。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人民所得工资不够提供适当的营养维持健康。我接着批评了零售分配系统，据我看来这是一种浪费。我们有七十五万个零售商店，这样开支就必然过大，分布显得过密。当然，这种情况在自动售货商店时代以前早就有了，在“马克斯与斯潘塞”以及“伍尔沃思”时代的初期就存在了。必须设法改进必需商品的分配。最后，还有严重的失业问题仍旧压在我们身上。那时，在重整军备的两三年以后，仍有一百七十五万人失业：

一个组织适当的制度，不管在什么政党治理之下，资本主义的也好，社会主义的也好，两种主义混合在一起的也好，都应该看到工业方面必要的失业劳动储备不应该是百分之十三、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而应大约为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最高为百分之七。我不能相信，在经过这场辩论之后，议会对待这些问题仍然不要求象我们对待国防和外交领域的问题那样认真予以对付。^①

我以这样的一些话作为结束：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6月24日。

不管属于那个政党，我们大家都有的货色是用民主政体优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这样相同的结束语来结束演说。但是，民主政体究竟不是由演说而是由行动来保卫。假若世界上现在屈从于不信宗教的专政之下的人民能够看到，现在在这个基督教国家里通过各政党人士的共同努力，如果现在不能建成上帝的联邦共和国，至少已决定进行某种尝试为上帝的联邦共和国奠定基础，这样他们就最终会被说服或者皈依宗教。^①

这是慕尼黑危机前我在议会的最后一次讲话。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充满了我的脑海，摆脱它们对我是一种宽慰。在我的这一长征中，我走过的是一条多少有点孤独的道路。那时，在那些即将支配政界的重大问题上，我将置身于一个日益扩大的队伍之中，在一些伟大的政治人物的领导下前进。

在最后搁置所有这些经济和社会问题——两次大战之间二十年里政治上的主要内容——之前，谈一谈一般思想或许是恰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它使经济处于围困状态以及它向全体人民索取大量的生命和财富，迫使政府如此广泛地干预全部经济事务，以至很难使那些回忆不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事情的人对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这一问题的争论的尖锐性有任何概念。一方面，有人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涉都必然是不适当的，是走向某种形式的专政的前奏。国家许多部门的一些最聪明、最可信赖的领袖根据这些理由支持放任主义。他们反对工业改组；他们反对任何试图解决煤炭工业的几乎绝望的困难的努力；他们不许政府干涉依靠金融政策的中央银行或社会的经济兴旺；由中央计划来处理特殊地区问题的特殊措施同样是禁忌的。一切事情都留给经济规律的作用来解决，而经济规律应该“终究”产生最大的效率。但是正如凯恩斯所说的，“我们大家终究都将死亡”。所有这一套学说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6月24日。

当时大部分过时了，没有考虑所谓自动调节带来的困难和障碍。
511 这首先来源于人道主义的立法，例如工厂法规；其次由于工会力量的日益壮大；第三由于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极为复杂的结构。另一方面还有工党和社会主义政党，他们机械地重复别人的叫喊——“这是制度的罪过”，不承认对所有错误的任何责任。可以说，这种态度意味着除了革命性的改变以外不做任何别的事情，而革命性的改变——荒谬之极——对多数作这种推荐的人说来又是特别讨厌的事。在理论上，他们是“最彻底的”人；而在事实上，他们在实践中又害怕他们在原则上介绍过的激烈的学说。

然而，我在那些年里鼓吹的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全国经济发展委员会成立了；有了一个控制中央银行、并通过银行利率和国家预算对经济活动的一般水平承担责任的政府；在运输和燃料方面扩大公用事业的原则；甚至举办一些必需食品的福利性分配，例如扩大学校就餐服务和对母亲与婴儿供给桔子汁、鱼肝油和牛奶。严格的放任主义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了，与之一起成为陈迹的，还有被遗弃的市镇、用木板钉成的商店、赤脚儿童以及——最重要的——在劳工介绍所外面排成长队的男女们。

但是对我们智慧的挑战仍然存在，虽然我们必须与之搏斗的困难和三十年代困扰我们的事情几乎恰恰相反。过度紧张的经济经常担心“收支差额”，劳动力不足，以及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新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是失业的贫困，而是老年人和退休人员的苦恼，他们经不起这种竞赛，使收入的增加赶上物价上涨——这就是当代政治家必须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后来使我苦恼。但是“鸿沟”已经越过，我们应为此高兴。

* * *

1938年这一年再一次给我们带来了悲痛。我的父亲于1936年故去，我的母亲接着于1937年逝世。1938年初，我妻子的父亲

又亡故了。他几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似乎只有在他的许多孙 512
儿孙女面前才得到一点乐趣，因为小孩子们意识不到老年人的弱
点，一切都感到很自然。可是他的死亡，对我们是一个打击，它标
志着我们生活中一个时代结束了。我女婿朱利安·艾默里最近寄
给我一份他父亲当时收到的加拿大总理的书信的抄件。利奥·艾
默里曾给加拿大总理寄去一份老公爵的讣告。麦肯齐·金总理写
了一封如下的回信：

我收到了我们的亡友德文郡公爵的讣告，非常高兴。我和您一样极
为钦佩公爵的高度责任感、他的丰富的常识、以及他的为人和善；此外还
有他那非常谦逊的态度。

这些都是真实的语言，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个人的品质。

第十七章 慕尼黑:绥靖的历史

1937年5月末,在新王加冕典礼后几天,鲍德温辞职了。接替他的是他的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鲍德温以各种形式,或者单独地或者和麦克唐纳一道,掌握最高权力达十四年左右,其中只有两次短暂的间断。我记录下了在这段历史内不同阶段我当时认为是鲍德温的一些失败和缺点的批评。我尽力准确而又真实地去回忆一个不担任任何官职、没有任何权势、强烈而又真心关怀许多大问题的年轻后座议员的印象和感情。后来的评论家的态度一直是较为严厉的。如果说鲍德温对德国决心称霸欧洲的迹象不理解,或者忽视了,那就不只是他一个人自欺欺人了。他对外交事务的详细情况不感兴趣。因此,他很自然地把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日常事务交给外交大臣和外交部处理。他既不喜欢外国人,也不了解他们。他极少访问外国首都。要是说他曾经横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话,那不过是一年一度远游到埃克斯累班,而这个地方本身决不是观察欧洲国家动态的有名的瞭望哨。西蒙和霍尔也没有好好替他出力。如果说他对陆海空三军都忽视了,仅仅是勉强推行缓慢的、不足以应付形势的重整军备措施,那么公平地说,不管他个人的看法如何,他是无法把自己的看法强加给他的政府、他的党、下院或全国的。他之所以没打算这么做,不单是由于软弱或政治上的圆滑。他比所有政治家高明之处就是把政治当作可能性的艺术。

514 无论如何,假若这些缺点一定要罗列出来在他的功过帐上作为反对他的项目的话,那么不应忘记他的功过帐上的成绩项目是

多么实在。沃波尔以后，鲍德温是多年来权势最大的首相，他对沃波尔非常钦佩。他对英国人民的研究和了解，其准确程度和他的那位伟大前辈操纵议会和宫廷的本领一样。他办事凭他的见识，而不是凭他的理智。他的政治生涯中的突出成就是简单的，但他认为这就证明他的事业确实是正当的。在1922年打倒劳合·乔治联合政府时，他发挥了仅次于博纳·劳的最有力的影响。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他一直把阻止劳合·乔治重新执政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目标。他对劳合·乔治的几乎没有吸引人的特色的政权感到厌恶，并对英国政治风气的堕落感到震惊。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考虑当时的特殊情况，也不体谅劳合·乔治由于没有受其支配的统一的政党而遇到的那些困难。劳合·乔治不得不采用某些办法，其中有些沃波尔可能会比鲍德温更快地给以同情。鲍德温不理解查塔姆以后的这位著名的最伟大的战时领袖的才华，在这方面命中注定只有丘吉尔才能和他相提并论或者超过他。随着劳合·乔治的离去，白厅失去了某种动力，这种动力直到丘吉尔掌权才得到恢复。

与此情况类似的是，鲍德温对海陆空三军缺乏个人经验，因此他完全不理解现代军备的特点，甚至对两次大战之间还不太复杂的军备也不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年龄太大未能参战；他从来没有关心过军需生产；而在他一生经历中，他从没有在军事部门担任过职务，既没有当过负责军事部门的大臣，也没有当过军事部门的次要官员。因此，当重整军备的计划得到通过并授权他去着手执行时，那是一件行动迟缓的事情。他任命了英斯基普担任国防协调大臣，这说明他对国防问题并不真正懂得。没有一个参谋班子，没有明确划定的权限，任何大臣也不可能作出成就。的确，这项任命似乎是全国和议会强烈激动不安的结果，究竟是何含义，是很不清楚的。当我于1940年担任军需供应部的次官时，我才知道

515

一点关于武器设计、改进和生产上的极端复杂性,以及在这些方面令人痛心的延误。这一切都超出了鲍德温的经验或想象力。

然而,他相信自己的主要政治目的——摧垮劳合·乔治的联盟——除了“整顿社会生活”外,还有这种进一步的正当理由。他有一种看法,即工党迟早会由一个小小的反对党发展成国家的两大政党之一,虽然它还没有意识到由执政或希望执政随之而来的责任。他认识到由劳合·乔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时刻赶走阿斯奎斯(采用的方式在当时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是粗暴而伤感情的。)而引起的激烈争论,将导致自由党的分裂,并将最后使它缩小为仅仅是一个议会集团。因此他有意地摧毁了1918—1922年的反社会主义联盟,并对1924年建立的第一届工党政府相当满意。1931年,他同意而不是促成组织举国一致政府。

鲍德温的第二个目的是想避免紧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月里国家曾陷入的危险分裂。于是他以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温和态度出现,为自己赢得一种几乎是超党派的身份。他在下院拉拢工党议员,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的全部哲学使他认为,使工党对民主政治无害,并引导它放弃革命手段而采取合乎宪法的手段,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此外,他知道自从选举权扩大以后,选民中的主要部分的人数不断增加,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党派情绪,保守党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应该由保守党的中间派和左派而不应由它的右派来掌握党的政策。用这种态度和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逐步驯服阶级斗争和粗野的思想意识。由大规模失业所造成的可怕痛苦和不满之所以未形成危险的破坏性运动,应部分归功于他对问题的理解和他的示范行动。因此,他继续执行并扩大对失业人员的救济,这种救济是劳合·乔治在1921年第一次经济危机时开始的,但却被右翼评论家轻蔑而愚蠢地描绘成“对失业者的施舍”。鲍德温就是这样揭开了社会改革的

序幕，这种改革在两次大战之间二十年里比我们当时所感受到的更为深入，更为广泛。他不能理解或治疗由资本主义制度暂时衰退所造成的疾病，但他具备对付这种疾病的一些最坏的症状的能力。即使在危机时刻，他那沉着的气质、他对正义和公平的明显热爱、和他那超脱狭隘的或党派的互相攻讦的能力，使他能够作出巨大的贡献。他对付 1926 年大罢工是他个人的胜利。同样，他也能顶住“报界巨头”们持续猛烈的攻击，到后来他对这些攻击简直不当一回事了。确实，现代的读者几乎无法理解“报界巨头”这个字眼的含意。今天，已经没有人想利用他们发行报刊的权势，要求进入唐宁街或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大臣们和政党领袖们，象诺斯克利夫、罗瑟米尔或比弗布鲁克那样的人物了。鲍德温运用宪法手段所获得的巨大胜利，是值得赞扬的。无线电的出现的确给他帮了忙。如今，无线电和电视摧毁了报纸的垄断地位。但是在他那个时代，那是一场激烈的斗争，而鲍德温面对着这些巨头，在他们的权力从未受到挑战的当时，很多人认为是不可战胜的。

他最后的伟大时刻是英王逊位危机。没有人能比他更体贴地更庄严地处理这个问题了。为此，国王和全国要永远感谢他。

不幸的是，鲍德温和以他为首或以他为支柱的几届政府，由于对外交事务处理糊涂以及未用军事力量作为外交政策的后盾，确实成了助长丘吉尔所谓的“本可避免的战争”的不太情愿的、不自觉的经理人。但是那种指责出自那些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者之口——有时出于恶意，有时出于为党派目的服务——是不应该的。议会内外的左翼人士和他们企图使之承担全部罪责的人是同样的 517 愚昧和有罪。工党和小小的自由党是重整军备的严厉的批评者，而当时他们心里一定明白重整军备是必要的，而且已经拖延太久了。他们依靠空话过日子，却不顾事实。直到战争迫在眉睫时，他们还在反对国民兵役制，而国民兵役制本身的重要性，也是英国可

以指望用来激励西方民主国家信心的唯一力量。在准备本书这几章的过程中,阅读有关这一时期的许多书籍和小册子是我的任务。当然,这些书和小册子是以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写的,也是在他们描写的事件发生很久以后写的。它们中的大多数绝不是没有偏见的。丘吉尔是极少数有权进行批评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有自己的经历为依据。然而,就是在酝酿着战争的全部年月里,丘吉尔本人是左派也是右派激烈批评的对象,批评他的人中包括许多后来装成是他的支持者和具有远见的爱国者。即使在丘吉尔自己的叙述中,^① 有的地方也误解了鲍德温的困难,曲解了他的轻率行为。鲍德温的儿子出于令人赞许的孝心,又把情况颠倒成另一种样子。^②

然而,如果说鲍德温在保持和培育国家主要力量所依赖的全国团结一致这一重大任务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他在首相的最高职责方面——保持体面的和平和战斗的姿态,使英国在任何时候都能恰如其分的发挥作用——却失败了。虽然至少就人性的角度来说,鲍德温为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个仁慈和体面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那里的男男女女到考验来临的时候,都以高尚的气魄去迎接之;但从外交形势和英国应付即将临头的危险的能力方面来说,他留给他的继任人的遗产却是少得可怜的。

鲍德温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十四年前我首次竞选
518 议员以来,他一直是保守党的领袖。我所认为他犯的错误,失职和犯罪两方面都有,虽然我对之失望而感到痛心,但我认识到我的这种判断可能仅仅是因为年轻和缺乏经验而产生的。而且,尽管我对他不满,他对我却表示谅解和善意。因此,我觉得对他表示一点同情还是应该的,于是就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

② A. W. 鲍德温:《我的父亲:真实的故事》。

1937年5月26日

亲爱的首相，

您的信件一定非常之多，我不揣冒昧，写信给您，这就更给您添麻烦，希见谅。

值您从高位隐退之际，您得到广大同胞的尊敬和爱戴，不管他们本人对有关政府政策的事务的看法如何，这一定会使您感到非常满意。

请允许我祝您幸福长寿，欢度晚年。

您十分真诚的

哈罗德·麦克米伦

我收到了一封特别友好的回信：

1937年5月31日

我亲爱的哈罗德，

谢谢您的来信，来信中再一次表达了熟悉和不熟悉的朋友们令人惊异的、深厚的友情。

为此，我深表感谢。

您永远真诚的

斯坦利·鲍德温

和鲍德温一道辞职的还有拉姆齐·麦克唐纳，他是鲍德温最后一届政府的枢密大臣。具有权威的麦克唐纳传记至今尚未出版。他是又一位被评论家苛刻甚至轻蔑对待的人。虽然在他的晚年，由于健康衰退，视力丧失，成了一个有点可怜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比现在流行的对他的看法远为重要的人物。如果说他不是工党的主要缔造者，那也是工党创建人之一。他使工党在下院只占少数的情况下，进而达到能够执政的地位；尽管居于少数地位，却分别于1924年和1929年两次执政，而且不无成绩。他在1931年的行动摧毁了他自己创建的党，使工党陷入长期暗然无光的状态，这就必然在他的老同事中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但是，组织举国一致政府却是出自他自己坚信是国家利益的真诚献身精神。他不是经

济学家，对财政问题几乎一无所知。不能由于他接受了几乎所有第一流专家对必须处理的问题提出的说一不二的意见而责备他。那些拒绝他做法的政府成员也不能解释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他接受了的意见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以及他和他的顾问们同样坚信，需要采取严厉而又痛苦的经济措施。麦克唐纳和那些背弃他的人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他有勇气采纳他认为是正确的意见，而他们却在他们自己也承认是必要的但却不得人心的那些政策面前畏缩不前。在外交领域里，麦克唐纳在他壮年时代，应付自如，颇有权威。他在国外受到尊敬，受到信赖。他若活着看到他为加强国联权力和普遍裁军所作的努力遭到彻底失败，他也有理由辩解说：他1924年秋在日内瓦完成的所谓议定书，至少有可能使国联通过它的集体力量成为维护和平的有效工具。这一议定书并未得到他自己的政府的正式同意，而且被他的下一届政府否定了，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在义务不明确和保证无力的情况下本能地畏缩了，另一方面由于所有自治领的强烈反对。如果说麦克唐纳在晚年头脑不清，语无伦次，但就全面来看，他一生的成就决不是微不足道的。

填补那些空缺职位的是一些世所周知的人物。西蒙由内政部调财政部，接替了内维尔·张伯伦的职位。霍尔离开海军部，被调到内政部，对这一调动丘吉尔表示了带有怀疑的蔑视。他似乎奇怪，竟有人宁要英国的监狱，而不要英国的舰船：“这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一个宁愿当绞刑吏而不愿当水手的人。”^①霍尔的职位由达夫·库珀继任，他不久就在慕尼黑危机中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英斯基普继续软弱无能地担任“协调国防”工作。在政府工作中有突出成就的空军部长斯温顿勋爵由于受到议会的压力于1938年5月被张伯伦免职，由金斯利·伍德继任。国内政府成员中一般说来最得人心的艾登，继续留任外交大臣，直到九个月后他辞职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446页。

时，才由哈利法克斯接替。以上这些都是政治舞台上的著名的有时也是陈腐的人物。但仍有一人置身于政府之外。那时我对丘吉尔已有充分了解。1936年3月，当人们普遍认为将起用丘吉尔时，鲍德温却任命了英斯基普，丘吉尔毫不掩饰这一事实，认为这是对他的打击。那时他已七年没有担任政府职务了。他知道自己的本领，而他被排除在当时我们都认为是必需的国防准备工作之外，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我不认为他在一年以后更为失望。他在内心里认为，要挽救局势已经为时太晚；命运已注定把他储备起来，以便时机到来时负担起最重要的责任。

新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他的直接前任者在性格上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他完全不象鲍德温那样毫无生气，但他也没有鲍德温那样的想象力。鲍德温总是缺乏自信；而张伯伦却非常自信，认为自己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正确的。鲍德温对待问题的态度多半是易于激动，感情用事；而张伯伦处理问题头脑清醒，合乎逻辑。唯一令人忧虑的是，一旦他犯了错误，就非常严重。如果张伯伦在1937年引退或者死去，他会作为一位伟大的社会改革家和一位伟大的行政人员而载入史册。他在担任卫生大臣期间的政绩尤其被人怀念；当时卫生部职权很广，住房也包括在内，现在分属几个部管辖了。在担任卫生大臣期间，他很进步，又很果断，他在行政管理和立法方面都作出了无比的政绩。在卫生部和在财政部一样，他常常表示乐于考虑新的和综合的治疗方法。他的性格的这一方面和 521 他父亲的一样，是属于那种主张激烈改革的古老传统。然而，他和约瑟夫·张伯伦不同，约瑟夫进而发展到具有范围广泛和冒险思想的第二阶段，而内维尔的最后阶段却注定自己倒霉，国家受难。

他注定要作整整三年首相。跟国外与日俱增的具有威胁性的形势斗争了二十七个月以后，他命中注定看到他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他的国家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次战争是历史长河

中最有考验性和最危险的。倒霉的是，他发现自己竟和小皮特一样扮演了战时首相这个角色，他的性格对此格格不入。不幸的是，他不象皮特那样年轻，又没有皮特那种迅速恢复精神的能力。张伯伦外表冷淡而常生硬，他内心羞怯、缄默，而且容易激怒。当他终于看清希特勒的真面目时，他使用的措词似乎是抱怨自己受了骗，而不是对一个惊慌失措的民族发出响亮的号召。经过几个月变幻不定的局面后，他的政府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人民的本能如同经常那样是可靠的。在紧急关头，他们转向了那个多年来不顾人们曲解和诽谤却对他们说真话的人。

内维尔·张伯伦的命运和许多别的政治家常有的命运一样，先是被人谄媚地吹捧，然后是大受咒骂。在他倒台以后生前的几个月期间，他一定会以某种带着冷嘲式的满意心情，注视着那些趋炎附势之徒那么迅速地抛弃他，又那样急于把他们自己和他的继任者的命运连系在一起。丘吉尔在鲍德温的晚年时对他格外友善，丘吉尔对内维尔·张伯伦也同样宽宏大量。如今，在多年之后，应该回忆一下张伯伦在其熟悉的政治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进入他一窍不通的领域后遭到的失败。对他自己和国家不幸的是，他似乎认为他自己承担着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使命，即凭借自己个人权威去赢得和平，他漠视一切建议和警告，以至不可挽救。522 他相信人们可以和希特勒做交易，一旦德国的“合法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会信守契约的。由于张伯伦一点也不了解自己要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他完全丧失了警惕。

在这狂乱的两年里发生的事件，大家都很清楚，而且在一些回忆录、传记、和历史书里都有详尽的描述。我不想重述全部历史，只想着重叙述当时我的朋友和我自己都不知道而现在已被揭露出来的一些侧面。我还要详细叙述那些和我有联系的人物为了影响时局而采取的徒劳无益的行动。在介绍这出戏剧时先回忆一下它

的简单过程也许是合适的。

1937年7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征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接着英国和美国的军舰受到了攻击。1938年2月，外交大臣艾登辞职，由哈利法克斯勋爵接任。1938年3月，希特勒用暴力手段将奥地利并入德国，这就是德奥合并。紧接着就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5月，在英法抗议下，希特勒作了表面上的让步。当希特勒再次施加压力时，朗西曼勋爵于7月底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去执行那喧嚣一时但却无效的使命，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区德国人之间进行“调停”。1938年9月，张伯伦三次访问希特勒，结果在9月30日凌晨签订了慕尼黑协定。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进入布拉格，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3月31日，英国向波兰提出了保证。4月7日，墨索里尼侵占了阿尔巴尼亚。4月13日，英国向罗马尼亚和希腊提出了保证。7月和8月间，德国对但泽问题的压力和对波兰的要求更加紧了。8月22日，保证俄国中立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公布了。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

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在东方和西方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系列惊人的事件。我们的同胞也从来没有带着这种灾祸的预感和沉重的心情参加战争。 523

张伯伦政权一开始就是不吉利的。尽管新王加冕典礼是一次显示英联邦国家潜在力量的机会，它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但联邦总理会议的调子却是低沉而谨慎的。各自治领对它们新近从伦敦得到的有关外交政策问题的独立性非常敏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尽管对英王一贯忠诚，对母国热爱，却理所当然地对日本的侵略比对德国的侵略更为关切。南非政府不能看不到分裂了自己国家的“向内看”和“向外看”两派在感情上的严重分歧。在麦肯齐·金无多大作为的领导下的加拿大非常明确地表示，它决不会事先作出

保证在另一次欧战中和英国并肩作战。当时，美国对德国的日益蛮横和意大利公然并吞阿比西尼亚肯定是愤慨的。可是，它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却更为关切。但是没有任何重要的迹象表明美国真要摆脱在国内盛行的孤立主义。美国的中立法确乎对独裁有利，而不利于民主国家。

张伯伦认识到，肯定其全部内阁成员也都认识到，在辽阔而分散的战场上对付三个强有力的敌人在战略上是有困难的。英国的大臣们最终不能不回想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是有了美国的援助，才扭转了局势。德国虽然一时有些沉寂，但是很清楚它正在筹划新的行动。墨索里尼正在进行积极干涉西班牙，1937年地中海上的潜艇海盗行为只是由于依据艾登那年9月在尼翁设法达成的协议所采取的强硬措施才受到制止。7月，日本进攻上海，不过公共租界未受侵犯。南京和长江下游遭到进攻，中国政府被迫撤出他们的首都，并于9月间向国联发出呼吁。面对这样的世界形势，还有什么希望保持和平呢？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呢？鉴于英国在军事

524 上未作准备，法国在政治上又软弱无能，在张伯伦及其政府看来，即使是合乎需要的话，组织和领导一个联盟这样的英国传统政策，也似乎是不切实际的。几世纪以来行之有效的英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古老的既定体制，当然一定要采取新的形式。必须促使各自治领认识危机即将临头的紧迫性。必须恳求美国给予帮助。必须团结旧国联残存的会员国，把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准备好最大可能的抵抗，以保卫国联赖以建立的那些原则。概括地说，这就是很中艾登意的那个纲领，它也是丘吉尔在“武器与盟约”的旗帜下加紧宣传的内容。这种政策要把英国卷入迅速而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而不能过多地考虑财政部关于工业混乱和经济承受风险的抗议。如果还没有必要采取适应总体战争的措施，那么也必须使军需品生产的组织工作和武装部队的规模适应临战的形势，这是所

有不自我欺骗的人都能明显看出的。同样的，这就意味着承认国联是反对独裁者的联合中枢的作用。这就应有一个包括从左翼到右翼全部有胆有识之士、集中全民力量的英国政府。英国这种榜样很可能给法国带来新的力量和团结；这会稳定中欧和东欧的局势，也可能使俄国在适当的时候和西方真正合作。这肯定会使各自治领的舆论激动起来，也许还会激励各自治领政府采取行动。这可能会——天晓得——成功地引导美国人民沿着他们命中注定在几年之内就要承担的国际义务的长途至少前进几步。

就是这些想法，尽管是刚刚想象出来的，或者是没有充分表达出来，却开始日益占据着我的头脑。在从事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同时，我开始在我的选区就这些题目发表讲话。例如，在1937年2月，我为支持英国在保卫自由方面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以及需要迅速而有效地重整军备而进行辩论。大量闲置未用的人力和机器设备应能有利于促进这项任务。同时，我和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维维安·亚当斯、著名工会领袖乔治·巴恩斯、阿瑟·张伯伦以及坦珀利教授，联名致函《泰晤士报》，呼吁恢复国联的全部威信，不仅恢复其传统的作为调解工具的作用，而且要使它成为使用一支“具有充分力量的国际警察部队”有效地强制执行其决议的工具。这项政策的确不久就被一个叫做新联邦协会的组织具体化了，这个组织得到丘吉尔的赞许，并开始迅速前进。那时确实和现在一样，名称很关重要。德意日三国虽已退出国联，但其他国家还可以团结在它的周围，这样的国联所指挥的一支国际警察部队，与经过多次挫折和六年战争后注定要拯救人类自由的大同盟，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然而，张伯伦在经过适当的考虑以后，却决定采取相反的方针。倘若不能成功地反对独裁者，那就必须对他们进行安抚；而为了做到这一点，第一步一定要分化他们。面对着德意日的威胁，显

而易见的方针是把最弱的一个分离出来。很明显，意大利是最弱的一个。因此，张伯伦当了首相几个星期以后，就着手进行这一项并非不惬意的工作。他自信自己的决定是明智的，而且有可能成功，这种想法直到那时为止，是他在政治生活主要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

对于作为外交大臣的艾登来说，唐宁街十号气氛的改变，一定使他非常注意。他以前有时对他的知心朋友们抱怨，说他因鲍德温对外交事务没有兴趣而感到忧虑。起初他是欢迎这种悬殊差别的。但是，如果说鲍德温做得太少，那么张伯伦很快就开始做得太多了。假如说鲍德温是一个极端放任而无权威的君主，那么张伯伦却热心地承担了一个极端专制的君主的角色。

正如丘吉尔所强调指出的，外交大臣“在英国内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① 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在历届政府中占有两个最重要的仅次于首相的位置。他们俩必须在工作上和政府首脑紧密协调，并且受到完全信任。财政部除了不时发生的有关政策的重大问题之外，没有必要事事都请示首相，而外交问题由于其性质所决定，几乎每天要由外交部和首相府进行磋商。此外，就内阁而言，外交部不同于政府其他部门，甚至包括国防部在内，除了一些绝密事件外，完全公开进行工作。全部来往电报以及外交大臣或外交部其他大臣及官员会见外国大使或公使的记录，每天都要送给内阁大臣们传阅。因此，外交大臣并不仅仅在一件事情已经成熟可以作出决定时和他的同僚们进行磋商，而是在谈判的每一个阶段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必要时甚至听取他们的批评。当然，首相对政府的全部政策负责，而且应当亲自或通过他的私人办公室和各部联系。可是，他和外交大臣的关系却是具有特殊性质的。他们在公务上的观点完全一致那是最理想不过了。但是，如果他们象我们常常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87页。

看到的那样，在处理问题和性格上有所不同，他们两人就更有义务互相开诚布公。对于一位首相来说，和外国首脑们通话或者甚至对有关外交事务采取任何措施时，不在每个阶段把情况通知外交大臣，那是不能原谅的。这种做法也必然导致灾难。

不幸的是，张伯伦在这方面有许多有失检点之处。由于他惯于完全控制他所主持的部门，这种合作的概念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即使在他当财政大臣时，他就在关于撤消对意大利的制裁这个问题上，未与外交大臣商量就采取了行动，因而犯了错误。如今当了首相，他在许多事情上不仅违犯了常规，而且也破坏了光明磊落的原则，而艾登对此几乎是太迁就了。由于张伯伦急于要和墨索里尼搞好关系，他于1937年7月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而他却没有把这封信给外交大臣看。当艾登通过意大利大使发现这一事实(他一定这样做)，他把这件事当作无意的疏忽。不过，他太宽宏大量了。张伯伦在他的日记里写了下面的话：⁵²⁷

我没有把信给外交大臣看，因为我感到他会反对这样做的。^①

还有同样的情况，1937年秋天张伯伦通过邮局和呆在罗马的嫂夫人张伯伦夫人通信。他的信毫无疑问被意大利邮局拆开了，并送交意大利当局。但无论如何，奥斯汀·张伯伦的遗孀是个最不可靠的心腹，因为她对墨索里尼产生了一种难以理解的钦佩之情。她的建议是绝对不可靠的，她与齐亚诺谈话中的轻率言论令人为难，也是危险的。艾登知道了这一切以后，增加了忧虑。最后，张伯伦有点轻视正式的外交手段，而喜欢他自己的顾问和调停人。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政府的首席工业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且不论威尔逊在一个他完全没有经验领域里工作够不够资格的问题，起码在艾登任职期间，在缓和首相府和外交部的关系方面他没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330页。

起什么作用。^①

每一个首相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心腹，特别是在非常时期。例如丘吉尔毫不犹豫地在他的办公室下面设置了一个由一位“教授”（彻韦尔勋爵）领导的统计部门，大家都知道丘吉尔和他商议的问题极为广泛。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这虽然引起一定程度的愤怒，但却没有任何秘密或瞒人的事情。同样地，我在我的内阁同僚们完全知道的情况下，使用了米尔斯勋爵，他就自己所属部门以外的经济和工业问题向我提出了大量建议。事实上，其他大臣们都欢迎这种安排，因为他们对米尔斯勋爵的经验和才智是极为信任的。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位内阁大臣。我还就一些极端秘密、极为重要的问题和诺曼·布鲁克爵士（后来的诺曼布鲁克勋爵）商量，特别是在和俄国人谈判时期以及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会谈期间。作为内阁秘书处负责人的诺曼爵士，所有大臣都熟悉他；大家都尊重他的建议和判断；而他也具有和外交部及其他有关部门业务负责人紧密合作的机敏和才智。尽管我对他极为信任，但我在任何时候都未曾听到过别人对他的行为有所批评。就较低一级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张伯伦掌权期间，首相府的私人秘书班子里就没有外交部的代表。这种现象是十分反常的，也是很不明智的。在我任首相期间，菲利普·德朱卢塔爵士自始至终在我的幕僚班子里担任这一职务，他对我和他所属的部门同样忠诚。在紧要关头，他会毫不犹豫地要我注意不要忘记把我正在采取的、甚至我打算采取的措施通知外交大臣和外交部的适当部门。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在白厅以及和外国外交官接触时的行为，即使不能把他们说成是最坏的，却肯定是无助于促进首相府和外交部之间应有的信任。

尽管张伯伦和艾登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好，可是几乎一开始他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447页以后。

们之间的气氛就被阴云笼罩着。这两位大臣在 1937 年夏季所面临的前景确实是严酷的。国联由于成员国减少,已显然不起作用,它在日本和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失败之后已不能履行盟约所设想的义务。正如人们传说墨索里尼曾说过的一句带点讽刺的幽默话,“麻烦的是现在强盗比警察多”。舆论仍旧希望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而不致把世界分裂成两个对抗的并迅速武装起来互相威胁着的集团。因为人们担心这会再次出现 1914 年以前的形势。可是,除了把维护和平与道义的力量团结起来之外,英国和法国打算怎样办呢?我们面对着巨大的、日益增强着的德国军事力量,它在中欧越来越占支配地位,并且日益受到他们正在狂热建筑的莱茵兰防线工事的保护,使他们不受西方任何有效的干涉。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冒险事业上“侥幸成功”以后,正在那里和北非保持着大量的军队。他正开始在地中海建立一个危险的支撑点。在远东,日本侵略正扩大它对中国大陆的控制,并危及英美在中国及其毗邻地区的重要利益。可是,英国的武装力量仍然使人失望地落在后面,法国军队的力量和德国的对比起来,肯定是相形见绌的,而且内部的严重分歧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因此很难由英法两国单独遏制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不同地区的野心。因此,当时我们很多人认为,英国首先和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是拉拢东西方两大国——美国和俄国——使他们成为英国为和平事业而斗争的盟国。不幸的是,张伯伦由于其性格的关系,轻视一个大国,怀疑另一个大国。

在莱茵兰被占领以后欧洲比较平静的几个月里,艾登在努力处理西班牙问题的空隙期间,以任何同僚所没有的先见之明将目光转向美国。他已经认识到在我们面临危险之时,如果没有美国不同形式的帮助,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当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紧时,艾登看出了机会。美国人恼火了,但还没有激怒到要进行积极报复的程度。他们不得不满足于日本外交官就日本军队

照自己的意志采取的军事行动所作的赔礼道歉。即使美国炮舰“帕奈”号被击沉，也只是引起了国务院提出强烈照会而已。然而，艾登意识到罗斯福总统本来想作更多的事情，他正在设法教育美国人民摆脱孤立主义，接受他们的世界义务。当然，这肯定是个缓慢的过程。这位总统对世界形势的恶化越来越感到苦恼。他正在寻求他能采用的办法，以制止形势继续恶化。他终于在10月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暗示了美国采取某种积极行动的可能性。虽然这个演说在孤立主义者中间引起了一阵猛烈的抨击，可是它至少表明了总统的心情和目的。第二步是召集布鲁塞尔会议——即九国公约^①签字国会议。以这种方式，美国可以作为一个正式成员国参加会议，而不仅仅是一个观察员。尽管这次会议除了通过决议外，别无成就，但艾登和美国代表诺曼·戴维斯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令人鼓舞的。同样，1938年1月，美国海军顾问海军上校R. E. 英格索尔访问英国，和英国海军参谋人员举行参谋会谈，这一行动也具有颇为重大的意义。

当时，张伯伦却决心执行他自己的方针。在政府核心成员的支持下，他无视较有经验的顾问们的警告，似乎相信自己有能力先与意大利后与德国达成某种解决办法。这一政策不久就堕落为最糟糕的“绥靖政策”。在德国问题上，艾登不自觉地把一个工具放到他手里，后来这个工具最有害地被使用了。他任命内维尔·亨德森爵士接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担任驻柏林大使。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亨德森的履历是值得尊敬的，当时是驻阿根廷大使。可是艾登不了解他，也从未见过他。而驻柏林大使却是一个关键性职位。亨得森后来的表现证明完全是个灾难；他为人歇斯底里，刚愎自用，而且又不可靠。艾登后来才认识到自己犯了一

^① 见本卷原文第381页。

个多么严重的错误。^①

张伯伦与德国联系的初次努力是采取哈利法克斯访问德国这一奇怪事件的形式来进行的。^②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大臣又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艾登由于同意这样做,这就削弱了自己的地位,并且 531 给人造成了一个相当错误的印象,即英国人老实可欺。这次邀请原先是由戈林元帅发出的。这是参加一次打猎表演会,会上将向这位高贵的“狐狸大师”介绍不用猎犬而用射杀以猎取狐狸的各种办法。哈利法克斯不仅处境尴尬,有损尊严,因为他是受命求见希特勒的,而且这次出使的目的和重要性也被英国报纸过分夸大了,这使外交部大为烦恼。在这位伟大的总督与希特勒会见的过程中,希特勒告诉他说,处理印度动乱的适当办法就是首先枪毙甘地,然后枪毙国大党的领袖们。哈利法克斯温柔的、基督徒的性格一定是在这种野蛮面前退缩了;但他太讲礼貌,因而没有表示出厌恶情绪。不幸的是,在这次长时间的讨论中,他未以充分的火力驳斥希特勒的新论点。那就是在这变化着的世界上,领土的改变和政权的更迭只能用两种办法之一来实现——或者用战争或者用他所谓的“高等理智”。希特勒认为自由使用力量——即战争——必须由“高等理智”的办法——即讹诈——来取代。用艾登的话来说,“我们应乖乖地送上他所要的东西,否则他只得自己动手去拿。”^③哈利法克斯本应坚决驳斥这种论点。相反地,他却谈到在适当的时候,关于但泽、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等问题可作某些变动。英国所感兴趣的是看到这些改变是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的。这种和平演变的学说似乎危险地靠近“高等理智”那种学说。哈利法克斯的这次访问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带来了大量的潜在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504页。

② 同上,第508—516页。哈利法克斯勋爵此时任枢密大臣。

③ 同上,第514页。

危害。

经过与德国人这一番无益而危险的接近之后，张伯伦又重新执行他那得意的计划，用诱骗或让步的办法使意大利与其盟国德国分离。

532 不过，艾登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年前他受骗卷入所谓“君子协定”事件中去，他从中没有得到什么益处，但取得了教训。据他看，假若墨索里尼不先履行他已作出的保证，谈判新的协定是没有用处的。于是在张伯伦和外交大臣之间发生了长期的意见分歧，这个分歧直到1938年初外交大臣辞职时也未解决。张伯伦用尽了各种办法使谈判进行下去。他深信他能把墨索里尼从希特勒的魔掌中挽救出来。在另一方面，艾登却感到在墨索里尼没有表示出任何迹象要履行他已经违背了的诺言之前，进行谈判会给人以急于求成的印象，这就会使掠夺成性的强国胃口更大，同时会震惊和削弱现有的或可能的朋友。总而言之，艾登不准备为了捞回损失而损失得更多。

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的这一争论进行得越来越激烈。当这争论尚未解决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此事在艾登脑子里的压力甚至比他厌恶张伯伦追求墨索里尼还要厉害。在1937年秋冬两季的几个月里，艾登对英美关系的进展还算满意。的确，布鲁塞尔会议除了使英格索尔海军上校到伦敦访问之外，并没有什么具体成果。尽管如此，英国外交大臣和罗斯福总统之间正开始发展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一方面通过美国驻布鲁塞尔的代表诺曼·戴维斯，另一方面通过美国驻伦敦大使罗伯特·宾厄姆。由于艾登对外交背后隐藏着的现实有真正的直觉，他迅速摸到了美国的情况。在这方面，他非常得益于曾经当过外交大臣的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的意见。事情越来越清楚，罗斯福总统正在颇为巧妙地对美国公众进行教育工作而又不冒过分的政治风险。他所面

对的是孤立主义者的院外活动集团，他们始终提防英国想把美国卷进去的企图。这些吹毛求疵的人特别对于为了使美国卷入外部世界，利用英美在远东的共同利益而采取的任何行动感到怀疑。这种看法至少在当时来说，毕竟不是毫无理由的。一般地说，美国人原来都是一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愤然决定离开欧洲的人。很多人是受政治或宗教迫害的流亡者；很多人是他们欧洲老家社会制度的牺牲品，那种制度驱使他们到海外寻找出路。因此，美国似乎没有特别的理由，感情上的或利害关系上的，去干涉美洲大陆以外的事情。不过，每当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利害时，它会坚决地甚至狂热地行动起来。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导致了美国的介入，但这不是出于自愿。要不是无限制的潜艇战所带来的几乎是疯狂的政策，美国很可能保守中立一直到战争结束。即使在当时即将来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美国给予欧洲如此巨大的同情和那么重要的物质援助，它最后参战也不主要是为了拯救欧洲。日本对珍珠港进行偷袭才拯救了当时在西欧孤军作战的英国。

然而，艾登知道在所有这一切怀疑的背后，有着美国生活中最强大的动力：美国的精神力量和热爱自由的力量。因此，当艾登不在伦敦的时候，美国总统提出了一项他自己显然非常重视的建议，这项建议受到英国驻美大使的热烈支持，预先把它告诉了首相。好象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极好的建议竟遭到首相独断专行的拒绝，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克·卡多根爵士提出了劝告他也不听。当时艾登在法国南部作短期休假，但很容易把他召回国内，至少也可以派特别信使和他磋商。由于张伯伦一心只想先与墨索里尼，再和希特勒进行谈判，就决定给总统一个令他泄气的回答。美国助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把这个回答说成是“一瓢冷水”。^①熟悉张伯伦的人会认识到，当他闹情绪的时候，他确实是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552页。

冷若冰霜的。

534 罗斯福总统建议的实际细节现在已无关紧要。他建议他在1938年1月22日召集全部外交使团，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生活准则日益堕落表示痛惜，并向各国政府建议“就处理国际关系所遵守的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如果反应良好的话，那就能够取得进展。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总统草案的条款仅仅透露给张伯伦，其中有些话也许是不适当的或使人为难的。然而，正如罗纳德·林赛爵士所清楚地认识到的，不管总统的计划结果如何，它必然能取得协调美国和民主国家意见的效果。那些独裁者可能会拒绝总统的邀请。倘若他们拒绝，美国政府就越来越能团结美国舆论反对他们。这是个不能错过的机会。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暂时却步。那么为什么张伯伦竟给总统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呢？为什么他要采取总统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原谅的方针呢？张伯伦毕竟不是个傻瓜，尽管他当时处在把自己当作世界和平缔造者这样一个多少有点神秘概念的影响下。很明显，是因为他不想采取这种办法。他怕英国立即接受总统建议，法国无疑也会这样做，可是德国和意大利是会拒绝的，这将进一步把世界分裂为两个集团，并给德意两国以借口使它们与英国的关系恶化。张伯伦真心相信，他能在民主国家和独裁者之间得到和解。此外，他怕罗斯福的计划会导致延期召开他一心希望的英国和德意的会谈。他也知道在未得到充分代价作为回报的情况下，就急于对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统治给以法律上的承认，这个问题将证明是一个引起麻烦的障碍。

艾登急忙赶回英国，他立即用首相自己的作法对待首相。他自主地向英国驻美大使发出电报，要大使设法恢复原来的局面。终于做了一点工作来安慰总统受到挫伤的感情，总统和首相之间
535 交换了一些友好的电报。但为时太晚了。两大国政府首脑之间进

行远距离磋商，关系始终是微妙的，误解也就必然时常发生。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并不存在真正的误解。张伯伦朝思暮想的是私人交易，先和意大利进行，然后再和德国进行。他给美国总统令人寒心的回答并不是出于疏忽，而是仔细计划出来的。对于总统的建议是否会有成效，将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霍尔为了自己的利益百分之百地为张伯伦的决定辩护，他这样做是根据一种奇怪的理由，即我们有理由怀疑美国；首先是因为美国在1933年破坏了世界经济会议，其次是因为它在1934年通过了约翰逊法令，禁止所有不偿付旧的战时债款全部利息的外国政府在美国筹集新贷款。^①这些非难无疑是正确的，但与当时的需要完全无关。按照我们当时的严重形势，我们不应该看过去，而应该看将来。我们在困难中所能指望的朋友，没有胜似罗斯福的了，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培养那种友谊。丘吉尔就有不同的看法。他把张伯伦拒绝罗斯福的建议，看作是“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②当然，“前海军人员”可能会给罗斯福一个非常不同的回答。^③不管历史的最后评价如何，这个事件尽管当时暂时掩盖起来，一定会使艾登感觉到，他自己和首相之间的决裂是不能长久拖延下去了。

张伯伦继续坚持要开始和墨索里尼谈判。艾登要求墨索里尼至少应该在他那一方面作出一些姿态。他是否愿意接受英国的方案从西班牙撤出意大利的志愿军？这就是一个考验。

张伯伦对这件事的处理并没有构成一个体面的故事。意大利 536 大使格兰迪以他正在打高尔夫球为理由，无理拒绝前往外交部去

① 坦普尔伍德子爵：《苦恼的九年》，第264—266页。

②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199页。

③ “海军人员”是战争爆发后丘吉尔参加政府担任海军大臣和罗斯福总统通信时使用的名称。他在担任首相后，又把这个名称改为“前海军人员”。

会晤艾登，张伯伦对此毫不介意，他原谅这种傲慢竟达到这种程度，以至邀请格兰迪到首相府，还要求外交大臣参加这次会谈。在这次有名的会见中，外交大臣被置于丢脸的地位，而格兰迪却扬扬得意。这次会见确实标志着英国的荣誉和权威下降到低点。不管人们是否接受格兰迪的说法，官方的记录很清楚地表明，外交大臣的处境变得无法忍受了，这就是艾登当时所感受到的。

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的这种长期冲突和这些深刻分歧，当时群众是不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幕布才逐渐被拉开。内阁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艾登很谨慎，对他和首相的意见不合保守秘密，同时也让外交部的同事和官员保密。在他这一方面，是没有闲谈这个问题的。张伯伦也同样很谨慎。他新近通过约瑟夫·鲍尔爵士^①和格兰迪的接触，保密工作是成功的。因此，当大臣们获知已经形成的僵局时，他们中大多数人感到震惊。在举行决定性的内阁会议时，首相不得不在形式上强烈要求外交大臣留任，其实他急于尽快赶走他，此时甚至大臣中象达夫·库珀这样更为聪明的人物，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僵局。^②如果说，首相和外交大臣的争执使大臣们感到意外，那么外交大臣1938年2月20日真实的辞职更是对党和国家的一次强烈震动。在议会，年轻的议员们对艾登特别信任，指望他执行一项坚定的外交路线。全国大量的各党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也是这么信赖艾登。有这么一种感觉，即艾登代表着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斗过的一代，而他是少数幸存者之一。人们都知道，他具有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的⁵³⁷思想，而成功的外交政策只能以此为基础。同时，也根本不容易彻底搞清楚他辞职的原因。他在下院的讲话和其后的辩论中，也没有把这个紧迫的问题完全弄清楚。主要之点即在撤退

^① 保守党研究室负责人。

^② 达夫·库珀：《老年人忽略了》，第215页。

志愿军的方案达成协议以前不应和墨索里尼举行谈判，这个问题似乎在最后时刻通过一个居间人——艾登不愿透露此人的名字——传给首相的秘密口信才应付过去。事实上艾登不可能揭露整个情况，揭露了至少也会对英国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他对罗斯福的倡议及其含意什么也不能谈。他曾再三抱怨重整军备的步伐缓慢，还有他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对内阁提出的严重警告，对此他一点也不能谈。他也不能透露他曾遭受到的全部侮辱。他特别不能抱怨首相在盲目推行“绥靖”政策时所采用的非正统和丢脸的办法。

确实奇怪，和鲍德温同样深深痛恨劳合·乔治的张伯伦竟然模仿起劳合·乔治的一些不太体面的做法。例如，有关外交事务的新闻公报，在未征得外交部同意的情况下，虽然名义上不是，实际上却经常是由首相府发出的；独立工作的霍勒斯·威尔逊已经成了首相的“顾问”；本意良好（结果往往不好）的、非专业人员的意见比可靠的、有经验的专业人员的意见更受到重视。与此类似的是，由于张伯伦每天和霍尔联络并非常信赖西蒙和哈利法克斯，他似乎决心回避他自己的外交大臣。无论如何，艾登下了决心他将不会继续表示容忍，象寇松勋爵在劳合·乔治手下长期受罪那样。

艾登辞职宣布以后，轰动是巨大的。然而，由于对辞职的真正原因不清楚和含糊，到辩论的时候就显得有点虎头蛇尾了。当然，在议会休息室里和保守党议员不同集团的会议上引起了很大的激动。艾登于2月21日在传统的下院中间通道的下面第三个席位的拐角处——发表了她的辞职演说，第二天全天都在辩论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投票的动议。辩论很严肃，给人的印象也很深刻，但是议员们仍然难以弄清楚所有这些争论究竟是为了什么。外交部次官克兰伯恩同时辞职，他的讲话就更为尖锐。然而，有些议员竟然相信当时大量流传的谣言，即艾登正患精神崩溃病。《泰

晤士报》当然不会不宣传这种说法，这个谣言据说是从西蒙那里开始的。^①从政府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肯定是一种对它有利的解释。尽管报纸上和议会休息室里有一种说法，我是一个字也不相信的。我记得梅尔本勋爵的一句名言，那就是他经常发现被人们肯定的事情都不是真的，特别假若那是“可能根据最可靠的来源”的话。结果，尽管丘吉尔发表了焦虑和阴沉的讲话，尽管劳合·乔治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有些无的放矢），都没有严重动摇张伯伦的地位。可是，就整体来说，党很关心这件事情，那时有许多人开始意识到我们正在陷进去的可怕的境地。最后，和丘吉尔商量的结果，决定最好的办法是拒绝投票。维维安·亚当斯感情非常激动，坚持要投政府的反对票。但是，我们当中其余的刚刚不到二十人听从了丘吉尔的建议。我们这个集团包括了支持政府的各党派各翼的代表。我和哈罗德·尼科尔森、希尔斯少校、斯皮尔斯将军、安东尼·克罗斯利、海军上校麦克纳马拉、龙尼·卡特兰一贯是可疑分子。但是，党的督导员们看到象约瑟夫·诺尔爵士（一位有名的相当右倾的工业家）、伦纳德·罗普纳、罗宾·特顿以及迪克·布里斯科这样一些可尊敬的人物参加了我们这一次行动，一定会感到意外。不久就发挥重大作用的保罗·艾姆里斯—埃文斯，另外还有汉密尔顿·克尔也拒绝了投票。丘吉尔本人和布伦丹·布雷肯当然也没有投票。“不投票”也许不是一个很勇敢的议会姿态。但是，如果向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各方面说明，在投票厅缺席并不是因为没去议院，那么“不投票”便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抗议了。我们都相当小心地保证做到这一点。

对于这个突然的大变动，丘吉尔几乎感到绝望。他对艾登已经十分尊重，而在特性上他更为关心的是由于艾登的去职而给国家所造成的损失，而决不是考虑反对那时政府似乎集中执行的方针

^①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面对独裁者》，第601页。

所获得的力量而感到安慰。

继任艾登职位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他的崇高的名誉给政府带来了好处。爱德华·哈利法克斯是一个具有特殊魅力、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和长期公共事务经验的人。但是在艾登失败之处，他也无力取得成功。一个来自上院的外交大臣是有一些有利条件的。他有更多的时间搞他的工作，并且不会因议会问题和议会辩论的压力过多地分散自己的精力，而在下院这种压力却是重得多的。但是政府的体制却要求外交大臣和首相之间建立一种特殊关系，还要求担任这两个重大职位的人相互完全信任。而且，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对外交事务都没有任何实际经验或知识。如果说张伯伦用多少有点狭隘的观点来处理外交事务，并且一直到最后还相信他和希特勒及里宾特洛甫有可能作成一项“交易”，那么作为一个大绅士和贵族的哈利法克斯则觉得完全无法理解这样一些人的思想。他简直无法理解掌管一个大国的政治家竟能完全没有真理观念和荣誉感。艾登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的继任者和首相一样，继续相信书面保证和正式协定的价值。似乎很奇怪，他们竟然没有记住，一个远比这两个匪徒受人尊敬的人是怎样轻视“等于一张废纸的条约”的。^① 哈利法克斯也没有少受由报纸和首相府的宣传活动所造成的麻烦。他对首相府未和外交部协商就发出的乐观主义宣传所造成的恶果，不得不常常提出抗议。

哈利法克斯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还有两个更为深远的后果。第 540 一，首相在下院越来越多地陷入外交事务的细节中去。有关中国、西班牙、意大利还有德国的每一问题，首相对反对党的攻击只有首当其冲。^② 由于他辩论的调子虽然很有力量，但却从来不是和解的，结果在需要最大程度的团结和谅解的时候，却造成了越来越大

^① 贝特曼-霍尔韦格对 1914 年比利时条约有名的描述。

^② 坦普尔伍德子爵：《苦恼的九年》，第 281 页。

的怨恨。工党和自由党的议员以及某些保守党人开始对张伯伦感到有点象是憎恶的情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直到 1940 年 5 月张伯伦政府因投票不利而倒台以前，组织一个真正的举国一致政府就成为不可能的了。第二个后果部分是由于哈利法克斯缺乏经验和谦虚，指导外交事务的权力落入了霍尔在其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四巨头”之手。^①这个核心内阁是由张伯伦、哈利法克斯、西蒙和霍尔组成的。就是这个核心小组在 4 月和 9 月与法国部长举行具有决定性会议期间掌握大权，而且一直到张伯伦政府倒台时为止。很难想象还有比他们更糟糕的班子了。

艾登辞职以后，局势是一个阴暗的前景。我们用不着等多久就遭到另一次打击。三个星期以后，即 1938 年 3 月 11 日，奥地利被强占了。

希特勒是不喜欢失败的。1934 年 7 月，他布置暗杀了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这是当地的纳粹党在德国鼓动下干的。然而，原来准备接着就吞并奥地利的阴谋却没有成功。法国和意大利携起手来，墨索里尼认为自己是够强大的了，就派了几个师去勃伦纳山口，因而使希特勒缩了回去。那时过了几乎四年之后，希特勒准备好了，而他对意大利的担心终于因墨索里尼的默许而解除了。希特勒表现出几乎是歇斯底里般的欣慰，公平地说，他没有忘记他的伙伴对他的情义。因为就在紧接着以后的几年里，意大利证明简直是个累赘，而不是有什么好处的伙伴了。在希腊、在北非、在意大利本土，为了设法挽救他们的盟友意大利的失败，德国人耗尽了自己的力量。

541 德国对奥地利的这次最后的行动是按照后来成为德国侵略的常用方式周密安排的。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被召到贝希特斯加登，受到长达一昼夜的威胁，简直近乎用刑了。结果，他同意任命

^① 坦普尔伍德子爵：《苦恼的九年》，第 291 页和第 301 页。

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控制全部警察。这是决定性的措施。因为就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爆发了示威游行和骚动，预示着国家的崩溃。然而，许施尼格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于3月9日宣布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看看人民是赞成和德国合并还是赞成奥地利独立。这个勇敢的姿态被长期以来认为德奥合并是不可避免的内维尔·亨德森描绘为“计划不周，准备不够的蠢事”。可是，对希特勒借自决的名义要求把奥地利并入德国，允许奥地利人民自己作出决定，这似乎并不是不合理的回答。当时普遍认为奥地利由于丧失了旧帝国，已成了一个无法生存的国家，因而并入德国就成了一个很自然的、甚至是健康的解决办法。即使如此，由于自愿加入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德国是一回事，而用蛮横手段被迫加入已被纳粹暴政弄成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德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奥地利终于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恢复了它的地位。我在1938年没有想到，在十七年之后我竟然以英国外交大臣的身份，在维也纳签署了恢复奥地利自由和独立的文件。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的第二天，张伯伦在下院以非常的强烈口气抗议希特勒的行动。他提醒我们奥地利是国联的一个成员，英国和法国、意大利一道，对其独立深为关切。德国已经干下了这一场侵略行为，甚至拒绝接受英国的抗议，理由是这个问题是日耳曼大家庭内部的事。考虑到仅仅在数周前首相对国联盟约的安全条文还是藐视的，我们下院中许多人听到他的声明感到惊讶和高兴。我们认为这样重新肯定英国对中欧的关心，似乎表明了一种较为坚强的态度。很自然，一旦完成对奥地利的占领就会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因此，首相的声明很受捷克政府的欢迎。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不仅象奥地利一样是国联的一个成员国，而且还和法国及俄国订有长期的防御盟约。^①

^① 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36页。

可是，这个辩论主要令人难忘之处是丘吉尔那个非凡的讲话。议员们凝神静听他的讲话，许多议员终于面对现实，被丘吉尔所谓的“精心策划和在时间上巧妙安排的侵略计划”的逐步展开的描绘所吸引住了。他问道，我们还要坐待事态的演变多久呢？德国在虚张声势的恫吓后面正在聚积力量，在这种力量变成不可抗拒以前，还要让这种虚张声势的恫吓得逞多久呢？他描述了维也纳的战略重要性，它是一个有公路、河流、铁路通向旧奥地利帝国所属各国的交通中心；描述了新的德国有能力控制东南欧的石油、矿藏和原料；描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岌岌可危，它的侧翼在某种程度上被包抄，它的贸易可以很容易被扼杀。他的讲话严肃而有权威，但却丝毫不带怨恨和责备的气味。他表现出他对自己所讲的题目十分精通，这是由于他对历史和战争艺术有深刻的研究。我当时一直在阅读丘吉尔所著有名的《马尔巴勒传记》的前三卷，并期待着最后一卷出版。据我看这部著作是丘吉尔全部著作中最优秀的，它无意中反映了当时相近似的时局。这位传记作者的祖先的精神似乎已经传给了传记作者本人。他在议会讲话时，象是一个置身于党派之外、超出党派之上的人，完全是为了他的国家。这次讲话深深感动了我。三天以后，我必须在斯托克顿保守党协会妇女分会的一次会议上讲话。这是一次表达我的见解的机会。我说：

我相信现在要避免战争为时还不太晚。使世界震惊的主要还不是德奥合并，而是达成德奥合并的方法，是无视既经表达的世界舆论，是大规模的残忍和迫害的行动，从奥地利开始的必将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

543 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和 1914 年的局势没有什么不同。许多人和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和 1914 年的自由党政府在那年 7 月非常明确地说明，如果比利时受到攻击，我国就给以支持，那就不致发生战争了。

如果我们打算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我们参战的理由——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这样做，但我说如果我们打算这样做，那就是说我们打算和法国及俄国联合在一起，我们最好现在就这么说，而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再说。

这时我很想看到扩大政府的举国一致的基础，就是接纳一些以前离开了政府的自由党人和一些工党领袖人物。我还想看到政府能容纳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这样一位在野的伟大人物，以便向全世界显示，在我们面对外界威胁时，我们在内部事务上完全分裂的党派分歧是无损于我们的团结的。^①

这至少是斯托克顿妇女们能够理解的讲话。这个讲话要比她们多年来非常耐心地坐着听完的那些关于经济的讲话好得多。

俄国人十分吃惊，他们于3月19日建议召开四强会议，讨论应付正在急速恶化着的形势的措施。三天以后，即3月22日，首相和外交大臣建议内阁拒绝这个建议。因此，首相在3月24日发表了一个进一步的声明，我记得我也听过这个声明，它看来比他因为希特勒傲慢而第一次引起激动时所作的讲话是有些后退了。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士曾把这个声明描绘为“一篇使人困惑的杰作”。^②这肯定会使全世界对英国在遇到各种意外事故时，会做哪些事或不做哪些事，感到困惑不解。不幸的是，影响到名单上第二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明确声明，对希特勒来说，几乎是一种鼓励，而不是一个威慑力量。张伯伦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当时不打算宣布他们准备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免受无端的侵略，也不愿意带头要求其他国家这样做。他们不能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即战争与和平的决定听其自然，英国当时的政府不能自行处理。同时，首相在颇为含糊的结论中指出，如果战争临到捷克斯洛伐克或别的

544

① 《北方回声报》，1938年3月18日。

② 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36页。

侵略受害者的头上，战争不可能限制在那些已经承担了条约义务的国家身上。没有人能说战争会在哪儿终止。别的国家可能会被卷进来。这对英国和法国基本上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有着长期的友谊和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这个讲话多少有点玄妙难解。我们有些人认为这个讲话至少向希特勒传达了一个谨慎的警告。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梦想到，不出几个月首相会着手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逃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以免英国卷入。

然而，德国占领奥地利有一个方面，现在我们已完全了解。由于大量的坦克和大部分机械化运输工具出了毛病，凯旋进入维也纳（这是希特勒一生中登峰造极的时刻，这位奥地利下士将扮演另一个恺撒的角色）很有可能变得有点滑稽可笑。幸亏这些新式战争工具被装在铁路货车上，由比较平常的蒸气动力运输工具成功地运到了维也纳的指定地点，才得以及时参加了阅兵仪式。^①

自那以后，我一直独自思索着的一个问题是，英国的驻外武官和特工处给政府打了些什么报告？多年来看到送到白厅的情报非常准确，而政府仍然对自己的军事弱点感到如此烦恼，其实他们没有认识到德国人也正遭受到类似的麻烦，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很明显，象 1940 年使法国屈服的德国巨大的机械化突击力量在 1938 年是不可能存在的。假若没有德国在法国占领区的前进基地，即使英国空中力量处于劣势，那也不会有多大的危险。在从军事角度来讨论慕尼黑解决办法的得失时，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因素，但却很少被考虑到。

已经感到茫然和混乱的下院从政府似乎较为坚定的态度中，
545 得到一定程度的安慰。奥地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显然是受害者名单上的第二个了。在吞并奥地利之后，戈林曾向捷克斯洛伐克驻柏林公使发誓，“捷克人无需害怕德国”，这件事本来应该使贝奈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 211 页。

斯总统有所警惕。此外，希特勒继续维持了 1925 年签订的两国仲裁条约。虽然贝奈斯或许当时对德国的口是心非怀疑得还不够充分，但他理所当然地应把他的信心主要放在先和法国、以后又和俄国缔结的互助条约上。

捷克斯洛伐克和许多新出现的国家一样，当然是由若干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其中有七百万捷克人，三百万日耳曼人，二百万斯洛伐克人，还有少量的马扎耳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这些日耳曼人从来不曾包括在德国的本土之内，希特勒后来叫嚷要他们“归属”德国，那是歪曲历史。多少世纪以来，他们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而从 1866 年到 1918 年他们又隶属奥地利帝国。这些少数民族肯定有某些不满，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这些少数民族比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少数民族受到更好的待遇。在旧波希米亚王国境内成长了一个现代化的、高效率的、管理得很好的、民主化的社会。那时由希特勒煽动起来的苏台德日尔曼人党在形式上鼓噪着要求解除他们的疾苦并实行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但这仅仅是掩盖希特勒真正目的的烟幕而已。他下决心要摧毁捷克国家本身。因为它在中欧占据着一个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战略位置。它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是由天然地形构成的。除了山脉的保护以外，并建有由要塞构成的强大的防御体系，人们常把它和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相比。^①在德国占领奥地利以后，捷奥边界确实无法防守了。然而，当捷克斯洛伐克的力量未受打击就被摧毁时，原来确实是很担忧的德国将军们都相应地解除忧虑了。

546

德国使用了全部肮脏的手段迅速而又全面地开展了宣传战。在 5 月的第三周，伦敦相信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已迫在眉

^① 我根据 C. L. 莫瓦特所著《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 604—605 页综述。

睫。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因此奉命向里宾特洛甫提出了警告。哈里法克斯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和德国驻伦敦大使谈了话；法国和俄国也都提出了类似的抗议。人们认为这些警告发生了相当大的作用。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希特勒似乎踌躇起来了。也许，似乎是强大的英法俄联合给了希特勒以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所有的顾问，包括总参谋部在内，都强烈主张退却，或者至少是推迟行动。希特勒大发雷霆，由于全世界报刊都发出了兴高采烈的调子，他的火气越来越大。坦克履带和发动机出了毛病以及英法在俄国支持下最近显示出的坚定性，也许同样是可以探求的一个理由。考虑到当时德国武装力量和已知的捷克军队在装备、防御阵地和士气方面的力量，希特勒无法对付一场两条战线、也许是三条战线的战争。然而，我们现在从德国档案中获悉，当时希特勒只同意把他的新冒险推延到10月。将军们必须在那以前作好准备，而法国和英国可能对他们突然表现出的决心感到后悔。

如果这些事件使希特勒震怒，而这些事件也使张伯伦惊恐。似乎只是在4月底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及法国外交部长博内的会谈中，张伯伦才极为困难地被说服接受了促使——或者说好象促使——希特勒后退的方案。但是下一次危机将如何避免呢？必须说服捷克人作出重大让步，必须劝告法国不要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为了达到“和平解决”就必须着手有效的谈判。这种带艺术性的词语在长长的绥靖史中一再不断出现，它事实上意味着在威胁面前投降。这意味着德国有权通过威吓、煽动和各种压力（只要不卷入实际军事行动就行），取得它所要求的一切东西。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的确有其长期的背景。多少个月以来，在杰弗里·道森影响下的《泰晤士报》一直鼓吹需要在牺牲德国邻国的情况下建立英德协约。这一方面是由于夸大了德国的不满之情，另一方面是由于所谓的“帝国孤立主义”，英国应该从欧洲大陆摆脱出来。可以想

象这种政策是用把整个欧洲无耻地断送给德国霸权之手的办法来执行的。即使作到这一点，这种政策也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一旦欧洲陷落，英国及其帝国能站得住吗？这种政策是由精心窜改的新闻长期培育起来的，它找到许多公开的或隐蔽的信徒。汤姆·琼斯曾把这个政策强加给鲍德温，因此在1936年敦促鲍德温和希特勒举行一次会晤。只有从那时以后，所谓的“克莱夫登派”作为许多有名的支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核心，才在政治上开始重要起来。琼斯在他的日记中意味深长地写道：

他(希特勒)因此要求和我们结成联盟，组成一个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堡垒……在外交政策上，劳合·乔治和鲍德温更接近，而不是和温斯顿更接近。^①

琼斯的日记中详细描写了劳合·乔治于1936年对希特勒的访问，^②对这两个人物的讨论作了出色的叙述，在讨论中这位伟大的、激进的战时首相似乎完全无视希特勒的一连串背信弃义的行为，以及包括迫害犹太人在内的纳粹制度中最可耻的几个方面。在这个时候他明显地支持同德国合作来反对俄国，虽然在慕尼黑事件以后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里宾特洛甫也曾催促鲍德温和希特勒会晤，假若不是鲍德温在性格上不喜欢搞任何戏剧性的积极行动，假若不是他除了一年一度的疗养以外不愿到外国去，他就可能受骗上当接受里宾特洛甫的意见。

这一切之所以重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张伯伦一定也模模糊糊地已经听说过这些建议，并在9月这个关键时刻可能受到这些建议的影响。真够奇怪的，汤姆·琼斯那时多少改变了一点看法，并于1938年3月写道，他欢迎丘吉尔进入政府领导空军部。他继续写了下面的话：

^① 托马斯·琼斯：《日记和书信，1931—1950》，第209页。

^② 同上，第241页以后。

他(丘吉尔)由于在最近一些讲话和文章中支持国联, 他已给工党造成良好的印象。为了应付紧急情况, 许多人希望在更为举国一致的基础上改组政府, 把两位工会领袖贝文和西特林吸收进来。一定要想办法消除人们对内维尔过分倾向法西斯分子的怀疑。^①

所有这些失败主义的活动长期以来不断进行, 并且影响了缓慢进行的重整军备的工作。据艾登所知, 哈利法克斯和金斯利·伍德可能对德国人不舒服的有关重整军备方面的任何事情都吹毛求疵。^②有名的1935年白皮书被《经济学家》周刊称为“黑皮书”。工党攻击战争公债为“为死亡借款”, 并且自始至终反对重整军备。任何关于组织一支军队在欧洲大陆作战的问题, 甚至到了1938年也被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描绘为“灾难性的蠢事”。若说直到慕尼黑事件前绥靖政策都没有公开地或含蓄地受到广泛的支持, 那是对历史的歪曲。直到事态的无情发展暴露了已经控制了德国的那个人的真面目时, 英国的舆论才开始有所转变。艾登的辞职至少产生了一根主心轴, 抱有不同政见的保守党成员围绕它得以更快地组织起来。

因此, 在这个夏季里, 保守党内持不同政见的集团开始形成。第一个集团是所谓的“老卫兵”——丘吉尔及其忠实的支持者, 只有五六人, 包括布雷肯、桑兹、和布思比在内。艾登集团——亦即“漂亮哥儿们”——全部人数大概在二十左右, 由于新的危机明显地正在逼近, 这些人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开始定期聚会。这些会议由艾登主持, 在几个人的家里举行; 有时在J.P.L. 托马斯的家里, 549 有时在马克·帕特里克的家。人数逐渐增多, 到慕尼黑事件以后达到三十人, 也许更多一些。和所有议会集团一样, 这个集团的成员也是流动的, 但我特别记得保罗·埃姆里斯-埃文斯担任秘

① 托马斯·琼斯:《日记和书信, 1931—1950》, 第397页。

②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 面对独裁者》, 第501页。

书,克兰伯恩、艾默里、沃尔默、斯皮尔斯将军、哈罗德·尼科尔森、罗纳德·特里、西德尼·赫伯特、德里克·冈斯顿、克罗斯利、以及罗纳德·卡特兰都是最积极的成员。我加入艾登集团,但也和丘吉尔保持紧密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我在两个集团之间起了连接作用。当然,丘吉尔自己也经常和艾登协商,但是他同意他自己及其直接追随者暂时和艾登集团分开更为明智。因为丘吉尔很久以来处于事实上反对政府的地位,所以艾登更能吸引那些迄今仍然忠于政府但正在开始有所怀疑的人。当然,丘吉尔和艾登都从许多方面得到充分的关于当前情况的消息,我觉得我自己由于和这两个集团都有联系,对于正在发生的情况内含的重要意义比过去知道得更多了。

当时开始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施加一连串压力,对此约翰·惠勒-贝内特爵士在他的权威性的、附以大量文献的历史著作中作了极为详尽的描述。^①当然,我们尽管怀疑,却无法准确地了解事态的进行情况。与此同时,议会工作在继续进行:财政法案、各种立法程序、以及议会生活中的日常工作。但是,我记得那几个月象是一个焦急等待的时期,大祸临头的感觉日益增加。不管怎么说,在1914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战争的来临犹如晴天霹雳。但在当时,好几个个月以来,许多人公开讨论战争,认为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想到另一代人可能命中注定要遭受我们在二十五年前受到的痛苦,这是多么可怕啊。我的唯一的儿子不久就要从中学毕业,升入大学。难道我和我的同时代的人所遭遇的事都要在我们孩子们的身上重复一遍吗?所有那些恐怖的事都将再次降临这狂乱的世界吗?依靠象丘吉尔和艾登这样一些人的判断,以及也依靠我自己的直觉,我相信避免战争——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的唯一希望是一个大胆而有力的政策,执行这一政策希特 550

^① 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

勒或许可以受到遏制。然而，我坦率地说，议会内外绝大多数我的朋友的观点又使我有时感到犹豫。到底张伯伦会不会是正确的呢？通过谈判可能达到某种程度的解决吗？或者，我们只不过是填满希特勒的胃口，然后我们被迫处于一种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单独作战的地步吗？现在的读者可以利用大量已经公布的有关这个悲剧时期的文献，很容易看出当时政府想要努力完成的事情是无益的、危险的。我们现在占有全部的德国文献，包括希特勒与他的将军们的讨论和他给将军们指令的记录。这些档案揭示了一个狂妄的但却是明明白白经过慎重考虑而产生的逐步吞并欧洲的计划，象这样的计划似乎很难想象是由一个人设想出来的。现代评论家必须记住，这个计划的全部内容在当时只能加以猜测。我们不得不部分地依靠我们获得的一鳞半爪的消息，部分地依靠自己的直觉，尽我们的最大可能来进行判断。我们甚至连政府坚持置之不理的资料也没有。

夏季几个月过去了，对不幸的捷克人施加的压力日益增大，我们这个小小的议会集团却只能干瞪着眼看着。即使我们当时能集聚足够的议员把政府搞垮，我们也无力改组政府。继任的政府也不可能带给我们多少鼓励。自由党人和工党成员在原则上都赞成“抵抗独裁者”，但仍然决心抵制能够促使英国军事力量迅速增长并能相应加强其对法国和其他国家影响的唯一实际可行的措施。我和当时的反对党有过多接触。在这两种相反的情绪之间似乎不那么茫然的为数很少。我与之开始讨论这些问题的休·多尔顿是其中之一。他是个杰出、坚强、热诚的人，他用一种古老的、恰当的英国方式把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无论如何，他比他的许多同事具有更切合实际的想法，正如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所了解的那样，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促使他的同事们面对现实。他以某种蔑视的态度来描绘工党的路线。他们似乎把集体安全政策

当作除了“依靠红军”以外英国无需提出什么别的贡献的东西。^① 551
他们想达到目的,但不准备采取措施。

人们知道政府正在对捷克总统贝奈斯施加压力,要他采取“和解”政策,并对苏台德的德国人的要求不断作出越来越大的让步。当然,所有这一切是以亨莱因是一个真正寻求妥协解决办法的地方领袖为前提的。^②他事实上是一个纳粹傀儡,没有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他决提不出任何计划或作出任何决定。希特勒并不是谋求一种满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德国人的公平解决办法。他要的是一个进行战争的借口。他决心要消灭这个凡尔赛和约的产物,从而消除通向东方的障碍,那里仍由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天然地形及其组织完善、装备精良的陆军部队防守着。

8月初,张伯伦由于看到事情没有进展,便决定采取自己的行动。他决定派一位英国代表干预捷克政府和苏台德地区德国人之间的问题。他为此选择了朗西曼勋爵。他有点虚伪地于7月24日对下院说,这个代表团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请”而派遣的。朗西曼不是作为一个仲裁者,而是“作为一个调查员兼调解人”。事实上,捷克政府根本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邀请,只是在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之后,才很勉强地同意发出这个所谓的正式邀请。捷克政府不可能和亨莱因举行任何有实际效果的谈判,他接到的指令是拒绝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张伯伦也对下院说:“我们并不是在逼迫捷克人”。^③事实上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法国人,多少周多少月以来从未停止“逼迫”不幸的捷克人。张伯伦还说,据他看,总的说来欧洲大陆的紧张形势有所缓和。他说这话完 552

① 休·多尔顿:《回忆录,1931—1945:决定命运的年代》(伦敦,1957),第46页。

② 康拉德·亨莱因是苏台德德国人党(S. D. P.)的领袖。事实上该党决不能代表苏台德区全体德国人。另外还有四个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农民党、德国基督教社会党、和德国小商人党(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82页)。

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7月26日。

全不顾他必然已经知道的关于德国军事准备的消息。第二天，议会按照惯例休会。议员们到各地度假去了，他们中大多数人相当乐观。

朗西曼代表团带着英国新闻界和公众的相当大的好意启程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并于8月4日在布拉格开始工作。丘吉尔和艾登对这个使团的作用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个代表团团长的选择及其成员的组成对他们都没有造成印象。代表团里没有一个人对捷克问题有任何知识，虽然很幸运碰巧财政部有一位青年绅士曾在捷克乡村骑自行车度假，他研究过中欧的德国人少数民族问题，他们把他吸收为代表团的一个成员。^①朗西曼是一位国内事务经验丰富的自由党政治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政府里担任过许多职务，成绩优异。但他并不是一个有威望的人，而且他执行使命的方式也不能取得捷克政府和人民的信任。象许多出身中产阶级并有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亲戚那种有钱的自由党人一样，他对贵族政治有特殊的爱好。因此，他在一些奥地利大贵族、古老的奥地利帝国的幸存者的城堡中度过周末，这些人心里从来没有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是他们的祖国。他们用亨莱因的纳粹突击队守卫他们的财产，这就表明了他们的感情。这就象在今天派一个代表团去爱尔兰解决那儿出现的一些困难问题，但却只和英国—爱尔兰地主阶级的残余分子打交道。朗西曼在执行任务时，还不断受到来自伦敦的压力。结果，由于亨莱因不能真正自主地进行谈判，而捷克人又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屈服，方案一个接一个地被提出来，又一个接一个地被拒绝，到了8月底，危机似乎达到了顶点。贝奈斯作了进一步的让步。9月4日，由于希望取得解决，他提出愿意接受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要求，那就是说，允许他们完全地方自治。他仅仅对彻底修改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使之并入德国体系这样的无

^① 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79页。

耻要求,不愿接受。

这个消息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似乎是解决问题的前奏。亨莱因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真的,他还能提出什么呢?亨莱因的要求被接受了,没有人比他自己更为吃惊。这简直是奥地利在1914年对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的翻版。希特勒也同样感到为难。这时英国新闻界进行了两次干预,都是同样不负责任的。代表左翼的《新政治家》宣称,波希米亚边界的战略价值不应成为导致世界大战的因素。^①《泰晤士报》是一家全国性的大报,还被国外认为是反映官方意见的,它在9月7日的社论中竟然以更大的权威更前进了一步:

如果苏台德人现在所提的要求比捷克政府在其最近一系列的建议中准备给予的还要多的话,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人不光是在于为那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感到不自在的人解除困难。在那种情况下,值得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排除为某些方面所赞成的方案,即割让外族(这些居民毗连着因种族相同而结成一体的国家)聚居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民族更加单纯的国家。^②

这个方案甚至激怒了哈利法克斯。外交部立刻发表了一项声明,否认《泰晤士报》的声明代表官方意见,并重申英国决心站在法国一边。但是,危害已经造成了,无法补救。

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希特勒预定9月12日在纽伦堡发表演说,这或许会给我们以回答。

我和我的妻子是在苏塞克斯家里听到这个演说的。那天只有我们俩在家。但是,就在这个演说开始以前,赛西尔勋爵^③瘦长的

① 《新政治家》,1938年8月27日。

② 《泰晤士报》,1938年9月7日。

③ 切尔伍德的赛西尔子爵。

身影出现了。他是从他在阿什当森林的香杨梅别墅走来的，那里离我们家的大门约有几百码。

554 赛西尔勋爵是我们家的世交。作为一个孩子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的弟兄和我都极为尊重他，而且相当敬畏他。首先，我们羡慕他，因为他常常驾驶着一部老式汽车，而我们仍然只乘坐单马拉的双轮马车，或者小马拉的双轮弹簧马车。他那部汽车是用蒸气开动的，常常打火。

他还是个热烈的高尔夫球和网球的爱好者，虽然他的打法不太正规。我现在能看见离高尔夫球洞二十码以内地点的情景，他的腰弯得几乎接近地面，常常显得难看，但却是不可思议地准确。他非常喜欢草地网球，他在打球时惯常使用一种巧妙的“削”球法(吸取硬地网球的打法)，这种打法在我们的网球草场上总是令人难以对付的，有时候具有毁灭性的威力。

我们在1938年有一部某种类型的无线电收音机，而他却没有。因此，他到我家来听希特勒的演说。如果我的记忆是正确的话，这篇演说先用德语广播，随后就播送译文和评论。

我现在仍能看见赛西尔勋爵伸直身体，几乎平卧在曾经作过我母亲的而当时则是我妻子的休息室里的一张沙发上面，他那长而消瘦的身躯、漂亮的脑袋、以及鹰钩大鼻——好象一个现代的萨沃纳罗拉。^①他和我都不会说德语，也不懂德语；但是我的妻子曾先后从好几位德国女家庭教师那儿学到了这种语言的充分知识，这使她能听懂大致的内容(不过如此)，并能抓住一些特别的语句。但是，不管是精通德语与否，没有一个收听的人不会领悟到演说者——声音粗哑、疯狂、几乎不近人性——吐出的充满恶意的、蛮横无理语句的含意，以及狂暴的听众发出的象一群野人作战时呐喊那样的咆哮“胜利万岁”的含意。

^① 萨沃纳罗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译者

在讲演结束时，自始至终一动未动的赛西尔勋爵慢慢地舒展了一下他那平躺着的身躯。他严肃而又缓慢地说，“这就意味着战争”。但是，当第二天报纸评论员开始分析希特勒所实际说的东西时，似乎有些疑惑了。无论如何，正象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还要过两个星期才是确定了的“绿色行动”——对捷克斯洛伐克入侵并征服之——的日子。尽管这个演说对贝奈斯总统的咒骂极尽粗俗下流之能事，它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来。它甚至没有提出在苏台德区进行公民投票，也没有提出转让领土。这就有待于英法方案去提出了。这篇演说是一个威胁，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是，到 555 当时为止，只此而已。

这篇演说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对亨莱因和苏台德的德国人中的纳粹党来说，任务是明确的。它意味着骚动，制造“事件”，以及某种类似革命的行动。不幸得很，使希特勒大为烦恼的是，这些示威游行很容易就被捷克警察控制住了。

对于法国和英国政府来说，这篇演说意味着什么呢？不幸得很，它意味着象兔子见到黄鼬一样吓呆了。巴黎和伦敦不仅没有发出坚定、响亮有力的回答，连吭一声也没有。果然，“英法方案”不久就出笼了，其中包含着给予希特勒某些他尚未要求的東西——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并把全部苏台德区让给德国。

议会在休会。他们得不到消息，也没有对政府施加压力。的确，英国舰队按照历来的常规，正开赴适当区域进行一年一度的演习。这时，法国的正规部队在没有总动员的情况下进入马奇诺防线阵地。但是法国政府因内部不和而四分五裂。大部分人被吓瘫了。包括雷诺在内的少数人感到无能为力。英国大使报告说，要是英国不带头去干，法国内阁是不能也不愿作任何事情。实际上，法国给伦敦的文电是“你们尽力为我们达成满意的协议，但是不要威胁和危机”。英国政府大为宽慰。毕竟法国是捷克斯洛

伐克的盟国。是法国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如果法国遇到困难，我们愿尽力帮助：使用海军；或许派两三个师的陆军。这就是奥利弗·斯坦利所谓的阴谋——恐吓法国人，使他们变节，然后踏着他们的肩膀溜掉。唉！除了达夫·库珀以外，所有的大臣都是极愿变节的。无论如何，从巴黎来的报告给了张伯伦长期以来一直等待着的机会。他要提议亲自和希特勒会谈。

但是，巴黎或伦敦对纽伦堡演说的极端无礼和挑衅行为没有
556 作出回击，这也等于是回答了希特勒和他那些焦虑的顾问们的问题。法国和英国将采取行动吗？希特勒早就相信他们最终是会让步的。张伯伦愿意访问他，这就使他加倍有把握了。

现代的读者很难体会首相的决定所引起的巨大影响。从伦敦飞到德国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戏剧性。但是在三十年以前，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进行过重要飞行的、上了年纪的——几乎七十岁——政治家来说，乘坐当时的一架原始的飞机出发，行程七小时，颠颠簸簸，或许还要晕机，并且没有取暖或空气调节或现在很普遍的舒适的设备：这是一次具有高度勇气的行动。首先，这是“冒险的”；英国公众对此那么欢呼。这确实表明一个人的巨大耐力和勇气。但这是一次外交悲剧，因为这直接落入希特勒的圈套。

人们经常详细地谈论张伯伦的三次访问——贝希特斯加登、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这一故事的奇怪和阴险之处。第一次会晤由于张伯伦缺乏经验和霍勒斯·威尔逊的建议，使张伯伦陷入单独会见希特勒的圈套，不带自己的工作人员，甚至连自己的翻译也没有。希特勒的译员有名的施密特博士肯定作了一份记录；但这份记录没有给张伯伦，他只能尽力追忆一下他所能够记住的谈话内容。

根据张伯伦自己的叙述，他发现希特勒非常不愿妥协，以至他

本人有点恼怒了，因而责备他的主人让他长途跋涉而得不到什么效果。希特勒于是施展了最有胜利把握的手段。直到那时为止，在苏台德区并不存在割让领土或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问题。当时希特勒大胆而又无耻地要求张伯伦接受“民族自决”。如果张伯伦同意在苏台德区实行这一原则，也许可能使希特勒住手——至少在几天以内是这样，否则，他的军队一定要开进去。张伯伦急忙抓住这根稻草。他不能在未同他的同僚们商讨的情况下接受民族自决和这个原则可能包括的内容。他将为此目的立刻返回国内。因此，他于9月15日启程前往会晤希特勒商讨妥协办法，9月16日就回到英国，仅仅得到这样一点，即希特勒将等待，直到他接受正式的投降。虽然张伯伦不能知道这一点，但由于在9月30日至10月1日以前无论如何也不会开始军事行动，当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让步问题了。

557

事实上，慕尼黑的解决办法不论好歹是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那一天决定的。因为不管戈德斯贝格9月22日会议的高度戏剧性和9月30日凌晨慕尼黑协定的最后签字，张伯伦第一次访问的唯一结果不是“是否”应该而是应该“如何”肢解捷克斯洛伐克。9月19日，英国工党领袖莫里森、多尔顿以及西特林向张伯伦呼吁，要求他态度坚定，他们还企图劝说法国的社会党人对达拉第施加类似的压力，可是没有效果。但两国政府都坚决支持投降。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无耻的六天压力的过程中，英国和法国政府决定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捷克人屈服。捷克政府于9月22日怀着某种有如绝望的情绪接受了这份最后通牒，在此之前贝奈斯总统曾寻求俄国人的援助，但他却无法得到所有捷克政党的一致支持，因此没有效果。结果，在闹哄哄的几天以后，张伯伦受权返回德国，全部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他动身时几乎是得意洋洋，认为危机已经解决了。使他吃惊和愤怒的是，希特勒却

坚持立即开进他的军队，并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法英两国政府坚持的较为体面的叛卖计划。尽管对争执的主要问题——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但德国附加的蛮横要求——象胜利者一样开进他们的军队，而不是象张伯伦和达拉第所希望的那样，为了保持“谈判”的体面，进行有秩序的、“和平的”领土转让——几乎引起了战争。在张伯伦从戈德斯贝格回来时，除了把进军“推延”到10月1日（这是很久以前就已决定了的“绿色行动”计划的日期）和希特勒一贯的声明“他在欧洲不再有任何领土要求”以外，他没有得到任何让步，而执行这种有失体面的投降方式，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愤怒和沮丧。在这以后的几天里，为了防备万一谈判最后决裂，迅速地作了一些准备工作。还处于初步状态的防空组织动员起来了；在伦敦架起了一些高射炮；在公园里仓促地挖了一些可怜的战壕。英国人民突然感到长期以来使人恐怖并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战争近在眼前了。

当局部署的预防措施之一是从伦敦和其他大城市撤出儿童。因此，德特福地方的雷切尔·麦克米伦幼儿园的大约二十五名儿童来到了我们的桦树林宅邸。我们把住宅的大部分让给了他们，这些孩子们及其随同而来的教师们好几个星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实证明，由于某种原因，把他们从伦敦迁出来比把他们迁回去要容易得多。他们竟然和我们住在一起直到圣诞节以后，而农村的空气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在这年的秋季，我知道战争迟早不可避免，于是采取了必要措施。我们幸而准备了一所小房子为自己使用，于是在第二年战争来临时，我们把全部住宅让给了一所来自巴勒姆的大幼儿园，它由伦敦郡议会直接管理。这些孩子们不时增加或者离开，他们在我们的住宅里一直呆到战争结束以后。在他们走后，又搬来了另一所学校，一直到大约十五年以后，我们才回到我们的故居。

在这种愤怒但对必将发生的事情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下，下院于9月28日复会了，大家期望首相根据当时的情况与1914年并无不同发表一篇演说，重复一下爱德华·格雷爵士1914年8月4日的著名宣言。^①尽管对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同意的事情和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所要求的東西之间的精确区别，我们很少有人有明确的概念，但从一些俱乐部和议会休息室传出的一些流言来看，毫无疑问政府已决定拒绝作出更进一步的让步。我清楚地记得首相起立时的紧张气氛，以及当他宣布他为和平所作的最后努力——一次四强会议——已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接受时，紧接着出现的那种极为特殊的情景。由于议员们在几乎是无法忍受的紧张中解脱出来，由于议员们对消息传来的方式（当首相演说时从希特勒那儿来的消息递给了他）感到兴奋，议会两边的所有议员们都站了起来，向首相致敬，祝他在拯救欧洲和平的第三次旅行中获得成功。我经常的座位在下院的反对党座席的那一边，当时反对党的座席被我们大量的保守党议员挤满了。我和其他议员都站了起来，和大家一样激动。那时我看到一个人安静地坐着——他的脑袋垂落在双肩，他的整个表情显示出一种又愤怒又失望的感情。此人就是丘吉尔。同时，艾登实在忍受不住了；他站了起来，走出了议会大厅。还有一位议员勇敢地静坐在那儿，不肯站起来。那就是哈罗德·尼科尔森。

559

这是慕尼黑协定的序曲。但问题的确是解决了。希特勒在和张伯伦举行第一次会议时就已经得到了苏台德领土。英法方案已经“出卖了捷克人”。其余部分就是悲喜剧了。的确，希特勒被剥夺了立即带领军队开进布拉格的机会，不得不推迟到六个月之后。希特勒虽然因为没有获得他期望的但包含着某些危险的军事胜利而感到恼怒，但他也一定会体会到，他正在不冒作战的危险与考验

^①这一天是英国在德国入侵比利时以后发出最后通牒的日子。

的情况下取得果实。当他的将军们看到未经一战就接管过来的捷克防御工事时，他们对于元首能够不流一滴血便赢得了胜利的那种“直觉”感到很惊讶，他们也同样感到欣慰与感激。

在张伯伦做了戏剧性的宣布以及反对党领袖们说了几句话之后，议会就休会了。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结果将是怎样呢？

我从艾登那儿获知某些已经进行的斗争情况。尽管外交部想把俄国拉过来，首相和他的亲密同僚们却决心拒绝俄国的帮助。我们也知道内阁已经分裂。张伯伦、霍尔和西蒙本想接受戈德斯贝格的条件，而且不无道理。因为除了执行的方式蛮横以外，戈德斯贝格的条件和英法在贝希特斯加登提出的方案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但哈利法克斯、达夫·库珀和内阁里一些较为年轻的成员奥利弗·斯坦利和沃尔特·埃利奥特等忍受不了这种赤裸裸的投降。因此，首相不得不寻求某种出路，并且希望希特勒会帮助他。法国是能够依靠的；在达拉第和博内领导下的法国政府除了想把他们的责任推给英国以外，别无他求。和希特勒协商以后，墨索里尼接受了邀请。为希特勒在慕尼黑所接受、被张伯伦称之为重大让步的对条款的修改，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两个同犯经过仔细讨论和争辩之后由墨索里尼炮制出来的。

然而，如果说在这整个事件中有那么多虚伪的东西，那么英国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情绪倒是真实的。在9月的最后几天里——张伯伦从戈德斯贝格回来后的五天里——他们坚强地但又平静和严肃地下定决心对付战争。他们被告诉说，空袭的破坏将超过人们的全部想象。他们还能因此而设想，平民将有大量伤亡。他们心里明白我们准备很差，很不妥当。他们信任英国的海军；但是其他任何方面都不令人宽慰。然而，他们却以沉着和庄严的态度来对付严峻的考验。

当首相于9月29日再次启程去执行他的和平使命时，全国都

在屏息等待。政府圈外的人对有关的问题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战争几乎不可避免的9月27日从张伯伦的广播讲话中听到这个复杂故事的一点点情况。他们获悉“由于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民族之间发生了争吵”，他们的生命和未来将被置于危险之中。在这面向全国的广播中，他丝毫没有谈到捷克人民的痛苦，只是同情希特勒“和在这以前没有认真对待德国人的抱怨使他产生的愤怒”，还建议要“保证”捷克政府将“履行他们的诺言”。的确，张伯伦曾声明，如果他“确信有任何国家决心用它的军事力量的恐怖来统治世界”，他将“认为这个国家必定会遭受抵抗”。但⁵⁶¹是，很清楚，他并不认为希特勒决心夺取苏台德区领土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从而证明他企图统治欧洲。丘吉尔至少在三年或四年前就认清了这个事实。我们其余的人主要是受了丘吉尔的影响，相信这一点也有一些时间了。不出几个月，全世界都明白了这一点。

然而，在那一天和那以后的一天，全国几乎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有任何怀疑了。在那以后的一两天里，我们将进入战争——而且是一次空前未有的恐怖性和破坏性的战争。

受到下院和全体人民善意支持的首相于9月29日上午离开伦敦，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9月30日凌晨2点30分，希特勒、墨索里尼、达拉第和张伯伦签署了慕尼黑协定。作为最后一分钟的让步，捷克政府虽然不是会议的成员，被准许派两名代表去慕尼黑，但“仅仅是向英国和法国代表团提供情况”。当他们在凌晨被召进会议室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离开了。在他们的敌人不在的情况下，他们的朋友向他们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十二个小时以后捷克政府屈服了。^①

在这以后，议会内外对戈德斯贝格的要求和最后的慕尼黑协

^① 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173—175页。

定的条件之间的区别讨论了许久。在纸面上它们并不是不重要的。概括地说,它们分为两个方面。设在柏林的、预定用来确定新的国家边界的国际委员会中将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此外,“在特殊情况下”,委员会有权——而不是义务——不执行“所有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德国人占优势的地区自动归于德国这一严格的种族规定”。^① 结果,这两项限制条款都证明是不起作用的。德国人根本就不把它们当作一回事。

张伯伦在获得了他视之为一项伟大的个人胜利以后,于 30 日 562 下午回到了伦敦,他认为这不仅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战争,而且用希特勒和他签署宣言的形式,保证两国为了获得欧洲和平,将执行一项相互协商的政策。首相亲自起草了这一纸宣言。他认为这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希特勒只是草草地看了一下就签了字。这项宣言一文不值。

张伯伦凯旋归来,对他是一片赞扬,甚至是谄媚,在我们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家受到这种待遇。这可能表现人们松了一口气,但这是真实的,而且几乎是普遍的。不幸的是,他在这可以谅解的洋洋得意的时刻,在唐宁街对热情的群众讲话时使用的一些词句很快就感到懊悔。他提到“光荣的和平。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和平。”天知道!慕尼黑和平既不光荣,也是短命的。

然而,世界各个角落的祝贺纷至沓来。所有自治领政府都是热情的。罗斯福总统打来了一个具有特色、带着明显赞同气味的电报,用了“好人”的字样。整个世界似乎对这位防止了战争的人共同表示了感谢之情。这就难怪首相处于一种得意忘形、几乎是陶醉的心情之中了。怀疑他的威信就是叛逆;否认他的灵机简直

^① 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 177 页。达拉第妄想根据这一条款,捷克可以保留某种可资防守的边界。

是亵渎行为。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各集团——丘吉尔的朋友们和艾登的朋友们——的一些会议。当然，我并没有超出——我确实和大家一样分享——普遍存在的轻松之感。我的儿子将在学校呆下去，并将于秋天进入牛津大学。我的家庭和孩子们，和全国各地所有的家庭一样，至少暂时将被幸免。我们好象已经来到悬崖之边，接着被某种奇迹拉回到安全的地方。

然而，当我们凑在一起讨论实际形势并倾听那些我们相信是判断正确的人的意见时，我们开始看到在自满情绪、自我欺骗的虚弱和不真实的帷幕后面的情况，这种帷幕是巧妙设计出来欺骗全体人民的，把他们引入一种虚构安全感之中。丘吉尔和艾登知道一些——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出卖捷克人的卑鄙情况和一些甚至比英国政府的虚弱更为丢脸的、更难原谅的关于法国崩溃的真相。他们还看清了由于捷克抵抗德国扩张的能力在实际上已经毁灭而造成的中欧和东欧整个战略形势的巨大变化。西方相应地受到削弱，法国军队的力量相对地下降了。因为威胁希特勒东线的大约四十个捷克师不能调动并且崩溃了；大量的防御工事投降了；不少巨大的军械库和仓库落入德国之手；法国精心构成的东方防御同盟实际上被破坏了。与此同时，在莱茵兰正在疯狂地建筑数道新防线，使之愈能保护德国免受法国在西部的压力。总之，正如丘吉尔对我们所解释的和他后来对茫然的议会所断言的那样，“我们面临着已经落到英法头上的巨大的灾难”。

尽管有这些怀疑，议会的辩论仍被张伯伦所控制。他是此时此刻的英雄。可是，在他能宣布开始讨论之前，他不得不先听听那位唯一最后坚持辞职的大臣的个人解释。此人就是达夫·库珀，他有突出的智力、坚强的性格，并且证明是勇敢的。我一贯佩服他，而从那一天以后，我们原来普通的友谊更加深厚了。我们以

后在丘吉尔政府中共事，在战争期间共同处理法国问题。在他担任驻巴黎大使以后，我和他时常见面。他的遗孀黛安娜夫人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们总是因他而感到自豪；但我们在1938年10月3日那一天对他更感到自豪。他有罕见的演说才能，不看讲稿，非常流畅。我想他已记住了自己的演讲词，因而几乎能够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他用词优美，辩论有力。最后几句话对下院来说，就象锤子敲打一样：

我已经放弃了以副官身份为一位我仍然极为敬佩和热爱的领袖服务的特殊光荣。也许我已经毁灭了我的政治生涯。但那是一件小事；我保留了对我来说具有极大价值的东西——我仍然可以在世界上昂首阔步。^①

564

和我们许多人的预料相反，达夫·库珀的辞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曾有过许多关于内阁中年纪较轻的成员沃尔特·埃利奥特、奥利弗·斯坦利、马尔科姆·麦克唐纳的议论，说他们可能和他一起进行抗议。如果他们这样做，我怀疑张伯伦政府是否还能存在几个星期。所有这些人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是我的多年的朋友。我现在体会到他们在不得不作出决定时的巨大压力，以及他们对党的忠诚的动摇而产生的混乱。当时，张伯伦的优势那样强大，用辞职来反对他们曾经同意其目的（如果不是同意其方法的话）的政策，似乎非常不合逻辑，而且也是无用的。无论如何，达夫·库珀是唯一辞职的人。他很快就参加了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并成为其中的一位主要人物。

翻阅《英国议会议事录》的各栏是难以使人们返回到那些狂热日子的气氛中的。张伯伦在开幕词中虽然多少有点不诚实地，但却清楚地说明了事情发生的先后情况。直到前几天，议会和全国一直处于迫在眉睫的战争阴影笼罩之下。对张伯伦来说，从下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10月3日。

院两方面取得对他和他的同僚们最近以来承担的可怕的重责的普遍同情是很容易的。对他的全部努力确实存在着一种感激之情。他当然要大力强调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要求和慕尼黑取得的让步之间的差别。这的确是他演说的主旨。采用这种办法，甚至达夫·库珀也曾同意过的、在贝希特斯加登所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投降也就被掩盖起来了。从10月1日到10日分阶段完成对苏台德区的占领，而不是在10月1日用一次行动加以占领，这件事被描绘为有重大价值的收获。最后国界由国际管理，并在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加的国际委员会控制之下，这是另一个主要的变动。此外，首相还获得一些进一步的修改，他当然要强调其重大意义。然而，一批要求更为严格的听众一定会同意丘吉尔的概括：

首相在争执的问题中和他能够为捷克斯洛伐克取得的最大收获，是德国独裁者已满足于由别人把食品一道一道地送给他，而不是由自己在桌子上攫取食品。^① 565

然而，甚至丘吉尔在他著名的关于三次会议的差别的叙述中，也没有充分说明情况。丘吉尔对贝希特斯加登、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是这样描绘的：

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以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英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①

事实上，贝希特斯加登会议是时机，英法方案是方式，全部代价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方式付出的，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就这样被断送了。但是下院在当时并不能认识这一点，因而当时进行了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并在其后的几个月里对一些实际上是次要的问题进行了辩论。无论如何，甚至被断定是在慕尼黑取得的德国的让步，很快也就无效了。例如，张伯伦极为重视的国际委员会从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10月5日。

来就没有准许任何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加。波兰和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并没有象张伯伦宣称的那样,提交给另一次四强会议。这些要求是由德国单独处理的,这样就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最后灭亡。这一“维也纳裁决书”尽管公然破坏了慕尼黑协定,后来英国政府对此不是抗议,而是泰然处之。

在称赞捷克政府挽救了欧洲和平的纪律性和高尚的品格之后,首相转向补偿问题。在政府保证之下,将在伦敦筹集三千万英镑贷款。对今日高涨的背叛价格在议会内外引起了强烈讽刺。在将近两千年前花三十块银币就可以做到的事,^①现在需要三千万英镑。对于这一嘲弄相互进行了攻击,虽然不是 在议会大厅里进行的。⁵⁶⁶最后,首相详细叙述了他个人和希特勒的联系,以及在那决定命运的凌晨获得德国元首签字的那个宣言。

显然,张伯伦深信这是欧洲历史上的转折点,他将不仅成为他祖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救世主。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牺牲是件憾事。但那是必要的。因为捷克人是通向绥靖的障碍:

通向绥靖的道路是漫长而又障碍重重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是最近发生的,也可能是最危险的。既然我们已经通过了这个障碍,我感到有可能沿着这条走向理智的道路继续前进。^②

关于张伯伦—希特勒条约,他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相信双方在这个声明中都怀有真诚和善意。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它的实际文字。^②

这些话听上去是真诚的。张伯伦似乎仍然相信如果能够避免与俄国接近,如果能对德国在中欧和东欧的野心采取现实的办法,或许再给它一两块殖民地,那就可能获得最后解决,而欧洲和平也就可以得到保证。这种思想在张伯伦的头脑里占了支配地位,以致在

① 指犹太以三十块银币出卖耶稣的故事。——译者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10月3日。

六个月后，甚至当希特勒通过占领布拉格以最公开、最无耻的办法破坏他最近的保证时，没有人能够容易地劝阻他不走他已经选定的道路。的确，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方针，即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消失了，英国对它的领土完整的保证也就不存在了。那时开始感到惊恐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和督导员办公室对张伯伦施加了压力以后才使他改变了腔调。^①他突然改变态度，他的某些同僚的确理所当然地对他怀有一些牢骚。例如西蒙，象某一异教徒圣坛上的一个老教士一样，对那些迅速不断减少的做礼拜的教徒咕哝着那日渐衰微的抚慰人心的礼拜仪式。

在这三天里，除了首相在开始辩论和结束辩论时的两次演说⁵⁶⁷外，还有两个杰出的演说。其中之一当然是丘吉尔的，他的演说气势雄伟，色彩鲜明；另一个是博纳·劳当时唯一还活着的最小的儿子迪克·劳的。^②迪克是最近才造反的，他的讲话带着一个叛逆者惯有的全部热情。他讲得很简短，但具有压倒的威力。他对张伯伦的友人们的言过其实的说法淋漓尽致地嘲笑了一番，那些人硬说张伯伦获得了个人胜利，用他个人的人格力量使希特勒后退了。这个说法是那些被信任的议员中比较会拍马的一些人恭维之词，这些人都是督导员们布置好替政府说话的。迪克·劳把这种说法描绘为简直无法令人相信，因为它推想

那些通过暴力和背信弃义而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取得最大胜利的人竟突然被首相的有魅力的眼睛说服（这只能是他的眼睛说服，因为谈话是通过译员进行的）：暴力和背信弃义得不到好处。^③

对于其他人来说，尽管有人作了许多切合实际的演说，提出了许多论证，大家都知道政府在国内的力量非常强大，因而在议会里无法

① 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伦敦，1965年），第432页。

② 后来的科尔雷因勋爵。

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10月3日。

给他们以重创。在和我们的朋友们几乎是每天都举行的讨论中，我们得到的是最令人沮丧的先兆。这时的潮流太强了，而且它是冲向我们的。有一种普遍存在的无限感激之情；张伯伦是个救世主，是批评不得的，也没有可批评之处。

然而，正如慕尼黑事件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在根据“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来讨论一项政策时，大家完全一致同意的唯一问题就是极端需要迅速完成英国的战备，^①这一事实是难以理解的。甚至反对党那时也承认有重整军备的需要，并对在危机时暴露出来的众所周知的缺陷大发牢骚。然而，张伯伦好象不相信局势严重。他嘴上高唱重整军备，但他真心相信的是，在他进行了巨大的、空前的努力以后，会出现一个普遍和平的新时代。

我们便这样进入了所谓的“绥靖的黄金时代”。这个梦想在六个月以后突然地破灭了。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在向德国人民发布的公告中包含着这样一个简单但具有戏剧性的句子：“捷克斯洛伐克不再存在了。”六年以后，在经历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努力，其间曾一度孤立并被盟友抛弃，但依靠在需要时从未抛弃过的英国精神力量的支持，英国对那句傲慢自夸的话给予了回答。1945年春，纳粹德国不存在了，祈祷上帝，它永远不会再复活了。

* * *

在这令人焦虑的日子里，我和人数日益增多、感到不满的那一部分保守党议员进行过多次讨论。9月28日，在作出导致慕尼黑协定的最后和决定命运的决议之前，在丘吉尔的住宅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我们讨论得很多；但在我们面前几乎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当达夫辞职的消息传出时，我们队伍的人非常高兴。我立刻打电报给他：

热烈祝贺你对舆论所起的令人鼓舞的带头作用。切望你的更多的

^① 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187页。

同僚效法你的榜样。

可惜第二句话太乐观了。

但在下院开会辩论慕尼黑事件以后的问题时，除了要发表一些演说外，出现了两个迫切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表决以及我们怎样做才能阻止一次突然的选举？第一个问题将主要由措词的方式来解决。如果反对党提出的修正案的条款不太敌对，谴责的内容又不太过分，那时总计二十五名或三十名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议员，包括丘吉尔、艾登、艾默里、达夫·库珀在内，可能准备投票支持修正案，或者至少是弃权。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得到丘吉尔的同意后，与多尔顿进行了联系，他在辩论的第一天（10月3日）已代表反对党作了最后一次发言。我设法在午夜前后见到了他；我告诉他有立即举行大选的危险，在大选中马上记录下来的选票将被当作对政策的一次检验。那些投票支持政府的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将“获得党魁们的承认”。^①那些投票反对政府或不投票的将被记下名字加以驱除，而官方候选人将和他们竞选。这将是又一次莫里斯式的辩论。^②因此，了解反对党的正式修正案的条款极为重要。我相当困难地说服了多尔顿和我一块到诺斯勋爵街的布伦丹·布雷肯的住宅去进行一次会谈。我们在这儿见到了丘吉尔和艾登，他们二人向多尔顿解释了我们的希望，即组织一次实质性的保守党议员弃权，对政府的动议和反对党的修正案都不投票。多尔顿记下了一件事，对此我也记起：

围绕集体安全的各种草案被提出来了。他们逼我同意的一个草案谈到了“举国一致的团结力量”。我对丘吉尔说：“这不是我们的行话。”

① 这是阿斯奎斯在1918年大选中对那些接受劳合·乔治和博内·劳支持的自由党人的轻蔑的描述。

② 对莫里斯将军致函《泰晤士报》攻击劳合·乔治的辩论导致了自由党人的大分裂（1918年5月）。所有在辩论中投票反对劳合·乔治的自由党人在其后的大选中都处于敌对的地位。

他回答说：“这可能是我们大家必须学习的行话。”^①

我们还讨论了万一提前大选，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人和工党之间在选区进行某种合作的可能性。多尔顿对此表示同情。他指出一些明显的障碍需要克服，但如果有人要搞类似御用选举的勾当，而由丘吉尔领导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人又以无党派候选人的身份竞选，那就不难看出，他们至少在多数地方会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这是令人鼓舞的。虽然多尔顿小心翼翼地说，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更多的讨论，并且说他的话不代表党的领袖们的意见，但我感到这次有点不平常的讨论是有价值的。

570 张伯伦的一些密友和顾问在推动他按照 1918 年的方式搞一次有利于他们的大选问题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仍然很不明确，在这样一次大选中他不是作为“赢得了战争的人”，而是作为“拯救了和平的人”而被推荐出来的。一般认为张伯伦最老的信徒之一金斯利·伍德正在怂恿他用这种方式利用局势。同样有人坚持说，哈利法克斯在反对这样做。在辩论期间，在议会休息室里议员们无拘无束地讨论着解散议会的可能性，甚至认为可能性很大。威胁的手段也使用出来了，以阻止那些犹豫不决的保守党人和党采取一致的步调。不管保守党的领袖们是否在认真考虑这个计划，这种想法终于被一个在议会生活中发挥极大作用的、未曾预料到的插曲所扼杀。这次计划——如果有这么一个计划的话——或阴谋——如果有这么一个阴谋的话——在不到二十分钟内，就被一次演说所毁灭，演说人是那些在党内极有影响但公众对他们却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中的一位，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常常发挥出决定性的威力。

西德尼·赫伯特由于受过重伤，那时身体日益衰弱，走起路来都感困难，通常是不参加这种辩论的。但他对议会休息室里传来

^① 休·多尔顿：《回忆录，1931—1945：决定命运的年代》，第 199 页。

传去的谣言感到愤怒，因此激动起来了。他决定讲话，时间安排在第二天下午7点30分，这不是个很好的时间，因为那时议会大厅里没有人了。然而，一当他的名字出现在布告栏上，议员们成群结队地涌进大厅。赫伯特曾当过鲍德温多年的议会秘书。他代表着最忠实的保守党传统；他富有资财，有贵族气派，很孚众望，而且极为聪明。此外，他还是个勇敢和正直的人；他是普通成员们在混乱时刻能够指望的那种人。他讲话坦率。他明确指出，一方面大家对首相的所作所为表示感谢，而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对他最近几年执行的政策有保留看法。然后，他提到把保守党团结到一起的那种忠诚，但他补充说，“我们可以被领导，却不能接受恐吓”。他接着转而谈到大家脑子里想着的事。世界上没有比在此刻强迫举行大选更不公正的事了。他在指出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大选不能得到什么而可能大有所失，并提到大为紧迫的迅速重整军备的问题以后，还继续说了这样的话：

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象坦慕尼厅^①那样的团体，他们要求这样一种解 571
决办法，但是我的解决办法却是完全不同的。我此时此地要求首相做一些完全相反的事。我要求他使他的政府真正做到举国一致，扩大政府的基础，邀请工党参加政府，特别是邀请工会领袖们参加政府。^②

“坦慕尼厅”这个词语切中要害。可能是由于我们和反对党领袖接触的结果，一个修正案事实上被记在官方文件上，具有一种允许我们弃权的性质。因此，我们终于对两次表决，即对政府建议批准的动议和反对党的修正案，都没有投票。我们的人数总计已达二十五人至三十人。

首相在这次辩论结束时的演说比他在开幕时的声明较为坚定一些，也比较符合议会的口味。因此，这次演说可能促使一些持怀

① 坦慕尼厅，本指美国民主党的坦慕尼协会。——译者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10月4日。

疑态度的人前往投票厅。总的说来,他得到了保守党的热情支持,他也从自由党和工党议席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同情。在全国来说,他的地位非常强大。至少有一件事取得了成功。或者是屈服于同僚们的意见,或者是听从了党的主要意见,或者可能是出自他自己更好的判断,张伯伦明确宣布将不会立即举行大选。在这一天结束前,有一个小的转向。当时应该提出这次短会的休会问题,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休会的时间不应长达四周。这使首相和丘吉尔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由于我知道在主要的辩论中我几乎没有发言的机会,我就在辩论的最后一天上午抓住了休会动议这个机会讲话。那些大臣们由于上午提出辞呈下午又撤消辞呈所产生的精神紧张一定精疲力尽了,我向他们射出一箭,然后抱怨道:

我们正越来越被人看成是一种德意志帝国国会,开会只是为了听演说,并把现在政府的政令登记下来。^①

我以宣布我的看法结束了我的讲话:

572 ……现在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面临的形势,世界面临的形势,自主、正义和自由面临的形势,更加危险,更加可怕,比基督教文明开始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加可怕。^①

第一个意见是一种夸大;而第二个则不是。

这样,在议会绝大多数支持张伯伦及其政府的情况下,在人民大众的一片赞扬声中,慕尼黑事件论战的第一阶段就结束了。随后一直继续着对这一事件功过的激烈争论。当时在社会的所有阶级中感受都很强烈,以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这问题只有1886年和1914年的爱尔兰问题可以与之比拟。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分裂,这种分裂使许多朋友和家庭不和,并留下了不能清除的痕迹。英国在十七世纪肯定曾有一些家庭,根据对皇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8年10月6日。

家的态度分裂为圆颅党和保皇党；美国在内战期间也存在这种情况。虽然由慕尼黑解决方式产生的分裂以后很快因共同的危险和灾难得到了弥合，然而对这场尖锐争论的记忆仍然存在。张伯伦的信徒们对造反者最初是蔑视，以后就越来越对他们感到恐惧。他们那些家伙中，特别是那些核心人物，认识到了他们自己踌躇不决，特别敏感。其时，所有压力和宣传工具都开动起来了。例如《泰晤士报》一贯歪曲事实，窜改新闻，并且经常表现出一种摇摆于欺骗和歇斯底里之间的耍态度。9月7日那篇建议移交苏台德区的灾难性的社论给人以严重的打击，哈利法克斯对此极为愤慨。严重程度稍差一点就是关于达夫·库珀辞职演说的事件。《泰晤士报》的驻议会记者年轻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安东尼·温发出一份关于演说在议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它被接受的情况的准确报道。该报编辑扣压了这篇报道，我想编辑是有权这样作的。但是编辑竟然写了一篇谎话，把达夫·库珀的努力描绘为“一件引不起注意的事情”，把它登在“我们驻议会记者”的标题栏下。年轻的温立即辞职。两年以后他在战斗中牺牲了。^①

象这样一些事件好比火上加油。张伯伦的奉承者们越来越奴颜婢膝，鼓励他闭眼不看现实。而他的对手们就越来越冒犯他。那时我们提到首相时便用“验尸官”这个绰号，这在我们中间已成为时兴了。我想这个绰号是布伦丹·布雷肯先用的。这个绰号至少不象一位美国记者在描写朗西曼抵达布拉格时那个有名的用语一样粗野：“这个刽子手提着小皮包，穿过阴暗的地方慢吞吞地走来。”^②

在我自己和我妻子的家人中看法就不一样。克兰伯恩勋爵和艾登一道辞职，这使赛西尔家族站到反政府的行列去了。卡文迪

① 达夫·库珀：《老年人忽略了》，第250页。

② 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79页。

什一家人动作比较缓慢。我的兄弟丹尼尔越来越和我一样地感到愤怒。我们习惯于每年 11 月 5 日在家里举行一个好看的营火会，篝火顶上放一个戴着旧帽子或穿着一套旧衣服的稻草人。这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们，以后又为了我们的孙子们和所有邻居的孩子们而举行的。这一年，我们搞了一个很好的张伯伦形象，为此目的我们牺牲了一顶修理得很好的黑色霍姆堡^①式毡帽和一把卷起来的洋伞。那时我的一些亲戚和我住在一起，这种作法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大约有四五十名捷克难民也参加了这次营火会，这就使这个场面更有戏剧性了。我已经让这些难民住在我们庄园上不同的住宅和小别墅里，并给以殷勤的款待。

在某种意义上说，慕尼黑变成了一个党派中考验人的术语。虽然在本质上不记仇的丘吉尔给了张伯伦的“老班底”中许多人以官位或职务，但我认为他们对他们中任何人也不真正信任。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有过多次数斗争，当时斗得很厉害，甚至带着怒火，但很快就被遗忘了。唯有这一事件在记忆中难于消除。

这就是那时候的矛盾情绪，张伯伦究竟是对还是错这个重大问题，仍要留待历史学家们争论多年。

574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具有两方面的内容。在贝希特斯加登作出实际决定，以后又在慕尼黑签字以正式协定批准这一决定，这样作张伯伦是正确的吗？或者英国带头抵抗，甚至甘冒战争危险，是否是可能和更为明智呢？第二个问题是，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鲍德温和张伯伦怎么会听任形势发展到民主国家无法对那时德国的公开侵略进行抵抗呢？

第一个也就是那个比较狭隘的论点肯定是仔细斟酌过的。当时就打仗比一年以后再打仗要好一些吗？的确，首相和他的同僚们从三军参谋长那里得到的忠告是，在 1938 年英国实际上不能进

^① 霍姆堡，西德城市名。——译者

行抵抗。主要原因是空军没有准备。而事实是,如果丘吉尔掌权,这种忠告的各个方面都会受到不断的检查和探索。首相和他的任何一个大臣既没有知识又没有经验承担这一工作,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做不到。显然,对于捷克防御工事的重要性和捷克军队阻挡德国进攻所产生的作用,都没有作过适当的评价。德国的将军只是在看到这些防御工事的力量以后,才体会到元首的讹诈所产生的奇迹。迁延不决的第二个理由是自治领的感情。它们的态度确实不是坚决的。但是,在那以前的年月里,自治领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正确的情报和领导。而且,希特勒又巧妙地呼吁采用当时已被广泛接受的民族自决原则。“啊!民族自决,在你的名义下犯下多少罪恶啊!”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会这样惊叫起来。从法律义务的狭隘范围来说,法国人抛弃他们的盟国比英国的犹豫不决更应受到谴责。法国的领袖们非常乐意让英国进行领导并承担罪责。但是,如果英国采取一种更为坚定的观点,他们无疑能推动法国人尊重自己的条约义务。假定战争不可避免,在1938年面对战争是否比在1939年要好一些呢?内阁的大部分人对英国缺乏战争准备和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方针所负的可怕的责任,肯定深有感触。在其他起阻碍作用的因素中,专家的忠告指出,对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轰炸,将在几周内导致大约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的伤亡。我们在1938年想象的空战颇象人们现在想象的核子战争。关于这一点,丘吉尔会对德国在征服法国和低地国家之前从它当时可资利用的机场发动大规模轰炸的实际可能性提出质询。然而,如果我们想在较狭窄的问题上谴责张伯伦及其同僚,我们必须公正地面对这一问题。在1938年的情况下,当情况发展到那年夏天的程度时,我们中是否有人已经准备好对德作战呢?但是,问题当然比这还要广泛。在这次危机以前的两三年内我们是怎样地让事情听其自然地发展呢?为什么我们不作出真正的努力把俄国拉入积极

575

的同盟之中呢？如果我们发觉我们的力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必须作出进一步让步的境地，为什么我们不赶紧进行包括国民兵役制在内的重整军备呢？为什么我们不设法扩大政府的基础呢？归根到底，自从重新武装莱茵兰以来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警告。真正的答案或许是我们都要受到责备。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出了巨大努力之后，似乎在晚近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犹豫不决，茫然不知所措了。他们想当大国，但又不愿付出代价；他们热衷和平，但对保持和平的措施却很冷淡。他们就象那种不买彩票就想中彩的人。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取得 1918 年胜利的盟国怎么会如此迅速而又令人震惊地遭遇到相反的命运，以致在胜利后不到二十年它们就碰到精神上失败的可怕困境，或者如人们所想的面临着如同物质上被消灭的境况呢？得到胜利的战时同盟不久就瓦解了。这种瓦解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就是美国退出同盟转为孤立。在我整个一生当中，旧大陆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设法促使新大陆承担它由于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而来的责任。象丘
576 吉尔和艾登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忧虑的主要事情就是如何去达到这个目的。张伯伦太狭隘，也过分地以自己为中心，以至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既然我们现在终于看到美国人承担了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批评他们运用他们的新权威似乎不仅是不礼貌的，而且是非常愚蠢的。我的某些美国朋友现在感到苦恼，因为他们的国家尽管以援助和防止侵略的方式把大量的恩惠分布到全球各地，但随着它的愈加强大，却变得愈加不得人心。我不断提醒他们，这正是承担世界性责任不可避免的报酬。英国除了给它的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安全以外，它至少在一百年时间里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保证了自由，维持了和平。可是，在欧洲及欧洲以外的外交界，英国被人憎恨、诽谤，并受到阴谋反对。

现在这个火炬主要传到美国人手中了。现在轮到他们自食其果了。这就是“制海权的代价”。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美国人却逃避了他们的责任。同时，日本是一个不满的国家，停止了和它的西方战时盟友合作。同样地，意大利感到它抛弃了它的长期盟友德国和奥地利，但却受骗未得到充分的代价。在墨索里尼领导下，领土和殖民野心开始占据它的统治者的头脑。在此全部时期内，英国和法国一般说来是不和的。在法国政策强硬的时候，英国政策是软弱的。而当英国人倾向于表示某种决心时，法国人却陷入内部纷争和失败主义之中去了。

因此，世界范围的集体安全所依据的首要条件从来没有达到。当时也没有一些具有相同看法的强国如现在这样团结到一起，而丘吉尔和一些与他有共同看法的人在战前的最后几年里曾为此目的作过很大的努力。此外，在英国，特别是在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性质存在着许多幻想。国际联盟这个机构把人们的希望提得很高。似乎仅仅依靠它的存在就能保证永久和平；甚至它的一些成 577 员国的严重背信弃义的行动也根本没有打破这种幻想。在英国，对于另一次战争的前景被认为是“难以想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空前的死伤对所有参战的国家都是一次新的体会，而对在其全部历史上总的说来一向是打便宜仗的英国来说，更是如此。法国对这一点或许体会得更深，但却体会得太深了。法国人的可怕损失和遭到的大屠杀突出表现在其人口下降方面。英国单方面的裁军树立了一个承担义务过重而又武装不足的大国的典型榜样。1934年以后的半瘫痪状态起因于在互相远离的战场上——在西欧、在地中海和在远东——要面对三个敌人的威胁。

最后，英国普通老百姓的那种正人君子也是一个不利条件。由于我们的偏狭性，我们既未读过希特勒的行动信条《我的奋斗》，也不理解他的运动的性质或他的野心的规模。我们闭眼不看希特

勒国内政权的特征,还自我安慰地认为:如果德国已经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它也不会比俄国更坏。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区别。一个国家正在慢慢地从野蛮中升起,而另一个国家却渐渐陷入野蛮中去。无论如何,对英国和欧洲来说,德国是当时直接的威胁。希特勒对很不相同的类型和背景的许多访问者,都具有或者似乎具有一种几乎使人迷惑的作用。张伯伦只不过是一长串受骗的人当中最后的一个,这些人在去贝希特斯加登朝圣以后,在长短不同的时期中不知不觉地堕入希特勒的魔法之中。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第一次会晤希特勒之后所得的印象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①所有的人都未觉察出他作为一个谈判者所采用的特殊方法、他所施展的奸诈之深,以及他总是寡廉鲜耻的恶劣行为。据说劳合·乔治曾在评论彭加勒时说过,由于彭加勒获得了诚实的好名声,他有时就可以耍花招了。希特勒由于一再背信弃义而臭名远扬,可是由于某种奇怪的理由,他却继续被人信任。

578

所有这些事情加到一起,包括全体英国人——左、中、右各部分——对战争、甚至对战备的普遍反感在内,是英国的世界威信明显崩溃的原因。左派鸚鵡学舌般地叫喊“集体安全”,借以掩盖他们对军备的厌恶,而我们对集体安全的贡献显然被认为是很少的。右派不信任国联,他们依靠仍然是强有力的帝国后备力量,宁愿采取一种半孤立政策。但是,它却拒绝采取必要的军事手段来保证这一政策。时常有一种论调说绥靖政策的真正意义并非绥靖,而是牺牲别人来获得时间或求得安逸的,它是一个巧妙设计出来的计划。这种说法肯定是不真实的。没有哪一届英国政府曾罪恶地策划过一个马基雅维里式^②的阴谋,签订一项可以说是与里宾特

^①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367页。

^②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是意大利主张权谋的政治家兼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式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译者

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相反的条约。和希特勒一起策划,让他统治中欧和东欧,指望他因此不来找我们的麻烦,并希望他在一场和俄国的冲突中消耗力量——这样一种政策尽管是卑鄙无耻的,也许能成功;但从长远来说,希特勒和拿破仑一样,从来也不会感到满足,而最后还是要转而指向民主国家。这样一个计划是不存在的。事实是根本没有计划。

我们该在慕尼黑事件上不惜一战吗?还是值得不惜任何代价获得一年的延缓期呢?只要研究和编写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不管是战术上的还是战略上的,将继续是剧烈争论的题目。两方面肯定都要展开大量的辩论。在国内,我们自己的重整军备工作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陆军很少,而且正如一年后所证明的那样,装备仍然很坏。空军由于喷火式战斗机还没有投入使用,只能依靠陈旧的或者快要不能使用的飞机;轰炸机几乎没有。只有海军相对说来情况还好。国内空防准备处于初期阶段,然而由于搁延似乎反而获得巨大的好处。在海外,自治领犹豫不决,不想参加另一次欧洲战争。法国政府和人民处于严重分裂中。空军无力,混乱不堪。人民怀疑如果发生战争,法国陆军除了开进马奇诺防线以外还能干点什么。不管德国在莱茵兰正在建筑的防御工事的实情如何,法国人几乎不想攻击这些工事。也没有一支可用的英国远征军对他们进行鼓舞。直到1939年3月为止,基于有限义务基础之上的战争原则,那就是不派英国陆军到大陆去,这的确是公认的陆军部的学说。因此,我们和我们的西方盟国都不处于能够打仗的良好状态。俄国是一个未知数。俄国人难道不会决定继续保持中立,坐观资本主义国家同归于尽吗?如果不是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几乎不可能处于我们在1940年夏天必须面对的那种危险局面了。那样法国军队就完整无损了。我们会使德国面对两条战线——西线和东线——德国要和捷克斯洛伐克打,可能还

579

要和波兰打,除它们以外,还要担心俄国。捷克斯洛伐克的陆军相当多,装备也很好。至于空军,虽然我们有弱点,但德国轰炸机要从国内机场——由于那时的飞机质量问题,航程远近是有重大意义的——出击是不便的。我们本来可以很有把握地获得俄国的支持,但他们把慕尼黑事件看作是西方精神上和物质上软弱的表现。一旦事情决定,自治领肯定不久就会跟上来的。此外,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我们当时可以鼓动德国的将军们认真地干一下,或者强迫希特勒退却,或者废黜他。

当时,除了依靠丘吉尔和我尊重他们的判断力的那些人的意见以外,我当然不了解官方在军事方面所作的任何估计,我和许多和我一块的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在慕尼黑事件上进行战争。从那以后,经过阅读了许多写成文字的有关两方面的材料之后,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改变这种看法。

然而,不管对慕尼黑协定的最后判断如何,张伯伦在该事件前后确实犯了缺乏远见而产生的自我满足和自欺欺人的罪。这是人们责备他的真正根据。他回国时得意洋洋。当他使用“光荣的和平”、“双方的善意”这样一些词句时,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已可耻地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抛弃给令人憎恶的纳粹统治的机构。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他为慕尼黑解决办法所作的辩护,不仅在反对党方面,而且在他自己的党内也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憎恶。他和他的朋友们至少直到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为自己辩解,因为慕尼黑协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年的喘息时间。张伯伦是用协定本身的价值和它指出的和平进程的幸福前景来辩护的。不管他的某些较为怀疑的同僚可能想些什么,绥靖政策却有一个诚实的阐述者,那就是张伯伦,他相信它。他认为他能和希特勒共事。他相信希特勒的表白。随着德国的要求逐步得到满足,他把自己当作普遍和平的缔造者。这么一来,欧洲就可以稳定在一个长时

期的和平中了。只是在很久以后，当人们的眼睛被打开，张伯伦的朋友们才替他宣称，慕尼黑的和平是一种休战，明知对己不利却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取得另一年的备战时间。如果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就坦率地告诉我们，他接受了一个不愉快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挫折，并且告诉我们那时必须以战争的规模来努力做好包括国民兵役制在内的重整军备工作，那么对他的讥刺会减少许多，他在历史上的声誉将获得保全。但是，事实上直到第二年的春季或夏季，“争取时间”的论调才变得时兴起来。如果这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是以更大的精力和决心加以利用的话，这种说法才会有更大的说服力。

但是，慕尼黑事件仅仅是一条漫长而不幸的道路的终点。更为广泛甚至更使人困惑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一切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怎么会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摆在我们政府和人民面前的如此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呢？在这个问题上，肯定地说，罪责不仅仅在张伯伦一个人身上，或者甚至不在鲍德温和麦克唐纳身上。罪责应该由整个民族共同来负。如果我们中有少数人能够说我们比另外一些人略为早一点开始丢掉幻想，那么对那位本能地理解世界战略和洞悉历史的人友好地在当时给我们指出道路，对此我们是感激不尽的。

回顾这几年，许多人，特别是丘吉尔所著《风云紧急》的读者 581 们，可能难以相信英国下院明显地感觉不到不断恶化着的形势。当时的政府忽视了他们的责任。反对党鼓励他们的那种忽视；反对党甚至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责备大臣们为了挽救正在迅速恶化着的形势而迟迟做出的那种非常之小的努力。这种攻击有多大真实性，以及这种党派偏见十足到何种程度，现在很难评价。1931年以来，一个举国一致的政府先是在麦克唐纳的领导之下，然后在鲍德温领导之下，最后在张伯伦领导之下，在下院都享有压

倒多数。议会竟容许国家接受一连串的外交失败，遭受到令人吃惊的战略挫折，最后经受军事上的失败而极少抗议，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只有在 1776 年至 1783 年美国革命期间，在支持诺思勋爵政府的议会中，才能找到与之类似的情况。然而议员们并不是腐败无能；他们茫然不知所措。

英国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年代里踌躇不决的真正原因不能单从议会里去找。原因比这复杂得多。导致我们软弱的情绪也不都是不光彩的。的确，最狭义的和平运动的本身并不能影响政策。受到卡农·谢泼德及其运动支持的教友派教徒的观点，在这个国家里一贯受到尊重。但是，这种观点从来也不曾得到过足够数量的真正诚实的支持者去影响国家的政策。更为危险和更能造成混乱的是，很多人虽不是宣传完全不抵抗主义的和平主义者，但却坚决相信 1914—1918 年的战争是建立同盟和进行武装的结果，并且决心——即使当事实证明是难以办到的时候——附着在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的希望上。归根到底，第一次世界大战难道不是“结束战争的战争”吗？由受苦受难的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经验所支持的理想主义者的全部热情支持世界组织，而世界组织据信是能够保证永久和平的。他们对国际联盟的支持是真心实意的。但我们的人民没有理解到要强制一个机构的意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这个机构美国又从未加入，一个接一个国家如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却开始从其中相继退出，因而它已蜕化成为一个残存议会。就在希特勒得势开始威胁欧洲和平的时候，英国的注意力仍然因国内经济困难而被分散了，而长期的联合政府又倾向于掩盖国际形势的严重性。左翼用“集体安全”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而不是用它作为促进因素在爱好和平的国家中推动建立一支真正的集体力量。右翼的声音在本质上更倾向于正统的箴言“如果你想要和平，你就备战”，可是由于顺应当时社会情绪的需要而变得软弱无力了。如果

不是因为存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冲击，所有这些情况或许是不可能有的。那些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或紧接在那以后的年代里生活过的人们，很难体会到这个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的那种程度。虽然我们的人民勇敢地面对迫在眉睫的打击，但他们的反应是软弱无力的。因为损失确实是可怕的。人们只需观察教堂或广场、小镇市或大城市、中小学或大学有关那次战争的纪念物就能看出损失的大小。在这个岛上比较遥远的地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村庄，那儿的死亡人数似乎差不多都大于得到补充的人数。不仅永远不应发生另一次战争，而且永远不再能发生另一次战争，这已成了一个信条了。

因此，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想要对他们的先辈进行严厉批评，他们绝不应错误地责备他们的前辈颓废堕落。他们的前辈肯定受了虚假的幻想的欺骗。但一旦他们觉醒，并面对巨大的考验时，他们的反应将会是无愧于他们的祖先的。不管在战斗部队里，还是作一个普通人民，在遭遇到新的、极大破坏性的攻击时，他们将不会动摇。虽然慕尼黑事件的耻辱是全民族多年混乱和迟疑不决的顶点，但他们最美好的时刻还是要到来的。

第十八章 滑向战争

不用等待历史的判决，无论如何我已经成了一个党派观念很强的人。一旦下院在短期会议后开始休会，我就着手工作。我的工作是从在自己选区里召开一系列会议开始的。我向付出了直接代价的捷克人称赞之余，宣称我担心要付出代价的将不仅仅是他们。我们那时必须把注意力只是集中在一件事上——团结和力量。在其后的一周（10月19日开始）我开始为支持国民兵役制而参加运动。那时这已成为必要，而且一定要这样作。

我们不久就得到了一个向政府挑战的机会。牛津城预定要举行一次补缺选举。这成了对慕尼黑政策的一次公民投票。黑尔什姆勋爵的儿子昆廷·霍格以正统的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从而奠定了他那长期的、杰出的政治生涯的基础。为了在这一问题上组成一种人民阵线，巴利奥尔学院院长 A. D. 林赛博士被敦促出山，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自由党人撤销了他们的候选人，并以全力支持林赛，这是一项高尚行为。我的“未来五年小组”里的大部分老朋友也团结起来支持林赛。赛西尔勋爵为了这个相同的目的运用了他的全部影响。在极力支持林赛博士的一些保守党大学生中，其中有一位其能干和热情都很突出。他的名字叫爱德华·希思。我既在一次公众大会上演说支持无党派候选人林赛，又给他发了一封友好的信。我在演说中宣称，这次选举指向我们已经执行而且现在仍然在执行着的外交政策。迄今为止，这是在优势力量面前的一次退却。我坚持人们不能总是把基督徒投给狮子来抚慰它。如果林赛博士获胜，这将意味着朝向真

正的举国一致政府前进的第一个迹象。我还用下面的措词写了一封信：⁵⁸⁴

我认为自己在道义上必须说，假如我是牛津选区的选民，我将毫不犹豫地为您选入议会投票和奔走。对于进步的保守党人的意见来说，时势太严重了，问题太重要了，以至它不能允许受到党派忠诚的影响，或容忍当前指导我们外交政策的原则摇摆不定。

作为这些行为的结果，报纸上普遍谈论督导员发给我的命令将被撤销；又说在下一一次斯托克顿选举时，将会有一位正统的保守党的候选人和我竞选。然而，这时有许多保守党议员也同样用各种办法制造麻烦。虽然霍格得票最多，但补缺选举的结果政府并不满意。如果没有昆廷·霍格这么一位能干的候选人，这个议席就可能很容易丢掉了。在1935年大选中保守党得票六千六百四十五张，这次下降到三千四百三十四张。听说委员会正在考虑把我驱逐出卡尔顿俱乐部^①的问题，对此我感到好笑。很明显，俱乐部有一条规定，就是在任何选举中，一个俱乐部成员不能反对另一个成员。然而，我从主任督导员或俱乐部秘书那儿都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同时，为了努力澄清我自己和别人的思想，我写了一本名为《和平的代价》的小册子，我以私人名义广为散发。^②书中对大选以来执行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并陈述了慕尼黑式和平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至于将来，它不仅号召积极重整军备，而且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体系，如果可能便在国联这个机构内建立。这个同盟应首先由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同时，我用下面的语言就有关这些问题的议会记录进行辩解：

我采取的行动是根据我在上次选举中全体选民对我的指示。应该

① 卡尔顿俱乐部，英国保守党本部。——译者

② 见附录4。

对玩忽职守负责的绝不是我。

585

结果,我收到许多表示赞赏的信,但也收到一些谩骂的信。维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女士(后来的阿斯奎斯夫人)写信给我说:

我应该感谢您赠给我《和平的代价》一书,其中字字句句所阐述的真理给与我的感受是多么深刻啊。

接着她提到了牛津的选举:

工党的态度使人失望——他们在牛津抵制自己的人,因为自由党和某些保守党人支持这个人——……请允许我祝贺您的前往,并对此表示感谢。对别人来说,这是您在勇气上所作的表率——首先是认识到存亡攸关的问题。

在慕尼黑事件之前,我并不感到害怕——但自那以后,我感到我们的生存受到威胁,我们的荣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与此同时,在议会内外作了多次努力来对政府增加压力或者寻求政治力量不同派别的支持。在丘吉尔了解和赞同的情况下,继续和多尔顿积极进行谈判。为了某种明确的行动,我在议会休会期间设法为莫里森、多尔顿和丘吉尔之间安排一次会见。起先我是满怀希望的。但是,在和多尔顿进行了初步讨论之后,认为等到情况在冬季开始有所发展时再采取行动,那就更好一些。斯皮尔斯将军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强烈赞成以联合行动去改变政府,让丘吉尔出任首相。艾默里于9月末在他的日记中谈到了这件事:

……斯皮尔斯的共谋者……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哈罗德·麦克米伦,他们非常狂妄,叫嚷着要在议会复会前采取强暴行动驱逐内维尔,让温斯顿当首相。我对这种议论浇了一盆冷水……^①

但是,事情发展得很快。不消几个月,利奥·艾默里通过一次演说就成了攻击张伯伦的领袖,他的这次演说是议会历来最猛烈和最具摧毁力的演说之一。^②

^① 见艾默里未出版的书信文件集。

^② 在这次辩论中导致了张伯伦政府于1940年5月9日倒台。

将近 11 月底时，在布里奇沃特举行的一次补缺选举对政府的打击甚至比在牛津那次还要厉害。弗农·巴特利特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凭着一项广泛反对政府的政纲，以超过二千三百票的多数当选——这件事发生在这样一个选区，在那里一个保守党人在大选中以接近一万一千票的多数当选为议员。这次又是自由党人撤销了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而支持了巴特利特。此外，议会里的动荡不安仍在继续。三十四名保守党议员以他们的名义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重整军备，其规模与当前需要相称。紧接在这件事之后，在 11 月 18 日进行了一次关于成立军需供应部的引人注目的辩论。就是在这次辩论中，丘吉尔的说明使下院大吃一惊。他说机械化骑兵部队肯定不超过所需编制的十分之一，而它们配备的只不过是些轻坦克而已。“它们机械化已经三年多了，而这种机械化只是把他们的马牵走而已。”这是自由党和工党提出的议案，但在议案提付表决时我们中某些人弃权了。我投票支持了这个议案，和我采取同样行动的还大有人在。另外只有两位保守党人和我在同一投票厅投票，一个是丘吉尔，另一个是布雷肯。这些批评政府的书面动议肯定要求政府答复；和我们大约三十五人唱反调的是二百二十五个后座议员，他们向首相保证无条件支持他为维护和平而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因此，在这整个阴郁的冬季，不知所措和忧心忡忡的下院发现自己已不能真正坚决地领导一个日益混乱的国家。确实，在紧接着慕尼黑事件后的几个月里，首相在议会内外仍然享有保守党的同情和支持。恐怕最重要的是使普通老百姓认清那个号召我们信任他的善意的人的本质，就是他在德国全境和德国所控制的国家里对犹太人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这一大屠杀是在一个波兰籍青年犹太人于 11 月 7 日开枪射击了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个低级职员 H. V. 拉特先生以后紧接着发生的。由希特勒下令执行的

587 难以形容的残暴行动吓坏了全体英国人。回顾这一奇特时期，我认为这一事件比任何其他事件在促使舆论摆脱张伯伦和他的拥护者仍然宣传的绥靖政策的乐观看法上具有更大的效果。英国人天生的正人君子的性格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是他们第一次开始认识到这些最后用自杀或上绞刑台来偿还罪恶的匪帮的真面目。鲍德温勋爵激动得抛弃了隐居生活，提出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主张，并呼吁帮助难民。当时盛传要和柏林断绝关系。

尽管主要由私人慈善机关做了一些工作来帮助难民，但难民问题仍然越来越严重。在向内政部施加了很大压力之后，对一些最有可能受到迫害危险的捷克人发了少量——三百到四百——入境签证。这真是沧海一粟啊。我在议会难民委员会和其他机构中全力以赴进行工作，但收效甚微。一方面是出自我自己的财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的慷慨的邻人的帮助，我们得以在苏塞克斯我的家里照顾大约四十名的男女难民，他们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在慕尼黑事件后通过各种办法才到达我国。在大战爆发后，我们逐渐能为其中某些人，特别是具有某种技术或专业能力的人，找到了工作。另一些人则到美国去了。这使我初次洞察到可怕的难民问题，这个问题将缠绕世界多年，最后也没有得到解决。

虽然我和多尔顿在10月中的几次谈判证明是失败了，但快到年底时，某些工党领袖开始以比较赞成的态度来看待和自由党人及保守党内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一些墨守成规的议员不愿正式考虑这样一种激烈的行动；但象格林伍德、多尔顿、莫里森和A. V. 亚历山大这样一些人，在英国职工大会书记沃尔特·西特林的支持下，正开始严肃地考虑未来的事情。牛津和布里奇沃特的补缺选举肯定起了作用。情绪有了缓慢的变化。原先对丘吉尔的怀疑和厌恶开始逐渐消失。甚至他的最坚决的对头也不得不钦佩他那长期的孤军作战。他们不得

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他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他的批评是有充分根据的。所有这一切在1940年5月将起重大的作用。甚至在那最大的危机中,工党也无法参加张伯伦领导下的联合政府。1939年1月初,邓肯·桑兹在卡克斯顿大厅“为了组织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召集了一次会议。这是另一次努力,它本身虽不太成功,但却具有象征意义。同时还广泛地流传着谣言说,政府里许多地位较低的大臣已团结起来,要求首相解除内阁里最不称职的成员的职务。对备战的焦虑一直在继续着。不过,尽管存在着这一切情况,保守党的纪律还是很起作用的。《旁观者》驻议会记者报道了真实情况:

回顾最近三个月的情况,人们不禁被保守党人的惊人团结所感动。在保守党内部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个强有力的少数被慕尼黑协定和那以前的外交活动吓坏了。关于我们重整军备的效率问题已经存在着——现在仍然存在着——深刻和普遍的忧虑。^①

然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至少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没有发生。

年底以前,那个倒霉的、引起艾登辞职的英意协定正式生效。这确实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事件。甚至政府也表现不出多大的热情来。丘吉尔、艾登、克兰伯恩和我们其余的朋友们再次认为只有弃权。

1939年1月底,绥靖达到了最坏的程度。英国驻罗马大使珀思勋爵受命把首相将在下院演说的提纲给齐亚诺看,征求意大利政府的同意。据齐亚诺说,墨索里尼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相信,这是英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把他的一个演说的提纲交给一个外国政府。这是他们的不祥之兆。^②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在同月早些时候对罗马的访问,除了增强墨

① 《旁观者》,1938年12月30日。

② 休·吉布森(编辑):《齐亚诺日记,1939—1943》,第17页。

索里尼的信念即英国不再可怕以外，没有获得任何成果。

同时，我尽最大努力继续活动。2月9日，我出版了一本关于国防的经济方面问题的小册子。^①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就自己所见说明一些问题：德国准备的程度，摆在英国面前的任务，以及需要做的紧急事情。那时已不再是效率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了。我还作为附录重印了我在1938年年底私人散发过的关于慕尼黑解决办法的小册子。^②这本小书受到极好的评价，销路颇广。有一家刊物甚至说它“比得上英国政治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小册子”。在编辑这本小书时，特别是关于对德国军费的估计，我很幸运得到了T.巴拉夫先生和保罗·艾因齐格博士的内行的帮助。

在此期间，我的选民始终是豪爽地支持我。当然也有一些批评，但总的说来，我比某些仅仅在最近才或多或少反对政府的保守党议员更为容易逃避批评。2月末，国防公债法案提出来了，这使我有机会阐明我写在上次出版物中的要点的某些部分。自从纳粹政权上台到1938年的五年里，根据现有最准确的估计，德国仅在军费上就花了二十八亿英镑，议会了解这个情况后似乎大吃一惊。仅在1937—1938这一年度他们的军费总额即达十二亿英镑，而我们的军费是二亿六千五百万英镑。我问道，那么人们怎么能反对政府现在要求的相对说来并不过分的金额呢？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人都不能说太多了，如果我们坦率地来对待这个法案，我们有时候一定会怀疑，这样的努力是不是够大了”。^③我不禁还要提
590 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在此期间已使五百万失业者得到工作，竟然还缺乏劳动力，而我们仍然有将近二百万人闲着无事可做。

① 哈罗德·麦克米伦：《国防的经济方面问题》（伦敦，1939）；见附录5。

② 《和平的代价》；见附录4。

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9年2月27日。

然而，政府仍然没有放弃绥靖政策。他们闭眼不看德国对慕尼黑协定的连续破坏，包括把大块捷克斯洛伐克领土让给波兰与匈牙利的所谓“维也纳裁决书”。直到1939年3月初，当德国政府粗暴地拒绝了英国和法国关于德国将如何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保证的照会，并指出英法即使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也构成了对已经明确公认的德国势力范围的难以容忍和令人不快的干涉，^①英法政府未加抗议就接受了这一令人难堪的斥责。几天以后，即3月10日，张伯伦说所有迹象显示出在欧洲将有一个政治上平静的未来和经济上和缓的形势。^②直到希特勒准备好他的下一次打击以前，事态就是这样向前发展。犹豫甚至绝望的情绪与日俱增。防止向战争发展似乎是不可能的，而对政府和议会的不信任已开始扩展到全国。可是，张伯伦于3月10日在下院对记者说，欧洲在“安定下来，进入了一个平静的时期”。在同一天，霍尔在一次非常愚蠢的讲话中，向他的选民描绘了一幅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的画面，而这个新时代是能够由三个独裁者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后者那时终于在西班牙取得胜利——和英国首相、法国总理合力建设起来的。就在希特勒发动攻击的那一天，著名的《笨拙》漫画杂志发表了名为《三月十五日》的漫画，它描绘约翰牛^③正在从恶梦中醒来的时候，战争恶魔经过窗户向外逃走。希特勒先是鼓动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④要求在德国保护下的独立，然后强迫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总统和他在柏林会见。倒霉的捷克总统哈查在等于拷问的情况下，被迫于3月15日上午4时30分签署了一项条约，把国

① 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318页，根据《法国黄皮书》（纽约，1940年），第61—65页。

② 同上书，第318页。

③ 约翰牛，英国的绰号。——译者

④ 罗塞尼亚，原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省，1945年以后并入苏联的乌克兰。——译者

家的剩余部分置于德国保护之下。^①在同一天上午9时,德国军队开进布拉格。可是,正如前面已经描述过的那样,甚至这些事件也没有立即使首相的心安理得受到震动。最初政府坚持说,我们本来建议保证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完整,既然这个国家因其内部分裂而解体,那么我们的义务也就随之而不存在了。

但是英国那时对绥靖已感到厌恶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国好象从长时间的沉醉睡眠中刚刚清醒过来一样,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以后的几天里议会和全国的情绪。可是,甚至在张伯伦被迫对这一新的侵略提出抗议时,他似乎把希特勒的行动看作是个人的冤恨,而不是公众的灾难:

当然啦,如果希特勒先生认为慕尼黑协定应予废除,我作为该协定的共同签字人之一有权参加规定的协商。

不过,他那时似乎认识到,如果希特勒真想用武力统治世界,“英国会竭其全力来对付这一挑战”。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俄国人在3月18日建议举行一次由英、法、俄、波兰、罗马尼亚及土耳其参加的会议,“商量抵抗侵略的办法”。^②张伯伦认为俄国的倡议尚不成熟,拒绝接受,而波兰人由于怀疑俄国人,也不同意他的代替办法——英、法、俄三大国在波兰参与的情况下发表一项宣言。

然而,张伯伦没有受到任何外交困难的阻碍,那时又轻率地采取了与以前截然相反的英国政策。到3月底他发出了一项保证,如果一旦发生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英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波兰人。这个保证虽然可能是可以理解的,但确实是个轻率的决定。因为正如事态所证实的那样,我们无力用军事行动来支持波兰。这个保证的真正含义只能是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将是全面战争的信号。

592 独裁者把这当作耳旁风,这从墨索里尼于一周后即4月7日入侵

^① C. 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637页。

^② 同上书,第638页。

阿尔巴尼亚这一事实就可以证明。当意大利人登陆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和丘吉尔在恰特韦尔共进午餐。这使我第一次看到丘吉尔工作时的情景。各种地图拿出来了；秘书都集合起来了；电话铃开始响了。“英国的舰队在哪儿？”这是最紧迫的问题。丘吉尔甚至在不担任公职时也总是维持着一个相当大的工作人员班子来帮助他不断进行大量的文字和政治活动，此时这些人员立刻被调动起来了。英国舰队原来分散在地中海各处。在那五艘主力舰当中，一艘在直布罗陀，一艘在东地中海，用丘吉尔的话说其余三艘“懒洋洋地停靠在相隔很远的意大利各海港内外”。^①几天以后，他在下院的一次有力演说中抨击了这些布署。

我将永远记住那年春天的情景和我对丘吉尔的魄力与精力以及他那种大量活动的感受，虽然他当时并未担任国家职务。当别人感到茫然和犹豫不决时，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在进行指挥。哈利法克斯对墨索里尼进攻的第一个反应和丘吉尔一样是有其特性的。据说当他听到这一突然背信弃义的攻击时，他惊叫道：“而且又是在耶稣受难日！”英国大使奉命向意大利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对此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本来可以在我们自己的机关里炮制出来”。^②意大利的政策一般是以威吓为其基础的，肯定只能采取坚决的行动才能对付它。正如俾斯麦有点蛮横地谈到意大利人，“他们的胃口很大，但牙齿不好”。对墨索里尼来说确实就是这样。

事件的经过是尽人皆知的——对波兰提出保证后，接着又向罗马尼亚和希腊提出了保证。从绥靖突然转变为广泛地向别国提出保证，其本身并不能使人信服。这太象临死时的忏悔，如果罪人死去那就很好了。如果政府按照西德尼·赫伯特在10月提出的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257页。

② 休·吉布森（编辑）：《齐亚诺日记，1939—1943》，第61页。

593 建议进行改组，那就可能引起希特勒的注意，俄国人也会相应地受到鼓舞。但事实上，一个愤世嫉俗者会因而发问，张伯伦政府作为绥靖活动中的旅行推销员和保险公司的掮客两种角色中，哪一种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他们的确是名誉扫地了。他们应该辞职，要不然就应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前至少要进行改组或重建机构。

这种争取举国一致政府或者至少把一些有力人物纳入政府的情绪，当时开始日渐强烈起来。在希特勒采取突然行动几天以后，我于3月21日给《泰晤士报》写了下面这封信，该报有点出人意料地把这封信登了出来：

先生，——十分清楚，当前的形势需要立即在最广泛的基础上组成举国一致政府。其所以重要是由于两方面的目的。第一，它将向我们潜在的朋友和潜在的敌人表明，我们决心放弃以前的政策，再次建立一个反对侵略的统一战线。第二，它将使我们能够以最小的摩擦去贯彻为支持一项新的、具有足够力量的外交政策所必须的严厉措施。

在一段旷日持久的犹豫和党派争论之后，这样一个政府最终可能出现。另一方面，如果各政党的领袖人物都将善处难局，它可能在没有讥刺、没有无益的互相责备的情况之下立即组成。

十四个月以后，在自从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以来我国最危险的时刻，这样一个政府组成了。但另一方面犹豫不决的长夜过去了。英国在它的最伟大的领袖人物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民族团结和力量”。

3月29日，我和丘吉尔、艾登、达夫·库珀共同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一项更为坚定的国家政策，一个举国一致的政府，和最充分地运用我们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在这个动议上签名的议员接近三十人，以前从未和我们合作过的一些新人的名字开始和我们联系到一起来了。两天以后，我在斯托克顿的讲话中宣称，“如果我们想避免战争和甚至比战争更坏的东西，失败，那就必须立即采取

一些措施”。如果要把英国的潜力及时动员起来，一个举国一致政府就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三个星期以后，在利奥·艾默里的领导下，四十六位议员在一项动议上签了字：

赞成立即接受强迫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原则。^①

我们的人数终于开始增长。虽然在政府的性质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却作了一些政策上的变动。4月末，国民义务兵役制这一原则终于被接受了。虽然它只规定二十和二十一岁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接受训练六个月，这至少是向前迈进了一步。甚至这种有条件的、有所限制的形式也受到全体工党议员和大部分自由党议员的强烈反对。艾德礼以一种交杂着狭隘和闹别扭的奇特态度谴责了这个兵役制。由于某种奇怪的心理变态，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仍然把在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当作是不民主的事情。一项授权建立军需供应部的法案于6月提出。但是，正如我在辩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大家对政府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缓慢改变感到高兴，可是甚至那时对这个新设部应如何行动以及它的职权范围，都还没有明确规定下来。在我后来担任议会秘书时，我才发现整个计划有严重的缺点。此外，选定伯金博士当军需供应部大臣，也是不很恰当的。

因此，时间就是这么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拖下去了。这是一个等待时期。这些绥靖的支持者那时放弃了他们的政策，但却没有放弃他们的职位。霍尔称之为“四巨头”——张伯伦、哈利法克斯、西蒙、与霍尔——的新的阴谋小集团仍在继续掌权。但自然存在着希望。如果能使苏俄和西方联合，希特勒甚至在那个时候还可能被遏制住。

如果说英国政府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苏俄，这是由于大约二十年的历史。苏联的宣传和共产主义者的颠覆理应使人愤恨，这

^① 《约克郡邮报》，1939年4月19日。

不仅表现在国内，那还比较无害，它在整个印度和殖民帝国，危险就大了。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俄国结盟可能是必要的，但却是令人厌恶的。此外，我们最近（也是很突然地）单方面给予保证的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已经表示极端不愿——甚至拒绝——接受俄国的援助，特别是军队形式的援助。他们对俄国和对德国一样，怀有很大的敌意。他们担心（后来证明是有点道理的）俄国人在你的国家里就象从前杂耍剧场所说关于在人们家里的丈母娘那样的笑话：“一旦你们让她们进来，你们就再也不能把她们赶出去。”从这个观点来看，不考虑俄国的问题，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决定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是愚蠢的，也是轻率的。我们也无需因担心“刺激德国采取激烈行动”而感到烦恼。希特勒一贯被英国政治家们认为好象是一个卓越的但却是容易激动的天才，他可能因人家对他和善而趋于平静，也可能因别人的激烈语言而心烦意乱。正是这种对独裁者本质非常错误的看法，才是艾登与张伯伦争吵的真正原因，也是在这灾难性的几年里出了许多岔子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英国有理由怀疑俄国，那么俄国人反过来怀疑英国也是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强国对俄国采取了敌视态度；在俄国内战中进行了干涉；强迫俄国丢掉领土。这些事情俄国都没有忘掉。最近以来，甚至在纳粹主义兴起之后，德俄关系一直是良好的，甚至是热诚的。希特勒激烈和侮辱性的反共宣传无疑激怒了斯大林，但他不是一个用语言就可以使他不采取他认为是有利行动的人。然而，在李维诺夫主管外交工作时，俄国的政策一直是通过国联和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来寻求安全。慕尼黑协定肯定使俄国人大为震惊。可是他们仍然坚持这个政策，就在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之后，他们还企图用正式的约束把这个政策固定下来。

这就是4月16日俄国提出三国同盟——英、法、俄——的重

大意义。这是李维诺夫最后的机会。这也是我们的最后机会。

丘吉尔对当时形势的总结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比方说，张伯伦先生在接到俄国的建议就回答说：‘对，让我们三个国家团结起来，扭断希特勒的脖子’，或者说出类似的话，那么，英国议会就会赞成，斯大林就会理解，而历史的进程也就会完全不同了。”^①不幸的是，张伯伦并没有用这种坚定而又简明的语言来回答俄国的建议。也没有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施加压力，让他们采取步调一致的步骤。英国政府拒绝了俄国的综合建议，这项建议包括一个军事条约并由法、英、俄三国对所有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边缘国家给予联合保证。相反，英国政府却建议由每一个国家单方面提出保证。俄国人的反应并没有拖延很长时间。5月3日，提倡和西方国家合作并在国联支持下寻求集体安全的李维诺夫突然甚至是蛮横地被免职了。他的职位由莫洛托夫接替，莫洛托夫注定长期担任外交部长，先后在斯大林及其继承人领导之下。莫洛托夫心甘情愿以任何方式去作他主人斯大林所决定的任何事情。而且他的手腕耍得极为巧妙。他最后和赫鲁晓夫发生冲突，被迫离职。幸而当今俄国发展了比较合乎传统的政权，他丢掉了职位，但没有丢掉脑袋。目前他在莫斯科过着退休生活。

当时，对波兰的压力正在增加。4月底，希特勒要求把但泽归还德国。与此同时，他通知废除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和1935年的英德海军条约。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墨索里尼并不全然高兴。意大利夺取阿尔巴尼亚这件事的确更象是为了挽回墨索里尼的面子和恢复他在国内的威信而作出的具有一种迅速还击性质的行动。可是，不管他的嫉妒情绪怎样，他通过“钢铁盟约”和他的德国伙伴比以前抱得更紧。这一条约是在将近5月底宣布

^①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285页。

的。^①

在这几个月里还出现了另一些令人烦恼的骚乱。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既混乱又不肯定。在议会里提出了很多批评，保守党议员大量弃权或投反对票。至于英格兰银行把价值六百万英镑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黄金移交给德国人，那是慕尼黑事件中特别丑恶的副产品。这件事发生在3月底，是在希特勒占领布拉格之后发生的。银行当局以这是一些技术性细节来为此辩护；但是这件事在5月和6月引起了尖锐的争论和强烈的辩论。财政大臣西蒙表现出一种条文主义和玩世不恭相混合的态度，这使议会大为骚动。甚至政府的最忠诚的支持者也几乎不能忍受这一骇人听闻的、丢脸的事件。丘吉尔把这次黄金交易描绘为一次国际上的灾难。所有这一切使保守党内越来越多的派系更加不信任政府了。

可是在整个夏天几个月的全部时间有一种忧虑统治着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那就是俄国问题。当然除了谣言和传闻之外，我们得不到什么消息。但议会尽力而为；我想起议会对这样一个似乎是不可思议地犹豫不决的政府用质询和辩论来施加压力。再者，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似乎至少应该以更大的活力和更快的速度行动起来。今天，由于有了一些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实际参与其事的人的著作这样一个有利条件，许多困难和复杂问题都暴露出来了。^②

在这关键性的几个月里，英国政策根本性的错误或许在于真诚希望不要把世界分裂成两个以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

① 这是德意之间的一项正式军事同盟的名字，这项盟约于1939年5月22日签字。

② 最有权威和最完整的叙述是：L. B. 纳迈尔：《外交序曲，1938—1939》（伦敦，1948），第143—210页；约翰·W. 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398—411，430—432页；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20，21章；斯特朗勋爵：《国内和国外》。

敌对集团。哈利法克斯和他的朋友杰弗里·道森指挥下的《泰晤士报》经常反复宣扬这个观点。根据这样一个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起因于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之间的对抗。这种错误也一直延续到布拉格事件以后时期对希特勒的看法，这种观点可能在慕尼黑事件时恰好站住了脚。现在肯定应该清楚了，希特勒是个野兽。必须把他关进笼子。他抱怨他受到了包围。那么，就把德国包围起来。但这正是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认为是错误的做法。

以上这些犹豫不决的情况从英国在4月29日给法国政府的 598 备忘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备忘录说明了英国的目的。我们的谈判者必须不放过在战争发生时得到苏联帮助的机会；他们必须不使波兰和罗马尼亚感到狼狈；他们必须不渲染德国反对共产国际的宣传；最后，他们必须不刺激德国采取激烈行动。^①这的确是一些困难而且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目标，当我们评价我们外交官的工作时，我们应该公正地记住这些。它们一部分是遥远的过去所留下来的遗产，另一部分是最近一些错误的结果。

议会立刻带头行动。多尔顿于5月10日建议哈利法克斯本人到俄国去，这似乎是相当合理的。毕竟张伯伦曾经三次访问希特勒，一次访问墨索里尼。哈利法克斯也曾出国访问过这两个法西斯独裁者。无论如何，莫洛托夫比之里宾特洛甫或齐亚诺不是更不应受尊敬的人。艾登极力敦促哈利法克斯接受这个方针，但是张伯伦不赞成。^②艾登甚至提出自己前往——他是曾和斯大林交谈过的一位英国大臣。但是这个建议也是不受欢迎的。^③5月19日，议会进行了一次短促但却活泼的辩论。劳合·乔治和丘吉

① L. B. 纳迈尔：《外交序曲，1938—1939》，第157页。这个由罗马尼亚外交部长 M. 加芬库发表的文件，据说曾由埃里克·菲普斯爵士传送给了法国外交部长。

② 哈利法克斯后来懊悔他没有对访问俄国的建议作出更为热情的反应（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40页。）。

③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清算》（伦敦，1965），第55页。

尔都极力赞成急需和俄国达成明确的谅解，并和它结成牢固的同盟。如果没有这个同盟，我们的处境几乎是绝望的。我还特别记得劳合·乔治给人印象深刻的警告。那天的气氛和1918年初一样。人人都知道德国的大规模进攻正迫在眉睫。没有人知道进攻将从什么地方开始。如果进攻波兰，我们能给它什么帮助呢？对于反对就其力量与价值把俄国作为一个盟国而展开的运动，劳合·乔治颇有理由地提出了抱怨。真不幸，这事情是真的。英国军方的意见一贯过高估计波兰陆军的力量，过低估计俄国陆军的力量。

599 张伯伦在答辩中不赞成劳合·乔治的悲观看法。形势是严重的，但决不是绝望的。他再一次强调，“把互怀敌意的欧洲国家对立集团集合于一个营垒之中”的危险性。这将证明是“一种不牢靠的政策”。他接着暗示波兰对苏联参与保证感到忧虑所造成的困难。丘吉尔以鼓吹三国同盟作为回答。他看不出三国同盟有任何不当之处。至于把我们的保证扩大到所有波罗的海国家，嗯，“你已经深深地陷进去了”。

5月27日，通过大使在莫斯科开始正式会谈。为了协助我们的大使，我们派去了一位有经验、有才干的官员威廉·斯特朗爵士——但他不是一位政治方面的使臣。斯特朗在我访问俄国期间，对我非常友好，他对俄国人的思想方法很了解，也使我印象很深。他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革命党人重视外交礼节的人。为什么不派一位大臣呢？他在一封给外交部副次官奥姆·萨金特的信中提出的看法是，“如果接受了苏联6月2日提出的草案的实质，我们或许可能得到比我们现在将要得到的更好的协定”。^①唉！我们将什么都得不到了！到7月底，英国和法国的谈判代表符合了俄国全部或接近全部的建议，一项政治协定似乎已经在望了。俄国人当

^① 斯特朗勋爵：《国内和国外》，第183页。

时要求在缔结政治协定以前商谈一项军事协定。^①但是英国和法国派出的军事代表团迟迟不能启程，而且他们的军级也比应有的低一些。他们乘船前往，于8月11日才到莫斯科。可是，那时俄国人已经有第二种想法了。他们什么时候作出最后决定，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简单的。那时他们相信，甚至三国同盟也不能遏制希特勒，他已下定决心消灭波兰。他们也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西方盟国的力量，他们估计如果战争到来，而又没有一个第二次慕尼黑协定来避免战争，它将使德国人精疲力尽。中立政策的利益将是相当大的。他们将获得时间来革新他们的军队，这些军队由于斯大林的“清洗”一定在某种程度上使士气沮丧了；他们将完成军队的装备。根据他们和德国签订的条约中的秘密条款，他们也将得到大面积的领土——波罗的海各国和半个波兰——由于得到这些领土，他们的阵地向西延伸了，一旦战争临头，俄国的心脏部分就能免受德国的攻击。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如果说他们的政策是冷酷无情的，但在当时也是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② 600

在德国进攻来临之前，议会休会了。我们越来越焦急地等待着来自俄国的消息。关于议会休会的提议，发生了一场尖锐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冲突。这种紧张情况明显是在打击政府，而首相通常那种操纵议会的本领不知到哪里去了。他于8月3日提议议会休会直到10月3日，他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他把这个提议差不多只当作一个形式而已。鉴于当时形势紧张，俄国又不可靠，以及对波兰的压力日益增加，我们许多人对这么长期地不正视现实深为不满，因而要求首相保证，如果形势发生变化，议会应即复会。为了反对这种修正案，首相不厌其烦地用一种颇为傲慢的态度提到一些人的讲话，丘吉尔对此大为愤怒。结果，一项本应在半小时内结束的

① C.L. 莫瓦特：《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1918—1940》，第643页。

②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风云紧急》，第307页。

讨论，继续了五个半小时。这次争论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丘吉尔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用自己的全部辩才、机智、冷嘲热讽的本领，把已经动员起来的欧洲和正进行长期休假的英国议会作了无情的对比。他说这确是一件怪事，“在这样一个时候，政府竟然对议员说，‘滚开，带着你的防毒面具去玩吧。’”他宣称——这是一种在那些战时最艰苦的日子里他证明他具有的忠心耿耿的感情——不管在国内被糟蹋到什么程度，英国议会在全世界仍被认为“最坚强有力地表现了英国民族的意愿，还被当作在反抗侵略中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

601 使心情紧张的原因之一是重新出现即将举行大选的谣言。现在似乎难以置信，当和平与战争问题正处于紧要关头之际，甚至这样的一个方案也认为是值得考虑的。但是，事实正是这样。我手头有一封我的朋友迪克·劳8月20日写给我的信，现在读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尽管现象呈现相反趋势，我仍然期望一次大选，而不期望一次战争，或者宁愿设想当大选真的到来时，将出现这种情况，即我们将发现我们完全无力支持政府，即使我们乐意这样做。人人都在推测这次不会投降了。我们低估了我们的人民的随机应变之才。此外，我们永不知道我们何时会被击败。去年九月我们不知道；今年9月我们也将不会知道。我对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举行选举，我们或者不得不屈服于伯明翰，或者必须与之斗争。安全是不会有的，中间立场是没有道理的。当我们回到伦敦时，我们必须制定明确的计划，我们这些人是不愿照办的。要不然，选举就要落到我们的头上，我们大家都将看风使舵地争着回来，根本不考虑尊严、诚实或其他东西。

艾登集团的议员，包括其领袖在内，对他们的处境特别感到不安。他们感到他们不能继续支持政府。他们是否应该象独立保守党人那样行动呢？还是他们应该试图创建一个新的独立政党呢？特别是他们和丘吉尔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我而言，我对自

己应该如何行动是没有怀疑的。1935年我在极为独立的基础上竞选，而且获得成功。我可以同样地再干一次。至于建立一个明确的独立政党，或在保守党内组成一个小组的问题，如果采取正式的组织形式，据我看此时只有丘吉尔能当领袖。

8月22日德苏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到伦敦。我当时正和我的朋友温德姆·波特尔^①乘游艇作短期休假。我们一直在英吉利海峡巡游，并到过好几个法国港口。8月23日上午我们在普尔港登陆。在我们走出码头时买了各种报纸，在那儿我们第一次获悉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因为俄德条约意味着或者是希特勒将容易地获得另一次胜利，或者在可能是最坏的条件下进行战争：俄国采取中立态度，捷克斯洛伐克已被消灭，法国和英国无力对它们曾保证其独立的波兰给予有效援助。内阁于8月22日开了会，并得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将签字。但是，既然英国政府已经确定了态度，张伯伦不想再次投降了；不管发生什么事，英国将履行它对波兰的义务。在议会能够复会之前，那天发表的一项公报中对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当我到达伦敦时，我听说议会将于24日开会，目的是通过紧急法规。虽然派往莫斯科的联合参谋代表团直到8月25日才正式解散，但事情已经决定，再也不能改变了。24日通过了紧急权力法案以及征召陆海空三军后备人员和防空警报的各种正式手续。张伯伦在那一天夜里还给希特勒发了一封私人信件。但这一次是警告希特勒不要犯造成“象1914年那样的悲剧性误会”的错误。他仍然认为德国和波兰之间的问题能够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同时，他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再让步。8月25日，和波兰签订的条约批准了，正式肯定了已经提供的保证。

随之而来的是惊人的一周。议会于8月29日再次集会。究

^① 后来的波特尔勋爵，丘吉尔政府的建筑工程大臣。

竟在发生什么事那是极难弄清楚的；但是好象看不出英国政府示弱的迹象。张伯伦在议会的演说是坚定的，他受到代表工党讲话的格林伍德和代表自由党讲话的辛克莱的全力支持。艾登也发表了具有巨大影响的讲话。情况很清楚，全国已经团结起来，准备战斗。如果他们对波兰人没有多大热情的话，他们那时也已认识到那个老问题又摆在英国人民的面前：“能够允许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统治欧洲吗？”对此只能有一个答案。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混乱的甚至是狂热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外交活动时期。希特勒把他进攻的日期推迟了一周，看来他想寻求他能“消除英国干涉”的某种办法。^①他似乎相信这仍然是可能的。这是他在慕尼黑得到的经验。他无法使自己相信，以前张伯伦是如此柔顺，当时却那么固执。他提出一项永远解决德英之间所有问题的“全面的建议”；德国“保护”不列颠帝国，在其受到威胁时给予支援。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那些经常的骗人的鬼话。鉴于我们政策上奇怪的两重性，希特勒对于不理解英国政府和人民的那种新情绪，或许有某种辩解。7月间，德国贸易代表和我国海外贸易部大臣罗布·赫德森曾进行会谈，暗示将给德国一项贷款。霍勒斯·威尔逊和德国驻伦敦大使也举行过会谈。据德国大使说，这些会谈设想英国正逐渐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②不管这些会谈的真相如何，希特勒肯定希望再一次欺骗我们。

但是，英国的舆论是坚定的。的确，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唯一害怕的是再一次投降。假若他们知道在六年可怕的战争中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仍然认为他们不会作出任何别的选择。因为他们那时心里明白，历史上一个伟大考验时期已经来到了。不管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不管历史的结局会怎么样，我们没

① 《对德国主要战犯的审讯》，第九卷（伦敦，1946年），第480页。

② L. B. 纳迈尔：《衰败中的欧洲，1936—1940》（伦敦，1950），第222—224页。

有选择的余地。

当时，一些奇怪的非官方机构在进行活动。一位瑞典工程师达赫莱吕斯不断在伦敦和柏林之间飞行，据推测他受到戈林的信任，与德国有大量的事务联系。罗斯福总统和比利时国王也参加了进来，打电话敦促双方保持和平。墨索里尼告诉希特勒说他不能打仗（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场意志较量继续下去，而在此期间议会却处于休会状态，我们则聚集在俱乐部等候消息。艾登集团经常开会。波兰政府屈服于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意派出一位代表和希特勒谈判，但同时他们命令军队 604 进行总动员。在8月的最后几天里，斗争一直在继续，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始终企图从德国的建议中寻求某种解决办法。但最后在9月1日这场竞赛结束了。希特勒很不忍耐，也可能疑心太大。他对波兰的侵略终于发动了。

几乎直到最后，我们中某些人仍然认为如果我们立场坚定，希特勒是会后退的。的确，希特勒受到戈林和另外一些人很大的压力，要他后退。我于8月30日收到一封克兰伯恩^①的来信，内容颇为有趣：

您预言的危机来势凶猛地临到我们头上了——可怜的内维尔！他实在是自食恶果啊。我仍然觉得我们有一线希望避免战争……俄—德条约看上去好象会作为一个过分巧妙的标准范例而载入史册。唯一可以想象出的为之辩护的理由——也是邪恶的理由——就是它是否会使法国和我们的反抗成为不可能。这无疑是里宾特洛甫的估计。他从来是一个二流人物。但是我现在难以看出他们怎么样才能避免得不偿失。他们在不打仗的情况下没有取得他们所要求的東西，他们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对他们说来，这有更大的灾难性——暴露出他们是下流的机会主义者。这不是能领导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气魄。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能够不经过战争就能摆脱他们自己已经陷入的处境。他们也许不

^① 后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

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我们将进行战争。但是，我不禁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垂死的、没有希望的赌博……同时，我希望我们将绝对屹立不动——这是和平的最大希望。

虽然这个预言没有成为事实，但它却极为深刻。因为就是这个似乎是非常巧妙的俄德条约到头来使德国付出了非常巨大的罚金。

随着时间的过去，紧张局势几乎使人无法忍耐，甚至对我们这些没有职责的人也是这样。电报和信函传来传去。就在德国进攻波兰那一天晚上9点30分，英国大使向德国递交了一份照会，声明如果德国不撤出军队，我们将履行我们的义务。法国政府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605 撤出在学儿童和有孩子的母亲的工作于9月1日开始进行。议会也在那一天开会，通知我们英国发出了最后通牒。我于星期六即9月2日回家，帮助我的妻子为一大批撤出的儿童和他们的伴随者的到达作好安排。根据上一年的经验，我们决定，如果战争到来，我们将不可能长期住在自己的家中，将尽快搬到我为此目的而准备的小别墅里去。实际上这次搬迁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才完成，部分原因是这个迁来的幼儿园迟迟未能满员。在慕尼黑事件和大战爆发之间的一年里，我确信战争即将到来，因此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全部家具推进了一间屋子；一些桃花心木门被换掉了；壁炉台、地毯和墙壁之间的地板都用胶合板或各种别的办法加以保护，借以减少甚至很小的小孩在一般情况下也能作出的损害。虽然我估计住在我们家里大约有六七十个儿童，外加他们的教师和媒姆，但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在这长长的几年里几乎没有毁坏过什么东西。

我于星期六下午回到伦敦，想打听一下情况怎样。形势极为混乱，在我们集团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疑虑。我们得到的全部消息就是我们仍在等待对我们9月1日照会的回答。这份照会似乎

没有采用最后通牒的措词，因为它没有限定回答的时间。反对党特别感到不安，我们的许多支持者也是这样。艾德礼因病不在，格林伍德代理工党领袖。首相只是告诉我们墨索里尼已提出建议召开四强会议。这非常象慕尼黑事件，议会因而感到不寒而栗。但首相不久就明确表示，只要波兰受到侵略，墨索里尼的方案就不能考虑。他还说我们正和法国人商讨我们允许德国军队从波兰撤出的时间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以保卫和保证波兰利益为条件，可以在波兰和德国政府之间进行商谈。^①由于不幸的波兰人已遭到一 606
场近两天的陆地和空中的猛烈攻击，这项声明似乎有点软弱无力了。前一年的回忆甚至把政府支持者中最忠诚的一些人压得透不过气来。当格林伍德站起来发言时，出现了一个常常被人详细讲述的情景，它生动地突出在我自己的记忆之中。艾默里大声叫道：“你要为英国说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他避免纯粹为党派发言。他肯定已经体会到在张伯伦有点吞吞吐吐的讲话的背后，存在着我们和法国之间的困难，而把这些困难泄露出来又是不明智的。格林伍德讲话既富有感情，也很庄严。他坚持要首相答复英国究竟抱什么态度。首相认为至少要到第二天才能回答。然后他说法国内阁正在开会，他将在几小时内知道它的结果。

议会闭会后，议员们在议会走廊和吸烟室里走来走去，情况有些混乱。谁也搞不清张伯伦声明的背后包含着什么。我们当然不知道法国外交部长博内正背着达拉第进行最后的孤注一掷的努力，想再来一次投降。那些“不知内情”的大臣们坚持要求内阁在那一夜晚些时候开会，以便澄清局势。法国人仍然请求拖一下，理由是要在没有空袭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动员工作，以及他们能够在毫不混乱的情况下进入马奇诺防线，他们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① L.S. 艾默里：《我的政治生涯》，第三卷：《无情的年代，1929—1940》，第323页。

达拉第因此要求再推延四十八个小时。但是英国内阁那时已经下了决心。哈利法克斯告诉法国人说，如果议会在第二天中午开会时首相不能宣称我们已处于战争状态，议会的局面就不能维持了。

9月3日即星期日，艾登集团在“安娜皇后大门”的罗纳德·特里的住宅里开会。我们听说这一天上午9点递交了一份真正的最后通牒，其时间限制是同日上午11点。11点15分，我们听到了张伯伦向等待着的人民广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他的话表达了他那深厚的感情。这些话是庄严的，也是真诚的：

607 我不认为，我还有什么该做的，或再有别的什么而没有做到……我们将为反对暴力、不道德的信仰、不正义的行为、压迫、和迫害这些邪恶的东西而战斗。我确信正义将战胜它们。

听完广播以后，我们走向下院。当我们进入新宫院时，汽笛声和警报器声大响起来。我问警察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根据指示，如果鸣的是颤音，那就是空袭。我问他这是不是颤音。他回答说：“嗯，先生，我不懂得什么是颤音，但据我听起来这鸣声不大象颤音！”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前，不准议会开会。作了一些工作才迫使议员进入地下防空洞。对我们多数人来说是太过分了。我记得在那美丽的星期日上午，我和许多朋友走了出来，登上了阳台。一个气球腾空而起，显然是从大河南岸伦敦郡议会大厦的郡议会大厅升起来的。人们用欢呼来表示对它的欢迎，它马上就被命名为“赫伯特·莫里森”。然而，很快就弄清楚这个警报发错了，我们于是就排队回到议会大厅，听首相的正式通告。

这是一个悲哀凄凉的演说。他说：“我所争取的一切，我所希望的一切，我在自己公共生活中所相信的一切，统统化为灰烬了。”他在结束时说了这样一些话：“我无法说明我自己能起多大作用；但我相信我会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被消灭，一个解放了的欧洲重新建立起来。”

唉，可怜的张伯伦。他只是又活了一年。

希特勒主义已被消灭。但是一个解放了的欧洲尚未重建起来。巨大的力量一旦被释放出来，就不易再被“关进小屋子里，关进栅栏里或禁闭起来”。虽然陷入贫困和被分割，欧洲在世界上的相对力量，不管是在精神方面还是在物质方面，都严重地削弱了，但它从严峻的考验中挣扎了出来，满怀希望地面对未来。但是，变革之风却是第一次非常强烈地刮起来了。

附 录

一、《重建》概要

(1933年发表)

1933年10月21日的《经济学家》指出，商业活动指数达到了1929年8月至11月间的最高点。1931年11月指数达到了最低点。根据那时以后所取得的恢复速度（每年百分之四点二）计算，我们在1939年以前将达不到1924—1929年“规划的”那种趋势——它本身就是令人沮丧的。

1929年是最近十年中最繁荣的一年，平均大约有一百二十万受到保险的失业者。如果1939年达到了那个水平的繁荣，那么人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设想，同样水平的商业活动就会意味着更大数量的失业。

救济失业者所必需的补助金使正在减少的财力愈益耗竭，同时对于恢复的推动力也起了一种制动作用。对失业工人来说，保险费可以使他能渡过几个月的失业困难，因为他的家庭已经得到了家具、衣服等的供应，但当失业延长数年之久，情况就改变了。

世界设备能力生产出来的东西超过了世界市场的吸收能力。当许许多多的人们正在忍受贫穷与困苦之时，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是荒谬可笑的；同时也是危险的，因为聪明的人们是不会永久甘心在这样的一个矛盾情况下受苦受难的，而在摧毁一个在富裕当中产生贫穷的制度时，他们可能被迫也去摧毁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一种逃避萧条的办法是非常必要的。

“自由资本主义”的旧制度是一个世界性的制度。每一地区生产自己最适合生产的商品，并且在世界市场上交换这些商品。至少在理论上，与其说这是一种竞争制度，还不如说这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制度。

但随着世界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当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本与市场的扩大速度时，这种制度的竞争性质就变得更为明显和更为尖锐了。竞争的生产者们转而利用他们的国家机构作为一种武器，同时经济上的国家主义变成了统治势力。关税，补助金，汇兑限额等等，这就是它的结果。我们对此也许深感遗憾，但对此熟视无睹是不可能的。

世界经济会议是这样设想的，即它的任务是消除阻碍贸易的一个人为的

上层建筑。协议证明是不可能达成的——因为会议正在研究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会议失败了，而且应该承认并且宣布这种失败，因为只要还存在着任何相信恢复旧制度是可能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便不会通过一项现实的行动计划。

经济繁荣的条件是依赖于商品生产以及其数量能够使它们互相进行交换的供应工作。使我们受到损害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生产中的不均衡或者失去平衡。这是由于生产者的错误与失算造成的。大量的生产者分别各自行事，不能调节供应；总的生产量可能超过了需要，因而激烈的竞争便把价格压低到无利可图的水平，使破产蔓延到一直在扩张着的范围中去。在迅速扩张的时代，这些错误打算不产生这样悲惨的和广泛的影响，但有效的扩张时期——即市场扩大的增加或者超过生产力增加速度的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现代生产巨大的增长速度，加上生产者数目的增加，所有控制的储备能力，使得危险更加尖锐了。

我们被迫要制定计划，因为老办法已经不再适用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方面——本国的与国际的。

一、本国问题

生产平衡受到四个因素的威胁。

进口

无限制地竞相进口可以使价格下降，从而使工资下降，由于随之而来的购买力的降低，骚动扩张到整个结构中去。当有效扩张时期过去以后，自由贸易便只能意味着在工资水平与总的劳动成本方面进行竞争，谁能够以最便宜的劳动力生产出同样质量的商品，谁就可以获得市场。在全国任何单位中实行生产计划，都需要有适当的保护贸易制度。保护贸易制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个初步的防御行动。它创造条件，使问题的国内方面能够得到处理。

生产过剩

某些商品生产过剩，售价降低，使厂主们受到损失，给工人们造成失业，形成购买力下降，其他工业生产部门从而受到牵连。通过在工业中建立一种组织机构，这种弊病可以得到矫正，并且可以防患于未然，这种组织机构可将个人生产者置于能确定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大体关系的中央指导的控制之下。工业只要是按竞争方式组织起来的，那么生产是无法根据估计的需求来

613

计划的。相当于垄断的管理权应当授予有效地组织起来与结合起来的国家工业，因为假若没有这种权力，过分的竞争力将重新产生。数量调节对于经济价格与市场稳定是必不可少的。

寻求一种方法使垄断生产组织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在总体上协调起来，这个问题必须予以重视。任何单独垄断的权力都将加以限制与约束，如果它是在一个生产与分配的其他功能同样地组织了起来的社会中进行的话。

储蓄与投资

在任何商品生产中，都有工资、薪金、租金、利息、利润等各种形式的足够的购买力将公开市场上的这些商品购回。但是得到这些钱的人们并不一定把它全部花掉；他们可以将其中一部分储蓄起来，这样便抑制了购买力，因而生产超过了需求。然而，只要储蓄的钱被用来投资——那就是说，借给那些希望使用它的人——那么购买力仅仅是转了手，而仍然产生着实际的需求。但是当储蓄率超过投资率时，实际的需求便缩减了，而经济混乱因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想出刺激投资的办法来。

生产与消费

这与前面那个因素有关。随着生产总量的每一增长，储蓄量似乎就要有所增加，最后总有一天把储蓄充分用于投资的机会不再存在。有三种利用这种增长的办法：增加工资，从而扩大国内市场；将劳动转移到这样一些事业上去，例如重新装备我们的工厂，给人民建筑住房，建造公共建筑物，或者减少劳动时间而工资不减，这样生产力的增长便以歇息的形式而享用了。

614 在目前情况下，根本没有什么途径可以使任何经济政策在整个生产领域内能够得到有效实施。我建议：

(1) 对每一工业或者每一多种工业集团建立有代表性的全国工业理事会，其功能为鼓励和帮助在购买、生产、销售以及研究等方面的有效协作，遵循的方针是使每一工业都能够朝着最大可能的统一政策和必要程度的集中管理方向发展。

(2) 建立一个中央经济理事会，它代表：

政府——通过关税咨询委员会；

工业——通过全国工业理事会；

财政——通过例如权限与功能都扩大了银行家工业发展托拉斯这样的机构。

这个机构将使政治、工业以及财政各项政策为达到平衡这个共同目的而

配合和联系起来。它将把投资引进到麦克米伦委员会报告所倡议过的、新近英国工业联合会也倡导的正确渠道中去。它将影响信贷政策，并且指导工业理事会根据市场需求的最科学的估计努力取得一项新的国内生产的平衡。

工业自治

最近几年里，在对工业生产进行集中和协调管理方面，我们取得了经验，在采取这些建议时，我们将不会感到全然陌生。例如电力委员会、伦敦旅客运送法令、矿业法令等方面的工作，试图导致或者强迫生产上的有效协作。在农业方面则有小麦限额、整顿猪的生产以及咸肉的加工处理等等。

然而，为了计划的整个利益，必须推进一项全面的重建方针。这是一项只能由工业本身完成的任务。这里提出的这一政策的全部意图，是要通过自治来代替官僚主义而达到制定计划。

工业家们认识到需要一体化、协作以及调节——因此近几年来形成了一些合并、企业联合、集中销售代理处等等。工业内部舆论动向的实例是全国造船者安全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为了通过集中生产与消除过剩能力以保证更为经济的成本而组成的；此外还有为保证在棉纺织和钢铁工业等方面进行整 615
顿所作的努力。

政府能够以多数票请求每一工业将它的工业一体化方案服从于一个全国单位，从属于适当的中央控制。当全国工业理事会被任命后，政府应当授予它必要的法定权力以贯彻一体化方案，并且从而通过运用调整权力以维持稳定。

第四次生产调查(1930年)把工业生产分为一百二十个行业，归入十七类。这包括除了农业、运输以及分配之外的所有工业。因此一百到一百二十个理事会就可能包括工业活动的全部领域——这和一千八百五十个地方税收机构，或者六百一十五个议会选区相比较，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数目。这些理事会的代表可以集合在中央经济理事会之中，它将成为一种工业议会。

中央经济理事会和财政、工业及 政治政策的协作

中央经济理事会将由每个工业理事会的代表、银行业和财政金融业的代表以及进口关税咨询委员会的各行政首脑组成。在这张名单上加进少数能够对经济政策多方面提出建议的经济学家，以及一批对科学发明与研究能够

提供专门知识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许会有好处。会议应由一位内阁成员在与首相保持密切接触的情况下主持——很可能是商务部大臣或者是一位特设大臣，他的全部注意力将专注于此项工作。运输大臣和农业大臣应当是它的成员。

这样一种职能性代表机构绝不会成为议会的敌对者。建立一个组织，它可以就工业问题向议会提出建议，议会通过这一组织将那些它可以讨论的政策付诸执行，这样它与议会一点也不矛盾。

通过平衡以取得并且保持经济繁荣的状态将是理事会的职责。例如理事会将负责在进口政策方面提出意见(见后面“国际问题”条下)；如果工业理事会未能处理生产过剩的问题，它将负责考虑采取行动；通过它的财政代表，负责保证总的财政政策以稳定价格为目标；负责为储蓄投资寻找新的途径，
616 如果投资不能与储蓄步调一致，则负责敦促采纳公共工程方案，以维持市场稳定，直到储蓄与投资恢复平衡为止。如果理事会发现储蓄的增加超过了便于进行投资的速度时，它可以建议增加社会福利费用，使工人脱离为交换而进行的货物生产，或者它可以建议缩减劳动时间。

经济自由

制定计划经常被弄得看来好象是一种官僚主义管理体制。这些提议和官僚政治的任何建议之间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作为提出的组织形式的结果，整个经济体系能被委托管理价格，以指导市场情况和生产规模。保持价格体系是社会主义计划观念与非社会主义计划观念的真正分界线。

如果提议的那些一体化的工业能够利用它们的垄断地位去剥削消费者的话，那将不可能把价格交由市场自行掌握。但是对于任何可能这样行动的垄断程度是有严格限制的。

有一种生产的“效率”水平，亦即任何一个个别单位的生产成本的最低水平。这是一个不变的因素，可以用纯粹的科学检验测定之。在销售方面，有两个变数——第一，消费者对于价格变动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根据展现在他面前的选择而变化(因为即使在任何工业内部的竞争消除之后，还有不同种类商品之间的竞争)，同时也根据满足需要的迫切性(如果奢侈品过于昂贵便可以完全避免消费)而变动。第二个销售变数是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最有利可图的销售标准可给制造者一个选择余地——例如，他可以搞清楚利润怎样才能达到最高限度，是以二十五先令出售较少的商品呢？还是以二十先令出售一大批呢？懒惰可能使其倾向于选择前一种办法。但他如果这样办，那

他将会受到劳资双方强大势力的反对，不管是资方还是劳方都反对限制产量。那个不变的因素与这两个变数的互相作用将进一步限制任何垄断能够剥削消费者而不致损害其自身。

任何试图利用自己垄断地位的工业，实际上由于减少对其他工业产品的需要，将损害其他工业。同时，既然它们在经济理事会全部有代表，于是就可以施加公众批评的压力。

一个垄断组织很有可能不利用新的发明。迄今为止的经验尚未证实这 617 种意见，因为最高度一体化的工业，例如化学工业，正是现代研究的最进步的使用者。科学与工业研究人员在经济理事会的出现，对任何工业压制新发明将是一种进一步的障碍。但是在保证足够地试验新发明方面，可能是有困难的。科学与工业研究部的某些调整将提供一种解决办法。

二、国际问题

只有当我们能够设计出一个方法，能使我国经济不致通过我们的对外贸易渠道遭受那些外来的混乱因素的侵扰，提出的这一整套制度才具有效力。

在正常时期，英国工商业活动的三分之一是依赖对外贸易的。英国的经济稳定从两方面受到危害——由于廉价进口货物削低了国内生产者能够出售到的价格，或因出口货物价格低廉，这两种意外事故都使国内生产遭受挫折，因而造成了失业。

一个自由贸易世界不管在理论上有哪些优越性，事实仍然是，我们并未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之中，而本书所依据的关于经济形势的见解，设想需要有保护贸易制度。目标必须是在货物交换与服务方面保持一个最高水平而不是最低水平的平衡。

经济理事会将追求三个明确规定的目标：

- (1) 保护国内市场，使其免受廉价进口货物所造成的混乱。
- (2) 保持我们对外贸易的平衡。
- (3) 保护我们的出口工业，通过出口工业保护我们的整个经济结构，使其免受因出口工业被迫在国外低价销售货物而引起的混乱。

关税与限额成为保护国内市场的一种措施。关税也对国家收入有所补助，限额尽管能使索取更高价格的外国生产者取得好处而对国家花费较多，但它有立见功效的优点。不管怎样，只靠关税与限额是不够的；一个劳动

力低廉、货币贬值的国家是能够克服关税障碍的。而且对于目的不仅仅是平衡我们的进出口，还要把平衡维持在一个高的而不是低的水平之上的政策来说，关税和限额并不是很适当的。

618 外贸统计的分析表明，种类为数不多的货物在我们进出口中却占了比较大的比例，同时又表明，在我们整个海外贸易的进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与少数几个国家进行的。在那样的限度内，安排购销之间的平衡就简单了。

走向解决的第一步在于使英国工业一体化、现代化以及重建。竞争的效率将因此而增加，而集中与专门推销取代英国制造商之间的竞争，这将产生节余，从这种节余中，人们就能为英国货物在国外市场上取得更适当的地位提供资金。

在全国理事会之下活动的改组过的工业将谋求大批购买原料与合作销售成品的利益。这些工业必须彼此协作经营，每一国家工业的购买与销售组织的代表都置于国家进出口票据交换所的管理之下。进口税咨询委员会能够成为这样一种组织的核心。票据交换所将不为自身的利益进行购买或销售，而是协调与指导其他为这种目的而存在的组织去购买与销售。这将产生两种利益：大量购买经济合算；有机会利用这个国家——世界上最大的食物与原料市场——讨价还价的力量去为我们的出口贸易获得合理的庇护所。我们从国外购买食物的需要并不比外国向我们销售食物的需要更大。事实上，1930年以来食物与原料的价格与工业制成品相比是下降了。我们讨价还价的力量可以用于象美国和阿根廷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在英国进口名单上分别占第一位和第二位，但它们在接受我们出口货物的国家名单上却居第七位和第十位。

按照提出的这些方针组织其贸易的国家将能指向一种真正的帝国发展政策。为了回报在它们市场上所获得的同等利益，我们能为英联邦国家提供一个价格合算的有保证的市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一项帝国贸易政策。

在这些方法证明还不够充分时，将有两种选择摆在我们前面。我们可以缩减我们的出口工业，同时发展农业及其他生产，以代替进口货——不是一项不可能的调整，尽管它减少了从国际专门化中可能得到的好处。要不然，我们可以付给出口商一笔补助金，这笔补助金或者直接出自财政部，或者由以低价购买进口货而以较高价格转卖获利的海外贸易组织支付。实际上，第一种选择将适用于其市场经常受到价格暴跌威胁的工业（例如煤矿、棉纺织、

造船),而第二种选择则适用于面临暂时危机的工业。

由于对外贸易政策指导得当,恢复金本位所带来的危险将不会存在,因为用来调节国际平衡的黄金流动可用我们对进出口货物与服务行业的平衡施加控制的办法,使其保持在某些限度之内。货币政策因此能够相对地不受维护黄金储备或者维持兑换率的影响。 619

三、劳工问题

由于当前把产生纠纷的条件加以明智的控制,调解劳资两方利害冲突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为了取得对于国家经济命运的指导,这种结构已经设计出来,因此不能认为它没有力量影响由于混乱情况而引起的劳资双方之间的争执,而这种结构正是为了消灭那些混乱情况而设计的。

经济理事会的目标显然是将通过扩大需求而不是限制供应的办法以维持供求之间的平衡。因此劳动报酬就成为总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方面。工人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

正如一个尽力提高其产品价格的工业将使其他工业可得到的报酬减少一样,如果这个工业中的工人强使工资提高——因而提高成本与价格——的话,其结果是其他工业的工人收入能买到的东西将要少一些。任何部门工人的工资绝不允许下降到足以损害市场稳定,也不能允许上升得如此之高,以至危害其他工人的生活标准。没有人提出工资能够或者应当相等,但是应当设计一种工资谈判制度以保证工资公平。

改组过的工业中的那些工会将自然地倾向于使它们的集团在类似的方针上适应资方,从而加速目前工业工会取代行业公会的趋势。从车间到全国理事会每一方面都将有一个代表资方的团体和一个代表工人的团体,最后成为与每一工业的全国理事会对应的工会理事会和与中央经济理事会对应的工人代表协调团体。

在每一个方面都将建立调解机构。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工时与工资,将由全国一级处理,而协议条款则提交经济理事会登记和批准。如果不能达成协议,那么争议将提交经济理事会,而在判决以前,将不允许罢工与闭厂。620 但是劝告将不具约束力,结果公布之后罢工与闭厂的权利将重新恢复,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权利,一种不断增强的高压政治将成为必然的,直至这个国家的个人与公民自由被剥夺一光,而这些自由正是本书决心维护的。

在设想的这些固定的条件中,当搞清楚实际上纠纷存在于工人与经济理

事会之间时，发生这种罢工的威胁就不会那么尖锐了。因为理事会将关心扩大市场，那么唯一能够引起这样一类纠纷的情况只有是，假若一部分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而要满足这些要求时只能牺牲其他工业中的其他工人。在维持国民这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平衡时，经济理事会更有可能保证劳工的合作，而不是惹起敌对。

工会提出要求参预工业管理与监督，是为了保证工人的福利将得到优先考虑。对于工业日常管理的干预必须给以抵制。但是在经济理事会中劳方的代表将有机会不仅照顾工人整体的利益，而且对促进合作制度的前进与发展做出他们的贡献。

如果现在产生摩擦的不稳定与波动得以消除，我们便可期待终有那么一天，劳方、资方以及厂主在合作与协力的精神下融合在一起。大规模生产使得工人的工作单调沉闷，并且不合乎人道。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减少劳动时间能使工人多一些闲暇时间，使生活不致单调，体力劳动者节日工资照发，病假也照发工资，而月、季或年度的雇用合同，则有助于消除工作无保障的顾虑。

四、独裁的威胁

同这本书里倡导的那些政策相似的一些政策被人们描绘成“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其实并非如此。

这儿所提的建议，与俄国的共产主义国家和意大利的全体国家有些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在所有那些以计划和有意识的指导取代自由市场混乱的经济制度中都将存在。但是计划这个概念既不是法西斯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那些革命运动在它们的经济政策设想出来之前就存在了。

621 这儿所倡导的政策是一个依靠向理智呼吁的有关经济进化的政策。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依靠激情的政治革命运动。两者全都拒绝代议制政府和民主政府的概念。两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不诉诸武力是不能解决的。它们准备通过革命行动和内战来夺取政权，而且在一经获得政权之后，便将根绝一切反对因素。

必须以积极的建议去对抗革命党人的浮夸呼吁。如果这样一种体系能够在社会的个人观念和集体观念的敌对要求之间提供一项合理的妥协，那它将是一种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因为这种妥协可能使它们各自比较高尚的方面得以保存。

二、《就业规划》导言——某些议员的初步研究

622

(1935 年发表)

两年前下院一些举国一致政府的支持者竭力想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个问题甚至在当时已够明显，而且从那以后变得越来越紧迫了。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举国一致政府是否仅仅应当被视为一个紧急看守政府的成员们的暂时联盟，如果不是，那么当紧急情况过去之后，它将主张什么样的总的路线政策呢？他们对那个问题总的回答与今天似乎在下院以及在公众之间存在着的那种感情倾向非常吻合。那种感情也许可以大致阐明如下。

在这些日子里，没有一个政府能被视为是看守政府，因为尽管我们生活其中的紧急状态的某些严重方面可以看做是暂时性的，但是紧急情况本身完全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变。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因素变了，因而世界社会生活也就变了。人们对这个改变可以各抒己见。对于这一或那一改变所具有的相对价值人们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估计。但是，总的来说，都认为恢复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经济形势是不可能的。各届政府与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学派必须使自己的政策适应新的趋势，这就完全象一百年前的各届政府和各个党派不得不使他们自己适应于工业革命的结果一样。一个举国一致政府是进行这种调整的适当工具。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种调整包含着“计划制定”，因为它牵涉着观点的审慎改变。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转变时期犹如一场运动战，在这场战斗中对于一位战略家说来至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自己的活动自由，不要把自己一成不变地束缚在一条特定的前进路线上。例如，目前经济力的趋势可能朝向某些基本工业紧密结合的方向前进，但是在某些领域内也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朝着大分化前进。如果老的僵化的党派教义只是为了让位给某一新的僵化的“规划”教条而被丢弃的话，那将是一次无聊的变换。在另一方面，一心一意要维护自己活动自由战略家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必须对他当前的目标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他对为达到这些目标而提出的方法尽管是临时性的，但也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那么当今摆在我们面前的目标是什么呢？显然是就业问题。不管某些人作什么样的美梦，梦想在一个世界里少数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可以以社

会红利的形式分配给社会所有成员。可是今天我们同胞们的第一需要是通过积极生产畅销商品与参加服务行业以谋求生计的机会。换句话说,当今我们需要的规划就是就业规划。认为不需要这样一种规划是可能的;夸大它的作用也是可能的。人们可以持这种见解,如果有一个健全的货币制度和合理的贸易自由,那么最大限度的就业就会自行产生。或者人们可以投身到劳动或雇佣者的专断征募的喧闹中去。但是人们也可以采取一种中间看法。人们可以持这样的见解:即使从目前的贸易量来看,工业和农业雇用的劳动力并不象它们能够吸收的那样多。依照这种见解,工业的吸收能力之所以受到妨碍,一方面由于工业本身内部组织有缺点,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政府有关工业政策的缺点。换言之,对有限市场的过度竞争,补充与训练的方法漫无目的,征收赋税,征收社会保险缴费的方法不好,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限制了就业,使就业失去了保障。如果要对更大规模就业有个审慎的规划,这些缺点必须首先纠正。

一个议会党派的首要职责就是在国会议员席上表明它在议会活动中的态度。后座议员不能希望制定政策,他们没有老练的行政人员那样的知识,也没有研究人员那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同时,我们中间某些人感到,当前重要的事情至少要制定一项有关就业政策的试行大纲,而党派内少数几位成员特别谈到问题的工业一方面。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制定一项国家经济政策,毋宁说是建议为制定这样一项政策和贯彻这一政策所需要的一套体制。这里出版的这份备忘录原来是在1934年8月起草的。无可否认它是不完备的,做为备忘录的作者的那些人,不管他们之间还是他们与党派其他成员之间,在备忘录提出的各种不同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上,以及在许多细节问题上,意见自然是不一致的。因此这份备忘录决不能认为是一个宣言;而它的作者们认为,做为制定政策的初步的试验性的文件,虽未经进一步推敲但现在把它发表,也许是有用的。

即使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显而易见的批评肯定可以加在它的身上。强调在备忘录的第一部分里作者们完全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仅仅适合于少数基础工业的工业“合理化”那样的特别体制之上,而对于很小的一些工业企业在生产与就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忽略了。这一批评在某种程度上由备忘录所作的评论,例如在第十四、第二十五和第三十五各节中事先就予以答复了。我们充分了解到雇用二十五人或少于二十五人的工厂在1930年占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工厂的百分之七十六,大约占工厂雇工的百分之十三,而

所有工厂雇工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在一百人或少于一百人的工厂里作工。如果我们把注意力特别集中于那些我们所谓的“所有其他工业依靠的某些基础工业”之上,那是因为这些工业提出了最紧迫的问题,同时也为自由法规制定确切纲领提供最明确的机会。

对于另外可能的批评,我们必须给予差不多相同的回答,那个批评说我们过多注意人们可能认为的效率比较高的生产,而较少注意人们通常认为的效率比较低的分配。这里我们还是必须根据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的材料。象备忘录中所指出的那样,甚至那些对认真考虑分配问题所必须的简单明了的事实尚且不清,就想就制定经济政策所需要的机构问题达成协议,这种缺陷就显得格外突出了。

概括起来,这个备忘录所寻求的,不过是对可能被五花八门的思想流派、个人主义者,同样还有那些对“公用事业”组织和强迫销售方案的虔诚信徒们所接受的那个问题,作一般的探讨而已。那些协同起草这个备忘录的人的名字都记在下面。他们所代表的舆论范围事实上是很广的;他们的目的不是起草一个纲领,更不是发表一项宣言,而是要对全国人民正在等待着的那个最后纲领做出贡献。

| | |
|---------------|----------|
| 安东尼·克罗斯利 | 杰弗里·埃利斯 |
| C. W. H. 格洛索普 | 弗兰克·海尔格斯 |
| 汉密尔顿·克尔 | 肯尼思·林赛 |
| 哈罗德·麦克米伦 | T. B. 马丁 |
| 休·莫尔森 | 查理斯·皮特 |
| 尤斯塔斯·珀西 | 罗纳德·特里 |
| 哈维·瓦特 | |

三、《未来五年》第一部分概要: 经济政策

625

(1935 年发表)

政府必须有条理地制定其经济政策的计划,并为此目的建立以下机构以作充分准备:

(a) 政府计划委员会,由不担任其他部门职务的内阁大臣组成,制订总的政策方针,提交内阁审批。

(b) 经济总参谋部,这是一个隶属于上述政治委员会的常设机构,由例如主要经济部门的常任主管、当前的经济咨询理事会以及工会和劳工运动的成员这样一些专家组成,并由一些资历很深的常设人员协助。它将不断地对全国问题进行调查,向计划委员会提出建议,并且制定出委员会委托给它的各项计划。

英国概况

大约六分之一的可用劳动力未加利用。巨大的浪费在继续着——体力与脑力的、资本的、物质的、机会的。还有财富的极端不均,这种不均与提供的社会价值几乎无关。下一代的两项主要经济任务必定是要纠正这两个显著的缺点。

国家发展

目前客观上既特别需要而时机也又非常好,用一项值得兴办的公共建筑工程的扩展计划做为手段来刺激经济复元。无论是长远的持续的国家发展方案,还是在萧条时期社会对有益的重要工程得以扩大其经费的短期方案,都很需要。我们倡议建立一个国家发展委员会。

适宜的活动范围是:

626 电气化 电力供应工业在公共改革与管理的日程上应名列前茅,资金要投放取得廉价供应品的地方,在那儿资金可被有效地使用。另外应该兴办的企业是铁路电气化。

房屋建筑 建筑业是刺激恢复特别合适的渠道,就成本而言它提供了较高比例的就业,同时由于导致对其他工业需求的增加,从而扩大了繁荣。

最为迫切的眼前需要是增加住房,这些住房的租金特别要以挣一般工资的人或低工资的人能够负担为度。房屋补助金仍然是必要的。

下列条件必须具备:

(a) 筹集资金必须集中,以便筹措资金时的利率与财政部贷入时的利率能够相同。

(b) 必须设立一个中央机构以保证建筑材料能够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大量购得。

(c) 新建筑要加以“规划”,既要从地理上根据国家政策,也要从地方上考虑适合当地的服务情况与环境的舒适。

为了中央统一规划与管理,应当建立一个国家住房建筑委员会。

道路 建议延长和改进公路干线、旁路与桥梁。

地方权力体制 自从 1931 年财政危机以来，政府劝阻地方当局继续进行它们筹划过的企业。应当积极鼓励重新从事这样一些企业。

鼓励私营工厂 国家发展委员会在推行其公共工程政策的时候，要经常密切注视私人资本发展的程度，并且适当地调整它的活动方案，但是也还有余地通过贸易便利条例和出口信贷保证部这样的措施给私人工业以积极帮助。

城市和乡村规划 在全国规模上考虑我们的人民与我们的工业的地理分布，现在是时候了。新的工业不应当设置在已经过分发展的大都市的新郊区，而应当设置在象贾罗或者北希尔兹这样的城镇中，那里原有的工厂和居民只有在极其有限的程度内，要蒙受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才能够重新安置。工业应当进一步分散。有一些工业正在作为花园城市的中心而建立，这很可能是对社会有好处的。

国家尚未采取什么行动以保留那些连绵成片的原野中的任何部分做为“国家公园”，国家应当把那些原野做为民族遗产保护起来。 627

我们建议对国家面貌规划总的监督责任置于国家发展委员会之下，运用诸如国家托拉斯以及保护英国乡村理事会这类团体的经验。应当设立区域规划机关，具有否决权，阻止那些不受欢迎的发展，也具有绝对的权力，诸如筹集资金，购买土地和着手制定建筑与运输方案。

工业组织

自由企业制度在实践中是否一直进行得象理论上描述的那样顺利，这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完全可以肯定，它今天进行得并不顺利。这有许多原因——主要是，进行调整的伸缩性减少了，这是由于高昂的资本成本以及现代工业社团组织而引起的，再就是（受到社会欢迎的）工会坚持标准工资和失业津贴的要求。还有战后产生了一种“生产力过剩”的新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战时的过分刺激，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外贸易的下降。剧烈的竞争越来越厉害了，即使效率最高的康采恩也被逼至绝境。但是为了防止这种剧烈竞争的危险而鼓励象限制生产以及将价格维持在尽可能低的成本之上那样的垄断公司，那将是跳出煎锅，投进火海。

在强调某些工业中自由竞争缺点的同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认为这些缺点是普遍存在的。然而我们必须为那些自由竞争产生了持续混乱，也产生了危险的经济力量集中的工业，建立新的体制，以取得经济生活上有条不紊。

但是，计划的制定必须要以做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利益为目标。仅仅用通过掠夺消费者去增加从事工业者的报酬的办法去“计划”工业，那将减少而不是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计划的制定是为了把真正财富的生产提高到最大限度。

组织方法

628 没有可适用于每一种工业情况的统一处理方法，然而如果每种工业都依次交付政府单独考虑，那么这项工作就永远不会完结。我们建议通过一项权力授予法案，它将按照进口税咨询委员会的方针建立一个工业咨询委员会去检查与通过各工业提交上来的计划。

授予多数工业以自行组成垄断集团的权力是不符合公众利益的，但是权力授予法案可能授予的许多权力，例如工资协定条款、标准化或者为研究部筹措资金等，都不会引起垄断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工业要求垄断权力——即对子公司限制产量的权力，规定最低价格的权力，或者限制和禁止新加入者的权力——那只有当规划包括公众监督这一条款时才应予以批准。

为了适应需要一定程度的组织或者需要公众监督然而它们自身却不能
在权力授与法案下完成这种任务的那些工业的情况，我们设想出四个主要组织型式：

萧条工业 在某些工业中，例如煤炭、棉纺织、钢铁以及造船，经常存在着生产力过剩的问题，任何计划都将包括缩减生产能力和在那些效率最高的工厂中集中生产这两方面。被委派来掌管改革方案的一个委员会或几个委员会，应该把自己看做是受整个社会委托的，因此每个委员会应有一位真实的“中立”分子，他所代表的不是工业中的任何一部分，而是公众利益。

公共康采恩 被一两个大公司统制着的那些工业实际上是垄断企业，应该通过一项公司法案修正案要求他们把全部业务活动完全公开，由官方或专业机构指定并给以报酬的会计人员清查帐目，并公诸于众。

公用事业 应赋予商务部以权力，与适当的计划权威协商，确定某些工业做为公用事业，如果该工业被公认其重要性而使这一措施成为正当的话。铁路、瓦斯以及电力公司已经纳入这一类；合资银行应被放在里面，同时这个原则很可能扩大到某种行业——如果不是所有的——保险以及其他工业中去。这个建议与其说是增加公用事业的职责，毋宁说是扩大公用事业的范围。

社会化工业 我们通常相信,各种形式的“公共企业”比在政治监督下直接国有化更为可取。实行公共所有或公共管理的程度必须限制在政府机关承担附加责任的能力上,而不冒无能或腐败等不适当的危险。国家不应承受正在衰退的工业的负担,也不应该接管那些迅速发展的工业,对于这些工业的发展来说冒险与试验都是致命的。从总体上说,必须有一个精心制定的“公用事业”的预算,每个公司或者必须支付其应承担的全部费用,或者必须无可争辩地提供相当于只顾及成本的公共福利。根据这样一些考虑,我们建议适合于社会化的工业包括运输、电力供应、某些形式的保险以及武器制造工业。 629

银行与财政

货币的作用是作为经济机构的一种润滑剂。因此有效的货币制度便是正常活动的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但是即使一个完善的润滑体系本身也不能使停止了机器开动起来,或保证其平衡运转。货币政策在一项完备的经济政策中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必要因素。

英格兰银行 英国的银行体系是以英格兰银行为基础,并大部分受其控制。尽管具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影响地位,而这家银行仍然是一家私营特许公司。这家银行同财政部保持着尽可能密切的联系,并把它的特权当做是公共的信赖,如果发生差错,那是真正的判断上的错误,而不是专为自己打算既得利益的行为。

但是这种情况有三个显著的缺点。这家银行倾向于反映商界和财政金融界的观点而排斥其他观点;它从来不阐明和辩护自己的政策,也不对任何人负责,它无法将那些丧失公众信任的人免职。使这家银行成为一个公共机构的时候到来了。第一,任命这家银行的总裁和副总裁应征得政府同意。第二,应给总裁提供一个咨询委员会,代表工业、商业、劳方、商业银行业以及经济科学等方面,甚至可能由这些方面提名。第三,应当责成这家银行应远远超过现在取得公众对它的信任。

合资银行 我们的意见是,应当给予合资银行以一种符合他们实际情况的地位,即它是我们公用事业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们应当继续为私人所有,但是它们的利润应该受到限制,其活动应该受到监督和检查,其功能应该由法律规定,有义务向公众提供关于它们交易的最全面的报告。

资本流通 英国现有的资本市场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改革应有 630
两个主要目标:调整与鼓励。在调整方面,内阁计划委员会和经济总参谋部

应当通过一个全国投资委员会进行工作，这个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要对用来为公债筹措资金的储蓄金做出数量上的估计。它的第二个任务是决定从这个总数中拿出多大一部分用于对外贷款。这个委员会将监督对政府、地方当局以及公共团体发出的一切贷款。就鼓励而言，需要建立国内发放机构，以检查发放条件、批准用钱的目的以及根据介绍发放贷款。公众在看见计划书某些公司当中一个公司的名字时将产生信心。必须教育被大量的公债惯坏了的英国的投资者，使他们认识到未来财富的唯一源泉是工业繁荣。

对外贸易

英国由于气候、人口与土地面积的关系或自然资源等原因，都不适合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意见的分歧只是我们打算搞多少外贸以及根据什么原则去搞外贸。由于至少半数的失业是因外贸下降所造成的，因此恢复对外贸易将为迅速重新吸收大量目前的失业者提供一个最好不过的希望。

如果扩大出口市场的努力得到自愿将进口税保持在适当限度之内的支持，那将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最好的关税制度除了属于下面所描述的某几个重要的例外以外，并不试图区分不同的工业。议会应该对各类产品制定相同的最高限度的进口税率——比如，对于初级产品粮食和原料是百分之X，对于半制成品是百分之Y，对于制成品是Z。强制拼凑一个不平衡的体系是不合理的。

在制定一项全国计划的过程中，如果为了社会理由，或在战时为了更大的安全，或者为了其他理由，国家决定一个特定的经济部门应特别给以援助的话，那么这种统一税率可能变更。不应当仅仅为了增加那些从事工业的人们的收入而做出决定。

扩大贸易的方法 单方面的经济缩减以及指望外国发善心或想当然
631 会使其共同我们协调一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保证英国未来的出口工
业市场最好的方法就是仅仅允许那些作为回报同意购买我国货物的国家容
易地进入英国这个大市场。几乎我们所有的贸易条约都包含着“无条件最惠
国”的条款，双方保证自己给予其他一方的待遇，与给予“最惠国”的待遇相等
(给予英国自治领或殖民地的特惠永远不包括在内)。但是一个关税高垒的
国家可以心安理得地保证不搞歧视，因为他们要一视同仁对所有国家的货物
都课以同样的寓禁关税。1932年以来所采取的那些双边谈判方法已经产生
了令人沮丧的结果。

需要对最惠国条款进行修改，为增加贸易而实施的真正相互交易的条款

为免税作好准备。我们只是建议，应当把现存于英帝国各国之间的互惠的贸易往来的可能性也扩大到我们与外国的关系中去。

英国应当宣布，在将来它不会把这项条款看做是适用于在某些条件下商议缩减关税的。这些条件的重要部分应该是：

- (1) 在协定中涉及到最低限度数目的国家(例如五个)。
- (2) 它是一个减税协定，而不是(象渥太华主要就是那样)一个对非参加者提高关税的协定。
- (3) 关税缩减包括有关国家大部分贸易。
- (4) 在同样减低各自关税的条件下，任何其他国家都可以参加这个协定。

低关税俱乐部 目前许多被迫保护其工业的国家，本质上并不是强烈的保护贸易主义者，它们将欣然同意联合起来，努力开放贸易。对于少数反对者，英国可以轻易地通告废除其贸易条约。

农业问题

英国从廉价进口食物中得到好处，切不可使我们忽视英国农业陷入恶化的情况。为了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保持一种健康的平衡，必须制止农业衰退。可以增进农业工业繁荣的主要方法有四：

(a) 增加需要 我们倡议将目前在福利门诊部和学校中提供廉价牛奶的范围扩大；有系统地供给小学生以补充膳食——参看下面的“社会正义”。

(b) 分配改革 农场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差额看来正在增大而不是缩小，同时经纪人商行和零售商增加了他们的利润和股息，在此期间，那些向他们出售产品的人遭受着严重的亏损。我们相信食物分配工业应该在做为扩大公用事业原则的那些工业的名单上名列前茅，即使不是为了实行公共所有制或公共经营。

(c) 增加效率 大部分农场需要修理与改进，但由于筹措资金困难而被拖延了下来。由于种种原因地主们已不能完成他们提供必须资本的经济任务。在土地私人所有制的结构中，这种事态是否能够得到改善，那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扩大各种形式的土地公共所有制已是迫切需要。

(d) 由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这有四种主要方法：限额、关税、征集和直接津贴。限额是最好的方法，用以防止进口突然增加以致可能摧毁国内市场并使国内生产者破产。关税由于征收食物税带来的极大不利而蒙受损失，采

用关税唯一的理由是在紧急情况下用来做为限额的一种替换物。征集是关税和津贴的一种混合物,如果是按照征集小麦的方法实施的话,那它就不列入预算项目,因此很少要直接接受议会检查。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是直接津贴。它的经费通过总的赋税体系可以由最有力量承担的人们来负担,它要受到纳税人选举产生的代表的经常检查,这项经费未必会被过低估计。

土地授与 为了使农业劳动者有自己的土地,国家应当帮助他们获得并积存土地,而且应当借给他们必要的流动资本,进行一般的监督。用提供土地与资本进行援助的办法,通过挑选与训练熟练的管理工头,国家也能援助建立“工厂化农场”型的合作村落,在这种“工厂化农场”中个体劳动者的地位更象挣工资的雇工,他们与家庭一起住在密集的村落中。对于城市失业者来说,这种形式的土地授与有相当大的优越性。对于萧条地区的失业者可以建立“自耕自给农场”,但由于它们当中大部分永远成不了赚钱的企业,国家应当支付一笔津贴,其数额大致与这些人已经接受的失业援助相等,这些钱要花在自耕自给农场需要而又不能自行种植的东西上面。总而言之,这类殖民地应当只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生产食物,因为期望现存的生产者去对付获得资助的竞争,那是不公平的。

社会正义

任何衷心希望民主政府和公民自由存在下去的人,都必须承认需要对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展开最强有力的进攻,这种不平等仍然把我们的民主分成“两个国家”。

如果取得财富上的平等,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贫困下去,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使社会生产力维持在最大限度上的愿望,必须不能用来做为无限期推迟向平等前进的借口。

劳动组织 集体进行劳资谈判的结构逐渐完备,保证对雇主保持一种正常的压力,使他们对最短工时付给工业可以负担得起的最高工资。

工作时间 只要有合理地减少工时而不会导致必须降低工资或者提高价格的前景,正确的政策应该是减少工时。

社会事业 我们相信英国有充分的权利为其社会事业感到自豪。然而,还有改进与提高的余地。我们认为在社会事业的四个方面立即有所前进,是可能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1) 失业问题 我们建议国家考虑能否负责维持所有那些依靠保险费或救济金生活的失业者的家庭负担,我们还建议保险救济金额应该稍微高

些,即使适用于一个短时期内也好。关于收入调查,应限于最亲近的亲属,而不是在一起生活的所有亲戚。

(2) 老年问题 在今后几年之内增加那些完全依靠养老金人们的养老金,应该是能够办到的。老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正在增加。我们现在就应当着手建立一种全国范围的老年退休津贴制度。每个工人应按其工资收入缴费,以便能够领取同其向来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养老金。

(3) 教育问题 自从教育部极力主张将强迫教育的年龄延长到十五岁的那个报告提出以来,八年多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这种延长应当迅即付诸实施。

(4) 营养问题 既应说服穷人去买也应使穷人有能力去买那种好的食物。应当组织一次全国性的教育宣传运动;国家应当为儿童、孕妇和哺乳的母亲安排供给价廉物美的食品。 634

赋税与公平 英国的税制十分不能令人满意。十年前,每年收入一百英镑的在直接和间接纳税中付出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一点九,这比每年收入为一千英镑的付出百分之十一要多。现在形势更糟,由于随着货币收入的下降,直接税收入减少,但是从更严重地压在穷人身上的间接税中得到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贸易税的结果。另外,地方税对于人口众多的家庭是一个特别的负担,在最贫穷的地区地方税最高。国家开支也未能使这种形势得到改善——在最近二十年,挣工资的阶级未能从改变预算中得到纯净增益。粗略估计一下,比较富裕的那些阶级缴纳了大约和战争贷款所得的利息这部分额外收入一样多的捐税,比较贫穷的那些阶级则负担了扩大社会事业所需要的支出。

我们在这本书里建议进一步扩大社会事业。如果以进一步对一般消费征税来资助那些社会事业的话,那么我们追求的目的就会遭到失败。如果要增加收入,我们建议采用提高地价税的办法;采用对不劳而得的收入征收较高的税的办法(对劳动收入和不劳而得的收入征收的所得税最大差额,不管怎样大,目前是六十七镑十先令);采用征收较高的遗产税的办法,这种遗产税附有分期付款的规定,以防止不那样做的话,如家族商业或土地财产,就将破产。

签名者

拉塞尔斯·艾伯克龙比教授

伊什贝尔,阿伯丁和特梅尔的女侯爵

弗朗西斯·艾克兰爵士, 议员

霍勒斯·G. 亚历山大

S. 亚历山大功勋教授

*†赫特伍德的艾伦勋爵

阿穆尔里勋爵

• 诺曼·安吉尔爵士

*†W. 阿诺德-福斯特

• 科贝特·阿什比夫人

玛格丽特·艾什顿小姐

西里尔·阿斯奎斯

J. H. 巴德利(比德尔斯学校校长)

杰拉尔德·贝利

欧内斯特·巴克教授

G. N. 巴恩斯

哈里森·巴罗

卡农·F. R. 巴里

杰拉尔德·巴里

• 弗农·巴特利特

罗伯特·伯奈斯, 议员

劳伦斯·比尼恩

诺曼·伯基特, 王室律师顾问

伯明翰主教, 皇家学会会员

635 巴兹尔·布莱克特爵士

C. W. 鲍尔曼

R. A. 布雷

• 亨利·布林顿

• 约翰·布朗利(机车司机和司炉联合会总书记, 职工大会前主席)

A. 巴勒特·布朗(牛津拉斯金学院院长)

蒙塔古·伯顿爵士

伊利莎白·凯特伯里夫人

• 劳伦斯·J. 凯德伯里

A. J. 卡莱尔牧师

西尔马·卡扎勒特小姐, 议员
切尔伍德的塞西尔子爵⁽¹⁾
凯思琳·D. 考特尼小姐
瓦伦丁·克里托尔爵士
* 杰弗里·克劳瑟
W. B. 柯里(达廷顿·霍尔学校校长)
莱昂内尔·柯蒂斯⁽³⁾
R. C. 戴维森
温德姆·迪兹爵士
R. D. 登曼, 议员
迪金森勋爵
卡农·F. 刘易斯·唐纳森
* A. E. 道格拉斯-史密斯
赫伯特·邓尼科牧师
杰弗里·埃利斯爵士, 议员⁽²⁾
埃尔顿勋爵
* R. C. K. 恩索尔
C. F. 恩特威斯尔少校, 议员
圣约翰·欧文
H. A. L. 费希尔(牛津新学院院长)
H. A. L. 费希尔夫人
霍勒斯·弗莱明
* 艾萨克·富特, 议员
A. G. 加德纳
马克斯韦尔·加尼特⁽¹⁾
艾尔弗雷德·E. 加维博士
G. P. 古奇博士
F. M. 格雷夫斯小姐, 议员
L. H. 格林上尉
理查德·格雷戈里爵士, 皇家协会会员
* 林达·格里尔小姐(牛津大学玛格丽特夫人学院院长)
W. A. 格里尔森上校

- 乔纳森·格里芬
- 巴巴拉·格威尔小姐(牛津大学圣休学院院长)
- 格雷斯·哈多小姐(牛津霍姆公费生院院长)
- 亨利·哈多爵士
- (丹尼尔)霍尔夫人
- J. L. 哈蒙德
- H. 威尔逊·哈里斯
- 约翰·W. 哈维教授
- T. 埃登蒙·哈维
- 杰拉尔德·赫德
- 伦纳德·希尔爵士
- J. W. 希尔斯勋爵, 议员
- A. L. 霍布豪斯
- J. A. 霍布森
- 托马斯·霍兰爵士
- 劳伦斯·豪斯曼
- 彭里思的霍华德勋爵
- 伊娃·哈巴克夫人(莫利学院院长)
- 卡农·F. W. 哈钦森
- 朱利安·S. 赫克斯利教授
- L. P. 杰克斯博士
- C. E. M. 乔德
- 斯蒂芬·金-霍尔海军中校
- 戴维·C. 拉姆(救世军委员)
- 沃尔特·莱顿爵士
- J. 斯科特·利杰特博士
- A. D. 林赛(巴利奥尔学院院长)
- 诺埃尔·克尔·林赛, 议员
- 636 奥利弗·洛奇爵士, 皇家学会会员
- 戴维·洛
- 伊迪丝·利特尔顿夫人
- 利顿的伯爵(1)

德斯蒙德·麦卡锡
*†哈罗德·麦克米伦, 议员
S. P. B. 梅斯
J. J. 马伦
杰弗里·勒·M. 曼德, 议员
T. B. 马丁, 议员
A. A. 米尔恩
• 休·莫尔森, 议员
莉莉·蒙塔古
哈罗德·J. 莫兰
J. H. 米尔黑德教授
• 菲利普·芒福德上尉
• 吉尔伯特·默里教授
• 玛丽·默里夫人
查尔斯·S. 迈尔斯, 皇家学会会员
沃尔特·内皮尔爵士
亨利·W. 内文森
珀西·纳恩爵士
T. J. 奥康纳, 议员②
C. S. 奥温(牛津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乔治·佩维里特
E. 皮尔顿—特伯维尔小姐
• 阿瑟·皮尤爵士(钢铁业联合会总书记, 职工大会前主席)
• 埃利诺·拉斯伯恩小姐, 议员
卡农·C. E. 雷文(剑桥大学钦定神学讲座教授)
• 朗达女子爵
莱顿·理查兹牧师
卡农·盖伊·罗杰斯
阿诺德·S. 朗特里
• B. 西博姆·朗特里
拉瑟福德勋爵, 勋章获得者, 皇家学会会员
*†阿瑟·索尔特爵士

西格弗里德·萨松
卡农·E.G.萨维尔
W.B.塞尔比博士
诺曼·肯普·史密斯教授
诺埃尔·史密斯
索思沃克主教
威克姆·斯蒂德
卡农·蒂辛顿·塔特洛
爱德华·汤普森
西比尔·桑代克夫人
R.C.特里维廉
雷蒙德·昂温爵士
艾尔默·瓦兰斯
安格斯·沃森
H.G.韦尔斯
• H.格雷厄姆·怀特, 议员
M.温特林厄姆夫人
H.M.沃德豪斯小姐(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女院长)
H.G.伍德
伊夫林·伦奇爵士
约克大主教
• 阿伦·扬

注: 上述签名中凡标有*号者参加过一次或多次发起本书和通过本书的会议, 或者在征集签名人的信上签过名。标有†号者系起草委员会的成员。

- ① 只同意本书论述国际关系的那部分。对于其他建议不愿发表任何意见。
- ② 不同意第五章中的建议(“银行与财政”)。
- ③ 仅同意第一部分。

四、《和平的代价》摘要

(1938年发表)

现任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在1935年的竞选中声明:

“保持国联是我们政策的主旨，因为那个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建立巩固的和平，而唯有国联能够通过其成员的集体行动给我们带来和平。因此，我们已明确表示，一方面我们离开其它成员将不采取行动，同时我们打算和其它成员一起根据盟约共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使妄图侵略的人们清楚，违犯庄严承担的保证而去进攻另一个国家是不合算的。”

自此之后，意大利人征服了阿比西尼亚；日本入侵中国。德国通告废除洛迦诺条约，重新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1936年3月），吞并奥地利（1938年3月），同时做为侵略威胁的结果，攫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领土（1938年9月）。事情也很明显，在最近两年期间，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违反不干涉协定，向西班牙佛朗哥将军的军队提供了人员、装备、轰炸机以及其它战争物资。

国际联盟未能制止这些违反条约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它的权力和威望由于不少成员国退出组织而受到削弱。

1937年5月28日，张伯伦先生出任首相。1938年2月21日安东尼·艾登先生因与张伯伦先生在英国外交政策路线上意见有分歧而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克兰伯恩勋爵也辞去了外交次官的职务。从那以后，指导外交政策的责任主要落到了张伯伦先生的手中。继慕尼黑协定宣布之后，达夫·库珀先生辞去了内阁职务，议会中的形势则是二十位支持政府者对于一项赞成批准政府活动的动议在投票时弃权。 638

最近危机中的那些事件必须根据这个政治历史背景加以考虑。舆论的分歧并不仅由于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涉及到外交政策的整个路线和概念。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不是地区性的；它是一个对世界和平和英帝国安全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提出了一些论证，为英国政府对局势的处理进行辩护。那种处理根据这样的设想，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调整一个普通的少数民族的问题。对政府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始终指出，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真是一个少数民族问题，那么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于9月5日提出一项计划时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按照朗西曼勋爵（特别调停人）的看法，那项计划几乎包含了苏台德的德国人所提出的全部要求。这个解决方案未被接受——甚至从未讨论过——这一事实证明了那不是—一个少数民族问题，它却证明苏台德德国人的不满情绪只是被德国政府利用了作为借口，来征服领土和取得经济的和军事的目的，这将使他们称霸欧洲。事实上他们达到了这些目的。

张伯伦先生和政府都同意，鉴于德国经济与军事力量新的增长，我们必须建立我们的武装力量 and 我们的防卫组织，比以前所想到的速度要更快，兵力要更强大。我们正在武装起来与之对抗的那个威胁，只能设想是来自德国以及与之联合的那几个强国，而正是这个英国的潜在敌人通过“和平”的条款格外强大了。我们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短暂期间的武装休战，未来的远景是战争，而且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

我们有两件东西要加以保卫——各种无形的东西例如和平、自由、民主以及文化机会；再就是我们的经济地位，没有这种地位，这些小岛上的众多人口将无法维持生活。我们将迫于经济需要——如果说别无更高尚的动机的话——去为我们在世界上的正当地位而战斗，只要这种地位受到威胁。

和平的经济后果

(a)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线的划定丝毫没有联系经济去考虑。慕尼黑协定表明对于纳粹哲学种族主义原则的彻底投降。

639 “新边界线使捷克斯洛伐克原先制定的工业方案受到严重损害。”^①

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活动的平衡在工业生产以及粮食和林业生产间，稳定地保持着。根据 1930 年的统计，两部分就业人口几乎相等：

| | |
|---------------|-----------|
| 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的人数 | 5,101,937 |
| 从事工业的人数 | 5,146,937 |

要详细探究给捷克斯洛伐克造成的经济困难，那将占用太多的篇幅，但 10 月 8 日《经济学家》阐述的如下估计把捷克经济那种剧烈而带毁灭性的紊乱情况的印象表达出来了：

“它的许多最好的工业将丢给德国和波兰。这些损失的程度从下列数字中能够估计出来，这些数字是以 1930 年的官方统计为根据的：

| 德国和波兰地区的工人 | 总的比例(百分比) | |
|------------|-----------|------|
| 矿业等 | 58,240 | 48.1 |
| 玻璃 | 39,226 | 61.8 |
| 金属 | 93,783 | 24.0 |
| 化学产品 | 14,373 | 34.6 |
| 纺织品 | 190,660 | 52.1 |

^① 《泰晤士报》社论，1938 年 10 月 14 日。

| | | |
|------|---------|------|
| 造纸 | 17,273 | 41.8 |
| 木制品 | 43,058 | 23.4 |
| 乐器 | 5,992 | 79.0 |
| 玩具 | 1,911 | 68.1 |
| 食品 | 62,103 | 25.4 |
| 衣服和鞋 | 70,943 | 24.2 |
| 其他工业 | 164,959 | 27.6 |
| 全部工业 | 762,521 | 33.3 |

这些数字显示出在这些地区不同的工业中的工人数目以及他们在全共和国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必须强调指出，要割让的地区几乎肯定比这儿包括的那些地区还大，因此比例数是最低的。

“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工业的国家来说，这些损失是十分惊人的。”

由于领土的转让，很大一部分工业人口和他们在其中劳动的工业部门，640都被割裂去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中央农业平原与工业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将不能继续保持。即使撇开当时货物交换必须越过新国界线的困难这一事实不论，还有德国国家控制的经济几乎肯定将把贸易方向搞乱这个事实。

国界线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几个经济区域切开了。波希米亚北部褐煤区域不仅是位于那个地区的工业的一个原料基地，而且向布拉格以东的工业区提供煤炭。

在那些转让地区内生产的半成品货物，以前都是由内地工业加工完成的。这些经济生命线都被切断了。

布拉格的电力供应来自转让地区；内地工业当时必须适应国内仍然保留的燃料，而这却又不得不进行长距离运输，结果成本和价格都随之增加，这对于国家的对外贸易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

建在转让地区褐煤基础上的重化学工业必须重新在别处建立，如果内地轻化学工业还要继续存在的话。

印刷以及相关连的工业，包括报刊出版，都从建立在旧捷德边境森林基础上的那些工厂获得纸张。所有利用木材的工业或者必须迁到东部去，或者必须负担很大的运输费用。

在保留下来的纺织工业中，纺纱厂、织布厂以及最后加工厂之间的联系，都被新的边界线破坏了。

人造丝工业与其原料基地(纤维素)也部分地被切断了；在捷克斯洛伐克

东部留下来的装备不敷应用,而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发展。

由于这种经济瓦解的结果,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将不能做为独立国家生存下去,除非基本重建项目迅速得到英法的大量援助。如无外援,捷克斯洛伐克必将成为大德国的一个经济和政治的附庸。

(b) 对于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在原料资源和工厂及其装备等方面所失去的,也就是德国在这几方面所获得的。转让地区富有矿藏和其他经济资源,这对战备具有重大价值。这是很重要的。它也得到了一些新人口,他们是欧洲最熟练的工人。有一种圆滑的说法,认为德国获得的将是一片“萧条地区”。当时在转让给德国的那些地区内,在捷克斯洛伐克“自由”经济的情况下失业百分比很高,那是千真万确的。但这一批新人口现在被补充到“控制”经济里来了,那就不会再有失业。通过极权方法,包括对国民自由的大量剥夺,德国严格控制生产上的所有因素——工资、劳动时间、投资方向——便成为可能了。

整个德国经济从来就是,现在也是为了进行最大限度的备战——既是军事的,也是经济的——而活动的。苏台德的新资源将被纳入那个体制,因此德国的力量相应地增强了。

多瑙河国家 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前,德国已经对多瑙河国家发挥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对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南斯拉夫等国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德国都占主要地位。它的边界扩展越过了苏台德山脉的天然屏障,因而获得了前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占支配地位的区域,这将进一步增强它对那些多瑙河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的影响。那些国家大量的谷物和木材以及石油等资源将日益任其处理。这样一来,做为一个潜在的未来侵略者,它的力量更加增长。关于这一点也值得记取的是,在上次大战中封锁乃是决定因素。得以利用多瑙河诸国的资源,将使德国免受英国海军力量的压力。

(c) 对于英国

被德国攫取的工业包括许多能制造象英国在海外市场上销售的同一种类的货物。在德国对外贸易制度之下,使他们不顾生产成本向外销售,德国有权利用新的煤炭、纺织、瓷器等的供应去破坏英国贸易,使我们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可能出现的局面将和前些时候由于俄国国家出口组织廉价出口俄国木材而产生的情况相似。关于这一点,我们记得加拿大的抱怨。不久我们就会处于那种地位,即英国那些依靠出口煤炭与纺织品的萧条地区将进一

步受到来自苏台德的工业产品的竞争，这些工业为德国唾手可得，不花资金成本，也没有对先前的所有主给以补偿。如果德国认为合适的话，由于它现在控制了新的工业区，它很有力量对我们进行经济战争。 642

和平的政治后果

捷克斯洛伐克依赖它与法国和俄国签订的条约，以及国际联盟所承担的保护成员国边界不受无缘无故侵略的义务来保护自己。说它被欧洲所有其他小国视为一个试验例子，那并不夸张。它受到鼓励，依靠大国的支持，并且在那一基础上制定自己的内外政策。在危机时刻它遭到了大国的抛弃，这对其他国家将是一个信号，告诉他们不要信赖类似的保证。国联体系将进一步瓦解。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谈判中俄国受到故意的冷落之后，它将不愿对法一俄条约再发生什么兴趣，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法国再也不能依赖它与东欧那些国家的条约体系了。它将发现自己实际上在大陆上孤立了，它的软弱将意味着经常诱使德国在政治上进行统治，这种统治将随着反对它的可能的联合的瓦解而威力日增。

* * *

从戈德斯贝格回来以后，张伯伦先生在9月27日的广播中说道：

“如果我确信有什么国家已下定决心用自己的武力进行威吓从而统治世界的话，我感到它必定遭到抵抗。”

我确信这恰恰就是我们通过制定9月19日的法一英建议从而向希特勒的恫吓屈服之前很久所面临的局势。只是在我们把每件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都放弃之后，张伯伦先生才确信是那样的。

法国一英国的计划把整个多瑙河盆地天然的山脉屏障拱手交给了德国侵略者。它放弃了耗资大约一亿英镑建造的捷克边界防线。（顺便说一句，捷克人假定他们的盟国及参加国际联盟的国家会支持他们而出钱修建了这条防线。）希特勒先生的戈德斯贝格建议只是在细节上以及就德国占领的时间表而言有所不同而已。可是，德国全部野蛮的侵略意图那时已公开表露出来了。

希特勒所要的一切我们全都给他了。我们准备在他取得这些东西的日期问题上与之斗争。参加慕尼黑会议的邀请令人感到宽慰而受到欢迎。事实上，慕尼黑会议仅仅是在国际认可之下，做为贯彻戈德斯贝格纲领的执行者来行事，而那个纲领在一星期前曾被认为不可忍受而遭到拒绝，这次竟被 643

视为胜利而受到欢迎。

事情很明显，如果事先几个月，当我们知道危机在发展，我们下定决心(a)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去抵抗侵略，以及(b)边界线将必须重划，那么捷克斯洛伐克肯定会谈判出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这比现在由于徒劳无益地显示抵抗而在最后一刻终于垮台要好些。

未来与重新武装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清楚而明确地决定在世界上是否有什么东西我们将认为值得进行战斗去保卫它。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让我们解除武装，让我们体面而明智地把自己的地位让与更强有力的国家。

但是，如果有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用战斗去保卫的话，那么就让我们来搞清楚，看看它们是些什么：使我们的那些潜在敌人对这些东西有个清楚的了解，并且建立防卫与攻击力量，如果发生战争，这种力量将使我们能够支持住我们的立场。通过清楚、坦率和不会误解的决心这样的方法，我们就很有可能完全避免战争。如果我们犹豫不决，软弱无力，那么什么东西也拯救不了我们。

不要由于英国比较大规模地重新武装而为自己造成安全的错觉。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结果，英国在重新武装期间变得不是更加强大，而是日益软弱了。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已无可挽回地陷进了德国的势力范围。波兰现在很可能将进行调整使自己适应德国的外交政策计划。如果我们的外交政策继续使我们失去朋友，那么我们要认清，英国和法国重新武装永远也补偿不了我们这方面丧失的俄国力量和欧洲小国中立化所造成的损失。除非我们现在准备结束英国外交政策的趋势，重新武装将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外交政策和重新武装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必须给以明确的说明。建立我们防卫体系的第一步应当是尽可能快地重新建立国际联盟内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的联合。门户将对所有申请者开放，但是英国、法国、俄国和国际联盟在欧洲其余的成员国在英帝国各成员国和美国的赞同与支持下，可以开始搞起来。

644 为了拥护这样一种外交政策，人民将甘心情愿作出为建立我们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任何牺牲。但是如果我们半心半意地进行这个工作的话，那么需要做出的牺牲将会更大。如果我们仅仅是增加我们的开支，而不是注意有效

地使用我们的资源的话，其结果将是把劳动力从有用商品生产中转移到武器生产方面来。生活水平将会下降。通过充分利用现在失业者的劳动力以及消除现在在生产与分配中因多余的竞争而发生的浪费，我们就能够增加我们的武器生产，同时也增加消费品生产。在这一点上，我的《中间道路》一书中的那些重建计划的建议，比以前任何时候更适合我们时代的需要。

五、《防卫的经济方面》摘要

645

(1939 年发表)

那些极权国家的主要资源和人力都已经立足于战时而动员起来了。在现代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只是由士兵和战舰等的数目来决定，而且也要由其能把自己的经济资源组织成为生产能力的效率程度来决定。军事力量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如果想要我们的防卫充分，坚不可摧，那么高度的经济效率是极为重要的。我们要拿出事实证明，民主具有产生它赖以生存的效果的意志与精力。

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不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来。因此，为了战争目的而建立经济力量，在各国彼此和平相处的整个期间进行。战争首先在经济战线上开始，而这个预备性战争在今天甚至可以进行到更长的时间，因为一个国家可以强迫一些别的国家成为它的盟国，首先取得经济支配，由于经济扼制的结果，然后再在政治上控制。

在我们时代的情况之下，与经济组织有关的防卫准备工作计有四个主要方面必须予以考虑。它们是：

- (1) 海外贸易以及我们与其他国家总的经济关系。
- (2) 我们经济体系总的生产效率。
- (3) 可贮藏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积累。
- (4) 关于生产某种战争物资的技术问题，生产它的工厂的位置以及后备生产力的组织。

德国在准备

德国是从事战备最积极的国家。用它的活动与成就加以比较，我们可能估计出英国能够做些什么以及需要做些什么。

647

646 德国政治政策不是由于它的经济需要而产生出来的。恰恰相反，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支配着经济秩序。整个生产体系从属于它的领袖们的军事野心和权力欲望。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鲁道夫·布林克曼承认：

“在商品购买领域里，企业家的安排自由受到了监督部门以及其他规章的束缚；

“劳动力的使用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工资最高限度和禁止价格增长强行规定了一个物价水平，这在一种自由经济中是行不通的；

“本想用于消费的货币被迫转移到资本投资中去，同时企业家感到在国家干预下被迫进行资本投资，如果让他自行其是的话，他将永远也不会那样干的；

“货币资本受到‘过剩红利强迫投资法令’的削弱，它又由于禁止私人向资本市场投资，被迫以低利率将资本提供给它很少感兴趣的地方。”^①

纳粹党上台时德国失业者有五百万人。到1938年3月时，失业人数只有五十万了。生产指数以1929年为100，1933年下降到69.2，而在1939年1月则上升到146.0。国民收入从1932年的四十五亿二千万马克上升到1938年的七百六十亿马克。1937年至1938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德国国民收入经过国家之手重新分配。

国民生产的全面规划当然是依靠对外贸易的完全控制。德国使用的方法不是为了正常销售竞争的扩大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取得对某些国家的经济控制，以达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征服这些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经济结构由于我们的对外贸易失败而遭削弱。通过使用出口津贴，通过对进口货物索取高价，结合必须耗费在德国指定的德国货物上的不能兑换外汇的马克，德国在对巴尔干的贸易中的份额大为增加。对于东南欧资源的充分开发，将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全部供应德国所需要的粮食、木材、石油、烟草、铜矿、兽皮与皮革、牲畜、肉类和油脂，以及它所需要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棉花与羊毛。德国在其他地区的经济侵略没有这样成功，但是它在某些南美市场上所占的比例增加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因而也是防卫力量的稳定）所包含的危险是令人吃惊的。

德国正在取得的控制地位是以牺牲它自己的人民为代价的，因为这意味着提高它自己人民的生活费用，可是事实上出口货物价格低于成本。

^① 《德国商业调查学会每周报告》，1938年11月2日。

然而，它所做出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报酬。没有一个国家曾得到更多的东西——在领土、人口、威望以及在经济和政治影响等方面——而不经战争手段的。1935年萨尔重归德国；1936年莱茵兰被重新占领。1938年奥地利被吞并，从而使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国家（苏联除外）中在面积上和人口上都成为最大的国家。六个月之后，由于吞并了苏台德区，德国不仅进一步增加了面积和人口，而且它也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经济资产，并且把它的政治边界扩大到越过了山脉屏障，大大改进了它的战略地位。独裁者确实能够宣称，它已经分得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英国的任务

暂时完全不谈任何战争的威胁，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保卫我们对外贸易的利益。另外，我们还必须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普遍取得更大的力量与效率，如果我们准备可能发生战争的话。

(1) 海外贸易和我们与其他国家总的经济关系

由于对出口货物采取补贴和巧妙使用“不能兑换外汇的马克”的办法，德国完全可以忽略生产成本或贸易利润。对于英国出口商来说，如果总是象单个人或单个公司一样去行动的话，那显然不可能对抗一种国家组织的竞争，这种竞争根本不顾成本与价格。出口贷款法案在政治情况需要的地方，为普通出口贷款提供了两千五百万英镑的追加额和一千万英镑的特别援助，这是一个受人欢迎的步骤。但是德国不仅补贴自己的对外贸易，它也象做为买主一样地正在动员其力量加强它的货物的销售。我们也应这样做。少了一个全国性的进出口交易组织将是不妥当的。我们需要一个对外贸易组织，它既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能在公平分配世界贸易的基础上讲和。

我的建议已在1938年5月出版的《中间道路》一书中详细叙及。简而言之，我们要求：

(a) 将出口商组织在合作销售组织中；

(b) 进口商组织防止竞争性购买，按照符合国家利益的次序与数量分配购买进口货物可能得到的资金；

(c) 建立单一的有权威的对外贸易组织，由进口税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汇兑平均基金的专家、财政部门（在对外贷款上作顾问）和进出口商组织组成。这个机构将把我们海外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协调在总的国家利益之中，从战略上考虑问题。

(2) 生产效率

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最后还是依赖我们能以最小限度的人力生产最大限度的货物。所有工业效率都是以节省劳动力为尺度的。过多的竞争以及失业都对目前英国劳动力的浪费起着作用。

(a) 工业改组 工业重建原则已被体现在提议的立法之中,但几乎每一遇到这种情况,一种眼光短浅的反对意见却强迫撤回那个措施。根据工业改组(授权)法案,应当给工业以机会,将它自己的机构安置就绪,如果它不能这样做的话,政府应当有勇气进行干预,要排除对实现国防和经济安全所必不可少的计划的每一障碍。

(b) 失业者 根据国家防御准备计划,要么我们使用全部可用的劳动力,并且通过增加生产,维持生活水平;要么我们将我们的部分劳动力闲置起来,并且通过把其他工人转到武器生产上去,听任消费品生产下降,生活水平降低。

使用闲置工人最容易和最有利的办法是在他们自己的工业之中。出口工业中的失业最为严重,而上述对外贸的建议能够使之缓和。在这些重要问题上造船工业提供了一个例子。一支强大的商船队对于民族和帝国的防卫是生死攸关的,然而,“在1914年我们有世界贸易吨位的百分之四十一·六,今天约为百分之二十六·四……在人员方面,我们在海上的人数比1914年少六万人……二十年前,我们在造船工业中拥有三十一万二千人,今天是十七万一千九百二十人……回溯到不太远的1929年,我们那时建造的船只曾占世界吨位的百分之五十一——有一个时期占百分之八十;而今天则占百分之三十二。”^①

649 引证的这些事实,表明非常需要协调政策,这样对英国海运与造船业进行援助的问题必须与我们为维持这些行业中失业工人现在所花费的金钱总额,也与我们防御政策中至关重要的需要,联系起来估计。

(c) 扩大 全国经济理事会应该毫不迟延地建立起来,以便组织对经济发展的管理,其中包括对资本投资与劳动资源的管理。由于对我们那些闲着的、使用不充分和使用不当的人们的合理利用,积极性随之增加,因此重新武装的全部费用能轻而易举地承担起来。

(3) 日用必需品的积累

正如凯恩斯先生在1938年8月对英国协会经济部的谈话中评论的那

^① 国会议员查尔斯·M. 巴里爵士给《泰晤士报》的信,1938年12月14日。

样，在战时日用必需品的储备“比金矿还要好”。他提倡积累五亿英镑的日用必需品。政府应为英帝国中一切在特定原料方面有剩余的生产者免费或付微不足道的费用在国内提供贮存。政府不要成为物主，而物主可以任何方式和在任何时候处理货物，但是假如国际前景显得特别危险时，政府可以立刻将货物买下来。这个方案也将是一种防止日用品价格波动的手段。国内生产的生铁也可以储备起来，这是为了军火生产，也是为了避免商业周期性波动。每年费用大约是两千万英镑。

(4) 技术问题

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供应部。“如果我们要在必要的规模上制造武器……那么将必须建立优先权。如果它们能够自动地建立起来，那么一个单一的部便能比四个部更好地完成任务；如果它们需要强制的话，那么它必然会从供应部或者从别处立刻得到……[还有]组织大规模生产的任务，[那就需要]与和平时期有效的那些部不同的一种部。”^①

建立这样一个部的另一个原因是，应当制定有关军火工业利润的明确政策。被要求开设新厂的制造商们，如果对于新厂将被利用的范围心中无数，他们不得不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把投资收回。但是问题不能简化成一个国家所有制的问题，因为一批范围广阔的康采恩其装备应比较完善，能够在需要时转入武器生产。

650

一项令人满意的政策将提供种种方法，包括国家工厂；在私人所有制工厂中建立国家所有的车间，在那种情况下将不会产生贬值率的问题；在通常与和平时期生产有关的工厂中建立私人所有车间，在那种情况下，一个供应部就应当能够根据对所发出的定单的保证来安排价格。

任何人只要没有被危险的乐观主义所迷惑，他便能够看出迟早一定要设立一个供应部。爱国主义和一般的谨慎态度都要求现在就应当把这个部建立起来。

自 由

有许多人害怕自由与民主可能受到用来保卫它们的那些措施的危害。保护措施存在于我们外交政策的决心与方向之中。如果我们与自由、进步、文化等力量结成联盟的话，那么危险就不大。如果我们仅仅受保卫我们物质财产的愿望所支配，那我们的防卫组织便可能堕落成暴政。

^① 《经济学家》，1938年11月5日。

姑且不论我们目前特殊需要的紧迫情况，经济重建对于我们的人民大众从贫穷与经济不安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必不可少的。除非我们的基点在于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源，否则我们人民的自由与自主便不能得到保护。

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

二十年来我们一直企图在国联通过政治协商取得世界和平。国联失败了，因为政治协议不能建立在经济对抗的基础上面。

给极权国家政治与领土的“绥靖”再多，也不能为它们自己的问题提供一个解决办法或为未来的世界和平提供一个基础。靠软弱让步，那除了毁灭我们自己以外，将一无所得。通过坚决抵抗，我们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保持民主国家的经济完整与文化价值，但是我们必须继续承受军事准备上的严峻考验。

当我们准备抵抗的时候，我们应当同时制定一项国际经济合作政策。先前这样做的各种尝试都失败了，因为没有有一个经济机构，通过它能使经济合作成为切实可行，而指导国际经济事务也不是政府权限以内的事。但是，现在651 我们正在接近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时期，对外贸易、对外贷款、信贷安排以及维持商船航运，在每个国家里都将组织在中央的控制之下。确实，这些改变是在国家或帝国政策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引起的。但是一旦每个国家由此而克服了它自己国民间的利害冲突，国际合作的道路便铺平了，这代替了各国间的经济对抗，而经济对抗将导致战争。如果经济合作的原则能一旦确立，经常监督与检查当前问题的国际专家组织建立起来，各国便将踏上唯一可以导致和平与繁荣的道路。

我们迟早将被迫建立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组织，并且随之建立一个为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本与劳力资源而执行合理路线的经济组织。这样做，通过寻求逐步发展一种可以根除引起战争的经济合作方法，我们将使我们自己能够推行一项真正的“绥靖”政策。

索引

- Abnormal Importations Act (1931), 非常进口法令(1931), 270, 307
- Abyssinian Crisis, 阿比西尼亚危机, 406, 411—24, 428—30, 434—5, 436—457, 523
- Adams, Vyvyan, 亚当斯, 维维安, 427, 525, 538
- Agriculture, steps to aid, 帮助农业的步骤, 308
- Albania, Italian invasion of, 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 522, 592, 596
- Alexander, A.V., 亚历山大, A.V., 432, 587
- Alexander, Professor S., 亚历山大, S. 教授, 375
- Alexander I, King of Yugoslavia, 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第一, 399—400
- Alexandra, Queen, 亚历山德拉皇后, 117
- Allen, Clifford (Lord Allen of Hurtwood), 艾伦, 克利福德(赫特伍德的艾伦勋爵), 362, 374, 376—7, 399, 430—1, 485—9, 502
- America, see United States, 美国, 参看 United States.
- Amery, Julian, 艾默里, 朱利安, 512
- Amery, Leo, 艾默里, 利奥, 152, 230, 273, 433, 434, 435, 502, 508, 512, 549, 568, 585, 593, 606
-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1935), 英德海军协定(1935), 404, 411, 429, 596
- Anglo-Italian Agreement (1938), 英意协定(1938), 588
- Anschluss, 德奥合并, 403, 417, 522, 540—542
- Appeasement, 绥靖, 196, 376, 437, 471, 489, 530 页以下, 566, 568, 578, 587, 588, 591
- “Arms and the Covenant” policy, “武器与盟约”政策, 478, 524
- Arnold-Forster, Will, 阿诺德-福斯特, 威尔, 374
- Arran, Island of, 阿伦岛, 44, 48
- Artists' Rifles, 艺术家步枪队, 61
- Aske, Robert, 阿斯克, 罗伯特, 427
- Asquith, H. H. (Earl of Oxford and Asquith), 阿斯奎斯, H. H. (牛津和阿斯奎斯伯爵), 60; resignation of (1916), 辞职(1916), 96, 121; loses seat (1918), 丧失席位(1918), 122; returned in 1922 election, 1922年选举当选, 131; in 1923—24 Parliament, 在1923—24年议会时期, 147, 148, 150—1; loses seat in Commons for last time, 最后一次在下院丧失席位, 156; final break with Lloyd George, 与劳合·乔治最后破裂, 167; on Churchill, 论丘吉尔, 176—7
- Asquith, Raymond, 阿斯奎斯, 雷蒙德, 95
- Astor, Colonel John, 阿斯特, 约翰上校, 130—131
- Astor, Lady Nancy, 阿斯特, 南希夫人, 195—6, 225, 232, 276
- Atholl, Duchess of, 阿索尔女公爵, 475
- Attlee, Clement (Earl Attlee), 艾德礼, 克莱门特(艾德礼伯爵), 311, 401, 402, 423, 433, 442, 450, 456, 594, 605
- Austin, Sir Herbert, 奥斯汀, 赫伯特爵士, 371
- Australia, 澳大利亚, 523
- Austria, 奥地利, 387—8, 403, 418, 458, 522, 540—2

Bailey, Captain, 贝利上尉, 91
Bailey, Cyril, 贝利, 西里尔, 45
Baldwin, Stanley (Earl Baldwin), 鲍德温, 斯坦利(鲍德温伯爵), as President of Board of Trade, 任贸易大臣, 127; opposes Lloyd George at Carlton Club meeting, 在保守党本部大会上反对劳合·乔治, 127—8; and 'Safety First' Slogan, “安全第一”的口号, 131, 244—245; as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任财政大臣, 133; agrees American debt settlement, 同意美国债务解决办法, 133—4; and protection, 保护贸易制度, 135, 137—8, 146, 152, 170, 172, 203, 230; in 1923—4 Parliament, 在1923—1924年议会时期, 147—148, 174, 177; dislike of electioneering, 厌恶竞选活动, 154; dislike of Lloyd George, 厌恶劳合·乔治, 167, 171, 253, 316, 514; popularity with Conservatives, 在保守党人中的声望, 169—171; personality, 人格, 170—2, 516; as broadcaster, 充当广播员, 170—171; respected in Europe, 在欧洲受到欢迎, 198; and General Strike, 他与总罢工, 214—215, 216, 219—220, 236; after General Strike, 总罢工以后, 220—1, 229; on Macquisten Bill, 关于麦奎斯顿议案, 226—7; his moderation, 他的节制, 249—50; obtains vote of confidence, 取得信任票, 252; fight to retain leadership, 为保持领导地位而斗争, 253—5; helps MacDonalld over India, 在印度问题上帮助麦克唐纳, 258; and prelude to National Government, 他与举国一致内阁的开端, 273, 281; 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任枢密大臣, 271; as leader of the House, 当议会领袖, 310, 312; and Lansbury, 与兰斯伯里的关系, 310; and 'New Deal' project, 他与“新政”计划, 315

—316; on India, 关于印度, 318; on Reconstruction, 关于《重建》, 370; on German Air Force figures, 关于德国空军数字, 408—9; becomes Prime Minister (1935), 当上首相 (1935), 412; and appointment of Hoare to Foreign Office, 委任霍尔为外交大臣, 413; and Abyssinian Crisis, 他与阿比西尼亚危机, 416, 434, 436—438, 441—5, 447, 450—3, 457—8; in 1935 election, 在1935年选举中, 432; on rearmament, 关于重整军备, 433, 453; attacked by Lloyd George, 受到劳合·乔治攻击, 457; and Rhineland reoccupation, 他与重新占领莱茵兰问题, 467; appoints Minister for Co-ordination of Defence, 委任国防调协大臣, 469—470; illness (1936), 生病 (1936年), 472; and Abdication, 他与逊位危机, 478—480; resignation, 辞职, 513; summary of work as Prime Minister, 首相任内工作概述, 513—18; possible meeting with Hitler, 可能与希特勒会见, 547; makes appeal for refugees, 为难民呼吁, 587
Balfour, Arthur J. (Earl Balfour), 鲍尔弗, 阿瑟 J. (鲍尔弗伯爵), 35, 126, 127, 147, 149, 238
Balfour Formula, 鲍尔弗方案, 112
Balfour Note (1922), 鲍尔弗照会 (1922), 123
Ball, Sir Joseph, 鲍尔, 约瑟夫爵士, 536
Balogh, T., 巴拉夫, T., 589
Banker, The, 《银行家》, 237
Barbusse, Henri, 巴比塞, 亨利, 347—8
Barnes, George, 巴恩斯, 乔治, 525
Barthou, Louis, 巴尔图, 路易, 397, 399, 400
Bartlett, Vernon, 巴特利特, 弗农, 586
Beale, Sir John, 比尔, 约翰爵士, 371
Beaverbrook, Lord, 比弗布鲁克勋爵, 127, 130, 245, 248, 254, 256; and Empire Free Trade campaign, 他与帝国

- 自由贸易运动, 252—3, 255, 308
- Beckett, Rupert, 贝克斯特, 鲁珀特, 367
- Belles, Dr. J. Tarleton, 贝尔斯, J. 塔
尔顿大夫, 54
- Belloc, Hilaire, 贝洛克, 希莱尔, 61
- Beneš, Eduard, 贝奈斯, 爱德华, 202,
545, 551, 552, 554
- Bennett, Sir William, 贝内特, 威廉爵
士, 56—57, 95
- Bentinck, Lord Henry, 本廷克, 亨利勋
爵, 225, 247
- Berchtesgaden, Chamberlain's visit to,
张伯伦访问贝希特斯加登, 556—7,
564, 577
- Bernays, Robert, 贝奈斯, 罗伯特, 322
- Betterton, Harry, 贝特敦, 哈里, 319
- Betting tax, 赌博税, 229
- Bevan, Aneurin, 比万, 安奈林, 261,
263
- Beveridge, Sir William, 贝弗里奇, 威廉
爵士, 213
- Bevin, Ernest, 贝文, 欧内斯特, 423
- Bingham, Robert, 宾厄姆, 罗伯特, 532
- Birch Grove House, 桦树林宅邸, 187,
189, 484, 558, 604—5
- Birkenhead, Frederick Smith, Earl of,
伯肯黑德, 弗雷德里克·史密斯伯爵,
127; and Irish Treaty, 爱尔兰条约,
123; and Chanak affair, 查纳克事
件, 126; and Lloyd George, 与劳
合·乔治的关系, 129, 149, 167; at
India Office, 任印度事务大臣, 174;
personality, 性格, 175; in House of
Lords, 在上院, 177; and defence
policy, 与国防政策, 201; and Gen-
eral Strike, 与总罢工, 214, 216
- Blanesburgh Report, 布兰尼斯伯格报
告, 231—232
- Blum, Léon, 勃鲁姆, 莱昂, 471—472
- Boar War, 布尔战争, 35
- Bondfield, Margaret, 邦德菲尔德, 玛格
丽特, 231—2, 258, 260
- Bonham Carter, Lady Violet (Lady
Asquith), 博纳姆·卡特, 维奥莱特女
士(阿斯奎斯夫人), 585
- Bonnet, Georges, 博内, 乔治, 546,
560, 606
- Boothby, Robert, 布思比, 罗伯特, 173,
178, 204, 240, 247, 267, 548
- Borden, Sir Robert, 博登, 罗伯特爵士,
111, 113—115
- Bracken, Brendan, 布雷肯, 布伦丹, 538,
548, 569, 573, 586
- Briand Aristide, 白里安, 阿里斯蒂德,
125, 202, 203
- Bridgeman, William, 布里奇曼, 威廉,
253, 254
- Briton, Henry, 布林顿, 亨利, 486
- Briscoe, Richard, 布里斯科, 理查德,
538
- 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 see Yel-
low Book, 《英国工业的未来》, 参看黄
皮书。
- British East Africa, see Kenya, 英属
东非洲, 参看肯尼亚。
- British Gazette, 《英国公报》, 219
- Broido, M., 勃罗伊多, M., 345
- Bromley, John, 布朗利, 约翰, 375
- Brook, Sir Norman (Lord Norman-
brook), 布鲁克, 诺曼爵士(诺曼布鲁克
勋爵), 528
- Brooke, Rupert, 布鲁克, 鲁珀特, 95
- Brown, Barratt, 布朗, 巴勒特, 486—7
- Brown, Ernest, 布朗, 欧内斯特, 305,
497
- Brown, W. J., 布朗, W. J., 251
- Brussels Conference (1937), 布鲁塞尔
会议(1937), 530, 532
- Bryce, Lord James, 布赖斯, 詹姆斯勋
爵, 140, 413
- Buchanan, Geordie, 布坎南, 乔迪,
168
- Budgets: 预算: (1925), 205—8, 211;
(1928), 240—2; (1931), 254, 270;
(1933), 306, 368; (1934), 307; (1938),
505

- Burgin, Dr. L., 伯金, L. 博士, 594
- By-elections: 补缺选举:
- Bridgewater (1939), 布里奇沃特 (1939), 586, 587
- Eastbourne (1925), 伊斯特本 (1925), 210
- Fulham East (1933), 东富勒姆 (1933), 394
- Kilmarnock (1933), 基马尔诺克 (1933), 394
- Oxford (1939), 牛津 (1939), 583—5, 587
- Newport (1922), 新港 (1922), 128
- Paddington South (1930), 南帕丁顿 (1930), 253
- St. George's, Westminster (1931), 圣乔治·威斯敏斯特 (1931), 252—4
- Cadogan, Sir Alec, 卡多根, 亚历克爵士, 533
- Cadogan, Sir Edward, 卡多根, 爱德华爵士, 31
- Cadogan Place, 卡多根街, 30—33, 56, 66, 118
- Camp bell case, 坎贝尔事件, 150—1
- Campbell-Bannerman, Sir Henry, 坎贝尔-班纳曼, 亨利爵士, 35
- Canada, 加拿大, 110—16, 523
- Cannes Conference (1922), 戛纳会议 (1922), 125
- Carlton Club meeting (1922), 保守党本部大会 (1922), 127—8
- Cartland, Ronald, 卡特兰, 罗纳德, 498, 538, 549
- Cator, Harry, 卡特, 哈里, 115, 116
- Cavan, Lord, 卡范勋爵, 69, 85
- Cave, Lord, 凯夫勋爵, 134
- Cavendish, Dorothy, see Macmillan, Dorothy, 卡文迪什, 多罗西, 参看麦克米伦, 多罗西。
- Cavendish, Lady Edward, 卡文迪什, 爱德华夫人, 110, 120
- Cecil, Lord Robert (Viscount Cecil of Chelwood), 塞西尔, 罗伯特勋爵 (切尔伍德塞西尔子爵), 104, 140, 413, 437, 486, 553—4, 573, 583
- Chamberlain, Arthur, 张伯伦, 阿瑟, 525
- Chamberlain, Sir Austen 张伯伦, 奥斯汀爵士, 127, 138, 200, 312, 316; in 1923—4 Parliament, 在 1923—1924 年的议会期间, 147—9; predicts Liberal fall, 预言自由党垮台, 155; and Lloyd George, 与劳合·乔治的关系, 167; personality, 个性, 174—5; as Foreign Secretary, 担任外交大臣, 177; and Locarno Pact, 他与罗迦诺公约, 202; and 'no war for ten years' rule, 他与“十年无战争”信条, 380; on collective security, 关于集体安全, 402; and Abyssinian crisis, 阿比西尼亚危机, 439, 446—7, 527
- Chamberlain, Lady Austen, 张伯伦, 奥斯汀夫人, 471, 527
- Chamberlain, Joseph, 张伯伦, 约瑟夫, 136, 138, 173, 252, 266, 287
- Chamberlain, Neville, 张伯伦, 内维尔, 171, 177; appointed to Treasury, 任命为财政大臣, 135;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品质与性格, 172—4, 520—1; letter to author, 与本书作者通信, 173, 224; as an 'appeaser', 作为一个“姑息者”, 196, 376, 465, 525—532, 535—7, 566, 587; and General Strike, 总罢工, 216; on Trade Disputes Act, 关于劳资争执法案, 228—9; and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地方政府改革, 235, 237—42; on the tariff, 关于关税问题, 248, 356; as party chairman, 担任保守党主席, 252—3; dislike of Lloyd George, 憎恶劳合·乔治, 253, 316, 538; and unemployment, 失业问题, 260, 290, 294, 295, 297; warns about 1931 crisis, 警告要发生 1931 年那样的经济危机, 264; as Minister of Health, 担任卫生大臣, 271; and

'Doctor's Mandate', 关于“医生的授权”, 275; as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担任财政大臣, 297, 306—7, 490; marked as Baldwin's successor, 预定为鲍德温的接班人, 312, 313; rejects author's economic plan, 不接受本书作者的经济计划, 368; and defence White Paper (1935), 国防白皮书 (1935), 401; supports Hoare, 支持霍尔, 413; and Peace Ballot, 和平投票, 414; and Abyssinian crisis, 阿比西尼亚危机, 416, 421, 445, 448, 452, 453, 455—6; rearmament plans of, denounced, 重整军备计划受到攻击, 433; Lloyd George attacks, 劳合·乔治对他进行攻击, 457; becomes Prime Minister, 担任首相, 520—2; inauspicious start to regime, 政权开始就不顺利, 523 页以下; relation with Eden, 与艾登的关系, 525—7, 528, 532, 535—9; suspicious of Russia, 对俄国怀疑, 529, 566, 594; rebuffs approach from Roosevelt, 拒绝与罗斯福接近, 532—5; hatred towards, among Members, 议员们憎恶他, 540; on Anschluss, 关于德国吞并奥地利, 541; advises against Russia's proposed Four-Power Conference, 主张反对俄国提议的四强会议, 543; on Czechoslovakia,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 544, 546; sends Runciman Mission, 派遣朗西曼使团, 551; visits Hitler at Berchtesgaden, 到贝希特斯加登访问希特勒, 556—7, 574; visit to Godesberg, 访问戈德斯贝格, 557, 558; prelude to Munich, 慕尼黑的序幕, 559; at Munich, 在慕尼黑会议上, 560—2; triumphant return from Munich, 从慕尼黑胜利归来, 562; at post-Munich debate, 在慕尼黑会议举行以后的辩论中, 568—72; considerations of his policy, 对他的政策的审议, 573—582; retains support of

Conservatives, 保守党人对他保持支援, 586; visit to Rome (1939), 访问罗马 (1939), 589; and Prague crisis, 布拉格危机, 590—1; abandons appeasement, 放弃绥靖政策, 591, 594; against visit to Russia (1939), 反对访问俄国 (1939), 598; and Poland crisis, 波兰危机, 602—3, 605—7; broadcasts declaration of war, 广播宣战, 606—6

Chanak, 查纳克, 126, 128

Chatsworth, 查茨沃思, 182; Christmas at, 在此地渡过圣诞节, 189—194

Cherwell, Lord, 彻韦尔勋爵, 527

Chester Square, 切斯特广场, 118, 134, 187

China, 中国, 380—2, 522

Churchill, Randolph, 丘吉尔, 伦道夫, 129页注解, 200

Churchill, Sir Winston, demobilisation plan of, 丘吉尔, 温斯顿爵士, 复员计划, 108; and Irish Treaty (1921), 爱尔兰条约 (1921), 123; and Chanak affair, 查纳克事件, 126; loses seat (1922), 丧失席位 (1922), 131; elected as “Constitutionalist” (1924), 以“立宪主义者”当选 (1924), 149; and Lloyd George, 与劳合·乔治的关系, 167; versus Snowden, 与斯诺顿相对抗, 168, 203—4; as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担任财政大臣, 174, 199, 200, 204, 230, 317;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1924), 特性与品格 (1924), 175—7; in General Strike and coal dispute, 在总罢工与煤炭争执当中, 219, 222, 244; and rating reform, 征收地方税的改革, 235—242; and free trade, 他与自由贸易, 253, 274, 278; withdraw from Shadow Cabinet (1931), 退出影子内阁 (1931), 255; attacks Naval Conference, 攻击海军会议, 257; and India, 关于印度问题, 312, 317—19; on Foreign Office briefs,

- 论及外交部概要, 314; isolation of during National Government, 在举国一致政府期间的孤立, 318—19; supports author's economic plan, 支持本书作者的经济计划, 368; and Japan, 日本问题, 380; and German rearmament, 德国重整军备, 382, 386, 389, 407—10, 417; attacks Disarmament Conference, 攻击裁军会议, 392; campaigns for rearmament, 重整军备运动, 395, 398, 407—410; misses only chance of meeting Hitler, 失掉会见希特勒的唯一机会, 399; and Abyssinian crisis, 阿比西尼亚危机, 417—419, 422, 435, 437; excluded from 1935 Government, 被排除在1935年政府之外, 432; on Chamberlain as "pack horse", 把张伯伦描绘为“担负国家大事的驮马”, 448; on Rhineland crisis, 关于莱茵兰危机, 462, 465—6; "Arms and Covenant" movement, "武器与盟约"运动, 478—9, 524; and Abdication, 逊位危机, 478—480; and Eden's resignation, 艾登辞职, 538—9; on Anschluss, 关于德奥合并, 542; opposes Government over Czechoslovakia, 反对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法, 548—9, 552, 559; after Munich, 慕尼黑事件以后, 562—3, 567, 568, 571; at Ministry of Supply debate, 在关于成立军需供应部的辩论会上, 586; and Albania crisis, 阿尔巴尼亚危机, 592; demands National Government (1939), 要求成立举国一致政府 (1939), 593; favours Russian alliance, 赞成与俄国结盟, 595, 598—600
- Ciano, Count, 齐亚诺伯爵, 527, 588—9, 590, 592
- Citrine, Sir Walter (Lord Citrine), 西特林, 沃尔特爵士 (西特林勋爵), 479, 557, 587
- Clark, Colin, 克拉克, 科林, 509
- Clarry, R., Independent Conservative candidate, 克拉里, R., 独立保守党候选人, 128
- Class war, dangers of (1924), 阶级战争的危險 (1924), 170
- Clifton-Brown, Colonel D. (Speaker), 克利夫顿-布朗, D. 上校 (议长), 179
- "Clivden Set", "克莱夫登派", 195—6, 463, 547
- Clynes, J. R., 克莱因斯, J. R., 432
- Coal industry, conflict in, 煤炭工业的斗争, 204, 212 页以下, 244; Royal Commission's Report on, 皇家委员会关于煤炭斗争的报告, 213, 216
- Coalition Government (Lloyd George), 联合政府 (劳合·乔治), 121, 127—8, 132
- Collective security, 集体安全, 375, 398, 401—2, 578
- Colonial Development Act (1929), 殖民地发展法案 (1929), 259
- Committee of Five, 五国委员会, 453
- Connaught, Duke of, 康诺特公爵, 117
- Conservative Party, joins 1916 Coalition, 保守党, 参加 1916 年联合政府, 121; in 1918 election, 在 1918 年的选举中, 122; leaves Coalition, 离开联合政府, 127—8; in 1922 election, 在 1922 年的选举中, 131; in 1923—1924 elections, 在 1923—1924 年的选举当中, 145, 147; numbers, in 1924 Government, 在 1924 年政府中所占的席位, 155; attitude of laissez-faire (1926), 放任主义态度 (1926年), 222—3; record of (1924—9), 1924—1929 年期间的成绩, 243; in 1929 election, 在 1929 年的选举当中, 247; and Baldwin's struggle for leadership, 鲍德温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 252—5; in 1931 election, 在 1931 年的选举当中, 281; attitude towards National Government, 对举国一致政府的态度, 305; and disarmament, 裁军问题,

- 395, 398; and defence White Paper, 有关防御的白皮书, 402; in 1935 election, 在 1935 年选举当中, 431—2; dissenters in, over Czechoslovakia, 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者, 548—9, 564, 568
- Consolidated Fund Bill, 整理公债基金法案, 368
- Cook, A. J., 库克, A. J., 214, 261
- Cooke, Joe, 库克, 乔, 144
- Coolidge, President Calvin, 柯立芝, 卡尔文总统, 133
- Cooper, A. Duff (Viscount Norwich), 库珀, A. 达夫(诺里奇子爵), 174, 178, 215, 320, 321, 384, 536; loses seat (1929), 丧失席位 (1929), 247; described as 'Socialist in disguise', 被描绘为“乔装的社会主义者”, 248; wins St. George's by-election, 圣乔治补选获胜, 254; at Admiralty, 在海军部, 520; and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555, 560, 563—4, 568; resignation, 辞职, 563—4, 572; demands a National Government, 要求成立举国一致政府, 593
- Cooper, Lady Diana, 库珀, 黛安娜夫人, 254, 563
- Corn Production Act (1922), 谷物生产法令, 124
- 'Council of Action' (Lloyd George), “行动委员会”(劳合·乔治), 377—8, 425, 427, 461—2, 486—7, 489
- Cranborne, Lord (5th Marquess of Salisbury), 克兰伯恩勋爵(索尔兹伯里第五侯爵), 44, 277, 538, 549, 573
- Crawford, Katherine, see Macmillan, Catherine, 克劳福德, 凯瑟琳, 参看麦克米伦, 凯瑟琳
- Crawford, William, 克劳福德, 威廉, 48
- Crespigny, Colonel C. R. C. de, 德克雷斯基皮尼, C. R. C. 上校, 79—80, 87, 91, 93
- Cripps, Sir Stafford, 克里普斯, 斯塔福德爵士, 423
- Crittall, Sir Valentine, 克里托尔, 瓦伦丁爵士, 371, 486
- Crookshank, Harry, 克鲁克香克, 哈里, 371, 486
- Crossley, Anthony, 克罗斯利, 安东尼, 322, 538, 549
- Crowe, Sir Eyre, 克劳, 艾尔爵士, 152 页注解
- Crowther, Geoffrey, 克劳瑟, 杰弗里, 374, 377
- Cunliffe-Lister, Philip, see Swinton, Lord, 坎利夫-利斯特, 菲利普, 参看斯温顿勋爵。
- Curzon, Lord, 寇松勋爵, 126—7, 132, 135, 174
-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418; Hitler's 'arbitration treaty' with, 希特勒与之订立“仲裁条约”, 403;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它在战略上的重要性, 465—6; Runciman Mission to, 朗西曼赴捷代表团, 522; crisis, 危机, 542—6, 549—555, 557, 560—568; composition of, 民族成分, 545; Sudetenland, 苏台德, 545, 551—3, 555, 556, 561, 564; Prague occupied, 布拉格被占, 566, 591; territory handed to Poland, 领土交给波兰, 590; gold delivered to Germany, 黄金交给德国, 596—597。see also Munich, 参看慕尼黑黑条。
- Dahlerus, Birger, 达赫莱吕斯, 603
- Daily Express, 《每日快报》, 415
- Daily Herald, 《每日先驱报》, 374
- Daily Mail, 《每日邮报》, 152, 215—216, 224, 248, 415
- Daily Mirror, 《每日镜报》, 209
-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248
- Daladier Edouard, 达拉第, 爱德华, 546, 557, 560, 561, 606
- Dalton, Hugh, 多尔顿, 休, 247, 265, 432, 550, 557, 568—569, 585, 587, 598

- Danzig, 但泽, 596
- Davis Norman, 戴维斯, 诺曼, 397, 530, 532
- Dawes Plan (1924), 道威斯计划 (1924), 200—201, 283, 379
- Dawson, Geoffrey, 道森, 杰弗里, 196, 319, 415, 432, 437, 445, 547, 597
- Defence Loans Bill (1939), 国防公债法案 (1939), 589
- Defence policies, 国防政策, 199—200, 382, 394—411, 433, 489; White Paper on (1935), 关于国防政策的白皮书 (1935), 402, 404, 548
- Demobilisation, after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复员, 106—108
- Depressed Areas Bill, see Special Areas Bill, 贫苦地区法案, 参看特殊地区法案。
- Depression, see Unemployment, 不景气, 参看失业条。
- Derating Bill, see Local Government Act (1929), 减税法案, 参看地方政府法令 (1929)。
- Derby, Bishop of, 德比主教, 117
- Derby, Lord Edward Stanley, 德比, 爱德华·斯坦利勋爵, 122, 124, 129, 138, 174, 317
- Development Act (1929), 发展法令 (1929), 259
- Devonshire, Duke of, as Governor-General of Canada, 德文郡公爵, 任加拿大总督, 110; 112—116; character, 特性, 112—113; refuses India Office, 拒绝担任印度事务大臣, 124; and Irish Treaty, 爱尔兰条约, 124; as Colonial Secretary, 担任殖民大臣, 128—9, 132—3; and projected purchase of The Times, 计划购买《泰晤士报》问题, 130—1; and 'paramountcy' principle, “至上”原则, 133; and American debt dispute, 与美国债务方面的纠纷, 134; in favour of free trade, 赞成自由贸易, 138; dropped in 1924 Government, 脱离 1924 年政府, 174; family life, 家庭生活, 182, 189—193; love of children, 爱小孩, 193; death, 死去, 512
- Devonshire, Mary, Dowager Duchess of, 德文郡公爵未亡人, 玛丽, 190
- Disarmament, see Defence Policies, 裁军, 参看国防政策。
- Disarmament Conference (1932), 裁军会议 (1932), 202, 286, 390—4, 396, 397
-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Population, Royal Commission on, 皇家工业人口分布委员会, 498
- 'Doctor's Mandate', “对医生的授权”, 275
- Dole, see Unemployment, 失业津贴, 参看失业问题。
- Dollfuss, Dr. Engelbert, 多尔夫斯博士, 403, 417, 540
- Dominions, status of, after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自治领地位, 112; end of colonial system, 殖民制度的结束, 287; attitude to League Covenant, 自治领对国联盟约的态度, 383; Imperial Conference (1937), 帝国会议 (1937), 523; enthusiasm over Munich, 对慕尼黑协定表示积极态度, 562
- Doumergue, Gaston, 杜梅尔格, 加斯頓, 396
- Drew, Mrs, daughter of W.E. Gladstone, 德雷夫人, W. E. 格拉德斯通的女儿, 120
- Drummond, Sir Eric (Earl of Perth), 德拉蒙德, 埃里克爵士(珀思伯爵), 424, 588
-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The (Keynes), 《和平的经济后果》(凯恩斯), 123
- Economic crisis (1931), 经济危机 (1931), 265 页以下, 283—6
-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campaign, 经

济重建运动, 355—378
 Economist, 《经济学家》, 225, 548
 Economy Act (1931), 经济法令(1931), 289
 Eden, Sir Anthony (Earl of Avon), 艾登, 安东尼爵士(阿翁伯爵), 174, 178, 421; early political career, 初期的政治生涯, 320—1; visit to Moscow, 访问莫斯科, 379, 405; character and brilliance of, 特性与才气, 384; defends Disarmament Conference, 为裁军会议辩解, 392—3; pleads for increase in defence, 请求增加防务, 395; and assassination of King Alexander, 亚历山大国王被刺, 400; visit to Berlin (1935), 访问柏林(1935), 401—3, 408; in Cabinet, 参加内阁, 415—16; and Abyssinian crisis, 阿比西尼亚危机, 420, 423, 424, 439—45, 447, 453, 455—6; and 1935 election, 1935年选举, 433; appointed Foreign Secretary, 被任为外交大臣, 452, 520; and Rhineland crisis, 莱茵兰危机, 462—465, 470; and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471—3, 475—6; advocates policy of resistance, 拥护抵抗政策, 524; relations with Chamberlain, 和张伯伦的关系, 525—7, 528, 532, 535—9; against Chamberlain's appeasement, 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 531页以下; and Chamberlain's rebuff to Roosevelt, 对张伯伦拒绝罗斯福建议的态度, 533—5; resignation, 辞职, 537—9; opposed to Czechoslovakia policy, 反对对待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 548—9, 552, 559; after Munich, 慕尼黑会议以后, 562, 568; demands a National Government, 要求成立举国一致政府, 593; offers to go to Russia (1939), 自荐赴俄(1939), 598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s, 二十年代的教育事业, 183—4

Edward VIII, King, as Prince of Wales, 国王爱德华八世, 当威尔士太子时的表现, 116, 477; Abdication, 逊位, 438, 477—80, 516
 Einzig, Dr. Paul, 艾因齐格, 保罗博士, 589
 Elections, General: (1906), 大选(1906), 35, 136; (1918), 101; (1922), 131, 137; (1923), 139—46; (1924), 149; (1929), 131, 245, 246—8, 258, 259; (1931), 276, 277—81; (1935), 375, 425—435, 584, 同时参看补选。
 Elliot, Walter, 埃利奥特, 沃尔特, 177, 308, 445, 560, 564
 Ellis, Geoffrey, 埃利斯, 杰弗里, 322, 373, 375
 Ellis, William, 埃利斯, 威廉, 143
 Emergency Powers Bill (1939), 紧急权力法案(1939), 602
 Empire Free Trade, 帝国自由贸易, 248, 252, 255
 Emrys-Evans, Paul, 埃姆里斯-埃文斯, 保罗, 322, 538, 549
 Entwistle, Major Cyril, 恩特威斯尔, 西里尔少校, 371
 Eton College, 伊顿公学, 38, 41—42, 121, 187
 European Common Market, 欧洲共同市场, 320
 Evening Standard, 《晚旗报》, 223
 Exchange Equalisation Fund (1932), 外汇平衡基金(1932), 308
 Eyres-Monsell, B. M. (Chief Whip), 艾尔斯-蒙塞尔, B. M. (主任督导员), 159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355, 385, 471, 同时参看墨索里尼, 本尼托。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英国工业联合会, 360
 Fielding, William, 菲尔丁, 威廉, 111
 Finance Bill (1936), 财政法案(1936), 490
 Firth, Sir William, 弗思, 威廉爵士, 371

- Fitzpatrick, Sir Charles, 菲茨帕特里, 查尔斯爵士, 114
- Fitz Roy, Captain E. A. (Speaker), 菲茨罗伊, E. A. 海军上校(议长), 179
- Flandin, Pierre-Etienne, 弗朗丹, 皮埃尔, 400, 455, 466
- Fletcher, Captain Aubrey, 弗莱彻, 奥布里上尉, 69, 75
- France, imposes sanctions on Germany, 法国, 强行制裁德国, 125; at Genoa Conference, 在热那亚会议上, 125; occupies Ruhr, 占领鲁尔, 132; strength of, 法国的军事力量, 201, 384; change of politicians in, 更变当政人物, 203; finally evacuates Rhineland, 最后撤出莱茵兰, 257; lose Power over Germany, 对德国失去控制, 383; attitude towards Germany and arms, 对德国及武装的态度, 384, 391, 397; and Rhineland reoccupation, 莱茵兰重新被占, 461 页以下; and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471—6; and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545—546, 549, 555, 560; and Poland invasion, 波兰被侵, 604, 606。See also Abyssinia; World War, First, 参看阿比西尼亚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各条。
- Franco, General Francisco, 佛朗哥将军, 473
- Franz Ferdinand, Archduke, assassination of, 奥国皇太子弗朗兹·费迪南被刺杀, 46, 59
- Free-trade policy, 自由贸易政策, 135—8, 204, 272, 277, 307—8。See also Empire Free Trade; Tariffs, 同时参看帝国自由贸易及关税各条。
- Garvin, J. L., 加文, J. L., 370
- Geddes Committee, 格迪斯委员会, 264
- General Strike (1926), 总罢工 (1926), 166, 167, 171, 172, 183, 214—219, 236; preliminaries to, 总罢工的开端, 204, 212—214; asserted illegality of, 断言它是非法的, 215; aftermath of, 总罢工的后果, 220—222, 224, 227—228
- Geneva, see League of Nations, 日内瓦, 参看国际联盟。
- Genoa Conference (1922), 热那亚会议 (1922), 125, 246
- 'Gentleman's Agreement' (Italy, 1936), “君子协定” (意大利, 1936), 475, 531
- George V, King, 国王乔治五世, 151, 422
- George VI, King, as duke of York, 国王乔治六世, 作约克公爵时, 117; as King, 宣布登基, 478
- Germany, guilt complex over, after First World War, 德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德国所存在的犯罪变态心理, 123; reparations, 德国赔款问题, 123, 201, 283, 379, 387; default, 德国违约, 125; Ruhr occupied, 鲁尔被占, 132, 387; at Genoa Conference, 在热那亚会议上, 125; and Rapallo Treaty, 拉巴洛条约 125; Ruhr evacuated, 法国撤出鲁尔, 201, 283; admitted to League of Nations, 准予参加国际联盟, 202, 379, 383; Rhineland finally evacuated by France, 法国终于撤出莱茵兰, 257, 283; U. S. loans to, called in, 美国收回对德贷款, 282;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282, 390—391; increasing menace of, 德国威胁不断增长, 376; rearmament of, 重新武装, 382 页以下; grievances of, under Versailles, 对凡尔塞和约的不满情绪, 386—389, 547; leaves League and Disarmament Conference, 退出国际联盟与裁军会议, 393, 396, 582; reoccupies Rhineland, 再次占领莱茵兰, 460—470; and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473, 476; Halifax visits, 哈利法克斯访问德国, 530—531; relief in, over Czechoslovakia, 在捷克斯洛

- 伐克问题上放心, 546—547; war declared on, and final defeat of, 对德宣战, 德国最后失败, 568, 607。See also Hitler, Adolf; World War, First, 同时参看希特勒, 阿道夫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条。
- Gladstone, Mr. (schoolmaster), 格拉斯通先生(教师), 37, 41
- Glyn, Ralph, 格林, 拉尔夫, 247
- Godesberg, Chamberlain's visit to, 戈德斯贝格, 张伯伦到此访问, 557, 558, 564
- Gold standard, 金本位, 204—5, 230, 242, 269, 273—4, 282, 284, 360, 364—5
- Goodenough, Sir Francis, 古迪纳夫, 弗朗西斯爵士, 371
- Göring, Hermann, 戈林, 赫尔曼, 401, 531, 545, 603
- Gorki, Maxim, 高尔基, 马克西姆, 347—8
- Gouin, Sir Lomer, 古安, 洛梅尔爵士, 114
- Graham, William, 格雷厄姆, 威廉, 223
- Grandi, Dino, 格兰迪, 迪诺, 419, 440, 536
- Grattan-Doyle, Sir Nicholas, 格兰顿—多伊尔, 尼古拉斯爵士, 322, 427
- Grayson, Victor, 格雷森, 维克托, 121
- Great Western Railway, 大西铁路, 244
- Greece, 希腊, 126, 522, 592
- Greenwood, Arthur, 格林伍德, 阿瑟, 433, 587, 602, 606
- Grenadier Guards, 英国近卫步兵第一团, 63 页以下, 106—9
- Gretton, Colonel, 格雷顿上校, 178
- Griffith, Kingsley, 格里菲思, 金斯利, 279, 427
- Grigg, Edward, 格里格, 爱德华, 322
- Grigg, Sir James, 格里格, 詹姆斯爵士, 125
- Gunston, Derrick, 冈斯顿, 德里克, 549
- Gwynn, Stephen, 格温, 斯蒂芬, 37
- Haddington, Lord, 哈丁顿勋爵, 116
- Hague Conference, 海牙会议, 256
- Hailsham, Lord, see Hogg, Sir Douglas, 黑尔什姆勋爵, 参看霍格, 道格拉斯爵士。
- Halifax, Lord (formerly Lord Irwin), 哈利法克斯勋爵(以前的欧文勋爵), 177, 570, 594, 598, 606; Viceroy of India, 担任印度总督, 317—318; supports appeasement, 支持绥靖政策, 376, 543, 548; as Foreign Secretary, 担任外交大臣, 413, 520, 522, 537, 539; visit to Germany, 访问德国, 530—1;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特性与品格, 539—540; warns Hitler on Czechoslovakia, 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警告希特勒, 546, 553; turns from appeasement, 对绥靖政策感到厌恶, 560, 566; visit to Rome (1939), 访问罗马(1939), 589; reaction to Albanian crisis, 对阿尔巴尼亚危机的反应, 592; fear of two hostile blocs, 恐怕出现两个敌对集团, 597
- Hamilton, Colonel G. C., 汉米尔顿, G. C. 上校, 67, 73
- Hardy, Thomas, 哈代, 托马斯, 117, 119, 186
- Hartington, Lady, 哈廷顿夫人, 276—7
- Hartington, Lord, 哈廷顿勋爵, 139, 150, 276
- Headlam, Cuthbert, 黑德勒姆, 卡思伯特, 322, 371, 372
- Heath, Edward, 希思, 爱德华, 320, 583
- Henderson, Arthur, 亨德森, 阿瑟, 168, 257, 390, 392
- Henderson, Colonel, 亨德森上校, 115
- Henderson, Sir Nevile, 亨德森, 内维尔爵士, 530, 541, 546, 604
- Henlein, Konrad, 亨莱因, 康拉德, 551—3, 555
- Herbert, Sir Alan, 赫伯特, 艾伦爵士, 44, 63
- Herbert, Sir Sidney, 赫伯特, 西德尼

- 爵士, 229, 549, 570—1, 592—3
- Herriot, Edouard, 赫里欧, 爱德华, 201, 203, 391
- Heyworth, General, 海沃思将军, 69
- Hichens, Lionel, 希琴斯, 莱昂内尔, 371
- Higginson, General Sir George, 希金森, 乔治爵士将军, 67
- Hills, Major Jack, 希尔斯, 杰克少校, 223, 225, 375, 538
- Hitchin, 希钦, 250—2
- Hitler, Adolf, 希特勒, 阿道夫, 313; rise to power, 掌权, 385, 388, 389, 394; becomes Chancellor, 成为总理, 392; and German rearmament, 德国重新武装, 393, 397, 399—406, 408, 410, 412, 418; and Abyssinian crisis, 437—8, 449, 454; Lloyd George visits, 劳合·乔治与他会见, 458, 489, 547; and Rhineland reoccupation, 重新占领莱茵兰, 460—2, 464—5, 469—71; and Nyon Conference, 尼翁会议, 476; takes over Austria, 接收奥地利, 522, 540—542; puts pressure on Czechoslovakia, 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 522, 542—547, 551—6; meets Halifax, 会见哈利法克斯, 531; Nuremberg speech (1938), 纽伦堡讲话 (1938), 553—4, 555; Chamberlain's visits to, before Munich, 在慕尼黑会议以前张伯伦访问他, 556—560; at Munich, 在慕尼黑会议上, 561—2; enters Prague, 进入布拉格, 566, 590—591; pleads 'self-determination', 主张“民族自决”, 574; mesmeric effect of, on visitors, 他对访问者的迷惑作用, 577; and Jewish pogroms, 对犹太人的屠杀, 586—7; and invasion of Poland, 侵略波兰, 595, 596, 602—604
- Hoare, Sir Samuel (Viscount Templewood), at India Office, 霍尔, 塞缪尔爵士(坦普尔伍德子爵), 担任印度事务大臣, 271, 319, 449; relations with Eden, 与艾登的关系, 320; at Admiralty, 担任海军大臣, 404, 456; as Foreign Secretary, 担任外交大臣, 413, 415; and Abyssinian crisis, 阿比西尼亚危机, 418, 420—1, 424, 428, 429, 439—53; character, 性格, 449; moves to Home Office, 调任内务大臣, 519—20; backs Chamberlain's rebuff to Roosevelt, 支持张伯伦拒绝罗斯福的建议, 535; Chamberlain's close relations with, 张伯伦和他的密切关系, 537, 540, 594; and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559; pictures dictators co-operating in world peace, 描绘独裁者能在世界和平事业上合作, 590
- Hoare-Laval Agreement, 霍尔-赖伐尔协定, 409, 439—55
- Hogg, Sir Douglas (Lord Hailsham), 霍格, 道格拉斯爵士(黑尔什姆勋爵), 129, 216, 273, 370, 583
- Hogg, Quintin, 霍格, 昆廷, 583—4
- Home, Lord, 霍姆勋爵, 320
- Honours system, 勋章制度, 126
- Hopkins, Sir Frederick Gowland, 霍普金斯, 弗雷德里克·高兰爵士, 486
- Hore-Belisha, Leslie, 霍尔-贝利沙, 莱斯利, 315
- Horne, Sir Robert, 霍恩, 罗伯特爵士, 204, 368, 371, 497
- Horsted Keynes, Sussex, 霍斯特德·凯恩斯, 苏塞克斯, 58
- Horticultural Tariffs Act, 园艺品关税条例, 307
- House of Commons, during National Government, 在举国一致政府期间的下院, 309—323. See also Parliamentary procedure, 同时参看议院法。
- Housing, 住房问题, 209
- Housman, Laurence, 豪斯曼, 劳伦斯, 375
- Hudson, Rob, 赫德森, 罗布, 178, 225, 234, 247, 321, 603

- Hughes, Thomas, 休斯, 托马斯, 47—49, 51
- Hunstanton, 亨斯坦敦, 33
- Hylton-Foster, Sir Harry (Speaker), 希尔顿-福斯特, 哈里爵士(议长), 179
- Hymans, Paul, 许曼兹, 保罗, 421
- Imperial Chemicals Industries, 帝国化学工业公司, 161, 247
- Imperial Conference (1926), 帝国会议, (1926), 112, 199; (1937), 523
- Import Duties' Advisory Committee (1932), 进口关税咨询委员会 (1932), 309, 358
- Import Duties Bill, 进口关税法令, 358—9
- India, 印度, 199, 255, 257, 317—19
- India Defence League, 印度保卫同盟, 317
- Industrial Christian Fellowship, 工业界基督教徒联谊会, 489
- Industrial Reorganisation League, 工业改组同盟, 371
- Industrial Transference Board, 工业转移委员会, 234
- 'Industrials', the, “工业家”, 178
- Ingersoll, Captain, R.E., 英格索尔, R. E. 海军上校, 530, 532
- Inskip, Sir Thomas (Viscount Caldecote), 英斯基普, 托马斯爵士, 470, 520
- International Brigade,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义勇队, 474
- Invergordon, mutiny at, 海军在因弗戈登叛变, 273, 282
- Ireland, 爱尔兰, 123—4
- Irwin, Lord, see Halifax, Lord, 欧文勋爵, 参看哈利法克斯勋爵。
- Isolationism, see United States, 孤立主义, 参看美国条。
- Italy, attack on Abyssinia, 意大利, 进攻阿比西尼亚, 411—24, 428—30, 434—435, 436—455; and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472—6. See also
- Mussolini, Benito, 同时参看墨索里尼, 本尼托条。
- Japan, as potential enemy, 日本, 成为潜在敌人, 200, 379, 453; failure of Naval Conference, 海军会议的失败, 202; invasion of China, 侵略中国, 380—382, 383, 393, 522, 529; leaves League of Nations, 退出国际联盟, 393, 582; attacks Shanghai, 进攻上海, 523; Pearl Harbour, 珍珠港, 533
- Jarrow, 贾罗, 294
- Jeffreys, Colonel G. D. (General Lord Jeffreys), 杰弗里斯, G. D. 上校 (杰弗里斯勋爵将军), 79
- Jewish pogroms,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586
- Johnson, Hewlett, Dean of Canterbury, 约翰逊, 休利特, 坎特伯雷教长, 475 页注解。
- Johnson Act (1934), 约翰逊法令 (1934), 469, 535
- Johnston, Thomas, 约翰斯顿, 托马斯, 258, 260
- Jones, Dr. Thomas, 琼斯, 托马斯博士, 196, 316, 319, 399, 432, 466, 547—8
- Jowitt, William, K. C., 乔伊特, 威廉, K. C., 246
- Joynson-Hicks, Sir William (Viscount Brentford), 乔因森-希克斯, 威廉爵士 (布伦特福德子爵), 236
- Kellogg-Briand Pact (1928), 凯洛格-白里安条约 (1928), 202, 379
- Kennedy, President John F., 肯尼迪, 约翰 F. 总统, 396
- Kenya, 肯尼亚, 133
- Kerr, Hamilton, 克尔, 汉密尔顿, 322, 538
- Keynes, J. Maynard, 凯恩斯, J. 梅纳德, 41, 123, 134, 204, 363, 366, 386, 460, 490, 510
- Kharkov, visit to, 哈尔科夫, 本书作者到此地访问, 344

- Khrushchev, Nikita, 赫鲁晓夫, 尼基塔, 396, 596
- Kinderfreund, Mme., 金德尔弗罗因德太太, 328, 350
- Kindersley, Major Guy, 金德斯利, 盖伊少校, 251
- King, Mackenzie, 金·麦肯齐, 113—115, 512, 523
- King's Royal Rifle Corps, 英国皇家步枪军团, 61
- Kingsley, Charles, 金斯利, 查尔斯, 51
- Kipling, Rudyard, 吉卜林, 拉迪亚德, 119, 185—186
- Kirkwood, David, 柯克伍德, 戴维, 168
- Knox, Dillwyn, 诺克斯, 迪尔温, 43
- Knox, Geoffrey, 诺克斯, 杰弗里, 400
- Knox, Mgr. Ronald, 诺克斯, 罗纳德, 43, 45, 97, 187
- Labour Party, in 1922 election, 工党, 在 1922 年选举中, 131; in 1923—4 elections, 在 1923—1924 年的选举中, 145, 147; numbers, in 1924 Government, 在 1924 年内阁中所得票数, 155; and unemployment, 失业问题, 230; in 1929 election, 在 1929 年的选举中, 245, 247, 258; gradual disintegration of, 逐渐分裂, 252; in 1931 election, 在 1931 年的选举中, 280—1; loses leading figures, 主要人物落选, 310; pacifism of, 和平主义, 385, 395, 398; and Hitler's nonaggression offers, 希特勒建议互不侵犯, 407; and Abyssinian crisis, 阿比西尼亚危机, 423; in 1935 election, 在 1935 年的选举中, 431, 432; opposes National Service, 反对国民兵役制, 594
- Lambart, Julian, 兰巴特, 朱利安, 42
- Lansbury, George, 兰斯伯里, 乔治, 258, 260, 310—311, 385, 399, 415, 423
- Lansdowne, Lady, 兰斯多恩夫人, 188
- Lansdowne, Lord, 兰斯多恩勋爵, 121, 124, 188—189
- Last, Mrs. (nurse), 拉斯特太太(嫖姆), 36, 40, 181
- Laurier, Sir Wilfrid, 劳里埃, 威尔弗里德爵士, 111, 113
- Lausanne Conference (1932), 洛桑会议 (1932), 287, 308, 379, 387
- Laval, Pierre, 赖伐尔, 皮埃尔, 400—401, 404, 406, 409, 420, 429, 439—447, 466
- Law, A. Bonar, 劳, A. 博纳, 121, 122, 127—134, 137, 145, 148
- Law, Richard (Lord Coleraine), 劳, 理查德(科尔雷因勋爵), 322, 567, 601
- Lawrence Guy, 劳伦斯, 盖伊, 97
- Lawrence, Sir Herbert, 劳伦斯, 赫伯特爵士, 213
- Lawrence, Susan, 劳伦斯, 苏珊, 426, 431
- Layton, Lieutenant, 莱顿中尉, 69, 75
- Layton, Sir Walter (Lord Layton), 莱顿, 沃尔特爵士(莱顿勋爵), 377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105, 112, 283, 375, 581; Germany joins, 德国加入, 379, 383; Manchurian crisis and, 满洲危机与国际联盟, 380—382; U.S. absence from, 美国未加入国联, 380—381; dependent on Anglo-French alliance, 依赖英法同盟, 383; and Austrian economy, 奥地利经济, 388; Germany leaves, 德国退出国联, 396, 401—402; Russia joins, 俄国加入, 398; arranges police troops during Saar plebiscite, 在萨尔公民投票期间安排治安部队, 400; and German rearmament, 德国重新武装, 406; author supports, 本书作者支持国联, 428, 525; weakness of, after Abyssinian crisis, 阿比西尼亚危机以后国联削弱了, 528. See also Abyssinian Crisis, 同时参看阿比西尼亚危机条。
- Lee, Kenneth, 李, 肯尼思, 213
- Leningrad, visit to, 访问列宁格勒, 328—332, 350

Lennox-Boyd, Alan, 伦诺克斯-博伊德, 艾伦, 498

Leopold, King of the Belgians, 利奥波德, 比利时国王, 603

Liberal Party, splits in, 自由党的分裂, 114, 121, 131; in 1922 election, 它在 1922 年的选举中, 131; in 1923—4 elections, 它在 1923—1924 年的选举中, 145, 147; in 1924 Government, 它在 1924 年的政府中, 150; decline of, 它的政治地位的衰退, 155—6, 165; and Yellow Book debate, 对“黄皮书”的辩论, 165; in 1929 election, 在 1929 年的选举中, 245—7; split in, 它的分裂, 263—4, 309—10; in 1931 election, 它在 1931 年的选举中, 281; attitude to National Government, 它对举国一致政府的态度, 305; pacifism of, 它的和平主义政策, 385, 395, 398, in 1935 election, 它在 1935 年的选举中, 431, 432; opposes National Service, 反对国民兵役制, 594

Liberty and Democratic Leadership (manifesto), «自由与民主领导»(宣言), 374

Lindsay, Dr. A.D., 林赛, A. D. 博士, 583

Lindsay, Kenneth, 林赛, 肯尼思, 322

Lindsay, Noel, 林赛, 诺埃尔, 322

Lindsay, Sir Ronald, 林赛, 罗纳德爵士, 532, 534

Litvinov, Maxim, 李维诺夫, M., 335, 345, 398, 595—6

Lloyd, George (Lord Lloyd of Dolobran), 劳埃德, 乔治(多洛布伦的劳埃德勋爵), 109, 478

Lloyd George, David (Earl Lloyd George),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劳合·乔治, 大卫(劳合·乔治伯爵), 品格与特性, 96—97, 164—7; on 1918 Parliament, 论及 1918 年议会, 101; problems facing, after First World War,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所面对的

问题, 114; wins vote of confidence (1918), 取得信任票 (1918), 122; and Irish Treaty, 爱尔兰条约, 123; and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 “重建欧洲”, 125; decline and resignation of, 衰落与辞职, 125—128; greatness of, 他的伟大, 128, 319, 514; on 'Tranquillity', 论“安定”, 131; as villain of the peace 成为和平时期的恶棍, 132; and Asquith, 与阿斯奎斯的关系, 147, 167; and Baldwin, 与鲍德温的关系, 167, 171, 220, 244, 316, 514, 537; opposes extra Dreadnoughts, 反对建造特大的无敌战舰, 199; and General Strike, 总罢工, 215; approves author's speech on industry, 称赞本书作者关于工业的发言, 223; on Trade Disputes Bill, 论劳资争执法案, 228; on unemployment and free trade, 论失业与自由贸易, 230; in full control of Liberals (1929), 完全控制自由党人(1929), 245—6; and MacDonald, 与麦克唐纳的关系, 263, 267; illness of, 生病, 271—2;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举国一致政府, 278; and unemployment policies, 失业政策, 302, 305; and 'New Deal' for Britain, 英国“新政”, 315—16, 376—8, 425; ageing of, 上了年纪, 316—17, 458; charmed by Hitler, 为希特勒所迷惑, 399, 458, 547; and Abyssinian crisis, 阿比西尼亚危机, 420, 456—7; and 'Homes fit for heroes', “为英雄准备的故乡”, 422; in 1935 election, 在 1935 年的选举中, 425, 427, 430, 432; attacks Chamberlain over Eden's resignation, 对艾登辞职事攻击张伯伦, 538; favours alliance with Russia, 赞成与俄国结盟, 598—9。See also Council of Action, 同时参看行动委员会条。

Lloyd Greame, Philip, see Swinton, Lord, 劳埃德-格里姆, 菲利普, 参看斯

- 温斯顿勋爵。
- Local Government ('Derating') Act (1929), 地方政府(减税)法案(1929), 172, 241
-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地方政府改革, 235, 237—42
- Locarno Pact, 洛迦诺公约, 202—203, 243, 379, 397, 461—462
- Loder, John (Lord Wakehurst), 洛德, 约翰(韦克赫斯特勋爵), 173, 178, 247, 384
- London Conference (1924), 伦敦会议(1924), 201
- London Passenger Transport Bill, 伦敦客运法令, 309
- Londonderry, Lord and Lady, 伦敦德里, 勋爵及夫人, 196—7, 399
- Lothian, Lord, 洛西恩勋爵, 196, 399, 461, 486
- Ludlow, Sergeant-Major E., 勒德洛, E. 军士长, 67
- Lumley, Roger (Lord Scarbrough), 拉姆利, 罗杰(斯卡布勒勋爵), 234, 322
- Lyttelton, Edward, 利特尔顿, 爱德华, 121
- Lyttelton, Oliver (Lord Chandos), 利特尔顿, 奥利弗(钱多斯勋爵), 371
- McCarthy, Desmond, 麦卡锡, 德斯蒙德, 375
- MacDonald, Malcolm, 麦克唐纳, 马尔科姆, 564
- MacDonald, Ramsay, as Prime Minister (1924), 麦克唐纳, 拉姆齐, 担任首相(1924), 148, 150—2; in Opposition, 在野, 167—8; as broadcaster, 作为广播者, 171; and Dawes Report, 道威斯报告, 201; appeals to 'Young Conservatives' to join Labour, 呼吁“青年保守党人”加入工党, 208; and evacuation of Ruhr, 撤出鲁尔, 212; visits U. S. A. (1929), 访问美国(1929), 257; difficulties in 1929 Government, 1929年政府的困难, 258—259; Lloyd George and, 劳合·乔治和他的关系, 263; and 1931 crisis, 1931年危机, 265—70; becomes head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成为举国一致政府的首领, 271—5; Labour Party attacks on, 工党对他进行攻击, 279; at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在世界经济会议上, 287—8; fades out as Prime Minister, 作为首相逐渐隐没, 302, 311—12; personality, 人格, 312, 519; on Reconstruction, 对《重建》的评论, 370; and Clifford Allen, 与克利福德·艾伦的关系, 374; his Plan on armaments, 他的军备计划, 391—2; and defence White Paper, 防务“白皮书”, 401; becomes Lord President, 成为枢密大臣, 412; resigns, 辞职, 518; summary achievements, 成就摘要, 518—19
- McKenna, Reginald, 麦克纳, 雷金纳德, 134, 135, 148, 199
- McKenna Duties, 麦克纳税, 138, 203, 205, 207
- Macmillan, Alexander (great uncle), 麦克米伦, 亚历山大(叔祖), 47, 51—52, 55
- Macmillan, Arthur (brother), 麦克米伦, 阿瑟(兄弟), 38, 43
- Macmillan, Daniel (brother), 麦克米伦, 丹尼尔(兄弟), 38, 41, 43, 54, 118—119, 483—4, 573
- Macmillan, Daniel (grandfather), 麦克米伦, 丹尼尔(祖父), 47—51
- Macmillan, Lady Dorothy (wife), marriage, 麦克米伦, 多罗西夫人(妻子), 结婚, 116—117, campaigning activities, 竞选活动, 142, 144, 154, 278
- Macmillan, Duncan, 麦克米伦, 邓肯, 48
- Macmillan, Sir Frederick (uncle), 麦克米伦, 弗雷德里克爵士(伯父), 44, 52, 118—19, 186, 483
- Macmillan, George, 麦克米伦, 乔治,

44, 118, 483

Macmillan, Harold, birth, 麦克米伦, 哈罗德, 诞生, 30; early life, 童年生活, 30—41; first schooldays, 童年学生时代, 37, 41; reading habits, 阅读习惯, 38, 97, 102; religious teaching, 宗教教育, 39; nervousness, 举止腴腆, 41; enters Eton, 进入伊顿公学, 41; enters Oxford, 进入牛津大学, 43; early political views, 青年时代的政治见解, 44; early social life, 青年时代的社会生活, 44—46; ancestry, 家谱, 47 页以下; operated on for appendicitis, 割治阑尾炎, 60; joins the Army, 参加陆军, 61 页以下; wounded, 受伤, 76—77, 84, 87, 83; in hospital during First World War,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住在医院, 77, 90—92, 95—96; on King's Guard; 在皇家近卫队值勤, 77—78; views on Army experience, 对军队经历的看法, 98—101; goes as A.D.C. to Canada, 以副官身分到加拿大, 110 页以下; marriage, 结婚, 116—17; publishing activities, 从事出版活动, 118—20, 145, 185—187, 483—4; growing interest in politics, 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大, 139; first political campaign, 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 140—6; early speeches, form of, 早期讲话的形式, 143; second campaign, 第二次竞选运动, 151—5; first enters House of Commons, 第一次进入下院, 156; constituency work, 选民工作, 159—164, 211; and unemployment, 失业问题, 162, 260, 284 页以下; joins 'Young Conservatives', 参加“青年保守党”, 177; social life in the twenties, 二十年代的社会生活, 180—5, 187—197; maiden speech, 初次演说, 205—209; in General Strike, 在总罢工当中, 217—219; on Board of G.W.R., 被选进大西铁路董事会, 244; defeated (1929), 选举失败

(1929), 247—8; on Baldwin, 论鲍德温, 249; considers standing for Hitchin, 考虑支持希钦保守党协会, 250—2; and Beaverbrook, 与比弗布鲁克的关系, 256; illness (1931), 生病(1931), 276; returned for Stockton (1931), 为斯托克顿选举而回国, (1931), 278—280; visit to Russia, 访问俄国, 324—354, see also specific towns, 同时参看有关城市; plans for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经济重建计划, 356 页以下; and reflation, 通货再膨胀, 360—5; and 'planning', “计划”, 364—373; absorption in home affairs (1931—1935), 热心国内事务 (1931—1935), 383; on causes of war, 论战争原因, 386; speaks at Kilmarnock, 在基马尔诺克发言, 394—5; 1935 election campaign, 1935 年选举活动, 425—31; disassociates from party policy, 脱离保守党的政策, 458—60; moves to Sussex, 搬家到苏塞克斯, 484; abstains from voting over Eden's resignation, 对艾登辞职问题拒绝投票, 538; listening to Hitler's Nuremberg speech, 听取希特勒在纽伦堡的广播演说, 553—4; relief and doubts over Munich Agreement, 对慕尼黑协定有轻松与怀疑之感, 562; campaign for National Service, 为支持国民兵役制参加运动, 583; supports Dr. Lindsay at Oxford, 在牛津城选举中支持林赛博士, 583; advocates Churchill for P.M., 拥护丘吉尔当首相, 585; takes in refugees, 收容难民, 587; houses evacuated schoolchildren, 为撤退的学童提供住处, 604—605; at outbreak of war, 在战争爆发时, 606—607

Articles: 论文: in Saturday Review (on Unionist Party), 《星期六评论》上有关保守党的文章, 249—250; in The Star (on Rhineland crisis),

- 《星报》上有关莱茵兰危机的文章,467—8
- Letters: 书信: to Baldwin (on his resignation), 写给鲍德温(有关他的辞职), 518
- to his mother (on First World War), 写给母亲(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 69—70, 72—73, 82—83, 96, 100; (on Russian visit), (有关访问俄国), 325—51
- to The Times ('Industry and Democracy'), 写给《泰晤士报》(“工业与民主”), 223; (Mosley), (莫斯利), 261—3; (tariffs), (关税), 356; (Abyssinia), (阿比西尼亚), 428, 445; (Special Areas), (特殊地区), 497;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525; (National Government), (举国一致政府), 593
- Publications: 出版物:
- Industry and the State (1927), 《工业与国家》(1927), 173, 223—4
- The State and Industry (1932), 《国家与工业》(1932), 357—8
- The Next Step (1932), 《下一步》(1932), 359
- Reconstruction (1933), 《重建》(1933), 369—71, 611—21
- Planning for Employment (1935), 《就业计划》(1935), 373, 622—4
- The Next Five Years (1935), 《未来五年》(1935), 374—5, 487—8, 625—36
- The Middle Way (1938), 《中间道路》(1938), 500—3
- The Price of Peace (1938), 《和平的代价》(1938), 584—5, 589, 637—644
- Economic Aspects of Defence (1939), 《国防的经济方面》(1939), 589, 645—61
- Speeches quoted: 讲话引用:
- on 1925 Budget (maiden), 关于 1925 年预算(初次演说), 205—9
- on Conservatism (1925), 关于保守主义 (1925), 210
- on Trade Dispute Bill (1927), 关于劳资争执法案(1927), 226—7
- on tariffs (1932), 关于关税 (1932), 357
- on unemployment, 关于失业(1933), 291, 292; (1934), 296—301; (1936), 490—5, 499—500; (1937), 496; (1938), 508—510
- o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关于政府经费(1933), 366, 367—368; (1936), 494
- on collective security (1934), 关于集体安全(1934), 398
- on industrial reorganisation (1938), 关于工业改组(1938), 503—507
- on rape of Austria (Stockton, 1938), 关于掠夺奥地利(斯托克顿, 1938), 542—543
- on Munich Agreement (1938), 关于慕尼黑协定(1938), 571—572
- Macmillan, Helen Artie, religious views, 麦克米伦, 海伦·阿蒂, 宗教见解, 39; artistic talents, 艺术才能, 55—56; marriages, 两次结婚, 55; character, 性格, 56—58, 482, 512; death, 逝世, 58, 481—483, 511; author's letters to, 本书作者和她的通信, 69—70, 72—73, 82—83, 96, 100, 325—351; suggests author as A.D.C. in Canada, 提议本书作者到加拿大当副官, 110; attitude to author's economic plans, 对本书作者经济计划的态度, 369; author's debt to, 本书作者对她感恩, 482
- Macmillan, Katherine, 麦克米伦, 凯瑟林, 48
- Macmillan, Malcolm, 麦克米伦, 马尔科姆, 48
- Macmillan, Maurice (son), 麦克米伦, 莫里斯(儿子), 44, 181
- Macmillan, Maurice Crawford (father), in family life, 麦克米伦, 莫里斯·克

- 劳福德(父亲),家庭生活, 37—39, 43, 50, 53; religious views, 宗教见解, 39; as publisher, 出版者, 43—44, 53, 118; early life, 幼年生活, 51—52; character, 性格, 52—54; marriage, 婚姻, 55; death, 逝世, 58, 481—3, 511; on amalgamation of Conservatives and National Liberals, 论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合并, 122; attitude to author's economic plans, 对本书作者经济计划的态度, 369; author's debt to, 本书作者对他感恩, 482
- Macmillan, Will, 麦克米伦, 威尔, 118
- Macmillan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Industry, 麦克米伦财政和工业委员会, 268, 360
- MacNamara, Captain, 麦克纳马拉上校, 538
- Macquisten Bill (1925), 麦奎斯顿议案(1925), 226—7
- Madan, Geoffrey, 马登, 杰弗里, 44
- Mafeking Day (1900), 马弗京胜利日(1900), 34
- Mallet, Victor, 马利特, 维克托, 44
- Manchester Guardian, 《曼彻斯特卫报》, 294, 374, 427
- Manchurian crisis, 满洲危机, 380—2
- Margesson, David, 马杰森, 戴维, 447
- Martin, Thomas, 马丁, 托马斯, 322, 368, 372
- Massey, Vincent, 梅西, 文森特, 44, 115
- Maurice, Frederick Denison, 莫里斯, 弗雷德里克·丹尼森, 51
- Maxton, James, 马克斯通, 詹姆斯, 168—169
- May, Erskine, 梅, 厄斯金, 157
- May, Sir George, 梅, 乔治爵士, 264
- May Committee (1931), 梅委员会(1931), 268
- Means test, see Unemployment, 资产考查, 参看失业条。
- Meighen, Arthur, 米恩, 阿瑟, 111, 113—114
- Meynell, Lady Mary, 梅内尔, 玛丽夫人, 77
- 'Middle Way' policy, “中间道路”政策, 223—224
- Mills, Lord, 米尔斯勋爵, 527—528
- Minchin, Second Lieutenant, 明钦少尉, 85—86
- Miners' Federation, 煤矿工人联合会, 213—214, 217
- Mining Industry Bill, 煤矿工业议案, 222
- Minto, Lord, 明托勋爵, 116
- Molotov, Vyacheslav, 莫洛托夫, 维亚契斯拉夫, 596
- Molotov-Ribbentrop Pact (1939),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1939), 522, 598, 602, 604
- Molson, Hugh, 莫尔森, 休, 322, 372, 374, 427
- Molyneux, Hugh, see Sefton, Lord, 莫利纽克斯, 休, 参看塞夫顿勋爵。
- Monckton, Walter, 蒙克顿, 沃尔特, 44
- Mond, Sir Alfred (Lord Melchett), 蒙德, 艾尔弗雷德爵士(梅尔切特勋爵) 222, 228
- Mond, Henry (2nd Lord Melchett), 蒙德, 亨利(梅尔切特勋爵第二), 371
- Moore-Brabazon, Colonel, 穆尔-布拉巴宗上校, 245, 254
- Morgan, Charles, 摩根, 查尔斯, 49, 186—187
- Morley, Lord, 莫利勋爵, 117, 140
- Morrison, Herbert (Lord Morrison of Lambeth), 莫里森, 赫伯特(兰贝思的莫里森勋爵), 311, 432, 433, 557, 587
- Morrison, Captain J.A., 莫里森, J.A. 上尉, 68, 75—77, 93
- Morrison, W.S. ('Shakes') (Speaker), 莫里森, W.S. (“谢克斯”)(下院议长), 179
- Moscow, visits to, 访问莫斯科, 332—335, 344—350
- Mosley, Lady Cynthia, 莫斯利, 辛西娅

夫人, 247
 Mosley, Sir Oswald, 莫斯利, 奥斯瓦德爵士, 247, 258—63, 267
 'Mosley Memorandum', “莫斯利备忘录”, 260
 Munich, 慕尼黑, 323, 485, 560—2; prelude to, 序曲, 559; aftermath of, 后果, 562—72, 584, 596, 603; great question of, 重大问题, 573—582
 Murray, Professor Gilbert, 默里, 吉尔伯特教授, 375, 428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本尼托, 313, 475, 576, 588—9; at Locarno Pact, 在有关洛迦诺公约的会议上, 202; as Fascist leader, 成为法西斯主义的领袖, 385; and rearmament, 重整军备, 394; and Abyssinian invasion, 侵略阿比西尼亚, 406, 411, 415—17, 419, 421—4, 470, 529; prevents Hitler from risking Anschluss (1934), 阻止希特勒冒险合并奥地利 (1934), 417, 540; true position of, 他的真正态度, 471; and Nyon Conference, 尼翁会议, 476, 524; invades Albania, 侵略阿尔巴尼亚, 522, 592, 596; and Spanish Civil War, 西班牙内战, 523; Chamberlain's pursuit of, 张伯伦对他的追求, 526—7, 531—3, 535—7; on weakness of League of Nations, 论国际联盟的软弱, 528; prelude to Munich, 慕尼黑协定的序曲, 559, 560; at Munich, 在慕尼黑会议上, 561; displeased by occupation of Czechoslovakia, 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表示不满, 596; and Polish crisis, 波兰危机, 603, 605
 Nagler, M., 纳格勒, M., 347
 Nall, Sir Joseph, 诺尔, 约瑟夫爵士, 538
 National Assistance Board, 国家援助委员会, 260
 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Service, 全国社会服务委员会, 293

National Government, 举国一致政府, 265, 266, 271, 272, 273, 275, 278, 281, 282 页以下, 305, 306; personalities in, 举国一致政府中的人物, 309—23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国民健康保险, 205
 National Service, 国民兵役制, 583, 594
 Naval Conference, 海军会议, (1923), 202; (1930), 257
 Naval Estimates, 海军预算, 200
 Nazi Party, 纳粹党, 257, 295, 407, 523, 555. See also Hitler, Adolf, 同时参看希特勒, 阿道夫。
 Nevill, Lord Richard, 内维尔, 理查德勋爵, 115
 'New Deal' policy, see Lloyd George, “新政”政策, 参看劳合·乔治。
 New Outlook, The (journal), 《新观点》(杂志), 486—8
 New Party (Mosley), 新党(莫斯利), 261, 263
 New Statesman, 《新政治家》, 223, 553
 New Zealand, 新西兰, 523
 Newman, Sir Robert, 纽曼, 罗伯特爵士, 225
 Next Five Years Group, 未来五年小组, 305, 373—5, 376—8, 425, 485—9, 583
 Nicolson, Sir Harold, 尼科尔森, 哈罗德爵士, 451—2, 502—3, 538, 549, 559
 Nizhni-Novgorod, visit to, 访问下诺夫戈罗德, 335—40
 'No war for ten years' doctrine, “十年无战争”学说, 200, 286, 380
 'Non-intervention', see Spain, civil war in, “不干涉”, 参看西班牙内战。
 Northcliffe, Lord, 诺思克利夫勋爵, 129—30
 Northern Group, 北方集团, 294, 304, 321—322, 368
 Norton, Company Sergeant-Major, 诺敦, 连军士长, 89
 Novar, Lord, 诺瓦尔勋爵, 134

- Nuclear tests, 核试验, 396
- Nyon Conference (1937), 尼翁会议 (1937), 476, 523
- Observer, 《观察家》, 248, 370, 415
- O'Casey, Sean, 奥卡西, 肖恩, 187
- O'Connor, Terence, 奥康纳, 特伦斯, 178, 225, 247, 321, 375
- Onslow, Sir R. (Speaker), 翁斯洛, R. 爵士(下院议长), 157
- Ormsby-Gore, William (Lord Harlech), 奥姆斯比-戈尔, 威廉(哈莱克勋爵), 177, 445
- Orr, Sir John, 奥尔, 约翰爵士, 501
- Ottawa, 渥太华, 110, 113, 116
- Ottawa Conference (1932), 渥太华会议(1932), 287, 308
- Oxford, 牛津大学, 38, 187
- All Souls College, 万灵学院, 374
- Balliol College, 巴利奥尔学院, 43—46, 140, 583
- Union resolution, 学生俱乐部决议, 385, see also Summerfields School, 同时参看萨默菲尔兹学校。
- Ozensky, M., 奥津基, M., 345—6
-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Protocol for, 国际争端和平解决草案, 202
- Pacifism, 和平主义, 385, 397, 414, 415, 581
- Page, Walter Hines, 佩奇, 沃尔特·海因斯, 104
- Palestine, 巴勒斯坦, 596
- Pany, U.S. gunboat, 美国炮舰“帕奈”号, 529
- Papen, Franz von, 巴本, 弗朗兹, 391
- 'Paramountcy', “至上”, 133
- Parliamentary procedure, 议会程序, 156—9, 205—6
- Patrick, Mark, 帕特里克, 马克, 549
- Peace Bollet (1935), 和平投票(1935), 413—15, 417
- 'Peace for our time' (Chamberlain), “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张伯伦), 562, 567
- 'Peace in our time' (Baldwin), “我们时代的和平”(鲍德温), 170
- Peace Pledge Union, 保证和平联盟, 397—8
- Peace Society, 和平协会, 385, 433, 457
- Peace Treaty (1919), 和平条约(1919), 123
- Pearl Harbour, 珍珠港, 533
- Peat, Charles, 皮特, 查尔斯, 322
- Peel, Lord, 皮尔勋爵, 174
- Pensions, War, 战争抚恤金, 160; Widows, Orphans and Old Age, 寡妇、孤儿、老年抚恤金, 172, 205, 208—9, 211
- People's Front Propaganda Committee, 人民阵线宣传委员会, 489
- Percy, Lord Eustace, 珀西, 尤斯塔斯勋爵, 177, 244, 322, 372—3, 376, 498
- Perth, Lord, see Drummond, Sir Eric, 珀思勋爵, 参看德拉蒙德, 埃里克爵士。
- Peterson, Maurice, 彼德森, 莫里斯, 440
- Petter, Sir Ernest, 彼得, 欧内斯特爵士, 254
- Pilkington, Sir Thomas, 皮尔金顿, 托马斯爵士, 62
- 'Planning', policy of, “计划”政策, 364—73
- Platt, Frank, 普拉特, 弗兰克, 371
- Poincaré, Raymond, 彭加勒, 雷蒙, 125, 132, 201, 387, 577
- Poland, 波兰, 590—2, 594, 598, 602—5
- Pole, Sir Felix, 波尔, 费利克斯爵士, 371
-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 政治和经济计划协会, 367
- Political Levy Bill (1925), 国家征集法案(1925), 171
- Pollitt, Colonel George, 波利特, 乔治上校, 141
- Ponsonby, Major Myles, 庞森比, 迈尔斯少校, 67

- Poor Law, 济贫法, 212, 232—3, 234
- Portal, Wyndham (Lord Portal), 波特
尔, 温德姆(波特尔勋爵), 601
- Post Office Savings, 邮政储蓄, 279—
280
- Powell, Major George, 波威尔, 乔治少
校, 64—65
- Prayer Book controversy, 祈祷书的争
论, 229
- Programme of Priorities, A (booklet),
《一个优先考虑的纲领》(小册子) 488
- Protection, 保护贸易制度, 135—8, 152,
153, 172, 203, 230, 252, 256. See also
Tariffs, 同时参看关税条。
- Pugh, Sir Arthur, 皮尤, 阿瑟爵士, 216,
375, 486
- Punch, 《笨拙》漫画杂志, 590
- Queen Mary (Cunarder), “玛丽皇后”号
(丘纳德航线), 294, 308, 493
- Rachel McMillan Nursery School, 雷
切尔·麦克米伦幼儿园, 558
- Ramcy, A.B., 拉姆齐, A.B., 42
- Rapallo, Treaty of, 拉巴洛条约, 125
- Rate reform, 地方税额改革, 209, 236
—42
- Rath, vom, assassination of, 拉特被刺,
586
- Rating and Valuation Bill (1925), 地
方税额和定价法案(1925), 209
- Reading, Lord, 里丁勋爵, 271
- Rearmament, see Defence policies:
Hitler, Adolf, 重整军备, 参看国防政
策, 希特勒, 阿道夫各条。
- Reflation, 通货再膨胀, 360—5
- Rhineland, evacuation of, 莱茵兰, 从
此地撤退, 257, 283, 379; Hitler's re-
occupation of, 希特勒重新占领此地,
460—70
- Ribbentrop, Joachim von, 里宾特洛甫,
约阿希姆, 546, 547, 590
- Ritchie, D.G. ('Dog'), 里奇, D.G. (“狗
子”), 89
- Robertson, Sir Malcolm, 罗伯逊, 马尔
科姆爵士, 371
- Roosevelt, President Franklin D., 罗
斯福, 富兰克林·D., 总统, 171, 287—
288, 455, 529—530, 533—5, 562, 603
- Ropner, Leonard, 罗普纳, 伦纳德, 251
- Ropner, Leonard, M.P., 罗普纳, 伦纳
德, 议员, 217, 538
- Rosengoltz, Commissar, 罗森戈尔茨人
民委员, 345
- Rostov, visit to, 访问罗斯托夫, 342—4
- Rothermere, Lord, 罗瑟米尔勋爵, 130
—1, 245, 252, 254—5, 399
- Roumania, 罗马尼亚, 522, 592, 594,
598
- Rowntree, Seebohm, 朗特里, 西博姆,
371, 501
- Ruhr, occupation of the, 鲁尔, 它被占
领, 132, 387; evacuation of the, 它
被撤出, 201, 212, 283
- Runciman, Walter (Viscount Runci-
man), 朗西曼, 沃尔特(朗西曼子爵),
279—80, 319—20, 362, 522
- Runciman Mission to Czechoslovakia
(1938), 朗西曼赴捷代表团(1938), 551
—2
- Rushcliffe, Lord, 拉什克利夫勋爵, 508
—9
- Russell, Lady Arthur, 罗素, 阿瑟夫人,
37
- Russel, George (“Æ”), 拉塞尔, 乔治
(“Æ”), 187
- Russia, pre-Revolutionary, 革命前的俄
国, 103
- Russia, Soviet, signs Rapallo Treaty,
苏俄, 签订拉巴洛条约, 125; author's
visit to, 本书作者访苏, 324—54, see
also specific towns; 另外参看具体城
市; Eden visits, 艾登访苏, 379, 405;
joins League of Nations, 参加国联,
398; Chamberlain suspicious of, 张
伯伦对它怀疑, 529, 566; proposes

- Four-Power Conference (1938), 建议举行四强会议(1938), 543; protests to Germany over Czechoslovakia, 抗议德国侵入捷克斯洛伐克, 546; opinion of Munich in, 对慕尼黑协定的看法, 579; proposes conference to resist aggression, 建议举行会议抵抗侵略, 591; distrust between Britain and, 英俄互不信任, 594—5; offers Tripartite Alliance, 提出三国同盟, 595—600. See also Molotov-Ribbentrop Pact, 同时参看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 Russian Treaty, 俄国条约, 150—151
- Russo-Japanese war (1904), 日俄战争(1904), 35
- 'Safety First' policy, “安全第一”政策, 131, 244—5
- Saint-Quentin, M. de, 德圣康坦, M., 440—441
- Salisbury, 4th Marquess of, 索尔兹伯里侯爵, 138
- Salter, Sir Arthur, 索尔特, 阿索爵士, 246, 367, 374, 375, 487
- Samuel, Herbert (Viscount Samuel), 塞缪尔, 赫伯特(塞缪尔子爵), 167, 213, 216, 221, 265, 271, 275, 307, 308, 315, 357, 378, 432
- Sanctions, against Italy, 对意大利的制裁, 414—24, 429—30, 439, 452—6
- Sandys Duncan, 桑兹, 邓肯, 588
- Sankey, Lord, 桑基勋爵, 271, 370
- Sankey Commission, 桑基委员会, 213
- Sargent, Sir Orme, 萨金特, 奥姆爵士, 599
- Sassoon, Sir Philip, 萨松, 菲利普爵士, 408
- Saturday Review, 《星期六评论》, 248, 249—250
- Schleicher, General Kurt von, 施莱歇, 库特将军, 391—392
- Schuschnigg, Dr. Kurt von, 许施尼格, 库特博士, 541
- Scott, Sir Leslie, 斯科特, 莱斯利爵士, 222, 228—229
- Scott-Lidgett, Dr., 斯科特-利杰特博士, 428
- Seekt, General von, 赛克特将军, 390
- Sefton, Lord, 赛夫顿勋爵, 116
- Seven-Hour Act, suspension of, 七小时法案暂行停止, 221
- Seyss-Inquart, Artur von, 赛斯-英夸特, 541
- Shaw, Tom, 肖, 汤姆, 211
- Shaw-Stewart, Patrick, 肖-斯图尔特, 帕特里克, 95
- Sheppard, Canon H.R.L., 谢泼德, 卡农 H. R.L., 385, 415, 581
- Sieff, Israel, 西夫, 伊斯雷尔, 371
- Simon, Sir John (Viscount Simon), and Lloyd George, 西蒙, 约翰爵士(西蒙子爵), 他和劳合·乔治的关系, 167; asserts General Strike to be illegal, 断言总罢工为非法, 167, 215; omitted from Cabinet (1931), 自内阁中消除(1931), 272; on exports, 论出口, 276; as Foreign Secretary, 担任外交大臣, 314, 412—413; relations with Eden, 和艾登的关系, 320; and Japan, 日本问题, 381—2; armaments plan, 军备计划, 393; visits Berlin, 访问柏林, 401—3, 408; and Anglo-German Naval Agreement, 英德海军协定, 404; and Abyssinian crisis, 阿比西尼亚危机, 406, 458; at Home Office, 在内政部, 412—413; as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担任财政大臣, 463, 519; and Rhineland crisis, 莱茵兰危机, 463; and Eden's resignation, 艾登辞职, 538; in Chamberlain's 'inner Cabinet', 参加张伯伦的“核心内阁”, 540, 594; anxious to accept Godesberg terms, 急于接受戈德斯贝格条件, 559; continued support of appeasement, 继续支持绥靖

- 政策, 566; and Munich aftermath, 慕尼黑会议的后果, 596—7
- Sinclair, Sir Archibald, 辛克莱, 阿奇博尔德爵士, 308, 315, 442, 479, 548, 602
- Sitwell, Sir Osbert, 西特韦尔, 奥斯伯特爵士, 97
- Skelton, Noel, 斯克尔顿, 诺埃尔, 171, 178, 255
- Smith, Herbert, 史密斯, 赫伯特, 214
- Snowden, Philip (Viscount Snowden), 斯诺登, 菲利普 (斯诺登子爵), 168, 203—204, 207, 256, 258, 259, 264—5, 267, 270, 271, 279, 307, 308, 317, 356, 365, 465
- South Africa, 南非, 523
- Spain, civil war in, 西班牙内战, 471—476, 523, 525
- Speakers, qualities of, 几位下院议长的特质, 179
- Spears, General Sir Edward (Louis) 斯皮尔, 爱德华 (路易斯) 爵士将军, 322, 445, 466, 538, 549, 585
- Special Areas Bill (1934), 特殊地区法案 (1934), 300; Amendment (1937), 修正案 (1937), 496
- Special Areas Reconstruction Act (1936), 特殊地区重建法令 (1936), 498
- Spectator, 《旁观者》, 147—8, 248, 415, 588
- Spender-Clay, Colonel, 斯彭德-克莱上校, 178
- Stalin, Josef, 斯大林, 约瑟夫, 379, 398, 405, 595, 596
- Stalingrad, visit to, 访问斯大林格勒, 341—342
- Stanley, Oliver, 斯坦利, 奥利弗, 173, 178, 247, 297, 298, 300, 321, 445, 555, 560, 564
- Statute of Westminster (1931), 威斯敏斯特法令 (1931), 287
- Steed, Wickham, 斯蒂德, 威克姆, 130
- Steel-Maitland, Sir Arthur, 斯蒂尔-梅特兰, 阿瑟爵士, 225, 234, 376
- Stephen, Campbell, 斯蒂芬, 坎贝尔, 168
- Stephens, James, 斯蒂芬斯, 詹姆斯, 187
- Stewart, Sir Malcolm, 斯图尔特, 马尔科姆爵士, 304—305
- Stimson, Henry, 史汀生, 亨利, 381
- Stockton-on-Tees, author's first campaign in, 斯托克顿 (在提兹河畔), 本书作者在此地进行第一次竞选运动, 139—146; second campaign, 第二次竞选运动, 151—155; constituency duties in, 此地的选区义务, 159—164, 211; General Strike in, 这里的总罢工, 217—218; 1929 campaign in, 1929 年竞选运动, 247; 1931 campaign in, 1931 年竞选运动, 251—2, 278—280; unemployment in, 此地的失业问题, 285; 'planning' conference in, 在此地举行“计划”会议, 372; 1935 campaign in, 1935 年竞选运动, 377—378, 425—433; speech on Anschluss in, 在此地发表有关德奥合并的演说, 542
- Stonehaven, Lord, 斯通黑文勋爵, 266
- Storey, Samuel, 斯托里, 塞缪尔, 322
- Strachey, St. Loe, 斯特雷奇, 圣洛, 148
- Strang, Sir William (Lord Strang), 斯特朗, 威廉爵士 (斯特朗勋爵), 152 页注, 324, 334, 351, 599
- Streatfeild, Sir Henry, 斯特里特菲尔德, 亨利爵士, 63, 77
- Stresa Conference, 斯特雷扎会议, 405, 412, 417, 418
- Stresemann, Gustav, 施特雷泽曼, 古斯塔夫, 202, 257, 390
- Stuart, James, 斯图尔特, 詹姆斯, 150
- Sudetenland, see Czechoslovakia, 苏台德, 参看捷克斯洛伐克。
- Suffragette, revolt, 妇女参政运动者的造反, 103
- Sugden, Sir William, 萨格登, 威廉爵士, 225
- Summerfields School, Oxford, 牛津萨

默菲尔兹学校, 33, 41
Sumner, Humphrey, 萨姆纳, 汉弗莱, 45, 187
Sunday Pictorial, 《星期日画报》, 224
Sunday Times, 《星期日泰晤士报》, 357
Supply, Ministry of, 军需供应部, 586, 594
Swinton, Lord, 斯温顿勋爵, 134, 271, 314, 410
Talbot, Gilbert, 塔尔博特, 吉尔伯特, 44, 78, 96, 164
Talbot, Neville, 塔尔博特, 内维尔, 90
Tariffs, 海关, 136—8, 152, 153, 177, 203, 256, 260, 270, 274, 284, 307, 356—358, 364。See also Protection, 同时参看保护贸易制度。
Tawney, R.H., 托尼, R.H., 370
Temperley, Professor, 坦珀利教授, 525
Temple, Most Rev. William, Archbishop of York, 坦普尔, 威廉, 约克大主教, 116—117, 370, 375, 486
Templewood, Lord, see Hoare, Sir Samuel, 坦普尔伍德勋爵, 参看霍尔, 塞缪尔爵士。
Tennant, Edward ('Bimbo'), 坦南特, 爱德华(“姑娘”), 67—68, 69, 75, 96
Thoburn, Hugh, 索伯恩, 休, 486
Thomas, J.H., 托马斯, J.H., 215, 216, 258, 271, 319
Thomas, J.P.L., 托马斯, J.P.L., 548
Thompson, Luke, 汤普森, 卢克, 225
Thornaby, 索恩纳比, 141, 144, 146, 285
Thorne, Tommy, 索恩, 汤米, 67
Times, The, 《泰晤士报》, 128, 196, 210—211, 224, 235, 243, 248, 273, 299, 357, 463, 597; struggle for control of, 为控制该报而进行斗争, 130—131; in General Strike, 总罢工中的该报, 219; on unemployment in County Durham, 论述达勒姆郡失业问题, 295, 296; pacifism of, 该报的和平主义, 406, 407, 437; anti-Italianism of, 反

对意大利的表现, 415; and Abyssinian crisis, 意大利危机, 440, 444—5; and Eden's resignation, 艾登辞职, 538; on need for Anglo-German entente, 论英德协定的必要性, 547; on Czechoslovakia, 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553; on Munich controversy, 关于慕尼黑辩论, 572; on Duff Cooper's resignation, 论达夫·库珀的辞职, 572—573。See also author's letters, 同时参看本书作者的书信。
Tories, see Conservative Party, 托利党人, 参看保守党。
Toynbee, Professor Arnold, 托因比, 阿诺德教授, 399, 463
Trade Disputes Bill (1927), 劳资争执议案(1927), 224—8
Trade unions, 工会, 167, 213—14, 216—17, 219—20。See also General Strike, 同时参看总罢工。
'Tranquillity', policy of, “安定”政策, 131, 146
Transitional benefit, see Unemployment, 过渡时期救济金, 参看失业条。
Tree, Ronald, 特里, 罗纳德, 459, 606
Turkey, 土耳其, 126
Turton, Robin, 特顿, 罗宾, 538
'Twenties', life and conditions in the, 二十年代的生活与情况, 180—197; optimism of the, 当时的乐观情绪, 198
Unemployment, before First World War, 失业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120—121; growth of, 失业的增长, 123, 132, 180, 211, 229, 234, 259, 285—6, 289, 293; protection as a means of fighting, 以保护贸易作为斗争手段, 135, 146, 152; on Northeast Coast, 东北海岸地区的失业情况, 160—161, 426; problems of relief for, 失业救济问题, 159—163, 225, 230—235, 260, 268, 284, 289—309, 491 页以下; Royal

- Commission on, 皇家失业保险委员会, 268; distressed areas, 贫困地区, 293 页以下, 496—9; present-day disappearance of, 目前消灭失业, 304; 'hungry thirties', myth of the, “饥饿的三十年代”的神话, 306; improvement in, 失业状况的改善, 306, 490
-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Board, 失业救助委员会, 291—292
- Unemployment Fund, 失业基金, 212, 232—234, 272, 499
- Unionist Party, 统一党, 136
-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lations with Britain after First World War, 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与英国的关系, 103—105; guilt complex over Germany in, 美国对德国存在着罪恶变态心理, 123; dispute over debts settlement, 清算债务的争执, 133—4, 170; sows seeds of Second World War, 播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201; Three-Power Naval Conference fails, 三国海军会议失败, 202; Depression in, 经济萧条, 282, 288;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destroyed by, 美国破坏世界经济会议, 287—288; absence from League of Nations, 不参加国际联盟, 380, 581; and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日本侵略中国, 381—382; at Four-Power disarmament talks, 在四强裁军会议上, 391; isolationism, 孤立主义, 397, 469, 523, 529, 532—3; at Brussels Conference, 参加布鲁塞尔会议, 530; delusions in, about international affairs, 对国际事务存在幻想, 576
- Urquhart, 'Sligger', 厄克特, “斯利格”, 45, 95, 187
- Vansittart, Lord, 范西塔特勋爵, 418, 440
- Versailles, Treaty of, 凡尔赛和约, 123, 379, 382, 386, 387, 391, 394, 397, 400, 403, 404, 461—462
- Vickers, Vincent, V.C, 维克斯, 文森特, V.C., 204
- Victoria, Queen, funeral of, 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 34
- 'Vienna Award', “维也纳裁决书”, 590
- Wallace, Captain Euan, 华莱士, 尤恩, 海军上校, 295—6, 298, 299, 304
- Walpole, Sir Hugh, 沃波尔, 休爵士, 119, 186
- War Loan, 3½%, conversion of, 把战时公债的利息改变为百分之三点五, 307—308
- Washington Eight-Hour Day Convention, 华盛顿八小时工作日协约, 225
- Waugh, Evelyn, 沃, 伊夫林, 185
- We Can Conquer Unemployment (pamphlet), 《我们能够克服失业》(小册子), 245—246
- Weimar Republic, see Germany, 魏玛共和国, 参看德国条。
- Welles, Sumner, 韦尔斯, 萨姆纳, 533
- Wells, H.G., 韦尔斯, H.G., 102, 375
- West, Mrs. (nurse), 韦斯特太太(嫫姆), 181
- Wheat Act (1932), 小麦法令, (1932), 308
- Wheatley, John, 惠特利, 约翰, 168., 258
- Whitley, J.H., (Speaker), 惠特利, J.H. (下院议长), 179
- Wilhelm II, Kaiser, 威廉二世, 德皇, 34, 59, 123, 388
- Wilkinson, Ellen, 威尔金森, 埃伦, 505
- Williams, Dr. (schoolmaster), 威廉斯博士(校长), 41
- Willink, Harry, 威林克, 哈里, 42
- Wilson, Sir Horace, 威尔逊, 霍勒斯爵士, 527—8, 537, 556, 603
- Wilson, President Woodrow, 威尔逊, 伍德罗总统, 104—5, 123, 201, 383
- Windsor, Duke of, see Edward VIII,

- 温泽公爵, 参看爱德华八世。
- Winn, Anthony, 温, 安东尼, 572—3
- Winterton, Lord, 温特顿勋爵, 448
- Wolmer, Lord, 沃尔默勋爵, 498, 549
- Wood, Sir Kingsley, 伍德, 金斯利爵士, 218, 463, 520, 548, 570
-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1933), 世界经济会议 (1933), 287—288
- World War, First, 第一次世界大战, 59—105; comparisons with Second World War,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对比, 92—94; officers and staff, relations between, 军官与参谋之间的关系, 92—94; songs of,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歌曲, 94; effects of, 战争结果, 101—5, 112, 581, 582
- Loos, 罗奥斯, 68, 71—77, 88
- Somme, 56, 64, 85—92
- Ypres, 伊普雷, 81—85, 93
- World War, Second, 第二次世界大战, 92—94, 568
- Worthington-Evans, Sir Laming, 沃辛顿-埃文斯, 拉明爵士, 149, 254
- Yeats, W.B., 耶茨, W.B., 187
- Yellow Book (Britain's Industrial Future), 黄皮书(《英国工业的未来》), 165—6, 245
- Yorkshire Post 《约克郡邮报》, 224
- Young, Allan, 扬, 阿伦, 286, 325, 378, 486, 500
- Young, G.M., 扬, G.M., 245
- 'Young Conservatives', “青年保守党人”, 176, 177—8, 208, 267
- Young Plan (1929), 扬格计划(1929), 201, 257, 283, 379
- Younger, Lord, 扬格勋爵, 147
- Zinoviev Letter, 季诺维也夫信件, 152 页及注解。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